# 未经修改的档案：托洛茨基——神话与人格

[俄]尤·瓦·叶梅利亚诺夫 著
雁 波 译

# 未经修改的档案

## 托洛茨基——神话与人格

尤·瓦·叶梅利亚诺夫 著

雁 波 译

# 译者的话

本书是叶梅利亚诺夫教授“未经修改的档案”系列传记的一本。主要叙述的是托洛茨基的一生。

作品据 2003 年莫斯科“Вече”出版社的原书翻译，未进行考订，引用时要注意与原文校对。

雁波

2024.8.30

# 内容简介

托洛茨基——激烈的革命者、列宁的同事、红军的缔造者、斯大林的反对派和敌人——这个人物在他的政治支持者和反对者以及历史学家中间引起了许多争议，而且现在仍然如此。对一些人来说，他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实践者，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他是世界后台的险恶人物。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的杰出而光辉的人物。

历史学家叶梅利亚诺夫的新书以其研究的公正性和罕见的客观性而著称，这本书尤为珍贵，因为在作家的笔下，这位著名的“不断革命家”，以其真实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

# 目录


译者的话 ..... 2
内容简介 ..... 3
前 言 ..... 5
第 一 章 ..... 8
第 二 章 ..... 36
第 三 章 ..... 55
第 四 章 ..... 72
第 五 章 ..... 82
第 六 章 ..... 95
第 七 章 ..... 109
第 八 章 ..... 122
第 九 章 ..... 130
第 十 章 ..... 143
第 十 一 章 ..... 160
第 十 二 章 ..... 175
第 十 三 章 ..... 201
第 十 四 章 ..... 213
第 十 五 章 ..... 243
第 十 六 章 ..... 254
第 十 七 章 ..... 265
第 十 八 章 ..... 280
第 十 九 章 ..... 293
第 二 十 章 ..... 305
代 替 结 论 ..... 325

# 前 言

5 月 1 日，同往年一样，莫斯科市中心卡尔-马克思纪念碑附近人山人海。许多横幅、红色标语和手工制作的海报证明这里正在举行集会。然而，这次集会并非千篇一律。在离集会者一定距离的地方，站着一些人，他们显然不赞同大多数人的观点，但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在其中一群人中，一个身材高大、手持一面巨大红旗的斯拉夫人格外引人注目。他的白色 T 恤上印着一个戴眼镜、留胡子的浓密头发男子的头像。肖像下面有一个拉丁字母签名：“列昂-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主义的追随者就聚集在这里。

在纳粹党的海报上，有对 1917 年 10 月“夺取俄国的犹太政委”的咒骂，他们的名字赫然在列，托洛茨基的名字排在第一位。

墨西哥艺术家迭戈-里维拉和俄罗斯艺术家伊利亚-格拉祖诺夫为了描绘世界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创作了大量的人物形象。墨西哥城美术宫壁画的创作者里维拉和“20 世纪”油画的创作者格拉祖诺夫在一件事上达成了共识：他们的作品中都有托洛茨基的形象。艺术家们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想法：没有托洛茨基，就难以想象刚刚结束的世纪所发生的动荡和矛盾事件。

托洛茨基逝世 60 多年后，他被逐出莫斯科 70 多年后，围绕其人格的争论仍未停止。这表明，20 世纪的许多问题和冲突已进入新世纪和新千年。托洛茨基的形象在二十一世纪仍然引起尖锐和有争议的评判，这并非偶然。

1917 年秋天，托洛茨基的名字享誉全球。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在他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中描述了这些事件，他为托洛茨基留下了许多生动的素描，在这些素描中，托洛茨基被描绘成胜利革命的杰出护民官。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年，托洛茨基的名字响彻整个俄国。在节日游行队伍中，示威者手持托洛茨基的巨幅画像与列宁的画像并列，在集会上的演讲以讴歌列宁和托洛茨基结束。

然而，几年过去了，从 20 年代中期开始，托洛茨基的名字开始在执政的共产党内部因指责他的分裂活动而引发的尖锐论战中倾斜。“托洛茨基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成了意识形态和政治上不可靠的代名词。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托洛茨基被指控领导反国家阴谋，企图建立波拿巴主义独裁统治、恢复资本主义、肢解苏联并将其领土转让给德国和日本。当时的漫画家描绘了“犹大-托洛茨基”手持血斧，头戴拿破仑三角帽，在希特勒德国领导人面前卑躬屈膝的形象。

随后，在整个苏联历史上，在学校和高等院校里，老师们向学生们讲述托洛茨基主义的危害，他们记住了托洛茨基领导的各种反对派团体的名字。

此时，只有在苏联境外才对托洛茨基有不同的评价。历史学家艾萨克-多伊彻在他的三部曲（《武装的先知》、《被解除武装的先知》和《被流放的先知》）中试图为托洛茨基开脱罪责。多伊彻将托洛茨基的人格笼罩在先知的光环之下，使他的读者相信，托洛茨基主义对苏维埃国家发展的替代方案比斯大林主义的胜利发展道路更符合社会主义理想。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这些思想在我国兴起。这些思想在瓦迪姆-罗戈文的著作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例如，在他的著作《托洛茨基主义有替代方案吗：历年回顾》中）。

那些不赞同托洛茨基主义思想、不相信托洛茨基主义替代方案的生产力的人

也改变了对托洛茨基的态度。虽然沃尔科戈诺夫在他的“领袖肖像”系列中谴责了斯大林的活动（因为他背叛了列宁的事业），然后又谴责了列宁的活动（因为他反人道主义），但这位将军兼历史学家对托洛茨基的态度却不那么明确。沃尔科戈诺夫指出，“托洛茨基是世界革命大爆发这一虚假的乌托邦思想的俘虏”，他同意多伊彻的观点，称托洛茨基是革命的“先知和先谕”。然而，沃尔科戈诺夫认为，“托洛茨基的主要优点是：他是第一个从内部看清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并与之斗争到底的人”。显然，在沃尔科戈诺夫眼中，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为托洛茨基坚持“虚假的乌托邦思想”开脱，并让这位历史学家对他说了许多热情洋溢的话。

托洛茨基在20世纪的评价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导致一些人宣称他仍然是一个尚未解决的人物。显然，正因如此，瓦列里-克拉斯诺夫和弗拉基米尔-戴恩斯于2000年出版了一本关于托洛茨基的书，书名为《未知的托洛茨基》。同时，作者试图证明，他们收集的材料不仅填补了人们对托洛茨基认识的真空，而且使人们有可能给予他高度评价：将他在内战期间的军事领导活动与拿破仑在战场上的辉煌胜利相提并论。

尽管对托洛茨基的评价不尽相同，但许多作者对这位人物在历史上的重要性都不容置疑。一些历史学家将他与列宁和斯大林等苏维埃国家领导人相提并论。但托洛茨基并不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人，而是在1903年至1917年中期与布尔什维主义进行了斗争。托洛茨基担任苏维埃国家领导人的时间没有斯大林长，但他从1918年一直与斯大林进行斗争，直到1940年去世。显然，托洛茨基之所以备受推崇，是因为他反对列宁和斯大林，是列宁和斯大林的失败替代者的缩影。因此，他的活动成为各种假设的主题，即我国历史发展中可能存在的托洛茨基主义变体。

还应考虑到，托洛茨基是在十月革命和内战的动荡时期登上世界舞台的，因此，他是那段风雨飘摇岁月中激情和幻想的缩影。这些情绪化的评价所造成的后果今天仍然可以感受到。所有这些情况都导致托洛茨基真实活动的故事被过多的猜测所淹没，托洛茨基本人成为神话的主题，在一些人眼中变成了“先知”，在另一些人眼中变成了阴险的“革命恶魔”。

托洛茨基是谁？是什么力量将他推上俄国革命浪潮的风口浪尖，进而使他成为世界性人物？托洛茨基的野心是什么？他的真实活动和围绕他的神话产生了什么后果？

现在有许多关于托洛茨基生活和工作的文献记载。他写了一本自传，详细描述了自己的一生。自1903年以来，他的大部分重要讲话都有速记本。他生前发表的文章、命令和指示数量可观。他在国家最高当局会议上的讲话都记录在会议记录中。许多人都留下了与托洛茨基会面的个人回忆。

不过，托洛茨基身份的最终揭晓还在后头。托洛茨基的主要导师和助手、20世纪最神秘的人物之一亚历山大-帕尔乌斯（伊斯雷尔-盖尔芬德）的档案可以让我们了解托洛茨基与当权者的关系。然而，当这位俄罗斯和德国的神秘金融家和社会民主党人的继承人开始整理死者的文件时，却发现其中几乎一无所有。甚至连他的个人照片也不见了。显然，死者或其遗嘱执行人确保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泄露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金融和政治圈子的内部秘密。

共济会组织的文件也被藏了起来，关于托洛茨基与这些组织的联系，报刊上有很多报道。不知道各国是否还有文件可以说明托洛茨基的各种国际活动。

然而，在现有证据的基础上，我们有可能试图重塑托洛茨基的真实肖像，去

除他和他的崇拜者们精心掩盖其个性中所有令人不舒服的特征和妥协关系的修饰。通过试图了解托洛茨基的真实面目，我们还可以揭开那些仍然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现代生活的关于他的神话的本质。

# 第 一 章

# 古人的后裔

1879 年 11 月 7 日（根据西欧日历），列夫（列巴）-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勃朗施坦）出生于乌克兰南部草原上的亚诺夫卡小村，此时距离十月革命爆发整整 38 年。托洛茨基在自传中回忆说，在他出生的那一年，俄国发生了针对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重大恐怖袭击事件，德国总理俾斯麦让帝国国会通过了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法律，并与奥匈帝国签订了条约，路易-勃朗和维克多-雨果要求法国议会赦免巴黎公社分子。然而，正如作者所言：

> “但是，在我出生并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初的 9 年时光的亚诺夫卡，无论是议会政治的喧嚣，还是外交舞台上的纵横捭阖，甚至是炸毁专列的爆炸声，都不能唤起任何回响。
>
> 在这广袤的赫尔松草原乃至整个俄罗斯南部的新罗西亚，完全是一个由小麦和绵羊构成的有着自己的特殊运作规律的独立王国。这里落后的交通和广袤的空间为它抵挡了政治浪潮的冲击。草原上数不尽的荒丘见证了民族迁徙演进的历程”。[1]

命运似乎注定列夫-勃朗施坦要永远呆在一个与世隔绝的村庄里，他的生活可能会变得像所罗门一样，所罗门是乌克兰南部一家客栈的居民，契诃夫的小说《大草原》主人公叶戈鲁什卡在旅途中去过这家客栈。很难说这位伟大的俄罗斯作家 1887 年在乌克兰南部大草原旅行时是否遇到过一个长得像未来的共和国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的人，但我们无法回避的印象是，契诃夫在描述所罗门时，眼前浮现出一张托洛茨基的照片，这张照片被印在艾萨克-多伊彻撰写的传记三部曲第一卷的封面上：

> “现在，在灯光下，你可以看清他的笑容；他的笑容非常复杂，表达了许多感情，但最主要的是一种纯粹的蔑视。他好像在想什么有趣而愚蠢的事情，什么他憎恨和鄙视的事情，什么他欢喜并等待时机嘲笑和大笑的事情。他那长长的鼻子、肥厚的嘴唇、狡猾而凸出的眼睛，似乎都因为想笑而绷得紧紧的”。（引用中的正字法和标点符号是作者编辑的。）

1917 年，约翰-里德在他的名著中对托洛茨基的素描留下了深刻印象：

> “托洛茨基那消瘦的、尖削的面孔上带着一种纯粹是麦斐斯托非尔式[2]的恶意嘲弄的神情。”[3]

正是这些特征——邪恶的讽刺、嘲弄——不断出现在托洛茨基的素描中。10 月 26 日，托洛茨基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言，“在他的嘴唇上徘徊着讽刺的微笑，近乎嘲弄”。同日，“主席台上站起了冷静而毒辣、对自己的权力充满自信的托洛茨基”。邪恶的讽刺和毒辣的挖苦是托洛茨基面部表情的特征，约翰-里德不断注意到他脸上嘲弄和轻蔑的狰狞。

---

[1]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一章 亚诺夫卡”，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2] 麦斐斯托菲尔是西方传说中的魔鬼。歌德在《浮士德》中所描绘的麦斐斯托非尔，是个冷酷无情，诡计多端的恶魔。——译者。

[3] 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第三章 前夜”，1980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正如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梅德姆所说：

“托洛茨基看起来就像他的姐姐（加米涅夫的妻子）。诚然，她是黑眼睛，而他的眼睛是浅灰色的——但两种面部表情都像一只猎鹰。他有一张大嘴，大而歪斜，咬人，令人恐惧……他的舌头锋利，思维超前。俄罗斯有句谚语，说一个人不会为了一句红字而放过自己的父亲，这句话很适合他……后来，他变了很多，变得更加和谐，但他的语言依然如此”。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托洛茨基与契诃夫笔下的所罗门之间的相似之处。所罗门就像未来内战中的演讲家一样，似乎充满了尖锐的滑稽动作和手势、带刺的短语以及充满激情和愤怒谴责的独白：

“叶戈鲁什卡在半梦半醒之间，听到所罗门用嘶哑的嗓音谈论犹太人，嘶哑的嗓音因仇恨而窒息；起初，他用俄语正确地说话，但后来他又陷入了犹太人生活中说书人的语调，开始像他曾经在小丑中那样，用夸张的犹太口音说话”。

但随后光线稍有变化，所罗门的五官不再是滑稽可笑的小丑，而是充满了威胁和险恶：

“叶戈鲁什卡摇摇头，环顾四周；他瞥见了所罗门的脸，就在他的脸转过四分之三朝向他的那一刻，长鼻子的阴影穿过了他整个左脸颊； 蔑视的微笑与那阴影交织在一起，闪烁着嘲弄的眼神，傲慢的表情，以及他整个拔尖的身材，在叶戈鲁什卡的眼中加倍闪现，使他现在看起来不像一个小丑，倒像是一个人们有时会梦见的东西，可能是一个不洁的灵魂”。

可以想象所罗门在 1918 年的集会上是如何“用因仇恨而窒息的嘶哑嗓音”谴责资产阶级的，“他那拔尖的身材”变成了一个令人生畏的“革命恶魔”。

19 世纪末，乌克兰南部大草原上已经出现了一种社会类型（犹太社会），这种社会类型一定有其特殊之处，促使契诃夫注意到它，并仔细描述了草原农场居民的举止、说话语气和面部表情。显然，这位艺术家在他笔下的主人公身上看到了一种尚未被社会关注，但已经准备走向公众生活前沿的重要现象。虽然契诃夫无法预见托洛茨基的诞生，但他在所罗门对当权者、金钱的力量，甚至对上帝的信仰的激烈反抗中，显然描述了 19 世纪末犹太人定居点居民所能感受到的那些情绪的表现。契诃夫讲述了所罗门与他的兄弟摩西-蒙塞耶维奇及其大家庭一起居住的客栈的故事，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熟悉了这些人，在他们中间沸腾着剧烈的激情，不仅叶戈鲁什卡无法理解，他的成年同伴们也无法理解。契诃夫注定活不到这样的时代：在革命风暴中，这些激情从犹太人的小村庄和孤独的草原农场喷涌而出，蔓延到整个伟大的国家，这些激情的承载者开始在俄罗斯的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然而，契诃夫在这一情节中描绘的犹太民族文化环境的特征，在托洛茨基关于他在草原村庄的童年的叙述中几乎看不到。托洛茨基试图以十九世纪俄罗斯著名作家自传体作品的风格来描述自己的童年。因此，在阅读托洛茨基回忆录的前几章时，人们可能会认为他是在叙述开发新俄罗斯（乌东）大草原的俄罗斯地主的家庭生活。托洛茨基在回忆录中提到，他的父亲来自波尔塔瓦省的一个犹太村庄，母亲星期六不进城，老师给他上的第一堂课包括用希伯来语学习《圣经》，只有从这些个别的记载中，我们才能了解到他是在一个犹太家庭中长大的孩子的童年生活。

与托洛茨基关系密切的马克斯-伊斯特曼在解释托洛茨基不愿强调自己民族血统的原因时声称：

“托洛茨基总是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这一事实而感到有些尴尬，就像我认识的所有犹太人一样，经常受到这一事实的影响”。

以色列学者内达瓦对托洛茨基“尴尬”的诚意表示怀疑：

“在我们看来，这种判断既肤浅又可信。伊斯特曼很可能表达了托洛茨基的观点，而这种观点对托洛茨基本人来说是很方便的。托洛茨基希望他对犹太人事务的漠不关心能被他的同事们注意到，并被他的传记作者们注意到”。

内达瓦认为，托洛茨基故意淡化自己对犹太文化和犹太语言的熟悉程度：

“至于传统犹太宗教和伦理的一般知识体系，即使在这方面，托洛茨基的知识也很可能远非他所标榜的完全无知。托洛茨基终其一生对意第绪语所持的不信任的“无知”态度，可以作为他对所有犹太事物的态度的一个指标”。内达瓦指出，“当对意第绪语的无知威胁到托洛茨基的地位或声誉时，他就会勉强透露自己熟悉这种语言”。

内达瓦在指出托洛茨基对其民族血统的态度前后矛盾时写道：

“托洛茨基认为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国际主义者，但却带有不可磨灭的民族印记，致命的是他永远无法完全摆脱自己的犹太血统。他所排斥的犹太主义被证明是他的不治之症.....”

约瑟夫-内达瓦认为，尽管托洛茨基做出了种种努力，但“他的命运可以被视为典型的犹太命运”。

然而，对于托洛茨基的许多政治反对者来说，他不仅仅是他的人民的儿子，而且是犹太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权力的关键人物。在 1920 年出版的《国际犹太人》一书中，著名汽车制造商亨利-福特一再指出托洛茨基在苏维埃俄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地位，以此证明他相信全世界犹太霸权的威胁。1920 年，温斯顿-丘吉尔将托洛茨基列入他认为表明犹太人企图统治世界的个人名单：

“从斯巴达克斯–魏肖普特到卡尔–马克思，再到俄国的托洛茨基、匈牙利的库恩–贝拉、德国的罗莎–卢森堡和美国的艾玛–戈德曼，这个以停滞不前的进步、妒忌的恶意和匪夷所思的平等为原则推翻文化、重塑社会的世界性阴谋一直在发展壮大……它是十九世纪所有颠覆运动的主要动力；最后，这帮非同寻常的，欧美大城市的败类，现在已经奴役了俄罗斯人民，将他们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犹太人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庞大帝国不可分割的主人。没有必要夸大这些国际性的、大部分不信神的犹太人在创立布尔什维主义和进行俄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关于托洛茨基在组织一场由国际犹太人领导的世界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的这些论断和类似论断随后被多次重复。

然而，不仅是托洛茨基的政治对手，他的思想伙伴和民族同胞也将他视为犹太民族的杰出人物。艾萨克-多伊彻是三卷本《托洛茨基传》的作者，也是托洛茨基活动的积极宣传者，他将托洛茨基与巴鲁克-斯宾诺莎、卡尔-马克思、罗莎-卢森堡相提并论，认为托洛茨基是犹太人的典范，他虽然打破了犹太宗教传统，但仍然是犹太民族的杰出代表。约瑟夫-内达瓦不断强调托洛茨基的犹太血统，他在 1989 年以俄文在耶路撒冷出版的《永恒的委员》一书中写道：

“托洛茨基是我们时代的巨人之一”。

尽管犹太文化遗产的宣传者刘易斯-布朗不愿意将托洛茨基的著作摘录到他的文集《以色列的智慧》中，但他将托洛茨基与迪斯雷利、拉萨尔、李卜克内西、柏格森、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等世界上最杰出的犹太世界人物并列。

多伊彻、内达瓦、布朗（福特、丘吉尔）都认为没有必要向读者解释托洛茨基的犹太人身份，显然他们自己和读者都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内达瓦说：

“托洛茨基对俄国来说是个新人，但对犹太人来说却不是”。

然而，对以色列公民来说显而易见的事情，对大多数俄罗斯公民来说却不那么清楚。为什么托洛茨基与爱因斯坦和斯宾诺莎一样，被视为犹太人的典型与犹太民族杰出的儿子？为什么亨利-福特和温斯顿-丘吉尔将托洛茨基视为那些威胁世界其他民族自由和独立的犹太人的代表？

由于这些截然不同的评价在今天仍然普遍存在，很显然，要研究托洛茨基的生平和工作，要了解关于他的相互矛盾的判断中的真假，一方面必须考虑犹太文化对他的影响，另一方面至少要简单了解犹太民族的文化和历史遗产。

显然，内达瓦是对的，无论托洛茨基如何试图淡化他的民族血统的重要性，强调他属于世界文明，一个人只有在他从小在其中长大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加入世界文化。列夫-勃朗施坦学到的第一条生活准则来自犹太教规定的行为准则。他听到的第一句话是用父母的母语对他说的。他从小养成的家庭习惯、风俗和礼仪属于犹太民族的古老文化。

其他作家描述了当年犹太人生活的典型特征，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有可能重现托洛茨基童年生活中那些被他和许多传记作者遗漏的重要片段。例如，与托洛茨基一样在犹太村庄长大的沙皇军队将军格鲁列夫回忆道：

“犹太男孩的第一个家庭仪式，不算割礼，是在他三岁时举行的——那是理发，在亲戚和熟人圈子里举行，同时还要请客，给孩子送礼物”。

托洛茨基在《我的生活》中描述了他幼年时的一些场景，在他的记忆中很可能还保留着这一仪式和其他仪式。

当时，犹太人对古老习俗的恪守和一丝不苟的遵守，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保存其固有文化价值的渴望，这尤其是许多脱离民族根基的民族的特点。作家里昂-费赫特旺格将这种对待古老民族习俗的态度的出现归因于犹太人的主要圣地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他在小说《儿子们》中写道：

“由于耶和华的殿堂不复存在，习俗之于犹太人就如同肉体之于精神；如果习俗消失，犹太性也将消失。割礼是耶和华与他的子民之间肉体结合的象征，对犹太人来说，割礼是他们民族和本质的基本标志”。

必须神圣遵守的习俗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色列的智慧》中列举的对现代正统犹太人具有约束力的规则，不仅包括处理《圣经》的规则和祈祷时应盖在头上的手帕。它还对睡醒后如何洗礼、从哪一边开始睡觉、睡觉时如何变换姿势等问题做了精确的说明。

信教的犹太人对时间的感知本身就很特别，使他们有别于其他民族。托洛茨基和其他传统犹太家庭的孩子一样，从生命的最初几年起，就牢牢记住了安息日在一周其他日子中的特殊地位。格鲁列夫先生写道：

“犹太人在安息日禁止做任何事情：不能碰烛台，不能碰硬币（以便尽可能远离任何交易），不能碰火柴、点燃的蜡烛等等。甚至连手帕也必须拿出来，要么放在家里，要么缠在脖子上，可以说，手帕成了身体的一部分；甚至连多余的指甲也不能剪；甚至在前一天，也就是星期五，也必须把指甲剪掉，然后扔进炉子里，不是扔进垃圾堆里，而是一定要扔进炉子里。毫无疑问，在星期六，亚诺夫卡的生活按照古老的法律处于停滞状态”。

像许多履行宗教要求的民族一样，列夫-勃朗施坦童年时代的犹太人也严格

遵守有关各种食物的禁令。人们只能吃嚼过草和蹄子松动的动物的肉。鸟类只能吃家养的，野味禁止食用。此外，可以吃肉的动物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则宰杀，并伴有特别的祈祷。列夫从小就知道，允许吃的食物被称为“洁食”，而犹太人不能吃的食物被称为“特尼法”。

其中许多禁令起源于史前时代。著名人种学家弗雷泽轻而易举地证明了犹太教禁止“在山羊面前煮羊奶”的禁令与非洲部落类似的古代禁令的相似性，非洲部落认为煮牛奶会导致奶牛停止产奶。这种古老的禁令反映在犹太人过去的习俗中，即只为奶制品菜肴准备单独的餐具和专用桌布。

宗教节日还与各种家庭仪式有关，毫无疑问，列夫从小就知道这些仪式。因此，在新年的节日里，每个家庭成员都要根据性别献祭一只家禽——母鸡或公鸡。根据格鲁列夫先生的说法，在托拉喜悦节（即新年节后不久），“每个人都必须尽情欢乐。在这一天，甚至可以喝一杯葡萄酒”。列夫可能还记得另一个节日光明节，那就是在这一天可以打牌。在光明节的八个晚上，家里都要点燃由八根蜡烛组成的烛台。可以肯定的是，在距离亚诺夫卡最近的犹太殖民者村庄格罗莫克雷，每逢光明节，都会组织节日表演，而这些表演一定会被男孩记住。

需要准备时间最长的节日是逾越节。甚至在节日前一个月，富裕的犹太人就已经租好了新房子，准备在节日期间搬进去住。由于勃朗施坦家拥有一定的财富，他们可能为这个节日准备了一个特别的房间。在节日前一周，家庭成员会整理房屋，清洗地板，粉刷墙壁。他们会特别注意消灭所有残留的面包屑，在打扫干净的房子里，他们会带来专门为这个节日准备的餐具和器皿。这些与节日有关的年度琐事和仪式在男孩的记忆中留下了永恒的痕迹。然而，托洛茨基在他的回忆录中只字未提众多的节日和与之相关的仪式，而这些节日和仪式构成了革命前俄国犹太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犹太人与该国其他人口区分开来。

托洛茨基的自传中没有任何关于他去犹太教堂的回忆。诚然，托洛茨基提到过他在格罗莫克雷的犹太教堂学习的情况，但他没有详细描述。与此同时，在列夫-勃朗施坦成长的岁月里，掌握希伯来语和接触上帝信仰的圣书构成了犹太人文化发展的最重要阶段。格鲁列夫指出，“识字和祈祷的启蒙教育对每个犹太男孩来说都是绝对的义务和不可避免的，哪怕只是对孤独无助的孤儿”，他写道，“不可能想象一个犹太人在这方面是文盲”。因此，当托洛茨基写道，他的父亲是个文盲，只有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才能在书籍和小册子的封面上按音节读出他儿子的名字时，他很可能是指他的父亲不懂俄语，就像当时的许多老年犹太人一样。然而，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列夫-勃朗施坦这位在犹太社区颇有地位的人没有学习过古文和圣书。根据《塔木德》，这应该从五岁开始。

列夫-勃朗施坦六岁时就被送进了幼儿园。在掌握了希伯来语的基础知识后，他和其他幼儿园的学生一样，开始学习《托拉》（“摩西五经”，即《圣经》的前五卷），然后开始熟悉先知的书。

托洛茨基提到，他“不会说传统语言”（托洛茨基称之为“意第绪语”），因此“没有办法与任何人亲近”，而且因为他在学校只呆了“几个月”，所以他声称自己的“学校记忆很少”。然而，他热情地回忆起了他在学校的第一位老师舒费尔，这也使托洛茨基的回忆与其他以前在学校的学生有了明显的区别，后者回忆起他们学习的日子是一段艰苦的岁月，并厌恶地回忆起那些严厉的老师，他们不会放弃小尖针或棍棒。

英菲尔德回忆起他在幼儿园的第一堂课时写道：老师的助手——

“把一本破旧的《圣经》放在桌子上，翻开沾满灰尘的一页，用一根木

头尖尖的指针戳进其中一个希伯来文单词，命令道：‘重复！’，我重复了一遍。‘重复！’，我又重复了一遍。如此重复了五次。然后他又说了一个德文犹太语单词（意第绪语），同样的命令是：‘重复！’，我顺从地重复了一遍。重复了五遍之后，我记住了这两个词，却不明白其中任何一个的意思。不过，我猜其中一个是另一个的翻译……木制的指针慢慢地从一个字移动到另一个字，从一行移动到另一行。助教的另一只手拿着一根棍子。但他从这节课的过程中看出，他不需要这根棍子。于是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桌子上……”

很明显，叙述者和列夫-勃朗施坦一样，意第绪语并不流利，但同样明显的是，在希伯来语学习之余，学生们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意第绪语技能。这根棍子可能就是用来介绍这些语言技能的。

格鲁列夫还回忆了严酷的教学方法：

“对学生的态度始终是严酷的，有时甚至是毫无道理的残酷：打耳光和抽鞭子都是家常便饭；学生们通过.....殴打教员的山羊、弄坏他的手表、千方百计地伤害折磨他们的教员来报复他们的刽子手，当然是在悄无声息的情况下”。

教师和学生几乎整天都在学习，彼此无聊至极，这可能加剧了师生之间的矛盾。格鲁列夫写道：

“男孩们早上不晚于 7–8 点钟就去了幼儿园，一整天都呆在那里，直到晚上 8–9 点钟，即大约 12 个小时，只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他们回家吃午饭”。

由于亚诺夫卡离幼儿园所在的格罗莫克雷很远，据他说，托洛茨基整个星期都呆在那里，直到星期六。他和住在格罗莫克雷的姑妈一起吃午饭和住宿。

即使是东正教神学院的学生，也没有这么早开始学习，也没有花这么多时间学习。然而，向犹太儿童介绍宗教书籍和古代语言的努力受到了几个世纪传统的保护。

当然，犹太教并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圣书在信徒意识形成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宗教。同时，毫无疑问，对犹太人来说，圣书不仅起到宗教作用，而且还取代了他们缺失（或不发达）的文化形式，这些文化形式是其他民族民族特性的强大精神支柱。以色列和犹太城市多次遭到征服者的破坏，犹太国家最终灭亡，与此同时，许多古犹太建筑遗迹也遭到破坏。然而，甚至在耶路撒冷被罗马人摧毁以及其他摧毁以色列人民古代创作的事件发生之前，犹太宗教就禁止复制人物和自然的图像，这使犹太绘画和雕塑的发展瘫痪了许多年。许多世纪以来，犹太音乐文化仅限于会堂曲调、民间仪式歌曲和舞蹈旋律。直到 19 世纪末，作曲家才开始对舞蹈旋律进行加工。犹太戏剧艺术的开端可追溯到中世纪末期，当时职业喜剧演员和小丑开始出现在犹太宗教节日上。根据苏联历史学家的说法，犹太戏剧是 19 世纪中叶在日托米尔和别尔季切夫地区诞生的。中世纪的犹太小说只是在伊斯兰教国家发展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阿拉伯作家的影响，而在基督教国家，犹太世俗文学只是在近代才出现的。因此，许多世纪以来，犹太民族文化遗产中最重要的部分都包含在《圣经》及其注释中。

然而，这并没有结束圣经对犹太人的作用。里昂-费赫特旺格在他的小说《犹太人胥斯》中谈到《圣经》对犹太人的重要性时写道：

“他们没有国家，没有土地，没有国王，没有共同的生活方式将他们团结起来。如果说他们团结在一起，而且比世界上所有其他民族都团结得更牢

固，那就是《圣经》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犹太人，无论深色、浅色、黑色、黝黑，无论伟大还是渺小，无论辉煌还是凄惨，无论邪恶还是虔诚，无论他们一生被禁锢于黑暗之中，还是在五彩缤纷的尘世中中骄傲地闯荡世界：所有人的心中都深藏着《圣经》中的话语。世界虽多，但都是虚空，都是心灵的苦恼，只有以色列的一位伟大的神，永恒的、无所不知的耶和华.....他们带着苍白而隐秘的微笑，思考着以东的力量、它的狂热和它虚荣的贫乏。[4]一切都是短暂的，耶和华是唯一的存在。两千年来，他们一直带着这本书。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家园、一份遗产和一份财产。他们把它传给了所有的民族，所有的民族都在它面前俯首称臣。但唯有他们，唯有他们，才有权拥有它，信奉它，守护它。这本书由 647319 封信组成。每一个字母都被编号、检查、检验和称重”。

《圣经》及其注释是智慧的主要来源，许多世纪以来是道德评价和法律决定的唯一来源，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犹太人的行为都是在此基础上确定的。在费赫特旺格的小说《犹太战争》中，祭司约哈难-本-扎凯宣称：

“犹太王国已经灭亡，.....但团结我们的不是王国。我们团结的意义在于圣律。只要圣律和教义存在，我们的纽带就是牢不可破的——它比来自国家的纽带更加牢固”。

约哈难在评估罗马人摧毁犹太圣殿后“经文”的作用时说：

“圣殿已不复存在。我们拥有的唯一王国就是圣经。它的书籍就是我们的省份，它的箴言就是我们的城市和村庄”。

通过向列夫-勃朗施坦和其他数百万儿童介绍《圣经》文本，犹太教法把他们变成了一个无形的犹太国家的公民，这个国家居住着早已死去或从未存在过的英雄。在这个国家里，生活受制于遥远时代的法律和对久远过去的戏剧性描述的逻辑，这些描述从头到尾都是梦幻般的，或者是对真实历史事件的高度歪曲。

与此同时，《圣经》的神话形式无疑给孩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们的脑海中留下了终生难以磨灭的印记。列夫对勇敢强壮的参孙攻破非利士人的神庙、勇敢的大卫打败歌利亚的故事几乎不可能无动于衷。在学习犹太教信仰的意义和逻辑的同时，他也学会了钦佩那些能够揭开未来神秘面纱的先知们，他们不畏无知人群的嘲笑，警告以色列面临的危险，或勇敢地向犹太民族的压迫者挑战。

列夫-勃朗施坦是否对《圣经》中的任何一位先知产生过深刻的印象不得而知，但另一位曾经就读于该幼儿园的学生拉扎尔-卡冈诺维奇写道，他童年时代最喜欢的先知是阿摩司。卡冈诺维奇在 90 岁高龄回忆起遥远的童年时说，这位先知与他特别亲近，因为他“鞭挞那些违反正义、通过暴力和抢劫积累财富的富人的贪婪”。

然而，《圣经》故事的逻辑在不知不觉中导致了这样一种观点，即犹太神话化历史的主角不是英雄、领袖和先知，而是犹太民族本身。世界宗教研究者坎贝尔在谈到犹太教时写道：

“与所有其他神话不同.....这里的英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摩西，而是犹太民族。异教和基督教中都有神的复活，而犹太教中则有得到神的知识和支持的天选之人的复活.....在任何地方，神性生命的原则都体现在一个神人身上（阿多尼斯——狄奥尼修斯——基督），而在犹太教中，神性生命的原则则体现在以色列人民身上，以色列人民的神话史发挥了在其他宗教

[4] “以东”或“以东人”——一个与犹太人敌对的部落的名字，在犹太文学中常用来指代基督徒。——原书注释。

中属于神的化身或表现的功能.....在每一代人中，每个人都必须把自己看作是来自埃及的人”。

通过学习《圣经》，列夫和其他孩子一样，学会了理解他从小就熟悉的仪式的象征意义，同时把自己想象成宗教节日活动的主人公。在逾越节这天搬到新家，连最小的面包屑都要事先清除，这让人想起神话中古犹太人出埃及的情景，而且在逃亡时，他们不能带面包，只能带面团，因为面团还来不及变酸。在新房子里用特制的烤箱烤制无酵饼或马扎，让人们直观地感受到千年前逃亡者如何烤制无酵面包的传说。信徒们带去新家过复活节的新餐具和用具让列夫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古老的犹太人，一个从埃及人那里带着餐具和用具，与他们一起寻找应许之地的人。每年的逾越节，聚集在会堂里的人都会喧哗高喊，试图淹没拉比叫出波斯大臣哈曼的名字，这种喧闹的仪式让男孩想象到这个犹太人的敌人还活着，可能会亲手消灭他，以及他的父母和其他亲戚。以斯帖成功地说服了她的丈夫波斯国王杀死了哈曼和 75000 名波斯人，他对以斯帖的钦佩之情丝毫不减，因为他知道所描述的事件发生在几千年前。每年在光明节的八个晚上点燃八根烛台的仪式都会让我们想起犹大-马卡比（哈斯莫内乌斯）领导下的犹太人战胜希腊人，希腊人在努德主神庙中为纪念宙斯而设立的祭坛被摧毁，公元前 165 年在那里恢复了以前对耶和华的崇拜秩序。

虽然宗教传统与真实的历史大相径庭，但《圣经》向 19 世纪末出生的孩子传达了古代争夺土地、牧场、牲畜和其他生存手段的精神，在这些争夺中，整个国家被摧毁，幸存者沦为无力的奴隶。不断引用《圣经》中的例子压缩了历史时间和事件，其中包括法老和巴比伦国王、非利士人、摩押人、以东人和其他早已消失的部落。这些信息似乎与有关现代统治者和民族的信息同样相关。在当代事件中，人们可以看到《圣经》中已经描述过的事件的重演。对传奇历史的亲近感与对弥赛亚降临后必将到来的梦幻未来的亲近感相结合。信徒们强调犹太民族动荡的历史几乎有可能画上圆满的句号，他们希望弥赛亚即将到来，他将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团结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并在逾越节时互相问候：“下一个（逾越节）夜晚——在耶路撒冷！”或“明年——在耶路撒冷！”。

列夫从《圣经》中了解到，以色列人民的道路是艰难的，犹太人屡遭惨败。然而，和许多其他的犹太教学校学生一样，列夫不禁为自己的同胞感到自豪，因为他们曾多次战胜过大小国家。在缺乏武装力量的情况下，古代犹太人通过狡猾的手段战胜敌人，比如在出埃及的时候，或者通过接近国家的统治者并影响国家的政策，比如约瑟夫能够成为埃及法老的第一大臣，以及以斯帖成为波斯国王亚达薛西斯最宠爱的妻子。

正如《圣经》所示，以色列人民的主要支柱是上帝本身。知道耶和华带领犹太人走出埃及，赐予他们正直生活的诫命，然后一再拯救他们免于毁灭，这不能不使孩子的心灵充满属于上帝选民的自豪感。犹太历史学家杜布诺夫写道：

“上帝选择了犹太民族，并赐予他们真理和善良的诫命。犹太人应该遵守这些戒律，而不是模仿其他民族的习俗。犹太人必须在生活中与众不同，将自己与其他民族区分开来，也要与一切不善的、异教的东西区分开来”。

列夫了解到，当犹太人背叛上帝的盟约、崇拜其他民族的偶像、采用外国习俗或娶外国女人为妻时，他们会受到可怕而无情的惩罚。古代犹太人因犯罪而遭受的严厉惩罚提醒信徒们遵守《圣经》指示的重要性。在无形的国家中，拉比扮演着政府和法官的角色，严格执行《圣经》的法律。犹太教行为准则的严格程度以及对其遵守情况的控制制度与任何传统社会（包括原始部落）中存在的相应法

律及其执行方法差别不大。然而，与原始部落不同的是，犹太律法早已将所有这些规则写成文字。此外，在公元前 200 年左右编纂的六卷本著作《米示拿》（“复述”或“申命记”）中，《摩西五经》中为每个信教的犹太人规定的 6 条 13 款行为准则得到了实质性的发展和反复补充，其中包含了约 4000 条对日常生活中各种问题的判断。《米示拿》又在公元前 500 年左右的著作《革马拉》（译为“教导”和“补充”）中得到注释。《米示拿》和《革马拉》合在一起形成了《塔木德》。

从 10 岁起，孩子们就开始学习《塔木德》，根据格鲁列夫的说法，这种学习在东正教犹太人中“一直持续到墓碑前”。对于儿童来说，掌握《塔木德》并非易事。

前苏联犹太宗教研究者拉诺维奇在分析《塔木德》时指出：

> “在表现形式上，《革马拉》是最狂野华丽的经院哲学，是未经任何文学处理的口头语言。拉比们的判例常常围绕着完全没有根据、实际上荒谬可笑、理论上匪夷所思的条款展开。如果我们考虑到《革马拉》是用一种野蛮的方言写成的，其中有许多歪曲的希腊语、拉丁语和波斯语单词，而且印刷版本中没有标点符号（除了偶尔的圆点），我们就可以想象《塔木德》的学习对孩子们产生了多么可怕的影响”。

这也就不难理解，学校的学生很难理解所学的经文，而老师也失去了耐心，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惩罚。

然而，无论《塔木德》的内容多么复杂和令人困惑，掌握它们的努力还是结出了硕果。学生们相信上帝会特别眷顾那些履行诫命的人，这种信念激励着他们。《塔木德》中记录的圣人的推理不仅涉及上帝和祈祷仪式，还对“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一问题提供了大量答案，是孩子们理解周围社会生活规则的一把钥匙。其中许多规则后来帮助他们与他人相处。在此过程中，他们的老师经常提到犹太智慧的创始人之一希勒尔的故事，他在回答一个外邦人提出的用两个字概括犹太信仰的要求时说：

> “你们所不高兴的是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律法的精髓；其他一切都只是对律法的解释。快去学习吧！”

对《塔木德》的不断学习也有助于孩子们智力的全面发展。背诵大量经文训练了他们的记忆力，并培养了学习任何科目所需的技能。与此同时，孩子们还学习了希伯来语，这种语言的闪米特语基础与他们熟悉的意第绪语有着本质区别，后者的基础是德语。通过这种方式，孩子们养成了通晓多国语言的习惯，并掌握了学习世界各种语言所需的技巧。由于《塔木德》的许多部分都提出了各种争论，学生们学会了论证某些观点和快速浏览学术争论的能力。由于这些争论是以世俗智慧为基础，以箴言的形式表达出来，并以幽默的方式呈现，争论者还诉诸生动的形象，因此，熟悉《塔木德》中的争论使学生们掌握了睿智的箴言，以及以箴言、诙谐和雄辩的方式表达思想的能力。

同时，在解决《塔木德》谜题的过程中，教师帮助学生从古代拉比含糊不清的陈述中找到隐藏的含义，教会学生仔细阅读文本，倾听人们的讲话，试图解开往往隐藏在语言形式背后的东西。犹太神学用“yesh”的概念表达了深藏在事物表象背后的本质。掌握塔木德神学培养了人们探寻隐藏在表象背后的本质的欲望，促进了分析性思维的发展。包括斯宾诺莎在内的许多杰出科学家都曾是犹太神学院的学生，这可能并非偶然。

尽管犹太神学和由其发展而来的犹太哲学努力保持其独特性，但在数千年活

跃的国际交往中，犹太思想受到了其他国家神学家和哲学家的巨大影响。希勒尔和迈蒙尼德等以色列杰出先贤的著作就反映了这一点。有时，这些影响来自远方。因此，根据布朗的说法，“卡巴拉”（一种译法是“接受”或“感知”，另一种译法是“传统”）这一神秘学说是“通过第三只手”从印度传入的，原因是犹太人与波斯的伊斯兰教派苏菲亚进行了交流。随后，犹太教的这一神秘分支影响了萨巴泰-采维（萨巴泰派）和雅科夫-弗兰克（弗兰克派）等颇具影响力的教派的出现，这些教派的领袖都自称是弥赛亚。犹太人的精神遗产反映了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许多思想成果，这使其鉴赏家更容易熟悉全世界的哲学和神学教义。

然而，犹太神学的熏陶也有其阴暗面。尽管拉比将《塔木德》描绘成关于所有宇宙问题的可靠的普遍知识来源，但其中记录的许多拉比言论反映了古代和中世纪早期相对较低的科学发展水平。格鲁列夫引用了《塔木德》中关于宇宙结构的一些荒谬论述，他说：

> “就像忠实的穆斯林对《古兰经》一样，虔诚的犹太人深信，只有在《塔木德》中才潜藏着最深层的知识；《塔木德》中没有的东西都是错误的，知道了也是有害的，而且，无论如何，一切都可以通过塔木德学者的理解和知识决定性地获得”。

格鲁列夫先生嘲笑以前的小学生的自信和傲慢，他回忆说：

> “我年轻时的一件事很有启发意义.....两个犹太人都学会了俄语。两个都学会了俄语的犹太人在交谈。一个人给另一个人读一本用俄语写的关于物理学的小册子，其中经常重复‘不言而喻’这句话，但两个对话者显然都不明白他们所读的内容，他们极其惊讶地看着对方，相互询问，并惊讶于他们什么都不明白。
>
> ‘你读懂了吗，雷布-伊兹乔克？’
>
> ‘我什么都不懂！在这里，他们都说‘不言而喻’；而我们，感谢上帝，却能读懂他们的语言，他们说什么我们都懂’。
>
> ‘这里会不会有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
> ‘诶，他们能有什么东西是‘gmore-kop’（塔木德经的首部——格鲁列夫注）可能不知道的呢？’”

夸大《塔木德》知识的重要性也导致了对那些不熟悉《塔木德》和没有在学校学习过的人的傲慢态度。这就是为什么肖洛姆-阿莱切姆故事中的主人公欣赏他的儿子们解读《塔木德》智慧箴言的能力，却对他无知、从事鱼类贸易的亲戚极度蔑视，而故事中的主人公和他的孩子们的生活就是以他的亲戚为代价的。对书本知识的崇拜也导致了对传统文化智慧的蔑视，因为传统文化被明确视为古老、异教野蛮的表现。世界上的城镇居民优于传统文化的乡村守护者（许多世纪以来，绝大多数犹太人都是世袭的城镇居民），这种优越感带有宗教色彩。东正教犹太人往往认识不到，他们自己的习俗（如禁止和限制食用奶制品）往往诞生于史前异教时代的传统农民社区。

犹太人也不例外，他们对书本传统之外的人傲慢无礼。许多其他宗教以及许多思想和哲学流派的追随者已经并将继续表现出同样的傲慢。世界上其他相信自己文化遗产优越性的民族也有类似的态度。与此同时，与那些自称道德和知识优越的民族不同的是，这些民族的自称并不总是能够得到外界的证明，而以色列的子民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能够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信仰中最重要的论述已被世界上大多数民族的宗教视为基石。犹太教的一神论被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所采纳。《古兰经》将摩西视为备受尊崇的先知之一。另一方面，基督徒承认《旧约

全书》是他们的“圣经”，并在教堂礼拜时重复大卫王的诗篇。不同民族和信仰的儿童都是在《旧约》故事的熏陶下长大的。数以百万计的基督徒从小就习惯于体验亚伯拉罕和撒拉以及他们后代的沧桑巨变，不由自主地同情以色列人民的苦难，在与其他民族的斗争中站在他们一边。世界上最好的画家和雕塑家在画布上和石头上塑造了亚当和夏娃、约瑟夫、摩西和大卫的形象。所有这一切都使犹太信徒，包括最年轻的信徒，确信犹太律法和圣经的正义性以及犹太民族本身的伟大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

这些见证强化了犹太教传教士坚持不懈地提出的犹太人在精神上领导世界的思想。杜布诺夫在概述耶胡达-哈勒维（1086-1142 年）的学说时写道：

> “上帝首先向以色列人启示了自己，因为他们是第一个显示出认识上帝能力的人。真理必须从他们那里传播到全人类，就像心脏的血液流遍全身并赋予其生命一样”。

然而，就像所有虔诚地相信自己的教义无懈可击的人一样，许多犹太人虽然满意地注意到其他民族对《圣经》的尊重，但他们往往只看到《圣经》肤浅地近似于那些不学无术、没有完全领会其深刻内涵的伟大真理。诗人海因里希-海涅在评论《旧约》思想对新教徒生活的重大影响时，欣喜地注意到这些思想的“巴勒斯坦化”。与此同时，诗人嘲笑苏格兰、丹麦、北德意志和美国“迂腐”地复制“《旧约》的生命”。诗人嘲讽新教是“吃猪的犹太教”，并将新教徒对犹太教信仰的模仿比作“达盖尔影像，其中的轮廓一丝不苟地再现，但一切都是灰蒙蒙的，没有应许之地的阳光”。诚然，海涅并没有失去希望，“总有一天，这种漫画会消失；古代犹太教真正的、不可战胜的、真正的道德将在这些国家蓬勃发展，就像它曾经在约旦河畔和黎巴嫩山区那样”。

众所周知，没有掌握某套知识或行为规则的人，无论是在专业方面还是在社会文化方面，都会认为自己低人一等，这种信念会随着知识的复杂性和规则的严格程度而增强。许多需要渊博知识和严格遵守严格规则的职业的成员，以及任何封闭的社会群体（从上层阶级到原始部落）的成员，由于其排他性的“秘密传统”以及复杂的礼仪和习俗而团结在一起，往往会把他们圈子之外的所有人都视为下等人。当这些受人珍视的知识和规则被宗教权威神圣化时，排斥外人就会显得是一种取悦上帝的行为。

可以认为，犹太人在学习圣书和遵守《塔木德》律法的许多规定方面花费了巨大的精力，这促使他鄙视那些忽视学习和履行对他来说神圣的规定的人。此外，犹太社会认为，那些没有背诵法律条文中的哪怕一条，或者违反法律条文中的哪怕一条规定的人，都是粗心大意和不可靠的。在正统派看来，即使是违反洗手的规定，也是公然的罪证。另一方面，长期违法者则被视为道德和智力上有严重缺陷的人。出于同样的原因，不承认整个犹太律法、不考虑其中的任何戒律、不遵守《旧约》中的 613 条规则和禁令以及《塔木德》中的大量补充规定的人，被视为无可救药的堕落者、野蛮人或道德和智力怪胎。

然而，东正教犹太人认为所有其他人都是低等的、对社会有危险的人，这与许多非犹太人的类似态度如出一辙。这并不奇怪，因为民族之间的相互敌意和猜疑与宗教仪式、民族习俗、文化、生活方式、家庭行为和礼仪方面的差异成正比。如果“自己的”被认为是唯一的权利，而“他人的”被认为是卑鄙的、犯罪的、违背人性和神的法则，那么就会为无止境的相互猜疑和敌意的反应创造必要的条件。

虽然托洛茨基在他的回忆录中只回忆了他童年时代庆祝东正教复活节和圣

诞节时的一些趣事，但事实上，任何这样的节日都可以让人意识到他的家庭与其他信仰的人之间的深刻差异。肖洛姆-阿莱切姆引用了一则轶事，说东正教徒在复活节时用“基督复活了！”来迎接一个犹太人。然而，如果东正教犹太人回应说：“真的复活了！”——就是违背犹太教基础的说法。同时，犹太人不想因为说基督没有复活而引起争吵，他决定狡猾一点，回答说：“贝尔-艾兹克刚刚告诉我的！”他期望他的对话者会把这些话理解为对他关于救世主复活的信息的积极回应。由于这位东正教徒不知道贝尔-艾兹克是犹太民间传说中一个著名的骗子，他才没有意识到在逾越节这个神圣的日子里，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来看，犹太人是在亵渎上帝。

冲突的危险不仅会在教会节日出现，也会在其他日子和许多场合出现。在所有东正教徒都工作的时候，犹太人却在周六休息；在东正教徒去教堂做周日礼拜的时候，犹太人却在工作。犹太人家里没有圣像，这提醒东正教徒犹太人不承认他们对基督的信仰。犹太人对基督徒可以接受的食物不屑一顾，但他们的食物对基督徒来说却显得陌生而难吃。如果有人邀请犹太人参加东正教的聚餐，他可以拒绝。熟悉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的人可能会记得夏洛克对巴萨尼奥邀请他共进晚餐的回答：

> “是的，叫我去闻猪肉的味道，吃你们拿撒勒先知[5]把魔鬼赶进去的脏东西的身体！我可以跟你们做买卖，讲交易，谈天散步，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可是我不能陪你们吃东西喝酒做祷告”。[6]

但是，即使没有读过莎士比亚的人也能注意到，犹太人遵守了许多晦涩难懂的规则，却没有遵守其他正统民族所必须遵守的规则。然而，在当时的保守主义生活中，即使是与被认为是规范的东西之间的细微差别也显得可疑甚至危险。因此，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诸多差异只能为相互厌恶创造丰富的土壤。在此基础上出现的严重经济、社会或政治矛盾引发了尖锐甚至血腥的冲突。

托洛茨基没有写他是否目睹过这种冲突或相互恶意的表现。不过，可以理解的是，他在孩提时代学到了许多与家庭观念不符的东西。他写道：

> “作坊、佣人房间和后院对我来说，生活与在家庭里是完全不同的，这里的空间更广阔些。生活的篇章没有结尾，我的生活才刚刚起步。小时候，人们谈话时并不避讳我，在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和管家不在场的情况下，通常人们说话是很随便的，因为不管怎么说，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和管家都可以算得上是半个当家人。而在作坊的熔炉边，在厨房的灶台前，我的父母、亲戚以及邻里们当着我的面谈及的几乎少有新的内容。所有这样的谈话已经永久地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其中或许有很多东西影响了我对现实社会的看法”。[7]

托洛茨基对“在作坊熔炉或厨房炉太的灯光下”说了些什么只字未提，但工人们在表达对亚诺夫卡地主的不满时，有可能想起了他们的信仰和国籍。在乌克兰，“地主”和“犹太人”的概念长期以来几乎是一致的。同时，两者都不被尊重。正如舒尔金所指出的：

> “马洛鲁什的历史歌曲中充满了对‘犹太人-地主’的痛苦控诉”。

看到他最爱的人——他的父母和亲戚——成为嘲笑甚至是恶意批判的对象，

---

[5] 指耶稣。因为耶稣幼年居住在拿撒勒，这是一座小城，常被人藐视，但却应验了先知的预言，即：基督将被称为拿撒勒人。——译者。

[6] 中学教科书九年级下册《威尼斯商人》。

[7]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一章 亚诺夫卡”，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这种震撼更加强烈，因为他知道这种亵渎来自那些人，而根据他从小就知道的所有观念，这些人都深陷无知和罪恶之中。毕竟，他们是不上犹太教堂、不守安息日、吃猪肉、不懂希伯来语、不读《塔木德》、不遵守《托拉》规定的任何饮食卫生规则的村民，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们都是粗鲁凶恶的野蛮人。这只是证实了男孩心中的想法，即自古埃及时代以来，犹太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受到无知而凶恶的人的迫害。

然而，即使列夫-勃朗施坦不会在亚诺夫卡遇到对其部落同胞的敌视态度，他也会很快完全了解反犹太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局限于乌克兰，早在乌克兰民族诞生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犹太人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持续紧张，因此所罗门-卢里教授宣称：

“犹太人出现在哪里，反犹主义就爆发在哪里”。

卢里在他的研究《古代世界的反犹太主义》中发现，在许多古希腊和古罗马作家的著作中都有反犹太主义（或仇视犹太教）的言论，其中对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作了极其负面的评价，曲解了他们的长处，强调了他们的弱点，并赋予他们许多令人厌恶的品质。卢里写道：

“当你见到他们时，他们被嘲笑，他们是讽刺哑剧中最受欢迎的角色”。

然而，他们所蔑视的民族却同时引起了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恐惧，因为他们有能力联合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有能力捍卫和巩固自己在外国的地位。著名的罗马哲学家塞内加在谈到“犹太人的威胁”时说：

“这个罪大恶极的部落的习俗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它已经被整个地球所采用；战败者为胜利者制定了法律”。

罗马杰出的护民官西塞罗谈到了犹太人无所不能的影响力：

“众所周知，他们有多么强大的力量，他们有多么一致的意见，他们在集会上有多么重要。我要小声说话，只有法官才能听到：因为（在这里）也会有人煽动反对我和反对最优秀的人；好吧，我不会帮助他们，也不会让他们的任务变得更容易”。

希腊人和罗马人认为犹太人是危险的野蛮人，而犹太人对这种态度的反应则是断言这些民族的野蛮本质。于是，希腊人和罗马人以及古埃及人、巴比伦人和其他人的所有知识都归功于犹太文化的理论应运而生。卢里教授提到了一位匿名的古代犹太人的著作，他声称：

“亚伯拉罕带着全家来到埃及，教埃及国王法雷托占星.....约瑟夫是第一个将土地划分成块、竖立界碑并使大量休耕土地适合耕种的人.....摩西长大后，教给埃及人许多有用的东西：造船、铺石机械、埃及军械、灌溉和战争工具；他还发明了哲学”。

在古代，犹太人与邻居之间的对立日益加剧，由此产生的另一个后果是，拉比制定了许多禁止犹太人与其他人交流的禁令。费赫特旺格写道：

“他们利用一系列规则，使犹太人的生活具有民族隔离性。他们禁止他们学习外邦人的方言、阅读外邦人的书籍、在法庭上承认外邦人的证词、接受外邦人的礼物、与外邦人发生性关系。被非犹太人的手碰过的酒，被外国人的手挤过的奶，都被视为不洁之物。他们将耶和华的子民与世界上其他民族隔离开来，严苛、盲目自大的墙越筑越高”。

犹太人与西欧人民之间的“冷战”不仅没有结束，反而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和成为主流宗教而愈演愈烈。虽然犹太人的“圣经”变成了基督教的《旧约》，但

犹太人却被指控杀害了基督。[8]中世纪西欧天主教国家对犹太人的敌意反映在当时的祈祷文内容中，开篇就是“让我们为背信弃义的犹太人祈祷”。所有的祈祷都需要跪拜，而这篇祷文却要站着听，这表明天主教徒从未打算向“背信弃义的犹太人”低头。在中世纪，犹太人的逾越节祷告词中增加了“消灭基督徒和异教徒，并将他们从生命之书中除名”的内容，这证明了他们之间的相互敌视。

反过来，许多基督徒也不遗余力地将犹太人从“生命之书”中剔除。在十字军东征期间，西欧基督教国家对犹太人的大规模殴打和灭绝尤其变本加厉。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和之后，一个又一个基督教国王下令将犹太人驱逐出他的领地。尽管新教教义向信徒们翻开了《旧约全书》，但其创始人之一马丁-路德却在布道中多次诅咒犹太人。

尽管历史学家承认，犹太人在伊斯兰国家一般不会受到严重迫害，但在那里，犹太人偶尔也会被要求放弃信仰并皈依伊斯兰教。11 世纪的犹太诗人所罗门-伊本-加布里奥尔抱怨说：

> “伊斯梅尔（穆斯林）就像狮子，而以扫（基督教世界）就像风筝；一个离开我们，另一个带走我们”。

在目睹十字军在巴勒斯坦建国后，耶胡迪-哈勒维感叹道：

> “当提兹昂（以色列的土地）在以东（基督徒）的锁链下，而我在阿拉伯的枷锁下受苦受难时，我该如何履行我的誓言呢？”

谈到长达几个世纪的敌视犹太人的历史，许多历史学家对其原因提出了相互排斥的解释。所罗门-卢里提请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

> “有些人认为反犹主义的原因在于犹太人优于他们所处的环境，因此引起了邻居们的嫉妒.....相反，另一些人则认为犹太人在道德上不如他们所处的环境--他们自私自利、嗜血成性（斯泰格林）；对一些人来说——整个问题在于犹太人充满了特殊主义，他们用一堵中国式的墙将自己与他人隔开（斯托克）。另一些人则认为犹太人的历史错误在于过于轻易地吸收了外来文化（弗赖登塔尔）；一些人试图将古代的犹太人划分为两种不同的对立潮流，并认为只有其中一种潮流——狭隘的民族主义——导致了反犹太主义（查波），另一些人则认为犹太人的历史错误在于过于轻易地吸收了外来文化（克罗格）。相反，也有人认为古代犹太人是一个紧密团结的大家庭，并用这种凝聚力来解释反犹太主义（莫姆森）；有人认为反犹太主义的原因在于犹太民族性格的非凡独创性和非理性，它是极端对立面的紧密结合（梅耶）；相反，还有人认为反犹太主义或多或少是由暂时性的偶然原因造成的（雷纳克）……”

卢里在总结这些结论时写道：

> “科学家们并不满足于犹太人在某一方面不同于古代世界其他民族这一事实，他们还认为有必要用犹太人比他们的邻居要么差得多要么好得多这一事实来解释反犹太主义。如果我们追随这些学者的脚步，犹太人就是世界历史上某种闻所未闻、难以理解的例外”。

从反犹主义作者的角度来看，犹太人身上的一些特质使他们无法与其他民族和平共处。1913 年，托洛茨基在评论国家杜马一些代表的反犹言论时，列举了许多对犹太人的传统指责：

> “这些人将抽象的‘犹太人’与某个种族相提并论，那么这个抽象的‘犹

[8] 耶稣的教导和行为引起了犹太教士们的不满和嫉妒。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犹太教士选择与罗马当局合作，将耶稣定为叛国者，并且杀害。——译者。

太人’到底是什么呢？它是不可阻挡的私利、社会寄生、为犯罪目的而进行的集体团结、完全脱离人民和道德排斥”。（托洛茨基在列举了他的政治对手的这些指责之后，又把这些指责转嫁到了他们身上）

如果我们相信反犹太（或仇犹）言论，那么犹太人就是世界邪恶的化身，他们引诱无辜和正义的人们偏离真理之路，正因为有了犹太人，世界上才保留了各种恶行和滔天罪行。事实证明，如果世界上没有犹太人，地球上的生活将是幸福快乐的。

反过来，从许多犹太作家的角度来看，上帝只想让犹太人成为世界其他民族的精神领袖。这些作者将世界历史的大部分内容描述为勤劳、道德和智慧的以色列人民长期遭受恶毒、懒惰和无知的人残酷迫害的故事，这些人企图消灭犹太人。这种传说贬低甚至抹杀了其他民族和文化的成就。此外，它给人的印象是，在世界历史上与其他民族的所有冲突中，犹太人总是正确的。

显然，上述对反犹太主义的解释以及犹太人的对比特征，在许多方面与种族或宗教间冲突的参与者对冲突原因的解释以及敌对民族和信仰的代表赋予对方的特征相似。通常，在此类冲突过程中，一个民族或宗教团体的代表往往会在外国人或部落成员身上找到最令人厌恶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在人类身上是很少见的，使他们更接近于动物世界中最令人讨厌的物种。与此同时，被批判者也不甘落后，在批判者身上发现同样令人厌恶的品质。值得注意的是，最尖锐的批评是针对近邻的。只要回顾一下阿尔斯特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卢旺达和布隆迪的主要民族、印度斯坦国家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长期相互仇恨的当代例子就足够了。这种相互仇恨一再引发冲突，造成数百万人受害。

犹太历史学家详细记述了过去三千年来世界各国对许多犹太人实施的掠夺、暴力和谋杀，但他们没有考虑到，在此期间，这些国家也发生了许多残酷和血腥的事件，数百万其他民族的人成为这些事件的受害者。包括犹太民族在内的许多民族和各种信仰的信徒要么被彻底消灭，要么沦落到悲惨的境地，最终从历史的长河中消失。犹太民族的苦难在世界历史上并非独一无二。

这些冲突和其他类似冲突的历史表明，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猜疑、怨恨和公开仇恨会产生互惠的情感，这反过来又会强化现有的民族和宗教偏见。犹太人通过其传统文化的棱镜来看待历史，这往往使他们将周围的民族视为新的埃及人、亚述人、波斯人，以及亚玛力人、摩押人、以东人和犹太民族的其他敌人。这种观念所产生的对其他民族的怀疑、蔑视和厌恶只会助长反犹太主义，而后者的表现只会使犹太人更加坚信，他们对他人的厌恶是正确的。因此，犹太民族优越于世界其他民族的传说以及无知和邪恶的民族对犹太人的不断迫害，助长了关于犹太民族独一无二的邪恶的反犹太主义传说，而反犹太主义版本又助长了犹太人优越和普遍敌视犹太人的神话。这两种传说各自影响着强大的社会力量，它们的共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世界历史的发展。

为了了解反犹主义的起因，我们必须求助于真实的历史，而不是列夫-勃朗施坦赖以长大的关于被上帝选中的民族永远遭受迫害的传奇故事，也不是关于被诅咒的民族、一切罪恶的承担者的反犹主义神话。

要知道，反犹主义主要产生于那些与犹太人为邻的民族，而犹太人认为这些民族是邪恶的化身。《圣经》将古埃及人、巴比伦和亚述的原住民、大部分波斯人以及非利士人、亚摩利人和许多与以色列人毗邻而居的部落列为最邪恶的民族，这一事实证实了后者。在《圣经》之后的时代，以色列的敌人名单大大增加。这是因为在犹太人漫长的生存历史中，他们已经有了许多邻居。这是因为犹太人与

腓尼基人、希腊人、中国人、印度人、叙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一样，都是积极参与国际贸易的民族，他们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商人殖民地。

将古代国家的各个中心、文明国家与世界上未开化的部落连接起来的国际贸易并不是犹太人开创的，也不是他们首先开创的。然而，由于犹太人定居在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各国的世界贸易路线的重要十字路口，他们不得不成为一个民族，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成为了国际商人或与国际贸易有关的人。

国际贸易商人将世界各国的生产结合起来，满足了世界各国人民最多样化的需求，这些需求是当地经济无法提供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加速发展。在他们的交易中，商人们通常不会留下微薄的收入，每一次成功的贸易往来都会使他们变得更加富有，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他们与贫困人口之间物质条件的差距。与此同时，许多穷人破产，沦为商人和高利贷者的抵押品。这就为贫困人口暴力抗议商人牺牲他们的利益致富创造了条件。

国际商人日益增长的财富不仅引起了穷人的不满，也引起了当地商人的不满，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海外来客”能获得如此丰厚的利润。对外国商人的仇恨导致了大屠杀和对他们富人住宅的屠杀。不仅是商人和放债人，这个民族的其他代表也经常遭到肆意破坏。这种情况在世界历史上时有发生，在二十世纪也没有停止。只要回顾一下对高加索和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最终导致 1915 年大部分亚美尼亚人被灭绝）、对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的中国商人的大屠杀、对东非一些国家的印度商人的大屠杀就够了。

欧洲和地中海在世界历史上占有特殊地位，这意味着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类似事件相比，因贸易争端而引发的冲突更受关注。在犹太人出现在世界贸易舞台上之前，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在地中海地区的激烈竞争也同样激烈。后来，（希腊）他们为争夺地中海贸易控制权而展开的激烈斗争，为罗马和腓尼基人所建立的迦太基所取代。然后，犹太商人也加入了这场斗争。

虽然最初定居迦南地的以色列人主要是农民和牧羊人，但杜布诺夫在其《犹太人简史》中写道：

> “随着时间的推移.....简单的农业生活体系发生了很大变化。贸易开始与农业竞争”。

迦南地处非洲、亚洲和欧洲之间的重要贸易路线上，其地理位置促进了贸易的发展。杜布诺夫认为，“在亚哈和约沙法时期”，即公元前 922-894 年，“两个王国（犹大和以色列——作者）的贸易都已十分繁荣。这一切促进了城市的快速发展。除了劳动力，还有资本、贸易货币、贷款和高利贷”。

商人阶层在犹太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犹太人的散居（即离散）并不像“受迫害民族”的传说所说的那样，是犹太人被逐出犹太，而是犹太商人的活动扩展到当时文明世界的许多国家的结果。甚至在 1932 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犹太人”一条中谈到“巴比伦囚禁”时代时，著名的苏联犹太教研究者尼科尔斯基写道：

> “属于资产阶级商人的部分流亡者只是从中受益，因为他们有机会扩大自己的活动领域；犹太资产阶级的代表很快变得富有，其中一些人很快就在巴比伦资产阶级的第一梯队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在古代，犹太人在罗马帝国各大城市的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仅次于罗马的帝国最大城市亚历山大里亚，有超过 40 万犹太人。他们大多从事贸易。公元一世纪中叶，在亚历山大城发生了历史上最早的一次犹太人大屠杀，组织者是犹太人的对手希腊人。据费赫特旺格称，约有 50000 名居住在亚历山大的犹太

人在大屠杀中丧生。随着犹太人在包括西亚、北非和欧洲在内的广袤而快速发展的地区成为贸易霸主，犹太商人与其竞争对手以及饱受摧残的社会底层的对抗在地域上不断扩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暴力和血腥冲突不断增加。

有时，这些冲突发生在犹大王国边境之外，该国统治者被剥夺了干预这些冲突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犹太教会成为犹太人散居地的思想、政治和组织中心，为犹太民族的巩固做出了贡献。甚至在犹太国家最终毁灭之前，祭司阶层的影响就在犹太国家中不断扩大，直到犹太国家实际上变成了一个神权国家。尼科尔斯基认为：

> “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神权社会的组织符合分散的犹太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在耶路撒冷神权社会的支持下建立了自己的商业中心：每年三次在耶路撒冷举行的节日大会，特别是在春季和秋季，同时也是犹太资产阶级的贸易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耶路撒冷的神职人员也在圣殿金库中收集了大量资金，并将其投入流通，耶路撒冷圣殿也卷入了投机活动的轨道”。

犹太国的灭亡和所罗门圣殿的毁坏只是促成了散居地的扩大，但并没有削弱犹太民族因宗教的紧密联系而团结在一起的凝聚力。与此同时，商人阶层在流散犹太人社区中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正如盖里克曼所说：

> “在古代世界末期，散居地的犹太人不仅是一个被剥夺了家园的民族，而且还是一个偏爱城镇居民的民族。散居地犹太人拥有土地的情况并不典型；犹太人社区本质上只有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商业和高利贷）和小资产阶级”。

虽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继续生活在巴勒斯坦领土上，他们的主要职业是务农，但随着从事国际贸易和全球金融交易的散居犹太人上层阶级变得更加强大，他们在世界犹太人中的作用正在削弱。

即使在耶路撒冷圣殿被摧毁近两千年后，全球各地仍有数百万犹太人继续从事直接或间接与国际贸易和世界金融相关的生意。亚诺夫卡也不例外。尽管托洛茨基一再强调他的出生地远离世界其他地方，而且对他的父母来说“其他一切似乎都无所谓”，但他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保留意见：

> “其他一切，除了世界谷物交易所的价格.....”

世界市场的神秘力量来到了亚诺夫卡。从尼古拉耶夫回来后，父亲黯然神伤地说：

> “听说，那个什么——阿根廷的地方今年又卖了好多粮食”。[9]

虽然勃朗施坦一家可能不知道法国议会的辩论或俾斯麦针对社会主义者的法律，也可能没有在世界地图上找到阿根廷，但他们和古代散居地的古犹太人一样，关注着他们农场产品的世界贸易机会。

与所有在异国他乡的商人一样，犹太人建立了自己的定居点。虽然犹太人和其他外国人一样，必须服从外国的权威，但在内部组织上，他们的定居点就像公元前一千年在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兴起的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的殖民地一样。他们将犹太人所在的国家与自己的隐形国家进行对比。

卢里认为，散居国外的犹太人的生活是由“双重公民身份”原则决定的，这意味着：

> “（1）必须严格遵守当地法律，但仅限于不与仍然存在于人们法律意识中的犹太法律条款相抵触，并且遵守这些法律不会对犹太人民造成伤害。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遵守直接或间接针对犹太人的法律。
>
> （2）必须严格效忠于有利于犹太人的国家。当两个国家或两个党派在

[9]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一章 亚诺夫卡”，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一个国家内交战时，人们应同情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帮助更同情犹太人的一方”。

世界历史表明，所罗门-卢里制定的这些原则普遍指导着各国大多数犹太人的行动。

所罗门-卢里认为，在任何国家，犹太民族“都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有机体”。教授从中看到了“犹太民族的特殊性”，而其他国家不承认这种“有机体”的特殊地位，则是导致反犹太主义的永恒原因。

犹太贸易殖民地的居民不愿意无条件地遵守所在国的法律，这些国家也不愿意接受犹太人的“双重国籍”，这只会加剧外国商人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对抗所造成的持续紧张局势，并为流血冲突创造先决条件。犹太社区与周围居民之间处于战争的边缘，这就需要犹太人在精神上做好准备，与可能的攻击进行激烈的斗争。犹太民族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圣经》故事和最重要的犹太宗教节日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在这些故事的帮助下，犹太教会堂说服信徒们相信，犹太人目前在任何国家的处境与“巴比伦的囚禁”、“埃及的奴役”或在哈曼的授意下在波斯即将发生的大屠杀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随着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关系日益尖锐，这些传说应运而生并广为流传。正如研究犹太宗教的学者所指出的，《以斯帖记》是在马卡比领导的犹太人反希腊斗争时期创作的。

犹太民族神话化的历史不仅是凝聚犹太人的意识形态工具，也是一种心理补偿手段，以弥补犹太人无法反抗压迫者的屈辱处境。历史题材的传说安慰了犹太人，向他们保证他们将摆脱“囚禁”，迫害他们的人将被消灭，不义统治者的宝座将倒塌，“东道国”华丽的建筑将被毁坏。这些传说使人们对“东道国”及其文化和习俗保持一种傲慢的蔑视。

与此同时，在多个世纪的国际贸易活动中，犹太人发展出了许多和平解决最尖锐争端的方法。正如卢里所指出的：

> “如果犹太人沉溺于对日常的每一个冤屈进行报复；如果他们甚至在遭受最严重迫害的情况下也开始将这种复仇的渴望付诸行动，那么他们在其历史的黎明期就肯定会被灭绝或被迫丧失国籍。犹太人注定要在外国人中间生活和活动，他们自己当然最希望与外国人建立和平友好的关系。他们随时准备作出一切可以想象和难以想象的让步，以便在这一‘爱国责任’和那一‘爱国责任’之间找到某种妥协”。

犹太人的“双重国籍”迫使他们采取各种方式适应异国生活，而这些方式又与国家法律或公共道德相冲突。流亡在外的舒尔金曾多次谴责他不喜欢的犹太人的行为特征，他惊讶地发现，俄罗斯白卫移民和散居犹太人的处境相似，导致他们的行为也相似。他问道：

> “难道我们现在不是在犹太人几千年来的相同命运中煎熬吗？我们现在不是‘四散奔逃’吗？难道我们现在没有经历犹太人曾经经历过的‘权利限制’吗.....？我们难道没有（因为我们的特殊地位而无法进入公务员系统或某些行业）从事各种‘geshefts’（雇佣工作等）？难道我们没有逐渐养成‘规避’对我们不便的法律的习惯，就像犹太人所做的那样？我们不是每天都在获得犹太人身上令我们恼火的、我们称之为‘无礼’和‘放肆’的那种坚持和厚颜无耻吗？”

所有犹太人为在“东道国”共处创造更有利条件所做的努力都是由犹太教长所代表的社区领导层不断协调和指导的。犹太教会在非犹太人中开展的传教活动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对犹太人的友好态度。卢里强调指出：

“如果我们不把犹太人看作一个宗教团体，而是看作一个民族国家单位.....被迫在外国人民中行动和发展，那么理解犹太人的传教活动就容易得多”。

正如拉诺维奇所强调的：

“散居国外的犹太人.....成为犹太教宣传的代理人。犹太教的宣传取得了巨大成功，散居国外的犹太人数量的迅速增长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不能仅仅用自然增长来解释。犹太教的宣传在妇女中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当大马士革的居民计划杀死犹太人时，根据约瑟夫（弗拉维乌斯——作者注）的说法.....他们只害怕自己的妻子，因为除了少数例外，她们都虔诚地信仰犹太教”。

以圣经中约瑟夫、以斯帖和但以理为榜样，犹太社区努力让自己的代表在所居住的国家担任有影响力的职务。历史上有许多犹太人在基督教和穆斯林国家担任政府要职的例子。同时，正如卢里所强调的那样，这些犹太人经常“公开宣称自己是犹太人，认为他们的人民比主人本身更优越、更优秀，无论是出身还是智慧和良好的道德”。这些犹太人不愿被同化，只承认自己是担任要职的国家的公民，这让一些古代作家毫不掩饰地感到恼怒。

因此，任何国家的犹太社区都要完成与任何其他国家在外交政策活动中相同的任务，开展外交、宣传和情报活动，并安插“影响代理人”。犹太社区为捍卫自身利益而必须完成的任务的艰巨性，以及犹太社区与“东道国”之间持续的武装和平状态，要求犹太人的队伍具有凝聚力。在与共同威胁作斗争的名义下，犹太社区因社会和阶级分层而产生的内部矛盾受到压制。

一方面，社会的宗教领袖不断提醒富人需要向穷人提供慈善援助。《塔木德》的许多教义和《塔木德》译者撰写的诫命详细规定了帮助穷人的数量和方式。在社区中，对贫困者的慈善援助有一套牢固确立的程序。另一方面，面对共同的威胁，人们不断提醒穷人和贫困者要忘记他们的冤屈。

犹太人个人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整个族群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因此族群的宗教领袖对每个成员都严格要求。时刻准备应对可能的攻击，使每个犹太人都成为一名预备役士兵，随时准备为捍卫共同利益而挺身而出。与此同时，由于武装冲突通常对社区不利，因此社区做出了许多努力来防止武装冲突。每个犹太人都必须充当可靠的线人，报告有关敌方事件的一切必要信息，充当娴熟的宣传员，能够消除敌视犹太人的观点，传播亲犹太人的情绪，充当社区的授权代表，整个民族的行为都可以通过他来评判。社区领导要求每个犹太人在行为上保持克制，以免引起外界的攻击。

武装冲突升级为全面冲突的事例只是为了让犹太社区的成员相信，必须完全服从拉比的独裁权威，拉比是在永久的紧急状态下运作的。稍有偏离规定的行为准则，就会立即引起注意，并被严厉谴责为对人民和上帝的背叛。

犹太教育家奥尔山斯基写道：

“任何熟悉犹太生活的人都知道，旧的犹太生活制度，包括中世纪的制度、宗教仪式和狂热主义，都依赖于这些城镇犹太居民保守、狂热的舆论力量。在这里，个人自由、个人思想完全被社区的专制主义所压制，社区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它的任何成员，不让他们偏离祖先的盟约一根毫毛；谁要是被发现背叛了祖先的信仰或哪怕是被时间神圣化了的最轻微的习俗，谁就有祸了！”

对乌里埃尔-达科斯塔和巴鲁克-斯宾诺莎等“自由思想家”的无情迫害就是

明证。

社区内部的严格控制以及社区所在国遏制社区发展的愿望催生了犹太人聚居区——犹太人居住的特殊城市街区。费赫特旺格在描述 18 世纪德国犹太人聚居区的生活时，不乏阴郁的色彩：

> “他们被驱赶到狭窄的空间，聚居区的大门在夜间被封锁并紧锁，所有出入口都有人把守。他们生活在难以置信的拥挤中，他们成倍增加，但分配给他们的空间却没有扩大。男人和美丽的女人早早就枯萎了，他们生下的 10 个孩子中，有 7 个夭折了。他们就像一潭死水，被大坝阻隔在湍急的生命之流之外，与其他人的语言、艺术和精神兴趣隔绝开来。他们生活在令人窒息的亲密关系中，每个人都知道对方的秘密，在永恒的流言蜚语和不信任中，他们互相摩擦，被迫瘫痪，互相撕咬，一个与另一个为敌，一个与另一个捆绑在一起，因为一个人的微小失误和不幸可能成为所有人的不幸”。

反讽和自我反讽是对犹太区生活条件及其身心不健康的心理补偿。刘易斯-布朗编著的《以色列的智慧》一书中，除了《圣经》、《密西拿书》和《革马拉书》中的段落外，还收录了许多各类轶事，这并非偶然，这些轶事一直以来都是犹太幽默的特色。这些轶事所嘲讽的对象是各个“东道国”的统治者、秩序和习俗。同时，犹太人的艰辛、他们对成功的追求以及他们的举止也是讽刺的对象。

显然，无论是犹太人与居住地人民之间持续不断的紧张关系，还是社区内部的压迫，抑或是许多犹太区居民的身心健康状况不佳，都没有打破犹太人的身份认同。西欧各王国多次驱逐犹太人并没有阻止该地区大多数犹太人从事的贸易活动。此外，腓尼基人和古希腊人等一些贸易国家退出历史舞台，以及其他一些东方国家的商人在欧洲的活动减弱，使犹太人成为该地区数量最多、组织最严密的国际贸易单位。欧洲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地区，这只会加强犹太商人和金融家的全球地位。

与此同时，犹太商人继承了专业的商业技巧，这些技巧基于东方商人几个世纪以来的经验，他们有能力挑选符合人们需求的商品，吸引人们对这种产品的关注，并让潜在的买家相信所提议的交易是有利可图的。当地的欧洲商人在历史上进入商业领域较晚，在这一相对较新的行业中显然不如他们。

作为一名优秀的人类经济史专家（特别是他在迪尔伯恩的个人博物馆中举办的杰出展览就证明了这一点），盖-福特浓墨重彩地描述了欧洲商人的贸易方式，这些贸易方式仍然带有浓重的宗法社会传统色彩：

> “在古老的英格兰，商人阶层盛行许多光荣的习俗。因此，一个受人尊敬的商人永远不会主动开创生意，只有当有人向他提出开创生意时，他才会主动开创生意。同样，用蜡烛或油漆装饰橱窗，以及展示旨在引诱公众的商品，都被认为是不光彩和不纯洁的行为，目的是让邻居的顾客望而却步。最后，买卖不止一种商品被认为是完全不体面的，也违背了商人的习俗。例如，如果有人从事茶叶贸易，那么他似乎也可以出售茶匙？但是，如果有人这样宣布，他就有可能毁了自己的生意——在公众舆论看来，这样的承认是畸形的。出于体面，商人必须假装不愿意放弃他的货物”。
>
> “可以想象，当一个犹太商人闯入这片宁静的风土人情时，会发生什么。他把它们砸得粉碎，犹太人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销售冲动。如果他无法向顾客出售某种商品，他手头就会有另一种商品可以提供。犹太人的商店成了集市，是现代百货商店的前身，而英国人每家商店只卖一种商品的旧习俗也被破坏了。犹太人追逐生意，追求生意，斥责生意。他是第一个提出‘薄利多销’

的人，也是第一个提出分期付款销售的人。他唯一不能忍受的就是平静和不变：他的所有想法都是为了周围的一切都在运动这一事实。他是那个时代的广告之父，当时，哪怕只是简单地宣布店里有什么货，都会让公众认为店主遇到了资金困难，面临破产的威胁，因此他采取了最后的绝望手段，任何有自尊的商人都不敢这样做.....在那个时代，习俗具有上帝制定的伦理法律的力量：因此，犹太人因其行为而被视为大罪人。谁能违反这些光荣的商人习俗，谁就会不择手段”。

福特认为：

“犹太人崛起为金融霸主，主要得益于他们的特殊才能：他们善于发明新颖的商业方法。在犹太人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之前，交易是以最简单的形式进行的。许多必要的信贷技术和汇票法都是犹太商人发明的。证券交易所的发明要归功于犹太金融资本”。

尽管亨利-福特效仿沃尔特-斯科特，报道犹太商人发明了本票的说法并不准确，但这一中国古代金融交易的发明有可能是由犹太人引入欧洲的。福特甚至声称：

“无论他们（犹太人）出现在哪里，就好像商业交易的枢纽在他们之后转移了”。

事实上，犹太商人只是能够迅速辨别出哪里存在最佳商机。

欧洲的犹太人不仅在犹太人区流亡和大屠杀中幸存下来，其中一些人还在欧洲国家的商业和金融资产阶级中取得了重要地位。费赫特旺格在描述犹太人的生活时写道：

“犹太人手中掌握着世界贸易的重要部分。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的城市中，犹太人自由而富有地生活着。他们建立了与南美洲和中美洲的贸易。他们开辟了通往巴西的道路。他们在西半球开始了制糖业。他们为纽约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西欧和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因此也为犹太商业和金融资产阶级的成功活动开辟了新的前景。世界上许多主要的金融领袖都是犹太人，他们在解决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在稳步增长。一些犹太裔人士进入了欧洲主要国家的政府（克里米尔在 1848 年革命后成为法国政府的司法部长，迪斯雷利或比肯斯菲尔德勋爵曾担任英国财政部长和首相）。一位匿名作者注意到犹太金融家对西欧政治生活的影响，在 1932 年《苏联大百科全书》的“犹太人”一文中写道：

“为了评估他们的作用.....有一个特点是，在维护战败国法国的利益时，德国的利益得到了犹太银行家布莱希罗德的维护，而法国的利益得到了法国银行家罗斯柴尔德的维护”。

与古代一样，西欧相当一部分公众舆论对犹太大金融家地位的加强表示担忧。20 世纪 40 年代初，法国宣传家图森特尔撰写了《犹太人是我们时代的国王》一书。19 世纪，西欧著名的文学经典在其作品中塑造了这些“国王”的肖像，早在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就开辟了这些“国王”的画廊。

画廊里有放债人高布赛克的画像，他把“人们吝啬的礼物——穷人送的一篮子鱼、一包蜡烛，富人送的银器和投机者送的金鼻烟盒作为抵押。所有东西都送到了他家，但什么也没拿走”。与高布赛克不同的是，努钦根甚至连黄金都舍得出手，但“只是因为他当时正在捞钻石”。在巴尔扎克的 20 多部作品中都出现了努钦根的形象，这位伟大的作家在努钦根身上塑造了银行家罗斯柴尔德的形象。

后来，居伊-德-莫泊桑塑造了金融家沃尔特的形象，他是国际骗局的组织者。查尔斯-狄更斯在《奥利弗-忒斯特》中塑造的黑社会“国王”形象，如年轻小偷学校的导师、阴险的费金，突出了这些无冕之王的道德败坏和犯罪形象。

对犹太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不满有时会升级为喧嚣的反犹运动。作家埃米尔-左拉[10]在《为犹太人辩护》一文中开宗明义地写道：

“几年来，我对犹太人在法国竭力煽动的反犹运动越来越感到惊讶和厌恶”。

在《致法国的信》中，作者指责天主教会帮助“人民染上了反犹主义的狂犬病：他们被兽性的毒药毒害，在大街上狂呼：‘打倒犹太人！犹太人去死！’”埃米尔-左拉写道：

“他们被指责为嵌入其他民族深处的民族，作为宗教种姓过着封闭的生活，没有国界，是一个国际教派，没有真正的家园，如果他们取得胜利，就能征服整个世界。犹太人娶犹太女人为妻，他们有非常强大的家庭，与现代世界的滥交形成鲜明对比，他们相互支持和鼓励，避开外国人，表现出巨大的抵抗力，并以某种深不可测的方式慢慢征服世界。但最重要的是，这个部落表现出罕见的务实和精明，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对利益的渴望，对金钱的热爱，他们以惊人的商业能力而著称，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积累了巨额财富，在这个资本统治世界的时代，他们似乎拥有了王权。这一切都是真的”。

左拉承认这些指责是有道理的，他写道：

“犹太人之所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是十八个世纪愚蠢迫害的结果。他们被允许从事金钱事务，却被蔑视地撇开这些职业，在社会中为他们创造了商人和高利贷者的地位——当野蛮武力的统治结束，理性和劳动的力量开始统治时，犹太人发现自己是资本的主人，从祖先的许多代人那里继承了敏锐、灵活的头脑，统治的时机已经成熟，这并不奇怪”。

左拉谴责反犹主义呼吁，建议基督徒在商业领域与犹太人作战，即在犹太人迄今为止击败他们的领域。他说：

“我们面前有广阔的活动空间，如果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沉迷于金钱，学会了如何敛财——那么我们就应该追随他们的脚步，获得同样的财产，用他们自己的武器打败他们。我们不要再徒劳地责骂他们了！让我们赢得优势，打败他们！”

然而，左拉打开了这扇门。此时，在残酷的“黄金”争夺战中，基督教商人已不再比犹太商人逊色。在书中塑造了令人厌恶的犹太小贩形象的作家们，描绘了同样令人厌恶的基督徒形象，这绝非偶然，对他们来说，对利润的渴望已成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只要回顾一下拉斯蒂尼亚克和杜鲁瓦《可爱的朋友》的形象就够了。他们在与古代金融家后裔的斗争中取得了成功。狄更斯在小说《我们共同的朋友》中塑造了一个基督徒放债人的形象，他巧妙地利用一个犹太人，假装自己是“典型的夏洛克”，以掩盖自己对债权人的冷酷无情。

卡尔-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解释许多基督徒沦为小贩的原因时写道：

“犹太人用犹太人的方式解放了自己，不仅因为他掌握了金钱势力，而且因为金钱通过犹太人或者其他的人而成了世界势力，犹太人的实际精神成

[10] 爱弥尔·爱德华·夏尔·安东尼·左拉（1840 年 4 月 12 日—1902 年 9 月 28 日），生于法国巴黎，法国自然主义小说家和理论家，自然主义文学流派创始人与领袖。——译者。

了基督教各国人民的实际精神。基督徒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犹太人，犹太人就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了自己”。[11]

与作家左拉不同，马克思并不认为在当时的世界上，蛮力已经被劳动和理性的力量所取代。卡尔-马克思在解释什么是在十九世纪的世界中取得胜利的“犹太人的实用精神”时写道：

“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

犹太人的世俗礼拜是什么呢？经商牟利。

他们的世俗的神是什么呢？金钱。

.....

金钱是以色列人的妒忌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金钱贬低了人所崇奉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

.....

抽象地存在于犹太人的宗教中的那种对于理论、艺术、历史的蔑视和对于作为自我目的的人的蔑视，是财迷的现实的、自觉的看法和品行。

.....

犹太人的想象中的民族是商人的民族，一般地说，是财迷的民族”。[12]

用马克思的话说，基督教世界的有钱人变成了犹太人，但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基督徒的意愿，至少将自己的部分财富捐献给邻居。资本主义的发展，伴随着对利润日益增长的崇拜，导致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矛盾急剧加剧。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为争夺市场和廉价原材料来源而展开的斗争，是 19 世纪多次战争和世界大战准备工作的起因。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正在把基督徒变成犹太人，而同样的过程也在打破犹太区的围墙，许多犹太人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犹太人，失去了与犹太社区和犹太文化传统的社会联系。在熟悉了 19 世纪的科学和文化成就后，以前的犹太教学生对中世纪关于宇宙结构的箴言、《旧约》和《塔木德》中规定生活方式的规则和禁令、宗教节日和犹太教堂的唱诗班等文化饮食感到不满。犹太人被同化并融入犹太社区以外的世界的进程愈演愈烈。

舒尔金在总结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与俄罗斯犹太人接触的印象时说：

“犹太人并不特别欣赏‘犹太性’.....犹太人对自己的宗教非常虔诚，但仅限于一定程度的精神发展：过了这一阶段，他们很容易陷入尖刻的无神论和激烈的唯物主义……犹太人对自己的语言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感情”。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托洛茨基所表现出的对母语和民族的漠视也是当时许多其他犹太人所表现出的。

舒尔金认为，“犹太人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大大丰富了上述‘民族缺陷论’”。舒尔金认为，这种特殊性在于犹太人“在内心深处对同宗同教的人保持着深厚的感情”。为了解释这种“深厚感情”的原因，舒尔金引用了一个完全不可信的故事，讲述了他与某一品种的马相处的经历。他保证说，即使距离很远，这个品种的所有马匹都会重复其中一匹种马在催眠状态下所做的所有动作。舒尔金从这个可疑的信息中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

“我们在犹太人身上也看到了类似的东西。除了个体灵魂之外，他们还有某种集体灵魂，其功能令人吃惊”。

舒尔金在犹太人中发现的民族团结并不是一种未知的心理生物学现象，而是

[11]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 卷。
[12]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 卷。

得到了当时正在加强世界各民族团结的同样力量——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是爱国主义的高涨和在民族团结的旗帜下团结人民的积极努力。此时，各国资产阶级转而神话本国人民独一无二的伟大过去，并夸大其词地宣称本国当前的特殊性，以证明本国有权“在阳光下占有一席之地”，实际上是有权抢占市场和殖民地。

这些过程在犹太人中也有所体现。传统原则的侵蚀并没有导致犹太人意识中所有那些将他们转变为因宗教而结合在一起的社区的顺从成员的机制完全消失。犹太资产阶级上层阶级的任务是在现代生活条件的基础上，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犹太人现有的遗传凝聚力！为此，他们不断在现代生活中寻找证据，以支持关于最有才华、最有正义感的犹太民族的传统传说，以及关于他们永远受到世界上其他无知而邪恶的民族迫害的传说。全面普及犹太社区人民的成就和宣传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才能，都有助于证明犹太人天赋异禀的论点。与此同时，世界上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和各国反犹太运动也成为加强犹太人团结的理由。与中世纪犹太人聚居区的时代一样，犹太人被灌输了他们应坚持“双重公民身份”的思想。19世纪末，犹太复国主义应运而生，它满足了犹太资产阶级在西欧以外建立殖民地的愿望，类似于当时世界上每个大国都拥有的殖民地。然而，犹太人最初并不清楚这个无形国家的殖民地将建立在哪里：非洲还是中东。

与此同时，在世界范围内，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争夺市场和殖民地的战争遭到了国际主义者和反资本主义者的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社会和阶级矛盾的加剧导致了一场群众运动的发展，这场运动寻求通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废除资本主义秩序。基于对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信念，马克思认为犹太人将随着资产阶级制度的消亡而消失。他写道：

> “社会一旦消除了犹太精神的经验本质，即经商牟利及其前提，犹太人就不可能存在，因为他的意识将不再有对象.....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13]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及其弟子宣布向资本宣战，直至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制度，这使马克思主义者成为资产阶级，包括犹太资产阶级最可怕的敌人。然而，许多不同意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犹太人从马克思主义的反资本主义思想中看到的首先是要求消灭那些在他们眼中体现了现代法老、巴比伦国王和波斯大臣的人。

这些矛盾的情绪反映在海涅对共产主义者的态度上。诗人写道：

> “我承认，共产主义与我所有的兴趣和倾向都是如此敌对，却对我产生了神奇的影响.....我内心有两种声音支持它……首先是逻辑，其次是仇恨——对所谓的德国民族党（海涅称之为德国现行制度的支持者——作者注）的仇恨……我一生都在与之斗争，而现在，当我手中的剑掉落时，想到共产主义将给他们最后一击，我感到欣慰。共产主义将像踩死讨厌的癞蛤蟆一样踩死贵族。出于对民族主义支持者的憎恨，我几乎准备好去爱这些共产主义者”。

诗人之所以憎恨德国民族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在希特勒上台前的一个世纪就已经是激烈反犹主义的传播者。本质上，海涅遵循了所罗门-卢里提出的原则：在国内两个斗争激烈的政党中，他选择了对犹太人敌意较小的那个。

来自资产阶级社会阶层的犹太人之所以愿意加入共产主义革命者的行列，可

---

[13]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 卷。

能主要是因为他们希望给西欧的“民族党”（即犹太资产阶级的对手和反犹情绪的传播者）以致命一击。与此同时，千百年来一直习惯于将可怜的“穷鬼”视为潜在的大屠杀者的人们，要想转而站在无产阶级一边也并非易事。要承认无产阶级在争取自身权利的阶级斗争中的正确性，也需要承认那些打砸富人房屋的穷人是正确的。犹太人在阶级斗争中选择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这使他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其他犹太资产阶级领袖的死敌。

对许多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来说，要与他们从小到大所接受的所有观念决裂并非易事，因此他们寻求折中的解决办法。费迪南德-拉萨尔就是犹太富商家庭后裔在革命运动中的一个典型例子。拉萨尔积极参与了 1848 年的革命，并首先加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行列，但他后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认为工人阶级可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减少剥削。他认为，反资本主义革命只能在无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进行。同时，拉萨尔排除了城市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联合采取革命行动反对现存制度的可能性，因为他的出发点是，除工人阶级外，所有阶级都是反动的。

拉萨尔的思想和他领导的德国总工会的活动影响了西欧的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理论逐渐被遗忘，而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为改善工人地位而进行的斗争则凸显出来。

前银行职员、德国著名社会民主党人爱德华-伯恩斯坦在他的著作中对这一做法进行了理论化：“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标什么都不是”。这个公式使得利用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政治潜力来实现任何政治目标成为可能，包括那些与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相去甚远的目标。

随着西欧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运动反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减弱，为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之间更广泛的合作创造了条件。越来越多的资产阶级成员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其中包括犹太资产阶级。

与此同时，许多犹太人接受了社会革命的思想，不愿意向现存制度妥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在接受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时，也与犹太传统决裂。这种决裂有时会导致一个人放弃他所拥有的唯一的道德、精神和文化基础。这可能导致内心的荒芜、非道德主义和极端虚无主义。当草原的克里斯托弗神父得知所罗门在嘲弄犹太教信仰时，他的愤怒绝非偶然。这位东正教神父似乎应该为犹太人脱离不义的信仰而感到高兴，但他开始劝诫所罗门：

> “等等.....如果你不喜欢你的信仰，那就改变它，但嘲笑是一种罪过，不要成为一个嘲笑自己信仰的人”。

犹太人中的这种虚无主义情绪使他们加入了革命极端分子的行列。显然，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队伍中有许多犹太人倾向于采用恐怖手段进行革命斗争（社会革命党人中的戈茨、格舒尼、阿泽夫，马赫诺主义者中的沃林-埃琴鲍姆、戈特曼、巴伦），这并非偶然。

然而，犹太人走上革命道路，放弃自己的信仰、民族和阶级出身，无论他们选择哪个革命政党，都无法改变他们的意识基础、民族和宗教文化。圣经传说中的许多形象、《塔木德》中的许多教义、他们习惯的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继续作为心理支持，证实他们的社会主义选择的正确性，并影响他们解释社会主义教义的方式。

谈到“托洛茨基身边的犹太环境”，内达瓦认为：

> “它.....促进了这位马克思主义领袖人格的形成，增强了他的革命热情”。

内达瓦写道：

“我们深信，犹太教对托洛茨基人格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与其他伟大的宗教体系一样（也许比它们更重要），在犹太思想中，宗教远远超出了仪式和典礼的范围。它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到传统和道德之中，不可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被根除，也不可能被一个人的意志——即使是托洛茨基这样的意志——所抛弃”。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只有犹太教为革命意识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督徒和穆斯林也是在不知不觉中通过从小就植入他们意识中的宗教思想的棱镜来理解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制度胜利的理论。许多神学院的毕业生都被革命社会主义的思想所吸引，斯大林绝不是唯一一个走上革命道路的东正教神学院学生。此外，犹太教和基督教中都有许多与革命社会主义信条相呼应的思想。

与现代社会主义者一样，基督和《旧约》中的先知们谴责他们周围社会的贪婪和不公。基督教和犹太教都许诺过幸福公正的人间生活。在这两种宗教中，人们都可以看到为公正生活而积极奋斗的呼声。

社会主义政党命令的严厉程度类似于每个世界教会所坚持的行为准则。在为神圣事业无私奉献的宗教教义影响下形成的意识，很容易接受社会主义政党和共产党关于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无私奉献的规定。

与此同时，每种宗教和民族文化在人们头脑中的遗留影响也表现在他们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认识上。仔细研读《托拉》和《塔木德》的习惯可能使犹太环境中的当地人习惯于不断从马克思、恩格斯及其追随者的著作中寻找意识形态的支持。对他们来说，马克思主义著作就像犹太教的圣书一样。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的规定中寻找当前生活中所有问题的答案。

被神化了的犹太民族的历史必然会影响前教会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认识，根据这一理论，被压迫阶级与压迫者进行着永恒的斗争，剥削者是一切恶行的承担者，而被剥削者则是一切美德的化身。人们习惯于从《圣经》故事中看到一段永远定格的历史，这段历史只会在我们的时代重演。托洛茨基不断试图用法国大革命的例子来解释布尔什维克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找到“雅各宾派”、“热月”和“波拿巴主义”的表现形式。

前犹太教徒对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世界革命的领袖的信仰，使他们对弥赛亚即将到来（弥赛亚将在人间建立千年的正义统治）的信仰重新燃起。对明年耶路撒冷会议和重建耶和华圣殿的期待变成了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秩序胜利的期待。

毫无疑问，从《塔木德》的箴言中探寻隐含真理的艰难历程为未来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做好了充分准备，而对商业的熟悉则更容易吸收《资本论》中的政治经济学规定。

对《塔木德》争论的仔细研究使他掌握了一些技巧，这些技巧在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种问题进行论战时派上用场。在教会学习期间获得的观念认为，影响人心的主要手段是语言而不是形象地体现思想，这促使革命犹太人中出现了能干的鼓动者和宣传者，他们能够通过书面和口头语言传播社会主义学说。《圣经》中先知们谴责社会恶习的激情呼吁影响了未来社会主义思想宣传者的风格。

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成为革命鼓动家后，在他的宣传演讲中多次使用阿莫斯的火热呼吁。可以认为，托洛茨基在托儿所的学习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在 1905 年写的传单中的开头语是“听啊，工人！”或“听啊，农民！”，这让人联想到

先知耶利米的演讲开头和传统的犹太祷告词，后者的开头语是“听啊，以色列！”（Shma, Yisrael!）。犹太人传教和宣传犹太教的传统转变为鼓动和宣传社会主义。

与此同时，在本土环境中学到的商业专业技能也被采用，但现在是以反资产阶级革命的名义使用。商业人士数百年的经验能够吸引漠不关心者的注意，说服犹豫不决者，将萌芽的倾向转化为拥有所提供物品的强烈愿望，这使得贫民区和地方的前居民能够在合法的条件下成为社会主义思想的娴熟的公共宣传者。

犹太人习惯于“双重国籍”并为无形的国家服务，这使得他们更容易在社会主义政党的阴谋和非法立场下工作。马克思主义者受到的嘲笑、辱骂和迫害使他们想起了传统上对犹太人的反犹态度。

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对“外邦人”社会的敌视使革命犹太人更容易接受与世界各国资本家进行阶级斗争的思想。各国犹太人有着广泛的国际联系，这使他们更容易将世界无产阶级阶级团结的思想内化。

与此同时，绝大多数犹太人几个世纪以来的城市生活经验表现为一种倾向，即支持西欧社会主义所特有的对乡村和农民的虚无主义态度，并夸大地相信世袭城镇居民的革命潜力。犹太教学校学生把书本知识看得高于一切的习惯有时会妨碍他们看清“阶级敌人”和“无产阶级”的真实面目。

总的来说，犹太人在与“东道国”的国家制度对抗的几个世纪中形成的品质，以及他们与生俱来的主动性、活力和在竞争中取胜的能力，促成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世界许多社会主义政党中，犹太人虽然在全体党员中占少数，但却被提拔到领导层，在其中占据领导地位。

这种情况产生了双重影响。许多犹太人为他们的族人在世界许多国家领导社会主义运动而感到自豪。这符合古代神话中的观念，即犹太人应领导人类走向光明的未来。因此，许多资产阶级出身的犹太人认为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人首先是他们人民的解放者，因此支持这些政党，甚至加入他们的队伍。

同时，犹太人在许多社会主义政党中的领导地位及其活动使得不友好的观察家夸大了他们在这些组织中的比例，甚至认为这些政党是纯粹的“犹太”政党。有人编造出这样的传说：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是犹太人建立世界霸权的工具。这些版本将反犹太主义与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仇恨结合在一起，被世界各国的极右翼思想家所采用。

几千年来，相互排斥的传说的暴力对抗导致了残酷的战争和无情的镇压。不仅是数百万犹太人，数以千万计的其他民族也成为了他们的牺牲品。

实际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完全从属于犹太人以及犹太人完全认同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的情况并没有发生。一方面，相当一部分犹太资产阶级保留了各国资本家敌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传统态度。另一方面，并非所有加入各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队伍的犹太人都能克服将他们与非犹太人隔开的古老的疏离障碍。虽然许多加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队伍的犹太人坚决切断了与犹太社区的联系，但他们对不同宗教和文化背景的人的传统厌恶表现在他们与其他民族的代表交流时遇到的困难上。然而，共同的文化根基使他们更容易接近自己的部落成员。这往往导致犹太社会主义者与世隔绝，甚至为犹太人建立专门的社会主义政党。因此，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俄国出现了多个犹太社会主义政党：崩得党、波阿莱-锡安、犹太复国主义社会主义工党、社会主义犹太工党等。这些政党的创始人确信，犹太工人的利益具有特殊性，不可能在国家社会主义政党的框架内捍卫他们的利益。

犹太人对本民族冤情的敏感性由来已久，有时会使犹太社会主义者将民族利

益置于社会主义运动的任务之上。因此，一些在社会主义政党中身居要职的犹太人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口号，成为民族利益的直言不讳的捍卫者。因此，在 80 年代末，社会主义报刊《阿塞法斯-哈霍米姆》的编辑利伦布伦成了流行小册子《论犹太人民在古代先贤圣地的复兴》的作者，而马克思学说的普及者耶加德尔（列文）则成了在巴勒斯坦重新安置俄罗斯犹太人的积极鼓动者。

对许多犹太人来说，加入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并不意味着与他们出身的资产阶级圈子彻底决裂。托洛茨基的朋友亚历山大-帕尔乌斯（伊斯雷尔-盖尔芬德）的生平清楚地表明，他采用了古老的“双重国籍”做法，既是社会民主党国际的一员，也是世界金融资产阶级最高层的一员。

然而，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社会主义政党的例子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波兰、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许多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逐渐转向纯粹的民族主义立场，并在新成立的民族国家的领导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波兰总统毕苏斯基、格鲁吉亚政府主席约尔达尼亚、亚美尼亚领导人卡扎兹努尼、哈蒂斯扬、奥汉扬、弗拉茨扬）。在政治活动中，他们很快从革命口号演变为支持当地资产阶级。显然，正如他们所理解的那样，他们民族的利益高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原则。

国际主义者转变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转变为资产阶级的支持者，这种自相矛盾的转变证明了从小就根深蒂固的态度的潜在力量。托洛茨基在成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之后，也未能幸免于他生长和成长的民族文化环境的影响。作为本民族的儿子，托洛茨基与本民族复杂而矛盾的历史命运联系在一起，因此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这些影响在许多方面决定了他的一生。列夫-勃朗施坦出生在俄国，这个国家有着自己复杂的命运，而且当时这个大国正面临着深刻的社会动荡，这一事实加剧了这些复杂性和矛盾性。

# 第 二 章

# 帝俄臣民

虽然直到 20 世纪初，俄罗斯与欧洲大陆上的西方邻国不同，成功地避免了革命，但随着发展速度的加快，国内的社会矛盾日益加深。1861 年废除农奴制之前和之后，封建君主专制秩序与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关系之间的矛盾在俄国都有所表现。 随着 1861 年后工业的迅速发展，俄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与此同时，幅员辽阔的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俄罗斯人民与西欧人民在文化上的深刻差异，决定了俄罗斯特殊的发展方式，不能机械地将西方产生的社会理论照搬到俄罗斯。

俄国国情的特殊性还体现在俄国各民族之间，特别是犹太人与帝国其他民族之间关系的发展方式上。同时，在许多犹太革命者看来，“犹太人问题”几乎是俄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只有通过革命爆发才能解决。

托洛茨基的以色列传记作者内达瓦写道：

> “托洛茨基是在民族压迫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对沙皇专制制度、对来自俄罗斯帝国政权的一切始终怀有强烈的仇恨。对大屠杀的态度仿佛是托洛茨基存在的一部分；他总是想着大屠杀，大屠杀刺激着他敏感的神经系统，不断把他推向革命活动……甚至托洛茨基对马克思主义革命原则的接受有时在某种程度上也似乎是一种不自觉的掩饰（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是他对一千公里犹太人区内骇人听闻的贫穷和被剥夺权利的真正反抗的伪装，而犹太人区正是俄国犹太人臭名昭著的居住地”。

内达瓦正确地描述了托洛茨基对沙皇俄国的态度。在他的出版物中，他对“犹太人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专门撰文论述了以反犹言论著称的国家杜马代表普里什凯维奇和其他代表。托洛茨基极力为贝利斯辩护，并尖锐地指责指责他的人。在这些充满讽刺意味的文章中，他不仅毫不掩饰自己对犹太人民敌人的仇恨，还假定反犹主义是俄国的国家政策。

但是，托洛茨基在他的文章中描述的情况是这样的吗？托洛茨基是否如内达瓦教授所说的那样，有根据明确评估俄国犹太人的状况，认为他们生活在“骇人听闻的贫穷和被剥夺权利”的条件下，时刻受到吃人的大屠杀的威胁？人们普遍认为俄罗斯是一个犹太人长期遭受迫害的国家，这种迫害是《旧约》和中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这种看法是否符合实际情况？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再进行一次历史考察，至少简要地阐明这一问题。

首先，我们有理由相信，与犹太人散居地的许多“东道国”不同，在这些国家，犹太人是作为外来人口来到这里的，因此引起了当地居民的不满，而俄罗斯犹太人的祖先并不是来到俄罗斯境内的，而是早在信仰犹太教之前就生活在那里了。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东欧犹太社区的出现与西欧国家的犹太人逃往那里有关。事实上，从 15 世纪开始，从西欧向波兰-立陶宛联邦移民的犹太人就不断增加。波兰贵族基于欧洲封建领主的传统私欲，鼓励这一进程，希望从犹太富豪那里分得一部分财源。波兰国王卡西米尔大帝公开宣布：

> “犹太人作为我们的臣民，必须准备拿出他们的钱来满足我们的需要”。

然而，早在犹太商人和银行家涌入波兰之前，东欧就已经有了犹太社区。一些历史学家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所谓的阿什肯纳齐人，即现在生活在欧洲和北美的犹太人的祖先，并不是来自西欧的巴勒斯坦当地人的后裔，而是欧亚大草原上的居民——哈扎尔人。

众所周知，公元 740 年左右，在巴勒斯坦土著犹太人的影响下，犹太教成为位于伏尔加河、顿河和里海草原的哈扎尔汗国的官方宗教。俄罗斯王公对哈扎尔国发动了数次战役，惩罚“无理取闹的哈扎尔人”的“暴力袭击”，最终斯维亚托斯拉夫王子的军队在公元 964-965 年打败了哈扎尔。根据美国作家莱昂-尤里斯的说法，俄罗斯“迫害犹太人的黑暗历史”就是这样揭开的。

哈扎尔汗国灭亡后，一些哈扎尔人迁往克里米亚。此时，克里米亚已经有犹太人居住，他们是阿南教义的追随者，也就是不承认《塔木德经》的卡拉派教徒。犹太化的哈扎尔人与他们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卡拉派民族。然而，著名的宣传家和作家阿瑟-凯斯勒在其著作《第十三个部落》中陈述了许多历史学家的观点，他认为大部分犹太化的卡扎尔人最终接受了《塔木德经》，定居在现在的乌克兰和匈牙利，并逐渐被视为犹太人。

《逝去的岁月》中说，“哈扎尔犹太人”在俄罗斯很早就为人所知。根据编年史家内斯特的记载，公元 986 年，弗拉基米尔大公身边来了“哈扎尔犹太人”传教，他们回答弗拉基米尔大公的问题。

大公问：“你们的法律是什么？”

他们回答说：“要行割礼，不吃猪肉和兔肉，遵守安息日”。

正如编年史所说，弗拉基米尔问：“你们的土地在哪里？”

他们说：“在耶路撒冷”。

他又问：“真的在那里吗？”

他们回答说：“上帝对我们的祖先发怒了，因为我们的罪过，把我们分散在不同的国家，并把我们的土地给了基督徒”。

弗拉基米尔大公说：“你们教导别人，而你们自己却被上帝抛弃，分散各地，这是怎么回事呢？还是你们也想让我们这样？”

然而，弗拉基米尔拒绝接受犹太教并没有阻止犹太化的哈扎尔人涌入基辅罗斯。正如杜布诺夫所说：

> “神圣弗拉基米尔（大公）百年之后，犹太人仍在基辅公国生活和贸易。斯维亚托波尔克二世大公资助犹太商人，并信任其中一些人收取商品税和其他公国收入。当时基辅有一个重要的犹太社区”。

根据有关现代欧洲犹太人起源于哈扎尔人的说法，犹太化的哈扎尔人并没有停止在东欧定居。在 1347-1348 年瘟疫流行期间，欧洲城市人口过多的贫民窟中的犹太人大量死亡，促使哈扎尔人的后裔迁往西欧，在那里他们充实了犹太人的队伍。巴黎历史的杰出作家维克多-雨果在他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中提到了 15 世纪中叶巴黎的匈牙利犹太人区，雨果的证词证实了西欧城市中东欧犹太人殖民地的存在，这些殖民地在外观和生活方式上有着明显的不同。犹太人不断从东欧移居国外（根据科斯特勒支持的假设），逐渐导致巴勒斯坦本地人（塞法尔迪姆人）与犹太化的哈扎尔人后裔混杂在一起，前者曾是西欧的犹太人口。然而，大部分草原（哈扎尔人）的后裔仍留在乌克兰，蒙古入侵后，乌克兰成为立陶宛公国的一部分，随后又成为波兰-立陶宛联邦的一部分。

这一版本有助于解释早在卡西米尔大帝统治之前的 11 世纪初，基辅罗斯就已经存在重要犹太社区的文献证据。这个版本还有助于解释这样一个事实：到

17 世纪末，随着前基辅罗斯的土地成为波兰的一部分，世界上大多数犹太人都生活在波兰。众所周知，波兰-立陶宛联邦是犹太商人和金融家的主要通道和国际活动中心。波兰王国局势动荡，农民起义狂热，期间还发生了摧毁帕尼亚庄园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看起来并不像世界上大多数犹太人为寻求安全而蜂拥而至的应许之地。（为了证明犹太人在欧洲主要是从东方流向西方，而不是相反，科斯特勒还提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 1648-1649 年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起义[14]之后，东欧犹太人的第二波移民潮涌入了西欧，与此同时还发生了多次犹太大屠杀）。

关于犹太化的哈扎尔人的后裔逐渐定居在基辅罗斯和后来的波兰-立陶宛联邦境内的说法，有助于解释波兰帝国境内犹太人数量众多的原因。这一版本还解释了生活在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和立陶宛的犹太人在生活方式、职业和文化方面与世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的显著差异。

科斯特勒指出：

> “哈扎尔犹太人转变为波兰犹太人，并不意味着与过去粗暴决裂或去除其特征。这是一个渐进的、有机的变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新国家的哈扎尔人社区生活的鲜活传统得以保留。这主要是由于出现了一种散居在世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所没有的社会结构或生活方式：犹太城镇，意第绪语称为‘shtetl’，波兰语称为‘locality’”。

科斯特勒特别提请注意这些村庄居民的服饰，他们穿着东方剪裁的长袖长袍，男人戴着让人联想到中亚头巾的圆顶小帽，女人则戴着头巾。他还指出，当地许多居民从事马车服务，这可能表明他们过去是游牧民族。（这在俄罗斯广为人知。拉热奇尼科夫的小说《布苏尔曼》中的德国医生安东是由一名犹太马车夫从立陶宛带到莫斯科的，这并非偶然）。东方犹太人使用的许多单词和名称，包括用来表示“社区”概念的“kagal”一词，显然源自突厥语。如果科斯特勒和其他支持这一假说的人是对的，那么列夫-托洛茨基作为犹太文化传统的继承者，也就是犹太民族的精神之子，很可能不是古犹太土著的遗传后代。（道格拉斯-里德在他的《锡安之争》一书中也积极使用了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哈扎尔血统这一说法，以便将巴勒斯坦血统的“好犹太人”[他将西欧的主要金融家和迪斯雷利这样的俄国劲敌纳入其中]与哈扎尔血统的“坏犹太人”区分开来，他将后者称为“狂野的亚洲人”、“突厥-蒙古阿什肯纳兹人”和“他们的斯拉夫苗裔”。里德将世界历史上大多数悲惨事件主要归咎于这一族群的活动，包括 1945 年苏联人民战胜法西斯主义，认为这是二十世纪最重大的灾难）。

无论关于阿什肯纳兹人起源于哈扎尔人的说法是真是假，生活在乌克兰的犹太人与西欧同胞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比西欧的金融家犹太人要穷得多，比如费赫特旺格的《西班牙民谣》中的唐-耶胡达或沃尔特-司各特的《艾凡赫》中的艾萨克。但与西欧贫民窟的贫困居民相比，他们的生活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更加健康。

这种生活方式也是托洛茨基祖父列昂-勃朗施坦的特点，他在 19 世纪 50 年代初从波尔塔瓦附近搬到了赫尔松省。托洛茨基的父亲大卫-列昂尼耶维奇继续过着这种生活。奥尔山斯基在描述托洛茨基祖父和父亲的生活方式时写道：

> “远离城市，靠自己的房租、磨坊、酒馆和类似的东西生活，乌克兰犹太人逐渐摆脱了拉比和社会的影响，因为拉比和社会以前一直把他控制在手里，特别是在与宗教有关的一切方面.....”。

---

[14] 赫梅利尼茨基起义是一起从 1648 年起，到 1657 年（或 1654 年 ）为止，发生在乌克兰的哥萨克起义，这次起义变成了乌克兰脱离波兰统治的独立战争。——译者。

根据奥尔山斯基的说法，塔木德派拉比越来越不能“满足酒馆老板的宗教需求，他不再需要一个博学的神学家来向他解释《塔木德经》中的黑暗之处，而是需要一个宗教领袖和忏悔者来控制他的思想和心灵，就像邻村的牧师控制农民的心灵一样，乌克兰犹太人的思想和道德水平已更加接近农民。哈西德教作为一种新的宗教和社会组织形式，必须满足犹太人生活的所有这些需求”。塔木德教在犹太人的城市环境中发展壮大，而哈西德教则满足了那些选择居住在乡村、更接近农民生活的犹太人的需求。与此同时，哈西德教反映了宗教宗派主义发展的趋势，其内在是对信徒行为的推崇，这一点在基督教会的宗派中也有所体现。

哈西德教的创始人是以色列巴勒-谢姆托夫（贝希特）。根据杜布诺夫的说法，与当时在犹太人中传播的卡巴拉草药学家一样，贝希特“在他生命的第 36 年.....开始公开充当‘奇迹创造者’或巴拉泽姆.....很快，他作为圣人在人们中间声名鹊起”。

然而，贝希特并不局限于巫术，而是创造了一种充满泛神论精神的全新宗教教义。他的仪式风格与传统犹太教堂的教堂仪式大相径庭。正如盖利克曼写道：

> “从贝希特的观点来看，祈祷是与上帝沟通的最佳方式。对神的虔诚必须是激情的、热情的。就激情而言，他把祈祷比作婚姻的结合。为了让自己进入一种崇高的境界，他建议人为地制造兴奋，如突然的动作、尖叫、左右摇晃、颤抖等。为了克服世俗的情绪和杂念，有必要人为地使自己兴奋起来，并强迫自己抛弃一切世俗和尘世的东西……因此，贝希特的追随者按照他的建议，在祈祷时变成了土耳其苦行僧或印度法基尔人”。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如此崇高的境界，一个人可以通过正义的代祷人——“沙迪克”——的祈祷得到“拯救”。后者是人与上帝之间的最高中间人，他的祈祷总是能到达天堂。人们可以向他倾诉灵魂的秘密，可以向他忏悔。根据贝希特的说法——

> “沙迪克与他的灵魂一起居住在天堂，如果他经常降临到尘世的居民身边，那只是为了拯救他们的灵魂，为他们赎罪”。

贝希特教导人们要对“沙迪克”抱有神圣而盲目的信仰。即使义人从事琐事、沉溺于虚荣，这种信仰也应坚不可摧。“普通”人不应该对他评头论足，而应该从中看到一些特殊的意义。贝希特说：

> “半熄的火仍然是火，随时都可能熊熊燃烧”。

贝希特的追随者贝尔在继承贝希特教义的基础上，宣扬了“沙迪克”的无误性。他说：

> “沙迪克人希望统治世界，因此主创造了世界，让沙迪克人享受统治世界的乐趣”、“心灵以正义者为中心”、“沙迪克将天地合为一体，他是世界的基础”、“沙迪克绝对无懈可击”、“沙迪克的陨落本身就蕴含着某种至高无上的深意，一个正直的人只有陨落，才能从卑微的事物中汲取神圣的火花，并将它们提升到天堂。沙迪克的崇高思想往往可能集中在一个卑鄙的容器中”。

据目击者称，贝尔“可以相当华丽地安排自己在人们面前的亮相。他身着白色缎子出席庄严的招待会。甚至他的鞋子和鼻烟盒也是白色的（白色在卡巴拉教派中是仁慈的象征）”。

对信徒来说，“沙迪克”是神力的化身，或许是其他更强大力量的化身。

> “沙迪克是哈西德人的偶像，他拥有超自然的力量，可以随意支配自然界的一切。当然，只有相信他并崇拜他的人才能通过无所不能的祈祷实现一

切。他的祈祷具有改变神意的力量。哈西德人在《塔木德》中说：‘上帝决定，但沙迪克取消’。沙迪克与超感官世界保持着持续的沟通，因此命运之书向他敞开。他可以自由地阅读未来，并向信徒们预测未来。他既不受空间、时间的限制，也不受一般自然法则的限制，而自然法则对普通凡人的命运有着巨大的影响”。

哈西德教不仅对贝希特和贝尔的支持者，而且对乌克兰广大犹太人的公共意识和行为都产生了强烈而持久的影响。哈西德教培养出的特点，如对沙迪克的盲目崇拜和对他有能力战胜世俗法律的神秘信仰，沙迪克出场仪式的戏剧化，以及哈西德教集会的激情，在一定程度上为犹太人营造了动荡的社会生活氛围，当时政治集会取代了宗教集会，政党领袖取代了沙迪克。

在俄罗斯帝国，哈西德教在乌克兰西部和南部尤为盛行。因此，勃朗施坦家族对这一宗教运动非常熟悉，当然也参与了自哈希德教出现以来就一直存在的“沙迪克”之争。从托洛茨基的政治活动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犹太教两个分支之间的对抗。从托洛茨基“火热”的演讲中，从他让群众陶醉的能力中，从他在讲台上戏剧化表演的倾向中，从他鼓励对其个人的无度赞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与哈西德派的激情祈祷和沙迪克人的行为有相似之处。与此同时，他希望通过引用马克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希望作为理论家和著作家而受到重视，这些都表明文学家和塔木德学者在他身上占了上风。

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分裂对乌克兰犹太人的处境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犹太地区已经处于犹太教塔木德解释与哈西德教之间的尖锐冲突状态。由于波兰国家的清算，酒馆老板和小业主、小商贩和手工业者、崇拜沙迪克人或诅咒沙迪克人的佃农发现自己成了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索尔仁尼琴（历史学家）在《共处二百年》一书中将波兰-立陶宛联邦最后一次分治的 1795 年作为犹太人在俄罗斯历史的起点。

同时，作者指出，1772 年波兰-立陶宛联邦第一次分治后，拥有 10 万犹太人的白俄罗斯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凯瑟琳二世在对新臣民的讲话中宣布，他们“不论是什么种类和等级”，今后都将保留“公共礼拜和拥有财产”的权利，还将获得“其古老臣民享有的所有权利、自由和特权”。索尔仁尼琴在评论这一声明时说：

“这样，犹太人就享有了与基督徒平等的权利，而在波兰，他们被剥夺了这些权利。同时，还特别针对犹太人补充说，他们的社会‘将保留和维护他们现在享有的一切……自由’——也就是说，犹太人没有被剥夺任何东西”。

正如索尔仁尼琴所强调的：

“犹太人获得公民平等不仅与普鲁士不同，而且早于法国和德意志国家。（腓特烈二世统治下的犹太人收到了更多的压迫）更重要的是：俄罗斯的犹太人从一开始就享有个人自由，而这是俄罗斯农民 80 年后才能享有的。矛盾的是，犹太人甚至比俄国商人和资产阶级人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商人和资产阶级住在城市里，而犹太人与他们不一样，‘可以住在地区村庄里，特别是从事葡萄酒贸易’”。

然而，早在波兰-立陶宛联邦第三次分治之前，俄罗斯商人和犹太商人之间就出现了尖锐的矛盾。就像亨利-福特上文描述的“古老的好英国”的商人一样，俄罗斯商人对女皇的新臣民带来的贸易方式毫无准备，并强烈抵制在他们的市场上出现有活力的竞争者。

莫斯科商人在 1790 年向凯瑟琳二世提交的请愿书中抱怨说，“莫斯科出现

了大量来自国外和白俄罗斯的犹太人”，其中许多人加入了莫斯科商人团体。特别强调的是，犹太人“以低于实际价格的价格零售他们从国外出口的外国商品，从而对当地的一般贸易造成了非常敏感的损害和干扰。这种针对所有俄罗斯商人的廉价商品销售清楚地证明，这只不过是通过边境秘密运输和完全逃避关税而已”。商人们强调，“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而对他们产生厌恶和仇恨”，而仅仅是因为物质损失，他们要求禁止犹太人从事贸易，驱逐那些已经定居的犹太人，排除那些秘密注册为莫斯科商人的犹太人。

尽管有许多证据表明凯瑟琳二世偏爱犹太人，但她还是在 1791 年 12 月批准了莫斯科商人的请愿，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犹太人无权“在商业城镇和港口注册”。他们“只能在已知的时间段内因贸易业务”来到莫斯科。该法令规定，犹太人可以在白俄罗斯、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总督辖区和陶里德省境内注册为商人。这是“定居路线”的开端。然而，正如索尔仁尼琴所指出的，凯瑟琳的法令并没有阻止在她统治结束时，“在圣彼得堡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型的犹太人聚居地”。

很快，俄罗斯社会与犹太人之间出现了新的摩擦根源。事实上，在新吞并的土地上，犹太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小业主和酒馆老板。1796 年，总检察长兼诗人捷尔扎文在视察白俄罗斯时亲眼目睹，新兼并地区半饥半饱的居民在酒馆和小酒馆里喝光了最后的积蓄，而这些酒馆和小酒馆都是犹太人在波兰地主的允许下经营的。后者从葡萄酒贸易中获得了可观的利润。

捷尔扎文在他的报告说明中指出了现有问题的复杂性：

> “很难无过错地、公正地严格指控任何人。农民们把口粮‘喝’给了犹太人，因此饱受糊口匮乏之苦。店主无法防止酒醉，因为他们几乎所有的收入都来自卖酒。犹太人也难辞其咎，因为他们从农民那里榨取最后‘口粮’的来维持生计”。

同时，捷尔扎文提议限制酒馆的数量，试图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 “在不损害任何人利益的情况下，减少（白俄罗斯村庄中犹太人酒馆的数量——索尔仁尼琴注），从而方便当地居民的饮食，并为他们剩下的人提供最好的、对其他人无害的维持生计的方式”。

然而，面对犹太人不愿改变现状的态度，捷尔扎文建议“削弱他们的狂热和麻木不仁的态度，使他们更接近直接的启蒙，但不能在容忍不同信仰的规则上有任何退缩；总之，要消除他们对外国人民的仇恨，摧毁偷窃他人财产的阴险谎言”。捷尔扎文表示，希望这些努力“即使不是现在，也不是突然之间，而是在未来的时代，至少在几代人之后”取得成果，然后犹太人将成为“俄罗斯皇室的直接臣民”。

捷尔扎文的立场和他关于限制食堂业务的建议激起了有关方面的强烈反对，他们把诗人描绘成俄罗斯的阿曼人。在警方截获的一封信中，一位犹太人写道，德尔扎文是一个“迫害犹太人的人”，曾受到犹太教长的诅咒。捷尔扎文得知，犹太人“为此案收集了 100 万份礼物并寄往圣彼得堡，要求尽一切可能改变总检察长捷尔扎文，如果不可能，那么至少要试图夺走他的生命。他们的好处是不被禁止在村里的酒馆卖酒。而且，继续做生意更方便”，他们将传递“来自异国他乡不同地方和不同人的意见，以何种方式建立犹太人组织更好”。正如索尔仁尼琴所指出的，“这些意见，然后是法文的，然后是德文的”，开始被送到专门为解决犹太人问题而成立的委员会。因此，从大部分犹太人转移到俄罗斯统治下的最初几年开始，就有人试图把俄罗斯政府的重要人物说成是迫害犹太人的人。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也向俄国施加压力，要求俄国对其犹太臣民的政策指手画脚。

与此同时，1802 年成立的犹太人福利委员会——亚历山大一世最亲密的支持者斯佩兰斯基、科丘贝、查托里斯基和波托茨基——于 1804 年制定了《犹太人条例》，其中强调“所有在俄罗斯居住、新定居或从其他国家来俄从事商业活动的犹太人都是自由的，与其他俄罗斯人一样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

索尔仁尼琴指出，该条款确认了“犹太人财产不受侵犯、个人自由、特殊信仰和社区组织自由的所有权利——也就是说，犹太社区组织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以前的收税权赋予了犹太人无限的财务权力——但没有增加费用的权利；禁止宗教惩罚和诅咒（cherem）——这给了犹太人宗教自由”。

尽管由于犹太人的反对，“建立普通犹太学校的计划没有获得通过”，但该条款规定，“所有犹太儿童都可以在俄罗斯的所有学院、中学和大学中入学并接受教育，与其他儿童没有任何区别”，而且这些学校中的任何儿童都不会“以任何方式偏离他们的宗教，也不会被迫学习与宗教相悖或甚至令人不快的东西”。

“犹太工厂主得到了‘特别鼓励’，既为工厂分配了必要的土地，又提供了大笔资金”。犹太人还有权获得土地——上面没有农奴，但有权使用基督教劳工。工厂工人、商人和手工业者不受定居线规定的限制。他们被允许在一定时期内前往内省和首都。与此同时，“犹太人被认为有必要学习周边地区的语言、改变外貌并改姓”。《欧洲先驱报》确定了新法律的目的：“让国家拥有有用的公民，让犹太人拥有祖国”。

当时似乎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为犹太民族在俄罗斯帝国境内的生存创造有利条件。只有《法规》第 34 条对犹太人的商业活动有所限制。它禁止犹太人从事酒类生产和销售：

> “自 1807 年 1 月 1 日起，阿斯特拉罕省和高加索省的犹太人一律不得从事酒类生产和销售。自 1808 年 1 月 1 日起，在阿斯特拉罕省、高加索省、马洛罗西斯克省和新罗西斯克省以及其他省份的任何村庄或村落，任何犹太人不得以自己或他人的名义经营任何租赁店、酒馆、小酒馆和客栈，不得在其中售酒，甚至不得以任何借口在其中居住，除非是为了旅行。这项禁令也适用于大路上的所有酒馆、客栈或其他场所，无论它们属于社团还是个人”。

然而，并没有大规模地将犹太人驱逐出村庄。此外，正如《法规》所强调的，

> “富有的犹太佃户很容易与地主达成交易，并与他们一起继续腐蚀和破坏农民群众”。

托尔斯泰写于 1849 年的诗歌《Bogatyr》被沙皇查禁，这间接证明了所有这些影响到小企业家的禁令并没有影响到大型酒类生产商。诗人声称，犹太工厂主“以两亿卢布的价格”获得了酒精饮料的生产权。诗人因此感叹道：

> 弹奏着，弹奏着，
> 河上流淌着酒，
> 把村庄和方域
> 淹没了罗斯大地。

与此同时，犹太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们还努力将犹太人的商业活动扩展到村里的酒馆之外。正如文献所指出的，1803 年，商人诺特金“提出了一项计划，要建立犹太工厂，吸引犹太人从事生产劳动，并在他们中间传播‘国家教育’.....”。在改善犹太人经济活动的口号背后，是犹太资产阶级进入工厂行业的真实阶级愿望。这符合政府的利益，政府通过分配土地和贷款以及吸纳农民来“‘鼓励’犹太制造商”。

与此同时，政府还大力将由小业主、酒馆老板、小商贩和无特殊职业者组成

的大多数犹太人转变为农业人口。然而，正如索尔仁尼琴在其研究中令人信服地指出的那样，沙皇政府的这些努力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在谈到对“犹太人尼基京，一个被当作殖民者的孩子”的研究时，作家指出：

“政府的目标是.....除了开发广袤的无人居住的土地这一国家任务之外，——还要让犹太人定居在比他们居住的地方更宽敞的地方，吸引他们从事生产性的体力劳动，让他们脱离‘有害的行业’，因为在这些行业中，他们‘肆意妄为，给农奴本已不堪的生活……增添负担’……然而，犹太人远没有急于成为农民。起初只有三十几个家庭愿意搬迁”。

虽然后来涌入的定居者越来越多，但“到 1812 年，人们发现，在已经离开定居地的 848 个家庭中，有 538 个家庭还在，88 个家庭不在（他们去了赫尔松、尼古拉耶夫、敖德萨，甚至去了波兰），其余的都消失了”。政府承认殖民失败的原因是“他们（犹太人）不喜欢耕作，不知道如何开始耕作，以及监工的疏忽”。将犹太人安置在土地上的新尝试也以失败告终。未来的十二月党人佩斯特尔这样解释这些失败：

“犹太人在等待弥赛亚的到来，他们认为自己是所在地区的临时居民，因此不愿耕种土地，他们甚至部分鄙视手工业者，大多数人只从事贸易”。

很明显，犹太人在当地的职业（经营酒馆和小生意）并没有为农民劳动做好准备，农民劳动需要大量的体能训练，以及各种自然知识和长期的农业活动经验。

索尔仁尼琴引用了尼基京的话，他描述了 1845 年赫尔松省犹太殖民者的状况：

“‘经济状况非常不尽人意；这些殖民者大多非常贫穷：他们对所有土里的活儿都很陌生，没有几个人会像样地耕种土地，因此即使收成很好，他们的收入也很微薄’；

‘菜园里的土地无人耕种’；

妇女和儿童没有在土地上工作，‘一块 30 俄亩的土地「只能勉强维持一天的生活」’。

效仿‘「德国殖民者的榜样」的犹太定居者人数最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耕作表现出明显的厌恶，并试图满足上级的要求以获得离开的护照……他们让大量土地荒芜，想在哪里开垦就在哪里开垦……他们对待牲畜过于粗心大意.....马匹被强迫骑乘，而且喂养不足，尤其是在安息日。温顺的德国奶牛在不同时间挤奶，导致它们无法产奶’”。

事实上，即使在 40 年后，赫尔松地区犹太殖民者的处境和活动也没有什么变化。托洛茨基在回忆录中描述了 80 年代格罗莫科尔殖民者的生活，他说：

“格罗莫科尔的移民区离亚诺夫卡有四俄里远，一条小河从它中间穿过，将它一分为二。河的这边是犹太人区，对岸是德国移民的聚居区。德国人居住区的房屋比较整洁，有的房顶上是瓦盖的，有的是用芦苇铺的，他们的牛马都膘肥体壮。而犹太人这边的房屋比较简陋，屋顶已经破烂不堪，牲畜更是骨瘦如柴”。[15]

俄国政府试图把犹太人变成牢固的乡村地主的努力失败了。

尼古拉一世的沙皇政府在试图强迫犹太人服兵役时也遇到了同样的困难。根据索尔仁尼琴的说法：

“尼古拉从执政伊始就采取了有关犹太人的第一项有力措施，那就是让犹太人与俄罗斯人平等地承担所有国家义务，即让他们参加普遍的个人征兵，

[15]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二章 邻居和启蒙学校”，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这是他们加入俄罗斯以来从未有过的”。

人们相信，“征兵义务将减少不从事生产劳动的犹太人的数量”，而且“新兵脱离浓密的犹太环境将有助于使他适应国家生活秩序，甚至是东正教”。尽管许多类别的犹太人（所有行会的商人、农业聚居区的居民、商店领班、工厂机械师、拉比以及所有受过中等和高等教育的犹太人）都免于征兵，但当局仍无法达到所需的犹太人数量。

“当在犹太人中实行定期征兵制时，应征入伍的人开始外流，无法足额提供”。

尼古拉一世时期建立的犹太儿童学校“只由犹太（和希伯来）教师教授犹太课程，由俄罗斯教师教授普通课程”，也遭到了抵制。正如索尔仁尼琴所指出的：

“在更长的岁月里，犹太人对这些学校深恶痛绝，体验到了‘学校恐惧’”。

历史学家盖森写道：

“就在人们躲避兵役的同时，他们也在逃离学校，害怕把孩子送到这些‘自由思想’的温床”。

索尔仁尼琴写道：

“富裕的犹太家庭常常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家庭教师那边，而不是穷人家的国立学校……”。

斯利奥兹贝格回忆说：

“即使在 70 年代，进入中学也被认为是对犹太身份的背叛，中学制服是叛教的标志”。

尼古拉一世禁止犹太人穿戴传统服装（妇女头巾和男子长袍）的法令被视为对犹太人生活基础的攻击。格鲁列夫将军从小就听过许多“成年人讲述的伴随着这项法令颁布的哭泣和哀嚎的故事”。在定居地区的城镇和村庄，成群结队的犹太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冲向墓地，在那里用愤怒的嚎叫、哭泣和哀叹为亲人的坟墓祈求祖先的庇护。许多犹太人想方设法保留传统服饰。被禁止戴头巾的妇女开始戴上“黑缎子头巾，上面簇拥着卷发，甚至还用白丝绸做了一个分头；这样，从外表上看，头巾就像她们自己的头发，而她们自己的头发仍然被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或被剃掉……然而，几年过去了，年轻的犹太妇女很快就忘记了她们改革前的半亚洲服装，开始心甘情愿地穿上欧洲服装”。

尼古拉一世认为犹太社区是抵制其改革的主要中心，因此于 1844 年解散了犹太社区组织，将其职能移交给市议会和市政厅。这是对俄国犹太人社区组织的一次打击。

虽然对沙皇改革的抵制往往是由于社区的保守主义造成的，但犹太人与政府之间日益加剧的矛盾是建立在利益冲突的基础上的，索尔仁尼琴是这样说的：

“犹太人的需要（也是他们三千年充满活力的生活的特点）是：尽可能广泛地在外国人中定居，以便尽可能多的犹太人能够参与贸易、调和和生产（然后——在周围居民的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俄罗斯人的需要，在政府看来，是：抓住他们经济（当时——和文化）生活的动脉，指导性的发展”。

正如索尔仁尼琴所正确强调的那样，犹太人口的迅速增长加剧了这种利益冲突：

“从波兰第一次分裂时的约 100 万初等人口到 1897 年人口普查时的 517.5 万人，即在一个世纪内增长了五倍多（19 世纪初，俄罗斯犹太人占世界犹太人口的 30%，1880 年已达 51%）”。

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现象，俄罗斯社会和俄罗斯政府都没有及时意识到这一点。事实证明，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自己在权利上处于不利地位，利益得不到满足，政府的政策遭到越来越多的人震耳欲聋的抵制。

西方能够认识到煽动犹太人与俄罗斯国家之间内部冲突的可能性。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 1846 年出使俄国就是一个例证。他带着维多利亚女王的推荐信来到我国，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说：

“他的任务是改善俄国犹太人的困境”。

在游历了犹太人居住的地区后，蒙蒂菲奥里向尼古拉一世提交了一封内容广泛的信，信中建议——

“普遍解除对犹太人的限制性立法，让他们‘与所有其他臣民平等’（当然不包括农奴），‘在此之前尽快：取消对定居区边界内居住权和行动权的限制’，允许商人和工匠前往内省，‘允许基督徒服役.....恢复犹太社区’”。

尽管这些提议有众所周知的理由，但很明显，当时在世界各地，包括在西欧和俄罗斯，还有许多其他更为恶劣的限制自由和压制人权的案例。应该指出的是，要求取消对俄罗斯犹太人的限制是由英国虚伪地提出的，而英国当时正在全球各大洲实行非人道的殖民制度，压迫包括邻国爱尔兰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人民的权利。很明显，在俄国的犹太人的地位问题不是用来缓解他们的处境，而是在主要大国为统治世界而进行的尖锐斗争中进行政治投机。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这个问题就被牢牢地提上了国际生活的议程。

1860 年，世界犹太人联盟成立，由法国前部长克雷米耶领导。正如索尔仁尼琴所指出的：

“联盟不止一次地直接向俄国政府呼吁，为俄国犹太人挺身而出，尽管往往是不恰当的。克雷米耶抗议将犹太人重新安置到高加索或阿穆尔州——但俄国政府并没有这样的意图；1869 年——犹太人在圣彼得堡受到迫害，并向美国总统抱怨俄国政府涉嫌迫害犹太信仰本身——但事实并非如此”。

西方主要大国的领导人对这些声明并没有置若罔闻。索尔仁尼琴提请人们注意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 1872 年派往俄国的新使团，以及迪斯雷利和俾斯麦在 1878 年柏林会议上对戈尔恰科夫施加的压力。尴尬的戈尔恰科夫在会上辩解说，俄国绝不反对宗教自由，而且完全给予宗教自由，但“宗教自由不应与政治和公民权利混为一谈”。

西方的立场影响了许多犹太人。根据“卢里原则”，在国际舞台上双方发生冲突时，犹太人往往选择至少在言语上更关心犹太人民的一方。西方国家的干预只会助长犹太人反对政府的情绪。

亚历山大二世政府将犹太人变为帝国的臣民，使他们的地位与国家其他人口相似，面对这些顽强抵抗，亚历山大二世政府采取了旨在分化犹太社区、支持最富有阶层的策略。在领导新的“犹太人生活安排委员会”（“第七个”，索尔仁尼琴强调，“但绝不是最后一个”）的布卢多夫的报告中强调，“犹太改革”的实质是“从广大犹太人中分离出在财富和教育方面有影响力的人”。1859 年，在第一行会中工作不少于 5 年的犹太商人被允许在定居区外的任何地方居住。1861 年，拥有学位的犹太人也获得了同样的权利，1879 年，这项权利扩展到其他受过高等教育的犹太人。1865 年，允许犹太工匠在定居区外定居。索尔仁尼琴指出：

“1859 年，解除了 1835 年的禁令：允许犹太人租赁或管理有人居住的地主的土地。1865 年，犹太人使用基督教劳工的禁令也被取消”。

在国家的支持下，犹太资本积极进入银行业和制糖业。后者由犹太工厂主——扎伊采夫家族、加尔佩林家族、巴拉霍夫斯基家族、弗伦克尔家族、埃廷格家族——主导。在19世纪90年代末，只有布罗茨基兄弟的工厂生产了俄罗斯几乎四分之一的精制糖产品。整个食糖贸易的70%都掌握在犹太商人手中。正如有关文献在70年代指出的那样，在俄罗斯，“犹太人金融家、银行家、股票经纪人和糖商已经站稳了脚跟”。

随着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前限制犹太人从事蒸馏酒活动的禁令被取消了。1865年，他们获准在俄罗斯各地蒸馏葡萄酒。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言：

> “到19世纪80年代初，‘切尔塔’地区全部犹太人口的三分之一生活在农村，每个村庄有两三个家庭，他们是传统犹太社区的残余。1870年，一份官方政府报告指出，西部地区的食品贸易几乎全部集中在犹太人手中，这些机构中的弊端超出了所有容忍的限度”。

1861年，废除了禁止犹太人从地产中获取单独收入的禁令。索尔仁尼琴指出：

> “现在，犹太人发展了土地租赁和购买”。

正如索尔仁尼琴引用的西南边疆区总督的说明（1872年）中所指出的：

> “犹太人不租地从事农业生产，而只用于工业目的；他们把租来的土地交给农民，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已知的劳动，超过了普通土地费的价值，建立了一种农奴制”。

改革后国家经济的普遍增长有利于富裕阶层犹太人的繁荣。然而，无论是富裕部落的繁荣，还是1861年后俄罗斯经济的快速增长，都没有影响到肖洛姆-阿莱切姆故事中描述的卡斯里洛夫卡等犹太村庄的大多数居民。用作家的话说，卡斯里洛夫卡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小镇”，“位于被祝福的‘定居区’.....的正中间。这个小镇挤在一个角落里，地处偏僻，与周围的世界隔绝，它孤零零地站在那里，被孤立、被停滞，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仿佛整个乱世的喧嚣、繁华、动荡和沸腾的激情都与它无关”。

卡斯里洛夫卡等地的居民对俄罗斯及其主要民族保持着傲慢和疏远的态度，试图将自己与“东道国”分离开来，就像古代犹太贸易殖民地的居民一样。从肖洛姆-阿莱切姆的故事来看，卡斯里洛夫卡的居民对俄罗斯的称呼除了“罗斯大姨”之外别无其他。与许多部落成员一样，他们不愿与当地人混居，而且本着古老的传统精神，拒绝犹太人或犹太妇女与外族人结婚的可能性。诚然，挤奶工泰维愿意原谅嫁俄罗斯人女儿，也愿意去基辅看望年轻人，但前提是基辅必须像卡斯里洛夫卡人所称的那样——“耶古佩茨”。他们鄙视别人的所谓愚蠢，当地的生产轶事就是证明，这些轶事后来与《托拉》和《塔木德经》的节选一起被收入《以色列的智慧》选集。在这些轶事中，俄罗斯人被嘲笑对犹太轶事的理解贫乏迟钝。

尽管卡斯里洛夫卡的居民对自己在知识和道德上的优越感充满自信，但他们也认识到自己物质生活的贫乏和不安全。肖洛姆-阿莱切姆笔下的主人公们只是梦想着与布罗茨基、罗斯柴尔德和其他商界无冕之王会面。肖洛姆-阿莱切姆的故事《父母的喜悦》中的小商人，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的典型居民，和他作品中的其他主人公一样，也就是所谓的“倒霉蛋”，长期运气不佳。如果“他购买谷物——价格下跌，他买卖牲畜——开始死亡，他从事林业——暖冬降临”。

诚然，与长期定居在这些地方的祖先一样，他们常常满足于自己卑微的命运。他们很高兴自己的孩子能够支持“关于《塔木德经》中的智慧之处”或“关于《圣

经》中的某些箴言”的谈话，然后他们就可以说：“布罗茨基与我有什么关系？对罗斯柴尔德来说我算什么？我是我的国王，我的荣誉！”

然而，1861 年的改革推动了各种力量的发展，使犹太地区的酒馆老板和商人不再过着沉浸于小生意、犹太法典学习和家庭享乐的惯常生活。在成千上万卡斯里洛夫居民“留居”的俄罗斯，不仅工业生产、城市和铁路迅速发展，而且俄罗斯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社会矛盾也急剧加剧。虽然犹太人中的富裕阶层变得更加富裕，但正如索尔仁尼琴所指出的那样，农奴制的废除总体上“对俄罗斯犹太人非常不利，对许多犹太人来说甚至是毁灭性的……社会变革在于不再存在数百万无权无势、被剥夺了流动性的农民阶级，犹太人的人身自由价值也随之下降。在经济上，农民摆脱了依附关系.....不再那么需要犹太人的服务，也就是说，不再被严格禁止通过指定的中间人（在西部省份几乎总是犹太人）以外的方式进行整个产品销售和货物采购。这样一来，被剥夺了自由农民劳动力的地主们为了不破产，不得不从事自己的经济活动，而在此之前，犹太人作为佃户和中介人在各种工商业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应该指出的是，当年开始实行的土地信贷取代了犹太人，成为地主生活财政基础的组织者”。

因此，在改革后的俄罗斯，富有的犹太人迅速致富，并成功地与俄罗斯商人竞争；相当一部分犹太社区的物质状况恶化。19 世纪末，25%到 38%的俄罗斯犹太人靠社区最富有阶层的施舍为生。

此时发生的事件不断被用来证明犹太人在俄罗斯的生活条件不堪忍受。正如迪曼施泰因在他发表于《BSE》第 24 卷的文章《俄国的犹太人大屠杀》中指出的那样：

> “亚历山大二世遇刺一个半月后，即 1881 年 4 月 15 日，在伊利萨韦特格勒市（有时该市的名字被写成“伊利萨韦特格勒”——作者注）发生了犹太人大屠杀，一直持续到 4 月 17 日……不久又发生了一些新的大屠杀。当时最强烈的大屠杀发生在基辅；从 4 月 23 日断断续续持续到 27 日。在基辅省的 48 个地方，犹太人的财产遭到抢劫”。

迪曼施泰因列举了在敖德萨、尼古拉耶夫、阿列克桑德罗夫斯克（后称扎波罗热）、佩雷亚斯拉夫尔、尼日恩、鲍里索夫、罗姆尼、洛佐瓦亚和其他定居点发生的大屠杀，指出“1882 年春，在前一年发生大屠杀的部分相同地点，以及巴尔塔、列季切夫、卡缅涅茨和莫吉廖夫-波多利斯克，大屠杀再次发生”。虽然大屠杀造成了巨大的物质损失，但人员伤亡却很少：一人在大屠杀期间死亡（根据其他资料，两年的大屠杀期间有两人死亡）。

1881 年之前，除了 1821 年、1859 年和 1871 年在敖德萨发生的三次犹太人大屠杀之外，俄罗斯帝国从未发生过此类事件。然而，在所有这些事件中，大屠杀的组织者都是居住在敖德萨的希腊商人，因此可以将其视为自公元一世纪亚历山大大屠杀以来犹太商人和希腊商人之间传统关系的延续。

对于 1881-1882 年的大屠杀，迪曼施泰因认为沙皇政府负有责任：

> “由于民意党犹太人参与了对亚历山大二世的谋杀，政府报刊加强了反犹煽动。政府为犹太大屠杀进行了组织准备，揭露革命运动是犹太分子挑拨的.....大屠杀不受惩罚，甚至受到鼓励，直到中、小犹太群众被镇压为止（富人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因为他们有士兵看守）”。

然而，迪曼施泰因和其他作者都无法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政府对大屠杀负有责任。索尔仁尼琴写道：

> “1917 年后，一组研究人员——杜布诺夫、克拉斯尼-阿德莫尼和洛津

斯基——在所有公开的国家档案中仔细寻找证据，结果发现情况恰恰相反，首先是亚历山大二世本人要求进行有力的调查”。

索尔仁尼琴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警察是如何镇压大屠杀而不停止使用枪支暴力的。

政府没有必要煽动人民反对犹太人，因为它知道专制制度的主要敌人不在帝国的外围，而是在帝国的中部地区和首都，也没有必要组织针对乌克兰少数民族的大屠杀来恐吓革命者。选择犹太人作为谋杀沙皇的主要被告在俄国得不到支持，这仅仅是因为，众所周知，他们在民粹派组织的恐怖活动中扮演的角色并不是主要的。民意党的绝大多数参与者都是俄罗斯青年知识分子，而不是犹太人。格西娅-格夫曼是因暗杀亚历山大二世而参加“三月一号审判”的唯一一名女犹太人，也是唯一逃脱死刑的被告。根据戴奇的信息，参加民意党恐怖活动的犹太人不超过 10-12 人。

然而，有许多证据表明，1881-1882 年的大屠杀并非自然的。1881 年 4 月，即亚历山大一世遇刺半个月后，民众中出现了骚动，从而助长了大屠杀的开始，在欧洲俄罗斯南部省份，认为犹太人是谋杀沙皇的主要凶手的观点变得十分普遍。在俄国南部，关于犹太人是谋杀沙皇的主要凶手的荒谬说法之所以被接受，可能是因为它是在长期存在的社会、种族和宗教对立的土壤上产生的。

历史学家格森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

“出于各种原因想要屠杀犹太人的当地人.....张贴了公告，组织了大屠杀的主要骨干分子，很快就有数百人在没有任何劝说的情况下自愿加入，他们被普遍的放荡气氛所吸引，容易获利.....然而.....即使在酒精饮料的刺激下，这些实施抢劫和暴力的人群也只朝着一个方向，即犹太人进行打击——放荡的行为在基督徒家门口立即停止了”。

尽管这些事件被描绘成“俄罗斯野蛮”或“沙皇恐怖”的证据，但类似事件在世界历史上却多次上演。大屠杀的对象不一定是犹太人。几乎整整一百年前，伦敦在 1780 年起义期间也发生过类似事件，狄更斯在 1881 年大屠杀 40 年前出版的小说《巴内比-鲁吉》中也有详细描述。在这些大屠杀之前，曾有印刷品煽动民众。在大屠杀期间，许多闲逛的路人也加入了活动分子的行列，他们要么想以他人的物品为代价牟利，要么只是想发泄自己的破坏倾向。尽管酒后激情勃发，但伦敦暴徒的大屠杀只限于特定宗教团体的住宅。不同的是，1780 年在英国，天主教徒遭到了大屠杀，而 1881 年在乌克兰，犹太人遭到了大屠杀。

与此同时，1881-1882 年在俄国发生的大屠杀与 1780 年在伦敦发生的大屠杀一样，显然具有深远的政治目的。1780 年伦敦大屠杀的任务是破坏国家局势的稳定，为议会的解散和以戈登勋爵为首的“新教徒联盟”的掌权创造条件。

但是，谁会挑动乌克兰民众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这种挑衅行为的组织者的目的又是什么？很难相信沙皇政府决定煽动群众进行大屠杀，从而在亚历山大皇帝去世后的头几个月里破坏秩序。索尔仁尼琴引用了普里奇曼的声明来支持民意党组织大屠杀的责任：

“报刊上有关于民意党个别党员参与大屠杀的消息，但参与的程度尚未澄清。从党的机关报来看，党员们认为大屠杀是革命运动的适当类型：他们假定大屠杀会使人民习惯于革命演说”，“最容易针对犹太人的运动在进一步发展中会落到贵族和官员身上”。

但是，除了有间接证据表明民意党的一些成员参与了大屠杀之外，没有证据表明该组织是大屠杀的发起者。尽管此时的民意党确实高呼屠杀是革命的开始，

但乌克兰的大屠杀显然无法推翻沙皇制度，甚至丝毫不会动摇俄国的稳定。因此，大屠杀的后果既不符合沙皇政府的利益，也不符合俄国革命力量的任务。

迪曼施泰因在列举大屠杀的主要后果时指出：

“犹太人大屠杀在犹太人口中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民族情绪激化。出现了支持大规模移居美国或巴勒斯坦的运动”。

从“在任何犯罪中，人们首先应该寻找那些希望从犯罪中获益的人”这一观点出发，我们可以推测，1881 年犹太人大屠杀的组织者是一些有影响力的国际势力，他们早已将“俄国犹太人问题”变成了复杂的外交政策游戏中的一张王牌，并利用它来解决影响深远的问题。

首先，大屠杀大大加剧了政府与犹太人之间的“冷战”，这场冷战始于“异化地带”建立之后。大屠杀使犹太人相信他们的想法是正确的，即沙皇是他们的新法老，沙皇的大臣们是新阿曼人，他们在俄罗斯的逗留可以比作“巴比伦的囚禁”[16]或“埃及的奴役”。[17]伊-巴别尔笔下的英雄贝尼-克里克口口声声说造物主让犹太人留在俄国是个错误：

“每个人都会犯错，即使是上帝。上帝把犹太人安置在俄罗斯，让他们像在地狱一样受折磨，这难道不是一个错误吗？如果犹太人住在瑞士，那里有一流的湖泊、山区的空气和强壮的法国人，那又有什么错呢？”

对于俄罗斯的敌人来说，利用一个或另一个民族的不满情绪来破坏俄罗斯的稳定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奥斯曼帝国巧妙地利用北高加索各族人民与俄罗斯国家之间的冲突，来削弱俄罗斯对其土耳其属地的进攻。19 世纪，一些西方国家多次利用“波兰问题”来打击俄罗斯。从 19 世纪末开始，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开始在俄罗斯各少数民族中建立自己的机构。众所周知，从 40 年代起，西方国家就试图挑唆犹太人与沙皇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可以推断，这些国家的机构可能以将犹太人作为其在俄罗斯帝国内的“第五纵队”为名，煽动了大屠杀。

富裕的犹太人，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国外，也对犹太人口中最贫穷的那部分人的大规模移民感兴趣。众所周知，犹太社区对富裕阶层不断施加压力，要求他们牢记履行帮助贫穷同胞的义务。与此同时，这一重担的很大一部分也落在了外国富裕犹太人身上，他们本应帮助俄罗斯的贫穷犹太人。通过煽动移民，富人减轻了慈善负担。因为富人们自费维持着没有明确的职业，只是靠富人的捐款生活的贫穷犹太人。这些数目日益增长的贫穷犹太人生活俄罗斯，占犹太人口中的 25%至 38%。

最后，激起犹太人大规模移居国外使一些西方大国和主要犹太金融家得以解决他们自己的与俄国事务无直接关系的问题，如在美国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中产阶级或在巴勒斯坦建立移民殖民地。根据古代传说故事和对现代性的认识，使犹太人相信有必要“逃离”俄国。他们将巴勒斯坦或美国视为应许之地。毫无疑问，受到反俄煽动的犹太人口变成了一个易于管理的群体，可以用来在中东和美国实现各种社会和政治目标。

索尔仁尼琴指出：

“早在 1869 年，联盟（世界犹太人联盟）大会就提出了犹太人从俄罗

---

[16] 巴比伦之囚是指公元前 597-前 538 年期间，新巴比伦王国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两次征服犹太王国，大批民众、工匠、祭司和王室成员被掳往巴比伦，这个事件被称为巴比伦之囚。——译者。

[17] 公元前 18 世纪，犹太祖先亚伯拉罕带领族人定居迦南。两百年后迦南出现了饥荒，部分犹太人逃亡古埃及。这部分犹太人为埃及人所奴役。后在摩西带领下，犹太人出埃及，重回迦南地。——译者。

斯移民到美国的第一个想法——在联盟和当地犹太人的帮助下，第一批到那里定居的人‘将成为.....一个对俄罗斯同宗教人士有吸引力的中心’”。

很明显，犹太人的大规模迁徙是在民众中进行有组织的巧妙宣传所引发的，而民众对 1881 年在伊利沙维特拉德和其他乌克兰城镇及地方发生的事件并没有清楚的认识。许多人就像肖洛姆-阿莱切姆的同名故事中的“莫特尔男孩”一样，只有当他们发现自己身处大西洋沿岸时，才终于问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大屠杀？”因为他们和他们的亲戚都从未目睹过大屠杀。

肖洛姆-阿莱切姆在书中给人的印象是，甚至在大屠杀开始之前，向俄罗斯境外大规模移民的一切准备就绪。欧洲各地成立了一系列移民委员会，为逃亡者提供免费食物、经济援助以及火车票和轮船票。

虽然移民在抵达时要经历屈辱的身份验证和入籍程序，但许多被接纳进入“美利坚地上天国”的人很快就忘记了这些屈辱，因为他们认为能够成为美国人是最高的幸福，因此更加渴望诅咒他们离开的国家。他们对美国的喜悦和对俄罗斯的蔑视在肖洛姆-阿莱切姆的故事主人公皮尼那里得到了表达，他“面向大海，举起右手，握紧拳头，破口大骂”：

> “听着，你们这些驴子、恶棍、酒鬼、无赖、流氓、大屠杀制造者！我们能来到这个国家，都是你们的功劳。如果不是你们的法律、迫害和大屠杀，我们不会知道哥伦布，哥伦布也不会知道我们！”

显然，“哥伦布”是皮尼对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的美洲的称呼。对皮尼来说，美洲是美国长久以来向当地居民许诺的幸福生活的化身。从 1882 年到 1908 年，大批犹太人从俄罗斯涌入美国，仅移民美国的犹太人就有 150 万。

虽然大屠杀过去了很多年，但犹太人从俄国移居国外的现象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愈演愈烈，而且主要是以“逃离组织犹太人大屠杀的国家”为标志。因此，1881-1882 年的大屠杀在某些人的巧妙煽动下，既为一些犹太人移居国外提供了方便的借口，也为留在俄国的犹太人日益强烈的反对情绪提供了借口。

同时，对政府来说，大屠杀标志着以往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了。大屠杀发生后不久，内政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在给亚历山大二世皇帝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当前的反犹运动——

> “无可辩驳地证明，尽管政府做出了种种努力，但犹太人与本地人之间的不正常关系.....依然如故”。

伊格纳季耶夫认为，取消对犹太人的限制只会导致他们“不是把全部精力用于提高国家的生产力，而是用于剥削周围人口中主要是较贫穷的阶层”。伊格纳季耶夫建议“采取同样有力的措施来消除目前当地人与犹太人之间……的不正常状况，并保护人民免受犹太人有害活动的影响”。

80 年代，政府采取了此类措施。1882 年 5 月，政府批准了《暂行规则》，禁止犹太人在城镇外（即乡村）重新定居、占有或使用不动产，并禁止他们在周日和基督教节日进行交易。对逃避兵役的犹太人的限制也加强了。这样就为犹太人与俄罗斯国家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创造了先决条件，而有利于那些企图颠覆俄罗斯的人。

这些事件对托洛茨基成长的家庭有何影响？虽然勃朗施泰因一家生活在 1881-1882 年发生犹太大屠杀的地区，但他们并未受到影响。托洛茨基自传的前几章是 80 年代的主要内容，其中只字未提在敖德萨、尼古拉耶夫和离亚诺夫卡不远的其他城市发生的犹太大屠杀。即使他在讲述参观伊利沙维特格勒（附近的乌兹别克中心，也是他看到的第一个城镇，他父亲在这个城镇附近租了地皮）时

给他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时，也没有提到几年前在那里发生的 1881 年第一次犹太人大屠杀。显然，他父亲的情况与那些大屠杀的受害者不同。勃朗施坦一家并不担心他们的财产会被肆虐的暴徒蹂躏，更不担心他们会漂洋过海去寻找幸福。（也许他们感到高兴的是，大部分由他们负担生活费用的穷人不会向他们求助，而是到遥远的美国去寻找日常的生计）。

列夫的父母显然将他们的人生计划与未来在俄罗斯的生活联系在一起。1879 年夏天，在第一次大屠杀前两年，也就是列夫出生前不久，他的父亲大卫-勃朗施坦从破产的地主亚诺夫斯基上校手中部分购买、部分租赁了亚诺夫卡。买下亚诺夫卡使大卫-勃朗施坦的希望成真。

买下的 100 俄亩和租下的 200 俄亩都能带来收入。这块土地上有许多建筑：

“我父亲已经盖了一幢瓦房，包括一个车间、一个厨房和一个伙房。然后是一个小木仓，接着是一个大木仓，然后是一个新木仓——都在芦苇丛下……谷仓里，分隔成一个个小谷仓，有散发着新鲜气味的小麦，有粗糙带刺的大麦，有扁平、滑溜、几乎是液体流动的亚麻籽……马厩、谷仓、猪圈和禽舍都在房子的另一侧……池塘边的小丘上矗立着磨坊。木板搭建的营房里有一台十马力的蒸汽机和两台发电机组……磨坊不仅为经济服务，也为整个村社服务。农民从 10–15 里以外的地方运来粮食，并支付十分之一的碾磨费”。[18]

托洛茨基写道：

“我的父亲不知疲倦、残酷无情地对待自己和他人，通过初步积累的劳动而崛起”。

“.....一年到头都在我家农庄做工的人并不多。大部分的佣工都是临时在这里做活的，在收成好的年景他们会有数百人之多。他们大多来自基辅、切尔尼科夫和波尔塔瓦地区，他们在这里一直干到圣母节，也就是俄历 10 月 1 日……有一帮皮肤晒得黝黑的收割工一连十年都来亚诺夫卡找活干.....他们很多都是一家人一起出来找活干。这些人从家里出来要步行一个月才能到达这里，一路上他们就吃一些干面包片，晚上就在沿途的市集上露宿”。[19]

劳动报酬很低，生活条件也很差；

“这些收割工人一夏天干四个月的活儿，男的可以挣到 40 卢布到 50 卢布的工钱，女的可以挣加卢布到 30 卢布，另外主人家要管饭吃。天气好的时候，他们就睡在露天的田地里，遇到下雨天，便躲在麦草堆下面。他们的午饭一般都是粥和菜汤，晚饭只有麦子面做的稀粥。饭食里能有一点少得可怜的油脂，对他们来说就已经很不错了，吃肉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有时候也会因此引发一些小小的冲突。雇工们会丢下手里的活计，聚集在院子里，他们有的趴在大谷仓的阴凉里，把被麦草扎得满是伤痕的赤脚在空中踢腾着，等待着主人给个说法。于是父亲就会给他们一点酸乳酪、西瓜或者是半袋子干咸鱼什么的，他们拿上东西，就会高兴地回去干活。像这样的事情在每个农庄里都有”。[20]

然而，尽管“活”很快就结束了，但托洛茨基的话表明，业主给雇工的食物只能勉强满足他们的基本生理需求。托洛茨基对工人所患疾病的描述就证明了这

[18]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的另一译本。——译者。
[19]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一章 亚诺夫卡”，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20]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一章 亚诺夫卡”，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一点：

“有一年夏天，雇工们都患上了夜盲症，天刚刚擦黑他们就看不见东西了，只能摸索着走路。我母亲的外甥当时正在我家做客，他写了一篇关于这件事情的文章，寄给了报社。这引起了地方议会的注意，还派了一个人到亚诺夫卡来调查此事。我那位写这篇报道的亲戚自然是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但我的父母却在心里怪他多管闲事，当然他自己也觉得有些歉疚。但这并未给我家带来多大的损失，那位调查员认为，这种病是因为雇工们的饭食里缺少油脂造成的，而这种情况在全省十分普遍，所有农庄里的雇工都是吃这样的饭食，而且有的方吃的比这里还差”。[21]

由此可见，大卫-勃朗施坦是当年典型的富裕地主，他想方设法充分利用劳动力，即使让工人挨饿也在所不惜。

因此，托洛茨基有理由以地主儿子回忆录的方式描述自己的童年。尽管他努力再现了许多情节，这些情节本应表明他的父亲和父亲的雇工之间关系融洽，但很明显，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社会障碍。似乎只有首席簿记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格里本与主人的关系较为密切，勃朗施坦家族看重的是他非凡的智慧和技术。然而，托洛茨基在讲述他的故事时，不知不觉地保留了显然是从小就养成的习惯，对这位据说梦想制造“永动机”的能工巧匠略带居高临下的讽刺态度。在记忆中，大多数工人都是无名的可怜虫，饱受艰苦劳动的折磨，赤着脚、衣衫褴褛、浑身脏兮兮的，身上还寄生着虱子。（托洛茨基回忆说：“星期天下午，姑娘们在小伙子们的头上或相互之间寻找虱子”。） 从这些描述中很难了解这些不幸的人在列夫心中唤起了什么样的情感：是同情还是胆怯？

勃朗施坦夫妇在跻身上流社会并成为亚诺夫卡的主人后，努力保留当时庄园的特点。虽然托洛茨基在自传中一再提醒人们注意房屋天花板上的裂缝和沙发软垫上的缝隙，但亚诺夫卡的房子显然是一座普通的庄园，里面有典型的城市家具。勃朗施坦一家努力保持家庭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与乌克兰和俄罗斯农民或格罗莫科尔犹太殖民者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孩子们由保姆照看。他们学习音乐。家里有许多俄文书籍和杂志。托洛茨基的母亲安娜-勃朗施坦来自敖德萨，她喜欢看小说，并向孩子们灌输了阅读的爱好。和当时许多地主家庭一样，孩子们也尝试写作。列夫写过诗，甚至尝试过出版家庭杂志。托洛茨基承认：

“作为一个富裕地主的儿子，我更多地属于特权阶层，而不是被压迫者”。

勃朗斯坦的社交圈主要由附近富有的地主组成。然而，在托洛茨基的描述中，这些人中的许多人不久前还是赫尔松大草原上无可争议的主人，与勃朗施坦家族相比，他们显得十分凄惨，并引起了他毫不掩饰的厌恶。对托洛茨基来说，赫托帕诺夫家族是当地贵族堕落的最突出例子。

“没落贵族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戈尔托潘诺夫家。这里的一个大村子和乡就是以戈尔托潘诺夫命名的，周围的土地曾经都是他家的。现在那个老头的手里只剩下了 400 俄亩土地，而且还都被抵押甚至再抵押了出去。我父亲就租种了他的一些地，但租金是直接交给银行的。那老头季莫费·伊萨耶维奇现在就以替农民们写书信和讼状为生。他和妻子来我家的时候，常常把招待他们的茶点和糖藏在袖子里带走。他的妻子有时候会流着口水给我们讲她年轻时家里是如何的阔绰：家里使唤着农奴，弹的是钢琴，穿的是绫罗绸缎，用的是名贵香水。她的两个儿子几乎都不认字，小儿子维克托尔在我家的作

[21]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一章 亚诺夫卡”，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坊里当学徒”。[22]

破产的地主们卖掉了昔日奢华的残余。勃朗施坦夫妇向他们购买家具和大钢琴。

托洛茨基还记得伊丽莎白格勒近郊的老地主，她来到亚诺夫卡“考察关于租约的事情”。大家对这位老妇人毕恭毕敬，还为她准备了特别的食物。“用烧鸡、樱桃酒和果酱款待他们”。[23]但后来她离开了，一年或半年都没有露面，农场的管理权完全交给了实际的主人勃朗施坦。

然而，勃朗施坦家族并不是赫尔松地区最富有的地主。列夫-勃朗施坦从小就知道：

> “这里的德国移民构成了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中间可真有富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很古板，儿子们很少会送到城里去，女儿们都要下地干活。那时候，他们的房子都是用砖砌的，盖着红红绿绿的铁皮屋顶。他们的马都膘肥体壮，马具也很结实，车是油漆过的，我们把这种车叫做‘德国大车’……他们中最著名的是草原上的绵羊大王法尔茨·费恩。
>
> 草原上数不清的羊群一望无边，这是谁家的呢？是法尔茨·费恩家的。大路上一队队装着粮食、柴草、谷糠的大车运往谁家？法尔茨·费恩家。飞驰的三套马的雪橇上坐着的穿着裘皮的老爷是法尔茨·费恩家的管家。令人称奇的壮观的驮队只有法尔茨·费恩家才有。法尔茨·费恩家有从美国买来的骏马，有从瑞士买来的公牛
>
> ……在草原上法尔茨·费恩的名字是那么响亮，就像几万只绵羊奔腾时的脚步声，就像无数头羊在叫，就像无数背着长鞭的牧羊人的长啸，就像千万只牧羊犬在狂吠。就连草原也是不论盛夏还是严冬都时时刻刻地呼吸着这个名字”。[24]

德国殖民者的生活和法尔茨·费恩的富裕可能是勃朗施坦夫妇的榜样，这影响了他们的儿子明显的“德国综合征”，并在他的生活中不止一次地表现出来。

尽管大卫-勃朗施坦与法尔茨·费恩相差甚远，但他的财富却迅速倍增。托洛茨基说：

> “十月革命使我父亲成为一个非常富有的人”。

很显然，如果没有十月革命，大卫-勃朗施坦本可以把他富裕的家产作为遗产传给他的孩子们。

勃朗施坦家族可能对沙皇当局有不满，可能对部落同胞受到的限制感到不满，也可能同情大屠杀的受害者，但很明显，“异化地带”和大屠杀都没有阻止勃朗施坦家族迅速提高他们在俄国社会中的地位，包括与俄国多数民族成员相比的地位。托洛茨基回忆说，尽管“1881 年的限制性法律颁布后，我父亲.....再也不能购买他渴望已久的土地，而只能在隐蔽的情况下租用土地”，但这种情况并没有阻止勃朗施坦财富的增长。显然，托洛茨基的父亲坚信沙皇制度的稳定性。托洛茨基回忆说：

> “1921 年，父亲经历了白军和红军带给他的种种危险之后到克里姆林宫来找我，我开着玩笑说：‘记得吗？当年您说过沙皇制度还能够存在三百年。’老人狡黠地笑着用乌克兰语回答我：‘这回算你说对了……’”。[25]

---

[22]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二章 邻居和启蒙学校”，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23]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二章 邻居和启蒙学校”，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24]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二章 邻居和启蒙学校”，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25]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六章 转折”，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显然，基于对现有制度力量的信念，大卫-勃朗施坦认为有必要在当时的条件下实现最大可能。最有可能的是，小时候的列夫毫无疑问地认同了父亲的信念。

因此，如果列夫-勃朗施坦因忠实于其父对沙皇制度持久性的信念，并继续其父的经济活动，那么他就不太可能受到“定居路线”和大屠杀思想的影响——而根据内达瓦的说法，正是这些思想导致了他的革命。在另一个世界线上，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他变成了众多犹太“商人”中的一员，他们忠于俄罗斯帝国，加入了迅速壮大的俄罗斯资产阶级的行列。在这种情况下，他绝不会写出火辣辣的文章，谴责普里什克维奇、扎米斯洛夫斯基和俄国其他公认的反犹主义者，当然也不会把沙皇尼古拉二世描绘成一个病态的仇视犹太人的人。在列夫-勃朗施坦开始有这种想法之前，他必须离开亚诺夫卡。

# 第 三 章

# 成为敖德萨知识分子

为了确保孩子们能增加他的财富并在社会上占据更高的地位，大卫-勃朗施坦希望给他们最好的教育。列夫在亚诺夫卡长大时，他的哥哥亚历山大和姐姐伊丽莎维塔在城外上学。后来，列夫本人和妹妹奥尔加也接受了同样的教育。在这些年里，许多犹太家庭，甚至是那些比勃朗施坦家更富裕的家庭，都把他们的孩子送到俄罗斯学校学习。在《草原》的故事中，摩西-莫伊谢耶维奇高兴地告诉他的客人，他的儿子纳姆将在一年后被送去“学习”。父母事先对儿子未来的分离感到担忧，尤其是考虑到他健康状况不佳。这个故事写于 1887 年，特别反映了作者同年春天去乌克兰南部旅行的印象。

犹太人口中的“学校恐惧症”被犹太儿童积极进入普通教育学校所取代。正如索尔仁尼琴所指出的：

> “从 1874 年那一年起，军事法规及其带来的教育福利——犹太人涌入普通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机构的人数急剧增加。这一跳跃非常明显。从 1876 年到 1883 年，中学和专业中学的犹太人数量几乎翻了一番，而从 1878 年到 1886 年——也就是在 8 年时间里——大学生的数量增加了，达到 14. 5%”。

犹太人大量涌入教育机构，以至于教育部早在 1875 年就向政府指出：

> “不可能在不使基督徒难堪的情况下接纳所有寻求普通教育的犹太人”。

根据索尔仁尼琴的说法，明斯克州长报告说：

> “犹太人有钱，比俄罗斯人更能为子女提供教育，犹太学生的物质条件比基督徒好，因此，为了不让犹太成分优先于其他人口，有必要对中学招收犹太人实行百分比限制标准”。

敖德萨当局也提出了类似的报告，他们报告说，在该市的一些中学中，犹太人占学生总数的 75%。

犹太家庭的孩子能够顺利进入教育机构，显然不仅得益于他们成长的良好物质条件，还得益于他们在幼儿园或在私人教师的帮助下养成的有益的学习习惯。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牢记，在这些年里，俄罗斯人口的绝大部分都是没有经济能力送子女上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的人。因此，当明斯克州长谈到犹太人有更多的物质机会时，他很难将他们与俄罗斯贵族、俄罗斯商人或俄罗斯城市中富裕阶层的代表相提并论。

当局以许多犹太学生参与革命活动为由，开始限制他们进入高等教育机构。索尔仁尼琴指出：

> “第一项限制措施是 1882 年的一项命令，即军事医学院录取的学生中犹太人不得超过 5%。1883 年，对矿业学院下达了同样的命令，1884 年，对交通学院下达了同样的命令。1885 年，哈尔科夫技术学院招收的犹太人比例被限制在 10%，1886 年，哈尔科夫兽医学院完全停止招收犹太人：因为‘哈尔科夫一直是政治骚乱的中心，在那里或多或少有相当数量的犹太人，一般来说是不受欢迎的，甚至是危险的’”。

1887 年 6 月，教育部长杰利亚诺夫发布了一份非正式通知，限制犹太儿童

进入高等和中等教育机构的比例：

“在定居地区——10%，在定居地区以外——5%，在两个首都——3%”。

实际上，这些规定确实遭到了违反。索尔仁尼琴指出：

“在敖德萨，犹太人占人口的三分之一，1894 年，在最著名的里谢利耶夫斯基中学，犹太人口占总数的 14%，第二中学占 20%以上，第三中学占 37%，女子中学占 40%，商业学校占 72%，大学占 19%”。

敖德萨在招收犹太儿童方面不存在任何障碍，这可能是勃朗施坦家族决定把列夫送到敖德萨学习的原因。列夫在敖德萨的生活由安娜-勃朗施坦 28 岁的侄子摩西-菲利波维奇-施宾策尔负责。据托洛茨基说，他是“一个聪明、善良的人，他在他那个时代‘受苦’了，就像他们当时说的那样，因此没能从中学考上大学”。1888 年，摩西-施宾策尔在亚诺夫卡度过了一个夏天，在那里他的健康状况得到了改善，因为他很容易得肺结核。据托洛茨基说，这位年轻人没有“固定的工作.....翻译了几部希腊悲剧并加以注解，还写儿童故事，为编历史年表还研究了施洛塞尔等历史学家的著作”来赚钱。[26]他很快与“敖德萨国立犹太女校校长”结婚。然而，根据托洛茨基的评价，尽管有摩西的工资和摩西额外的收入，“摩西-菲利波维奇家的生活并不富裕，几乎没有余钱”。

列夫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长大的。托洛茨基没有具体说明。也不清楚施宾策尔是如何突然变得富有并成为一个繁荣的出版商的。托洛茨基只指出，后来施宾策尔“办了一家小出版社，最初几年业务开展得并不顺利，但是后来发展得很快，十一二年以后，他成了南俄最著名的出版商，拥有一家规模很大的印刷厂，还有一处豪宅”。[27]

1888 年，当列夫随施宾策尔夫妇搬到敖德萨时，这座城市还不到一百年。这座城市始建于 1794 年，位于苏沃洛夫军队在土耳其要塞叶尼-杜尼亚（新世界）遗址上修建的要塞附近，敖德萨最初被命名为“哈吉比”——这是突厥语的名称。然而，一年后，这个名字被改为现代名称——“敖德萨”，因为人们错误地认为该地是古希腊人奥德索斯的定居之处。这个错误并没有得到纠正，但很快就有大量的希腊人来到了这座新城市。与此同时，犹太人也迁入了这座城市。索尔仁尼琴在书中指出，“由于俄罗斯犹太人和主要来自德国和加利西亚的外国犹太人向敖德萨大规模迁移”，敖德萨的人口迅速增长。

敖德萨市发展了大型商港和工矿企业，并建立了一所大学。歌剧院和芭蕾舞剧院成为敖德萨的骄傲，世界舞台上的明星经常在这里演出。整个敖德萨都在讨论俄罗斯戏剧界著名演员卡鲁索和恰利亚平的巡演。多伊彻写道：

“黑海港口敖德萨是俄罗斯的马赛，只是比马赛年轻得多，阳光明媚，热情开朗，是世界性的大都市，能接受多种思潮和影响，激情、热爱壮观的场面和热情感性主导着敖德萨人的性格”。

正如索尔仁尼琴所强调的：

“甚至从 19 世纪初开始，作为一个沿海开放的口岸港，自由的敖德萨就按照自己的特殊法律发展，与俄国法律迥异。比如，俄罗斯在与土耳其发生战争时，它向土耳其船只开放”。

索尔仁尼琴引用了《简明犹太百科全书》中对敖德萨的如下描述：

“这一时期，（敖德萨）犹太人的主要职业是谷物贸易。许多犹太人是小商人、中介（主要是地主和出口商之间的中介）、外国和本地（主要是希

[26]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三章 家庭与学校”，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27]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三章 家庭与学校”，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腊）大型粮食贸易公司的代理人、粮食交易所的经纪人.....、估价师、出纳员、称重员、‘装卸工’”；

“犹太人在粮食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到1870年，他们掌握了大部分粮食出口。到1910年……占总出口的89.2%”。

“与定居区的其他城市相比，敖德萨有更多的自由职业的犹太人.....他们与俄罗斯有教养的社会代表有着良好的关系，并得到城市最高行政部门的赞助……1856-1858年敖德萨学区托管人皮罗戈夫尤其受到犹太人的赞助，他是俄罗斯著名外科医生”。（1913年，托洛茨基为皮罗戈夫撰写了一篇大篇幅的赞美文章）。

乌克兰南部商品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城市及其犹太社区的繁荣。索尔仁尼琴引用了革命前敖德萨前居民伊齐科维奇回忆录中的一段话，他写道：

“在丰收年，从最大的粮商到最小的个体户，半个城市的人都靠出售粮食产品为生”。

伊齐科维奇保证说：

“在敖德萨，‘小麦’商人或银行家的终点和知识分子的起点是无法划清界限的”。

显然，伊齐科维奇在提请人们注意许多敖德萨居民的密切利益关系之后，掩盖了“小麦大王”与城市其他居民在社会地位上的明显差异，这并非毫无道理。另一位敖德萨人尤里-奥列沙将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并列出了其中一些人的名字：

“敖德萨的富人……布罗茨基、盖普纳、哈里、阿什肯纳齐、普塔什尼科夫、阿纳特拉.....他们是银行家、粮食出口商、黑社会、罪犯”。

像大卫-勃朗施坦这样的农村企业家的命运取决于这些人，但敖德萨商业精英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像亚诺夫卡这样的农场的粮食供应。

随着俄罗斯的南移，新城市的资产阶级很快开始影响整个俄罗斯社会。敖德萨“黑暗而罪恶”的商人们咄咄逼人的活动风格形成了俄罗斯新商人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他们缺乏精神基础，一切活动都服从于赚钱的能力。众所周知，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最终在敖德萨找到了自己，并在那里一住就是几年”。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先是“结识了许多犹太人、日兹卡人和日登尼亚塔米人”，最后不仅与犹太人结识，而且“也被犹太人接受了”。我们必须认为，在他生命的这一时期，他培养了自己制造和伪造金钱的特殊技能。

费奥多尔-巴甫洛维奇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敖德萨商人在金融事务中的复杂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是俄罗斯资本化与西方大资本家之间的重要纽带。里亚申科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俄罗斯粮食经济》一书中指出：

“最广泛参与粮食贸易和粮食出口业务的主要私人银行是：亚速-顿河银行、国际银行、圣彼得堡私人商业银行、北方银行、俄亚银行（主要与法国资本合作）、俄外贸银行和圣彼得堡会计银行（与德国资本合作）”。

据卡拉-穆尔扎估计：

“外国银行资本在面包出口中所占份额为35-40%”。

俄罗斯出口的廉价粮食是国际金融家的金矿。正如卡拉-穆尔扎解释的那样：

“占俄国人口85%的农民生产了大量流动性很强的产品——粮食——不仅自己没有得到任何剩余产品，甚至还放弃了部分必要的产品。国家通过税收和货币征收肩负了从佃农那里榨取这些产品的任务。他们从这些资金中为西方股东提供了足够高的利润。农民生产的面包约有一半出口，成为硬通

货……(与此同时，农民自己平均每年从出口中获得每码 10 卢布的收入)”。

敖德萨谷物商人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他们获得了谷物贸易的部分利润，这说明城市经济相对较快地融入了世界文明的最新技术成果。这些年在敖德萨生活过的尤里-奥列沙回忆说，在他童年的几年里，城市出现了有轨电车、电灯泡、电话、锌制排水管等“奇迹”，他写道：“伟大的技术出现在我眼前”。亚诺夫卡与敖德萨之间相距几十公里，列夫-勃朗施坦因克服了这一障碍，一下子从草原荒原上走了出来，在那里，即使是很小的格罗莫克雷亚村也似乎是一个大城镇，他来到了一个不寻常的世界，在那里，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哈西德人梦寐以求的奇迹。伟大的科学和技术发现的证据可以让大草原上的居民相信，他已经进入了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就像在扎迪克人的故事里一样，自然法则被废除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大城市的灯光”催眠了这个孩子，就像催眠了周围村庄的许多新来者一样。

施宾策尔夫妇决心“文明化”这个村里的孩子，把他变成一个大城市的居民：

> “他们时常提醒我早上要道早安，手和指甲要时刻保持整洁，不能用刀子叉东西吃，任何时候都不能迟到，别人为你服务时要对他们说谢谢，不能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我还知道了，在亚诺夫卡经常说的好多话其实是乌克兰方言，根本就不是地道的俄语。每一天都会有更多的新鲜事物展现我的面前，这些远比我生活了十年的亚诺夫卡文明得多。在古典文学和戏剧的魅力熏陶下，就连作坊也显得黯然失色了。我身上也渐渐开始带有城市的气息了，但是乡村就像失去的乐园一样，偶尔也会在我的头脑中清晰地显现。这时，我就会变得郁闷起来，焦虑不安，在窗玻璃上写下我对母亲的思念，或者趴在枕头上痛哭一场”。[28]

尽管施宾策尔夫妇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他们还是没能让列夫迅速准备好圣保罗实科学校的入学考试。1883 年秋季，他的入学成绩一般，俄文 3 分，算术 4 分。据托洛茨基说，“犹太孩子从这个班考入一年级虽然也要遵守入学名额比例的规定，但是可以优先”。[29]

据托洛茨基回忆，“圣保罗实科中学最初是一所德国人的学校，是由路德派新教区专门为敖德萨和南方地区德国移民的孩子开办的”。然而，在列夫进入学校时，“这里的德国学生还不到总人数的一半，在学校的管理方面德国人不断受到排挤”。[30]不过，据托洛茨基说，“学校里的德语在一定程度上与俄语竞争”，因此，他在学校的逗留不禁有助于熟练掌握德语和熟悉德国文化，他在亚诺夫卡开始感受到德国文化的吸引力。

与此同时，列夫继续学习《托拉》（律法）和《塔木德经》。课程在学校进行。当东正教学生学习“上帝的律法”时，犹太学生去上另一堂课。托洛茨基写道，“在那里，一个姓津盖尔曼的好心人用俄语教犹太学生《圣经》和犹太民族的历史”。大卫-勃朗施坦并不满足于此，他为儿子聘请了一位私人教师。托洛茨基写道：“我在敖德萨从一位非常博学的老人那里上过私人圣经课”。因此，他在求学期间接触德国和俄罗斯文化并不意味着他与犹太民族的文化隔绝。

根据托洛茨基的回忆录，他是一个勤奋的学生，努力从学习中获得最大的收获：

> “每天很早起床，匆匆喝完早茶，用纸包上早餐，塞到大衣口袋里就往

---

[28]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三章 家庭与学校”，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29]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三章 家庭与学校”，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30]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三章 家庭与学校”，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学校跑，赶去上层祷。我没有迟到过，总是安静地坐在课桌旁边专心听讲，认真抄老师写在黑板上的字。在家里我认真写作业，按时睡觉，保证第二天能够起床喝早茶并赶上层祷。我按部就班地从一个年级升到另一个年级，在街上遇见老师时恭恭敬敬地向他们行礼。

……我很少逛街，不怎么到广场去玩，也不常做户外运动……

……有许多男孩子到海上去划船，到堤坝上去钓鱼，但是我就没有体会过这种乐趣。我在大海旁生活了七年，但海在我的生活中并没有占据什么位置”。[31]

托洛茨基自己也用他的决心解释了一个孩子的这种不寻常行为：

“我觉得到城里来就是要读书和工作的，我以为孩子们在街上打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况且他们完全是没事找事”。[32]

托洛茨基声称，在城市里缺乏体育锻炼，他“我会到假期在乡下都给补上”。

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孩子在他这个年龄不参加通常的体育活动，特别是不参加海上游戏，是有其他原因的。从托洛茨基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在学校的早期，他并没有回避体能训练器材课，甚至还试图在这些器材上表演需要相当大的力量和灵巧的复杂技巧。

托洛茨基写道：

“进学校不久，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孤儿院的孩子在那里做了几个技巧动作，我也能照他那样尝试一下。我爬上直梯，用脚尖勾住最上面的横梁，头朝下倒挂在那里，想来个 180 度回转，脚落到地上。但我没及时松开手，结果身体撞到了梯子上，伤到了胸口，呼吸困难，倒在地上，身体痛苦地扭动着。我伸手抓住一个孩子的脚，随后就失去了知觉。从此我在做体操运动的时候就变得格外小心”。[33]

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次事故使列夫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愿意玩耍和参加体育活动，但有理由相信，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不是这次事故，而是孩子的慢性疼痛。托洛茨基承认：

“他从小患有一种被医生称为慢性消化道黏膜炎的疾病，这种病折磨了他一辈子。他不得不长期服药并控制饮食，精神上的压力（原文翻译是“神经性癫痫”。——译者）总是首先反映在肠胃上面。上四年级时他的病情恶化了，严重妨碍学习。长期的治疗无效后，医生们决定，病人应该去乡下疗养”。[34]

很有可能，这个诊断是非常近似的。众所周知，当托洛茨基成为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之一时，俄罗斯和德国最好的医生都在为确定托洛茨基慢性疾病的性质和找到治疗方法而努力。神经性癫痫反复对托洛茨基的身体产生强烈而多样的负面影响。除了在自传的开头提到“神经性癫痫”会导致肠道疾病外，托洛茨基还在书的中间部分写道，他的特点是“身体疼痛或不舒服时容易晕倒”，这是他“从母亲那里遗传来的”。托洛茨基说，“这给了一位美国医生借口，把癫痫归咎于我”。然而，除了这位匿名的美国医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托洛茨基患有癫痫外，他的狱友齐夫也写道托洛茨基患有癫痫。很显然，一个牢房里的人无法相互隐瞒许多疾病，甚至是他们不愿承认的疾病。

---

[31]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三章 家庭与学校”，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32]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三章 家庭与学校”，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33]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三章 家庭与学校”，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34]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四章 书籍和早年的冲突”，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列夫从体操台阶上摔下可能是由于他惯常的癫痫发作。根据他的证词，他当时失去了知觉，其他体操运动员很可能告诉他，他是如何在地上抽搐扭动的，孩子们误以为他试图抓住他们的腿。这听起来像是对癫痫发作的描述。

托洛茨基在详细描述他被迫暂时中断在校学习的那次袭击事件时，出于某种原因，他以第三人称叙述了自己的遭遇，并主要提请人们注意他的神经系统和心理的痛苦状态：

> “外面的积雪还没有完全消融，但天气已经开始转暖，屋顶和树梢已有了春的气息，麻雀也带来了春天的问候。一个四年级的学生放学回家，不成样子地拿着书包，因为书包带子上的卡扣掉了。他觉得身上的长大衣有些累赘，大衣很沉，压在身上闷得他直冒汗，他感到精疲力竭。小男孩重新审视周围的一切，首先是看了看他自己。春天的阳光使他想到这世上肯定有比学校、学监、不成样子的背在肩上的书包以及学业、象棋、午饭甚至是阅读和戏剧，一句话，比所有的日常生活都更有力量的东西。这种东西从未出现过而现在却凌驾于一切之上，让孩子热切盼望又备受甜蜜的折磨。
>
> 他脑袋昏昏沉沉的，感觉就像生病了一样，他把书包扔到桌上往床上一扑，禁不住抱住枕头大哭。为了给流泪找个理由，他拼命地回忆书本和生活中的痛苦情景，但这却让他更加伤心。他哭啊，哭啊，用泪水洗刷着春天的忧愁。那一年他已经 13 岁了”。[35]

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男孩的身体疾病与抑郁的精神状态相结合，他对日常渺小生活的思考与对一些崇高的伟大原则的敏锐认识相结合。可能在生病的状态下，男孩从外部来认识自己，而这也反映在托洛茨基的故事中。这种叙述者从外部观察自己的描述，在一定程度上让人想起《白痴》中的几页，其中患有癫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详细描绘了米什金王子在癫痫发作前的状态。

托洛茨基的慢性病伴随了他的一生，任何压力都会诱发这种疾病，然后伴随着类似癫痫的抽搐，接着引起胃肠疼痛，然后发烧。这种疾病甚至在童年时期就影响了他的性格和行为。从学生时代起，他就不得不担心在身体或神经受到强烈刺激时疾病会突然发作，因此尽量避免游戏、娱乐和那个年龄常见的活动，严格遵守作息、饮食和学习制度。同时，长期的疼痛和对癫痫发作的恐惧会给孩子的生活带来持续的压力，使他变得易怒和任性。

托洛茨基间接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尽管他为自己的暴躁找到了其他的解释：

> “从童年时代起，我的生活中就有不少的冲突，用法学家的话来说，就是与人间的不平作斗争。我与别人之间的密切或破裂的关系都源于此”。[36]

但在其他方面，托洛茨基对自己的批评更为严厉：

> “这个孩子无疑是自爱的、脾气暴躁的，也许是不安分的”。

甚至在他成年后，易怒和顽固，甚至变成神经衰弱的行为，都是他的特点。托洛茨基不止一次出人意料地与他的伙伴决裂，把以前的热情关系变成了侮辱性的语气。当他不同意别人的观点时，托洛茨基就会采取极端的抗议方式，要么蔑视地摔门而出，拒绝听取对方的意见，要么在对方坚持拒绝离开房间时不得不抱着对方离开。托洛茨基一生中多次上演过这样的场景。

列夫各科成绩都很好，但由于他的不稳定和易怒的性格，他不喜欢学校和学

---

[35]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四章 书籍和早年的冲突”，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36]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四章 书籍和早年的冲突”，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校的所有老师。他在总结在学校的生活时写道：

“总的来说，实科中学留给我的印象即使不是黑色的，也是灰色的。学校里或喜或悲的一切事情都发生在没有人性、官僚气息十足的形式主义制度下。当我回忆起这段生活的时候，很难能怀着真正的热爱之情说出哪怕是一位老师的名字”。[37]

有时，对学校和老师的厌恶会让他写出一些丑闻。

据托洛茨基回忆，“最严重的一次冲突是我上二年级时和比尔南德之间发生的”。据托洛茨基说，有一次，这位患有胃肠炎的老师在上课时病发，“那一天比尔南德暴跳如雷，他服了两倍剂量的治胃病的药”，据说还因此给了学生瓦科尔 1 分的成绩。他的同学们决定给老师开一场“大合唱”。托洛茨基回忆说：“我还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优等生”。[38]

“我们所谓的‘大合唱’就是当老师走出教室时我们就一起低吼，把老师轰出去，但我们在吼的时候嘴唇不动，这样就看不出是哪些人干的。

我们已经对比尔南德吼过一两次了，但是因为我们都很怕他，所以吼的声音比较低。但是，这回我们决定来一次狠的。当‘法国人’（指比尔南德，因为他是法语教师。——译者。）刚夹起班级日志时，最边上的一排就吼了起来，整齐的吼声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教室，包括靠近门边的座位，我也毫不惜力。一只脚已经踏出门口的比尔南德很快地转过身，跑到教室中间，脸色可怕极了，站在他的这些敌人面前，怒目而视，一言不发。我们坐在课桌后面，尽量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特别是前几排的），而后面几排的则假装收拾书包，就好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比尔南德在那里站了 30 秒钟，疯狂地朝门口转过身去，他的燕尾服的后摆像帆一样飘起来。这次，全班的学生一齐大吼着把他哄出了教室。我们的吼声在走廊一直追了他很远”。[39]

课间休息后，调查开始了。众所周知，老师知道无法挽回不可救药的恶作剧者，“全班有 10 到 15 个孩子被留在学校里不许回家吃午饭”。托洛茨基写道：

“我并没有企图摆脱自己，但是也没有主动站出来”。

然而，“大合唱”的煽动者列夫-勃朗施坦却没有被绳之以法，这让受到捉弄的老师很生气，第二天，列夫被传唤到校长办公室。起初，老师们不愿相信他们所听到的，因为列夫-勃朗施坦被认为是班上的第一名学生。然后，告密者对列夫提出了新的指控。原来他是其他“大合唱”的组织者。原来，列夫怂恿学生们写匿名信给督学，指控比尔南德，企图将他开除出校。为了不让学校当局猜出是谁写的信，列夫建议每个学生在信中“不要签名，每个人在信上只签一个字母”。

当老师们得知这位“模范学生”的胡作非为时，都大吃一惊。比尔南德尤为愤慨，他反复强调：

“二年级最优秀的学生原来是个道德败坏的家伙”。[40]

他被开除出学校，但允许他在第二年重返学校。

惩罚可能太重了。当然，老师也不应该称这名学生为“道德败坏”。最后，

---

[37]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四章 书籍和早年的冲突”，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38]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四章 书籍和早年的冲突”，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39]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四章 书籍和早年的冲突”，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40]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四章 书籍和早年的冲突”，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列夫的太过事不关己，袖手傍观，引起了学生们的愤怒。然而，这个故事的有趣之处首先在于四十多年后托洛茨基本人对这个故事的态度。列夫-托洛茨基已年过半百，积累了丰富的人生阅历，在这个故事中，他不仅为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充分辩解，还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反抗学校“没有人性、官僚气息十足的形式主义制度”的青年英雄。托洛茨基一生都患有严重的慢性疾病，他并不同情这位被孩子们恶毒欺凌的患病教师。相反，托洛茨基在这个故事中看到了“有生以来经历的第一次政治考验”。[41]

52 岁时，托洛茨基无法原谅他的同学向老师打小报告，他是各种恶作剧的煽动者，但总是不受惩罚。在这个很久以前的校园插曲中，托洛茨基试图看到他后来在政治斗争中多次观察到的相同模式。他写道：

> “围绕这件事人们分成了不同的群体：一边是嫉妒和告密的人，另一边是坦荡和勇敢的人，中间是一群左右摇摆、举棋不定、保持中立的人。在随后的几年中我身边的这三个群体也没有完全消失。在后来的岁月里，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我不止一次地遇到这三种人”。[42]

托洛茨基的后半生似乎都在为自己没能逃脱惩罚、保住“第一名学生”的名声而愤愤不平。他从那些不想让他——主谋——逍遥法外的人身上看到了“背叛”和“不稳定”。如果与老师的斗争尽管幼稚不成熟，但建立在崇高原则的基础上，那么“运动领袖”就应该不得不大胆地承认一切，以便与他的“同伙”一起分担惩罚。一个受骑士精神熏陶的小学生甚至可以把别人的罪过揽到自己身上，就像汤姆-索亚那样，勇敢地把自己置于棍棒之下，使贝基-撒切尔免于即将受到的惩罚。

苏联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详细分析了《我的生活》中的这一情节，他揭露了托洛茨基在面临类似局势表现出的“自信”，即头目指挥忠于他的人采取颠覆行动，而他自己却保持着无辜者的声誉所造成的后果：

> “当我们必须了解托洛茨基 1923 年的讨论时，我们会看到同样的景象：主要组织者完全置身事外——他与此无关，甚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坦荡的’、勇敢的‘男孩’们则坐在灌木丛中为这位领袖而战，他们书写决议、收集签名、在会议上发言；最后，‘不稳定的群众’，起初‘摇摇晃晃’，犹豫不决，直到理清头绪，然后友好地转向‘嫉妒和告密的人’。整个派别突然发现自己站在对立的一边，只有‘勇敢的人’除外，他们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失去勇气，稍作拖延，就跟在群众后面走了。
>
> 这是一幅非常相似的图景——托洛茨基不止一次地回忆起这幅图景，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成年人托洛茨基对残忍的儿童恶作剧不加批判的态度，以及从这些行为中看到政治活动开端的倾向，都证明了托洛茨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明显处于精神发育不全的状态。同时，将他的幼稚恶作剧描绘成对“无法忍受的压迫”和“公然的不公正”的正义抗议，在当时的俄国知识分子中并不罕见。列夫-勃朗施坦对他的学校作出了明确的负面评价（托洛茨基一生都保留了这一评价，未作任何修改），这在当时出身于俄国知识分子家庭的人中是很典型的。

根据伊兹戈耶夫在《论聪明的青年》一文中引用的社会学调查数据。在 20

---

41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四章 书籍和早年的冲突”，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42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四章 书籍和早年的冲突”，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世纪初接受调查的莫斯科学校毕业生中，86%的人表示“他们与中学教职员工中的任何人都没有精神上的亲密关系”。在描述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对学校的态度时，伊兹戈耶夫写道：

> “在学校里，孩子们感觉就像在敌营里，有人在密谋对付他，有人在操纵他，有人在为他的末日做准备。在孩子看来，学校是邪恶的，但不幸的是，它是不可避免的。必须在对自己伤害较小的情况下进行：你需要得到最好的分数，但给学校尽可能少的劳动，并深深地躲藏在她的角落中。欺骗、诡计、假装羞辱——所有这些都是正当的自卫手段。老师进攻，学生防守。更重要的是，在这场斗争中，学生在家里获得了父母作为盟友，而父母对学校的看法与学生并无太大区别”。

列夫一直以来的盟友是施宾策尔一家。值得注意的是，在列夫被学校开除后，施宾策尔家起初对他的父母隐瞒了这一事实，试图让他们逐渐对这一沉重打击有所准备，并在他们眼中为儿子的行为辩解。列夫住在敖德萨的公寓里，只是在学校通常放假后才来到亚诺夫卡。尽管做了“准备”，列夫的母亲还是被他的行为激怒了，一开始拒绝和他说话。而他的父亲则对这个被开除的学生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托洛茨基认为：

> “尽管他也很难过，但是看得出，他在想：他的儿子尽管是班里第一的学生，竟敢对着当官的吹口哨，他为此而感到自豪”。[43]

显然，这件事增强了列夫对施宾策尔夫妇的依恋，他们为列夫挺身而出。虽然列夫在学校接受过正规教育，但毫无疑问，他在学生时代的主要教育者是施宾策尔夫妇，他们是典型的敖德萨知识分子。摩西-菲利波维奇和他的妻子不仅让列夫习惯了城市礼仪和遵守日常生活的需要，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品味和观点的形成。虽然托洛茨基喜欢在亚诺夫卡读书，但他指出：

> “在敖德萨可供选择的书籍范围要比在亚诺夫卡广泛多了，再加上有人热情指导，我便如醉如痴地疯狂读书。我匆匆地体味读来的新知识，然后又迫不及待地继续读下去。我每天晚上都想尽各种办法求得让我多读一刻钟，哪怕是五分钟也好，以便能够读完一章”。[44]

托洛茨基回忆说：

> “在刚到敖德萨的几年中，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间莫过于晚上做完功课之后到睡觉之前的那半个小时。在那段时间里，莫伊谢（摩西）·菲利波维奇常朗读普希金的作品，尤其是朗读涅克拉索夫的作品”。[45]

对俄罗斯经典作品的熟悉不仅限于阅读书籍。在施宾策尔的熟人中，有一位莎士比亚鉴赏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西切夫斯基，他曾让列夫写一篇文章，比较普希金的《诗人与书商》和涅克拉索夫的《诗人与公民》。这篇文章立即受到了严格的审查。

列夫还认真地熟悉了西方文学。托洛茨基还记得摩西-施宾策尔对他关于《浮士德》和《奥列佛·特维斯特》[46]内容的好奇问题的回答。列夫还阅读施宾策尔夫妇不允许他阅读的书籍，但他可以从他们丰富的图书馆中偷偷借阅。因此，雷巴

---

[43]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四章 书籍和早年的冲突”，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44]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四章 书籍和早年的冲突”，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45]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四章 书籍和早年的冲突”，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46] 英国作家狄更斯的作品。——译者。

读了列夫-托尔斯泰的《黑暗势力》，这本书被审查员列为禁书。

在施宾策尔家，列夫成了报纸的常客。他特别高兴地阅读了弗拉斯·多洛舍维奇的小说，这些小说经常在敖德萨报刊上发表。

施宾策尔夫妇还让列夫迷上了戏剧。《纳扎尔·斯托多拉》的首场演出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后来，他“被剧院的魅力所吸引，后来又喜欢上了令敖德萨人引以为豪的意大利歌剧。在上六年级的时候，我甚至去给别人上课，只是为了挣钱去剧院”。[47]

托洛茨基写道，母亲灌输给他的“对文字的热爱”在施宾策尔夫妇那里得到了发展，这种热爱“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出现了，“虽然这种喜爱时强时弱，但是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强烈。在我看来，作家、记者和演员组成一个有着无限魅力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是由最优秀的人群组成的”。[48]受阅读的影响，列夫自己也尝试写作。甚至在入学前，他就开始写诗。二年级时，他尝试创办文学杂志《水滴》，他的努力得到了文学老师的好评。然而，他对戏剧的印象促使他尝试与朋友合作上演《悭吝骑士》。[49]

显然，列夫接触文学的经历结出了硕果。托洛茨基在他的文章和演讲中多次提到俄罗斯经典作品的形象，特别是经常使用果戈理和萨尔特科夫-谢德林的作品。托洛茨基除了在政治修辞中习惯使用俄罗斯文学经典中的著名作品外，还经常使用不常被引用的文学作品（如阿-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本《瓦西里萨-梅连捷娃》）。至于 19 世纪俄国主要的评论家和宣传家，托洛茨基不仅列举了他们的名字，还对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多布罗留波夫和赫尔岑的观点进行了详细的评价。托洛茨基在流亡期间写了许多关于俄国和西方各种作家的文章。托洛茨基的这些作品和其他作品证明了他对俄罗斯和外国文学的广泛了解。

托洛茨基还在他儿时阅读小说的爱好上留下了印记。萧伯纳称托洛茨基为“长篇小说之王”并非偶然。

列夫在施宾策尔家庭中积极接触世界文化，尤其是俄罗斯文化的成就，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社会政治观点。托洛茨基将施宾策尔家庭中流行的观点描述为：

> “带有一些社会主义特征、具有民粹派和托尔斯泰主义色彩的、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温和自由主义倾向”。[50]

托洛茨基回忆说：

> “他们几乎从来不谈论政治，尤其是当着我的时候，也许是因为他们担心我会在学校里乱说而惹来麻烦”。[51]

还有：

> “我周围的环境远离政治。我在学生时代没有政治观，也不需要有政治观，但在我的潜意识里却有斗争精神，我非常痛恨现存制度中的不公平现象和专制压迫”。[52]

---

[47]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四章 书籍和早年的冲突”，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48]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四章 书籍和早年的冲突”，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49] 普希金所写的剧本。——译者。

[50]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四章 书籍和早年的冲突”，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51]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四章 书籍和早年的冲突”，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52]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四章 书籍和早年的冲突”，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托洛茨基在解释他为什么在这么小的年纪和“远离政治的环境”中成为反对派时写道，他的反对源于许多情况，包括“来源于施宾策尔家的人道主义思想，来源于涅克拉索夫的诗歌和其他的书籍，来源于整个社会环境”。[53]

毫无疑问，摩西-施宾策尔和他的妻子通过阅读列夫的书或评论他读过的报刊文章，通过回应他关于戏剧表演或学校生活事件的故事，有意无意地向他灌输了他们家庭所接受的观点，以及敖德萨和大部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典型观点。此时，许多犹太人已经摆脱了与世隔绝的地方生活，融入了俄罗斯社会，接受了不同社会阶层和阶级的品味、态度和行为方式。这一过程发生得如此迅速和明显，以至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给卡尔-马克思的一封信中写道：“俄罗斯知道如何使德国人和犹太人俄罗斯化”，并讽刺地指出：“在那里，甚至犹太人的颧骨也长出了斯拉夫人的颧骨”。

但是，勃朗施坦家族融入了俄国地主和商人阶层，采用了俄国地主和资本家的习惯和价值取向，而施宾策尔家族因为其脑力劳动的主要职业，决定了他们作为迅速成长的俄国知识分子中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地方或贸易办事处形成的生活方式和思想与知识分子阶层格格不入。俄国知识分子关注的不是某些商品的市场状况，而是世界和俄国社会发展的最重要问题。他们必须精通的不是对古代宗教书籍的解释，而是现代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潮。他们必须了解西方和俄罗斯的最新文化成就。

有时，这些要求对于每天都要从事职业劳动和家务劳动的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俄罗斯知识分子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完全依赖公共事务和文化领域的主要专家发表的意见。因此，文学评论家或新闻观察家的权威在俄国是如此之大。（托洛茨基后来在这一领域表现出色）。

文学评论家和期刊评论作者成了主流知识分子的向导，他们将自己的品味，最重要的是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取向强加于人。知识分子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些评价，并极力为其辩护。格申宗并没有夸大其词，他指出：

> “公众舆论要求禁止阅读费特，否则至少受到嘲笑.....它（知识分子——作者注）在其精神领袖——批评家和宣传家——的主持下，对自由创作的真理进行了宗派审判，并作出了判决：秋切夫——不予理睬，费特——嘲笑，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宣布为反动，契诃夫不值一提，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列举了许多他从小就喜欢的作家和诗人的名字，却只字未提格申宗认为知识分子“忌讳”的名字。

盲目服从杂志和报纸上的“舆论”，对许多超出专业能力范围的问题不可能有足够深入的理解，这往往使知识分子们过于自信，并导致他们肤浅狂妄，自以为无所不能。并不是每个俄罗斯知识分子都能像伟大的科学家伊万-巴甫洛夫那样，承认自己对一系列问题，尤其是那些超出自己专业外的问题一无所知。通过加入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行列，当地人和教会学校的学生发现，他们正在加入一个社会阶层，而这个社会阶层的自我意识特点是夸大地认为自己在知识和精神上优于他人，就像正统的犹太人一样。

19 世纪 70 年代，作家波波维奇金提出了“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用以指代从事脑力劳动的专业人员。在弗拉基米尔-达尔于 1881 年出版的《通释词典》中，这个词被定义为：

> “人口中通情达理、受过教育、智力发达的部分”。

---

[53]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四章 书籍和早年的冲突”，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这一定义尤其暗示了对其他“居民”的“通情达理”和“智力发达”的怀疑，但却具有代表性。脑力劳动者只占俄罗斯人口的 2.7%。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自己是一个新的自封阶级的代表，是唯一一支“智力发达的力量”，有能力合理地组织社会，并扮演法国大革命时期“第三等级”领导人所扮演的角色。许多知识分子接受了民粹派关于领导群众的“英雄决定论”的思想。这些思想只会加强知识分子对其崇高历史命运的自负。普列汉诺夫在 1895 年撰写的论文《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中写道：

> “无论英雄多么热爱群氓，无论英雄对群氓的世代贫穷，对他们无休止的苦难怎样满怀同情，他都不能不用高高在上的目光俯看群氓，不能不意识到，一切都取决于他这个英雄，而群氓则是没有任何创造性因素的群众，好像一大堆的零，只有在他们的头里宽容地摆放着慈祥的、‘善于批判地进行独立思考的’单位那种场合下才会获得积极的意义”。[54]

普列汉诺夫认为，这种思想是“四十年代‘善于批判地进行独立思考的’德国‘知识分子’那种极端的、可以说非常丑恶的自命不凡之基础”，而现在，这种思想正在“俄国知识分子中产生同样的缺点”。[55]

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对其社会角色的夸大其词和对社会发展的肤浅认识往往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其后果是，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不断蜕变，他们的思想和政治立场出现内在矛盾。他们领导人民的思想与“对人民的崇拜”结合在一起，别尔嘉耶夫认为，“人民崇拜”是“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主要道德教条”。这种“崇拜”迫使许多知识分子从事教育和慈善工作，“到人民中去”，支持旨在改善人民状况的努力，并欢迎那些提请人们注意国家绝大多数人口的尖锐问题的艺术和新闻作品。

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唤起人们关注大多数人民的境况方面的功绩是显而易见的，许多脑力劳动者也为缓解他们的困境做出了努力。然而，“对人民的崇拜”往往变成了那些对人民的真实生活不甚了解的人对陈词滥调的重复。马克西姆-高尔基在他的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中嘲笑了这种“人民”的偶像形象与现实之间的差异：

> “为了让人们更容易爱上农民，人们把他想象成具有非凡的精神美，头戴无辜受难者的王冠，头顶圣人的光环”。

在萨姆金的知识分子家庭里，这个孩子从小就习惯于重复涅克拉索夫的诗歌，因此，当他发现自己在村里的集市上时，他并没有认出那些与他形成的观念完全不同的人们。

> “克里姆对一大群穿着节日盛装、喝得半醉、非常开朗和善良的男女感到惊讶。克里姆拿着父亲让他学并让他在宾客面前朗诵的一首诗，问祖父：
>
> ‘那些在田野里、在路上、在监狱里、在奥斯特罗格、在马车下、在草原上睡觉的真正的人们又在哪里呻吟呢？’
>
> 老人笑了，挥舞着棍子对人们说：
>
> ‘那就是他们，你这个傻瓜！’”

摩西-施宾策尔经常给列夫朗读涅克拉索夫的诗歌。他们的朗读、对其作品的分析以及其他作家描写人民苦难的书籍、施宾策尔家的谈话都迫使少年以不同的眼光看待那些为他父亲工作的人的处境。甚至在摩西-施宾策尔第一次逗留亚诺夫卡期间，列夫就亲眼目睹了他对惩罚工人的反应。

---

[54] 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第五章 现代唯物主义”，2012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55] 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第五章 现代唯物主义”，2012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有一次监工因为马倌没有在天黑以前按时把马赶回马厩，就用一条长长的鞭子狠狠抽打他。莫尼亚看见了，气得脸色发白，咬着牙说：‘这简直太可恶了’。我也感到那是可憎的事情。我不知道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会不会有这种想法，但无论如何都是他帮了我，仅凭这一点我终生都要感激他”。[56]

学校放假回到村里后，列夫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人们的困境。现在，他注意到“门口有一个光着脚的女人.....她是疯疯癫癫的牧童伊格纳特卡的母亲”，来向列夫的父亲要钱。“家里没有人，所以也没人给她一卢布，她只能一直等到天黑”。

列夫还注意到，他的父亲是如何把一头闯进主人田里的牛牵走的。那人哀求道：“‘请看在上帝的份上把牛还给我吧’，并发誓说再也不会让牛跑到麦地里去了”。父亲回答说：

“你的牛吃了我 10 戈比的麦子，损失折合 10 卢布”。

“农民仍然不断哀求着，目光中充满了仇恨。这样的场景让我感到非常可怕，连最后一根神经都在颤抖”。[57]

不过，这些小插曲并没有妨碍列夫帮助父亲做家务。托洛茨基回忆说：

“假期我也记记账，也就是和哥哥姐姐轮流登记雇佣的工人、佣工的条件以及实物和现金支付情况。在与工人结账的时候，我还常常给父亲帮忙。这时，我们会当着工人的面发生一些小小的冲突，但是碍于工人在场而强忍住。我们在结账时从不欺骗工人，但是对于协议中的雇工条件会解释得很严格”。

诚然，托洛茨基保证他努力维护工人的利益，“这让父亲很恼火”。[58]

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捍卫人民的利益不仅与向贫困者提供援助有关，而且还意味着对现存秩序的积极批判，这种批判发展成为对现存制度的斗争。施宾策尔家族中的列夫-勃朗施坦所奉行的反对主义，与俄国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普遍情绪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司徒卢威在《知识分子与革命》一文中写道：

“俄国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形式是脱离、疏远国家和敌视国家”。

格申宗在描述 19 世纪 90 年代“公共氛围”下的青年教育时写道：

“一个刚踏入人生门槛的年轻人遇到了铺天盖地的公共舆论，并立即向他指出了一个崇高、简单和明确的目标。生命的意义是预先确定的，是所有人共有的，没有任何个体差异。个人和社会生活中的一切污垢和动荡都归咎于专制——个人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

列夫之所以能如此轻松地接受这些新态度，可能是因为他从小就被灌输了一种信念，即必须毫无疑问地遵守无穷无尽的规则和禁令。现在，古老的犹太教戒律被他所知道的最开明的民族的令人叹为观止的信仰的规则和禁令所取代。

与宗教思想体系一样，许多俄国知识分子的信仰也是建立在善（他们站在善的一边）与恶（强者站在恶的一边）之间不可调和的斗争之上的。弗兰克在《虚无主义的伦理学》一文中谈到许多知识分子倾向于将道德简单化时写道：

“俄罗斯知识分子不知道绝对的价值观，没有标准，没有生活方向，只知道在道德上将人、行为、国家区分为好与坏、善与恶”。

新信仰的基本信条简单明了，易于青少年接受。此外，当时的知识分子普遍推崇年轻人的最高主义（以年轻人唯命是从）。这使得布尔加科夫在《英雄主义

[56]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三章 家庭与学校”，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57]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五章 乡村和城市”，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58]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五章 乡村和城市”，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与好战主义》一文中谈到了俄罗斯社会的“精神家长制”。他写到了“丑陋”的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青年学生’的评价和意见变成了长辈的指导，颠倒了事物的自然秩序，对长辈和晚辈都同样有害”。

在这种环境下，思想、言论和行为中人为地保持“青年风格”，不可避免地助长了情绪激动、不断恼怒的气氛。格申宗在《创造意识》一文中描述了当年俄罗斯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

“我们的知识分子十分之九患上了神经衰弱症，我们中间几乎没有健康的人——都是胆怯、闷闷不乐、坐立不安的面孔，被某种隐秘的不满情绪扭曲了，都是不满，愤懑和烦躁”。

在这样的环境中，列夫-勃朗施坦所特有的易怒和难耐、在兴奋和沮丧之间的情绪波动以及流泪的倾向是司空见惯的，而歇斯底里的倾向则是一种行为规范。

此时，许多年轻的犹太人加入了俄罗斯知识界最激进的革命圈子。索尔仁尼琴引用了列文的《革命中的犹太人》一书中的一段话：“不仅俄国犹太人口中的社会下层屈服于革命分子的力量”，而且这场运动“不可能不包括犹太民族中半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的重要骨干”。

根据卢里提出的原则，许多犹太知识分子将俄国知识分子视为反对政府的力量，并因此加入了政府。在施宾策尔家“非政治化”的房子里，列夫可能就被灌输了这种观点，但不是直接灌输，而是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评论逐渐灌输的。施宾策尔家的客人也为孩子的政治教育做出了贡献。列夫记得，在阅读了他关于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诗歌的文章后，西切夫斯基朗诵了托尔斯泰的诗歌《波波夫的梦》，其中充满了对圣彼得堡高官的恶毒讽刺。阅读了多洛舍维奇反对敖德萨市长、海军少将泽列诺伊和执法机构活动的长篇小说后，孩子对当局有了更多的反感。

列夫读过多洛舍维奇的长篇小说，听过“敖德萨居民耳语相传的”关于市长的“无数轶事”，因此他对市长的印象不能不与普遍的看法不同。因此，他“只见过泽列诺伊一次，而且只是从后面”，就“足以”记住他是一个粗鲁和爱骂人的人。此外，托洛茨基与敖德萨市市长短暂相遇的记忆，是他评价俄国当局最有说服力的例子。他写道：

“这位市长直挺挺地站在马车上穿过街道，一边挥舞着拳头一边对着前面破口大骂。警察们必恭必敬地向他行礼，仆人们向他脱帽致敬。人们躲在窗户后面看着他，万分恐惧”。[59]

这一形象符合许多知识分子对俄罗斯当局的普遍看法，在他们眼中，俄罗斯当局是一种蛮横、野蛮的力量。

托洛茨基后来以类似的方式描绘了沙皇。他声称尼古拉二世的特点是“恶意、野兽般的报复”、“贪得无厌的嗜血”、“憎恨人类思想”，而君主本人则是一个“来自人类垃圾桶的垃圾人物”，“在他的同类中，他的恶行和罪行正变得独一无二”。他称皇帝为“正统教会暴力和野蛮的无冕之王”。

对东正教牧师和东正教信仰的厌恶可能在施宾策尔家族和他们的朋友中潜移默化地形成了。列夫从自己的印象中选择了那些厌恶作为圣人的俄罗斯东正教神职人员的负面看法，他们的行为不符合他们所宣扬的崇高道德原则。托洛茨基童年时曾多次与东正教牧师会面，他记得有一位牧师与一位女士一起拜访了亚诺夫卡：

“他撩开长袍的下摆，从条纹裤子的口袋里掏出一只带花字图案的银烟

[59]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三章 家庭与学校”，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盒，他点起香烟，老练地一个接一个地吐着烟圈，讲夫人看小说只看对话（当时夫人不在）。大家客气地笑了笑，但都克制自己不做评论，因为大家都知道，教士将把一切都转告夫人，甚至还要添枝加叶”。[60]

在圣保罗学校教授“上帝的律法”的神父也被描述得同样令人不快。托洛茨基是这样描述他的：

“那个教士是主教的侄子，就像人们说的那样，是一个备受姑娘青睐的金发美男子，好像是照着耶稣画像描下来的一样，只是完全被世俗化了。他戴着金边眼镜，长着一头浓密蓬松的金发，是一个叫人难以忍受的奶油小生。其他教派的学生在他去上课的时候要离开教室，有时是当着他的面走出去。他看着出去的学生，脸上带着一种被基督教真正的宽容精神淡化了的轻蔑神情。

有时他会问他们：‘你们到哪儿去？’

学生回答：‘我是天主教徒。’

‘哦，天主教徒，’他点点头又问，‘哦，哦……那你呢？’

‘我是犹太人……’

‘犹太人，犹太人，哦，哦……’。[61]

托洛茨基写道，他“敏锐地感受到了教士对‘犹太人’的歧视”。民族不平等可能是对现存制度不满的潜在动力之一。

如果一个牧师见到犹太儿童时摇头的微不足道的证词被当作“民族不平等”的无可争辩的证据，那就意味着这个孩子的头脑中已经牢固地形成了对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刻意偏见和消极思想。一个特点是，托洛茨基在自传中对他童年时接触过的所有犹太教拉比和教师都抱有极大的同情。许多俄国知识分子对东正教信仰和牧师持怀疑和嘲笑的态度，支持了托洛茨基在启蒙教育中形成的对基督教会的疏远态度。

对精神和世俗当局的厌恶有机地发展为对整个国家的厌恶和对境外生活的理想化。这些情绪在俄罗斯知识分子中十分普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列夫-勃朗施坦出生前 6 年创作的小说《魔鬼》中塑造了作家卡尔马济诺夫的形象，他“傲慢地嘲笑俄罗斯，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在欧洲的伟大思想家面前宣布俄罗斯在各方面都破产了更令人愉快的事了”。在同一部小说中，他还描写了一个“疯子”，他对着大厅大喊：

“在诺夫哥罗德，在古老而无用的索菲亚对面，庄严地竖起了一个青铜巨球，以纪念过去一千年的混乱和无所事事”。

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这些言论在俄国知识分子中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因此，他在描述卡拉姆季诺夫的演讲和一个俄国外省小镇（而不是敖德萨的犹太商人集会）社会对“疯子”的反应时，不无讽刺地指出，这些言论“几乎得到了大厅一半人的喝彩；无辜者被吸引了：俄国被侮辱了——堂而皇之地、公开地，难道还能不高兴得咆哮吗？”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理由描绘这样的作家和这样“狂躁”的演说家，以及知识界对反爱国演说的热烈欢迎。

如果说对西方的崇拜是许多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特点，那么在与西方贸易往来频繁的国际大都市敖德萨，这种情绪尤为强烈。艾萨克-多伊彻在谈到敖德萨一些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时写道：

“有一种感情非常明显：对欧洲及其文明、对整个西方及其自由的憧憬。

[60]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的另一译本。——译者。

[61]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五章 乡村和城市”，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对‘西方’就像对应许之地的憧憬——它为俄国可怜而贫穷的现实提供了补偿和安慰。对于犹太知识分子来说，世界的这一部分……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对于大部分非犹太知识分子来说，西方也是他们在国内所憎恨的一切的对立面：宗教会议、审查制度、鞭刑和刑役”。

托洛茨基也写到了这种观点的流行：

“对俄国现实政治制度不满的同时，在内心深处暗自把西欧和美国的政治制度理想化了。我根据从零散的资料中得来的印象，再加上自己的想像，构想出一个高度发达、在高度文明的前提下人人平等的社会，后来又在这个设想的基础上加上了理想化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成分”。

托洛茨基承认：

“我的这幅关于西方自由世界的理想图景是受了周围市民自由主义思想环境的影响而产生的，直到后来在我刚刚形成革命的观点的时候这一理想图景仍未破灭”。[62]

从这些话中，人们可能会觉得托洛茨基多年来已经摆脱了对西方的“理想化”，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尽管托洛茨基参与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的逻辑将他变成了西方国家社会秩序的反对者，但他并没有放弃“西方走在世界发展前列，是全人类榜样”的观念。托洛茨基在撰写自传时对西方的批评是由于他当时对西欧和北美没有一个国家同意给予他政治避难感到不满。托洛茨基说他曾经相信西方民主，他恼怒地写道：

“假如我当时就听说，以社会民主政府自居的德意志共和国可以为保皇派提供政治避难，却拒绝革命派入境，可能会非常吃惊”。[63]

多年来，托洛茨基对西方的批评可能越来越多，但他仍然忠实于敖德萨童年时代的看法，即“先进的西方”与“落后的俄国”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文化鸿沟。写完自传后不久，托洛茨基开始撰写一本关于十月革命历史的书。[64]在他于1931年撰写的《俄国发展的特殊性》一章中，他表达了在敖德萨学习期间在头脑中形成的对俄国的看法。托洛茨基认为，不利的自然环境和国际环境造成了俄国的全面落后：

“俄国历史最基本也是最稳定的特点就是其发展的迟缓性，以及由此相伴产生的落后的经济状况、原始的社会形态和低下的文化水平。

俄国居民生活在东方强风与亚洲入侵者长驱直入的一望无际的寒冷大平原上。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他们注定要长期处于落后状态”。[65]

托洛茨基认为，全面“落后”体现在俄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托洛茨基写到“俄国封建制度的先天不足”，指出“阶级关系的无形性”、“文化遗产的匮乏”以及“莫斯科人的惰性”。托洛茨基认为，“东方带来了鞑靼人的压迫，从而给俄国的国家结构注入了一种重要成分”。因此，“在俄国，国家状态更加接近亚洲的专制制度。”。西方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俄罗斯掌握了一些“先进国家的物质和意识形态”，但这并没有改变俄罗斯的国家性质。“不仅俄国封建主义的贫乏性，而且旧俄国的全部历史的贫乏性，在缺乏作为工商业中心的、真正中世纪城市的情况下，得到了更令人郁闷的反映”。[66]

托洛茨基在这本书的最后几行写道，俄国“只能肤浅地模仿西方的高级模式”。

---

[62]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五章 乡村和城市”，2005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63]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五章 乡村和城市”，2005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64] 即《俄国革命史》。——译者。
[65]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一卷 二月革命 第一章 俄国发展的特殊性”，201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66]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一卷 二月革命 第一章 俄国发展的特殊性”，201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他认为，俄罗斯文化只给世界带来了“‘沙皇’、‘大屠杀’和‘鞭子’等野蛮的概念”。在学校学习俄罗斯文学、在施宾策尔家中阅读俄罗斯诗人的作品、观看俄罗斯戏剧似乎只是为了让列夫-勃朗施坦通过考试。虽然他偶尔也能引用俄国作家的作品，但显然他把这些作品视为落后文化的典范。

毫无疑问，在敖德萨知识分子家庭的“熏陶”岁月里，“反对”国家当局、东正教和整个俄罗斯的态度牢牢地扎根在列夫-勃朗施坦的脑海中。与此同时，他还掌握了区分“正确”观点和与他格格不入的“错误”观点的技巧。托洛茨基回忆说，他是如何“在与同班同学洛泽维奇和科洛格里沃夫的交往中，突然发现了自己的这种反抗精神”。有一次，托洛茨基在父亲是上校的洛泽维奇家里，据他说：“有一两次当我们的谈话偶然涉及宗教和政治问题时，引起了不安甚至敌意。他们家遵循一种保守和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这让我觉得压抑”。[67]

列夫的另一位同学科洛格里沃夫在托洛茨基“讲了校长或其他什么人的一些坏话”时，变得非常愤怒。托洛茨基显然认为，“这个孩子只不过是在重复从他们那个封建家庭里听来的话”。[68]然而，托洛茨基实际上也认识到，他自己也只是在重复他在施宾策尔家和他的熟人圈子里反复听到的话。

敖德萨知识分子成功地“驯化”了一个草原农场的本地人。这个男孩不仅成为了敖德萨实科学校的首批学生之一，而且与前沿的思想政治态度一起获得了进入“先进知识分子”圈子的通行证。据托洛茨基回忆，当时：

> “我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俄国将通过不断进步逐渐追上先进的欧洲。我当时的政治见解仅此而已”。[69]

在俄罗斯知识分子中传播的各种思潮的代表口中，都能听到对俄罗斯秩序的批评，以及将俄罗斯视为反动和落后国家的看法。托洛茨基后来承认：

> “在学校时，我的政治倾向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朦朦胧胧的反对派。当时学校里根本不谈论革命。
>
> ……当我面临人生道路重大转折时，我在政治方面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当时我只有 17 岁。在我的面前出现了太多的问题，让我难以应付。
>
> ……当我必须从最初的生活经历中做出最终的抉择时，我还有些许的犹豫（迷茫）”。[70]

[67]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五章 乡村和城市”，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68]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五章 乡村和城市”，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69]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六章 转折”，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70]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六章 转折”，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 第 四 章

# 人生的十字路口

列夫-勃朗施坦的居住和学习地点的改变促进了他的思想和政治演变。托洛茨基写道，由于圣保罗真正的学校没有提供完整的学习课程，他不得不搬到尼古拉耶夫完成学业。很难理解为什么在黑海的无冕之都没有找到一所可以完成全部学业的真正的学校。可能是因为大卫-勃朗施坦在尼古拉耶夫设有办事处，而此时他的谷物贸易业务已经扩大。

居住地的改变极大地影响了列夫-勃朗施坦今后的命运。根据托洛茨基的说法：

> “这座城市比敖德萨土气多了，学校的教学水平也比那里差得远。但是我在尼古拉耶夫学习的1896年却是我青年时代转折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我思考了自己在人类社会中的位置的问题”。[71]

在尼古拉耶夫，地主的儿子们成了他的伙伴，他们告诉列夫自己是社会主义者。这些年轻人自信地提出了与前敖德萨“现实主义者”所熟悉的观点截然不同的观点。有了这套知识分子的态度，列夫认为自己是敖德萨熟人中的“佼佼者”。然而，在他的新熟人圈子里，他“大胆”的反对派言论却被认为不够“先进”。列夫的新朋友们谈到，消灭私有财产和剥削阶级是建立社会公正社会的首要条件。

面对对私有财产不可调和的批判、要求摧毁资本主义阶级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呼声，一个富有地主的16岁儿子、一个敖德萨书商的学生该作何感想？对他来说，要做出有利于激进革命者思想的选择并不容易。他随时准备谴责和嘲笑俄国的“落后”、其秩序和习俗的“野蛮”，但他不会攻击在他看来是繁荣的经济基础的制度。他的新朋友们的思想是对他从小养成的价值观的挑战。

显然，列夫认为，他作为敖德萨学校的“第一名学生”和敖德萨知识分子圈子的一员，能够向尼古拉耶夫省的人证明他们的正确性，嘲笑社会主义的失败，因此与他们发生了争执。托洛茨基写道：

> “值得一提的是，我在最初的谈话中坚决反对‘社会主义乌托邦’，以一个已经思考过这个问题的怀疑者的身份自居。当然，在政治问题上我决不是一味地怀疑和调侃。那家的女主人很惊讶地看着我，甚至要让她的孩子以我为榜样，尽管她的孩子比我年长，有些左倾。但是对我而言，这是我第一次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进行力量悬殊的斗争。我尽量避免受那些年轻的社会主义者的影响。这场力量悬殊的较量只持续了几个月”。[72]

过了一段时间，新朋友们邀请列夫-布朗斯坦参加青年政治问题讨论会，讨论会在捷克籍的弗朗茨-什维戈夫斯基租用的花园里举行。这位园丁订阅德国报纸，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精通文学。据托洛茨基说，“通过什维戈夫斯基可以搞到禁书”。[73]什维戈夫斯基鼓励年轻人参观他的花园，有时还亲自参加他们的讨论。后来发现，什维戈夫斯基的雇工向警察报告了花园里的讨论情况，并向宪兵提供了一些年轻人阅读的文学作品样本。出于某种原因，当局没有找房客本人

---

[71]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六章 转折”，2005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72]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六章 转折”，2005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73]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六章 转折”，2005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的麻烦。

在什维戈夫斯基花园的一间小屋里，聚集的不仅仅是学生。根据托洛茨基的说法，还有“几位被流放的人，当时他们仍然受到警察的监视。他们是民粹派运动处于衰败时期的二流人物”。[74]在参加讨论的人中，主要是民粹主义者。不过，经常参加讨论的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发言的。

这种讨论在 19 世纪末的青年知识分子中很常见。民粹主义的危机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日益流行迫使许多前民粹主义者重新考虑他们的观点。1883 年在流亡中成立的俄罗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团体“劳动解放社”（普列汉诺夫、扎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德、戴奇、伊格纳托夫）的所有组织者都是具有丰富革命工作经验的前民粹主义者，不仅在革命环境中久负盛名。格奥尔基-瓦连季诺维奇-普列汉诺夫于 1876 年 12 月在圣彼得堡喀山大教堂举行的首次政治集会上发表演讲后广为人知。他后来成为革命组织“土地平分社”（民粹派组织）的创始人。1878 年，维拉-伊万诺夫娜-扎苏利奇因枪杀圣彼得堡市市长特列波夫而闻名全俄。同年，著名鼓动家、人民活动家列夫-格里戈里耶维奇-戴奇从基辅监狱大胆越狱。从 70 年代中期开始，革命文学的读者就知道帕维尔-鲍里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德的文章，他在巴枯宁的杂志《社区》上发表过文章。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伊格纳季耶夫是“土地平分社”民粹派组织的积极成员，他因积极参与“到人民中去”运动而声名鹊起。因此，他们甚至在列夫-勃朗施坦出生之前就都参加了积极的革命斗争。

从 80 年代初开始，他们正式宣布与民粹主义决裂，并与他们以前的追随者展开积极的论战，捍卫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并代表俄罗斯参加 1889 年成立的社会主义政党第二国际。劳动解放社成员努力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为此创建了“现代社会主义书库”，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弟子著作的译本。它还出版了该组织成员（主要是普列汉诺夫）的作品。然而，该小组缺乏资金。1887 年，该社收到了敖德萨工人转来的 20 卢布，普列汉诺夫对他们表示了热烈的感谢。普列汉诺夫及其支持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传到了俄国并取得了成果。

80 年代末，一批来自技术、林业和矿业学院以及大学的圣彼得堡学生在帝国首都创建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圈子，布鲁斯涅夫是该圈子的领导人。克拉辛、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克鲁普斯卡娅等后来的布尔什维克名流也参加了这个圈子的工作。

1891 年，弗-伊-乌里扬诺夫（列宁）在圣彼得堡参加大学课程的校外考试时，遇到了技术学院的教师列-亚-亚维因，他本人认识恩格斯和李卜克内西。亚维因给沃洛佳-乌里扬诺夫弄来了一些马克思主义文献。1892 年，乌里扬诺夫很快在萨马拉组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圈子，1893 年迁居圣彼得堡后，他参加了布鲁斯涅夫集团大部分成员被捕后成立的马克思主义圈子。1895 年 11 月，在列宁的领导下成立了“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其成员包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克鲁普斯卡娅、马尔托夫、加里宁。

1892 年，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在梯弗里斯成立，两年后更名为“麦撒墨达西社”。随后，包括加里宁在内的流亡圣彼得堡的俄国革命者也参加了该团体的活动。从 1898 年起，约瑟夫-朱加什维利（斯大林）开始活跃在这个团体中。

此时，类似的马克思主义团体正在帝国各地建立：喀山、下诺夫哥罗德、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华沙、维尔纳。在这些组织中，犹太人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

[74]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六章 转折”，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索尔仁尼琴从《革命中的犹太人》文集中引用了曼德尔的一段话。曼德尔这样解释马克思主义对犹太人的吸引力：

> “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纯粹形式是从德国照搬过来的，它从来就不是俄国的民族运动，而俄国犹太人中具有革命思想的那部分人的运动。对他们来说，从德国书本中领悟社会主义学说并不困难，他们自然会在把这一外来果实移植到俄国土地上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索尔仁尼琴从这些言论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即“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是从定居地区的犹太青年开始的”。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运动始于帝国的首都，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公认领袖是俄国人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圈子的领导人主要是俄罗斯人。根据苏联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的计算，犹太人占“所有革命政党组织层的 1/4 到 1/3”。在马克思主义组织的领导层中也观察到了大致相同的比例。

相当一部分犹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没有必要加入全俄马克思主义圈子。1897 年 9 月，来自维尔纳、明斯克、华沙、维捷布斯克和比亚里茨托克的犹太社会民主党人在维尔纳召开大会，成立了“俄国犹太工人总联盟”，当时被称为“崩得”。与其他社会民主党组织不同的是，“崩得”不是以领土原则为基础，而是以民族原则为基础。崩得的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Arbeiter Stimme）指出，“维护犹太人的特殊利益超出了任何全俄罗斯党组织的能力范围”。

由于犹太工人的人数并不多，崩得党的组织者宣称，犹太无产阶级不仅包括产业工人，还包括工匠、小商人甚至中介人。同时，崩得领导层还宣称“犹太人是世界上最好的无产者”。索尔仁尼琴认为，尽管崩得党拥护阶级斗争的思想，但它“开始从国外富有的犹太圈子获得大笔资金”。后来，崩得党以自治组织的身份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尽管该党领导人普列汉诺夫强烈谴责了崩得党的自治行为。

在俄罗斯南部，大多数犹太人加入了不以民族划分的马克思主义圈子。90 年代中期，在俄罗斯南部的基辅、哈尔科夫、顿河畔罗斯托夫、叶卡捷琳娜斯拉夫和敖德萨也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圈子。这些圈子的组织者都是在民粹运动队伍中有过斗争经验的革命者。

在加入什维戈夫斯基的圈子之前，列夫-勃朗施坦对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主义都没有明确的概念。多伊彻说：

> “他对这两种学说都知之甚少。他刚从什维戈夫斯基那里借来了一些过期的小册子，这是他第一次阅读，还借来了一些激进刊物的订阅本，他紧张地翻阅着，急切地想一目了然地掌握其论点的精髓”。

从托洛茨基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在新朋友圈子中遇到的难题，都想尽快从书本中找到全面的答案。根据托洛茨基的说法，他“开始如饥似渴地读书，生怕一辈子的时间都不够用来为那伟大的事业做准备。紧张、急不可耐、毫无系统地阅读大量书籍。从阅读早期非法的小册子开始转向阅读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逻辑学体系》，这本书只看了一半就扔下，又开始读理帕特的《原始文化》……理帕特的作品还没有读完，我又开始读米涅的《法国革命史》”。[75]他选择的书籍以西方作家的作品为主。

像许多俄罗斯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列夫-勃朗施坦也把西方理想化了，他对来自西方的各种社会和政治思想表现出一种不加批判、往往是肤浅的态度。布尔加科夫认为：

---

[75]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六章 转折”，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其西方主义中，只是从外部吸收了西方最新的政治和社会思想，并将其与最极端、最尖锐的启蒙哲学联系起来加以接受”。

根据多伊彻的说法，“有一段时间，勃朗施坦自豪地宣称自己是一个边沁主义者”。

托洛茨基回忆说：

“我认为，边沁的功利主义是人类思想的最高境界，在之后的几个月里我甚至就是一个坚定的边沁拥护者”。[76]

对于一个土生土长的资产阶级来说，勃朗施坦选择边沁作为自己的思想导师是理所当然的。早在 19 世纪初，杰里米-边沁[77]就从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中看到了自己的社会理想，并宣称英国企业家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这位哲学家认为，资本主义之前是一个无知和妄想的时代，只有资产阶级制度才是“自然的”。边沁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进化发展辩护，认为资产阶级中最活跃的代表的个人繁荣将逐渐导致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道德与立法原理引论》一书的作者无疑会在我国找到许多热情的崇拜者，他们像边沁一样坚信，资本主义是自由和平等思想的生动体现，这种制度将自动导致人类的普遍繁荣和精神繁荣。然而，在青年社会主义者的圈子里，正如多伊彻正确指出的那样，边沁的学说“不适合任何革命者，无论他是民粹派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勃朗施坦不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边沁的学说进行了彻底的、毁灭性的批判，称他为“资产阶级愚蠢的天才”。但在当时，正如多伊彻所写，勃朗施坦“甚至对马克思本人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小人物没有丝毫了解”。托洛茨基在给涅夫斯基的信中写道：

“1896–1897 年，我是马克思（我没有读过他）的反对者”。

从托洛茨基的自传以及其他作者为他撰写的传记中可以看出，托洛茨基与俄国社会民主党未来的一些杰出人物（例如斯大林，多伊彻曾仔细研究过他的生平）不同，他没有参加任何马克思主义圈子，在青年时期也没有费心去研究共产主义理论创始人的著作。直到流亡期间，列夫-勃朗施坦才开始研读《资本论》，但显然他从未完成对这本书的研读，因此，多伊彻说，他在流亡期间非常害怕列宁和《火星报》的其他领导人会就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他进行审查。

勃朗施坦因此用“无情的讽刺”抨击了马克思的理论及其支持者亚-索科洛夫斯卡娅，后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比他的对手要深得多，而且比他大好几岁。这位真正学校的学生大胆地宣称：

“马克思主义像灰尘一样狭隘、干瘪，侮辱了被它描绘成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囚徒的人”。

虽然这位年轻的边沁主义者打着分析别人论点的幌子，把别人的论点说得荒诞不经，感情用事地美化他所捍卫的观点，但据什维戈夫斯基圈子的成员之一齐夫说，他“由于其杰出的能力和才华，吸引了弗朗茨所有来访者的注意”。他“像所有智力发达、思维反应敏捷的人一样，具有极好的虚张声势的天赋。他能迅速把握对方的思维方向和所有.....结论，以至于在争论中很难击败他，因为他只掌握了有关主题的知识”。

无论列夫-勃朗施坦如何努力地与马克思主义作斗争，他所采取的立场都注定了他在什维戈夫斯基的圈子里只能扮演一个落后保守派的角色。在敖德萨的熟

---

[76]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六章 转折”，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77] 杰里米 • 边沁（1748 年 2 月 15 日—1832 年 6 月 6 日），英国法理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者。——译者。

人中，他好不容易才赢得了被视为佼佼者的权利，而在这个自恋又病态的年轻人身上，几乎每个人都会有的害怕显得落后、因而显得可笑的心理尤为强烈。现在，他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陌生的环境，这个环境带着 19 世纪末年轻社会主义者特有的不宽容，恶毒而愤恨地攻击着勃朗施坦认为不容置疑的一切。

与此同时，当他的父亲来尼古拉耶夫出差时，列夫的激进言论让他父亲感到震惊。据托洛茨基回忆，“这时，我和家人的关系越来越糟糕了”。他的父亲“感到这是很危险的，就试图用父亲的权威来加以阻止。我们激烈地吵了几次。我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独立和选择人生道路的权利，最终拒绝了家庭提供的物质帮助，搬出了学生宿舍，和什维戈夫斯基住在一起”。[78]

多伊彻写道：

> “老勃朗施坦有时会从亚诺夫卡来看列夫，他相信列夫会因为厌倦了匮乏和不便而有所改变。然而，这并没有发生”。

什维戈夫斯基的一位房客后来成为著名的共产党出版物编辑，他回忆说：

> “一个留着大胡子的大个子农民一大早就来到小屋……他站在我面前，用洪亮的男低音喊道：‘你是不是也逃离了你的父亲？’这些丑闻以部分和解告终。父亲看到希望破灭，变得越来越暴躁和不耐烦。儿子希望领先他的同志们，对这些场面感到羞愧，因此做出了不敬和讽刺的回应。双方都有相似的性格，同样的骄傲，同样的固执，同样的自信，同样的雷鸣般的低音”。

1896 年与家人的一次争吵是列夫-勃朗斯坦人生的转折点，决定了他未来的命运。尽管当时他还没有开始革命活动，也远未接受马克思主义或其他革命思想，但他的新生活方式标志着他与父亲和祖上几代人所遵循的资产阶级企业家的传统生活的决裂。在什维戈夫斯基花园的新房子里，勃朗施坦和他的朋友们过着“‘公社’一样生活.....我开始在外面教书。我们过着斯巴达人式的生活，睡着光板床，吃着自己做的饭。我们一律穿蓝上衣，戴圆草帽，拿着黑手杖。城里谣传我们加入了一个秘密教派。我们杂乱无章地阅读，激烈地辩论，满怀热情地憧憬未来，在这里我们倒也能自得其乐”。[79]

托洛茨基后来在给维-伊-涅夫斯基的信中写道，参加讨论的人“建立了一个发行有用文献的圈子——《苗圃》”。他在自传中承认，这个圈子的成员“筹措资金，买廉价的书，却不能把它们散发出去”。什维戈夫斯基的雇工“从我们这里偷了一捆通俗读物并交给了宪兵队。我们的开端并不成功，但我们相信未来一定会成功的”。[80]

与此同时，列夫决定首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他“写了一篇论战性文章投到敖德萨的民粹派刊物，与俄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刊物论战”。正如托洛茨基所承认的，“这篇文章摘抄、引用和攻击性话语比内容还多。我从邮局把这篇文章寄到编辑部，一周后就亲自跑去问结果。编辑透过他那大大的眼镜亲切地看着我这个头发蓬乱、下巴溜光的作者，但是文章并没有被采用。在这件事上谁也没什么损失，我就更没有什么损失了”。[81]

列夫不喜欢马克思主义，不得不暂时离开公社。此时，他和讲课人索科洛夫斯基的哥哥决定创作一部嘲弄马克思主义的剧本。托洛茨基回忆说，为了防止有人干涉他们的剧本创作，“我们暂时退出公社，躲到一个屋子里，没有把地址告

---

[78]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六章 转折”，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79]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六章 转折”，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80]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六章 转折”，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81]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六章 转折”，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诉任何人.....剧本中的浪漫主义情节是这样表现的:饱受生活压迫的老一代革命家爱上了一个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女战士,但她却无情地拒绝了他,这宣告了民粹派的失败”。[82]虽然该剧的第一幕已经写好,但从未完成

这些活动影响了他的学业,但列夫还是在 1896 年夏天以优异成绩毕业了。直到 1896 年秋天,他才决定去亚诺夫卡探亲。据托洛茨基说:

> “这一次只能算是与家庭暂时的和解。父亲希望我成为工程师,而我在研究对自己有着强大的吸引力的纯数学或者投身革命事业这两种想法之间犹疑不定。在家里,只要一谈到这个问题,就会引发一场激烈的冲突。大家都很担忧,所有的人都感到难受,姐姐还暗地里流泪,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83]

列夫的舅舅是一位“工厂的厂主和工程师”,他劝说少年和他一起住在敖德萨。据托洛茨基说,他“在舅舅那里住了几周,我们经常争论利润和剩余价值问题,但是舅舅对于牟取利润可比解释利润在行多了”。[84]

尽管多伊彻在提到伊斯特曼先生时声称,托洛茨基开始在敖德萨大学学习,并在学习过程中发现了相当高的数学能力,但托洛茨基本人对他 1896 年秋天从亚诺夫卡回来后的生活是这样描述的:

> “报考数学系的事情被拖延下来,我留在敖德萨继续寻找。寻找什么呢?最重要的是在寻找自我。我偶然结识了几位工人,弄到一些最新的非法出版物,在外边讲课,秘密地给技校高年级学生作报告,并和马克思主义者们论战,当时我还没有打算在他们面前做出让步。在秋天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乘汽船离开敖德萨回到尼古拉耶夫,又住到了什维戈夫斯基的那个园子里。
>
> 于是,一切又都恢复了从前的样子。我们围绕最新的激进杂志展开讨论,就达尔文主义进行辩论,漫无目的地准备和等待”。[85]

如果说勃朗施坦被列为敖德萨大学的学生,那也只是形式上的,因为他并没有留在敖德萨,而是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尼古拉耶夫,参加什维戈夫斯基圈子的活动。

勃朗施坦并没有停止抨击马克思主义,而是像他未完成的剧本中的主人公一样,爱上了马克思主义者索科洛夫斯卡娅——他作为合著者的姐姐。他将自己的思想和政治追求与与索科洛夫斯卡娅的调情结合在一起。1896 年的最后一天,当朋友们聚集在什维戈夫斯基家庆祝新年时,17 岁的勃朗施坦宣布他已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索科洛夫斯卡娅非常高兴,但勃朗施坦的祝酒词破坏了她的新年晚会,他诅咒所有马克思主义者“把枯燥和沉重带入生活的各个领域”。女孩流着泪离开了派对,并宣布她再也不会把自己的手交给勃朗施坦了。(果然,三年半后索科洛夫斯卡娅成了他的妻子)。

但事态的发展迫使勃朗施坦和他的圈子成员考虑是否有可能将他们迄今为止还只是喋喋不休的革命思想付诸实践。托洛茨基认为,俄国学生中的骚乱助长了圈子的活跃。他确信,1897 年 2 月,女学生韦特罗娃在彼得保罗要塞自焚,直接推动了他们的行动。托洛茨基写道:

---

[82]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六章 转折”,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83]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七章 我的第一个革命组织”,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84]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七章 我的第一个革命组织”,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85]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七章 我的第一个革命组织”,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这起没有被彻底查明的悲剧使人们受到很大的震动，大学生们掀起了学潮，逮捕和流放更加频繁。

我是从‘韦特罗娃事件’开始从事革命工作的”。[86]

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多伊彻的支持。他写道，在学生骚乱的影响下，“勃朗施坦和他的朋友们觉得是时候从言辞转向行动了”。多伊彻引用了齐夫的话：

> “勃朗施坦.....突然把我叫到一边，私下建议我加入他自己创建的工人组织……勃朗施坦说，民粹主义的想法已经被抛弃了。我们的计划是建立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不过勃朗施坦避免使用这个词……有人提议将其称为‘南俄工人协会’.....当我加入这个组织时，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勃朗施坦已经与工人以及敖德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和其他城市的革命团体建立了联系”。

如果齐夫相信的话，那么勃朗施坦就大大夸大了自己在组织 1897 年春成立的“南俄工人协会”中的作用。众所周知，除勃朗施坦外，在工会领导层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有索科洛夫斯卡娅、她的兄弟索科洛夫斯基、科罗特科耶、穆欣、列金和巴边科。虽然新组织的成员中年轻人占多数，但绝大多数人的年龄都超过了列夫-勃朗施坦。

可能是列夫在成为这个秘密组织的成员后，试图让齐夫相信他是这个组织的创建者，并相信他掌握着将这个组织与其他革命中心联系起来的纽带。虽然托洛茨基在自传中没有重复这一说法，但他确实写道，他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精神”亲自起草了该组织的章程。

同年，俄国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迅速发展。正如多卷本《苏联共产党历史》所指出的：

> “在敖德萨、叶卡捷琳娜斯拉夫、哈尔科夫、顿河畔罗斯托夫、尼古拉耶夫和该国南部其他城市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圈子。他们的组织者通常是知识分子中的革命者”。

值得注意的是，当 1897 年出现筹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问题时，尼古拉耶夫联盟以及敖德萨和“年轻的”圣彼得堡社会民主党团体“由于不十分稳定和缺乏足够的阴谋性”而未被接纳参加代表大会。

做出这一判断是有充分理由的。托洛茨基的叙述表明，包括他本人在内的许多南俄工人协会成员仍然与社会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相去甚远。新会员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曾经信奉各种宗教教派的工人。托洛茨基写道：

> “有些人自称是浸礼宗、史郭达派和福音派的信徒……在开始的几个星期里，有些工人在和我们谈话时还会夹杂一些宗教的语言，并且常常把这与基督教初创时期相比”。[87]

在这些反对东正教的人中，“协会”成员很可能希望将他们的反对意见传播到俄国生活的其他方面。

然而，年轻的热血青年并没有准备好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勃朗施坦在他的同志中进行的试验性宣传演说就证明了这一点。据齐夫回忆，列夫-勃朗施坦“引用了古姆普洛维茨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话，最后完全被吓住了。他的措辞越来越蹩脚，越来越难以理解。听众们由衷地同情这位演讲者，却不知道如何帮助

---

[86]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七章 我的第一个革命组织”，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87]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七章 我的第一个革命组织”，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他完成演讲。当他终于停止讲话，要求大家就他正在讨论的话题提问时，所有人都沉默了，因为他们不知道话题是什么。演讲者大步穿过房间，把自己扔在沙发上，脸埋在靠垫里。他浑身是汗，后背因无声的抽泣而颤抖。我们都为他感到由衷的惋惜”。

勃朗施坦在成为广大观众的偶像之前，必须进行大量的学习。学习是从尼古拉耶夫开始的。他从工人穆欣那里学到了第一课，穆欣比列夫大 10 岁，据列夫说，穆欣在他眼里就像个老人。

穆欣在向勃朗施坦解释他向教派信徒进行宣传的方法时说：

“‘在我们这件事上，福音书只是一把钥匙，我们从宗教人手，然后转到现实生活。几天前，我用豆子做比喻向一个史郭达教派的信徒揭示了所有的真理’。

‘怎么用豆子？’

‘很简单。我将一个豆子放在桌子上代表沙皇；在它周围再放上几颗代表部长、主教和将军；再放上一些，代表贵族和商人；在另外一边放上一堆豆子代表普通百姓。然后我问：「沙皇在哪儿？」他指了指中间那颗；「部长们在哪儿？」他又指了指周围那些，我就这样问他，他就这样回答我。现在等一会儿，’伊万•安德烈耶维奇说，‘一小会儿。’他眯起左眼顿了顿。‘这时我用手把这些豆子搅在一起，然后对那个人说：「现在你告诉我沙皇在哪儿？部长在哪儿？」他回答：「现在怎么分得清啊？恐怕你自己也分不清了……」，「没错」，我说，「你分不清了，所以才要把他们搅混」’”。[88]。

穆欣的这个故事震惊了勃朗施坦。据他说，他“激动得都要冒汗了。这才是真正的革命宣传，而我们却在那儿自作聪明地又是猜测、又是等待”。[89]一方面，勃朗施坦意识到，介绍自己消化得很差的古姆普洛维茨和密尔的著作是不会被工人们理解的。另一方面，他清楚地认识到，不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上，而应该用最简单的方法在工人的头脑中灌输这样一种思想：主要的事情是“搅动”俄国。

对马克思主义著作或世界社会民主运动经验的研究被减少到最低限度。用托洛茨基的话说，“宣传材料也不够用。在领导人中间传来传去的惟一宣传材料是从敖德萨弄来的一本手抄的《共产党宣言》，这个手抄本中有许多遗漏和错误的地方，已经破旧不堪了”。于是，这个圈子的领导人“自己编写宣传材料”。[90]

在勃朗施坦的参与下，文学作品被用来制作传单（共制作了 10 份）和报纸《我们的事业》（共出版了三期）。托洛茨基说，

“我的写作生涯也是由此开始的，几乎与我的革命生涯同步”。[91]

列夫撰写宣言或文章，然后用印刷体誊写在宣传物上。这项工作并不轻松，每一页至少需要两个小时的辛勤劳动。然而，托洛茨基写道：

“后来，我听说工厂和车间的工人们竞相传阅并热烈讨论我们这些用紫

---

[88]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七章 我的第一个革命组织”，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89]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七章 我的第一个革命组织”，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90]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七章 我的第一个革命组织”，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91]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七章 我的第一个革命组织”，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色墨水印刷的秘密宣传单时，内心觉得很满足。他们想像宣传单的作者肯定是一个神通广大的神秘人物，这个人可以深入到每一个工厂，知道车间里发生的事情，24 个小时以后这些事情就会反映在新的传单中”。[92]

尼古拉耶夫的工人们是否真的把传单的作者想象成了这样的人不得而知，但有可能列夫希望被想象成这样的人，而且他事实上就是这样的人。他在圈子里的同事齐夫声称，勃朗施坦在这几个月里的英雄是费迪南德-拉萨尔。多伊彻写道：

“年轻的勃朗施坦对拉萨尔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是因为他们之间毫无疑问的相似之处。拉萨尔也是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的儿子，他从自己的阶级中脱颖而出，为工人的解放而奋斗。他是那个世纪最伟大的演说家之一，也是那个世纪最多彩、最浪漫的人物之一”。

托洛茨基很可能也接近拉萨尔的思想，后者认为只有当无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时才有可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因此，拉萨尔认为有必要在不清算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逐步为改善工人的地位而斗争。

众所周知，拉萨尔在领导德国第一个工人组织——德国总工人联盟时年仅 38 岁。勃朗施坦因可能期望在达到拉萨尔的年龄时（1917 年 10 月 25 日[11 月 7 日]），能在行动上与这位杰出的德国革命家平起平坐。勃朗施坦“以狂热的崇拜之情谈论他的英雄，发誓要追随他做每一件事；如果齐夫的话是可信的，他还吹嘘自己将成为俄国的拉萨尔。这个年轻人没有虚伪或真实的谦虚”。

“南俄工人协会”的领导人与“德国总工人协会”的领导人相比还相差甚远。尽管工会的名字很响亮，但它只团结了 300 多名工人，但这位自信且雄心勃勃的拉萨尔模仿者几乎不怀疑他们的组织很快就会广为人知。这位年轻人将组织的成功主要归功于他个人的成功。

齐夫写道：

“无处不在，永远第一——这始终是勃朗施坦个性的基本本质；他心理的其他方面只是服务性的上层建筑和附加物”。

根据齐夫的说法，参加地下活动是列夫-勃朗施坦自我肯定的强大源泉。“革命支配着他的自我”。同时，齐夫认为，勃朗施坦的“‘自我’支配着他的行为……他爱工人，爱同志.....因为在他们身上，他也爱自己”。

多年以后，齐夫对勃朗施坦当时心理状态的描述是否正确？我们无从得知一个真正的学校毕业生当时的真实想法。不过，从学校和家庭生活到革命活动的转变显然过于迅速，不能认为这是一个成熟和深思熟虑的决定的结果。反政府宣言的作者不久前还在亚诺夫卡以同样的热情创作家庭杂志和圣保罗学校的杂志《水滴》。一年前，他还在拼命与敌人争论；几个月前，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只是帮助他在朋友中争夺领导权，同时向他喜欢的姑娘求爱。他对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基本上还一无所知，他曾在一篇尖刻的文章和一部未完成的剧本中对他们的思想提出质疑，但后来却打算在工人中宣传他们的思想。

从他的故事中可以看出，勃朗施坦热衷于革命活动的另一个方面——保密的需要。甚至在多年以后，他还毫不掩饰地描述了在喧闹的“罗西亚”酒馆里，在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声中，或者在月夜的墓地里举行的秘密会议。勃朗施坦因发明了一个笔名“利沃夫”，在会见“协会”的新成员时，他就用这个姓氏介绍自己。也许，这一切由他浪漫的想象力所滋养的。

但他一定意识到，准备传单和报纸并在工人中散发，并不是在学校准备一场

[92]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七章 我的第一个革命组织”，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大合唱”。敖德萨流放者在施宾策尔家的谈话可能会让他相信，这种“游戏”的代价是严厉的惩罚，而不是暂时开除学籍。是什么决定了他的行为：是青春期的轻浮，还是一个成熟革命者形成的先决条件？毫无疑问，无论“游戏”在勃朗施坦的行动中占多大比重，他都表现出了加入政权敌人行列的勇气。

但是，不仅勃朗施坦，“协会”中他的那些更成熟的同事们在地下活动中也表现得相当轻率，公然无视密谋规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组织者对南俄工人协会开展地下工作能力的怀疑并非徒劳。几乎就在开始散发通告之后，“协会”成员就受到了宪兵队的监视。他们之所以没有被捕，用托洛茨基的话说：

> 只是“因为他们不敢相信这些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就是这场斗争的发起者，猜想可能有更老练的流放者在幕后领导我们。
>
> 这种情况使我们又得到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但是最终，宪兵们还是通过严密追踪搞清楚了我们的情况，小组接二连三地被发现了”。[93]

[93]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七章 我的第一个革命组织”，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 第 五 章

# 在监狱压力机下重塑

1898 年 1 月 28 日，警方刚刚收集完有关南俄工人协会活动的情报，该组织的约 200 名成员就在尼古拉耶夫被捕。那天，勃朗施坦在城外大地主索科夫尼克的庄园里，当时什维戈夫斯基正在那里工作。他在这里被捕，然后被关进尼古拉耶夫市的监狱。乌克兰南部的冬天并不严寒，但监狱里却很冷。牢房的面积可以容纳 30 人，但当时只有两个人——勃朗施坦和“协会”的另一名成员印刷工亚维奇。晚上给了他们一个草垫子，但 6 点钟就被拿走了。每天，囚犯们都在痛苦地努力取暖，要么在角落里跑来跑去，要么肩并肩地坐在微热的灶台旁。

三周后，勃朗施坦被转移到赫尔松监狱。这里比较暖和，但托洛茨基在回忆录中抱怨伙食差（上午一块面包，下午一块面包）和卫生条件差（“我没有可换洗的衣服，一套衣服穿了二个月。我没有肥皂，牢房里的寄生虫恨不得要把我活生生地吃掉”）。他在这里被监禁的主要特点是单独监禁。正如托洛茨基所说，“我一生中虽然在 20 来个监狱呆过，但那一次的孤独寂寞是最难熬的。我没有书本和纸笔”。[94]在赫尔松监狱之后，托洛茨基被转移到新的敖德萨监狱，并再次被单独监禁。

托洛茨基在他的回忆录中只字未提他是如何看待突然的逮捕、整个组织的粉碎以及他自由生活的突然停止。很可能，这对一个易受影响、病态而又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勃朗施坦想成为俄国的拉萨尔的计划在他革命活动的一开始就遭遇了毁灭性的失败。如果说托洛茨基终其一生都无法原谅他在学校二年级时的失败，当时他被揭发是“大合唱”的组织者，那么在他被捕后，这个年轻人很可能极其痛苦地经历了他独立生活中的第一次残酷失败。但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只讲述了自己如何与单调乏味的单独监禁作斗争，如何不气馁，如何每天沿着牢房的对角线步行 1111 步，如何创作革命诗歌。

多伊彻重复了托洛茨基的这些说法，并报告说当时“协会”的一些成员在审讯期间遭受了酷刑，因此他认为与他们相比，勃朗施坦是幸运的。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托洛茨基对他在单独监禁中遭受的折磨的严重性保持了沉默。阅读弗-多洛舍维奇《单独监禁》一书的内容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在参观了新的敖德萨监狱后，这位年轻的小说家（勃朗施坦非常喜欢阅读其作品）在全面了解了单独监禁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单独监禁是最残酷的惩罚方式之一。多洛舍维奇在谈到专家的意见时写道：

> “萨哈林监狱的一名看守，以残忍著称，是体罚方面的大专家，他是这样认为的：——我放弃了体罚。体罚有什么用！人们会习惯一切。但一个好的单独监禁，没有人会习惯的！”

多洛舍维奇认为，长期单独监禁几乎不可避免地会破坏神经系统，而且往往会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其表现之一就是幻听和幻视。

> “这些幻觉有一个特点。不同的人对不同的事物会产生不同的感觉。在

[94]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八章 第一次坐牢”，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一个人看来是一只巨大的青蛙，在另一个人看来是一个穿红衣服的男人。但对每个人来说，它总是：一只翠绿色的青蛙，一个穿着鲜红色衬衫的男人。这是被孤零零的白色墙壁所折磨的视觉的一种再自然不过的抗议”。

虽然托洛茨基没有写明他是否出现过这种幻觉，但很明显，在长期的单独监禁之后，他开始严重缺乏鲜艳的色彩。托洛茨基在回忆母亲在牢房里给他的食物时特别强调：“橘子，.....颜色鲜艳的橘子”，这绝非偶然。多洛舍维奇认为，禁闭室居民神经紊乱的结果是“自杀企图不断.....在安排单独囚室时，主要注意的是囚犯没有东西可以用来上吊：他们说，‘嘿，这个梯子必须拆掉！他会上吊自杀的！’这是禁闭室唯一能激起的‘好’念头”。勃朗施坦在狱中写给索科洛夫斯卡娅的信证明，他不止一次有过这样的想法：

“我曾有过这样的时刻（几小时、几天、几个月），自杀是最体面的结果。但我没有勇气这样做”。

然而，幻觉和自杀未遂并没有完全消除孤独者对人们心理的影响。多洛舍维奇继续说：

“由于疲惫、贫血、消瘦，神经痛会特别强烈。而单独监禁，在释放一个有肺痨症状的坏血病人的同时，也释放了一个神经失常、不正常的人。众所周知，单独监禁的囚犯往往在刚刚离开监狱时就会犯下令人吃惊的残暴罪行。不可能不是这样。你还能指望一个不正常的人做什么呢？”

应当牢记，单独监禁甚至会削弱健康和坚韧的人的意志，而一个易患急性神经病的 18 岁男孩却经历了这种情况。通过使用这种残酷的影响方法，警方显然是想从精神上击垮勃朗施坦。显然，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成功了。勃朗施坦被转移到一间普通牢房后，他在什维戈夫斯基圈子里认识的战友们第一次目睹了他的癫痫发作。显然，勃朗施坦以前就有过这种癫痫发作，但什维戈夫斯基圈子里的人直到那时才知道，他们是在勃朗施坦被单独监禁后病情恶化时才得知他的病情的。

单独监禁不仅加剧了他神经系统的痛苦，也扰乱了他的心理平衡，勃朗施坦的狱友注意到他的情绪和高傲的行为经常发生突然的变化。在调查过程中，他有时表现得像一个真正学校的学生，身上长满了麻风病，试图逃避惩罚。根据齐夫的说法，列夫-勃朗施坦因就像一个被可怕的老师审判的顽皮男孩一样，幽默而扭曲，千方百计地为自己辩护。但有时，他也会对监狱的命令提出尖锐的抗议，并像在学校的一年级一样，成为集体抗议当局的组织者。齐夫讲述了勃朗施坦如何在狱中组织暴力反抗示威。在得知一名囚犯因拒绝在监狱当局面前脱帽而被扔进惩罚牢房后，勃朗施坦和其他人要求狱卒打报告给典狱长。狱卒拒绝了。勃朗施坦自己按下了呼叫按钮。典狱长在狱警的陪同下跑到院子里。囚犯们看到他们后，纷纷把帽子戴在头上。典狱长被激怒了，要求摘下帽子。对此，勃朗施坦建议典狱长摘下他的帽子。在典狱长的示意下，看守们扑向勃朗施坦，把他带到了惩罚牢房。

勃朗施坦在会见亲友时尽情释放自己的情感。

“他心地善良，对战友和他们的亲属甚至多愁善感.....不仅对他的女友和未来的妻子.....而且对所有其他前来看望丈夫或兄弟的妇女都表现出令人感动的温柔；他的高贵气质深深地吸引着每一个人”。

齐夫回忆说：

“从惩罚室回来后，他会把用不完的温柔倾注在我们身上……拥抱、亲吻和爱抚每一个人”。

似乎再也找不到那个傲慢的年轻人的影子了，他总是对他的同志们冷嘲热讽。

勃朗施坦行为上的另一个明显变化是，他对基督教宗教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托洛茨基后来解释说，他之所以选择这种不同寻常的阅读方式有两个原因。首先，托洛茨基写道，他决定同时学习两种语言（英语和意大利语），并通过阅读四种语言的《新约全书》来提高他在实科学校学习的两种语言（德语和法语）的水平。应勃朗施坦的请求，他的姐姐在狱中给了他这四种语言的《新约圣经》。托洛茨基保证说，通过“逐节”阅读，他“在几个月内.....取得了很大进步.....”。不过，他也指出：

“说实在的，我的语言天赋很一般，我虽然曾经在欧洲的许多国家生活过很长时间，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掌握一门外语”。

即使勃朗施坦具有快速掌握外语的能力，他所选择的从新约文本中学习现代语言的方法也不可能使他获得成功，因为福音书的词汇并不适合现代生活。许多革命者通常采用现代教科书和自学的方法。例如，斯大林就是如此，他在狱中从一本自学书中学会了世界语。（诚然，与托洛茨基一样，斯大林的这一努力并没有成功。他也没有学习外语的特殊才能）。

如果不是因为年轻的勃朗施坦因试图用不同的语言学习《新约圣经》，同时又积极阅读监狱图书馆里的各种宗教文献，人们可能会认为他试图从《福音书》和《使徒书信集》的文本中学习外语是由于他的天真。托洛茨基在解释他对这些文献的兴趣时说，他在敖德萨监狱紧张的几个月里“没有收到过外面送来的书，只能在监狱的图书馆里寻找安慰，而那里只有一些保守的历史和宗教方面的陈旧杂志。我如饥似渴地研究这些东西”。[95]

关于监狱图书馆只有“保守的历史和宗教方面的陈旧杂志”的说法与沙皇时期监狱中其他囚犯的印象不符，他们经常注意到那里有丰富多样的书籍。究其原因，是因为囚犯经常把个人书籍留在监狱里。

即使假设监狱图书馆里只有“保守的历史和宗教方面的陈旧杂志”，也很难相信这些期刊会像托洛茨基所描述的那样，以教派和异端邪说的资料为主。托洛茨基写道，由于阅读了这些期刊，他“从中了解到了古今各种宗教的门派和教别，明白了东正教的所有优点，找到了反对天主教、新教、托尔斯泰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最重要的论据”。[96]给人的印象是，勃朗施坦并不是为了无聊而简单地翻阅自幼与他格格不入的文学作品，而是有选择性地仔细研读。

此外，该囚犯还与狱警就宗教话题进行交谈，讨论各种异端邪说。根据他的叙述，他积极地与典狱长米克林讨论阿里乌派异端。

勃朗施坦对宗教派别和异端邪说的兴趣，对于当时的年轻革命者来说是令人惊讶的，但如果我们考虑到，从东正教的角度来看，协会的大部分成员，也就是他的狱友，都是教派分子或异端。一方面，勃朗施坦阅读这些材料时试图了解其同伙的宗教思想的特殊性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他的狱友们在加入“南俄工人协会”之后，可能并没有放弃他们的信仰，并试图让这个年轻人加入他们的教派。此时的勃朗施坦可能正处于精神混乱状态，开始屈服于他们拉他加入其宗教组织的努力。

勃朗施坦在单独监禁和癫痫发作时经历的痛苦环境会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不寻常幻觉的生动记忆，而他并不总是能够清楚地解释这些幻觉。曾经不止一次经历过癫痫发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小说《白痴》中这样描写米什金王子：

“在他的癫痫状态中，有一度几乎就在癫痫发作之前.....突然，在悲

[95]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八章 第一次坐牢”，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96]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八章 第一次坐牢”，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伤、精神阴郁、压力之下，刹那间他的大脑仿佛被点燃了，他所有的生命力都被一种不同寻常的冲动牵引着。在这闪电般持续的瞬间，生命感和自我意识几乎倍增。他的思想和心灵被一种非同寻常的光芒照亮；他所有的焦虑、所有的疑虑、所有的烦恼都仿佛一下子平息了，化为某种更高的平静，充满了清晰、和谐的喜悦和希望，充满了理性和最终的理性”。

癫痫袭击发生后，米什金亲王反思道：

“毕竟，他当时没有梦见任何幻觉，就像梦见大麻、鸦片或酒一样，使智力退化.....”。

王子毫不怀疑，这种“瞬间的感觉.....给人一种前所未闻、前所未有的完整感、度量感、调和感，以及与生命最高综合体的焦急祈祷的融合感”。他认为，“这确实是‘美和祈祷’，是‘生命的最高综合’，‘一个人可以为这一刻付出整个生命’”。

勃朗施坦在经历了这种感觉之后，有可能从他所熟悉的犹太神学中回忆起“耶什”的概念——一种物体的最高本质，深深地隐藏在其外表之下；卡巴拉、安息日派和法兰克派的神秘教义；以及哈西德派关于扎迪克人能够直接与上帝沟通并创造奇迹的故事。他可能把自己的印象告诉了狱友，这些狱友都是各种宗教派别的信徒。他们可以让勃朗施坦相信他与另一个世界进行了沟通。同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可以说出这些幻象的神性，而另一些人则可以说出其撒旦性质。

勃朗施坦因在狱中对阴间的故事很感兴趣，这在《我的生活》的相关篇章中可以得到证明。托洛茨基写道，他在宗教杂志上仔细阅读了“对魔鬼、撒旦及地狱的研究”“关于天国、天国的内部构造以及它存在的地方的详细探究”。[97]诚然，三十年后他嘲笑了这些“研究”，（“长久以来荒诞不经说法的集大成者”）但我们不知道当时一个身陷囹圄、精神极度混乱的年轻人是如何看待这些研究的。

我们可以认为，阅读基督教文学虽然有些片面，但反映了勃朗施坦的精神蜕变。他有可能真诚地希望了解基督教信仰，而迄今为止，他一直习惯于认为基督教信仰与他格格不入。尽管如此，勃朗施坦更有可能是以教派的形式接近基督教的。因此，他试图研究不同语言的《新约圣经》可能与他计划加入一个教派并参与其在俄罗斯境外的传教活动有关。

勃朗施坦对共济会的兴趣对于当年的革命者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他又一次把这归功于从监狱图书馆阅读宗教期刊。他写道：

“神学杂志上刊登的关于共济会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98]（从托洛茨基的话来看，这些文章包含了对共济会的尖锐批评，其内容很可能与 1905 年革命后谢良尼诺夫撰写的《共济会的秘密力量》等著名作品相近）。

勃朗施坦对“自由共济会”的兴趣要求他了解更广泛的文献，据托洛茨基说，他“在几个月内，我废寝忘食地阅读了许多亲戚朋友们从城里送来的关于共济会历史的书籍”。阅读不仅限于阅读。勃朗施坦开始详细记录所读文献。他写道：

“我就想法找了一本有一千页的笔记本。我用很小的字把书上的许多精华部分摘抄下来，其中夹杂了我对共济会和唯物史观的想法，这用了大概一年的时间。

.....

我在敖德萨监狱呆的最后一段时间，宪兵上士乌索夫检查并签字的那本

[97]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八章 第一次坐牢”，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98]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八章 第一次坐牢”，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厚厚的笔记成为我的历史和哲学知识的宝库”。[99]

勃朗施坦不仅研究共济会，还不断与狱友分享他新发现的知识和研究成果。他写道，他“对一些章节进行修改和补充，抄在我暗地里弄到的笔记本上，以便让监狱里的其他难友传阅”。[100]

《关于共济会的研究》是勃朗施坦的第一部独立的重要著作，但由于在流亡期间遗失而从未出版。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对这一遗失感到惋惜，也许他认为这本书适合出版。

托洛茨基在解释他对共济会的迷恋时写道，他突然被一个问题所困扰：

“这项运动是怎么产生的呢？马克思主义怎么看待它呢？”[101]

这个问题的提出意味着，此时 18 岁的托洛茨基已经是一个成功的马克思主义者，只需运用他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共济会。事实上，此时他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只是在学习这一学说的基础知识。托洛茨基在自传中写道，他“在牢房里激动地阅读了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两篇著名论文的法译本”。[102]从托洛茨基的进一步言辞中可以看出，当时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解还相差甚远。他承认：

“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的文章具有哲学抨击性。写这些文章必须具备丰富的知识，这是我所不具备的，我只好去揣测它”。[103]

显然，勃朗施坦从拉布里奥拉的两篇论文中研究马克思主义所花费的时间远远少于他对共济会的研究。

在这一点上，勃朗施坦与俄国绝大多数年轻的革命家不同，他们的第一部作品通常要么是关于社会经济问题的，要么是关于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斗争的时事问题的。众所周知，列宁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斯大林在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中，斯大林比较了在俄国工人阶级中流行的两种革命理论。布哈林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专门论述了世界大战对经济状况和工人阶级地位的影响。

任何有抱负的社会民主党人把自己的第一部著作献给共济会，并为此付出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这样的例子是不可能也不切实际的。当时，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的出版物中通常忽视这一有影响力的运动，理由是它诞生于社会的特权阶层，在意识形态上与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格格不入。

但要知道，布尔什维克党未来的领袖们在撰写第一部重要著作时比勃朗施坦更加成熟，他们在社会民主党内有一定的工作经历和党务工作经验。他们已经就党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撰写了大量文章和论文。他们最初的主要理论研究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运动面临的任务是一致的。由于勃朗施坦此时还不是社会民主党党员，他可以选择主要符合个人兴趣的研究课题。

毫无疑问，研究“自由共济会”这一世界秘密组织的奥秘会吸引一个好奇的年轻人的想象力。促使他研究有关教派和恶魔的文献的同样情况，有可能增强了他对共济会的纯粹认知兴趣。众所周知，神秘的教义在共济会中非常普遍。19 世纪早期和中期，在俄罗斯共济会中非常流行的“心行”练习是一种伴随着屏息的冥想。在这种状态下，人可能会产生幻觉，据说这是在与“更高的力量”交流。皮索姆斯基的小说《共济会员》中的主人公深信，人工憋气会导致心跳加快，并

[99]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八章 第一次坐牢”，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100]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八章 第一次坐牢”，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101]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八章 第一次坐牢”，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102]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八章 第一次坐牢”，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103]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八章 第一次坐牢”，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进入晕厥前的状态，从而将“一个人.....带入天堂的本质，这种本质显现为神圣的温暖，随后是天堂的甜美……最后是天堂之光和神圣形象的幻象”。

一些共济会组织了一些聚会，其成员在聚会期间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这些仪式使他们更接近教派。正因如此，俄罗斯统治集团中颇具影响力的共济会员千方百计地阻挠东正教会镇压教派的努力。反过来，一些教派的成员也支持共济会并与他们走得很近。

在“南俄工人协会”的教派成员中，可能有熟悉共济会的人，甚至可能有前共济会成员。他们可能会告诉勃朗施坦许多关于这个秘密组织的有趣事情。勃朗施坦可能在入狱前就知道共济会的存在，这可能是通过施宾策尔家族的谈话，也可能是通过文学作品（至少是通过阅读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1880年，著名作家皮索姆斯基在《雷鸣》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小说，再次激发了人们对俄罗斯共济会历史的兴趣。勃朗施坦的家人和朋友都能读到这本脍炙人口的小说，它以明显的同情之心描述了 19 世纪 30 年代俄罗斯共济会员的生活，是根据作家对他的叔叔——一位活跃而有影响力的共济会员——的个人回忆创作的。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关于共济会及其过去和现在的出版物，列夫-勃朗施坦在入狱前就可能知道这些内容。例如，他可能知道边沁是一名共济会员，因此他可能会对他最重视的思想家所参与的组织感兴趣。与教派狱友的谈话，或在神学期刊上读到对共济会进行猛烈抨击的文章，都有可能激发勃朗施坦对共济会运动已有的了解。

然而，勃朗施坦对共济会的密切关注不太可能只是因为他对这个神秘而隐秘的组织闲来无事的兴趣。在经历了巨大的打击之后，勃朗施坦面临着对未来人生道路的选择。

尽管共济会的历史扑朔迷离，充满了关于其起源的可疑传说，但勃朗施坦从批判性和辩解性的资料中发现，该组织比社会主义者更早着手改造社会。共济会的纲领性文件宣称：

> “自由共济会是一个世界性的秘密兄弟会，致力于带领人类实现人间伊甸园、黄金时代、爱与真理的王国、阿斯特里亚王国”。

共济会对古希腊女神阿斯特里亚——居住在黄金时代幸福人民中间的正义女神——的诉求并不局限于对古代神话的利用。据称，共济会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毕达哥拉斯的奥秘，甚至是古埃及祭司的秘密。勃朗施坦了解到，共济会积极使用他从小就熟悉的犹太民族的古老符号。虽然共济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对犹太人开放，但在其寺庙内部装饰中使用的共济会符号中，可以找到犹太人神圣的六角大卫星（Mogendovid）和犹太信徒在光明节点燃的八角烛台。共济会主要传说的主角是一位古犹太人——所罗门圣殿的建造总指挥阿多尼拉姆（或希拉姆），他被三位建造者背信弃义地杀害了。“自由共济会”的主要标志和入会仪式都使用了他们创作的这一传说的主题。

如果对共济会进行深入研究，勃朗施坦就会意识到，共济会的大部分内容都源自古老的伊斯兰苏菲教派的教义和实践，苏菲教派影响了犹太教的卡巴拉和其他神秘流派。与苏菲派一样，共济会也对自己的活动进行了分类，积极使用象征性的寓言、只有入会者才知道的口令、图像符号以及秘密手势。与苏菲派一样，共济会认为自己是最高深奥智慧的守护者，只为少数被选中的人服务。与苏菲派一样，共济会员也认为自己凌驾于当时的社会习俗和风气之上，因此，他们对社会秩序的傲慢讽刺常常导致他们与国家当局和主流宗教发生冲突。

阅读有关共济会的文献会让人觉得，这个组织不仅是最古老的组织之一，而且仍然极具影响力。从神学期刊上尖锐批评的文章中，勃朗施坦可以得出这样的

结论：共济会是上个世纪世界革命力量的启蒙者和组织者。从这些文献中可以看出，世界上许多地方发生政变和革命的根本原因不是经济和阶级矛盾的发展，而是“自由共济会”的活动。勃朗施坦可能也开始倾向于这一结论。

从托洛茨基对他的工作的评价来看，即使在 30 多年后，他仍然非常欣赏共济会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托洛茨基写道：

> “对共济会的研究可以检验我的这些假设.....我没有很快地、机械地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也没有把辩证法就看成是抽象的定义，而是把它们作为我试图在历史进程中努力寻找的那股鲜活的动力之源”。[104]

在托洛茨基看来，俄国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在其理论著作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的研究似乎只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教条和抽象的认识形式。他对工人阶级社会状况的研究以及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并不感兴趣。从他对共济会的兴趣来看，他专注于政治和社会进程的幕后，以及革命和政变的秘密机制。由于他的研究课题是共济会，他很可能从中看到了世界发展的“春天”，并准备将“自由共济会”组织视为世界社会进程的主导力量之一。

显然，为了扫除革命宣传中对共济会的传统蔑视，将其视为陈旧过时的组织，托洛茨基强调，共济会组织中采用的老式形式在今天也可以积极使用。他写道：

> “生产领域的技术变革要比思想领域的变革广泛和深刻得多，思想领域宁可修修补补也不会把一切都推倒重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法国小资产阶级的议员们找不到好的方法来缔造人们之间的新的道德纽带，以抵制瓦解新的社会关系的旧势力。他们自己也不想从根本上重建大楼，而只是系着白色围裙、带着圆规和铅锤钻到早已建好的议会大厦和内阁大楼里去修修补补”。[105]

托洛茨基从共济会古老的仪式与他们正在解决的相当现代的政治任务的结合中看到了历史进程的辩证法。

勃朗施坦还从共济会中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潮流的结合中看到了辩证法。托洛茨基在自传中写道：

> “在共济会的某些支派，例如苏格兰支派，封建反动势力占了上风。18 世纪共济会成为启蒙运动的很好形式，其中革命先锋‘开明派’在革命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的左派演变成了烧炭党。路易十六和发明了使他丧命的断头台的吉约坦医生都是共济会的成员。南部德国的共济会体现了鲜明的革命性，但在叶卡捷琳娜的皇宫中，共济会成为虚伪的贵族和官僚统治集团的代名词。共济会成员诺维科夫被同为共济会成员的女皇流放到西伯利亚”。[106]

与此同时，共济会内部的许多意识形态和政治分歧也化解为共同的超政治和超宗教原则。皮塞姆斯基的小说的主人公维格尔在解释共济会的精神原则时宣称，虽然共济会“崇拜万能的宇宙建造者”，但他们“对超感性的东西没有明确的概念”。

维格尔认为，共济会用现代术语来说，“主张普世价值优先”，“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激发人们的人性，使他们在天主教、路德教和东正教背后不忘人类”。维格尔宣称共济会是“联盟中的联盟”，他解释说：

> “共济会将人类和人类历史的所有对比联系在一起。共济会将所有美好

[104]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八章 第一次坐牢”，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105]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八章 第一次坐牢”，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106]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八章 第一次坐牢”，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的事物汇聚到自己的殿堂，以思想交流为目标，以平衡所有敌对的粗糙。这项工作正在进行，并将继续下去，直到人类充满爱的情感，在共同的和谐中团结起来”。

一方面，共济会把关于人性和爱邻里的一般规定作为最高目标，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只关心人类利益的组织，另一方面，又掩盖了某些共济会会所及其协会为自己规定的具体任务。维格尔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含糊地解释道：

“关于我们共济会最高目标的观点如此多样……以至于要把它们描述得面面俱到，就像夏日傍晚田野、草地和森林中五彩缤纷的绿色一样困难……共济会本身就是一个谜，因为只有那些生活在共济会中的人才能揭示其真正的内在含义，并通过不断参与共济会的工作而得到提高”。

反对共济会的人认为，“自由共济会”打着数十载改善人民生活的幌子，却能策划针对基督教国家的险恶阴谋。亚历山大-谢里亚尼诺夫在他的《共济会的秘密力量》一书中指出：

“共济会的主要优势之一就是不急于求成。指导共济会的力量已经计算出实现其秘密目的所需的真正巨大破坏的难度，并将其工作分为‘准备’和‘执行’。准备工作包括欺骗基督教世界，使其能够轻而易举地得手，并在基督徒中挑选合作者，这些人不忠于自己的过去，会变得肆无忌惮，赞成毁灭自己的祖国”。

反共济会的作者认为，“自由共济会”的领导人故意在他们的计划目标周围制造迷雾，掩盖他们的破坏性目标，而不是热爱人类的目标。谢里亚尼诺夫写道：

“当经过多年的准备工作，共济会作为使徒和布道者完成了他们的宣传工作时，当在他们周围按照他们的要求工作的团体变成他们宣传的不懈回声时，当政治权力被攫取时，当演说家、记者、诗人、演员、色情出版物的作者以各种方式在狂热的民众面前充分阐释了他们所谓的进步思想，就像西班牙的‘斗牛士’（banderillas）在公牛面前挥舞着他们的红色斗篷时，政治‘斗牛士’——秘密力量的真正拥护者——终于可能出现了”。

谢里亚尼诺夫写道，一个真正的领袖出场之后，“不是宣传破坏性的理论，而是将叛乱和破坏的武器付诸行动，这将不可避免地引起迫害、抢劫、大屠杀、谋杀，而被疯狂蒙蔽了双眼的激动的人群将狂热地冲上前去参与暴行——这表明它已经达到了一个装饰着共济会秘密徽章的‘斗牛士’所必需的境界。不管他是米拉波、丹东、罗伯斯庇尔，还是离我们更近的瓦尔德克-卢梭、孔贝、克里孟梭，不管他本人是不是共济会员，既然他被选为‘代表’，他就有足够的话语权，以便把事先为他捏造好的舆论带走。群众和权力同时掌握在他的手中”。

共济会目标的模糊性或隐秘性并不妨碍勃朗施坦在共济会中看到一个连贯的联系系统，为来自不同国家、代表不同社会阶层、政党和宗教派别的人们提供互助。如果勃朗施坦熟悉“互联网”，他可能会在共济会中看到与互联网类似的特征。与“互联网”一样，共济会向全世界的人们开放，不论其国籍、政治和宗教观点如何。同时，只有掌握了符号系统并能读出暗语——密码的人才能进入这个全球连接的网络。他们有自己的“网站”（共济会会所），在那里举行“聊天”（集会）。就像“互联网”上的“网站”致力于各种主题一样，共济会会所也迎合了当时社会的各种兴趣。有的团体从事哲学和神学、炼金术、神学，甚至试图制造人造人。就像刚接触全球电子网络的新手一样，共济会的新手往往无法理解深奥的奥秘，只能接收到大量垃圾或低价值的信息。与此同时，就像“互联网”的常客一样，有经验的共济会员掌握了使用全球连接的艺术，学会了用只有他们

才能听懂的特殊行话相互交流。

然而，与“互联网”不同的是，获取共济会内部组织信息的权限取决于这个或那个共济会成员对其组织秘密的奉献程度。共济会成员在多级等级制度中的晋升由该组织的秘密领导人决定。此外，与“互联网”不同，加入共济会不仅意味着获得信息，还意味着获得权力。在外人看不见的共济会世界网络的细线上，可以迅速崛起，甚至参与整个国家权力和社会秩序变革的决策。

显然，这一情况决定了勃朗施坦对共济会的浓厚兴趣。勃朗施坦一直追求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将毕生所思所想都寄托在这一愿望上。只要成为这个组织的一员，他就可以畅通无阻地走上通往世界最高权力的台阶。

然而，他当时不可能想到，复杂而神秘的共济会组织并没有让许多成员明白，他们中谁是秘密统治者手中顺从的傀儡，谁又是傀儡的操纵者。同时，共济会制造平等的假象，吸引了许多真诚向往平等、博爱、自由和启蒙理想的人加入其行列。

勃朗施坦仔细研究了相关文献，从中了解到主要作家、作曲家、哲学家、自然科学家、贵族和主要金融家、各种邪教的牧师、革命家和国王都是共济会的成员。他们每个人的成败，有时甚至是生死，都取决于共济会秘密会议的决定。共济会组织是推动大臣任命、政府辞职、政变和革命的“弹簧”。

皮塞姆斯基在他的小说《共济会》中描述了 19 世纪 30-40 年代俄罗斯共济会的生活，他说，即使在尼古拉一世击败“自由共济会”之后，共济会仍然是一个有影响力的组织，俄罗斯的政治和公共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许多共济会员继续保持着有影响力的地位和对其组织纪律的忠诚。因此，当小说的主人公叶戈尔-叶戈里奇-马尔芬决定将总督赶下台时，后者的命运就注定了。马尔芬写给部里一位官员的信等同于命令，并得到了执行。最和蔼可亲的叶戈尔-叶戈里奇更是轻而易举地解除了邮政局长和其他省级或县级官员的职务，任命他喜欢的人取而代之。如果我们相信皮塞姆斯基的话，这就是共济会在俄国的权力，即使在他们被政府禁止和迫害的时候也是如此。在西欧的现代国家，加入共济会可以获得担任要职的机会，这也是这个组织吸引野心家的原因。托洛茨基正确地写道：

> “共济会”“并不是要建造一座新楼，而只是要打入议会或部委建造已久的大楼”。

显然，在与同伙们讨论他得到的信息时，他把这些信息与他们的革命工作经验进行了比较。从共济会的历史背景来看，他们几个月来在尼古拉耶夫的活动显得非常业余，毫无希望。“自由共济会”娴熟地隐藏着秘密，这与“南俄工人协会”无助的阴谋企图形成了鲜明对比。共济会员有能力渗透到社会最不同的阶层，并逐渐影响政治生活的发展，然后发动广大民众的演说，或组织宫廷政变，这迫使他对自己的省级组织进行了批判性的评估，因为该组织在大学生的领导下只团结了几十名教派工人，而且存在时间不超过一年。现在，他尤其清楚地认识到，尽管“南俄工人协会”与其他革命组织有一些联系，但其领导人只是作为孤独的工匠行事。勃朗施坦对共济会历史的研究向他表明，如果不与其他革命团体建立良好的联系，如果所有地方小组不严格服从中央组织，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勃朗施坦不断嘲笑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观点“狭隘”，并将其与共济会进行对比，共济会可以在模糊的“普世”言辞中消解意识形态、政治和宗教分歧，并在献身于“超政党”和“超宗教”超级组织的基础上将其成员团结起来。在这样一个组织中，可以容纳一个长期在边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徘徊的人。

通过不断谴责马克思主义的枯燥乏味，勃朗施坦将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当代

经济和社会生活批判的学说的宣传与共济会的传说和仪式进行了对比，共济会吸引了近几个世纪最先进的人的想象力。如果说革命者将他们的聚会变成了沉闷的科学争论，那么共济会则不断地将他们的聚会戏剧化，有时甚至将自己推向极度亢奋的状态。共济会的会议风格很可能更接近勃朗施坦，他甚至在与什维戈夫斯基圈子里的同志打交道时也倾向于戏剧化和夸张化。

可以说，勃朗施坦在其进一步的政治活动中使用了他在比较世界共济会和“南俄工人协会”的经验时得出的许多结论。他很快就成为了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彻底秘密的革命组织的一贯支持者，这个组织不仅在国内拥有广泛的组织网络，而且在国际上也有广泛的联系。对他来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俄共（布）就是这样一个政党。在这些党内，他一再谴责某些纲领或派别的“狭隘性”，试图扮演“超派别领袖”的角色。尽管他不得不忍受“枯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党内的统治，甚至假装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勃朗施坦还是在自己的著作中引入了大量花言巧语（为此他受到了普列汉诺夫的严厉谴责），随后成为著名的在讲台上戏剧化亮相的大师，将党和群众会议推向了一个崇高的境界。

从小就向往领导地位的勃朗施坦意识到了控制群众集会情绪的重要性，他在共济会的历史中发现了许多在政治运动中掌握权力的人取得成功的例子。他曾试图在南俄工人协会的队伍中成为一名俄国拉萨尔，但以失败告终，这清楚地向他表明，只要他还停留在政治运动的边缘，他的抱负就毫无希望。然而，从共济会的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向他证明，当他发现自己身处做出主要决定的总部时，他将不再是复杂政治游戏中的一枚棋子。被捕后不到五年，他就成功地进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总部，并被视为该党充满希望的年轻领导人之一。

对共济会文献的熟悉可能使勃朗施坦相信，只有与共济会“互联网”建立联系，才能取得革命的成功。勃朗施坦可能通过不断向他的同志们讲述“自由共济会”这股无形却强大的力量，使他们相信不仅需要利用共济会的经验，还需要利用共济会的联系来促进革命事业。他可能得出了与著名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家克鲁泡特金王子相同的结论：

> “共济会首先是一种世界性的政治力量和古老的组织。我们的革命运动如果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共济会联系起来，就会损失惨重，因为共济会在俄国——当然也在圣彼得堡——的各个领域都有它的活动”。

邦奇-布鲁耶维奇在评论克鲁泡特金的这一言论时写道：

> “他（克鲁泡特金）至少有一点是对的：俄国自由派的反对活动与共济会有着直接的联系，通过共济会渗透到各个地方，渗透到专制组织最隐秘的地方，到处都有它的影响”。

与法国结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共济会在俄罗斯的活跃，“自由共济会”在法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如伊万诺夫所说：

> “1890 年法俄结盟后，‘法国大东方’（共济会中心）成为俄罗斯共济会的实验室。俄罗斯政治移民主要在巴黎的共济会中找到了好客的庇护所。上世纪 90 年代，在‘法国大东方’的协助下，巴黎成立了一所专门的学院，这是一所培养未来革命人物的学校。这所学院的许多教授——科瓦列夫斯基、特拉切夫斯基、阿姆菲特海特洛夫——以及他们的学生都成了共济会员”。

在这些年里，不仅自由派，而且革命派的许多反对派人士都加入了共济会组织，到俄国革命开始时，许多重要政党的领导人都变成了共济会会员。后来，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韦利霍夫报告说，他“加入了所谓的共济会，其中包括左翼进步人士（叶夫列莫夫）、左翼立宪民主党（涅克拉索夫、沃尔科夫、斯捷潘诺夫）、

社会革命党（克伦斯基）以及孟什维克（契赫德泽、斯科别列夫）的代表”。在这些年里，俄国的政治知识分子，包括社会民主党人，普遍渴望加入共济会。

我们不知道勃朗施坦在狱友中宣传他的共济会思想有多成功，也不知道他是否鼓动他们与共济会建立联系，但有大量证据表明，勃朗施坦最终成为了共济会组织的成员。尼娜-贝尔贝罗娃这样一位共济会研究者在谈到她与共济会名单的个人交情时声称了这一点。伊万诺夫在《从彼得大帝到我们时代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和共济会》一书中，把托洛茨基列为俄罗斯著名共济会员之一，声称，如克伦斯基、马克拉科夫、阿夫克森捷耶夫。瓦连京-普鲁萨科夫一样，“托洛茨基于1916年在美国逗留期间加入了共济会”。但是，既然我们谈论的是一个秘密组织，就没有任何文件证明勃朗施坦加入了“自由共济会”。有资料表明，他一直与共济会运动保持着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出身于世袭共济会世家、时任法国共济会最高领袖的泽勒，在 20 世纪 30 年代移居国外期间曾在托洛茨基的秘书处工作。泽勒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了这一点。

如果勃朗施坦希望借助世界共济会的网络迅速登上权力的高峰，那么他就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加入共济会的行列就意味着要对“自由共济会”团体承担相当大的义务。在无形的共济会幕后黑手的命令下，一个普通的共济会成员可能会被从地球的一端扔到另一端，被迫执行繁重的任务，并在几分钟内改变自己的政治角色。

我们不知道勃朗施坦是否在狱中加入了共济会，但很显然，他对共济会的研究不仅让他看到了自己以前对世界的看法的不完美，也让他看到了自己的弱点。他肯定熟悉的共济会原则之一就是自我完善。共济会宣称：

> “共济会是对人的再教育”。

狱中的严酷考验和对共济会的研究迫使列夫-勃朗施坦不仅重新思考自己的思想准则，也重新思考自己的个人价值观。达到入会最高级别的人，不仅要依靠更有影响力的人的支持，还要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要像切割粗糙的石头一样，把自己的弱点切割掉。这种“切割”的表现之一就是勃朗施坦出狱后性格的改变。

多伊彻指出，勃朗施坦的战友们“多年来一直铭记着他热情的友谊，以至于后来‘他们’对他在革命和内战年代的冷酷无情感到震惊”。对狱友的好感爆发很可能只是一个心灵受到震撼的人的痛苦反应。狱中生活结束后，勃朗施坦的行为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变化。此外，入狱后他变得非常孤僻，对个人情感的表达也很克制。在狱中见到过勃朗施坦的人都对他开始对昔日的狱友表现出的冷漠感到震惊。入狱后见到勃朗施坦-托洛茨基的人都注意到了他的冷漠和傲慢，认为这是他与生俱来的性格。社会民主党人加维曾于 1912 年在维也纳与托洛茨基会面，他写道，托洛茨基给那些与他交谈的人灌输了“距离感的悲怆，他的眼睛在耳钉后面闪烁着冷酷的光芒，他的声音带着冷酷的金属音色，他的言语冷酷而清晰”。内达瓦写道：

> “许多回忆录作者指出托洛茨基对朋友漠不关心，倾向于与他们保持距离。更准确地说，他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朋友（拉科夫斯基和越飞除外，但他与他们也曾是短暂的朋友）。托洛茨基简直散发出一种优越感，从他的脸上可以读出一种肯定，即他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感伤的废话上”。

齐夫是勃朗施坦在狱中暴力表现出仁慈和温柔的见证人，也是他在尼古拉耶夫圈子时期的朋友，他认为这种行为只是暂时的现象，并得出了坚定的结论：

> “托洛茨基的灵魂中根本没有残忍和人性，取而代之的是空虚。他的灵魂中没有与满足个人需要无关的对人的热情。对他来说，人只是能够满足他

的权力饥渴的成百上千、成千上万的个体。托洛茨基在道德上是混沌的。这是一种先天的生理缺陷，英国人称之为道德失常。同情的灵魂器官在托洛茨基母亲的子宫里就萎缩了”。

齐夫的最后一句话并不公平。毫无疑问，列夫-勃朗施坦的顽固不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疾病造成的，随着他的成熟，这种顽固不化可能会逐渐消失。然而，入狱后，他变成了一个冷漠、傲慢的人，毫不掩饰他对周围人的疏远态度。这种行为方式很可能只是他在狱中经历的深刻心理变化的外在表现。

人物的“多面性”体现在他对笔名的选择上。就像在古代的入会仪式中，一个人在模仿新生之后会被赋予一个新的名字一样，革命者的党派化名永远将他们与新的生活联系在一起，而他们的真实姓氏往往会被遗忘。在敖德萨监狱里，勃朗施坦遇到了一个人，后来全世界都知道了他的姓氏。他是凶狠的典狱长托洛茨基。他是敖德萨监狱的灾难，不仅囚犯们害怕他，就连监狱当局也害怕他。后来，这个监狱长姓氏的主人成了一名革命者。

俄罗斯历史上没有革命人物以这种方式选择笔名的例子，尽管在选择地下名字和绰号方面有相当多的独创性。专有名称和地名（列宁、梁赞诺夫、雅罗斯拉夫斯基）、母亲的名字（斯捷克洛夫、加米涅夫、斯大林）、劳动工具（莫洛托夫）、星期（皮亚特尼茨基）甚至鸟类（古谢夫）都曾被用作笔名，但从未有人想到为严酷的监狱制度的化身选择姓氏。

历史学家瓦谢茨基认为，勃朗施坦选择笔名反映了这位囚犯的讽刺心理：

“托洛茨基似乎是为了报复典狱长的独裁做法，他用自己的姓氏作为笔名，以便向所有人证明，一个专制制度的老卫士的姓氏也可以用于其他目的——革命”。

内达瓦认为，托洛茨基笔名的由来之一是他想放弃犹太人的身份：

“毫无疑问，勃朗施坦这个姓氏至少在日常生活中干扰了托洛茨基。对于一个否认国籍的国际主义者来说，这个姓氏也没有任何用处，仅仅因为它带有国籍的印记……托洛茨基这个姓氏听起来像波兰语而不是俄罗斯语，与俄罗斯常见的姓氏勃朗施坦形成鲜明对比”。

同时，这位科学家认为，“勃朗施坦喜欢这个姓氏，当然，他是根据德语（和意第绪语）单词‘Trotz’（意为‘尽管’、‘反对’）推导出这个姓氏的。他的另一个文学笔名——‘安蒂德-奥托’（Antid Oto）基本上重复了第一个笔名”。（托洛茨基把意大利语中的“antidoto”[意为“解毒剂”]变成了一个似名非名的名字）。

曾与托洛茨基一起入狱的齐夫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他认为“年轻的勃朗施坦格外喜欢敖德萨监狱典狱长这个具有代表性的专制形象”。对于身体不健康、情绪不稳定、一心想着自杀的布朗斯坦来说，托洛茨基是他被剥夺的一切的化身——体力、对自己行为不可动摇的信心，以及让他可以自由地让几十名囚犯服从自己意志的地位。心理学现在已经积累了大量数据，说明在自由的影响下人的思想会发生奇怪的转变。心理学家在分析二十世纪下半叶被绑架者的行为时发现，有些人在难以忍受的精神压力下，有时会站在绑架者一边，开始模仿他们的行为，甚至帮助他们。斯德哥尔摩劫持人质事件就描述了被绑架者的这种行为，这种情况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勃朗施坦对狱卒托洛茨基的崇拜也可以用类似的现象来解释。

内达瓦和瓦谢夫斯基的解释并非毫无根据。对托洛茨基的崇拜很难让勃朗施坦忘记，托洛茨基代表了他从小就憎恨的一切——蛮横无知的权力的胜利。列夫

-勃朗施坦在入狱前，最严重的失败和屈辱是在与比尔南德的校园故事中。从小就习惯了绅士子女地位的他，发现自己的处境比父亲庄园里的任何一个工人都要悲惨。他肮脏不堪，浑身都是虱子，就像那些引起他怜悯之心的劳动者一样。 甚至在托洛茨基撰写回忆录时，他都无法忘记自己被单独监禁数月而不换床单或肥皂时引起狱卒的怜悯之心。他被剥夺了任何一个最悲惨的穷人所拥有的自由。最后，他被那些他一生都习惯于蔑视他们的无知和野蛮的人统治着。

尽管他属于天选之子民（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属于知识分子（他们认为自己是俄罗斯社会中“最通情达理”的一部分），但他却被践踏得体无完肤。古代祖先的价值观、知识分子的态度在他眼中荡然无存。“勃朗施坦”这个姓氏将他与祖先联系在一起，而他从小就知道，他的祖先永远受到粗鲁无知的人的迫害。通过放弃祖先的姓氏，勃朗施坦与注定要顺从蛮力的命运决裂了。他不想再和那些永远诅咒死去已久的迫害者，却无法抵御现在主宰社会的力量的人在一起。他不想与那些像绵羊一样被驱赶到流放地，任由他们隔着大洋和大陆对俄国大声咒骂的人在一起。

一个终其一生都无法原谅学校老师在他二年级时对他的惩罚的人，很难原谅他在狱中所遭受的严峻考验和屈辱。他很可能认为是制度、国家、整个国家对他的折磨有罪。为了今后不再遭受类似的失败和屈辱，他不仅要放弃许多让他束手无策的东西，还要具备胜利者所拥有的品质。为此，他必须变得像监狱长托洛茨基那样坚强、残忍和对他人的痛苦麻木不仁。

显然，改名是他性格深刻转变的结果，并非一日之功。

# 第 六 章

## 从泰加森林到不列颠海岸[107]

持续了近两年的“南俄工人协会”案件调查终于结束了。未经审判就作出了判决：流放西伯利亚四年。在前往西伯利亚的途中，勃朗施坦在莫斯科的布蒂尔监狱度过了 6 个月。在这里，他第一次听说了列宁，并阅读了列宁的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1899 年底，他在布蒂尔监狱与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举行了婚礼。婚礼由犹太拉比主持。托洛茨基在他的回忆录中叙述了他一生中的这一重要事件，他说得非常干脆：

> “我和在尼古拉耶夫时的亲密战友亚历山德拉•利沃夫娜一起被流放到这里。她是南俄工人协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她把全部的热情都投入到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事业中，毫无私心杂念，这为她赢得了很高的威望。共同的事业使我们走到了一起。为了不会在流放中被分开，我们在莫斯科羁押解送监狱的时候结了婚”。[108]

正如多伊彻正确指出的那样，如果从表面上看，人们可能会认为勃朗施坦和索科洛夫斯卡娅认为他们的婚姻是假的。

然而，应该记住的是，托洛茨基是在与索科洛夫斯卡娅分居并与另一个女人结婚很久之后才写回忆录的。婚礼和这对年轻夫妇前往流放地途中的目击者说，勃朗斯坦夫妇的表现就像一对新婚夫妇通常所做的那样。他们离开了监狱，离开了像托洛茨基这样严厉的监工，克服了长途跋涉的磨难，这对年轻夫妇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开始了他们的共同生活。

勃朗施坦一家定居在乌斯季库特这个被遗弃的淘金村，托洛茨基说：

> “乌斯基库特村也见证了早年的那段伴随着放纵淫乐、尔虞我诈、盗匪横行的繁荣时期，但是到我们去那里的时候这一切已经归于沉寂了，当然酗酒无度的风气保留了下来。我们住的那家的主人就是一对嗜酒如命的家伙。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生活黯淡无光、毫无生气。晚上蟑螂成群，肆无忌惮地爬到桌子上、床上甚至人的脸上，发出令人厌恶的的声音。我们经常冒着零下 30 度的严寒搬到屋子外面住上一两天，并敞着房门。而夏天的蚊子更加可怕，有一头在森林里迷路的母牛竟被蚊子咬死了。当地农民为了防止被蚊子叮咬，在头上套着涂了柏油的马鬃网。到了春秋季节，村庄就会陷于一片泥泞之中”。[109]

即使是针叶林也没有让勃朗施坦高兴起来，他说“大自然是美丽的”，但随即又说：

> “只是在那个年月我对此却毫无兴趣，因为我不会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欣赏美景上。周围森林环抱、旁边大河奔流，而我对这些却从未留意”。[110]

---

[107] 来源于《红军最强大》的另一版本的歌词。——译者。
[108]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九章 第一次被流放”，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109]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九章 第一次被流放”，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110]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九章 第一次被流放”，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任何一个经过漫长而艰难的旅途，穿越西伯利亚来到流放地的人，都会有一种阴郁的感觉，即使是美丽的大自然也会让他无动于衷。在勃朗施坦夫妇踏上艰难的流亡之路的十年前，同样的道路穿过西伯利亚，前往萨哈林岛的是契诃夫。在他的西伯利亚速写中，作家特别提到了流亡者的处境：

“知识分子在来到流放地后最初都显出惘然若失和大为惊愕的样子；他们畏畏缩缩，仿佛受尽折磨一样……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开头陆续卖掉自己的荷兰亚麻布衬衣、床单、头巾，最后，过了两三年，都死于极端的贫困之中……另一些人逐步找到一些事情来做，情况有所好转；他们做律师工作，给地方报纸写文章，去当司书等等。他们的月工资很少超过三十到三十五卢布”。[111]

流亡者被剥夺了自由，物质生活困难重重，他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容易导致道德沦丧的环境中。契诃夫写道：

“当地的知识分子，有思想的和没有思想的，从早到晚喝伏特加，喝得不专业，粗鲁而愚蠢，不知道分寸，不醉不归；客套两句之后，当地的知识分子一定会问你一个问题：‘喝不喝伏特加？’出于无聊，流亡者会和他一起喝酒，起初他皱皱鼻子，后来就习惯了，最后当然就烂醉了。如果我们谈论醉酒，那么不是流亡者使民众士气低落，而是流亡者的民众使流亡者士气低落”。

这些观察与托洛茨基的印象不谋而合，他写道：

“有些流放者被环境同化了，尤其是在城市中，而另有一些人则酗酒沉沦”。[112]

然而，与契诃夫不同的是，托洛茨基认为流亡者精神不健康的原因在于他们集体中经常出现的争吵：

“思想上的分歧导致了在不同派别之间的激烈争论，这在流放地是很常见的。私人之间的恩怨，尤其是由那些浪漫生活引发的冲突，往往带来悲剧性的结果，甚至引起一些自杀事件的发生”。[113]

托洛茨基在讲述他的流亡熟人中发生的一起自杀事件时说：

“在所有较大的流放区内都有自杀者的坟墓”。[114]

然而，勃朗施坦并没有失去理智，没有酗酒，也没有试图自杀。这对年轻夫妇现在不得不照顾他们的女儿齐娜，她于 1900 年底出生。1902 年年中，另一个女儿妮娜出生了。

列夫的父亲可能帮助过勃朗施坦一家（他几乎在 1917 年革命前一直为儿子提供经济援助），但这个年轻家庭的一家之主试图寻找一份独立的收入。为此，勃朗施坦从乌斯季库格转到了伊利姆河畔的另一个村庄，在那里他为当地的一位富人找到了一份办事员的工作。然而，勃朗施坦在亚诺夫卡的暑假期间获得的会计经验并不多。据托洛茨基说，他只干了一个半月，因为他有一次“把一俄磅红丹写成一普特，并且把这张奇怪的账单寄到了远方的一个店铺那里。我声名扫地，只好辞职，我们返回到乌斯基库特”。[115]

冬天，在西伯利亚 40 度的严寒中乘坐雪橇走 250 英里的路并不容易。勃朗

---

[111]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2006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十二章 无自由生活的考验”校对。

[112]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九章 第一次被流放”，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113]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九章 第一次被流放”，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114]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九章 第一次被流放”，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115]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九章 第一次被流放”，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施坦膝上坐着 10 个月大的齐娜，她“头上套着一个皮筒用来呼吸。们每停下一次，就担心地掀开褪裸看看她”。[116]

勃朗施坦一家没有在乌斯季库特久留，很快就搬到了上霍伦斯基。无论是在乌斯季库特还是在上霍伦斯基，勃朗施坦都没有再尝试受雇工作。不过，此时他已经选择了一种能给家庭带来一些收入的职业。在乌斯季库特期间，他开始与伊尔库斯克报纸《东方评论》合作。他用笔名“安蒂德-奥托”[117]发表了几篇关于西伯利亚乡村生活的散文，随后开始撰写文学评论。在学校的学习和在施宾策尔家的成长没有白费。他评论了“易卜生、霍普特曼和尼采、莫泊桑和爱斯托尼、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和高尔基的作品”。勃朗施坦工作很努力，用他的话说，他“彻夜写作，探寻有价值的思想，对稿子反复推敲字斟句酌”。勃朗施坦“成了一名作家”。他的文章质量令编辑们满意，他也不乏订单。此外，他说：

>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不久报社把我的稿酬从每行两戈比提高到了每行四戈比，这充分说明我的成功”。[118]

家庭生活、照顾年幼的孩子和艰苦的文学创作并没有让勃朗施坦沉沦。他继续自学，尽管对《资本论》的研究进展缓慢。他回忆说：

> “我一边研究马克思的著作，一边忙着驱赶书页中的蟑螂”。[119]

他声称，甚至在到达乌斯季库特之前，他就已经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并指出“到我被流放之前，马克思主才彻底成为我的世界观的基础和思维方法”。[120]在流亡期间，他曾多次与流亡的民粹派争论，批评他们的观点。然而，他仍然没有研究工人阶级的状况或工人运动的经验。虽然他写了几篇关于西伯利亚农村的文章，但缺乏深入的社会分析。

勃朗施坦将人们对改革后乡村的普遍看法延伸到西伯利亚乡村，并以他对乌斯季库特这个废弃的掘金村的印象加以说明，他语重心长地说：

> “我们的村庄在经济上被土豪掠夺，在物质上被各种流行病侵袭，最后，在精神上，它处于一种集中的黑暗之中”。

尽管契诃夫与勃朗斯坦不同，他是西伯利亚的旅行者，但他留下了更多生动的素描，让人们注意到西伯利亚村庄与俄罗斯中部村庄的不同。

契诃夫对西伯利亚村庄缺乏美学设计感到惋惜，他钦佩西伯利亚人的勤劳，因为他们必须在极其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履行农民的职责。他还注意到西伯利亚普通农民富裕的物质生活，他们的小屋整洁有序：

> “厨房是一个宽敞明亮的房间，里面的家具是我们库尔斯克人或莫斯科人梦寐以求的。干净得令人吃惊：没有一点污渍，没有一点斑点。墙壁是白色的，地板必须是木地板，或涂上油漆，或铺上彩色帆布；有两张桌子、一张沙发、一把椅子、一个放餐具的橱柜”。

在勃朗施坦的西伯利亚乡村素描中却找不到这样的作品。这很可能是因为，契诃夫是为了参加全俄人口普查，并借助这一社会学研究加深对人的了解而被送往萨哈林监狱的，而勃朗施坦则不同，他感兴趣的问题与该国大多数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相去甚远。托洛茨基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

[116]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九章 第一次被流放”，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117] 托洛茨基：“我翻开意大利文字典给自己取笔名，一眼就看到“解毒剂”这个单词。在后来好几年的时间里我的文章都用安季特·奥托来署名。我跟朋友们开玩笑说，我想把马克思主义的解毒剂注射到他们的合法报纸里去”。（第九章 第一次被流放）
[118]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九章 第一次被流放”，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119]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九章 第一次被流放”，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120]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九章 第一次被流放”，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现在，在流放中我尽量以这种新的方法去思考所谓‘永恒’的人生主题，例如爱情、死亡、友谊、乐观、悲观等。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人们的爱、憎和希望是各不相同的。如同树通过根从土壤中吸收养分来供给自己的花朵和果实一样，个人也是通过社会的经济基础汲取营养来培育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哪怕是“最崇高的”思想也是如此。那个时期我写的文学评论几乎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个人与社会的关系”。[121]

这一主题使勃朗施坦得以思考强势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抗问题，尤其是在他关于弗里德里希-尼采和易卜生作品的文章中。在谴责对尼采“金发兽性”的崇拜的同时，勃朗施坦也支持这位德国哲学家与资产阶级的不可调和性。在批评易卜生笔下一些人物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同时，勃朗施坦赞赏挪威剧作家对布尔乔亚道德的立场，他与易卜生笔下的人物一样蔑视无知的“群众”：“如果让‘群众’来决定这种或那种科学理论或哲学体系的正确性是荒谬的”，勃朗施坦指出，“易卜生是千真万确的”。

安蒂德-奥托的哲理散文也是基于一个强大的人格，一个先进思想的载体，呼唤人们走向光明的未来，与一个受原始本能感染的无知人群的对立。在一篇献给新二十世纪初的文章中，勃朗施坦选择了一个从宇宙距离看地球的视角，把自己想象成银河系的一颗星星：

“只要我呼吸，我就希望！……如果我过着天体的生活，我将完全漠视一粒可悲的泥土.....我将同样照耀邪恶和善良”。

勃朗施坦在总结上个世纪时写道，十九世纪带来的失望多于成就。勃朗施坦问道，“新的二十世纪给人类带来了什么？”并回答道：

“在法国——种族仇恨的毒泡沫；[122]

在奥地利——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的民族主义撕咬；

在南非——一个小国被巨兽屠杀的痛苦；[123]

在‘自由’岛国本身[124]——为金戈主义者[125]的贪婪胜利而唱的凯歌”（59，т.1，78）。

在作者看来，20 世纪似乎在宣告“乌托邦去死！信仰去死！爱情去死！希望灭亡！放弃吧，梦想家！我，万众期待的 20 世纪，已经来临！我就是你们的未来！”但这位梦想家兼作家却大胆地回答 20 世纪的开端：

“不！你只是现在！”

勃朗施坦宣称：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我就要为未来而奋斗，为那个光芒四射、光明灿烂的未来而奋斗！在那个未来里，人类将成为自己历史的主人，将自己的历史引向美丽、欢乐和幸福的无边无际的地平线！”

尽管托洛茨基保证他在《东方评论》上发表的文章是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但我们很难认同。许多俄国知识分子，包括那些与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的人，都表达了对 20 世纪进步性的信念以及对德雷福斯事件和布尔人的支持。

就在勃朗施坦评论尼采和易卜生的作品，指责英国对布尔人的战争和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时，俄国发生了一些事件，对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继 1891 年的严重饥荒和 1897 年、1898 年的粮食短缺之后，1901 年的饥荒导致

---

121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九章 第一次被流放”，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122 指德雷福斯事件。——作者注。
123 这是关于英布战争的。——作者注。
124 他讽刺地称英国为‘自由’岛国。——作者注。
125 英国沙文主义者的称谓。——作者注。

大部分农民的境况恶化。农村自发地爆发了农民起义。波尔塔瓦省和哈尔科夫省爆发的农民起义尤为激烈。

1900-1903 年的经济危机导致 3000 家企业倒闭，解雇了 112000 名工人。工人们为争取自身权利而进行的抗议演变成了政治斗争。1901 年 5 月，圣彼得堡工人的“奥布霍夫保卫战”成为全国头条新闻，工人们以积极的抵抗回应了警察镇压罢工的企图。从 1901 年春开始，政治示威活动遍布全国，从圣彼得堡到巴库。工人们在革命斗争中变得越来越积极。在 90 年代，被捕的革命者中工人不到六分之一，而在 1901-1903 年，他们几乎占了一半。1901 年 2 月和 3 月，工人和学生在圣彼得堡、莫斯科、哈尔科夫、基辅、喀山和托木斯克举行了示威游行。

国内发生的事件使许多反对现存制度的人相信，理想的革命已为期不远。根据“奥布霍夫保卫战”的经验，列宁在 1901 年秋提出了准备人民起义的任务。

越来越多具有革命思想的人赞同这种想法，这促进了新的马克思主义组织的建立。1901 年，在托木斯克工人的倡议下，成立了西伯利亚社会民主联盟。起初，它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外的一个独立组织，直到 1903 年 1 月，西伯利亚联盟才宣布自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一个委员会。

勃朗施坦与西伯利亚联盟伊尔库茨克小组建立了联系，并开始为其撰写宣言。勃朗施坦在尼古拉耶夫已经有了地下活动的经验和研究共济会的经验，现在又开始从事革命活动。托洛茨基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

> “我通过对共济会的研究，明白了思想在历史进程中的推动作用。‘思想不会从天而降’。我常常重复老拉布里奥拉的这句话。现在的事情已经与纯科学的兴趣无关，而涉及政治道路的选择”。[126]

勃朗施坦显然想到了共济会的组织形式，他在一篇文章中论证了“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党的必要性”。正如他曾经努力让狱友们熟悉他关于共济会的著作一样，勃朗施坦也在流亡者中散发了他的文章。

直到 1902 年夏天，勃朗施坦才了解到，类似的想法早已在仍然四分五裂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队伍中流传。

1898 年 3 月在明斯克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虽然宣布成立一个统一的党，但并没有实现这一目标。代表大会的所有代表和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会在大会结束后被捕，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一如既往地被剥夺了党的中央机关。建立全俄社会民主党的协调工作由《火星报》编辑部接手，该报自 1900 年 12 月起在慕尼黑出版，1902 年 4 月起在伦敦出版。该报编辑部的成员既包括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创始人（普列汉诺夫、阿克塞尔罗德、扎苏利奇），也包括已经具有丰富革命活动经验的社会民主运动的年轻成员（列宁、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列宁的妻子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担任了编辑部秘书。

列宁在《火星报》上概述了他的计划，即借助报纸建立一个组织严密、中央集权的党。在《从何着手？》一文中，列宁指出，党是无产阶级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总部，不知疲倦地开展革命工作。

1902 年 5 月，弗-伊-列宁的小册子《怎么办？》出版，其中规定了在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带入无产阶级的政党领导下，将无产阶级自发的经济斗争发展为政治斗争的原则。列宁呼吁道：

> “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斗争’。

[126]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九章 第一次被流放”，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

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127]

1902 年 6 月，《火星报》出版了一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

有关俄国地下革命组织生活的消息迟迟才传到流放地区。这些消息通常是由新的流亡者带来的。托洛茨基回忆说，他热切地等待着下一批流亡者的到来，他们途经上霍伦斯基。正是在这里，勃朗施坦第一次见到了被流放到勒拿河上游的捷尔任斯基和乌里茨基这两位未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领袖。

他从到达上霍伦斯基的革命者那里第一次得知，《火星报》已经在国外成立，它的任务是建立一个由职业革命者组成的中央集权组织，以铁的纪律约束自己的行动。

> “列宁在日内瓦出版的《怎么办？》一书也传到这里，全书都是在论述这个问题。面对伟大的新任务，我觉得我的专题论文、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以及为社会民主党西伯利亚同盟写的宣言实在是太微不足道和浅薄了”。[128]

这个消息让勃朗施坦得出结论：

> “寻找新的活动领域”。[129]

他的工作可以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全俄中央集权党。同时，他不想满足于在外围执行中央领导层指示的普通角色，而是希望积极参与地下革命总指挥部的决策。因此，他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 “我应该逃出这里”。[130]

然而，逃跑意味着他不得不将两个年幼女儿的照顾和抚养权交给妻子亚历山德拉。正如托洛茨基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

> “西伯利亚的生活十分严酷，我的逃走将给亚历山德拉·利沃夫娜增加沉重的负担。但是她只用一个词：‘必须’来回答我。在她看来，革命的使命高于一切”。[131]

托洛茨基写道，此时——

> “逃亡事件像流感一样迅速蔓延开来。我们不得不定下逃跑的顺序。几乎每个村子里都有自幼深受革命先辈影响的农民，他们秘密地用小船、大车和雪橇把政治犯们辗转送出西伯利亚。其实西伯利亚的警察也和我们一样无能为力。这里广阔的空间对逃亡者有利。逃亡者虽然很难被抓住，但是他们掉到河里淹死或者在森林里冻死的可能性也不小”。[132]

事实上，当地居民并没有受到革命者的“宣传”，他们只是对“受害者”表现出了俄罗斯人特有的态度，这种态度的基础是一句著名的俄罗斯谚语：“监狱和牢房是不安全的”。赫尔岑在他的《过去和杜马》一书中这样写道：

> “老百姓对流亡者的敌意更小，他们一般都站在受惩罚者一边。——在西伯利亚边境附近，‘流放者’一词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不幸者’。在俄罗斯人眼里，法院的判决会玷污一个人。在彼尔姆省通往朵伯利斯克的公路上，农民们经常在一个小窗口里放上伏特加、牛奶和面包，让‘不幸的人’偷偷溜出西伯利亚”。

---

[127] 列宁《怎么办？》“四 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革命家的组织”，《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6 卷。
[128]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九章 第一次被流放”，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129]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九章 第一次被流放”，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130]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九章 第一次被流放”，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131]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九章 第一次被流放”，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132]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九章 第一次被流放”，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前苏联时期，瓦西里-舒克申在他的故事《猎活》中描绘了西伯利亚村民对逃犯的类似态度。

1902 年 6 月 12 日，以生病为借口留在上霍伦斯基的捷尔任斯基逃离流放地。1902 年 8 月 21 日，勃朗施坦逃离了同一个城市。

亚历山德拉-勃朗施坦想尽一切办法，确保这次越狱尽可能长时间地不被发现。逃跑后的第二天，她指着草棚，让宪兵相信她的丈夫病了，正在睡觉。亚历山德拉当时还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带着两个孩子离开西伯利亚。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导致了婚姻的破裂。

仅仅两天后，一封电报从上霍伦斯基发来：

> “致总督：
>
> 昨天，列夫-勃朗施坦，23 岁，身高 2.5 俄尺，棕色头发，双下巴，戴眼镜，根据他妻子的陈述，勃朗施坦离开了伊尔库茨克。
>
> 抄送警官
>
> 区督察 路德维希”。

与此同时，列夫-勃朗施坦正和另一名流亡逃犯一起乘车前往铁路。在途中，同伴们分头行动，以增加抓捕他们的难度。托洛茨基回忆说：

> “我顺利地上了火车，在车厢里伊尔库斯克的朋友给我准备了一个行李箱，里面装了浆洗过的衬衣、领带和其他一些具有文明意味的物品。我手中拿着一本格涅基奇按六音部诗体译成的荷马史诗”。[133]

在西伯利亚车站，勃朗施坦在一本假护照上写下了托洛茨基的姓氏。

一个姓敖德萨狱卒的人登上了一列开往西方的火车。不久前，《东方评论》发表了他关于格列布-乌斯宾斯基之死的文章，文章引用了死者的作品，称他必须“忘记自己的过去”，才能找到新的身份。或许，这种想法与乘客的心情不谋而合。然而，在后来的《我的生活》中，他只记得自己曾在路上读过《荷马史诗》。

在萨马拉，托洛茨基从西伯利亚来到这里，俄罗斯《火星报》组织主席团主席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接见了他。主席团的秘书工作由克尔日扎诺夫斯卡娅和列宁的妹妹乌里扬诺娃负责。

在结识了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及其随从——这位早已被遗忘的“南俄工人协会”的成员，只有《东方评论》的读者才知道——之后，这位创作了大量文学素描的作家便进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人物的圈子。此时，脍炙人口的革命歌曲《瓦尔沙维扬卡》的作者格列布-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当时以阴谋论的绰号“克莱尔”为人所知）已经有了参加革命运动的丰富经验。“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失败后，他被流放到米努辛斯克区。流放期间，他在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上签了名，这是反对“经济派”斗争的一个重要阶段。从那时起，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就一直站在列宁一边。

托洛茨基到达萨马拉时，俄国组织局正在积极实施列宁的建党计划。此时，列宁从伦敦（当时《火星报》正在伦敦出版）寄来了一封富有启发性的《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信中建议取消把党委会分为两个的做法——一个是工人委员会，另一个是知识分子委员会。列宁建议，应特别努力在工厂建立委员会。他写道：

---

[133]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十章 第一次逃跑”，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每个工厂都应当成为我们的堡垒”。[134]

早在 1902 年 4 月 23 日，[135]列宁就在给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

“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为这一点作好准备，就是说，使完全是自己的人能进入尽可能多的委员会去……这是主要的任务，因为否则我们必然会被排挤掉：一切其他的事情必须服从这个任务，要记住第二次代表大会最重要的意义！

……

总之，再说一次：务必参加委员会”。[136]

当时，大部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及其个别地下组织都忙于地方事务，极不团结。通过俄罗斯组织局，“《火星报》代理人”被派往全国各个城市。他们的任务是帮助加强地方委员会与《火星报》的联系，从而建立一个团结的党。这些“特工”包括党内最值得信赖的成员，他们在革命工作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

我们完全不清楚托洛茨基是出于什么原因受主席团指示视察哈尔科夫、波尔塔瓦和基辅的党组织。毕竟，他不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只是与西伯利亚联盟合作，但并未成为其成员。此外，该组织当时还不是全俄党组织的一部分。谁会推荐托洛茨基以及推荐内容是什么也不清楚。他所有的政治工作经验都仅限于为“南俄工人协会”和“西伯利亚联盟”撰写几篇宣言。东西伯利亚只有少数人知道他关于建立中央集权党的好处的摘要。他的文学经历也不为该地区以外的人所知。当时，托洛茨基还没有机会成为征服大众的杰出演说家。

此时，托洛茨基唯一一部有分量的著作是他关于共济会的手写本。不正是这部著作帮助托洛茨基找到了进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部的机会吗？后来人们知道，1917 年加入临时政府的一些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知名人士都是共济会员。在 1902 年的社会民主党人中也可能有“自由共济会员”。这些人可以为热衷于深入研究共济会历史的人提供支持。他们在推动托洛茨基前进的过程中提供的帮助，后来可能会被托洛茨基所利用。然而，我们没有任何文件证据表明共济会参与了提名托洛茨基为“《火星报》代理人”。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萨马拉中心的其他领导人对他完成任务的方式很不满意。托洛茨基说：

“由于在南方这些组织的联系还很薄弱，在哈尔科夫连接头地址都不对，在波尔塔瓦遭遇了地方主义，所以我一无所获地回到了萨马拉”。[137]

然而，当托洛茨基回到萨马拉时，却发现他被召到了伦敦《火星报》编辑部。托洛茨基写道：

“同时，和萨马拉委员会保持着密切通讯联系的列宁也一再催促我出国”。[138]

这又让人产生疑问：列宁从未听说过托洛茨基，为何突然开始召他去伦敦，甚至要求加快他离开的速度？我们可以假设，列宁只是从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他在萨马拉分局工作的妹妹的口中得知托洛茨基的。但是，他们为什么突然决定推荐托洛茨基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移民领导职务呢？托洛茨基和支持他的传记作者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们默认，任何见过托洛茨基的人都不会不注意到他的优秀品质。最有可能的是，托洛茨基是由认识他并长期追随他的人推荐的。我们

---

[134] 列宁《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7 卷。

[135] 日期有误，应该是 1902 年 5 月 6 日。4 月 23 日是给阿克雪里罗得的信。——译者。

[136] 列宁《致格 • 马 •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1902 年 5 月 6 日）》，《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44 卷。

[137]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十章 第一次逃跑”，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138]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十章 第一次逃跑”，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不能逃避的印象是，一些有能力对俄国社会民主运动施加影响的人正在坚持不懈地、迅速地把一个迄今为止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推向前台。

前往伦敦需要向托洛茨基提供必要的资金，并让他熟悉非法越境制度。据托洛茨基说，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给我提供了出国的经费，并给了我一些从加米涅茨一波多里斯克附近穿越奥地利边境的必要提示”。[139]据称，托洛茨基的新笔名就是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起的。这个假名叫做“笔尖”。显然，人们由此认为，他的门徒的显著特点是能够从事文学活动，而且可以在《火星报》编辑部使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托洛茨基在他的传记中浓墨重彩地描述了他从萨马拉到伦敦的充满冒险的旅程。从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出，这位旅行者在旅途中一旦遇到任何困难，就会毫不犹豫地去打扰，不仅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重要人物，而且还有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重要人物。因此，当他发现自己在维也纳没有资金时，便要求立即让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克多-阿德勒接见他。该党的主要机关报《劳动报》的编辑弗里德里希-奥斯特利茨强烈反对任何人在周日打扰维克多-阿德勒，哪怕是报道沙皇在俄国被杀和革命已经发生的消息。在与阿德勒预约后，他从他那里获得了再次前往欧洲所需的资金。

在托洛茨基前往的苏黎世，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著名人物阿克雪里罗德在那里生活和工作。在描述这位党内元老时，多伊彻试图强调是什么让他与托洛茨基走得更近，他说：“阿克雪里罗德是南乌克兰犹太人，就像托洛茨基一样”。根据多伊彻的说法，“阿克雪里罗德将政治职业与实践活动相结合。与许多移民不同，阿克雪里罗德组织了一个小型乳品加工企业.....他留着宽大而凌乱的胡须，看起来更像一个俄罗斯拉比，而不是一个革命政治家”。

虽然阿克雪里罗德不是崩得党团的成员，但他经常把俄国工人运动的问题与犹太人的具体情况联系起来。他写道：

> “犹太社会主义者从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国际性这一绝对正确的立场出发，却犯了一个错误，即忽略了犹太人在俄国作为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相对立的实际地位……因此。俄国犹太社会主义者决不能在他们的活动中——基于世界主义的考虑——忽视专门的犹太群众，这正是因为‘本族居民’的群众不仅与世界主义的感情和观念还相去甚远，而且与帝国本身内部不同民族的下层阶级的团结观念也相去甚远”。

托洛茨基是在半夜抵达苏黎世的，但这并不妨碍他叫醒阿克雪里罗德，向他通报自己的到来。从表面上看，这位党内元老愿意原谅这位布尔乔亚主义者的冒失。从这次会面开始，托洛茨基和阿克雪里罗德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后来，托洛茨基在瑞士旅行期间经常住在阿克雪里罗德家。托洛茨基在 1904 年出版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我们的政治任务》的扉页上题词：

> “献给我亲爱的老师帕维尔-鲍里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德”。

不过，这一次托洛茨基没有在阿克雪里罗德家久留，而是从苏黎世前往巴黎，再从巴黎前往伦敦。

1902 年 10 月的一个清晨，里希特夫妇租住的伦敦公寓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几分钟后，里希特夫妇（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以这个姓氏住在伦敦）从床上爬起来，接待了一个化名为“笔尖”的年轻人。托洛茨基在解释他的轻佻行为时写道，他“当时还被促使我从维尔霍勒恩斯克逃出来的那股力量推动着”。[140]

---

[139]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十章 第一次逃跑”，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140]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十一章 第一次流亡国外”，2005 年东方出版社

但是，托洛茨基能向列宁和《火星报》的其他领导人提供什么来解释他为何能迅速出现在俄国和世界社会民主的“上流社会”中呢？托洛茨基自己也承认，他在匆忙穿越欧洲时带来的信息包袱是微不足道的。在列宁面前，托洛茨基“立刻就向他们讲了自己所知道的俄国国内的一些情况：党在南方的联系还不够紧密，哈尔科夫秘密联络点的地址是错误的，《南方工人报》拒绝合作，穿越俄奥边境的行动竟然是由一个不愿帮助火星派的中学生来负责的”。[141]用托洛茨基的话说，“列宁知道如何倾听”，所以他才能详细介绍所有这些并不重要的消息。

很明显，托洛茨基出现在泰晤士河畔时的推荐信假定，他抵达伦敦时将不仅仅是一个关于俄国社会民主生活的零碎和几乎不需要的信息的传递者，而是一个在革命运动中大有希望、具有巨大潜力的人。可能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列宁带托洛茨基去伦敦时，决定对他进行“不动声色地考查”。考察确实是“全方位”的。“那你们在理论方面的情况怎样？”——列宁问他。[142]托洛茨基急忙回答说，他从原始资料中研究了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之间的论战，但不得不承认，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研究至今停滞在第二卷。另一方面，托洛茨基说，他还在狱中时就读过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并对列宁的统计资料工作表示钦佩。

从下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与托洛茨基谈话后，列宁无法决定这位新来的移民到底应该在伦敦做些什么。托洛茨基承认：

> “在这次谈话中，我只是简要地说了自己的工作计划。我初步打算先在国外呆上一段时间，看一些新出的文献，熟悉一下环境，然后再作进一步的安排。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希望能秘密回国继续从事革命工作”。[143]

事实证明，托洛茨基从俄国到伦敦社会民主党运动中心的商务旅行需要大量的资金，并对精心组织的偷运革命者越境系统带来风险，尽管没有人知道在伦敦该如何处理托洛茨基，但托洛茨基还是进行了这次旅行。列宁、克尔日扎诺夫斯基、阿克雪里罗德，甚至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其领导人阿德勒不仅在金钱上帮助托洛茨基，甚至还为《劳动报》主编弗-奥斯特利茨对托洛茨基的苛刻待遇道歉）都对这次旅行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这使得这次旅行变得更加奇怪。为什么俄国和奥地利的主要社会民主党人如此关注一个 22 岁、刚刚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人的国外之行？

多伊彻不得不提出这个问题，并以托洛茨基内心独白的形式加以表述：

> “最重要的问题是：托洛茨基为什么被如此紧急地召往伦敦，他在那里要做什么？”

多伊彻不得不承认：

> “说实话，没有什么特别的任务在等着他”。

也许，几年前同样受到欧洲主要社会民主党人夸大关注的另一位俄国青年移民的类似命运的故事会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1886 年，19 岁的以色列-拉扎列维奇-盖尔芬德（又名“亚历山大-盖尔芬德”和“帕尔乌斯”）从敖德萨的一所中学毕业，来到瑞士，受到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其他领导成员的接见。在瑞士，盖尔芬德住在巴塞尔，并进入巴塞尔大学学习，于 1891 年毕业。虽然盖尔芬德

---

出版。

[141]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十一章 第一次流亡国外”，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142]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十一章 第一次流亡国外”，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143]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十一章 第一次流亡国外”，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以非常平庸的成绩完成了学业，但他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人物卡尔-考茨基和克拉拉-蔡特金的指导。

他在斯图加特定居下来，不久，24 岁的盖尔芬德开始在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报上发表文章。盖尔芬德的第一篇文章专门论述了谷物贸易在俄国、美国和西欧国家之间经济竞争中的重要性。盖尔芬德认为，俄国和美国很快就会剥夺西欧的世界经济霸权，其后果将是粮食价格上涨。

盖尔芬德拥有关于粮食市场的卓越信息的原因很简单：与托洛茨基一样，盖尔芬德也是敖德萨一个富有的粮食商人的儿子。他不断加强对世界粮食市场上这一主要商品的了解，并与这一领域有影响力的人士建立联系。

此时，盖尔芬德（从 1894 年起使用笔名帕尔乌斯）还没有德国国籍，这给他带来了一些不便。卡尔-考茨基和维克多-阿德勒之间有通信往来，内容涉及他们试图让帕尔乌斯获得德国或奥地利国籍。然而，这位没有国籍的人却在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生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他积极参加社民党代表大会，并成为一名极端激进分子。

在 1892 年发表于《新时代》（Neue Zeit）的一系列文章中，帕尔乌斯提出了政治罢工的观点，认为这是对抗资本主义制度的最有效方式。帕尔乌斯写道：

> “罢工造成的国家生活的分裂，将使党处于不得不做出‘基本决定’的境地；换句话说，党将不得不为争夺国家权力而展开公开斗争”。

在攻击伯恩施坦的同时，帕尔乌斯反对消极等待资本主义的崩溃。他呼吁德国社会民主党积极行动起来，他写道：

> “给我们六个月的政府暴力，资本主义社会就会成为历史”。

在 1898 年的斯图加特党代会上，他试图通过一项支持革命的决议，但社民党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以强硬的声明回应了帕尔乌斯的革命呼吁：

> “我们不会屈服于挑衅！”

帕尔乌斯很快放弃了他的革命呼吁，转而支持伯恩施坦，后者坚持要求社民党积极参与争取国会席位的斗争。1903 年在德累斯顿召开的社民党代表大会上，其领导人奥古斯特-倍倍尔嘲笑帕尔乌斯观点的戏剧性演变：

> “看看帕尔乌斯。不久前，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发誓，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不屈不挠的激进分子，而现在，这个引以为傲的激进主义堡垒，这个巨人.....成为一片废墟”。

帕尔乌斯积极参与社民党内部的党争，要么采取极左立场，要么采取中右立场，但他仍专注于研究世界市场问题，并在其政治活动中试图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强加给社民党。因此，他在 1900 年谴责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对美国、俄国和西欧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和竞争问题的忽视。他写道：

> “为了在这场激烈的竞争中获胜，西欧不可或缺的条件就是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将导致欧洲联邦的建立”。

他用俄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前景吓唬德国，并预测俄国将在未来 10-15 年内发展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1899 年，帕尔乌斯前往俄国。在经历了几年的歉收之后，他对俄国的粮食生产状况特别感兴趣。同时，他还试图找出该国社会和经济结构中最脆弱的一面。他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莱曼一起，以捷克奥古斯特-彭的名义，用假护照穿越了俄德边境。这次旅行的成果是他和莱曼共同撰写的一本书，他们在书中不顾俄国政府的“展览宣传”（指芝加哥和巴黎的展览），为俄国的内部弱点进行了考察。早在 1895 年，帕尔乌斯就预言日俄战争即将爆发，其后果将是俄国革命。现在，他在访问俄国后再次证明，俄国即将爆发一场轰轰

烈烈的革命，并敦促西欧支持即将到来的反对沙皇专制的革命。

由于帕尔乌斯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保持着联系，普列汉诺夫等人将他视为他们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谋取利益的渠道。帕尔乌斯在非法访问俄国期间会见了波特列索夫，在第二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896 年）召开前夕，波特列索夫甚至邀请帕尔乌斯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

起初，列宁对帕尔乌斯也有很高的评价。1899 年，列宁在评论帕尔乌斯的著作时，称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德国宣传家”，“他把世界市场的发展置于其著作的中心，并首先描述了随着英国工业霸权的衰落，这一发展最近经历了哪些阶段”。

一年后，当列宁在慕尼黑郊区的施瓦宾定居时亲自会见了他，当时帕尔乌斯就住在那里。泽曼和沙劳有理由写道：

> “在本世纪头五年，盖尔芬德在施瓦宾的公寓是真正的俄国移民中心……盖尔芬德在施瓦本的公寓里为一家非法印刷厂配备了一台现代化的印刷机，该印刷机有一个特殊装置，可以瞬间分散印刷，这是为了防止警察可能进行的突袭。这台印刷机共印刷了八期《火星报》”。

帕尔乌斯在《火星报》的活动中以及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联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使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听取了他的建议和请求。如果他向俄国本地人寻求帮助，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也不可能拒绝。如果我们假设大卫-勃朗施坦在得知儿子逃离西伯利亚的消息后，请求他在谷物贸易方面的同事拉扎尔-盖尔芬德通过他的儿子帮助列夫逃离俄国并在国外定居，那么帕尔乌斯就有可能在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朋友的帮助下答应这一请求。列宁有可能通过他的兄弟德米特里与敖德萨的党组织建立了联系，而德米特里当时正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层在敖德萨。（列宁与敖德萨的密切关系还体现在他代表敖德萨社会民主党出席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尽管他本人从未去过敖德萨）。可能就是这种情况，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在萨马拉更加关注托洛茨基，然后托洛茨基又突然被召到伦敦。

这一假设可以通过以下说法予以否定：

> “即使大卫–勃朗施坦向盖尔凡德家族求助，他也不会有任何收获。以色列–盖尔芬德早就离开了敖德萨，不再与敖德萨的谷物商人有任何关系”。

然而，以色列-盖尔芬德的命运证明，他从未与谷物商人的世界断绝关系。虽然盖尔芬德-帕尔乌斯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投身于德国和俄国的社会民主运动，但他最终还是回到了父母的职业中。盖尔芬德-帕尔乌斯传记作者泽曼和沙劳写道：

> “他选择了与敖德萨商人相同的道路：黑海沿岸的谷物贸易成为他经济成功的基础。从 1911 年开始，帕尔乌斯积极从事谷物批发贸易，并很快成为欧洲最富有的谷物贸易商之一”。

为什么一个商人出身和倾向于社会民主运动？许多历史学家在谈到帕尔乌斯时，总是称他为“冒险家”，暗示他对冒险的热情是最重要的。但是，为什么不认为以色列-盖尔芬德暂时放弃商业活动，是为了满足他的亲戚、朋友或他父亲圈子里的人的愿望，这些人派他进入社会民主运动的队伍，以便收集有价值的信息并影响其活动呢？

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所有国家都在等待着世界和地方战争、世界和民族革命的爆发，对机密信息的秘密搜寻变得异常活跃。与此同时，国家和其他组织试图影响未来全球和地方冲突的准备和发展的行动也成倍增加。

最重要的关注对象之一是社会民主运动。十九世纪末，世界社会民主运动迅速发展，试图在全新的社会主义基础上重建世界。少数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如米尔杰兰或伯恩斯坦，谈论与资本合作，或在实践中进行这种合作，却遭到党内其他同志的无情谴责。世界上所有国家的警察都派遣特工进入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了解他们的所有意图，并试图把他们的活动引向当局所希望的方向。在俄国，当时有人试图把工人运动置于警察的控制之下（即所谓的“祖巴托夫运动”）。

不仅是警察，世界主要国家的资产阶级也在焦急地注视着世界社会民主的成功。对粮食生产者来说，革命首先意味着粮食市场的灾难性动荡，因此他们可能会特别积极。从传说中的约瑟夫时代起，人们就知道，在知道大灾难即将来临的情况下，就有可能积累粮食，以防止饥荒或出售粮食获取巨额利润。此外，世界各地的谷物商人，包括亚诺夫卡大卫-勃朗施坦，都知道即使是遥远的阿根廷发生的事件，也会反映在乌克兰南部谷物生产者的繁荣上。因此，世界谷物贸易始终需要掌握世界不同地区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的可靠信息。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他们试图采取对自己最有利的行动。

从帕尔乌斯在社会民主党人中的活动来看，他不仅利用自己的地位积极收集有关欧洲和北美主要国家经济和政治形势的信息，还从世界粮食贸易的利益出发影响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活方向。例如，帕尔乌斯在其文章中不断坚持的自由贸易或建立欧洲联邦的要求，就符合谷物贸易商的利益，他们希望消除众多的关税壁垒。在革命危机期间，也为谷物投机商创造了大量致富机会。在远离革命动乱中心的国家及时购买谷物，可以让幸运的谷物商人在短短几天内致富。这可能就是帕尔乌斯将俄国视为可能爆发革命风暴的国家的原因。此外，从帕尔乌斯的行动来看，他试图加速这场风暴的到来。

但是，如果可以解释为什么谷物种植者愿意派人加入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为什么社会民主党会容忍来自敌视他们的阶级的人出现在他们中间呢？一方面，有大量证据表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革命组织在长期面临资金短缺的情况下，总是乐于接受富人的资助，暂时忘记了自己是在反对这些财阀的统治。十九世纪末，接受资本家捐款的不仅仅是外国联合会。“劳动解放社”不仅接受了敖德萨工人的帮助，还接受了其他阶级的帮助。以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不止一次地接受了俄国大资本家的大量金钱捐助。这些捐款不太可能是绝对无私的。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捐赠者获得了在他们需要的经济领域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或影响政策的机会。

另一方面，欧洲的革命者可能强烈地感到，他们需要与谷物贸易中消息灵通人士建立联系。与谷物商人希望确切知道何时何地会发生社会和政治灾难一样，革命者也希望确切知道何时何地会发生粮食短缺。至少自 1789-1794 年法国大革命以来，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城市粮食供应的中断为社会和政治动荡创造了可靠的先决条件。造成这种供应中断的原因不是变幻莫测的天气，而是粮食投机商的阴谋诡计。在欧洲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帕尔乌斯是一个能够对世界粮食市场的状况做出可靠预测，并对世界各国粮食商人可能采取的行动提出合理建议的人。

然而，我们只能猜测帕尔乌斯在世界历史上扮演的多重角色。帕尔乌斯和其他与秘密组织活动有关的人一样，用他的传记作者泽曼和沙劳的话说，他“神秘到了狂热的地步，喜欢创造关于自己的传奇，为自己的名字披上一层厚厚的神秘面纱”。

帕尔乌斯可能不是唯一一个将国际谷物生产商和世界革命者的部分一致利

益联系在一起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托洛茨基不过是 20 世纪初连接政治和阶级对立者的复杂纽带系统中的另一个环节而已。因此，1902 年，欧洲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向敖德萨谷物商人家族的下一代敞开了大门，并为他在西欧的居留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

托洛茨基在研究了共济会的历史后，1902 年秋天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件符合他的想法，即一个秘密组织的普通成员在赢得最高领导人的认可后，应该如何崛起，他在等待进一步的事件发生。至于托洛茨基的赞助人，他们决定先看看自己的门徒能做些什么。

# 第 七 章

# 政治天空中的新星

托洛茨基抵达后的第一天，就住进了《火星报》的两位领导人马尔托夫和扎苏利奇的家。多伊彻认为，托洛茨基与马尔托夫和扎苏利奇的邻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在政治上与他们的和解，而不是与住在另一栋房子里的列宁的和解。朱利叶斯-马尔托夫比托洛茨基大七岁，根据多伊彻的说法，他“出身于一个著名犹太学者的古老家族”。作为“崩得”的创始人之一和该党纲领的起草人，他很快离开了“崩得”，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马尔托夫很快与托洛茨基走得很近。然而，托洛茨基与维拉-扎苏里奇之间较大的年龄差距以及民族和社会背景的差异，并不妨碍后者对这位新移民表示善意。

起初，托洛茨基阅读《火星报》和《黎明报》出版社出版的书籍。不久，他尝试自己为《火星报》写读书笔记。

托洛茨基在 1902 年 11 月 1 日出版的《火星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专门讨论了俄国庆祝彼得大帝建立什利谢尔堡要塞 200 周年的活动。托洛茨基提醒说，庆典要塞曾被用作监狱，并谴责“爱国狂欢”。在下一期《火星报》上发表的《斯拉夫主义的鲨鱼》一文中，他再次抨击了俄国的爱国主义，“泛斯拉夫兄弟情谊的思想”。在第三篇文章中，他抨击了芬兰的“俄罗斯化政策”。

普列汉诺夫在熟读了托洛茨基拟在《火星报》上发表的第一批文学评论尝试后，坚决地宣布：

“我不喜欢‘笔尖’你的文笔”。

托洛茨基继续写作，但为了满足普列汉诺夫的要求，列宁不得不对这位年轻作家的文章进行了彻底修改，删去了他华而不实的词句和华丽的辞藻。

托洛茨基很快就找到了一项活动，可以让他在更大程度上证明自己适合担任党的领导。他被指派参加与其他革命移民的辩论。在辩论中，年轻且文化水平不高的托洛茨基似乎很容易就战胜了年长且文化水平较高的革命者，其中包括移民元老、民粹派柴可夫斯基和无政府主义者切尔基佐夫。

托洛茨基雄辩的口才、用讽刺或冷笑话压制对手论点的能力、在演讲中加入自己从西伯利亚和俄国南方带来的新鲜印象从而增添感情色彩的能力，使他在伦敦白教堂举行的辩论中赢得了无可争议的胜利。现在，托洛茨基在什维戈夫斯基的圈子里激烈地为他长期以来在辩论中承认的马克思主义辩护。托洛茨基后来嘲讽地写道：

“令我颇感惊奇的是，这些试图推翻马克思主义的前辈们竟然凭着那么幼稚可笑的论据来进行辩论”。[144]

托洛茨基回忆说：

“记得在回去的时候，我有些洋洋得意，走在人行道上好像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145]

---

[144]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十一章 第一次流亡国外”，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145]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十一章 第一次流亡国外”，2005 年东方出版社

托洛茨基的精神漂浮在地面之上，他有理由感到欣喜若狂。托洛茨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不得而知，但在这次演讲中，他第一次公开展示了自己的演说才能，这种才能在他余下的动荡政治生涯中一直忠实地为他服务。但托洛茨基当时很清楚一件事：在白会堂取得成功后，他的演说技巧不仅得到了社会民主党最高层的认可，而且还受到了追捧。

社会民主党的元老们为新人的成功感到高兴。党的领导人清楚地意识到，俄国正处于伟大革命事件的门槛上，而革命党人仍然习惯于在志同道合者的狭小圈子里进行枯燥的学术辩论。新的环境需要这样的人，他能够用嘲笑和蔑视压倒反对者，用生动的演讲点燃怀疑者的心，用对光明未来的多彩描绘鼓舞志同道合的人们。

列宁和他的同事们可以从托洛茨基身上感受到一种敏锐的能力，即把握听众的情绪、激发人们的信心并引导他们的思想。他们不能不认识到，大众听众更容易理解的不是他们精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而是马克思主义观念与报纸上关于进步成就的陈词滥调的混合，是托洛茨基关于俄国和革命的独白中关于剥夺权利和落后弊端的一般性论述。

当然，列宁、扎苏利奇等人不可能没有注意到托洛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的肤浅。在其他情况下，他们可能会毫不留情地抨击他对意识形态的庸俗化、对党的政治经验的肤浅理解。此外，党的领导人还从如何在争取群众思想的斗争中利用托洛茨基的直率判断、敏锐表达和举止的角度来看待他。几乎所有经验丰富的党员都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在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的条件下，这些缺点变成了党的领导人的优点。

社会动荡与演说的兴盛之间的联系早已被人们所认识。因此，就连米歇尔-蒙田也曾严厉谴责过演说家，他指出：

> “这种为煽动群众和控制混乱社会而发明的工具，就像药物一样，只在不健康的状态下有机体中使用……当罗马受到内战风暴的冲击时，雄辩术最为兴盛，就像杂草在未开垦和被忽视的田地里生长得最为茂盛一样”。

法国大革命带来了许多著名的演说家，如马拉特、罗伯斯庇尔和丹东，这绝非偶然。20 世纪初，杰出的演讲者首先出现在经历严重社会政治危机的国家。

托洛茨基一生都在仔细研究当时许多杰出演说家的口才特点。他早在什维戈夫斯基的圈子里就开始了对演说的研究，当时他模仿自己的偶像拉萨尔，发现自己渴望成为一流的演说家。当时，他仔细研究了叔本华的《辩论的艺术》一书中的演讲技巧。多伊彻写道，除了试图在叔本华的帮助下掌握雄辩术外，托洛茨基并没有特别试图学习演说技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思考过演说领域。就连穆欣关于如何用一把豆子说服工人开始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的故事，也被列夫-勃朗施坦因当作向群众演讲的成功范例。随后，他的观察成倍增加，一生中积累了一整套对不同演讲者口头演讲的个人印象。托洛茨基在他的生活素描中，努力关注演讲中的细微之处，经常非常详细地描述演讲者的手势、面部表情和演讲特点。

托洛茨基是这样描述列宁的演讲的：

> “第一句话通常是共性的，语气是试探性的，整个人似乎没有找到平衡，手势还没有成型，目光已经进入了自己的内心，脸色相当沉闷，甚至有些沮丧——思想正在寻找接近听众的途径。这种开场白或多或少会持续一段时间，这取决于听众、话题和演讲者的情绪。但现在，他已经切中要害。话题开始

出版。

浮现。演讲者将上半身前倾，将双手的拇指放在马甲剪裁的后面，头部和双手立即从这双重动作中向前伸展……双臂活动自如，但没有躁动或紧张……声音变得柔和，更加灵活，有时还带着狡猾的亲和力”。

“但在这里，演讲者会代表敌方提出一个假定的反对意见，或者引用敌方文章中的一段尖刻的语句，在他还没来得及解析敌方的思想之前，他就让你知道这个反对意见是毫无根据的、肤浅的或虚假的。他把手指从马甲镂空处松开，身体微微后仰，一小步一小步地后退，好像要为加速腾出空间，然后——然后是讽刺，然后是绝望的神情——耸耸圆肩，摊开双手，表示性地把大拇指放在一边。根据对手和场合的不同，在反驳之前总是先对对手进行谴责、嘲弄或羞辱。听众就像被提前警告了一样，他应该等待什么样的证据，应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来思考。之后，逻辑攻势开始。左手要么放回马甲领口，要么——更常见的是——放进西装的口袋。右手跟随着思维的逻辑，标记出其节奏。在适当的时候，左手会出手相救。演讲者冲向观众，到达舞台边缘，身体前倾，用双手的圆润动作处理自己的语言材料。这意味着它已经达到了中心思想，也就是整个演讲的要点”。

很显然，对演说家在讲台上的行为进行如此详细的分析，要么是由一本关于口才的手册的作者完成的，要么是由一个试图通过独立观察来理解这种艺术的人完成的。同样，托洛茨基也分析了二十世纪初其他演说家的演讲。托洛茨基在这里讲述了法国社会主义者领袖饶勒斯的故事：

“在讲台上，他看起来很高大，但实际上他的身高低于平均水平……作为一个演说家，他是独树一帜的。在他的演说中，没有范德维尔德的那种成熟老练，有时甚至令人恼火。在逻辑上，他比不上倍倍尔。他与维克多-阿德勒那种恶意的、毒辣的讽刺格格不入。但气质、激情和狂热的升华对他们来说都是足够的……法国人有演说技巧——这是一种共同的遗产，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掌握这种技巧，而在这种技巧之外，他们是不可想象的，就像一个没有气质的‘文化人’。每个会说话的法国人都能讲得很好。但是，法国人要想成为一名出色的演说家就更加困难了。饶勒斯就是这样的人。不是他那丰富的技巧，不是他那巨大的、震撼人心的、如同奇迹般的嗓音，不是他那自由大方的姿态，而是他那和蔼可亲的天真热情——这就是饶勒斯与大众的关系，也是他的魅力所在”。

托洛茨基能够从各种演说家身上发现优点，并对其进行详细分析。在分析维克多-阿德勒演说艺术的特点时，他说：

“阿德勒演说家非常特别。谁希望演说家有如诗如画的形象、铿锵有力的声音、丰富多彩的姿态、沸腾的悲怆，那就让他去听饶勒斯的演说吧。那些要求演说家有精致的风格和同样精致的姿态的人，让他去听范德维尔德的演说。阿德勒两样都不会。他的嗓音很好，有内涵，但并不有力，而且，阿德勒的嗓音并不属于自己：浪费得很少，演讲结束时还会喘息和咳嗽。他的手势虽然很有表现力，但并不丰富。我们还必须补充一点，阿德勒的口吃相当严重，尤其是在演讲的开头。但同时，他也是欧洲最杰出的演说家之一”。

托洛茨基认为，阿德勒作为演说家的长处是什么？——

“阿德勒最有力的工具是他的讽刺，深刻，因为它充满了道德内容，同时又通俗易懂，具有世俗意义。作为一个演说家、抨击家，阿德勒是高不可攀的。当然，他不会忽视对手偶然的、细微的失误，但他的主要任务始终是——揭示对手主要的愚蠢。正是愚蠢……当他说话时，为他的思想选词，用

他的脸部表情配合他的工作，而他的脸部表情又闪烁着讽刺的光辉，那么，即使他说话的有机缺陷似乎也是一种必然：短暂的停顿，用于应付口吃，仿佛使听众更接近演说家的创造性工作——坚持与材料的原汁原味，而不是立即屈服于刀削的半成品一样”。

在托洛茨基的这些笔记中，读者几乎无法了解演讲的内容或其思想倾向。虽然在这些草图中可以了解到演讲者的语调、音色，甚至是结巴，但却没有引用他们演讲中的一个字。显然，托洛茨基对演讲内容并不感兴趣。这绝非偶然。托洛茨基开始相信，演说家的演讲应该不是给人以思考的冲动，而是给人以行动的冲动。他写道：

“除了促使行动的逻辑，演讲中还有其他有价值的逻辑吗？”

在他看来，“促使行动的逻辑”首先体现在手势、演讲的节奏和情感色彩中。

托洛茨基自己的演讲经验使他相信，演讲者会凭直觉找到必要的话语。为此，有必要与听众进行情感交流。后来，托洛茨基在回忆他 1917 年在彼得格勒“摩登”马戏团集会上的演讲时写道：

“有时候，好像我的嘴唇就能感到这些融为一体的人群的渴望心情。在这种气氛的烘托下，我事先准备好的那些言词和论据就会不知不觉地退到一旁，而那些发自内心深处的更加缜密的语言和论据就会脱口而出，这对演说者来说是一种意外，却正是群众最需要的。这时我好像感到自己也是站在演说者身旁的一名听众，拼命想跟上演说者跳跃的思维，惟恐自己的声音会把这个像梦游者一样的人打断，使他惊醒跌入深渊”。[146]

阿道夫-希特勒在演讲中宣称要与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他几乎用同样的话解释了他成功地公开露面（也是在马戏团）的秘诀。在托洛茨基的《我的生活》出版前几年，希特勒在他的《我的奋斗》一书中对他在克罗内马戏团的演讲作了如下描述：

“在我看来，一个演讲者.....如果他是一个出色的大众演说家，就不会以同样的形式重复同样的方法和同样的实质两次。他总是让自己被广大群众所接受，让他的嘴唇说出合适的话语，以便这些话语能够深入听众的内心。如果他说错了，哪怕是一点点，他面前的听众也会纠正他。首先，他可以从听众的表情中看出他们是否理解他所说的话；其次，他们是否完全听懂了他的讲话；第三，他是否让他们相信他所说的话是正确的.....他会自己说出他们的反对意见，虽然这些反对意见还没有说出来，但他已经掌握了这些反对意见，并且会反驳和摧毁这些反对意见，直到那些反对他的人的行为和表情能够让他得出结论：在他的论点面前，他们已经承认自己投降了”。

托洛茨基和希特勒吸引听众的方法相似并非偶然。他们都属于 20 世纪上半叶的杰出演说家，都是在社会和政治动荡的浪潮中崛起的政治活动家。然而，受欢迎的演说家从不局限于他们能够巧妙地表达人们的情绪这一事实。他们同样能够巧妙地引导失去方向的骚动群众，为他们提供解决问题的简单方法。

当他们的演说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时，他们就能给人一种自觉真诚的印象（这往往是通过模仿理智对情感的失控来实现的）。事实上，这样的演说家会观察听众的反应，并像变色龙一样根据听众的冲动改变颜色，不断对听众进行催眠，直到他们开始顺从地点头，以配合演说家的劝诫。

美联社记者路易斯-洛希纳亲眼目睹了德国纳粹党最有权势的演说家之一戈

[146]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二卷 第二十四章 在彼得格勒”，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培尔是如何驾驭听众的。他描述了戈培尔在 1932 年的一次演讲：

“当我第一次聆听戈培尔博士的演讲时，我被这样一个事实震惊了（这让我此后对他进行了特别仔细的观察），这个身材瘦小的人，德国有史以来最灵巧的诱惑者之一，却表现得绝对冷静、有条不紊，同时又给人一种他被自己的口才深深激动和感染的印象。他的手势似乎充满激情。人们会以为他被自己狂热的情绪所控制，以至于忘记了时间，一直讲到向听众表达完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为止”。

“不过，我还注意到另外一点：他那双漂亮的手做着威严的手势，没有丝毫的颤抖，让人感觉到他颤抖的声音是虚假的。他的手势似乎是随意的，因为他在开始做每个手势之前，总是摆出一个舒适的姿势，在他开始做手势之前，他面前有一块手表，他有时会瞥上一眼，我意识到他是在计时”。

“总之，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演员，他对自己每时每刻要做什么都了如指掌，对自己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个手势的效果都事先进行了精确的计算……我觉得，如果他的偶像希特勒决定支持共产主义、君主制甚至民主共和制中的任何一种，戈培尔也会以同样的狂热为它们辩护”。

洛希纳很快就发现，戈培尔确实有能力为任何政治纲领辩护。一位纳粹熟人讲述了他参加一次会议的经历：

“戈培尔在会上发表演讲，呼吁恢复君主制、恢复魏玛共和国、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共产主义、加强国家社会主义事业，以此取悦在场的人”。

一位目击者说：

“我向你们保证，在每次演讲结束时，我都准备支持戈培尔所主张的每一项事业。他为每一种政府形式都提出了有力和令人信服的论据”。

经验丰富的演说家在掌握了争取广大听众的方法后，就变成了能够在政治舞台上实现任何虚构并让人信服其真实性的演员。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像舞台上的演员一样，不仅通过模仿自己没有感觉到的情绪，还通过改变自己的外表来达到与所扮演的角色一致的目的。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意大利社会党的领导人之一贝尼托-墨索里尼就是如此。墨索里尼的一位朋友、无政府主义者莱达-拉法内利回忆说，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未来的元首“在公众面前演讲时，会表现出夸张的肮脏、不刮胡子的样子，穿着与无产阶级领袖相称的简陋衣服，演讲结束后，他会迅速换上超级时髦的皮靴和丝绸翻领的西装”。

托洛茨基并没有忽视这种表演技巧。因此，在内战期间，他在讲台上的表现总是戏剧化的。但是，他吸引观众的主要秘诀在于，他能够给人留下情感完全真实的印象。他知道，只有在激情澎湃时发表的演讲才能被俄国革命的广大听众所接受。托洛茨基在描述他在摩登马戏团的观众时写道：

“在人们欢呼的热烈气氛中，不时爆发出阵阵的喊声，这是摩登马戏场特有的热烈吼叫.....在这么热烈的群众的强力感召下，无论怎样的疲劳，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147]

在社会动荡、激情澎湃的时期，群众的情绪最容易被那些本身就有病态亢奋的人或能够巧妙模仿这种情绪的人所控制。在国家风暴时期或“威胁前夜”，社会上的负面情绪会因为与那些因神经疾病而行为失常的人接触而大大减弱。此外，精神不健康者的性格特征，如突然的情绪波动、猜疑心的增加、不合理的易怒，甚至他对自己所见幻象的描述，都可以更好地表达在紧张的公共气氛中人们的情

[147]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二卷 第二十四章 在彼得格勒”，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绪。从希特勒歇斯底里的“爆发”中，从他的演讲风格中，我们不难看出，当他突然改变说话的音色和节奏时，他在巧妙地模仿一个神经质的人的行为。（有确凿证据表明，这些场景是“着魔”的元首事先准备好的）。显然，这并不是偶然的，在凯撒和拿破仑的宏大社会动荡期间，患有癫痫病的人越来越多。但众所周知，法国皇帝故意夸大易怒的程度，并上演了践踏三角地带的场景。显然，在一个神经高度紧张的时代，这种滑稽行为并没有被视为危险的精神异常表现，反而有助于波拿巴管理国家，使其兴奋到革命事件的极限。

经验使宣传大师们相信，他们越是能制造出自己失去自制力的假象，就越能赢得听众的信任。这样，一个没有演说经验的普通人就会说：

“在如此激情澎湃的时候，有可能说的不是自己的真实想法吗？这位演讲者是一个诚实而真诚的人！”

也许托洛茨基的暴躁甚至神经病增强了他赢得辩论和赢得人心的能力。他的暴躁天性只会帮助他在演讲中采用和运用他从其他演说家那里精心学到的技巧，这些演说家在演讲中痛击政治对手，嘲笑他们，把他们描绘成傻瓜。他在癫痫幻觉中产生的恶梦和美丽画面的记忆，帮助他创造出生动的形象，激情澎湃地讲述受苦受难人民的悲剧，并以钦佩和自觉的口吻讲述即将到来的伟大变革。

同时，每一次这样的演讲，演讲者都会成为听众兴奋到极点的媒介，将自己交托给汹涌的激情，几乎失去对理智的控制，这需要巨大的奉献精神，使身体处于极度紧张状态。这样的演讲者往往是在筋疲力尽的状态下离开会场的。托洛茨基经常使自己处于这种状态。

然而，超负荷工作的不仅是演说家的身体机能，还有他的意识。政治家的表演不同于艺术家的表演，因为政治家的生活和角色之间的界限往往是模糊的。因此，政治模仿的习惯成为墨索里尼的第二天性。拉法内利发现——

“他有一个令人讨厌的习惯，就是在谈话过程中改变自己的观点，以配合他所表达的内容；其他人后来证实，他通常会采用上次与他交谈的人的观点”。

墨索里尼向拉法内利抱怨说，有时“他自己都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

习惯于根据听众善变的情绪改变自己的发言，最终会导致无原则的行为。演讲者既能适应听众的情绪，又能通过宣讲简单化和多彩化的公式来引导听众，这种高超的技巧可能会将演讲者带入危险的陷阱。那些“为了煽动情绪”而抛给听众的短语，可能会在一天之后，在不同的听众中，因为乡巴佬的轻率发言而激怒演讲者。

托洛茨基也经常掉进自己热衷于“煽动词句”所造成的类似陷阱。托洛茨基在解释他为何经常改变对他一生中一系列观点的评价时写道，起初他发现很难接受对他来说是新的主题和判断，常常断然拒绝，后来经过内心的挣扎，他接受了他最初抵制的东西。

托洛茨基解释了他最初对巴黎以及巴黎博物馆的绘画和雕塑收藏的厌恶。他还解释了自己的政治蜕变，指出：

“我当时对艺术的抵抗与我早年革命和稍后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在后来的几年内对列宁主义及其方法的抵抗，其实是一样的”。[148]

在阐述这些解释时，多伊彻写道：

“我们会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种心理机制在他身上起作用：他面临着一

[148]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二卷 第二十四章 在彼得格勒”，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个新的想法，他必须对这个想法做出反应。然而，一开始，他傲慢而顽固地抵制这种想法；当这种想法变得有吸引力时，他的抵制就会加剧，但他会压制自己潜在的怀疑和犹豫。然后，他内心的防线崩溃了，自信心消失了，但他仍然过于骄傲或不够自信，以至于没有表现出任何屈服。他心中的斗争还没有表现出来。然后，一种新的信念在他心中增强，似乎在瞬间战胜了他的矛盾心理和虚荣心。他给对手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他完全平静地屈服，而且是他接受对手事业的热情，以及他从对手的论点中得出的出人意料、意义深远的结论”。

如果不忽略一个重要的情况，这些解释看起来会令人信服。托洛茨基在拒绝接受任何门槛上的东西时，并没有把自己局限于内心的怀疑，而对于任何第一次面对新课题或新观点的人来说，内心的怀疑是非常合理的。他没有宣称他不熟悉这个或那个观点，也没有要求给他时间来思考他不熟悉的问题。集会的偶像不能公开承认自己在任何问题上的无能，也不能承认自己在智力上的不完美。他给人一种无所不知的印象，对任何新思想和新信息都会立即做出反应，试图证明自己在智力上的优越性。

作为一个习惯于引导听众的人，托洛茨基急于对这个或那个人或思想发表生动的、往往是毁灭性的、有时是侮辱性的言论。在这样的发言之后，托洛茨基就成了他雄辩的俘虏，即使后来的事件表明他美丽而草率的评价显然是谬误的。然而，托洛茨基避免公开承认错误和剖析错误，他更喜欢用突然改变的观点和优美的新措辞来迷惑周围的人，以支持他最近谴责过的东西。

托洛茨基（还有多伊彻）解释说，他的判断和政治立场的多次改变是由于他的固执，而他逐渐克服了这种固执。他后来的人生经历表明，导致他多次改变立场的不是他的固执，而是他对政治形势的取向。然而，许多追随公众情绪变化、努力站在人民同情浪尖上的著名领导人都有类似的政治变化。

温斯顿-丘吉尔是当时著名的政治家和出色的演说家，他的政治生涯从保守党开始，转入自由党，然后又回到保守党，逐渐转向右翼。社会主义者贝尼托-墨索里尼经历了政治蜕变，离开了社会主义党的队伍，创建了法西斯运动，并在法西斯政变后无情地迫害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这些例子和其他许多例子都表明，对人类激情的善变因素盲目的关注，会导致那些成为职业政治明星的人失去道德，不择手段。

在国内从事地下活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小党派的领导人，几乎没有意识到他们提名在口头鼓动中扮演第一角色的人的所有危险。1902 年秋天还没有结束，托洛茨基就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层派往其他外国移民中心。在那里，他参加了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反对者的辩论。多伊彻在谈到目击印象时写道：

“修辞手法常常破坏了他的写作，这使得他的演讲更具戏剧性。他的内心似乎正在经历一场戏剧性的盛宴，在那里，身材夸张的演员们进行着堪比半神的荷马史诗般的战斗。他高高在上，感觉无数双眼睛都盯着他，而他自己却在攻击下面的人的许多心灵——他如鱼得水”。

一位同时代的人这样描述他：

“这个瘦小的男人有着一双凶狠的大眼睛和一张性感的不规则形状的大嘴，他像一只猛禽一样爬上讲台”。

托洛茨基在布鲁塞尔、列日、瑞士和德国城市以及巴黎的革命移民会议上发表了演讲。他的演讲取得了成功。这位 23 岁的年轻人直到几个月前还流亡在迷失在西伯利亚的韦尔霍伦斯克，如今已成为俄国政治移民公开辩论的明星。毫不

奇怪，他以前的生活似乎很遥远，早已结束。

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也被遗忘了。她和她婚后所生的孩子都留在了遥远的俄罗斯。托洛茨基对与索科洛夫斯卡娅断绝关系的解释是：

> “我在流亡国外期间很难得和她通信。后来她第二次被流放了，再后来我们只是偶然见过几次。生活使我们分开了，可我们之间思想上的联系和友谊却是永存的”。[149]

现在，托洛茨基身边又多了一些人，他们不是把他当作革命圈子的新人，而是把他看作俄国革命最高领导人的特使。在他热情的听众中，有俄国学生纳塔利娅-伊万诺夫娜-塞多娃。她代表巴黎的革命流亡者，在自己居住的房子里为他找到了一个房间。据她说，托洛茨基的演讲“非常成功，流亡者们非常高兴，年轻的火星派超出了预期”。

在巴黎逗留期间，塞多娃向托洛茨基介绍了巴黎及其艺术博物馆。然而，托洛茨基对法国首都并不着迷。塞多娃在日记中写道：

> “他对巴黎的总体印象是：‘与敖德萨相似，但敖德萨更好’”。

由于托洛茨基“驰骋”于欧洲各大城市，此时他只对地球上的几个聚居地有所了解：敖德萨、尼古拉耶夫、一个墓地，然后悄无声息地死去，因为他们注定不会看到更美的景色。如果我们不用那些为托洛茨基着迷的人们的眼光来看待他，而是用普列汉诺夫——这位杰出的哲学著作的作者和具有丰富党务工作经验的革命家的眼光来看待他，那就没有理由感到特别高兴了。新的合作者能为《火星报》带来什么呢？他的文风远非完美，除了对专制和俄国爱国主义的平庸抨击（这在社会民主党的环境中是司空见惯的），以及关于俄国乡村淹没在无知的黑暗中的同样公式化的论述之外，他几乎无法为革命报刊的读者提供任何东西。与帕尔乌斯不同，这位从俄国移民并不掌握独特的经济信息，要想成为世界市场问题的专家，他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普列汉诺夫可能也对托洛茨基将“个性鲜明的人”与“群众”相提并论的倾向以及他在文学作品和个人行为中表现出的自负感到厌恶。毕竟，他在 1895 年写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一书中谴责的正是俄国知识分子的这些品质。显然，关于托洛茨基演讲成功的报道并没有给普列汉诺夫留下深刻印象。因此，尽管托洛茨基在演说领域取得了成功，但这颗新星在社会民主党内的地位并不稳固。

与此同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的时间日益临近。在这次大会上，该党将通过自己的纲领，并确定近期的政治路线。在大会筹备期间，党内不同方向的代表之间展开了紧张的内部斗争。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火星报》的支持者（即那些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党的人）和他们的反对者（主要是“崩得”的成员，他们主张把党变成一个民族组织的联合会）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矛盾。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列宁为代表大会制定了一项计划。他假定大会将有大约 32 名《火星报》支持者、8 名反《火星报》支持者和 11 名“未定”支持者。然而，由于《火星报》支持者之间不团结，情况变得更加严重，这一点在 1903 年 7 月 17 日（30 日）在布鲁塞尔开幕、随后在伦敦继续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很快就显现出来。

从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开始，代表西伯利亚联盟的托洛茨基就开展了大量的活动。他站出来改变议程，把“崩得”问题“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而是

---

[149]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九章 第一次被流放”，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作为组织问题的一部分，因此也是首要的痛苦问题”。正如多伊彻所强调的，关于“崩得”的讨论是在“基希讷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发生后仅几个月”进行的。犹太人的怀疑和病态易敏感性增加了，这反映在“崩得”的行为上。

1903 年 4 月 6 日和 7 日，基希讷乌发生了犹太人大屠杀，造成大量人员伤亡（50 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和致残）。报纸保证，普列夫部长在国外截获的电报证明他及时了解了大屠杀的情况。《火星报》在多篇文章中严厉谴责了大屠杀，认为政府应对大屠杀负责。基希讷乌大屠杀成为叙述俄罗斯犹太人命运的一个值得纪念的里程碑。早在苏联时期，诗人乌特金就在其关于基希讷乌裁缝店布洛哈的诗歌中，以主人公的亲属在大屠杀中遇害的故事作为开头。

基希讷乌大屠杀后，参加大会的“崩得”代表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捍卫犹太人权利的活动是不够的。他们坚持认为，“崩得”作为唯一在犹太工人中开展工作的组织具有特殊地位。另一方面，《火星报》的领袖则认为应在代表大会一开始便否决“崩得”所倡议的联合结构原则。马尔托夫、托洛茨基和其他一些不属于“崩得”的犹太党员提出了一项决议，反对保留“崩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的特殊地位。大会批准了这项决议。

然而，一些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支持者要求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获得特殊地位，这种要求并不局限于崩得成员。这一点在讨论议程上的第一个项目时就很明显。除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外，《火星报》编辑部的所有成员都支持马尔托夫提出的条目，即任何人只要接受党的纲领，并在某个党组织的领导下经常给予个人帮助，就可以成为党员。而列宁对该条款的措辞则规定，任何人只要接受党的纲领，并通过物质手段和亲自参加某个党组织来支持党，就可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

马尔托夫提法的支持者在拒绝列宁的建议时，主要是为那些不愿在党组织中工作的人辩护，为他们制定了一项特殊规定。阿克雪里罗得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明确指出，这主要是一个知识分子的问题：

> “比如说，一位教授认为自己是社会民主党人，并宣布自己是社会民主党人。如果我们采用列宁的公式，就会把一部分虽然不能直接加入党组织，但仍然是党员的人扔到海里”。

甚至在公开讨论开始之前，为了解决分歧，用托洛茨基的话说，就已经决定召开“一次《火星报》内部会议来弥合分歧”。托洛茨基参加了会议。此时，《火星报》派之间的分歧已变得如此尖锐，以至于在选择会议主席时出现了困难。出乎意料的是，戴奇提议选举会议最年轻的与会者托洛茨基担任会议主席。据多伊彻称，这位革命斗争的老人“怀着钦佩的心情”关注着托洛茨基在国外“迈出的第一步”，并“千方百计地帮助他前进”。正如托洛茨基所写，戴奇开玩笑地称他为“维奥诺什”或“维尼亚明”，指的是圣经中约瑟夫兄弟中最小的一个。戴奇说，“我提议选择我们的维尼亚明”。显然，托洛茨基被对立双方的代表视为一个方便的人物（后来他们被称为“强硬的火星派”和“软弱的火星派”），由于戴奇的倡议，托洛茨基成为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主要领导人会议的负责人。

托洛茨基在回忆这次会议时写道：

> “所有的人的神经都高度紧张。列宁愤而退席，砰地撞上了门。这是我所看到的惟一一次他在激烈的党内冲突中情绪失控”。[150]

在这次讨论开始之前，托洛茨基就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表明了他与列宁在政治

[150]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十二章 党的代表大会与分裂”，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上的合作，他甚至因此从大会与会者梁赞诺夫（戈尔登达赫）那里赢得了“列宁的棍子”的绰号。突然间，“棍子”落到了普列汉诺夫和列宁身上。托洛茨基曾大力维护严格的党的纪律，并提议将不服从党中央的组织“从革命队伍中提除出来”，他在回应普列汉诺夫的讲话时说：

> “当普列汉诺夫建议投票赞成列宁的方案作为反对机会主义的可靠手段时，我感到非常惊讶。我不知道还可以创造出反对机会主义的法定咒语。我认为机会主义是由更复杂的原因造成的……限制那些站在党的纲领立场上的聪明的独行侠的命运，强制让他们在党的组织的指导下为党服务有什么意义呢.....”。

托洛茨基坚决支持马尔托夫。列宁还不相信托洛茨基的立场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他试图改变托洛茨基的想法，先是亲自找他谈话，然后通过他的弟弟德米特里和其他代表，但一切都是徒劳的。

托洛茨基很快在《火星报》编辑部的组成问题上同样强烈地反对列宁。考虑到三位编辑——列宁（32 篇文章）、普列汉诺夫（24 篇文章）和马尔托夫（39 篇文章）——对 45 期《火星报》的贡献最大，而其他三人的贡献要小得多（波特列索夫撰写了 8 篇文章，扎苏利奇撰写了 6 篇文章，阿克雪里罗德撰写了 4 篇文章），列宁建议编辑部保留实际工作的人（普列汉诺夫、列宁和马尔托夫）。托洛茨基的回应是建议《火星报》编辑部保持原样，尽管他之前在代表大会前的代表会议上曾表示，他赞同改组编辑部。

托洛茨基在回忆录中对他突然改变观点的原因的解释含糊不清，自相矛盾。他写道：

> “由此来看，我与列宁的这次决裂是“道义上”的，甚至是私人之间的，但这仅仅是表面现象。事实上，我们分裂的根源在于政治和组织方面”。[151]

多伊彻用托洛茨基决定支持阿克雪里罗德和扎苏利奇这一事实来解释托洛茨基的行为。他认为，托洛茨基把这些人从《火星报》编辑部除名，是对他的“亵渎”，而列宁的立场则是“冷酷无情”的表现。然而，多伊彻并没有准确地说明这些问题的讨论过程，他没有提到在预备会议上托洛茨基并没有认为这一提议是“亵渎”。为了支持他所描述的托洛茨基的高尚义愤，多伊彻甚至重新安排了大会讨论问题的顺序，在开始讨论《章程》第一段之前描述了关于编辑部组成的讨论。

沃尔科戈诺夫则认为托洛茨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行为是“循亲枉私”。他认为，既然托洛茨基主张建立一个有党内纪律的中央集权制政党，他就应该支持列宁对宪章第一段进行表决。沃尔科戈诺夫认为，托洛茨基之所以投了违背自己信念的票，完全是因为他不理解列宁和马尔托夫之间的分歧。后来托洛茨基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斗争的惰性将使他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与列宁对立”。

这些论点有一定道理。在托洛茨基的行动中，个人因素无疑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代表大会召开时，托洛茨基与马尔托夫、扎苏利奇和阿克雪里罗德关系密切，他们曾在托洛茨基与普列汉诺夫的争论中支持过托洛茨基，但托洛茨基拒绝了他们的支持。托洛茨基对漂亮词句的特有爱好可能导致他在反对列宁对第一点的表述时走得更远，而不符合他自己对严格党内纪律的信念。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做出了错误判断，或者说他抗议列宁的“冷酷无情”是出

---

[151]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十二章 党的代表大会与分裂”，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于崇高的道德考虑，这种说法是难以令人接受的。

托洛茨基主张建立一个有严格纪律和集中组织的党，但他并不认为严格服从这个组织的命令会适用于他。他不习惯这种纪律。他在南俄工人协会逗留了几个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层认为这个组织没有足够的纪律性。托洛茨基在抵达伦敦之前并不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然而在伦敦，他立即发现自己在党内的地位特殊。在欧洲巡回宣传的角色只是加强了他独立地位的习惯。托洛茨基很可能有意识地支持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德、扎苏利奇等人抵制列宁将党的铁的纪律毫无例外地扩大到每个人的企图。

至于《火星报》编辑部的个人组成，托洛茨基显然不愿意支持列宁的提议，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支持他加入《火星报》领导层的人就会被排除在编辑部之外。在托洛茨基积极反对列宁制定的党章第一条之后，列宁很可能不会支持他的候选人资格。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马尔托夫作为托洛茨基的盟友留在编辑部了。

起初，托洛茨基和那些与他一起投票的人似乎遭到了失败。在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和他的支持者取得了胜利，列宁的党纲草案和有关党的策略的主要决议获得通过。列宁支持的人当选为中央委员和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尽管大会通过了党章的第一条，但在马尔托夫的措辞中，党章的大部分条款都符合列宁主义者的要求。因此，在这次大会之后，列宁的支持者被称为布尔什维克，而马尔托夫的支持者被称为孟什维克。然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后发生的事件导致布尔什维克很快被解除了党的领导地位。

党代会结束后，孟什维克立即开始努力组织自己的中心，以反对刚刚当选的中心。1903 年 9 月，在日内瓦召开的一次有 17 名孟什维克参加的会议上，成立了孟什维克派主席团。主席团由马尔托夫、丹、波特列索夫、阿克雪里罗德和托洛茨基组成。会议提出了接管党中央机构和地方委员会的行动纲领。主席团决定出版自己的报纸《克拉莫拉》。

自这位化名“笔尖”的上霍伦斯基逃亡者被列宁从俄国地下党召到伦敦以来，还不到一年的时间。现在，他是一个五人主席团的成员，该主席团试图控制整个社会民主党，从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手中夺取权力。但很快，孟什维克的矛头就主要指向了列宁。事实是，普列汉诺夫在党内分裂的威胁下惶惶不可终日，他提出了和解的建议，并独断专行地让前编辑们进入了编辑部。列宁离开了《火星报》。

党的中央机关报违反了代表大会的决议，由一个旧的编辑部领导，但没有列宁。既然托洛茨基已成为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派中的盟友，他就有机会加入《火星报》编辑部。然而，普列汉诺夫对托洛茨基文学活动的厌恶并没有改变，他强烈反对在《火星报》上发表托洛茨基批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党委员会过分专注于攻击俄国资产阶级及其在俄日战争中的作用的文章。托洛茨基认为，这场战争完全是为了专制制度的利益，而不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普列汉诺夫不同意这种解释，丑闻爆发后，他要求托洛茨基从《火星报》中除名。托洛茨基最近帮助他重返《火星报》的前盟友马尔托夫、扎苏利奇和阿克雪里罗德支持普列汉诺夫。从他们的行为来看，他们对党内斗争并不陌生，他们对托洛茨基的才华也并非无限着迷。为了表示对编辑部成员行为的愤慨，托洛茨基于 1904 年 4 月停止了与《火星报》的合作，但没有离开孟什维克派别。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民主党在了解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分歧后，站在了孟什维克一边。卡尔-考斯基在解释自己的立场时，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员利亚多夫（曼德尔施塔姆）说：

“你们想要什么？我们不了解你们的列宁，他对我们来说是个新人。我

们都很了解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德。我们习惯于从他们的报道中了解俄国的现状。当然，我们不能相信您的断言，即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德突然变成了机会主义者。这是荒谬的”。

在这次谈话中，考茨基闭口不谈他经常从他的老熟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俄国问题上的主要专家帕尔乌斯那里得到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分歧的实质和相应结论的详细信息。正如泽曼和沙劳指出，帕尔乌斯是第一个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通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上和会后发生的事情的人。因此可以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层采取了反列宁主义的立场，这很可能是受到了帕尔乌斯的影响。

列宁继续极力为自己辩护。他在 1904 年 5 月出版的著作《进一步，退两步》中概述了他对代表大会结果和党内生活后续发展的看法。作为回应，孟什维克发动了一场针对列宁个人的运动。

1904 年 5 月 14 日（27 日），波特列索夫写信给阿克雪里罗德：

“我急忙通知您，我刚刚收到考茨基的来信，允许我们在《火星报》上刊登对列宁的答复。因此，第一颗炸弹已经投下，——上帝保佑——列宁将被炸死。我非常重视制定一个针对列宁的总体作战计划——把他炸死，有条不紊、有计划地把他炸死……如何炸死列宁，这是一个问题。首先，我认为有必要对他发动权威打击——考茨基（已经有了）、罗莎-卢森堡和帕尔乌斯”。

托洛茨基积极参与了反对列宁的运动。第二次代表大会结束后，他立即在西伯利亚代表团的报告中指责布尔什维克摧毁了《火星报》，指责列宁贪恋权力，想“把党委会变成一个无所不能的公安委员会”。托洛茨基声称，列宁就像罗伯斯庇尔一样，正在为“社会机会主义的催化剂”做准备。显然，作者难以抑制自己汹涌的情绪；将列宁的行为与罗伯斯庇尔的独裁方式相提并论对他来说似乎还不够，他在后文中纠正自己说，列宁只是对罗伯斯庇尔的模仿。

波特列索夫的信发出后不久，托洛茨基就向列宁扔出了他的“炸弹”，于 1904 年 8 月 23 日完成了《我们的政治任务》。他将自己的第一部重要著作献给了阿克雪里罗德。多伊彻承认，托洛茨基的这一著作是党内论战中的一个新现象：

“当然，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通常会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但他们一般都避免人身攻击。几乎没有孟什维克以如此毒辣的愤怒攻击列宁”。

多伊彻强调，托洛茨基的恶毒攻击是针对“最近向他伸出合作之手、把他带到西欧并为他辩护的人.....他无法为自己的指控提出任何在历史学家眼中站得住脚的证据”。

托洛茨基尖锐的指责和张扬的语气表明，这本小册子的作者运用了他在口头演说中经常使用的论战技巧。托洛茨基在其著作的第一行中就写到了列宁的小册子《进一步，退两步》：

“我们尽管在该书出版之前确信列宁同志对维护他的立场说不出什么值得注意的话，因为他的立场是完全没有出路的，然而我们确实没有料到他的思想会像他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贫乏”。[152]

托洛茨基称列宁的著作“冗长而乏味”。他声称列宁把自己“置于一个特别可笑的境地”，并讽刺地感叹道：“可怜的列宁！”他嘲讽地称列宁是一个“光杆司令”，他的军队正在他眼前消失。

---

[152] 托洛茨基《我们的政治任务（摘录）》，“序言”，《托洛茨基言论》。

托洛茨基还没有来得及学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知识，而且直到两年前还担心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会对他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考试，现在他却自信满满地责备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掌握得不好，并说：

“说到辩证法，那是对列宁同志毫无办法的”。[153]

托洛茨基指责列宁歪曲马克思主义理论：

“据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确，要比列宁更加厉害地用讥讽的态度来对待无产阶级最优秀的精神财富，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他来说，马克思主义不是要求巨大理论义务的科学研究方法，不是的，——如果需要擦脚，它就是一块破抹布；如果他想在它面前显示自己的伟大，它就是一块白色亚麻布；如果他必须表现自己的党性，它就是一根可以折叠的测量杆”。[154]

然而，托洛茨基用虚构来代替列宁意识形态错误的证据。因此，他的小册子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虚构的“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对话，在对话过程中，后者表现出了惊人的愚蠢。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不断提到列宁在小册子《怎么办？》，而“孟什维克”则“诙谐地”将这一计划与普法战争中的“特罗舒将军的计划”相提并论，后者只会加剧法国的失败。（显然，托洛茨基非常喜欢这种比较，因为后来他不止一次地把他所谴责的计划与“特罗舒计划”相提并论）。

托洛茨基没有对列宁著作的优缺点进行证据分析，而是建议读者将“社会民主党人”改为“社会革命党人”。在这种情况下，他向读者保证，没有人会注意到这种替换。托洛茨基还声称，这样篡改孟什维克的著作是行不通的——“要吃苦头了”。[155]

尽管托洛茨基的小册子表面上很肤浅，但孟什维克在反对列宁的斗争中还是采用了它。然而，在这本著作出版几天后，托洛茨基宣布退出孟什维克派别。他回忆说：

“1904 年 9 月，我正式宣布脱离孟什维克，实际上我从 1904 年 4 月起就已经不属于这个派别了。在这期间，我在慕尼黑的俄国侨民区住了几个月，那时这里被认为是德国最民主和艺术最发达的城市。在那里，我开始对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有所了解，参观了慕尼黑的美术馆，结识了《老实人》周刊的漫画讽刺作家”。[156]

在与孟什维克决裂后，托洛茨基也没有加入布尔什维克，他实际上离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托洛茨基作为一颗耀眼的明星，从社会民主党的天空中消失了一段时间。

---

[153] 托洛茨基《我们的政治任务（摘录）》，“纪律和集中制”，《托洛茨基言论》。
[154] 托洛茨基《我们的政治任务（摘录）》，“纪律和集中制”，《托洛茨基言论》。
[155] 托洛茨基《我们的政治任务（摘录）》，“纪律和集中制”，《托洛茨基言论》。
[156]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十三章 回国”，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 第 八 章

# 慕尼黑诞生的理论

托洛茨基不再积极参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生活是在俄国革命前形势日益严峻的时期。1903 年 7 月至 8 月俄国南部发生政治大罢工后，工人运动有所衰退，但 1904 年夏天又出现了新的高潮。现在，罢工发生在圣彼得堡、下诺夫哥罗德、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和高加索地区。与此同时，农民的示威游行也越来越频繁。自由反对派的政治活动大大加强。自由派以举行宴会为借口，联合“解放联盟”和“立宪派联盟”举行会议，提出在俄国进行政治改革的要求（即所谓的宴会运动）。

托洛茨基了解正在发生的事件，并给予了适当的评价。1904 年 8 月 23 日，托洛茨基在《我们的政治任务》这本小册子的序言中评论了 1904 年夏末的国内局势，他写道：

> “在这一时期，在下面，在人民的底层，进行着看不见的、然而不可避免的革命愤怒蓄积的分子过程，这种愤怒也许明天就会以不可抗拒的狂暴力量爆发出来，就象湍急的雪水冲决桥梁和堤坝一样，不仅会冲垮警察的路障，而且也冲垮我们在组织方面的辛勤劳动建立起来的全部机构”。[157]

托洛茨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

> “在这一时期，似乎只有一种学说，即起义的学说，是合乎时宜的，似乎只有一种艺术，即街垒的艺术，是可以允许的”。[158]

托洛茨基密切关注着俄国革命风暴的来临，为什么会在 1904 年秋天决定专门去了解慕尼黑的美术馆、漫画家和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呢？托洛茨基在列举了他认为值得关注的慕尼黑生活的这些方面后，并没有立即说他是应伊斯雷尔-盖尔芬德（帕尔乌斯）的邀请来到这座城市的，他和妻子就住在他家。托洛茨基也没有说他在帕尔乌斯家的主要目的是为积极参加俄国革命做思想和政治上的准备，而俄国革命随时都会开始。

帕尔乌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扮演着俄国问题专家的角色，而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则扮演着德国社会民主党顾问的角色，他显然是利用自己不同寻常的地位来玩弄自己的游戏。帕尔乌斯后来的职业生涯中，与德国和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合作占据了重要位置，因此我们可以推断，除了俄国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之外，其他势力也知道帕尔乌斯的计划。

泽曼和沙劳在《帕尔乌斯传》中写道：

> “列夫-达维多维奇-勃朗施坦——托洛茨基从主人那里得到的不仅仅是款待”。

他们之间短暂而深厚的友谊是托洛茨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托洛茨基 1904 年底至 1905 年初在帕尔乌斯家的逗留。多伊彻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题为《知识分子的伙伴关系》。通过阅读这一章，人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印象：这两

---

157 托洛茨基《我们的政治任务（摘录）》，“序言”，《托洛茨基言论》。
158 托洛茨基《我们的政治任务（摘录）》，“序言”，《托洛茨基言论》。

个敖德萨本地粮商家庭的人“合作”的结果就是所谓的不断革命论。毫无疑问，该理论的真正作者是帕尔乌斯。毕竟，他不仅比 25 岁的“搭档”年长 10 岁，而且在编写深入分析研究报告和预测全球发展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断革命论”的基本规定就来源于这些研究和预测，并由他在托洛茨基搬到慕尼黑之前的 1904 年初发表在《火星报》上的一系列文章中详细阐述。

随后，共产主义者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们忘记了“不断革命”的立场是共产主义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和《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首次提出的。“不断革命”思想设想在革命开始后不断或“不断”深化社会变革。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要求：

> “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159]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革命向外传播的“连续性”（或“持久性”）出发，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从英国等地开始后，将在法国、德国继续下去，逐渐覆盖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

帕尔乌斯在预测世界发展时采用了这一观点。然而，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的是，他不仅把无产阶级革命，而且把帝国主义战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体化进程都纳入了改变地球面貌的事件链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在世界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才有可能消除国界，而帕尔乌斯则认为，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可能发生的。根据多伊彻的说法：

> “帕尔乌斯的核心思想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国家已经寿终正寝……各大洲的命运变得相互依存”。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世界各国的革命视为世界革命的一个阶段，最终社会主义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而帕尔乌斯尽管发表了革命性的言论，但他感兴趣的是战争和革命将如何影响消除国界和关税壁垒。他提请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人对西部的探索加剧了粮食生产者之间对世界市场的争夺”。在这方面，帕尔乌斯认为:

> “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农业和工业利益集团将联合起来，结束自由贸易，在西欧建立保护主义制度”。

帕尔乌斯写道：

> “关税壁垒已成为各国人民文化统一历史进程的障碍；.....它们激化了国家间的政治冲突”。

由于帕尔乌斯后来重返资本家阶级，并转变为有影响力的粮食和军火商，我们可以认为，他之所以预测战争和革命，不仅仅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他所预测的事件将如何影响外贸形势。作为有影响力的金融界代表，帕尔乌斯（显然不止他一个）似乎竭尽全力确保社会民主党在西欧国家的执政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但是，在表达跨国金融集团的利益时，他显然希望确保世界的社会变革会导致各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被置于国际垄断集团和一体化欧洲的超国家结构的控制之下。最终，西欧 20 世纪的历史完全遵循了帕尔乌斯所描绘的道路。众所周知，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政党在西欧的崛起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的衰落，而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加强。20 世纪末的标志是跨国公司在世界上建立霸权，以及西欧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

---

[159] 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7 卷。

帕尔乌斯预测的事件的最初推动力是俄国的革命。早在 1895 年，帕尔乌斯就预言日俄战争不可避免，其后果之一就是俄国发生革命。帕尔乌斯在 1904 年 3 月发表在《火星报》上的文章中，以及后来在他的《战争与革命》一书中预言：

“因满洲和朝鲜而开始的战争已经发展成为一场争夺东亚霸权的冲突”。

帕尔乌斯认为，日俄战争将结束普法战争结束以来世界相对稳定的时期。

帕尔乌斯预言说：

“在下一阶段，俄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将受到质疑；战争的高潮将是世界政治平衡的破坏.....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正在导致俄罗斯的政治动荡。这反过来又会对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产生影响。俄国革命将撼动资产阶级世界……俄国无产阶级可以发挥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作用”。

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假定，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将在无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无产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矛盾最尖锐的国家开始。因此，他们认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从俄国开始。但是，俄国的动荡将对整个欧洲大陆产生巨大影响的观点，对于西欧的革命者来说并不陌生。在整个 19 世纪，俄国都被视为国际宪兵，为国际反动派的利益站岗放哨。1891 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写道，俄国的崩溃是将欧洲从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的途径，因此这位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呼吁在未来的对俄战争中支持德国，他说：

“因此，德国的胜利就是革命的胜利”。

另一方面，帕尔乌斯并没有把沙皇主义在军事上的失败，而是把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推翻沙皇主义作为自己的计算基础。

显然，帕尔乌斯相信俄国在他所预言的事件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因此他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十分关心。然而，他多次试图影响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斗争，却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从随后发生的事件来看，帕尔乌斯决定依靠那些让他充满信心并能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发挥他所需要的作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虽然帕尔乌斯本人也亲身参与了俄国第一次革命，但他显然具有自我批评精神，认识到自己不具备试图扮演革命领袖角色的魅力。托洛茨基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巡回演说家和抨击家所取得的成功是众所周知的，帕尔乌斯很可能决定把赌注押在这位 25 岁的杰出演说家身上。

同时，帕尔乌斯也意识到托洛茨基理论知识的薄弱。因此，他决定认真培养托洛茨基。首先，他努力拓宽托洛茨基的视野。多伊彻认识到：

“国际思想和帕尔乌斯的革命观点已成为托洛茨基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根据多伊彻的说法：

“托洛茨基的演讲风格和方式，尤其是他的预测，都能感受到帕尔乌斯的影响”。

同时，多伊彻认为托洛茨基并没有简单地模仿帕尔乌斯，而是——

“由于他在思想和文学上接近帕尔乌斯，自然而然地、有机地吸收了这种影响，而这种影响并没有因为性格和气质上的差异而受到阻碍”。

托洛茨基在帕尔乌斯家六个月的实习期间学到的思想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武装了他，并构成了他主要理论著作的基础。托洛茨基在 1906 年撰写的《总结与前瞻》一书中概述了“不断革命论”的原理，多伊彻写道：

“托洛茨基在这里达到了他发展的顶峰.....对他来说，这是一个从早熟到成熟的勇气的过渡，这个过渡就像他从童年跃入少年和从少年跃入成年

一样突然而迅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在捍卫和发展他在1906年简述的思想”。

托洛茨基成为“不断革命论”的积极宣传者后，逐渐被视为这一理论的共同作者之一（有时甚至是唯一作者）。

托洛茨基与帕尔乌斯不同，帕尔乌斯写的是俄国革命的全球后果，而托洛茨基的著作只关注俄国在世界“不断革命”中的地位。然而，即使在这里，帕尔乌斯的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多伊彻认为：

“托洛茨基对俄国历史和俄国国家概念的一些评价是在帕尔乌斯的影响下形成的”。

根据多伊彻的说法，帕尔乌斯认为：

“俄国国家是介于亚洲专制主义和欧洲专制主义之间的中间地带，它不是作为俄国社会任何阶级的权力机关发展起来的，而是作为一个军事官僚机器发展起来的，其主要目的是抵制来自文明程度较高的西方的压力。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沙皇将欧洲文明的元素引入了俄国，尤其是军队”。

然而，多伊彻指出，帕尔乌斯（以及后来的托洛茨基）对俄国历史推动力的解释来自俄国历史学家和政治人物米留可夫。

托洛茨基在《总结与前瞻》一书的第一页就阐述了这些观点。托洛茨基在分析俄国的世界地位时，首先谈到了俄国的有机落后性：

“如果我们把俄国社会发展的情况同其它欧洲国家的社会发展情况（把共同特点极相似、其历史与俄国历史不同的一些欧洲国家作为一类）进行对比的话，我们可以说，俄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特点是相对的原始性和缓慢性。

在这里我们不准备详述这种原始性的自然原因，但事实本身是毫无疑问的：俄国的社会生活建立在比较贾乏和比较原始的经济基础上”。[160]

托洛茨基指出，俄罗斯落后于西方邻国，这使得俄罗斯很容易受到西方邻国的攻击。

托洛茨基发展了帕尔乌斯（更确切地说，是米留可夫）的思想，强调来自西方的进攻威胁迫使国家在国防上花费过多，并按照西方的思路建立军队。他说：

“迫使古代罗斯采用火器和创设常备射手团的并不是鞑靼人；后来迫使俄国组织雇佣骑兵和步兵部队的也不是鞑靼人，而是立陶宛、波兰和瑞典的军事压力。

由于来自西欧的压力，俄罗斯国家消耗了过大的一部分剩余产品，也就是说，国家靠牺牲正在形成中的特权阶级的利益而存在下来，因而妨碍了这些阶级本来就很缓慢的发展”。[161]

与帕尔乌斯和米留可夫一样，托洛茨基也认为，在俄国，国家扮演着超阶级的角色。他写道：

“作为一种独立力量的国家权力，也从本位的观点看待较高等级的利益，抵制它们的要求，力图使它们服从自己”。[162]

托洛茨基强调国家在俄国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无条件地接受了帕尔乌斯关于俄国经济的“人造”特征的结论：

“新的手工业部门、机器、工厂、大生产、资本等，从某个角度来看，

[160] 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第一章 历史发展的特点”，蔡汉敖译、陈泰编校。
[161] 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第一章 历史发展的特点”，蔡汉敖译、陈泰编校。
[162] 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第一章 历史发展的特点”，蔡汉敖译、陈泰编校。

似乎都是人为地移植到自然经济上来的。资本主义似乎是国家的产物”。[163]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俄罗斯在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发展方面取得的所有成就都是“人造的”，因此是没有生命力的。

托洛茨基写道：

“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俄国的全部科学都是政府人为努力的产物，是被人为地嫁接在民族愚昧的自然基础上的。（**只要回想一下国家和学校之间原有关系的特点就可以明白，至少学校也和工厂一样，也是国家「人为」的产物。国家在教育方面的压力可以说明这种「人为性」。那时逃学的学生们会被处以上枷的刑罚。可以说整个学校都处于上枷的状态。学习成了一种服役。学生可以得到工资，等等。——托洛茨基原注**）”。[164]

因此，俄罗斯的任何成就都无法克服其原始性和落后于“先进的”西方。

托洛茨基认为，与欧洲“自然发展”的国家不同，俄罗斯国家是一种人为成长起来的、权力过大的不成比例的怪胎。托洛茨基认为，19 世纪现代科技进步的所有成就（铁路运输、电报）都是俄罗斯国家为了统治官僚机构的自我生存而采用的。托洛茨基认为：

“因此，在 19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在世界面前，俄国政府是一个拥有无敌力量的庞大军事官僚和财政—金融机器”。[165]

托洛茨基认为，俄国国家只为自己工作，脱离了其他阶级，这种人为的特点使它变成了一个泥足巨人。脱离了国家的俄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利益。托洛茨基阐述了帕尔乌斯关于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过程中掌权的可能性的立场，他写道：

“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有可能比发展得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更早地取得政权。在 1871 年，无产阶级有意识地在小资产阶级的巴黎把政权拿到了手，虽然只掌握了两个月，但是在英美那样的资本主义中心，无产阶级却连一个小时也没能掌握政权。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在某种程度上机械地有赖于一个国家的技术力量和资源，是一种简化到极点的「经济」唯物主义的成见。这种观点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我们认为，俄国革命将创造出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之下，政权有可能（在革命胜利时应该）在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客们把革命通通搞砸之前转到无产阶级手中”。[166]

托洛茨基的这一立场与帕尔乌斯早在 1904 年初就在《火星报》上发表的观点不谋而合。帕尔武斯认为，“俄国的革命临时政府应该是一个领导革命运动……社会民主党政府”。托洛茨基提出的“没有沙皇，但要有工人政府”的口号是对这些观点的呼应。

这些观点后来遭到了列宁的尖锐批评，他认为托洛茨基低估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并希望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跳”到无产阶级革命阶段。列宁认为托洛茨基实际上只是在阻碍革命的发展，他写道：

“托洛茨基实际上是在帮助俄国的自由派工人政客，他们通过‘否认’农民的作用来理解他们不愿意提高农民的革命觉悟”。

对农民的虚无主义态度是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特征。托洛茨基把这种评价搬

---

163 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第一章 历史发展的特点”，蔡汉敖译、陈泰编校。
164 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第一章 历史发展的特点”，蔡汉敖译、陈泰编校。
165 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第一章 历史发展的特点”，蔡汉敖译、陈泰编校。
166 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第四章 革命和无产阶级”，蔡汉敖译、陈泰编校。

到俄国，只是在重复他认为无可争议的态度，因为这些态度诞生于“先进的”西方。

对俄国农民革命潜力的态度成为布尔什维主义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分水岭。斯大林后来将第二国际各政党“第二国际各党所以漠视农民问题，有时简直否认农民问题”与列宁的立场进行了对比，他说列宁的出发点是“认为多数农民具有革命能力，认为可以把这种革命能力用于无产阶级专政”。[167]

诚然，这种承认并不意味着农民在列宁所说的工农联盟中扮演了平等的角色。农民只扮演“革命后备军”的角色，这是所有城里人，包括已经成为城市工人的前农民的态度。不愿意把农民看作平等的伙伴，是我国 20 世纪许多政治错误和社会灾难的根源。

与 20 世纪初西欧的工人阶级不同，俄国的无产阶级主要由昨天的农民组成，他们与乡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往往是亲属关系。托洛茨基认为，这些联系的存在是俄国无产阶级落后的表现。事实上，这些纽带有助于在俄国工人的意识中保留许多在传统农民村社中诞生的强烈特质（精神活力、思维活跃、好奇心强、自我要求高、能吃苦耐劳、集体互助等）。正是俄罗斯无产阶级在农民和民间文化中孕育的这些特质，使其成为 20 世纪将我国改造成世界上最强大国家之一的决定性力量。

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层高度评价俄国无产阶级的能力，这一事实最终形成了一种思想基础，即有可能在俄国发动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而无需等待西方国家的革命。随后，俄罗斯无产阶级强大潜力的思想让斯大林提出了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论断。索尔仁尼琴说列宁“有战略计划地打击作为共产主义胜利主要障碍的俄罗斯人民”，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不是列宁，而是托洛茨基表现出了对俄国无产阶级和俄国人民的可能性的轻视，甚至当托洛茨基谈到“无产阶级专政”时，这些言论也可以用来掩盖建立一个会导致建立资产阶级秩序而非社会主义秩序的政权。从托洛茨基对革命过程中将在俄国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推理来看，这就是社会民主党的专政，它将以亲无产阶级的名义进行统治。同时，他还提到了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并将俄国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与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专政进行了比较。托洛茨基写道：

> “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农民.....对于维护无产阶级政权(「工人民主」)的兴趣，无论如何不亚于法国农民对于维持拿破仑•波拿巴军政府的兴趣”。[168]

事实证明，“无产阶级专政”既可以是罗伯斯庇尔的专政，也可以是波拿巴的专政。他们的想法似乎是要在“落后的”俄国重演一百多年前在法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

托洛茨基认为，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不可能持久。他认为主要的危险在于农民人口的“低水平”。他写道：

> “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格和政治上的幼稚愚昧，他们的局限于农村的短浅眼光，他们的不理解世界政治联系和依存关系，都会为无产阶级政权革命政策的贯彻造成极大的困难”。[169]

托洛茨基确信，无产阶级政权“遇到政治障碍要比其自身的技术落后更严

---

[167]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五 农民问题”，《列宁主义问题》，1971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168] 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第五章 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农民”，蔡汉敖译、陈泰编校。
[169] 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第六章 无产阶级政治制度”，蔡汉敖译、陈泰编校。

重.....如果任其发展，就必然会在农民背弃它的时候被反革命所击溃。”。[170]

由此得出的另一个结论是：

> “**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能保持政权，这是一分钟也不能怀疑的。**另一方面，也毫无疑问，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将使我们能够把工人阶级的暂时统治直接变为社会主义专政”。[171]

托洛茨基认为，俄国工人阶级“除了把本国革命与欧洲革命联系起来，俄国工人阶级没有别的出路”。[172]

这些思想，包括他的小册子中的黑体字，成为托洛茨基思想和政治武库的基石。在实践中，这意味着俄国革命的利益要服从西欧社会民主党领袖为自己制定的任务。

历史证明，社会民主主义在 1918 年后在许多西欧国家上台执政后，甚至没有试图建设社会主义，而是仅限于在维护和加强资本主义秩序的同时进行一些社会改革。因此，将俄国的“社会主义专政”与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捆绑在一起，就意味着利用我国的潜力来支持西欧资产阶级，而帕尔乌斯与西欧资产阶级关系密切。

帕尔乌斯用他的理论指导武装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得到了一个可靠的思想指南，准备把俄国革命变成通往建立资本主义欧洲联邦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与此同时，帕尔乌斯努力培养托洛茨基成为全俄革命起义的领袖。他在慕尼黑的培养成果是托洛茨基的《行动计划》，[173]其中概述了革命起义的计划。托洛茨基在书中写道：

> “把工人从机器和车间中拉出来；把他们从大门领到街上；把他们领到邻近的工厂，在那里宣布罢工，然后把新的群众领到街上。这样，从一个工厂到另一个工厂，从一个车间到另一个车间，建立起来并扫除警察的障碍，发表演说并吸引过路人的注意，抓住正在走另一条路的人群，填满街道，占领你遇到的第一座建筑物，利用它们与不断变化的听众进行连续的革命集会，你将使群众运动有秩序，提高他们的信心，向他们解释事件的目的和意义，这样你将把城市变成一个革命营地——这就是总的行动计划”。

多伊彻声称托洛茨基的“行动计划”是独创的，因为它没有任何先例可循，这一点值得怀疑。有报道称，早在 1903-1904 年，托洛茨基就在巴黎聆听了共济会教授奥拉德关于法国大革命史和革命斗争方法的系列讲座。这些讲座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托洛茨基的“行动计划”。

多伊彻声称，到 20 世纪初，世界上还没有发生过工厂工人参与的城市起义，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这种经验不仅存在于以革命传统（包括城市工人起义）著称的法国（只需回顾 1831 年和 1834 年里昂工人起义、1848 年 6 月巴黎工人起义和 1871 年巴黎公社期间的起义即可）。

查尔斯-狄更斯并不像托洛茨基那样热衷于城市工人的起义。他在小说《巴纳比-鲁吉》中对共济会组织的 1780 年伦敦起义的描述，在许多方面与托洛茨基的“行动计划”相似。起义之前是积极的系统性煽动。然后，“暴动者.....成群结队地分散到城市的不同地区……途中这些团伙的人数不断增加，就像河流奔向大海一样。一旦需要，新的领导者就会出现，当不再需要他们时，他们就会

---

[170] 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第九章 欧洲和革命”，蔡汉敖译、陈泰编校。译者只找到了后半句的原文，前半句的原文没有找到。——译者。

[171] 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第八章 俄国的工人政府和社会主义”，蔡汉敖译、陈泰编校。

[172] 托洛茨基《总结与前瞻》，“第九章 欧洲和革命”，蔡汉敖译、陈泰编校。

[173] 译者没有找到本书中文翻译。——译者。

消失，而在关键时刻，他们又会像从地底下爬起来一样重新出现。根据不同的情况，爆发的性质也不同。干完一天活回家的平静工人扔下工具袋，瞬间就变成了暴乱者。信差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仿佛有什么传染病席卷了整个小镇。兴奋、喧闹、快速的移动对成百上千的人产生了吸引力，他们无法抗拒。传染性的疯狂像可怕的恶性热病一样蔓延开来。虽然还没有达到极致，但每小时都有越来越多的人受害，伦敦社会已经开始颤抖，注视着这场骚乱的疯狂”。

托洛茨基似乎打算将西欧长期以来描述和研究的城市起义经验应用于俄国。在他的“行动计划”中，最主要的是控制因骚动而激动的群众的情绪，并把他们变成破坏制度的工具。显然，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打算近距离遥控这些事件。然而，俄国发生的事件使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的计划落空了。

# 第 九 章

# 在革命风暴的浪潮中

1905 年 1 月 10 日（23 日），托洛茨基抵达日内瓦，在那里向俄国移民发表演讲。他知道前一天在圣彼得堡举行了群众示威游行，但出于某种原因，他以为游行并没有举行。当他走进《火星报》编辑部（此时该报已从伦敦迁往日内瓦）时，马尔托夫对他关于示威游行取消的说法大加斥责：

“怎么没有举行？”.....我们昨天在咖啡厅里坐了一夜，传看新来的电讯，难道您还不知道吗？快看看吧……”[174]

——并给托洛茨基塞了几封新电报。托洛茨基回忆说：

“我迅速地浏览了有关“流血星期日”报道的开头几句，不禁热血翻涌”。[175]

托洛茨基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看待俄国革命开始的消息的人。这场革命的可能性已被谈论了近一个世纪，但它的到来甚至让那些为此精心准备的人也大吃一惊。一方面，革命是残存的地主君主制秩序与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关系之间、弱势群体与特权阶层之间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革命形势被国内外各种政治团体所利用，这些团体往往相互敌视，因此秘密地、独立地为推翻沙皇制度做准备。

即使在“宴会运动”期间，俄罗斯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他们的商业活动受到当时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限制）也反对专制制度。知识分子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断反对专制制度。在革命政党（社会革命党人、社会民主党人、无政府主义者）的政治宣传影响下，工人们的示威游行和罢工中不止一次出现了反对专制的口号。

出于各种原因，俄罗斯的外部竞争对手也对摧毁专制制度感兴趣。美国希望削弱俄罗斯在谷物市场的地位。德国和奥匈帝国试图扩大其在巴尔干地区的影响力，希望俄国削弱，避免国际事务加剧自身国内问题。此外，他们将俄国视为敌对的英法协约的盟友。日本自 1904 年初开始与俄国交战，急于在敌人阵营中制造国内政治危机。这些列强不遗余力地通过其代理人网络在俄国内部进行阴谋活动。

国际犹太资产阶级也为打败俄国做出了巨大努力。雅各布-希夫曾是德国臣民，后成为美国公民，他是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库恩-莱布银行的负责人，在日俄战争期间向日本提供了 2 亿美元的贷款。他还慷慨资助了俄国的革命运动。

一些研究人员将许多俄国新闻机构的失败主义立场归咎于日本人或希夫的金钱。关于俄国军队软弱、指挥无能、后方腐败的报道只有利于革命宣传。在慕尼黑时，托洛茨基在他的小册子（《行动计划》）中建议围绕日俄战争的失败煽动人们的激情：

“我们的船只行驶得更慢了，我们的火炮离得更远了，我们的士兵是文

[174]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十三章 回国”，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175]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十三章 回国”，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盲，我们的军士没有指南针或地图，我们的士兵赤脚、赤身、挨饿，我们的红十字会在偷窃，司令部在偷窃——当然，有关这些的谣言和消息会传到军队，并被军队贪婪地吸食。每一个这样的谣言都像强酸一样腐蚀着道德的锈迹”。

托洛茨基几乎不知道，从 1904 年底就开始领导“彼得堡俄国工厂工人大会”的牧师格奥尔基-加邦也使用了同样的宣传方法。在加邦的建议下，“大会”成员向工人们介绍了日俄战争进程的筛选信息，这些信息给人的印象是沙皇制度已经彻底腐朽。关于亚瑟港陷落的报道激起了人们的熊熊怒火，因此，只需一个小小的借口，即被歪曲的解雇 4 名工人的消息，就可以用罢工使首都陷入瘫痪。

目前还不清楚牧师背后的势力是什么，是谁指挥了他的行动。他与警察和社会革命党（其中有许多警察特工）的关系表明，加邦的手是被警察用来挑衅的。俄罗斯警察在与恐怖分子的联系中所扮演的奇怪角色，以及其他许多情况，使得我们无法肯定地说警察的行为完全是为了统治秩序的利益。无论加邦的幕后黑手是谁，有一点是明确的：首都工人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及其残忍的枪杀行为让国内的许多革命者，尤其是国外的革命者措手不及。

显然，在收到来自圣彼得堡的消息之前，托洛茨基认为距离他的“行动计划”付诸实践还有很多时间。 当局对示威者的无情屠杀表明，事件的发展完全不符合“行动计划”作者在慕尼黑的计划。因此，托洛茨基决定立即前往俄国，争取在沙皇军队镇压最后一批革命群众之前将他的计划付诸实践。托洛茨基写道:“我不能再在国外逗留了”。

托洛茨基立即返回慕尼黑。他们与帕尔乌斯一起决定，立即以《直至 1 月 9 日》为标题出版载有“行动计划”的小册子。据托洛茨基说，帕尔乌斯当时说：

“这个事件充分证明了这种预见。今天谁也不能否定，总罢工已经成为最主要的斗争手段。1 月 9 日的这个事件虽然披着宗教的外衣，但它实际上是一次政治罢工。现在我们只需要再补充一点，那就是俄国革命的最终结果将是工人民主政府掌权”。[176]

本着这种精神，帕尔乌斯为托洛茨基的《行动计划》写了序言。

与此同时，还采取了将托洛茨基非法转移到俄国的措施。托洛茨基再次向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克多-阿德勒寻求支持。据托洛茨基称，后者“为这些人提供路费、护照，告诉他们联络地址等。在他的住处，一个理发师为我易容，因为国外的俄国密探们对我的这张面孔太熟悉了”。[177]很明显，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都把托洛茨基视为他们在俄国革命中的代理人，就像帕尔乌斯一直以来被认为的那样。

塞多娃先于丈夫前往俄国，以便“去基辅安排住处并建立联系”。[178]1905 年 2 月，托洛茨基持阿尔布佐夫准尉的护照抵达基辅。在基辅，托洛茨基不断更换公寓。有一段时间，为了保密，他甚至被安排住进了眼科医院。

托洛茨基在基辅地下工作期间和 1905 年之后的几个月里，一直与列昂尼德-克拉辛保持着联系。选择克拉辛作为能够给予托洛茨基最大帮助的人绝非偶然。作为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电气工程师，克拉辛还掌握了良好的企业家技能，是迅速发展的电气工业的组织者。克拉辛在俄国国内外商界的关系使他能够在革命运动中发挥基本独立的作用。他时而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担任领导职务，时而

[176]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十三章 回国”，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177]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十三章 回国”，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178]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十三章 回国”，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退出积极的政治活动，回到自己的电气工程专业和商业生活中。同时，他属于所谓的和解派，即愿意与孟什维克妥协的人，因此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两派之间采取“中立”立场的托洛茨基更容易与他找到共同点。

然而，克拉辛的“和解”立场丝毫不影响他对革命的看法。克拉辛赞成尽快克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分裂，他认为这是坚决反对专制的必要条件。在布尔什维克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05 年 4 月）上，克拉辛作了两个重要报告（《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和《中央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克拉辛与列宁一起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五名成员之一。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武装起义的决议》承认：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组织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来直接同专制制度斗争是党在目前革命时期最主要最迫切的任务之一”。[179]

代表大会指示党组织“要采取最有力的措施来武装无产阶级以及制定武装起义和直接领导武装起义的计划，必要时应设立由党的工作者组成的专门小组来进行这项工作”。[180]

准备武装起义成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心任务。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克拉辛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大会结束后不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成立了战斗技术小组，列昂尼德-克拉辛担任组长。“战斗技术小组的成员组织制造炸药和炸弹，建立储存武器的仓库，安排在国外购买武器并运往俄罗斯”。在战斗小组的控制下，还有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团体——战斗队。托洛茨基写道：

> “对我来说，1905 年间与克拉辛的关系无疑是十分宝贵的。我们约好在彼得堡见面，秘密接头地址也是我从他那里拿到的”。[181]

在帝国的首都，托洛茨基用地主维肯季耶夫的护照住了下来。

托洛茨基很快被送往芬兰，住在“劳哈”（芬兰语，意为“和平”）寄宿处。众所周知，托洛茨基在寄宿处准备了一些宣言，这些宣言的开头也向读者发出了类似的呼吁：“听着，农民！”或“听着，工人！”这些文告呼吁工人们不要害怕沙皇的子弹，就像他们不要害怕每天去工厂一样，“在那里，机器吸吮着你们的血液，残害着你们的身体”。向村民发表的宣言重复了农奴制时期俄国知识分子中常见的故事，讲述了农民如何被用来交换纯种狗，沙皇如何用农奴劳工来奖赏贵族。托洛茨基敦促农民劝说农民出身的士兵不要射杀工人。他对士兵们说，俄国是一艘“巨大的战舰”，敦促他们以“波特金”号战舰的水兵为榜样，反对当局。

然而，我们不知道这些公告是通过社会民主党的哪些组织散发的，也不知道它们在革命过程中是否被使用过。也没有人解释，为什么托洛茨基不像克拉辛和其他许多社会民主党人那样身临其境，而是躲在基辅和圣彼得堡的安全屋或芬兰的和平宾馆里。他似乎是在等待命令，以便在合适的时机出现在政治前台。

以 1 月 9 日“血腥星期日”为开端的俄国革命事件发展并不平衡。这主要是由于反政府力量分为不同的政党，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革命目标。

在这些动荡的事件过程中，帕尔乌斯越来越积极地干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事务。帕尔乌斯这样做给人的印象是，他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的授权下行事的。帕尔乌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的政治代表是 1905 年 3 月成立的“帕尔乌斯主义者”小团体的成员，其中包括梁赞诺夫（戈尔登达赫）和埃尔曼斯基。

---

[179]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全集》，第 10 卷。
[180]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全集》，第 10 卷。
[181]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十三章 回国”，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列宁偶尔会对《火星报》上帕尔乌斯的出版物发表评论，或赞扬他的睿智，或尖锐批评他建议革命政党与自由资产阶级做交易。在 1905 年的几个月里，帕尔乌斯更喜欢在德国提出建议和指示，但在 10 月中旬，他向社民党的同事们宣布，他将前往俄国。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印象是，他掌握着俄国事件的可靠信息，甚至部分控制着革命的发展。因此，当他自信满满地宣布：“人渣完蛋了！”——并向朋友们保证，他将带着一本关于俄国革命胜利的新书回来时，他们相信了他。显然，帕尔乌斯的自信鼓舞了一些社民党领导人，他们密切关注着俄国的事态发展，准备在道义上支持革命的胜利。国内局势急剧恶化。

莫斯科工人的罢工始于 1905 年 9 月，得到了其他城市示威游行的支持。10 月 10 日，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相继举行了大罢工。即使在圣彼得堡总督特列波夫发表“不要空枪，不要爱惜子弹”的声明后，政府镇压罢工的企图也没有得逞。很快，俄国就有 200 多万工人举行了罢工。罢工者要求推翻政府、建立共和国和革命临时政府的权威。

在圣彼得堡罢工期间，约 20 万工人于 10 月 13 日选举产生了工人代表苏维埃。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成员包括克拉辛、博格丹诺夫、茨哈卡亚、波斯托洛夫斯基、克努扬茨、克拉西科夫等人。无党派律师赫鲁斯塔列夫-诺萨尔当选为苏维埃主席。苏维埃在克拉辛曾经毕业的技术学院举行了会议。中央委员会战斗技术小组组长参加了委员会的组成，这表明布尔什维克准备把圣彼得堡委员会变成武装起义的总部。

后来，克拉辛回忆说：

> “那是一段欢乐的时光！最紧张的党的组织工作、建立技术机构、在群众中进行最广泛的宣传和鼓动.....积极准备武装起义、一系列阴谋活动和技术事务——所有这一切把时间完全填满了”。

克拉辛的“欢乐时光”被“技术事务”填满，其中包括炸弹制造工作。

彼得堡苏维埃成立两天后，托洛茨基于 10 月 15 日返回彼得堡，并抵达技术学院。克拉辛邀请他参加布尔什维克派的会议。不久，帕尔乌斯也来到了彼得堡。他的预言似乎正在成真，他期待着专制制度分分秒秒的垮台和世界不断革命的开始。众所周知，这种希望是有根据的。从政治总罢工的发展来看，它很有可能发展成为一场革命起义。

然而，这一次，迄今为止一直依靠蛮力的政府决定采取行动。10 月 17 日，沙皇发表宣言，宣布“公民自由的基础不可侵犯”——人身、信仰、言论、集会和工会自由权利不可侵犯。宣言承认国家杜马是立法机构，未经杜马批准，任何法律都不能生效，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自由派资产阶级和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要求。10 月 17 日之后，这些政治活跃分子对革命斗争失去了兴趣。在此之前一个半月，《朴茨茅斯和约》签署，结束了与日本的战争。政府不仅在国内政治领域，而且在外交政策领域消除了紧张局势的根源。

10 月 17 日的《宣言》在俄罗斯民众中引起了兴奋，他们相信自由和民主事业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卡塔耶夫的小说《孤独的白帆》的主人公彼佳-巴谢记得，在那一天，“所有的城门上”都悬挂着“白蓝红相间的国旗”，人们读着贴在护柱上的《宣言》文本，“丝毫不觉得自己是在大街上，而是高呼‘万岁’，像复活节一样亲吻”。

武装叛乱的支持者也产生了幻想。他们似乎在《宣言》中读到了专制者所说的“动荡和不安.....巨大而沉重的悲痛充斥着我们的心”，于是得出了与彼佳-巴谢相同的结论，认为“沙皇一定是陷入了困境，如果可能的话，他请求任何

人帮助他”。然而，革命者不会帮助沙皇。《沙皇宣言》让他们相信，政府已经走上了一条向反政府势力让步的道路，这对任何政权来说都是致命的，不仅不会降低革命的热度，反而会增强反对派对自身力量的信念，证明统治集团的无能为力。人们决定用这种信念来武装人民，并为此组织演讲，以证明现存政权的衰微，并表明《沙皇宣言》只是专制统治者的无奈之举，而专制统治者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事态似乎开始按照托洛茨基的“行动计划”发展。他后来回忆说：

“对我们来说，革命是一种土生土长的元素，尽管非常叛逆”。

在国内的一些大城市，学生们举行了示威游行，他们毁坏了皇室画像，亵渎了俄国专制者的纪念碑，高呼反对君主和现行制度的口号。

托洛茨基决定，完全按照他的“行动计划”，扮演国家主要煽动者的角色，鼓动群众采取新的行动反抗当局。在《宣言》发表的当天，他作为从孟什维克中选出的苏维埃代表“亚诺夫斯基”，在圣彼得堡大学发表了煽动性演讲。托洛茨基后来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时显然很满意，听众们欢呼着他对特列波夫的咒骂和大赦的要求。演说家感叹道：

“公民们，我们的力量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必须手持利剑捍卫自由。而沙皇的宣言——看，——只是一纸空文”。

正如多伊彻所写：

“他用一种戏剧性的手势在人群面前挥舞着《宣言》，并用拳头猛地将其揉成一团”——演讲者演讲道——“今天他给了我们自由，明天他就会夺走自由，把它撕成碎片，就像我现在在你们眼前把这纸自由撕成碎片一样”。

多伊彻总结道：

“因此，俄国第一次听到了革命演说家的声音”。

代表亚诺夫斯基（托洛茨基）的发言给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很快被选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由三支主要革命力量（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各三名代表组成。托洛茨基代表孟什维克。虽然托洛茨基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任何派别都没有一年时间，但他与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克拉辛都保持着联系，这使他很快从幕后脱颖而出，成为革命权力机关的主要人物之一。

然而，10 月 17-18 日的暴力革命示威并没有引起群众的支持。绝大多数俄国民众还沉浸在《沙皇宣言》的强烈印象中，处于亢奋状态。因此，革命者撕碎《宣言》、亵渎沙皇纪念碑和肖像的一切行为，都可能成为犹太人亵渎国家象征、煽动群众组织暴乱的证据。而这些“证据”立即开始以大量谣言的形式传播开来。据称，在基辅，“一名犹太学生用红旗刺穿了沙皇的肖像”。据说，另一名犹太学生在挖出君主肖像的头后 将自己的头塞进了洞里，并在阳台上向人群喊道：“现在我就是君主了”，有谣言说犹太人想把哥萨克人赶出顿河和库班河地区，夺取他们的土地。有传言说，犹太人对俄国人说：

“你们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很快就会变成我们的犹太教堂……很快犹太人将成为部长，你们的部长将为我们的拾破烂者倒茶！.....我们给了你们上帝，我们也会给你们沙皇”。

这些谣言的理由是犹太人敌视“异族人”。此时，在《俄罗斯旗帜》等报刊的影响下，部分舆论正在形成，任何信众都会像肖洛姆-阿莱切姆的故事中的人物法警马卡-霍洛德尼一样，相信“犹太人每个安息日都会在会堂里诅咒所有其他民族，并呼吁毁灭他们，他们一提到教堂就会吐口水，当基督徒离开犹太人的房子时，他们就会追着他泼泔水”。关于亵渎和侮辱民族尊严的谣言引起了复仇

的渴望。

10 月 18 日，奥廖尔发生了犹太人大屠杀，一直持续到午夜。10 月 19 日，库尔斯克、辛菲罗波尔、顿河畔罗斯托夫、梁赞、大卢基、喀山、伊万诺沃、卡卢加、诺夫哥罗德、斯摩棱斯克、托木斯克、图拉、乌法和俄罗斯其他许多城市都发生了大屠杀。从 10 月 18 日至 24 日，大屠杀总共覆盖了俄罗斯的 660 个城市、城镇和村庄。与此同时，正如斯利亚尼诺夫所指出的：

> “被杀害和殴打的不仅有犹太人，还有革命分子和那些仅仅被怀疑参与解放运动的人”。

大屠杀的景象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宗教狂热分子的运动不可避免地会有非宗教分子的加入，“神圣的复仇”主要表现为对家园的破坏。狄更斯在描述 1780 年 6 月发生在天主教徒家中的新教徒大屠杀时写道：

> “暴徒们占领了房屋后，从地窖到阁楼，四处散开，干起了魔鬼般的勾当。有些人在窗下生火，有些人打碎家具，把碎片扔进火里；在墙壁和窗户的破口足够宽的地方，桌子、抽屉、镜子和画都被扔进火里。每当有新的‘燃料’出现，就会发出一声怒吼，一声狂嗥，这使得满目疮痍、火光冲天的景象更加恐怖和令人作呕”。

库普林在小说《甘布里努斯》中阐述了大屠杀参与者的心理。库普林在《甘布里努斯》一书中写道：

> “那些曾经被普遍纯洁的喜悦所感动，被即将到来的兄弟之光所激励，在被征服的自由的象征下，唱着歌走过大街小巷的人们——这些人现在要去杀人了，他们去杀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奉命行事，也不是因为他们对犹太人怀有敌意（他们与犹太人往往有着亲密的友谊），甚至也不是因为贪婪，而是因为生活在每个人心中的肮脏、狡猾的魔鬼在他们耳边低语：
>
> ‘去吧，一切都将逍遥法外：谋杀的禁忌好奇心，暴力的诱惑力，控制他人生命的权力’”。

据官方统计，在大屠杀中，有 810 人丧生，1770 人受伤。BSE 第 1 版发表的文章《俄罗斯的犹太人大屠杀》称：

> “根据公开的计算，有 3500 到 4000 人死亡，1 万多人受伤”。

不管谁对受害者人数的估计是正确的，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俄罗斯从未发生过这样的大屠杀。

这些大屠杀和之前发生的事件让许多非犹太人相信，革命的主要组织者是犹太人。许多犹太人还认为，他们是现代俄罗斯迫害的主要受害者，就像他们在《旧约》和中世纪时一样。

针对大屠杀的对策是组织犹太社区进行自卫。在这方面，一位来自尼古拉耶夫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证词很有意义，他声称在他逗留期间，“托洛茨基在基辅参加了犹太人自卫组织”。此人描述了他与托洛茨基的会面，托洛茨基在会面中说：

> “你们应该知道，我们已经与当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领导人就建立联合自卫组织达成了协议。我们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朋友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都将参与其中。你和你的兄弟将负责我们和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联络工作”。
>
> 托洛茨基的公寓成为了总部……托洛茨基为所有“热点”提供武器。

很难确定这一信息的准确性，因为从这一证词中看不出我们所说的是 1905 年的哪一天。如果是在年初托洛茨基在基辅时发生的，那么自卫队早在十月大屠杀之前就已经成立了。如果是在十月中旬发生血腥事件之时，托洛茨基正在圣彼

得堡，那么这个故事就是虚构的。与显而易见的证据相反，托洛茨基可能同时在遥远的城市，就像哈西德故事中的茨达迪克一样。

犹太人大屠杀、君主主义者的多次大规模示威游行以及大部分民众对 10 月 17 日沙皇宣言的支持，都表明彼得堡罢工不可能发展成全俄起义。10 月 21 日，圣彼得堡苏维埃决定结束罢工。在镇压罢工中被杀害的工人和革命者的葬礼原定于 10 月 23 日举行，但在前一天，苏维埃得知他们准备驱散葬礼队伍，并将举行大屠杀。托洛茨基赞成拒绝大规模的送葬队伍。这也与苏维埃大多数成员的立场一致，他们认为：

> “彼得堡的无产阶级不是在特列波夫选择的那一天，而是在对武装起来、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有利的时候，给沙皇政府最后一击”。

显然，圣彼得堡苏维埃在 10 月 21 日和 22 日作出的结束罢工和取消葬礼游行的决定，对变化了的形势作出了正确的反应。

然而，形势正在迅速发生变化。11 月 2 日至 7 日，苏维埃为抗议军事法庭审判喀琅施塔得叛乱分子的决定，在圣彼得堡组织了大罢工，罢工的成功让许多革命者相信，他们已经牢牢掌握了主动权。托洛茨基在代表苏维埃宣布停止罢工时宣称：

> “事件正在为我们服务，我们不需要加快它们的步伐。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延长决定性行动的准备期，比如一两个月，直到我们建立起一支尽可能有凝聚力、有组织的军队”。

俄国革命的一点点经验并没有让革命政党的领导人明白，在世界各国建立一支有凝聚力、有组织的革命军队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希望用克拉辛战斗小组的炸弹武装起来的激进分子能够在与有组织的沙皇军队的战斗中获胜是荒谬的。只有军队和警察拒绝执行沙皇的命令，才有可能取得胜利。然而，士兵和水兵在喀琅施塔得和塞瓦斯托波尔的孤立示威并没有得到其他军事部队和师的支持。陆海军没有大规模地站到革命一边。在革命者看来，要取得胜利，他们所缺少的只是几个月的时间和一个领导革命的中央机构。

在这些日子里，列宁从尽快发动武装起义的必要性出发。他在 11 月 3 日《新消息报》上发表的《决战即将来临》一文中表达了这一观点。11 月 8 日，列宁抵达圣彼得堡。根据埃森的回忆，他在圣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狠狠地责备我们竟让孟什维克窃据了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领导权”。[182]

但突然之间，俄国革命宣传的主角不是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而是帕尔乌斯及其领袖。帕尔武斯到达圣彼得堡后没几天，就收购了一家自由主义倾向的日报《俄罗斯报》，根据多伊彻的说法，他“把它变成了一个激进社会主义的大众机关报”。在 10 月底的几天内，《俄罗斯报》的发行量从 3 万份增加到 10 万份。到 12 月初，该报的订单总数已达 50 万份，但机器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

与此同时，帕尔乌斯组织出版了孟什维克的新闻机关报《起源》。虽然担任报社社长的马尔托夫并不赞同帕尔乌斯关于不断革命的观点，但他不得不承担起宣传这一理论的工作。马尔托夫在给阿克雪里罗德的信中写道：

> “我们将不得不同意宣传这一颇具风险的思想，而不能反对任何东西”。

除了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之外，维克多-阿德勒、奥古斯特-倍倍尔、卡尔-考茨基、罗莎-卢森堡、弗朗茨-梅林和克拉拉-蔡特金等国际社会民主党的著名人士也为该报的出版做出了贡献。显然，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领袖人物对《起源》工作的积极参与使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相信，第二国际是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的后盾。

---

[182] 埃森《同列宁的会见》，《回忆列宁》，第 2 卷。

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试图进入帕尔乌斯的出版物。托洛茨基在《起源》上发表了一篇普列汉诺夫的文章，这让他感到了一种愉快的报复，而就在一年前，普列汉诺夫还宣称他对《火星报》上的邻居托洛茨基感到“道德上的反感”。

许多年后，托洛茨基高兴地引用了加米涅夫的描述，即圣彼得堡火车带来的《起源》是如何在火车站被抢走的。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在十月中旬之前一直是革命事件的幕后策划者，而现在他们却成为了革命事件的领导者，并通过大众报刊影响着俄国的公众舆论，为新的社会动荡做好准备。

同样令人惊讶的是，本应保护沙皇和王室利益的俄罗斯警察却没有注意到圣彼得堡苏维埃中包括他们自 1902 年以来一直在寻找的流亡逃犯列夫-勃朗施坦。俄罗斯警察也没有找帕尔乌斯的麻烦，因为他以前只能用别人的护照非法潜入俄罗斯。俄罗斯警察的许多其他行为也同样奇怪，他们与谋杀国家著名政治家的组织者阿泽夫合作，为巴格罗夫服务，巴格罗夫在 1911 年杀害了俄罗斯总理斯托雷平，然后“忽视”了国家上层社会（包括共济会）的许多阴谋，这些阴谋导致了 1917 年二月革命和君主制的推翻。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秩序卫士”中，有些有影响力的人不是为了维护专制制度，而是为了与俄国毫无关系的秘密势力的利益而破坏和摧毁专制制度。

显然，在革命期间，人们没有时间去关注许多奇怪的事情。革命者们也是如此，此时他们试图共同行动，而没有过多考虑谁在何时、出于何种原因参加了革命。1905 年 11 月，革命者深信时间在为他们工作，并试图不屈服于政府的挑衅。因此，列宁在 11 月 14 日的委员会会议上就如何应对圣彼得堡大规模解雇工人的问题发言时，明确表示反对举行罢工来支持被解雇的工人。托洛茨基坚决支持这一立场。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列宁主义决议，指出“工人不会在政府企图强使他们战斗的不利的条件下应战”。[183]

11 月 16 日塞瓦斯托波尔水手起义的开始被许多人视为内战开始的前奏。

“塞瓦斯托波尔的起义日益扩大。……因此，我们正处在决定性关头的前夕”——列宁在《新生活报》中写道。[184]

在这些日子里，托洛茨基参加了魏克斯库尔-冯-希尔德布兰特男爵夫人家的招待会，客人们看到无产阶级苏维埃的成员穿着最时髦的衣服，都感到非常惊讶。托洛茨基对聚集在男爵夫人家的一大群军官说，工人阶级和自由本身是手无寸铁的。他们，军官们，掌握着国家军火库的钥匙。在决定性时刻，他们有责任把这些钥匙交给它们理应属于的人——人民。

实质上，托洛茨基是在重复他在慕尼黑写的、革命爆发后最初几天发表的小册子中提出的结论。在这本小册子中，他认为军队应该自愿把武器交给新当局。这一次，他决定亲自向那些手中握有武器的人索要这些武器。多伊彻正确地认为，军官们可能认为托洛茨基的这一呼吁是“一个绝望者的玩笑”。然而，革命者相信，陆军和海军中有许多潜在的施密特中尉，专制制度的力量正在耗尽，革命已经做好了胜利进军的准备。

11 月 23 日，列宁保证说：

“起义日益发展。专制的维特政府日益软弱无力、惊慌失措和分崩离析”。

---

[183] 列宁《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关于与同盟歇业作斗争的办法的决定》，《列宁全集》，第 12 卷。

[184] 列宁《军队和革命》，《列宁全集》，第 12 卷。

[185]

在街垒的另一边，列宁看到了完全相反的进程：

“革命的组织和动员”。[186]

这种评价是没有道理的。三天后，以赫鲁斯塔列夫-诺萨尔为首的圣彼得堡苏维埃领导人被捕。11 月 27 日，选举产生了临时主席团，成员包括托洛茨基、斯维尔德什科夫、兹列德涅夫。如果正如革命者所设想的那样，专制制度很快倒台，那么已成为首都苏维埃领导人之一的托洛茨基就可能成为革命政府的关键人物之一。

但很快，专制制度显然没有倒台，而是开始了反攻。政府授权地方当局“在不征求中央政府许可的情况下采取非常措施”，以打击铁路、邮局和电报部门的罢工。政府还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参与罢工的最危险表现应受到刑事处罚”。通告命令“立即查明反政府运动和土地运动的所有领导人，并将他们关押在地方监狱，根据内务部长的指示进行处理”。

在这种气氛下，帕尔乌斯决定对政府进行反击，提出自己的斗争条件。12 月 2 日，圣彼得堡苏维埃临时主席团未经全会讨论就通过了《金融宣言》，出人意料地将与政府的斗争转入了一个完全不同寻常的革命领域。宣言从头到尾都是由帕尔乌斯起草的，而他并不是苏维埃的成员。

《金融宣言》宣称俄罗斯的财政破产不可避免，并宣布“罗曼诺夫家族的债务义务不会得到战败人民的承认”。该《宣言》指出：

> “专制制度从未得到过人民的信任，也没有得到人民的授权。因此，我们决定不允许偿还沙皇政府在明确、公开地向全体人民发动战争时缔结的所有贷款债务”。

《宣言》呼吁：

> “应放弃折旧费，以及所有有利于国家的付款。在包括工资在内的所有交易中，都应该用黄金支付，如果金额不超过 5 卢布，则用全额硬币支付。必须从储蓄银行和国家银行提取所有存款，并以黄金支付”。

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现在决定引发金融恐慌，而不是激起群众的革命示威。为此，帕尔乌斯的报纸广为流传《金融宣言》。

与组织任何此类恐慌时的情况一样，宣布银行不可靠和货币不稳定导致大量存款从储蓄银行撤出。另一方面，宣布政府财政破产严重影响了卢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报价。

俄国国务会议就国家银行 1905 年的报告通过的决议中提到了《金融宣言》：

> “由于这一罪恶的宣言以及随之而来的极端党派的反政府煽动，在民众中出现了我国国家信贷史上前所未有的恐慌：从国库中提取存款呈现出自发的特点，到报告年度结束时已达到 1.48 亿甚至更多的巨额数字。与此同时，黄金支付需求大幅增加，资本外流导致的货币抛售业务也大大增加”。

苏联历史学家通常认为《金融宣言》是圣彼得堡苏维埃在反对专制的斗争中采取的一项重要行动，而完全忽视了帕尔乌斯在编写这份文件中的作用。然而，如果我们记得《宣言》的作者几年后开始在奥斯曼帝国和巴尔干国家进行数百万美元的谷物和武器投机，我们就不难推测，帕尔乌斯在组织 1905 年 12 月的金融恐慌时，其指导思想不仅仅是、也不完全是为了帮助革命事业。

我们知道，在这种恐慌中，不仅有受害者，也有赢家。受害者是俄罗斯的银

---

[185] 列宁《垂死的专制政府和新的人民政权机关》，《列宁全集》，第 12 卷。
[186] 列宁《垂死的专制政府和新的人民政权机关》，《列宁全集》，第 12 卷。

行和整个国家，它们的金融体系受到了严重冲击。但可以推测的是，帕尔乌斯和他的朋友们（他们为他提供了购买圣彼得堡报纸的资金）在这些事件中并非毫发无损。

显然，帕尔乌斯的“朋友”非常有影响力。几年后，帕尔乌斯被德国最高层接受，他在俄国组织革命的计划不仅得到了“第二帝国”领导人的批准，还得到了金钱上的支持，这不能不说是偶然的。众所周知，俄国的金融危机利用了德国银行家。他们要求俄国向柏林运送一大批价值 6000 万卢布的黄金。

《金融宣言》让帕尔乌斯和法国银行家受益匪浅，他们同意贷款支持俄国，但条件是保税。1906 年 4 月，法国在巴黎签署了向俄国提供 8437.50 万卢布贷款的协议，年利率为 5%。俄罗斯历史学家西罗金指出，在这笔贷款之后，“法国出现了一大批从‘俄罗斯贷款’中‘剪取息票’的放债人”。

《金融宣言》的后果表明，欧洲主要国家有影响力的金融和政治力量支持帕尔乌斯。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的革命言论实际上是以牺牲俄国为代价，为西方金融家敛财和加强西方国家政治地位的幌子。托洛茨基意识到这一点了吗？他是否意识到，在取得革命权力机关的权力之后，他只是一个狡猾的金融诈骗计划的执行者，他不是革命的傀儡，而只是世界主要傀儡操纵者手中的一个傀儡？遗憾的是，我们无法知道托洛茨基的“入门水平”如何，也无法知道那些掌握着世界金融和世界政治命脉的人的秘密。

在意识到《金融宣言》对国家经济形势造成的严重后果后，总理维特下令没收所有发表过该宣言的报纸。临时局的成员们意识到，苏维埃的命运将在未来几天内决定。他们不能再等待沙皇军官把兵营的钥匙交给他们了。在 12 月 3 日召开的圣彼得堡临时苏维埃扩大会议上，两个社会民主党派都提议在 12 月 5 日发动总罢工。社会革命党人和全俄铁路联盟的代表不支持他们的提议，声称自己没有做好“总战斗”的准备。会议期间，人们知道警察要逮捕苏维埃的成员。在主持会议的托洛茨基的建议下，会议决定不解散，而是让他们自己被逮捕。多卷本《苏联共产党历史》的作者认为：

> “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警察和士兵冲了进来，逮捕了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大部分代表。不仅首都无产阶级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多伊彻认为，决定托洛茨基在这些时刻的行动的主要因素是他的“自豪感和对舞台效果的渴望.....”他把戏剧的最后一幕变成了一场诙谐的综艺表演，大胆地进行了表演。当一名警察站在执行委员会面前开始宣读逮捕令时，托洛茨基尖锐地打断了他：

> “请不要干扰发言者的发言。如果你想发言，就必须说出你的名字，然后我会问大会是否愿意听取你的发言”。

据称，这位莫名其妙的军官一直等到托洛茨基让他发言“了解情况”。在军官宣读了命令的内容后，托洛茨基让另一位发言者发言。托洛茨基说：

> “你已经说过了，现在离开会场”。

然而，在克服了混乱之后，军官带着士兵逮捕了执行委员会成员和许多苏维埃成员。在被宪兵抓走之前，托洛茨基设法对着大厅喊道：

> “看看沙皇是如何实现他的《十月宣言》的！快看！”

后来，托洛茨基在被执法人员拘留时又重复了这样的场景。每次他都不得不被强行带出房间，而他自己却在大声喊着抗议的话。

托洛茨基显然喜欢这样的丑剧。他可能也从 1905 年 12 月 3 日上演的一幕中得到了满足。如果托洛茨基不出风头，苏维埃成员本可以躲起来，但显然，为了

出风头，为了光鲜亮丽，托洛茨基没有放过他在圣彼得堡苏维埃的同事们。

这一天，帕尔乌斯没有被捕，他决定在没有托洛茨基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第二天，帕尔乌斯宣布成立新苏维埃。新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会由一些不知名人士组成：维克托-塞梅农、鲍里斯-戈德曼、季莫非-斯米尔诺夫、叶夫根尼-弗伦克尔和帕尔乌斯本人，帕尔乌斯宣布自己为彼得堡委员会主席。委员会号召彼得堡工人举行罢工。如果警察试图逮捕苏维埃的新成员，帕尔乌斯提议使用枪杆子。

然而，此时革命的主要事件却从圣彼得堡转移到了莫斯科。由于彼得堡苏维埃遭到逮捕，莫斯科布尔什维克联合会决定于 12 月 7 日宣布举行总罢工，并将其转变为武装起义。这一决定得到了莫斯科苏维埃的支持，莫斯科苏维埃在其宣言中宣布对专制进行无情的战争。12 月 10 日至 11 日，莫斯科 15 万工人的罢工演变成了起义。在 10 天的时间里，2000 名武装和 4000 名非武装的战斗义勇军成员在莫斯科的一些地区的街垒上展开了战斗。12 月 15 日至 16 日，部队到达莫斯科后，反革命部队在人数上占优势，起义被击败。罗斯托夫、新罗西斯克、叶卡捷琳娜斯拉夫、戈尔洛夫卡、哈尔科夫、亚历山德罗夫、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赤塔、彼尔姆、下诺夫哥罗德和其他城市的起义也以类似的方式发展。

到 12 月底，所有起义都被镇压下去，参与者损失惨重。仅在莫斯科，就有超过 1059 名起义者被打死。惩罚性的征伐在全国各地展开。到 1906 年 4 月，被枪决、绞死或杀害的总人数达到了 14 000 人。监狱中的政治犯人数为 75000 人。托洛茨基就是其中之一。

和五年前一样，托洛茨基再次被关进沙皇监狱。他把这段在圣彼得堡监狱度过的生活称为“我的第二次监狱生活”。托洛茨基先是被关在“克罗斯特”，然后被关在彼得保罗要塞，接着被关在预审拘留所，最后被关进中转监狱。托洛茨基指出：

> “这一次对我来说比第一次轻松多了，而且条件也比八年以前的那次要优越得多”。[187]

在这里，托洛茨基有机会工作。用曾与他一起服刑的斯维奇科夫的话说，“托洛茨基的牢房变成了某种图书馆“。他在狱中写下了《回顾与展望》一书，据他自己说，该书是“那一时期不断革命论的最重要的奠基之作”。[188]

几个月后，即 1906 年 4 月，不断革命理论的作者帕尔乌斯被捕，他很快就和托洛茨基一起被关进了彼得保罗要塞。戴奇也在那里，他提议越狱。托洛茨基对此表示反对。后来他说：

> “我认为，对我们的审判将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这对我很有吸引力”。[189]

1906 年 9 月 19 日，对圣彼得堡苏维埃的审判开始了。托洛茨基在审判演说中一方面竭力证明苏维埃没有造反计划，另一方面又利用法庭宣布广大群众必然会出现反对现存制度的斗争。他宣称：

> “无论武器有多么重要，法庭上的先生们，强大的力量并不在于武器。不！法官先生们，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决定人民起义胜利的不是群众杀死他人的能力，而是他们对死亡的巨大准备”。

---

[187]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十五章 审判、流放、逃跑”，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188]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十五章 审判、流放、逃跑”，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189]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十五章 审判、流放、逃跑”，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托洛茨基的父母当时也在法庭上。据托洛茨基回忆：

“当我在法庭上发言的时候，母亲默默地流泪，尽管她未必全能听懂我讲话。

……

在休庭时，我的父母用幸福的眼光看着我，母亲甚至相信我不但会被宣判无罪，说不定还可以受到奖赏。我提醒她做好我可能被判处服苦役的准备，母亲惊慌但又难以置信地把目光投向辩护律师，想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父亲脸色苍白，默不做声，他既感到幸福又觉得难过”。[190]

被告试图发起反击。他们试图将审判转移到对犹太人大屠杀的讨论上，并保证说这些大屠杀是在执法机关准备的。被告的律师要求传唤参议员洛普欣问话，声称他于 1905 年秋天在警察局开设了大屠杀印刷所。当法庭拒绝这一要求时，被告阻挠法庭并被带出法庭。他们的律师和支持者在法庭上紧随其后。判决于 1906 年 11 月 16 日在被告和辩护人缺席的情况下宣判。

“托洛茨基和苏维埃的其他 13 名成员被判处终身流放监禁，因为他们是这样一个团体的成员：这个团体通过组织武装起义，决定用武力改变俄国的根本大法所确立的统治，使之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

托洛茨基被囚禁的地方是奥布多尔斯科耶村，位于鄂毕河畔秋明之外、北极圈之上。托洛茨基指出：

“我们都将被流放到位于北极圈内很远的一个叫做奥布多尔斯克的小镇上。那里离最近的铁路有 1500 俄里，离最近的邮局也有 800 俄里。邮差两个星期才往那里送一次邮件，在春秋季节道路泥泞的时候，甚至一个半月到两个月都不来一次”。[191]

囚犯们在被流放前换了衣服。托洛茨基写信给他的妻子：

“大家都换上了灰色的裤子和灰色的上衣，还戴上灰色的帽子，彼此看着觉得十分有趣。只是，后背上的红黄方块布不见了，我们获准保留自己的内衣和鞋子”。[192]

托洛茨基后来回忆说，后一种情况“允许保留自己的鞋子对我来说有不小的意义，因为在我的鞋掌里藏着一本精致的护照，而在鞋的后跟里塞着几枚金币”。[193]这些东西很快就派上了托洛茨基的用场。

在 1907 年寒冷的冬季，托洛茨基不得不乘坐雪橇北上。旅途十分漫长。在旅途的第 33 天，即 1907 年 2 月 12 日，雪橇队才到达别廖佐沃，彼得二世统治时期缅希科夫曾流放于此。在这里停留了几天。托洛茨基利用这次停留制定了逃跑计划。在流亡者之一费特医生的建议下，托洛茨基假装患了坐骨神经痛。这个假想病人被留在了当地医院。据托洛茨基回忆，医院的制度“更加宽松。每当我的病痛‘稍稍减轻’时，我就会出去散步，一走就是几个小时。医生甚至还鼓励我多走走。前面已经说过了，在这个季节谁也不会担心有人会从别廖佐沃逃走”。[194]

---

[190]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十五章 审判、流放、逃跑”，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191]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十五章 审判、流放、逃跑”，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192]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十五章 审判、流放、逃跑”，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193]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十五章 审判、流放、逃跑”，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194]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十五章 审判、流放、逃跑”，2005 年东方出版

别廖佐沃住着流亡革命家罗什科夫斯基。托洛茨基设法与他商定了逃跑的组织工作。当地一个绰号“山羊脚”的农民也参与其中。正如托洛茨基所承认的：

“当他的身份暴露之后，他吃了不少的苦头”。[195]

“山羊脚”找到了一位科米人当地居民，他同意帮助托洛茨基逃跑。托洛茨基坐着驯鹿拉的雪橇，在雪地里走了一周，行程 700 公里。最后，他到达铁路沿线，登上一列火车，很快在一个车站遇到了娜塔莉亚-塞多娃。在她的陪伴下，他到达了圣彼得堡。

托洛茨基现在在俄罗斯首都很有名气，于是夫妇俩搬到了芬兰。据托洛茨基说：

“赫尔辛福斯的警察局长是一位积极分子，即芬兰革命民族主义者，他答应一旦有来自彼得堡那边对我的威胁，他会提前通知我”。[196]

托洛茨基与妻子和儿子住在芬兰，托洛茨基的儿子是在父亲入狱时出生的。在此期间，他写了一本名为《往返记》的书，[197]讲述了他 1905-1907 年在俄国的生活。托洛茨基称，这本书的版税收入帮助他在 1907 年 4 月买了一张去瑞典的机票，并在那里定居下来。他的妻子和儿子暂时留在了俄国。早在 1906 年 11 月，帕尔乌斯就从叶尼塞斯克的流放地逃了出来。回国后，他出版了一本名为《革命期间的俄国巴士底狱》的书。该书断言，沙皇制度完全无法改革，俄国的唯一出路是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下进行革命。该书的主要内容是帕尔乌斯在狱中和流亡期间的故事。该书很快销售一空。

朋友们很快就见面了，帕尔乌斯帮助托洛茨基成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报纸《前进报》和《新时期》的通讯员。显然，托洛茨基打算效仿他的老战友，在西欧长期定居。这一点从他关于俄国第一次革命的书名中也可以看出。毕竟，书名意味着作者把在祖国的逗留看作是一次“在那里”的旅行，最终要“返回”主要的逗留地。

---

社出版。

[195]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十五章 审判、流放、逃跑”，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196]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十五章 审判、流放、逃跑”，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197] 译者没有找到本书中文版的翻译。——译者。

# 第 十 章

# 维也纳市民

1907 年 4 月，托洛茨基在伦敦第五次党代会开幕前不久抵达伦敦，党代会于 4 月 30 日（5 月 13 日）在南门路的团契教堂举行。这是托洛茨基参加的第二次党代会，这次他的声音更大。由于托洛茨基在 1903 年与布尔什维克决裂，在 1904 年与孟什维克决裂，因此他不代表任何党组织，只能被视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报纸的代表。然而，托洛茨基却因参加圣彼得堡苏维埃而被光环笼罩。他在审判中的火热演说和从流放地大胆逃亡的故事仍历历在目，因此他的演说受到了极大的关注。此外，两个派别的代表都表示希望托洛茨基加入他们的队伍。

列宁在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就体现了这一点，他说：

> “关于托洛茨基，我想谈几句话。我现在没有工夫谈我们同他的意见分歧。我只想指出，托洛茨基在《保卫党》这本小册子中公开表示他同意考茨基的看法，即在俄国当前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在经济上是一致的。托洛茨基承认成立反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左派联盟是可以允许的，是适宜的。在我看来，这些事实足以说明托洛茨基是接近我们的观点的。撇开‘不断革命’的问题不谈，这里在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的基本点上是一致的”。[198]

显然，列宁想掩盖布尔什维克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分歧，因为后者的立场更接近社民党领袖的观点，而托洛茨基则被视为扮演着与西欧社民党联系的角色。

托洛茨基设法确保自己被视为“特殊潮流”的代表。因此，在讨论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时，他有 15 分钟的发言时间。借此机会，托洛茨基努力向代表们解释他希望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占据的位置：

> “为了避免误解，我必须声明，在分裂党的政治问题上，我绝不是像有些同志说的那样，站在‘中派’的任何特殊观点上。在我看来，‘中派’立场的先决条件是明确而坚定地意识到妥协的必要性，因为妥协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策略的先决条件。但是，如果我意识到并强调妥协的必要性，这并不意味着我自己在某一政治问题上的观点是对两种相互矛盾的意见进行算术平均”。

“算术平均”的领袖角色因其非倾向性而适合两派，但托洛茨基并不适合。他宣称：“我拒绝沿着这个假想的调和妥协提前塑造我的思想”。托洛茨基正在争取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他宣称：“我坚决主张有权对每一个问题都有明确的看法.....我保留全力捍卫自己观点的权利”。

托洛茨基在讲话中巧妙地引用了米留可夫的小册子中的一段话，其中提到了“托洛茨基主义的革命幻想”，他随即说道：

> “米留可夫先生，如你所见，把我的名字与革命最高涨的时期联系在一起，这太给我面子了”。

---

[198]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文献》，“就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报告所作的总结发言”，《列宁全集》第 15 卷。

然而，托洛茨基显然是在暗示，他在过去两年中已经获得了足够坚实的政治分量，因此有权向党提出自己的革命胜利之路。

托洛茨基宣布，党的统一在历史上是不可避免的，当这一情况发生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将选择“最无产阶级的”、“最革命的”和“最文化的”纲领。他没有把这个纲领称为“托洛茨基主义”，但人们可以这样理解他。为了确保通过一个他可以接受的纲领，托洛茨基积极参与了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他严词维护自己的立场，抨击党内公认的领袖，指责列宁本人虚伪。（然而，他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实际成果。）尽管托洛茨基发出了威胁，大会还是通过了一项布尔什维克决议，谴责国家杜马中孟什维克的策略。如果托洛茨基没有如此陶醉于自己的雄辩，没有陷入个人侮辱，他本可以在两派之间发挥建设性的调停作用。但无论如何，托洛茨基没有考虑到最重要的一点：团结全党的可能性很小，而他在自己的“托洛茨基主义”纲领上领导一个团结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列宁则“遗憾”的指出托洛茨基的党外性质和反“布尔什维主义”的纲领。

在出席代表大会的 342 名代表中，托洛茨基没有注意到梯弗里斯组织的代表伊万诺维奇，他只投了咨询票，只在他与代表大会代表邵武勉和卡霍扬一起向代表大会主席团发言时才被提及。然而，伊万诺维奇密切关注着托洛茨基，并在两期《巴库无产者报》上发表文章，对托洛茨基在代表大会上的活动作了如下描述：

> “所谓中派或泥潭派在代表大会上是没有的。托洛茨基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废物’”。[199]

这是斯大林的著作中第一次提到托洛茨基，他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使用的笔名是“伊万诺维奇”。

这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对抗的最初证据，这场对抗持续了三十多年，并使托洛茨基悲惨地结束了生命。这场对抗的原因是深刻的，主要是由他们之间的本质区别和他们所代表的力量决定的。尽管人们可以在这些未来的苏维埃国家领导人身上找到许多相似之处（几乎同龄、属于俄罗斯的少数民族、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从小就热衷于阅读书籍，然后又渴望自学以弥补高等教育的不足），但《托洛茨基传》和《斯大林传》的作者艾萨克-多伊彻在比较他们的社会背景时写道：

> “托洛茨基是不久前发了财的犹太土地所有者的儿子，他是从他家的窗户里第一次看到贫穷和剥削的.....没有任何人像斯大林–朱加施维里那样，在青年时代如此直接地和如此强烈地感受到农奴的生活环境”。[200]

即使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看似相似的生活方面，实际上也只是强调了他们之间的差异。对于斯大林-朱加什维利来说，作为少数民族的一员意味着他是格鲁吉亚人民的儿子，而格鲁吉亚人民的历史命运与犹太民族大不相同。格鲁吉亚人民在长达几个世纪的独立斗争中，面对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捍卫了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对格鲁吉亚的大自然，无论是野生的还是人工栽培的，无论是山脉还是花园，都怀有深厚的感情，这是格鲁吉亚人爱国主义和献身于祖先土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 20 世纪初几乎从未离开过故土的格鲁吉亚人不同，绝大多数犹太人早在几个世纪前就离开了自己的祖国，生活在祖国之外。托洛茨基是犹太民族的儿子，

---

[199] 斯大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一 代表大会的成分”，《斯大林全集》，第 2 卷，诸夏怀斯社本。

[200]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2006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二章 幼年从哥里得到的遗产”校对。

犹太民族的团结没有“世俗的支持”，而是建立在对犹太信仰归属感的认识上。对祖国的依恋被“双重臣服”的概念所分化。虽然托洛茨基-勃朗施坦的童年记忆与乌克兰南部的大草原有关，但他所处的民族文化环境迫使他将自己视为一个无形的世界国家的公民，虽然身处异族之中，但却按照几个世纪前为“天选之民”制定的特殊法律生活。

当时绝大多数格鲁吉亚人都是农民或农民的后代。斯大林本人就是新近迁入城市的农民的儿子，他是在忠实于许多传统价值观的文化氛围中长大的。虽然农民在教育方面落后于城市居民，但一旦进入城市，他们很快就会弥补这一不足，因为他们拥有传统社区文化所特有的强大的智力和道德品质。

当时的犹太文化主要是城市人的文化，他们认为农民的发展水平较低。即使是那些生活在乡村的犹太人，如勃朗施坦一家，也是在纯粹的城市文化传统中长大的，这种文化是犹太人在散居地生活了许多世纪后形成的。如上所述，沙皇政府试图把犹太人变成农民，但没有成功。虽然托洛茨基是在农村长大的，但他在父亲的庄园里见惯了的农民在他看来都是阴暗、不快乐的人，他们的头脑中充满了疯狂的偏见。在敖德萨知识分子的成长过程中，托洛茨基对“黔首”的居高临下甚至蔑视的态度愈演愈烈。托洛茨基在精神上脱离了占俄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

斯大林-朱加什维利属于格鲁吉亚人，这意味着他从小就与俄罗斯人一样信仰东正教。斯大林在哥里的神学院和梯弗里斯神学院接受教育。托洛茨基是犹太教学校和教师的学生，他聘请了他的父亲，至少，他疏远了东正教信仰。这种疏远后来发展成了对国家主导宗教的敌意。

虽然格鲁吉亚对沙皇当局积怨颇深，并怀念几个世纪以来失去的独立，但斯大林后来强调，在他的祖国“没有严重的反俄民族主义”。在格鲁吉亚，没有人想过从帝国移民，斯大林从他最早的著作中就强调，格鲁吉亚只是俄罗斯的一个小角落。然而，在托洛茨基成长的环境中，对俄罗斯的厌恶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从帝国移民被许多犹太人视为继续生活的唯一可能条件。托洛茨基在他的著作中多次谈到犹太人在俄国遭受迫害的情况，同时大大夸大了国家和教会在组织犹太人大屠杀中所扮演的角色。托洛茨基对俄国世俗和精神权威机构的敌视态度扩展到了整个国家，他多次说过并写道，大自然本身就注定了俄国的落后和野蛮的行为方式。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对俄罗斯的不同态度决定了他们对俄罗斯文化评价的差异。斯大林认为俄罗斯文学是最高的精神源泉。他从未停止过阅读俄罗斯作家的作品、聆听俄罗斯作曲家的音乐所带来的愉悦。虽然托洛茨基从小就熟悉俄罗斯作家、作曲家和艺术家，有时还能引用俄罗斯文学作品，但他坚信“俄罗斯文化只是对世界文化最佳范例的模仿”。

阶级和民族文化背景的差异也决定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在革命道路上的不同。虽然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都成为了地下革命圈子的成员，但他们对革命党及其意识形态的态度却大相径庭。对于来自群众的斯大林-朱加什维利来说，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最终建立社会公正社会的思想源于幼年的经历。他在鞋匠父亲的贫民窟中长大，了解到社会的种种弊端。他从小就熟悉新近在城市定居的前农民的愿望，并珍视建立在平等和博爱原则基础上的传统社区的理想。

托洛茨基-勃朗施坦与革命者的和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他长期不愿接受革命者的思想，因为这些思想与他在地主父亲的家庭以及后来在敖德萨知识分子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思想相去甚远。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和哲学的基础知识后，立即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而列夫-勃朗施坦则不同，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愿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圈子里，他嘲笑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自己比他们优越。即使因参加地下革命而入狱，他也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开始研究共济会的历史，并在狱友中宣传共济会。他没有加入任何地方党组织，只是在流亡期间才逐渐与一些社会民主党人走得很近，这些人帮助他逃出了西伯利亚。

即使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吸引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人物，也反映了他们之间的深刻差异。有一段时间，斯大林的理想人物是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斯大林多次在文章中提到倍倍尔，指出他坚持原则地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并表示希望俄国也有自己的“倍倍尔”。托洛茨基在一段时间内的理想人物是德国工人运动的早期领袖费迪南-拉萨尔，他出身于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因其机会主义而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谴责。

斯大林-朱加什维利在马克思主义政党中看到了一个可以实现他的社会理想和个人价值的组织。1907 年 3 月 22 日，朱加什维利发表了一篇短文来纪念他的党内同志格奥尔基-捷利亚，这就是证明。在这篇文章中，他列举了逝者所具有的品质，在作者看来，这些品质“最能表明社会民主党的特色的东西——渴求知识、独立自主、勇往直前、坚忍不拔、爱好劳动、道德高尚”。[201]斯大林认为，党在最大程度上为他提供了实现理想的机会，因此他积极参与了社会民主党基层组织、地方组织和中央组织的工作。他后来说，在将近 20 年的时间里，他从“革命的学生”到“学徒”，再到“革命的大师”，逐渐掌握了革命的理论和实践。

对托洛茨基来说，党从来都不是他最高理想的化身，他也没有把入党与实现自己的道德价值和思想要求联系起来。托洛茨基成为革命的杰出人物之一后，却长期游离于党外，没有在任何基层或地方组织中工作过。与此同时，出人意料的是，他迅速登上了党的最高领导层，并不断得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外有影响力人士的支持。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不同，斯大林经历了党工作的各个阶段，而托洛茨基则始终处于革命党的旅行同伴的地位，他是各种国际势力的代表，这些势力由于各种原因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有过接触。

斯大林在格鲁吉亚积累了多年组织革命斗争的经验，1907 年，他在俄罗斯迅速发展的工业中心之一——巴库——的工人中开展党的工作。他非常了解俄罗斯工人的需求，学会了如何捍卫他们的具体经济和社会要求，并将这些要求与政治斗争相结合。斯大林与当时居住在巴库的不同民族的工人——阿塞拜疆人、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波斯人、达吉斯坦人——一起生活和工作。他不断努力确保党不脱离俄国工人阶级，将其视为社会的主要革命力量。

托洛茨基与俄国无产阶级的直接接触只发生在他参加尼古拉耶夫“协会”的那几年，而且仅限于写一些传单和公告。后来，托洛茨基在党组织之外开展工作。他在 1905 年写的那些向工人、农民和士兵发表的色彩鲜艳的宣言的命运如何，完全不得而知。

与斯大林不同，托洛茨基不仅脱离了党和俄国工人阶级，而且也脱离了俄国本身。在帕尔乌斯的庇护下，他重复了自己的命运，成为国际社会民主党领袖与西方金融资产阶级高层之间的中间人。

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这些分歧和其他分歧反映了托洛茨基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从一开始就追随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后来又支持斯大林的那部分人之间的深刻矛盾。

---

[201] 斯大林《悼念捷里亚同志》，《斯大林全集》，第 2 卷，诸夏怀斯社本。

尽管斯大林当时不太可能充分了解托洛茨基的阶级背景及其所有关系，但他将大会上的布尔什维克对手视为阶级异己力量。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一文中写道：

“很明显，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是大工业无产者的策略，是阶级矛盾特别明显和阶级斗争特别激烈的地区的策略。布尔什维主义是真正无产者的策略”。[202]

斯大林认为：

“另一方面，同样很明显，孟什维克的策略主要是手工业工人和农村半无产者的策略，是阶级矛盾不很明显和阶级斗争还隐蔽着的地区的策略。孟什维主义是无产阶级中半资产阶级分子的策略”。[203]

斯大林提出了另一个不仅会影响孟什维克，也会影响托洛茨基个人的意见：

“统计数字表明，孟什维克派的大多数是犹太人（不包括崩得党人），其次是格鲁吉亚人，然后是俄国人。但布尔什维克派中绝大多数是俄国人，其次是犹太人（当然不包括波兰人和拉脱维亚人），然后是格鲁吉亚人，等等。这种派别构成不难解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中心主要是大工业区，也就是纯粹的俄国区，波兰除外，而孟什维克区、小生产区同时也是犹太人和格鲁吉亚人等的区.....两个派别的成分如此，是不难解释的。因为布尔什维主义的策源地主要是大工业区，除波兰外，都是纯粹俄罗斯人的区域；孟什维克的地区都是小生产的地区，同时是犹太人、格鲁吉亚人等等的区域”。[204]

斯大林在谈到布尔什维克中俄国人占多数，而孟什维克中犹太人占多数时写道：

“关于这一点，布尔什维克中曾有人（好像是阿列克辛斯基同志）开玩笑说，孟什维克是犹太人的派别，布尔什维克是真正俄罗斯人的派别，所以我们布尔什维克不妨在党内来一次蹂躏犹太人的暴行”。[205]

但伊万诺维奇认为，即使没有大屠杀，代表大会也取得了对孟什维克主义的胜利：

“因此，今后，党将奉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严格的阶级政策。无产阶级的红旗再不会倒向自由主义的狡辩家了。那种为无产阶级所不容的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受到了致命的打击”。[206]

斯大林是对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坐在一起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托洛茨基虽然发表了许多精彩的演说，但在争取“不断革命”思想的斗争中未能取得任何实际的成功。由于俄国发生的事件，托洛茨基成为一个能够掌握权力的强大政党领袖的前景也被推后了。代表大会结束 5 天后，即 1907 年 6 月 3 日，国家杜马被解散，社会民主党派的成员遭到逮捕。许多自由派的改革被取消了。6 月 3 日的政变给 1905-1907 年的革命划上了句号。

由于“那里”的路对托洛茨基来说已经被安排了一段时间，所以他决定在西

---

[202] 斯大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一 代表大会的成分”，《斯大林全集》，第 2 卷，诸夏怀斯社本。

[203] 斯大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一 代表大会的成分”，《斯大林全集》，第 2 卷，诸夏怀斯社本。

[204] 斯大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一 代表大会的成分”，《斯大林全集》，第 2 卷，诸夏怀斯社本。

[205] 斯大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一 代表大会的成分”，《斯大林全集》，第 2 卷，诸夏怀斯社本。

[206] 斯大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 2 卷，诸夏怀斯社本。

欧安顿下来。在他从伦敦抵达的柏林，塞多娃正在等着他。在这里，帕尔乌斯也见到了他。托洛茨基回忆说：

> “一天，我和妻子及帕尔乌斯一行三人徒步穿越萨克森瑞士山地。时值夏末，天气晴好，清晨时分已略带一丝凉意。我们喝着牛奶，尽情呼吸着山里的清新空气。我和妻子尝试着离开道路下到山谷中，险些丧命。我们走出山地就进入了波希米亚，到了一个叫吉尔施贝格的小镇，在一个小官员的别墅住了几周”。[207]

托洛茨基写道，在赫希贝格期间，他和帕尔乌斯经常为社会民主党报纸撰写文章。显然，在赫希贝格逗留的时间很长，因为托洛茨基甚至有时间写了“一本论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书”。[208]

还在柏林时，托洛茨基经帕尔乌斯介绍认识了卡尔-考茨基，后者邀请他到自己家中做客。在柏林，托洛茨基还结识了德国社民党的其他著名领导人。多伊彻指出：

> “令人惊讶的是，托洛茨基并没有与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弗朗茨-梅林（未来的共产党创始人）领导的德国社会主义激进派建立最密切的联系，而是与那些表面上保持马克思主义正统性，但实际上却领导党屈服于霍亨索伦帝国的帝国主义野心的中派人士建立了最密切的联系”。

事实上，这并不奇怪。在帕尔乌斯的指导下，托洛茨基重复了他的道路，最终导致这位“革命者”与德皇合作。（显然，帕尔乌斯与王室的友好关系得益于他与那些最终开始与霍亨索伦合作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圈子的熟识）。

托洛茨基搬到维也纳后不久，就受到了阿德勒的热情接待，他为俄罗斯读者写了许多关于阿德勒的文章。托洛茨基还与阿德勒的中介人弗里茨成了朋友。与托洛茨基关系密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一样，维克多-阿德勒也与党内的妥解派和修正主义势力走得很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支持对俄国采取军事行动。

因此，后来被誉为极左革命派领袖的托洛茨基从 1907 年起就与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保持着密切友好的关系，这些领导人倾向于与本国资产阶级合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支持本国政府，随后又采取了敌视苏维埃国家的立场。

托洛茨基在回忆录中解释了他搬到维也纳的原因，他写道：

> “我们为什么偏偏选择维也纳呢？这是因为那时我对德国的政治更加关注，但我之所以没有住在柏林，完全是由于警方的原因，这样我就留在了维也纳”。[209]

1907 年，托洛茨基来到欧洲的中心，他可以反思自己是谁，变成了谁，自 1897 年除夕夜在什维戈夫斯基的圈子里开玩笑地宣布自己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来的十年间，命运将他置于何地。经过多年的漂泊，托洛茨基有了机会，不再是一个囚犯、一个流亡者、一个时刻担心被捕的地下战士，或者一个无家可归、在不同国家之间辗转的政治移民。他在罗德勒街有一套三室一厅的公寓，距离以餐馆和葡萄园闻名的维也纳郊区格林津步行五分钟。根据他的回忆录，这对夫妇在维也纳的生活很幸福。

---

[207]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十六章 第二次流亡国外与德国社会主义”，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208]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十六章 第二次流亡国外与德国社会主义”，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209]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十六章 第二次流亡国外与德国社会主义”，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托洛茨基发现自己来到了维也纳，这里正处于弗朗茨-约瑟夫统治的末期，也是宏伟的哈布斯堡帝国的最后岁月。他似乎进入了施特劳斯诗意地描绘维也纳森林和“蓝色多瑙河”周边环境的童话世界，进入了莱哈尔和卡尔曼歌剧中的玩具世界，他们的主人公是来自世俗社会的无忧无虑的维斯尔查克。对于世界上的许多人来说，此时的维也纳体现了布尔乔亚的舒适和衣食无忧的繁荣。托洛茨基接受了维也纳布尔乔亚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在咖啡馆里喝咖啡、看报纸。英国作家塞基（芒罗）在其二十世纪初创作的一篇小说中就描绘了这样一个布尔乔亚人——利特波尔德-沃肯斯坦。他笔下的主人公经常“在他最喜欢的哈布斯堡帝国首都的咖啡馆里，手捧一份《新自由报》，来一杯加奶油的咖啡和一杯冷水，饮品是一个自大的科尔纳人给他送来的”。

托洛茨基和他的妻子努力融入维也纳的城市生活，首先注意以符合当时风尚和礼仪观念的精神教育子女。两个儿子利奥和谢尔盖很快就学会了德语，先是在幼儿园，然后是在学校。在家里，他们既用俄语也用德语进行自我解释。托洛茨基并没有很清楚地解释这对无神论者夫妇为什么决定用基督教信仰来教育他们的孩子，他写道：

> “我们为孩子选择了路德教，这是因为我们觉得这种宗教不会对孩子的能力和心灵造成太沉重的负担”。[210]

托洛茨基承认，孩子们喜欢上宗教课，喜欢在家里重复祷告。尽管托洛茨基将自己对孩子们皈依路德教的宽容归因于他不愿公开宣布孩子们是无神论者，但内达瓦认为，这可能是由于父亲希望找到一种吸引他的生活方式：

> “托洛茨基从学生时代起就崇拜德国人的整洁、干净、有序——他本人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也被同样的品质所吸引……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孩子们接受路德教的洗礼，是他从犹太人区逃到灯火通明、井井有条的德国街区的缩影”。

托洛茨基本人积极融入维也纳的精神生活。他参观图书馆，甚至准备参加维也纳大学的课程考试。为了顺应维也纳社会的各种新潮流，他对当时正在流行的精神分析产生了兴趣。根据多伊彻的说法，托洛茨基的朋友阿道夫-越飞“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卡拉派知识分子，患有神经病”，精神分析师阿尔弗雷德-阿德勒为他治疗，他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学生。 托洛茨基“会见了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对精神分析产生了兴趣，并得出结论认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之间的共同点比马克思主义者愿意承认的要多得多”。革命后，托洛茨基试图在苏维埃国家宣传弗洛伊德主义。

托洛茨基之所以能迅速接受弗洛伊德的思想，可能不仅是因为普遍的热潮，还因为他与阿德勒的私人谈话，阿德勒与托洛茨基有很多共同之处。美国心理学家威尔逊写道：

> “阿德勒是犹太人，一个谷物商人的儿子。他的父亲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阿尔弗雷德是他的最爱。他从小体弱多病”。

阿德勒的心理学思想在某些方面不同于弗洛伊德的理论，有可能与托洛茨基的生活经历相吻合，并帮助他解释了自己的心理问题。

基于亚里士多德将人视为社会动物的观点，阿德勒认为，人之所以成为社会动物，是为了克服在周围世界中的自卑感。因此，坚持“自我”的欲望是人类活动的主要动机之一。与尼采的观点相同，阿德勒宣称人的意志是最强大的驱动力。

---

[210]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十七章 酝酿新的革命”，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同时，阿德勒认为，即使是人的非理性行为，也需要满足他感受自己优于他人的需要。阿德勒认为，显性和隐性的优越感都是对实践活动的一种刺激。

以寻找病态、非理性或破坏性动机为基础的精神分析对人类性格的解释，很可能与托洛茨基关于人类灵魂的想法相吻合。托洛茨基可能从弗洛伊德和阿德勒关于人的精神世界中存在着黑暗潜意识的霸道力量的思想中，找到了解决他因神经系统病态和严重癫痫发作而产生的情绪波动的答案。

阿德勒认为，即使是通过非理性的自我主张，也需要保持自己优于他人的意识，这一观点可能有助于托洛茨基理解他在演讲时的精神状态，当时他几乎失去了对演讲的理性控制，只服从于领导激动的听众的强烈欲望。这一理论有可能使他能够解释自己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他想“打败”什维戈夫斯基圈子里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愿望，他对共济会——秘密而强大的世界力量——的兴趣，他“转变”为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对他来说成了野蛮胜利力量的象征，他试图压倒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以及他想成为俄国革命党和革命政权领袖的野心。

时髦的精神分析理论、维也纳的博物馆和图书馆、霍夫堡和美泉宫的华丽、普拉特游乐场的乐趣以及维也纳森林的静谧，本应吸引一个厌倦了漂泊和不安的人的注意力。但托洛茨基不能放松，这仅仅是因为他必须养活一个迅速成长的新家庭。现在，他发表文章的机会更多了。他用《东方评论》的笔名——安蒂德-奥托——为广为人知的自由主义方向的报纸《基辅思想》撰稿。他还从维也纳向他的导师施宾策尔出版的《敖德萨新闻》寄送信件。他还为孟什维克报纸《光明》撰稿。

与此同时，乌克兰社会民主党人团体“斯皮尔卡”建议托洛茨基亲自组织出版一份报纸。大家决定将其命名为《真理报》。越飞成为了新报纸的首席雇员。但托洛茨基没有意识到办一份期刊有多么困难。托洛茨基担任出版编辑的第一年只出版了五期。他从各家报纸获得的版税全部用于资助《真理报》。他不得不向外国社会民主党求助，他的父亲多次到维也纳看望儿子，并一直在金钱上帮助他。

与帕尔乌斯一样，托洛茨基开始积极在西欧主要的社会民主党报纸——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和《新时代》以及比利时社会主义报纸《灰烬》上发表文章。

他与西欧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关系不断扩大。除了上文提到的奥地利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外，托洛茨基还亲自结识了菲利波-图拉蒂、埃马尔-范德维尔德、儒勒-盖德、詹姆斯-麦克唐纳、弗里茨-普拉滕以及意大利、法国、比利时、英国、瑞士和其他一些国家社会党的其他著名人物。正如沃尔科戈诺夫正确指出的那样：

> “托洛茨基已经是这样一个政治人物，他‘处在’这些人物的‘圈子里’，维也纳的‘客人’在这些圈子里是他们自己的人”。

托洛茨基越是沉浸于西欧的世界，他就越是疏远俄国，而他在 1907 年曾如此愉快地“回到”俄国。他不仅毫不掩饰自己对祖国的厌恶，甚至对任何试图在俄国发现任何有价值和值得关注的东西的企图也是如此。托洛茨基毫不留情地谴责过去俄国知识界最杰出领导人的任何爱国言论。赫尔岑认为受过教育的俄罗斯人民是“最自由的人民”，农民群体是社会正义的保障，托洛茨基以此为借口，声称赫尔岑宣称“落后和野蛮是斯拉夫人相对于欧洲旧文化世界的最大历史优势”。

托洛茨基在他的文章中毫不留情地指出，俄国知识分子是面向西方的，即使他们不这么说。托洛茨基称“斯拉夫主义”为“斯拉夫嗜好主义”，认为斯拉夫

嗜好者的思想是“暂时的意识形态高跷，知识分子在此高跷上将自己从国内生活的沼泽中拾起，然后走向欧洲”。托洛茨基利用逻辑上的牵强附会和玩弄概念的手法，试图证明“民粹主义，即去掉恋斯拉夫政治和恋斯拉夫宗教的恋斯拉夫主义，只不过是欧洲文化的优越性和力量在有思想的俄罗斯人的焦虑意识中的第一次消极反映——光不是阴影，而阴影永远也不可能是光！”

托洛茨基在同样的基础上认为，赫尔岑“与欧洲的”“碰撞”，“他对欧洲的诅咒，只是他对欧洲的高尚而急躁的热情的产物”。他写道：

> “赫尔岑说，仅仅承认科学是不够的，还必须‘用科学’来教育自己。赫尔岑本人就是我们‘对欧洲’最有灵感的教育者之一。有人称之为‘回到赫尔岑’……我们不会跟在他们后面重复。前进——从赫尔岑开始！这意味着：教育人民‘走向欧洲’”。

托洛茨基对某些俄罗斯作家企图为自己的祖国说好话异常愤怒。托洛茨基为《基辅思想》撰写了一篇关于《伊万诺夫》一书的尖刻评论。在对比俄国和西欧时，他写道：

> “在商店、行会、市政当局、大学以及它们的会议、选举、游行、庆典、争论中，人培养了自治的宝贵技能，在那里人的个性获得了成长——虽然是资产阶级的，但好歹也一种个性，而不是任何灰暗麻木、毫无生气的面孔。我们的贵族多么可悲！城堡在哪里？他们的锦标赛在哪里？十字军、侍从、吟游诗人、侍童呢？对骑士精神的热爱？一千年来，我们一直住在低矮的原木建筑里，裂缝上长满了青苔——梦想着镶嵌拱门和哥特式塔楼是对的吗？”

他在俄罗斯没有看到一个有个性的人，看到的只是“面孔”，没有看到一座漂亮的建筑，看到的只是凄惨的棚屋。 他可能根本没有想到，除了这一切，他根本不了解俄罗斯，而他喜欢猜测俄罗斯。在大城市中，他只知道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他几乎没有时间去看看美丽的基辅，只能躲在安全屋或以“生病的阿尔布佐夫”的名义住在眼科医院的病房里。他没有机会游览圣彼得堡的宫殿和博物馆，要么躲在秘密机构里，要么日夜坐在技术研究所里参加圣彼得堡苏维埃的会议。在往返布迪尔监狱的路上，他还没有看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他素描中的“破旧木屋”来自乌斯季库特和上霍伦斯基，这是他有时间看到的定居点，即使是在那个时候，他也是带着流亡者寻求逃离可耻囚禁的闷闷不乐的目光。

托洛茨基在罗马尼亚多布鲁扎采访时写道：

> “路——俄罗斯的，尘土飞扬的，我们赫尔松的路，鸡不知怎么用俄国的方式从马蹄下跑出来，小马的脖子上系着俄罗斯的绳子，山羊的背也是俄罗斯的……啊，它的背真像俄罗斯人的背：你走遍整个地球也找不到这样的背……它很安静，腿上的血液在刺痛，似乎要从新布格车站到亚诺夫卡村去”。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即使在托洛茨基漂泊了半年几十年后，有时也会唤醒列夫-勃朗施坦这个活泼的男孩，迫不及待地等待着回到故乡的农场。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对托洛茨基来说，整个俄罗斯都缩水成了一条尘土飞扬的道路、绳套、鸡和马，而马车夫科兹连科的背影则阻挡了观察者看到整个伟大的国家，甚至成了国家的化身。

托洛茨基在《基辅思想》的评论中拒绝了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关于俄罗斯精神财富丰富的保证，他写道：

> “俄罗斯知识分子只是模仿西方，采用现成的体系、学说和纲领。我们的社会思想史甚至还未能触及人类普遍思想的发展”。

托洛茨基在这篇文章中表达的对俄国的蔑视和对西方的崇拜达到了极致，就连他的崇拜者多伊彻也指出，这是一种强烈的过激反应。

托洛茨基攻击俄国的新契机是“贝利斯事件”。1911 年 6 月，犹太人门德尔-贝利斯在基辅被捕，被控以宗教仪式谋杀男孩安德烈-尤辛斯基。贝利斯的辩护律师是格鲁岑贝格，他曾是托洛茨基在审判圣彼得堡苏维埃成员时的辩护律师。在 1913 年 9 月至 10 月举行的案件听证会上，贝利斯被宣告无罪。

俄罗斯公众强烈谴责对贝利斯的指控。世界新闻界和一些著名政治人物加入了为贝利斯辩护的运动。正如内达瓦指出的那样，犹太人的所有阶层，不分阶级，都对贝利斯一案做出了反应：美国犹太劳工组织、美国犹太委员会、大多数欧洲（“小资产阶级”）社区、罗斯柴尔德勋爵（他在梵蒂冈获得了教皇诏书的认证副本，否认犹太人使用血液……）。在欧洲，同时代的人们还记得独立后的捷克斯洛伐克未来总统、当年自由派捷克人民党领袖托马什-马萨里克愤怒的演讲。在美国，公众舆论对政府的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终止了对俄罗斯有利的贸易往来。

媒体不断将“贝利斯案”与“德雷福斯案”相提并论。众所周知，法国犹太人德雷福斯于 1894 年被判处终身监禁，罪名是为德国从事间谍活动。由于广泛的抗议运动在法国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德雷福斯在服苦役五年后获释，又在七年后恢复名誉。在比较贝利斯和德雷福斯“案件”时，世界新闻界常常试图表明，俄罗斯在恢复中世纪对犹太人的仪式谋杀指控方面是独一无二的。与此同时，他们却忘记了“蒂萨-埃斯拉尔案”对犹太人宗教仪式谋杀的指控，该案在奥匈帝国引起了公众两年（1882-1884 年）的关注，并导致了奥地利帝国一些地方的犹太人大屠杀。

托洛茨基积极参加了围绕“贝利斯事件”的运动，他在《新时代》上发表了自己对此案的看法，坚称这是司法部长谢格罗维托夫一手策划的。尽管这篇文章是在被告无罪释放后发表的，尽管托洛茨基曾一度将德雷福斯案件列为人类野蛮行径最险恶的证据之一，但他甚至不愿将这两起案件相提并论。他说德雷福斯公诉人的指控是“滔天大谎”，但他马上又规定说：“公诉人的成分本身并没有什么大问题”——托洛茨基无视德雷福斯军官曾在法属圭亚那服刑五年，并在法律上被判犯有间谍罪长达 12 年的客观事实。托洛茨基说（贝利斯案）十二个“黑衣人（公诉人），大部分是农民”，是“司法部方便法官进行中世纪审判”所特别挑选的，“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向基辅陪审员灌输对犹太人贝利斯的仇恨”，这让读者忘记了一个重要的细节：这些“黑衣人”的公诉结果是无罪释放。

托洛茨基没有谴责各国法院的不公正以及围绕各种刑事案件煽动宗教和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利用“贝利斯事件”再次臆测俄国在“开明”世界中的独特“落后性”。托洛茨基还借机证明了“不断革命”开始的必然性。托洛茨基在文章末尾总结道：

> “贝利斯事件预示着俄国革命转变的新时代”。

托洛茨基在一篇专门纪念罗曼诺夫家族 300 周年的文章中总结了俄罗斯历史的当前阶段并评估了尼古拉二世的活动，他保证“在他的个人政策中，毫无疑问，对犹太人的疯狂、无限的仇恨占据了首位”。托洛茨基断言：

> “尼古拉……不仅正在成为最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式反革命行为的赞助人，而且正在成为全俄罗斯的煽动者”。

托洛茨基生动地描绘了对犹太儿童施暴、残杀犹太人的场面，据称这些都是沙皇命令的执行者在教堂祈祷仪式后，在不断高唱“上帝保佑沙皇！”的赞美诗

声中实施的。这篇文章的作者声称，当沙皇得知有 40 名犹太人在大屠杀中丧生时，尼古拉二世“失望地”说：“只是.....我以为远不止这些”。在托洛茨基的笔下，俄罗斯是一个在专制者的命令和教会的庇佑下不断对犹太人进行残酷灭绝的国家。托洛茨基的著作表明，哈曼已经死而复生，正在屠杀世界六分之一地区的犹太人。

托洛茨基在论述俄国时，将其与西方的理想化形象进行了对比，西方的“中世纪”野蛮和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多伊彻谴责托洛茨基判断的片面性，他指出：

“1914 年前欧洲文明的璀璨外表掩盖了自我毁灭和内部腐朽的过程，这些过程很快就在随后的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阵痛中显现出来。只有被西方文明的成功所迷惑的人才会注意不到这些进程的迹象”。

在托洛茨基所在城市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很容易就能发现即将到来的反犹浪潮的迹象。当时维也纳的市长是卡尔-吕格尔，他是“基督教社会党”的领袖，通过积极的反犹宣传赢得了选举。这位狡猾的政客任意选择他的竞选目标，冷嘲热讽地宣称：

“我自己决定谁是犹太人”。

但托洛茨基并不准备在维也纳市长身上看到任何不光彩的东西。毕竟，吕格尔镇长的举止要比敖德萨市长泽列诺伊优雅得多，而维也纳市民最喜欢的警察——镇民们每年圣诞节都会送礼物奖励他们——一点也不像托洛茨基的狱警，可以为了好玩而给人一根牙签。

与此同时，阿道夫-希特勒热衷于研究“基督徒社会党”的反犹主义小册子和受人尊敬的吕格尔的言论。1909 年至 1913 年，希特勒住在曼德尔曼大街的一家工人宿舍里，距离托洛茨基的家步行一小时。“基督教社会党”以其反犹主义吸引了希特勒，泛日耳曼主义者则以建立一个征服地球大部分地区的大德意志的前景吸引了希特勒。虽然社会民主党人反对资本势力的鼓动也吸引了希特勒的想象力，但他们宣扬的国际兄弟情谊却让希特勒反感。他不会与维也纳国际人种熔炉中的所有人：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匈牙利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尤其是犹太人友好相处。 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希特勒，无论冬夏都穿着同一件旧外套在维也纳街头游荡，寻找临时工作，他深信“外国人”从他那里夺走了他应得的德国财富。

我们可以假设，希特勒和托洛茨基是在街头或参加社会民主党活动时偶然相遇的。托洛茨基显然没有意识到，在他身边正在出现一个天才的煽动家，他后来警告过这个人的危险。但是，如果说托洛茨基是通过“原汁原味”地学习演说家来完善自己的艺术，那么这位未来的纽伦堡党派演说家则是通过多次重温凯勒曼的电影《图尼埃尔》来学习煽动者的艺术。他想成为这样的群众领袖。但托洛茨基很难相信，一个穿着可笑的长花大衣、拍打别人的地毯或推销自己的水彩画未果的人，会对世界和平和数百万人的生存构成威胁。

同时，这两位维也纳居民也有许多共同之处。两人都羡慕西方首都的生活方式。两人都渴望激进的世界动荡。两人都是社会民主主义集会的常客。两人都认为，应该改变俄国人的生活，让“懒惰”和“愚蠢”的俄国人臣服于“先进”的德国文明。

托洛茨基从未停止对 1905 年革命失败的哀叹，当时他距离成为俄国最高权力的领袖仅有两步之遥。他认为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俄国农民的“腐儒主义”。1909 年，他写道：

“地方腐儒主义是农民运动的历史魔咒。第一次俄国革命（1905 年）就

倒在了农民的政治局限性上，农民为了夺取地主的土地，在村子里痛打地主，并穿着士兵的外套向工人开枪”。

但他相信第二次革命即将到来。1909 年 12 月 4 日，托洛茨基在《真理报》上写道：

“今天，透过笼罩着我们的反动黑云，我们已经看到了新革命的胜利曙光”。

为了准备“新革命”和凯旋回国，托洛茨基密切关注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动态。革命失败后，许多成员被关进监狱、流放或服刑。1909 年，全国有 170000 名政治犯，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国内许多党组织一再遭到镇压。圣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组织遭到了 15 次大规模逮捕。莫斯科州委和莫斯科省委被捕 11 次。乌拉尔、西伯利亚、远东和顿巴斯的大部分党组织遭到镇压。

在少数几个继续积极开展地下工作的大型党组织中，以巴库布尔什维克委员会为首的巴库党组织是其中之一，委员会成员包括邵武勉、斯潘达良、阿齐兹别科夫、费奥列托夫、扎帕里泽、奥尔忠尼启则和斯大林（当时的党内化名为柯巴）。巴库委员会继续为工人的权利而斗争，并在工人中宣传革命社会主义思想，在这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后来，奥尔忠尼启则回忆说：

“当黑色反动势力在整个俄国盛行的时候，巴库却出现了一个真正的工人议会。在这个议会中，巴库工人的所有要求都得到了公开阐述，我们的演说家们展开了我们所有的最低纲领”。

然而，革命力量的巴库孤岛只是一个例外。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大多数人的困境导致领导层内部分歧加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领导人物开始提出自己的方案，以克服当前的危机。马尔托夫、丹、阿克雪里罗德、波特列索夫、拉林、佐尔达尼亚和其他孟什维克都主张对非法政党进行清算（取消）。波特列索夫等“取消派”认为，在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不存在本质上的政治对立，他们因共同的目标而团结在一起，因此应该紧密团结。

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阿列克辛斯基、索科洛夫（沃尔斯基）和其他布尔什维克主张从国家杜马召回工人代表。他们被称为“召回派”，呼吁立即采取革命行动。随后，一些“召回派”（卢那察尔斯基、阿列克辛斯基）和其他一些布尔什维克成立了一个“最后通牒派”团体，他们提出，在代表们不宣布无条件服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指示的情况下将其从杜马召回。1909 年底，“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围绕《前进报》，[211]与造神派联合起来。

托洛茨基还建立了自己的组织。除了上面提到的越飞，托洛茨基在维也纳的几年里还成功地团结了一些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拉狄克、克里亚奇科、斯科别列夫、梁赞诺夫、柯伦泰）。托洛茨基还与卢那察尔斯基关系密切。1909 年夏，托洛茨基依靠他的伙伴和盟友，积极尝试在他的“中派主义”基础上团结全党。他在演讲中强调，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代表了两个类似的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集团，他们都在争夺对“政治上不成熟的无产阶级”的影响力。列宁强烈反对托洛茨基“无原则的和解”政策。列宁注意到托洛茨基行动的调和主义背景，不断强调托洛茨基的活动掩盖了取消主义的危险。列宁在 1909 年 8 月 11 日（27 日）给季诺维也夫（阿普费尔鲍姆）的信中写道：

“您一定会确信.....托洛茨基的行为表明他是一个最卑鄙的野心家和派别活动者，同梁赞诺夫之流是一丘之貉！.....嘴上滔滔不绝地

[211] 与前文所提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前进报》是不一样的。——译者。

谈党，而行动却比所有其他的派别活动者还坏”。[212]

在托洛茨基参加的1910年1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会上，他成功地达成了一项妥协，削弱了两派领导层的地位。全会决定关闭《无产者报》，将属于布尔什维克的部分资金交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其余资金交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梅林、蔡特金和考茨基保管两年。

诚然，托洛茨基在崩得党的支持下试图进入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努力失败了。编辑委员会由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布尔什维克派）、马尔托夫和丹（孟什维克派）以及巴尔斯基（波兰社会民主党派）组成。在重新建立各团体之间联系的过程中，托洛茨基的姐夫加米涅夫（罗森菲尔德）从布尔什维克借调到《真理报》编辑部。托洛茨基发给的月薪为150卢布。

然而，党内的妥协是短暂的。全会结束后不久，一些孟什维克人再次在《我们的黎明》、《生活的事业》和《社会民主党人之声》杂志上站在自己的派别立场上大声疾呼。“前进派”的支持者也与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层决裂。托洛茨基解除了加米涅夫在《真理报》编辑部的职务。同时，他宣布筹备召开党的会议。列宁认为，托洛茨基试图无原则地消除党内分歧的立场是危险的，因为它干扰了反对取消主义的斗争。列宁写道：

> “托洛茨基和类似的‘托派和妥协派’，比任何取消派都更有害，因为深信不疑的取消派直接表明自己的观点，工人们很容易识破他们的谬论，而托洛茨基先生却欺骗工人，掩盖罪恶，使人们无法揭露它和医治它”。

托洛茨基在斗争中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知名人士的支持。列宁对此深恶痛绝，但又无可奈何。他在给朱利安-马克列夫斯基的信中写道：

> “连考茨基和沃姆都看不出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的文章的庸俗和卑鄙，这令人极为反感。我至少要给考茨基写一封私人信件来澄清此事。因为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肆无忌惮地撒谎，打着‘科学’文章的幌子写诽谤文章，这简直是胡闹！”

托洛茨基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宣称，“列宁的圈子想把自己凌驾于党之上，很快就会脱离党”。此外，他还“解释”说，“移民领袖中没有一个代表俄国真正的运动，他们寻求团结并谴责他们的阴谋”。这一评价可能适用于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的领导人，但不适用于托洛茨基，因为后者不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之列。此时，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正在哥本哈根召开。普列汉诺夫率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团要求将托洛茨基开除出党。“召回主义者”卢那察尔斯基支持托洛茨基，但他的主要支持者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为了避免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发生冲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层没有驱逐托洛茨基。这一事件的后果尤其是加强了托洛茨基与卢那察尔斯基和波格丹诺夫之间的联系。

1911年夏天，托洛茨基在卢那察尔斯基在博洛尼亚创办的一所学校讲课。

托洛茨基在《新时代》上发表文章后，列宁写了一篇广为人知的文章《犹杜什卡·托洛茨基羞红了脸》。他对托洛茨基的虚伪表示愤慨，指出：

> “现在这个犹杜什卡又在捶胸大叫，说自己是护党的，要人相信他决没有向前进派和取消派卑躬屈膝。犹杜什卡·托洛茨基就是这样羞红了脸”。[213]

党领导层的分裂愈演愈烈。这种情况引起了普通党员的焦虑。巴库布尔什维

---

[212] 列宁《致格·叶·季诺维也夫（8月27日）》，《列宁全集》，第45卷。

[213] 列宁《犹杜什卡·托洛茨基羞红了脸》，《列宁全集》，第20卷。

克委员会成为这些情绪的表达者。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报纸《巴库无产者报》上发表了与巴库委员会达成一致的文章，谴责了党中央机关陷入争论和争吵的局面，并强烈反对移民对普通党员的意志指手画脚的企图。他写道：

> “如果以为远离俄国现实的国外机关报能把早已经过小组活动阶段的党的工作连成一气，那就太奇怪了”。[214]

他要求：

> “尽量把党的职责交给工人，以便使党摆脱不坚定的知识分子。参加工厂党委会的先进工人就是能把自己周围的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的活跃分子”。[215]

为了克服党内的危机，斯大林建议借助全俄报（而不是外国报纸），“把彼此隔离的各个地方组织联系起来，.....把它们集合成一个有联系的过着统一生活的党”。他强调：

> “全国性的报纸可能成为.....领导党的工作、统一和指导党的工作的中心”。[216]

1909 年 8 月，巴库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建议“为消除现存不正常状态‘召开’一次和全党代表会议平行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

尽管对中央委员会活动的尖锐批评也针对他，列宁还是支持巴库委员会成员努力挽救党的垮台。他努力吸引他们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从 1910 年起，他开始与巴库委员会的一些成员通信，其中包括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1910 年，斯大林被任命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专员”，1911 年，奥尔忠尼启则被派往列宁在朗朱莫的学校学习。

1912 年 1 月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布拉格会议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和磋商，指出不可能与孟什维克和其他团体实现统一。在会议从 11 人中选出的党中央委员会中，有 3 人代表巴库委员会（斯潘达里艾、奥尔忠尼启则、斯大林）。为响应巴库委员会的要求，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俄国局吸收了在工业部门工作的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加里宁、别罗斯托茨基、彼得罗夫斯基、巴达耶夫、基谢廖夫。

布尔什维克很快宣布创办自己的印刷机关报，以《真理报》为名在俄国出版。托洛茨基强烈抗议说维也纳已经出版了一份同样名称的报纸，但遭到了忽视。然而，托洛茨基继续试图在重建统一党的过程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和以前一样，他寄希望于革命运动开始崛起，从而使党统一，成为俄国命运的领导者。

托洛茨基参加了 1912 年 3 月在巴黎举行的一次会议，与会者（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派、“前进派”小组代表、“崩得”外交委员会等）谴责布拉格会议是一场“政变”。托洛茨基在《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篇攻击布尔什维克的匿名文章：列宁对这篇文章感到愤怒，称其为“狂热和卑鄙”。

他不止一次对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写道：

> “托洛茨基把所有的人都堆在了一起，既有反对党主义的人，也有支持党主义的人。当然，他也没有得到任何团结：五年来，他一直在主导这种幼稚的不可分割的说教，而在这里，我们取得了这样的成就：我们有两份报纸、两个讲坛、两次会议，而工人民主派和取消派人之间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团

---

[214]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2006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十八章 无产阶级政党内‘巴库人’的无产阶级革命”校对。

[215]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2006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十八章 无产阶级政党内‘巴库人’的无产阶级革命”校对。

[216]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2006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十八章 无产阶级政党内‘巴库人’的无产阶级革命”校对。

结！……托洛茨基从一个梦幻般的团结的鼓吹者，变成了取消派的勤务员，做着取消派喜欢的工作……这不是团结，而是一场堪比喜剧演员的游戏”。

与此同时，托洛茨基继续着他的“游戏”。1912 年 8 月，托洛茨基在德国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和帮助下，在维也纳召开了一次俄国社会民主党会议，为建立新的党中央做出了最重要的尝试。然而，一些有影响力的团体拒绝出席会议。例如，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派和波兰社会民主党就没有参加会议。因此 ，这次会议并非一个全党性的会议，而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个别组织的会议。

会议的组成人员并不多：18 名代表拥有决定性投票权，10 名代表拥有审议投票权，还有 5 名嘉宾。大多数代表都是与俄国工作无关的移民。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代表是虚构的。引用秘密警察特工报告中的信息，沃尔科戈诺夫写道：

“米哈伊尔-阿达莫维奇、盖克-阿扎季扬涅茨、波鲁克-平丘斯-阿克雪里罗德、格里戈里-阿列克辛斯基、彼得-勃朗施坦、西玛-索菲娅-勃朗施坦、米哈伊尔-戈德曼、柴姆-扬克尔-格尔丰德、弗拉基米尔-梅德姆、安德烈-彼得森、拉菲尔-伊采克-莱因、亚历山大-斯米尔诺夫、摩西-乌里茨基、尤利-采德尔鲍姆（马尔托夫）和其他人来到了维也纳”。

托洛茨基尽了一切努力实现与会各团体之间的团结。孟什维克、崩得党和托派的团结是以与取消派形成实质性妥协为代价实现的。然而，“前进派”离开了会议，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坚决反对通过取消派纲领的企图，而大多数与会者正是在这一纲领的基础上实现团结的。

托洛茨基在会议上发挥了领导作用。《社会民主党人报》指责会议组织者鼓励取消主义，并指出：

“波特列索夫、列维茨基和丹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暂时被托洛茨基的时代所取代……取消主义的可喜之处从托洛茨基的胡言乱语编织的破烂面纱下露出了缝隙”。

1912 年 8 月，所谓的“八月集团”在维也纳成立。该集团成立后，列宁呼吁谴责托洛茨基和其他“知识分子团体自以为是的傲慢做法……他们在遭到……彻底失败后……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厚颜无耻态度唾弃先进工人的决定和意志”。

反过来，托洛茨基领导了一场针对列宁的积极论战。政治斗争的逻辑使他从“超派别”的立场和对两个派别的不偏不倚的批评转向了对列宁的积极攻击，这与他在 1904 年进行的攻击相似。布尔什维克拒绝在无原则的基础上与孟什维克联合，这使托洛茨基得以将指责列宁的分裂活动作为其运动的中心。托洛茨基在给国家杜马代表齐赫泽的信中写道：

“列宁大师，这个俄国工人运动中一切落后现象的职业寄生虫，正在有计划地煽动垃圾争吵，他似乎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痴迷。没有一个精神不受损害的欧洲社会主义者不会相信，由于列宁从克拉科夫制造的那些人为分歧，导致分裂成为可能”。

尽管托洛茨基有意淡化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分歧的性质，但他提请人们注意布尔什维克政治行动中最脆弱的一点：他们拒绝与孟什维克合作表明他们不希望克服党内的分裂。托洛茨基踌躇满志地预言列宁主义即将崩溃：

“工人对团结的自发渴望是如此不可抗拒，以至于列宁不得不有计划地与他的读者玩捉迷藏的游戏，一边谈论自下而上的团结，一边进行自上而下的分裂，在圈子和派别的定义下提出阶级斗争的概念。一言以蔽之，列宁主义目前的整个大厦都是建立在谎言和篡改之上的，它本身就已经开始腐朽。毫无疑问，由于另一方的合理行为，列宁主义在不久的将来——正是在统一

还是分裂的问题上——就会开始剧烈的解体”。

对此，列宁提请注意托洛茨基的无原则行为。他写道：

“托洛茨基在 1901–1903 年是一个狂热的‘火星派’.....1903 年底，托洛茨基是一个狂热的孟什维克，即从‘火星派’投靠了‘经济派’，他宣称‘在新旧《火星报》之间是一个深渊’。1904–1905 年，他脱离孟什维克，立场摇摆不定，要么与马尔蒂诺夫（‘经济派’）合作，要么宣称进行荒谬的左派‘不断’革命。1906–1907 年，他接近布尔什维克，1907 年春宣布声援罗莎–卢森堡。在解体时期，经过长期的‘踌躇’犹豫，他再次向右转，并于 1912 年 8 月加入了取消派集团。现在，他再次背离了他们，实际上重复了他们自己的主张”。

列宁不仅正确地指出了托洛茨基的肆无忌惮，还指出了他的野心：

“‘图希诺飞行队’以今天‘借用’一个派别的思想，明天‘借用’另一个派别的思想为由，宣称自己比派别高明.....在俄国工人群众运动还在沉睡的时候，任何团体都可以‘宽大’地假装自己是一股潮流、一个团体、一个派别——一句话，就是一个‘势力’，妄谈与他人联合”。

托洛茨基声称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扮演“仲裁者”角色，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国际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他与帕尔乌斯的友谊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帕尔乌斯贪污了布尔什维克交给他保管的马克西姆-高尔基的钱，由考茨基、倍倍尔和蔡特金组成的委员会对此案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但没有得出结论（帕尔乌斯在回答委员会成员的问题时相当厚颜无耻地说，他在一次去意大利的旅行中贪污了属于布尔什维克的 13 万马克），丑闻发生后，这位贪污犯于 1910 年离开德国，暂时搬到了维也纳，并在那里再次与托洛茨基保持联系。然而，帕尔乌斯在哈布斯堡王朝的首都并没有待很久，从 1910 年 11 月起，他永久性地搬到了君士坦丁堡。帕尔乌斯从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不断离开，游历巴尔干各国，并结识了这些国家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人。他与拉科夫斯基特别结识。

很快，帕尔乌斯成了土耳其军队最大的武器和粮食供应商之一。这位德国和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经手的巨额资金的来源只能猜测。最有可能的是，帕尔乌斯在 1905 年底组织俄国金融崩溃的活动并没有被那些从俄国卢布下跌的投机活动中获利颇丰的圈子所遗忘。

帕尔乌斯一如既往地正确评估了政治和经济形势，提前抵达“热点地区”，从事可以带来可观利润的生意。帕尔乌斯抵达君士坦丁堡并积极游历巴尔干各国，在他成为奥斯曼军队的主要武器和粮食供应商几年后，巴尔干地区爆发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1912 年 10 月 9 日至 1913 年 5 月 30 日），随后又爆发了第二次战争（1913 年 6 月 29 日至 8 月 10 日）。

托洛茨基在此之前一直住在维也纳，他突然对巴尔干战争前线发生的事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作为多家报纸的通讯员前往巴尔干，这很难说是偶然的。显然，战区记者的身份为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忠实朋友提供了急需的信息。此外，来自前线的报道也影响了欧洲各国的舆论。塞基的故事中的利特波尔德-沃肯斯坦喜欢用咖啡和奶油来品尝这些来自巴尔干前线的报道。

托洛茨基对这一事实的看法是毫无疑问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在文章中展开了反对斯拉夫主义谎言的斗争”。

托洛茨基发表了一篇文章，谴责保加利亚人对待土耳其战俘的行为，甚至就此问题与米留可夫展开了论战。很明显，这些出版物是有利于帕尔乌斯的奥斯曼朋友的。

在巴尔干国家旅行期间，托洛茨基与帕尔乌斯几年前会见过的那些社会主义政党领导人走得很近。与帕尔乌斯一样，托洛茨基也与拉科夫斯基成了朋友，后者此时已离开保加利亚，正忙于在罗马尼亚建立社会主义政党。托洛茨基曾在拉科夫斯基位于黑海的家族庄园度过一段时间。托洛茨基在评价拉科夫斯基时写道，他是“欧洲革命运动中最具国际化的人物之一 ..... 在各个不同时期积极参加了保加利亚、俄国、法国和罗马尼亚四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的党内生活，后来成了一位苏维埃联盟领袖和共产国际奠基人之一、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苏联驻英法两国的外交代表”。[217]托洛茨基没有提到，拉科夫斯基是托洛茨基在 20 年代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拉科夫斯基与主要革命家和有影响力的金融家都有广泛的联系，而且他很容易从一个国家转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党派转到另一个党派，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这是因为他是国际共济会组织的重要人物。

拉科夫斯基绝不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唯一一个从一个国家轻松辗转到另一个国家并加入各种政党的人物。卡尔-拉狄克（曾在奥匈帝国和俄国）、罗莎-卢森堡（曾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安杰利卡-伊萨科夫娜-巴拉巴诺娃（曾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担任意大利主要社会主义报纸《前进报》的编辑，并加入了俄共[布]），他们的传记中都有类似的经历。这些人和其他一些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知名人士经常提前到达那些即将爆发重大内部或外部冲突的国家。显然，这些“世界公民”之所以能够进行这样的运动，是因为他们与有影响力的国际力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12-1913 年间，拉科夫斯基、帕尔乌斯和托洛茨基这个有着广泛国际关系的人同时发现自己身处的地区不仅是 1912-1913 年两次巴尔干战争的战场，也是世界主要国家军事和政治利益交织的地方。俄国旨在加强其在巴尔干地区的影响力，并最终夺取黑海海峡。俄国的这一愿望遭到了奥匈帝国和德国的反对，奥匈帝国希望在巴尔干地区站稳脚跟，而德国则计划通过土耳其向中东扩张。然而，英国和法国也声称在该地区拥有势力范围，并控制着黑海与地中海、欧洲与亚洲之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交通。这些矛盾只能引发尖锐的冲突，进而升级为世界大战。

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塞尔维亚地下恐怖组织成员加夫里拉-普林西普在波斯尼亚萨拉热窝刺杀奥地利大公斐迪南而引发的。显然，早在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这一地区就已经在秘密准备一场反对和平的阴谋，帕尔乌斯及其朋友的活动很可能与这一阴谋有关。

[217]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十七章 酝酿新的革命”，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 第 十 一 章

# 世界公民

除了那些对秘密阴谋了如指掌的人之外，世界上几乎没有人预料到会发生世界大战和正常秩序的崩溃，其结果是世界上许多伟大人物将退出舞台，而不起眼的政治人物将成为领导人物。1914 年 6 月，列宁在《启蒙》杂志上写道：

> “就让托洛茨基在“自己的”小小的杂志上借同前进派联合去取乐吧，就让前进派和托洛茨基派去玩‘强国’、‘派别’相互勾结的游戏吧！这不过是想用豪言壮语来掩盖自己‘集团’的不可救药的空虚的人们的一种幼稚的游戏罢了”。[218]

托洛茨基的说法，即使从不相信现存制度的持久性的革命者的角度来看，也显得幼稚可笑。

但是，如果托洛茨基的雄心壮志在列宁看来是荒谬的，那么在那些从未想过要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的人看来，就更加荒谬了。无论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许多传统社会组织形式数百年来都没有改变，保留着古老家族的特权。到 20 世纪初，尽管东半球几乎所有国家都对变革之风做出了重大让步，但君主制以及与之相伴的封建社会的许多制度和习俗却依然存在。

1910 年 5 月，爱德华八世逝世之际在伦敦举行的王室会议似乎表明了旧秩序的牢固性。俄皇尼古拉二世和德皇威廉、奥地利大公斐迪南和比利时国王阿尔伯特、奥斯曼帝国苏丹的继承人优素福亲王以及黑山共和国的达尼洛亲王（他不仅在名字上与《风流寡妇》中的主人公十分相似）在灵车后的伦敦民众面前驰骋。五十多位皇室和王室殿下、五位继承人、七位王后以及一小群来自共和国家的特使庄严地跟随着这位贵族典范——英国国王的灵柩。历史学家芭芭拉-托克曼在其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著作中写道：

> “他们代表了 70 个国家，参加了有史以来最盛大的王室和贵族聚会。这样的聚会是独一无二的，也是最后一次。当队伍离开皇宫时，大本钟的钟声闷闷地敲响了九点钟，但历史的时钟正在落下，旧世界的太阳正在熄灭的光辉中下沉，再也看不到了”。

谁能预料到，四年后，年轻的大公将被塞尔维亚恐怖分子的子弹夺去生命，加夫里拉-普林西普的枪声将把这支辉煌的骑兵队伍的成员驱散到前线的不同阵地，战壕、炮火、成堆的废墟和尸体，将使欧洲四分五裂？阿尔伯特国王骑在大公身边，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很快就会背井离乡，流亡国外四年。谁能预料到，在短短十几年后，世界各大报纸会被一张从荷兰多恩镇寄出的照片所取代，照片上曾经叱咤风云的德皇正在为他那简陋的住所锯木头；谁能预料到，在三十年后，德皇军队中的一名前中士阿道夫-希特勒会在 1940 年德国占领荷兰后下令撤走皇帝宅邸外的仪仗队？英国新国王乔治五世不可能想到，他的儿子乔治六世会通过首相丘吉尔要求接见鞋匠的儿子朱加什维利，而他得到的却是居高临下的回答：

---

[218] 列宁《关于“前进派分子”和“前进”集团》，《列宁全集》，第 25 卷。

“我的计划是不接见国王……但如果您认为我有必要会见国王，我不反对您的计划”。

在伦敦，没有人不怀着钦佩好奇的心情观看葬礼队伍，也没有人会想到，八年后，作为英国新国王乔治五世的远亲、与乔治五世极为相似的俄国沙皇会耐心地等待着对自己命运的判决，而《基辅思想》前记者列夫-托洛茨基会坚持让自己成为审判俄国皇帝的公诉人。世界上很少有人预见到，这些永恒不变的制度的鲜活象征中的大多数很快就会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相信君主制的持久性将成为梦想家们的专利。很少有人相信，记者托洛茨基关于成为俄国革命政府首脑的“幼稚”梦想，以及失业的希特勒关于建立一个从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手中“解放”出来的大德意志的“疯狂”计划，会更加现实。

没有人注意到日后搅动世界风云的未来领导人的言行举动，也没有人注意到日后这些人在世界范围内的讲话和行动很快就会成为人们评论的主题。如果人们能够预知未来，他们一定会惊讶于这些未来领袖在默默无闻期间发表的许多言论，以及他们的职业和地理路线与未来伙伴或劲敌的人生轨迹的惊人交集。在 1913 年的意大利，很少有人会对社会主义报纸《前进报》的新编辑所说的“必须废除私有财产，意大利必须进入集体化阶段，以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感到惊讶，因为墨索里尼以其激进的观点而闻名。1913 年，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几乎同时被任命担任美国和英国海军部的领导职务，没有人对此感到惊讶，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两个人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两个大国。

1913 年初，在没有庄严警卫和闪光灯的情况下，许多未来的世界领袖来到了维也纳。除了已经在维也纳的希特勒和托洛茨基，24 岁的布尔什维克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真理报》的编辑斯大林也来到了奥匈帝国的首都。托洛茨基描述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在孟什维克斯科别列夫的公寓里会面的情景。托洛茨基声称，他当时就注意到斯大林面部表情“严峻凝重”，“黄色”的眼睛里充满“敌意”，并听到一些“咕咕声”，而不是问候。多伊彻指出，斯大林向托洛茨基打招呼时发出的“粗鲁的咆哮声”“来自俄罗斯茅屋的深处”。会面就是这样发生的，托洛茨基当时的印象就是这样，这一事实的可信度值得怀疑，因为这一情节是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斗争多年之后才被描述出来的。

几个月后，这场沉默的维也纳最高级别“大会”结束了。斯大林前往俄国，在那里被捕并被流放到图鲁汉斯克地区。他在那里一直呆到 1917 年。布哈林离开维也纳，不断变换地点，周游欧洲和美国，直到 1917 年。希特勒前往慕尼黑，一年后加入德国军队，一直服役到 1918 年。一年多后，托洛茨基被迫离开维也纳。

战争破坏了全世界数百万人的和平计划，也打乱了托洛茨基的“大国”游戏，因为他试图让第二国际参与到他反对列宁的斗争中来。1914 年 7 月底，他前往布鲁塞尔，与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一起向第二国际正式提交了一份针对布尔什维克的控诉书，要求国际局干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事务。然而，1914 年 8 月初，驻扎在遭受德国侵略的国家的第二国际已无暇顾及党内争斗。为了避免被拘禁，托洛茨基于 1914 年 8 月移居苏黎世，列宁、布哈林、拉狄克和许多其他社会民主党人很快也来到了那里。

战争不仅加剧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分裂，而且划定了新的不团结界限，这与第二国际所有党派的类似不团结不谋而合。国际冲突中的阶级斗争原则受到了严峻的考验。支持自己的政府就意味着放弃社会民主党数十年来斗争的基本目标。在战争条件下继续与现存秩序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无异于帮助一个拥有完全相

同的反无产阶级力量的外来国家。

相当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采取了“保卫祖国”的立场，暂时放弃了反对政府的斗争，而强调了反对敌对联盟中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的阶级性。格-瓦-普列汉诺夫将党的社会主义目标与支持沙皇政府在世界大战中的努力结合起来，其理由如下：

> “被剥削者反对剥削者的斗争并不因为剥削者生活在战壕的另一边而不再是阶级斗争”。

这一立场使得社会民主党人可以在爱国主义的口号下，与包括本国统治集团在内的各阶级和政治团体广泛合作。这有助于扩大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基础，但代价是削弱其无产阶级形象，切断其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联系。

除了普列汉诺夫之外，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采取这种立场的还有扎苏利奇、波特列索夫、阿列克辛斯基、布里安诺夫、列维茨基等人。在类似理由的帮助下，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社会主义者的领袖朱尔斯-盖德、阿尔伯特-托马斯、埃米尔-范德维尔德和马克斯-卡斯特罗等人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阿尔伯特-托马斯、埃米尔-范德韦尔德、阿瑟-亨德森等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人进入了他们国家的政府。《前进报》的编辑墨索里尼创办了一份新报纸《意大利人民报》，他在报纸上鼓吹意大利加入协约国一方反对奥匈帝国和德国的战争。墨索里尼要求将的里雅斯特、菲乌姆、巴尔干半岛的一些地区和中东并入意大利。

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一些著名人士采取了所谓的中派立场，他们的解释是，不可能做出牺牲阶级斗争利益和国际团结的选择，也不可能做出牺牲爱国主义和保卫工人——同胞不受外国军队侵害的选择。马尔托夫对社会民主党面临的两难境地的实质作了如下解释：

> “要么继续处于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地位，在爆发的帝国主义飓风面前在每一个国家捍卫自己的生存，要么接受‘民族休战’的一切后果和一切可耻的妥协，背弃迄今为止为之斗争的原则，并且得到一切耻辱”。

这一切导致中派为那些采取“保卫祖国”立场的人开脱。这一立场使他们内部犹豫不决，将他们分为“左派”和“右派”。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左派”中间派由马尔托夫领导，“右派”中间派由阿克雪里罗德领导。德国的中间派立场由考茨基和希尔费丁，奥匈帝国的阿德勒，法国的朗格，英国的麦克唐纳等人。

左翼社会民主党人毫不妥协地坚持社会民主党的“战前”原则。他们不愿与本国的非无产阶级力量结盟，这迫使他们拒绝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他们反对本国政府的斗争是在帮助外来资本主义。左派（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在德国，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蔡特金、梅林和其他人）主张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打败“他们的”政府。要求同时打败两个对立派别的自相矛盾的路线在要求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内战中找到了合乎逻辑的结论。左翼社会民主党人是唯一忠实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人，因此他们要求清算第二国际并成立新的国际。

在交战国的爱国情绪高涨之时，这一立场使社会民主党左派在每个交战国都陷入孤立。他们受到叛国罪的指控和镇压。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布尔什维克代表因其失败主义观点而被捕。

世界大战给托洛茨基带来了困境。他在奥古斯特集团中的一些盟友，如阿列克辛斯基或普列汉诺夫（1914 年 7 月他曾与他们一起前往第二国际控诉列宁），在俄国成为了“社会爱国者”。曾在 1907 年与他合作过的罗莎-卢森堡加入了左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左派由托洛茨基当年的主要敌人列宁领导。他在

社会民主党中的大多数朋友（考茨基、希尔费丁、阿德勒、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德等人）都采取中派立场。

他的主要导师和资助人帕尔乌斯站在威廉二世政府一边。此外，帕尔乌斯还利用自己与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人的密切联系，呼吁他们在对俄战争中支持德国。他为自己的提议辩解道：

“协约国的胜利意味着专制的胜利，这将对俄国的革命事业造成巨大伤害，整个欧洲将进入一个无限制剥削的新时代”。

拉科夫斯基是巴尔干地区帕尔乌斯思想的指挥者。在罗马尼亚期间，他带头大力鼓动该国加入同盟国阵营。作为德国外交部的雇员，布舍承认：

“拉科夫斯基与我们有联系，并在罗马尼亚为我们工作。罗马尼亚加入协约国后，拉科夫斯基被捕了”。

从君士坦丁堡到索非亚，再从索非亚到维也纳和利沃夫，帕尔乌斯非常积极地组织对同盟国集团的援助。在他的建议和参与下，“乌克兰解放斗争联盟”成立了。这个“联盟”得到了奥匈帝国和德国军队的支持。早在 1914 年 9 月，帕尔乌斯就制定了将“联盟”的战斗行动转移到俄罗斯境内的计划。与此同时，他还努力为高加索地区的当地人建立一个类似的组织。

1915 年 1 月 7 日，帕尔乌斯拜访了德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冯-旺根海姆肯 。大使很快向柏林报告说：

“亚历山大-盖尔芬德博士（帕尔乌斯）向他提出了在俄国组织革命的计划”。

帕尔乌斯被召至柏林，并于 3 月 6 日受到德意志帝国总理贝特曼-霍尔韦格的接见。会后，帕尔乌斯制定了一项针对俄国组织颠覆行动的计划。

该计划规定在俄罗斯帝国外围组织民族分离主义起义。帕尔乌斯认为，最重要的是乌克兰的分离主义运动。帕尔乌斯声称：

“乌克兰是基石，动摇它就能摧毁中央集权国家”。

与此同时，他还计划在芬兰、高加索和库班哥萨克中发表演讲。此外，帕尔乌斯还建议利用社会民主运动中的左翼力量在俄国城市组织大规模的工人示威游行。帕尔乌斯写道：

“这样，德意志集团国家的军队和俄国本身的革命运动将动摇危害世界和平的沙皇帝国所依托的巨大政治集权，欧洲政治反动的堡垒将被推翻”。

帕尔乌斯要求德国政府提供资金，用于在芬兰和乌克兰组织分离主义运动，以及资助“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失败主义派别”。后来，帕尔乌斯在丹麦时向德国驻丹麦大使布罗克多夫-兰考伯爵概述了他的计划，后者于 1915 年 8 月 15 日向柏林发出了一份电文 5，称“盖尔芬德博士（帕尔乌斯）.....制定了在俄国组织革命的行动计划”。大使在描述这一计划时写道：

“利用盖尔芬德背后的势力有一定的风险，但如果我们因为害怕无法控制这些势力而拒绝这样做，这无疑是我们软弱的证明”。

大使补充道:

“如果能及时革新俄国，从而瓦解联军，那么胜利，乃至最终的世界霸权，都将掌握在我们手中”。

最终，德国政府决定接受帕尔乌斯的计划。德皇威廉二世下令向他拨款 200 万马克。正如泽曼和沙劳所指出的，帕尔乌斯“利用金钱、最高层的关系和令人生畏的军事机器等手段，大张旗鼓地开展工作……他正在为自己作为改革者、救世主和革命领袖在舞台上的胜利亮相做准备”。

在制定打败俄国并将其分割成不同领土的宏伟计划的同时，帕尔乌斯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商业利益。他购买了大量粮食和武器，然后卖给交战国。他利用丹麦的中立地位，在交战国之间交易在战争条件下变得非常昂贵的商品。

迅速增长的资本让帕尔乌斯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泽曼和沙劳写道：

> “1915 年 5 月，盖尔芬德在苏黎世的‘鲍尔阿姆拉科’建造了一个真正的宫廷。他的随从都是收入不菲的金发女郎，他对大雪茄的喜爱与他对香槟的渴求，以至于他每到早餐时就能喝上一瓶香槟”。

帕尔乌斯的整个生活方式证明，这位曾经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士已经变成了他的对立面——富有的资本家，而后者正是革命宣传的主要目标。

然而，帕尔乌斯承认，列宁拒绝了他的提议。有一种说法是，列宁甚至没有让帕尔乌斯把话说完，就把他指到了门外。诚然，克伦斯基声称：

> “虽然列宁拒绝直接回答帕尔乌斯的建议，但他们之间商定，他们的秘密中间人将是弗斯滕贝格（笔名——加涅茨基、哈内克）。列宁把他派到哥本哈根，在那里与帕尔乌斯共事”。

泽曼和沙劳对布尔什维克弗斯滕贝格与帕尔乌斯的企业合作作了如下解释：

> “如果在 1915 年。如果列宁支持哈内克在帕尔乌斯的组织中工作，这对双方都有利：列宁可以了解斯堪的纳维亚的工作进展情况，而盖尔芬德则通过弗斯滕贝格与布尔什维克总部建立了可靠的联系”。

尽管弗斯滕贝格加入了帕尔乌斯的公司，但布尔什维克与德国政府之间通过帕尔乌斯的调停并没有建立起永久的合作关系。1915 年 11 月 20 日，列宁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堕落到了极点》一文，明确公开地表达了他对帕尔乌斯提出的德皇与革命结盟的一切看法。在这篇文章中，列宁第一次指出帕尔乌斯“在俄国革命中就已表现出是个冒险家”。[219]虽然列宁没有具体说明这一指责的含义，但他有可能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了他在 1905 年逐渐形成的对帕尔乌斯活动的怀疑。

列宁对帕尔乌斯企图在德国总参谋部和俄国革命之间扮演调停人的角色表示愤慨：

> “他向兴登堡摇尾乞怜，要读者相信‘德国总参谋部是支持俄国革命的’，并下贱地颂扬这个‘德国人民精神的体现者’和它的‘强烈的革命情感’”。
>
> ……
>
> “帕尔乌斯先生竟厚颜无耻地公然宣称，他的‘使命’就是‘充当武装起来的德国无产阶级和革命的俄国无产阶级之间的思想纽带’。这种丑角的插科打诨，准能使俄国工人笑破肚皮。如果说普列汉诺夫先生、布纳柯夫先生以及和他们一伙的《号召报》理所当然地得到俄国的沙文主义者和赫沃斯托夫的赞许，那么，帕尔乌斯先生的《钟声》杂志就是德国的叛徒和走狗们的喉舌”。[220]

列宁把帕尔乌斯归入了“冒险家和社会主义运动中朝三暮四的人”的行列。[221]

甚至在列宁的文章发表之前，帕尔乌斯就试图重新与列宁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同僚建立联系。然而，蔡特金和李卜克内西冷淡地对待帕尔乌斯，罗莎-卢森堡也立即将他拒之门外。帕尔乌斯试图控制国际社会民主党左翼的努力失败了，

---

[219] 列宁《堕落到了极点》，《列宁全集》，第 27 卷。
[220] 列宁《堕落到了极点》，《列宁全集》，第 27 卷。
[221] 列宁《堕落到了极点》，《列宁全集》，第 27 卷。

他在俄国点燃革命的企图也受挫了。他的所有努力只导致了尼古拉耶夫的小规模示威游行，而托洛茨基就是从那里开始他的革命活动的。这些演讲很快就被镇压了。帕尔乌斯也未能在俄国外围组织起全国性的起义。

尽管帕尔乌斯对自己的许多行为保密，但他与同盟国集团政府的关系却广为人知，并震惊了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其中一位名叫戴维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在日记中这样描述帕尔乌斯：

> “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一个极端激进的革命者，一个俄国告密者，一个无赖，一个骗子（高尔基事件！），现在又成了土耳其特工和投机商”。

在与帕尔乌斯保持关系严重损害任何社会民主党人利益的时候，托洛茨基于1915年郑重宣布与他的朋友、导师和赞助人决裂。托洛茨基在《给在世的朋友的讣告》中宣称帕尔乌斯是“政治上的法尔斯塔夫，他在巴尔干游荡，诽谤他已故的替身”。

就在托洛茨基用文学手法将马克思主义者帕尔乌斯与金融家和“社会沙文主义者”帕尔乌斯区分开来的时候，托洛茨基本人也受到了指责，之后他不得不证明在这件事上我们谈论的是两个不同的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在“八月集团”中的前盟友阿列克辛斯基指责他帮助和教唆德国。这一指控得到了报刊上其他言论的支持。有人指出，某个叫尼古拉-托洛茨基的人是“斯皮尔卡”（即乌克兰解放联盟）的首领，这是一个得到奥地利人支持的反俄民族主义组织。虽然托洛茨基有时会在自己的姓氏前加上首字母“N”，但他声称这是不同的托洛茨基和不同的尼古拉。

正如1905年托洛茨基在乌克兰领导犹太人自卫队的故事一样，我们并不清楚“尼-托洛茨基”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领导一个民族主义者武装组织的，但《我们的言论》报上新发表的文章却为指责托洛茨基亲德提供了众所周知的理由。老革命家戴奇“在读到刚刚收到的关于托洛茨基的一期报纸时，愤慨地喊道：‘如果我不认识托洛茨基本人，我会毫不怀疑他投靠了德国政府’”。内达瓦对此的解释是，托洛茨基与俄国和西欧的部分犹太人有着同样的亲德情绪：

> “受压迫的犹太群众刚刚尝到贝利斯事件的苦头，他们时刻被大屠杀的恐惧所困扰，他们急切地希望俄国在战争中失败.....在德国和奥地利，几十年来犹太人或多或少地享有完全平等的地位，这两个国家似乎并不是他们的敌人。毫无疑问，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犹太人都站在德国一边——这当然不是出于对德国人的喜爱或对俄国人的厌恶，而只是出于对沙皇主义的憎恨，这是可以理解的。在俄国，他们立即被指控大肆从事有利于德国人的间谍活动，并遭到进一步镇压，包括被逐出前线”。

托洛茨基向全世界宣布了与德军勾结的指控的虚假性，并公开与帕尔乌斯决裂，在这些年里，托洛茨基发现自己来到了他被拒绝的朋友和导师当时居住的地方——苏黎世。诚然，托洛茨基后来只字未提他当时与帕尔乌斯的接触，并写道他当时“积极地参加了瑞士社会党的生活”。托洛茨基公开宣布与帕尔乌斯断绝关系，但有消息称，托洛茨基与帕尔乌斯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直到后者于1924年去世。

从1914年底起，托洛茨基开始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帕尔乌斯行事。至少从1904年起，托洛茨基的行动就一直受到他的赞助人的指导，托洛茨基完全可以摆脱赞助人的不断庇护，因为此时他已经在国际圈子中获得了广泛的人脉，这使他能够在世界大战期间从一个国家转到另一个国家，在其中安身立命，并试图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占据有利的“中派”地位。

战争爆发后不久，托洛茨基撰写了小册子《战争与共产国际》。[222]正如托洛茨基所承认的：

“不乏这样的流言，说我小册子充当了协约国的宣传手段的高超武器”。[223]

他说，正因如此，“也不妨碍法国当局在边境上扣押我的书，因为它‘来自德国’”。[224]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一情况并没有阻止托洛茨基很快举家迁往法国。1914 年 11 月 19 日，托洛茨基作为《基辅思想》的战地记者越过法国边境，但他很快就开始为马尔托夫出版的《声音报》工作。该报发表了社会民主党各支部代表——范德维尔德、考茨基、阿克雪里罗德——的文章。

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为托洛茨基试图重建“中派”立场开辟了道路，从而使他能够发挥团结作用。托洛茨基加入了“左翼”中间派马尔托夫的阵营，决定趁势建立一个新的党内集团。然而，派别之间的分歧太深，反映出冲突的结果是在战场上决定的。因此，托洛茨基试图在各国的“中间派”和“爱国者”之间建立一个由他领导的新集团，但没有成功。

失败迫使托洛茨基寻找其他可以依靠的力量。1915 年 2 月，托洛茨基与马尔托夫一起领导了《我们的言论》报，该报联合了孟什维克（安东诺夫-奥夫先科、梁赞诺夫、罗佐夫斯基、柯伦泰、乌里茨基、麦斯基）、最后通牒派（卢那察尔斯基、马努伊尔斯基）。托洛茨基在维也纳与之建立了友好关系的卡尔-拉狄克和与墨索里尼决裂的安杰利卡-巴拉巴诺娃开始在报纸上积极合作。

《我们的言论》批评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托洛茨基赞同列宁关于第二国际破产和需要建立新国际的立场，并于 1915 年 7 月对布尔什维克的国际主义立场给予了积极评价。然而，列宁并不支持托洛茨基的这些倡议，宣称只要他与“孟什维克社会护国主义”保持联系，他的国际主义就纯粹是名义上的。

与往年一样，托洛茨基决定利用自己的国际关系来证明自己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各派领袖的地位。他响应了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奥-莫尔加里提出的召开一次社会主义者国际会议的建议，并开展了组织会议的活动。然而，列宁强烈反对托洛茨基参加会议。为了克服这种反对，马尔托夫和马努伊尔斯基放弃了自己的授权，支持托洛茨基。

国际社会主义会议于 1915 年 9 月 5 日至 8 日在瑞士的齐美尔瓦尔德村举行。出席会议的左派代表提出的宣言草案提出了“不是阶级间的和平，而是内战！”的口号。草案指出：

“你们必须走上街头，向统治阶级大声疾呼：屠杀够了”。

托洛茨基在许多立场上支持列宁，但拒绝赞同列宁打败政府的口号。相反，他提议赞同“没有胜利者和没有被征服者的和平”的要求。托洛茨基起草了《齐美尔瓦尔德宣言》的文本，尽管列宁和一些代表对该文件持保留意见，但所有代表一致接受了该宣言。也许托洛茨基在支持列宁的口号时的谨慎也是出于个人动机。他继续与支持战争的《基辅思想》合作。因此，托洛茨基从法国发来的战报与俄国官方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多伊彻指出：

“这使《齐美尔瓦尔德宣言》的作者处于最尴尬的境地”。

由于对会议决定不够激进感到不满，列宁和其他一些代表组织了所谓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在这一小撮社会民主党人中，相信有可能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

---

[222] 译者未有找到中文版的翻译。——译者。
[223]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十八章 大战爆发”，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224]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十八章 大战爆发”，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内战的人占多数，这是因为他们有 1905 年革命的经验。他们知道，现代战争比过去的武装冲突更加血腥，战争失败和伤亡的消息对反政府情绪的高涨起到了什么作用。

成千上万的人在战火中丧生，经济崩溃，粮食供应恶化，这些消息都为革命风暴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其破坏力远远超过了 1905 年。许多社会民主党人都感受到了俄国新革命危机的积聚。随着战争造成的危机加深，托洛茨基削弱了对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我们的言论》表示声援 1916 年 4 月底在昆塔尔召开的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会议的决定。托洛茨基在回忆录中保证说：

> “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之后没过几个月，那些在会议期间我和列宁之间其实并不重要的分歧也烟消云散了”。[225]

事实上，即使在昆塔尔之后，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论战也没有停止，涉及到革命的根本问题：对农民的态度、民族自决权。列宁强调，“找出即将到来的革命中的阶级比例是革命党的主要任务.....”。托洛茨基在《我们的言论》中错误地解决了这一任务，他重复了自己 1905 年的“原创”理论，却不愿思考生活中这一美丽理论流逝的原因。列宁保证说：

> “托洛茨基实际上是在帮助俄国的自由派工人政客，他们通过‘否认’农民的作用来理解不愿提高农民的革命水平”。

列宁认为，托洛茨基对民族自决权的支持是形式上的：

> “他有时赞成自决，但是……他有这种空话，因为他并不要求受某个民族社会主义‘祖国’压迫的民族有分离的自由”。

列宁自己则把托洛茨基与考茨基和希尔费丁一起列入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劝说者、说服者”、“其改革者”的名单，他在《帝国主义笔记》中的笔记就是证明。托洛茨基则继续指责列宁是一个分裂人物，从未放弃将他的“中派理论”作为全党的政治纲领强加于人的企图。1916 年 12 月，列宁在谈到托洛茨基时写道：

> “而托洛茨基呢？他一方面同马尔托夫的党断绝了关系，但又继续责备我们，说我们是分裂派。他向左转了一点，甚至建议同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领袖们决裂，但是他没有彻底向我们说明，他愿意同齐赫泽党团统一还是分裂.....我们反对这种联合。马尔托夫赞成。而托洛茨基呢？不知道”。[226]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列宁引用了荷兰社会主义者罗兰-戈尔斯特的一段话：

> “谁要是象托洛茨基和他那个集团那样愿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谁就应当克服流亡者之间的意见分歧（其中大部分带有十足的个人性质而且是分裂极左派的）所造成的后果，谁就应当参加列宁派。‘革命的中派’是不可能有的”。[227]

然而，托洛茨基未能及时熟悉列宁的这些言论，因为在 1916 年的最后一个半月里，他一直在西班牙等待前往美国。托洛茨基是在被法国以德国颠覆者的罪名驱逐出境后来到西班牙的。尽管托洛茨基宣布与帕尔乌斯决裂，但他与帕尔乌斯本人一样被视为德国的代理人。西班牙当局也试图摆脱托洛茨基，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他和家人被安排登上 1916 年 12 月 25 日从巴塞罗那出发前往纽约的“蒙

---

[225]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十九章 巴黎与齐美尔瓦尔德”，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226] 列宁《给波里斯·苏瓦林的公开信》，《列宁全集》，第 28 卷。

[227] 列宁《给波里斯·苏瓦林的公开信》，《列宁全集》，第 28 卷。

特塞拉特”号汽船。424 年后，托洛茨基再次踏上哥伦布的征程。

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在被法国驱逐前不久，在《我们的言论》报上预言“美国的世界独裁即将到来”。因此，托洛茨基是在前往一个他看到了地球未来统治者的国家。托洛茨基在回忆他前往美国时写道：

“欧洲的大门在我身后关闭了”。[228]

只有证据表明，托洛茨基是认真地、长时间地移居美国的。1916 年底离开欧洲时，他在给一位熟人的信中写道：

“我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古老的阴沟——欧洲”。

在 1916 年的最后几天和 1917 年的最初几天，托洛茨基和自 19 世纪 80 年代初以来从俄国西部地区移居美国的一百五十万同胞一样，横渡大西洋。

肖洛姆-阿莱切姆嘲笑许多新美国人的希望过于天真。在其作品中，著名骗子贝尔-艾兹克对卡斯里洛夫卡的人说了当时关于这个神奇国度的一些平常故事：

“人们在那里赚了很多钱，他们成群结队地去那里，捞取金子！那里的生意多得让人匪夷所思！”

贝尔-艾兹克向卡斯里洛夫人保证说：

“在美国，没有哪个民族像犹太民族这样尊贵、受人尊敬和崇高。对他们来说，犹太人是最尊贵的；你是犹太人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诚然，他警告说，卡斯里洛夫卡人必须改变他们在美国的外表：

“他们不喜欢的是犹太人的胡子和帕萨。当他们看到一个犹太人时，他们不会去碰他，但一旦他们抓住他的胡子和帕萨，他们就会拉扯和掐他，以至于最后他不得不把胡子和帕萨刮掉……如果一个犹太人既没有胡子，也不说犹太语，你怎么能认出他呢？……只能通过他们灵活的步态或说话时挥手的方式”。

贝尔-艾兹克的观点部分是正确的：能否成功融入新社会，始终取决于移民的外表和言语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百分之百美国人”的形象。20 世纪末，社会学家斯塔德斯-特克尔讲述了一个斯堪的纳维亚裔美国妇女的故事，她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外貌和语音语调，只为进入当地一家富人俱乐部。二十世纪初，来自俄罗斯的犹太移民抵达纽约湾区后，立即开始严格地融入美国生活。

从多克托罗的小说《拉格泰姆》的内容来看，在把俄罗斯移民变成正式的美国公民之前，他们在这个岛上经历了相当屈辱的程序：

“他们被贴上标签，在淋浴下清洗，在泻湖的长凳上搅动。他们立即意识到移民官员的巨大权力。如果他们不会发音，这些官员就会改掉他们的名字，并将他们与家人分开，命令将老人、有眼疾的人、各种人渣和无礼的人遣返”。

然而，许多获准进入美国的人发现自己处于美国社会的边缘，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不愿放弃自己的名字、帕萨和胡子。大“生意”根本没有足够的地方容纳所有人。新美国人不得不开始他们的“事业”，在纽约街头做彩票工人，生活在贫穷和犯罪猖獗的街区。 带领他们来到美国的希望破灭后，他们经历了痛苦的失望，并始终感到自己处于二等地位，许多离开乌克兰寻求更好生活的人，如多克托罗小说中的一家之主，成为了社会主义者。

但是，托洛茨基和他的家人在抵达纽约后，并没有被在脖子上挂上标签，也没有被送去洗淋浴，警察也没有开始为他们编造新的美国姓氏。这个在法国和西

---

[228]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二十一章 穿越西班牙”，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班牙被视为政治危险分子的人很快就和他的家人来到了美国最大的城市，并在数小时内获得了舒适的住所和一份有趣的工作，满足了全家人的物质需求。他很快就获得了美国护照。与许多同胞不同，托洛茨基有人照顾。

能否进入美国并获得美国国籍，始终取决于该国外交官的青睐和努力。1916年3月，身为著名银行家和粮商的弗朗西斯出任美国驻俄国大使，这可能是托洛茨基能够轻而易举地进入美国并获得公民身份的原因。因此，帕尔乌斯或大卫-勃朗施坦的商业关系可能为托洛茨基加入美国籍提供了便利。

应该考虑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在俄罗斯的资本投资增加了许多倍。弗朗西斯是使俄国经济服从美国利益的广泛计划的发起人，同时也是将俄国从世界粮食市场上消除为美国竞争对手的计划的发起人。对这位杰出的俄国革命家的支持，很可能是美国统治集团为破坏俄国稳定而精心策划的多管齐下的复杂计划的一部分。

从托洛茨基的言论来看，1月初抵达的美国并没有让他失望。他在回忆录中描述自己“发现美国”时写道：

> “就这样，我来到了纽约这个既神奇又平庸的资本主义机械化都市，这里的街景充分体现了立体派的审美理念，但人们在内心深处却信奉美元至上的道德哲学。纽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最淋漓尽致地体现了现代化的精神”。[229]

他被美国人的舒适生活深深吸引：

> “我们在工人区租了一套房子，并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了一些家具。房子每月的租金是18美元，但它的设施的便利舒适是欧洲人闻所未闻的：电气、煤气灶、洗澡间、电话、送食物的自动升降机和倒垃圾的垃圾道，所有这一切使我的两个孩子立刻就喜欢上了纽约。有一段时间，电话简直成了他们生活的中心。这种不可思议的东西是我们无论在维也纳还是在巴黎都不曾有过的”。[230]

托洛茨基的孩子们跟随父亲周游世界，很快就适应了新环境。托洛茨基注意到，他的孩子们学习外语的速度非常快。在维也纳，他们掌握了维也纳普通人的语言。在苏黎世，他们必须适应当地的方言，这与维也纳的德语非常不同。托洛茨基回忆道：

> “在巴黎，孩子们又一下子改用了法语，在短短几个月内他们就完全掌握了这门语言……他们在西班牙本土和西班牙客轮上总共呆了不到一个月，但这已足以让他们掌握最基本的词汇和表达方式。最后在纽约，他们在美国学校读书的两个月的时间内又基本上掌握了英语……外语从他们的记忆中消失的速度比学习时还要快。但他们说俄语就像外国人一样。我们常常惊奇地发现，他们的俄语句子结构完全是从法语翻译过来的，但他们已经不能用法语来组合这个句子了。我们漂泊不定的国外流亡生活，就像是在可以擦掉字迹的羊皮纸一样留在了孩子们的脑海里”。[231]

托洛茨基注意到了孩子们在思想和言语上的这些变化，却没有注意到他自己在旅行过程中的变化。在成为“世界公民”之后，他和他的孩子们一样，习惯于迅速适应新的环境，每一次变化都会在他的思维和习惯中留下印记。虽然与孩子们不同，他不能那么快地学习新的语言，但他掌握了在新环境中所需的基本行为

---

[229]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二十二章 在纽约”，2005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230]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二十二章 在纽约”，2005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231]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二十二章 在纽约”，2005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方式。在维也纳，他的孩子们正在学习如何成为正统的路德教徒，他则撰写了关于俄罗斯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将自己视为哈布斯堡祖国首都的永久居民。托洛茨基对他的孩子们用法语造俄语词感到啼笑皆非，却没有注意到他的思维结构早已变得陌生，他的思想是一套翻译成俄语的外国人的思想。现在，一到美国，他就像他的孩子们一样，很快忘记了自己新学到的西欧人的行为方式，并乐于采用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托洛茨基在回忆他在美国的短暂生活时说：

> “在那里，我写文章、编辑报纸、在工人集会上发表演说。我整日忙得不可开交，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身处异国他乡。我在纽约的一家图书馆里勤奋地研究美国的经济生活。在战争期间美国出口额的增长令我震惊，这对我来讲可真是一个发现。这些数字不仅早就决定美国会不可避免地介入战争，还决定了战后美国在世界上的决定性作用。那时我曾就这个题目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并做了几次报告。从那时候起，“美国与欧洲”这一课题就成了我的重点关注问题之一.....如果我们想展望人类的未来的话，就没有比这个题目更为重要的了”。[232]

托洛茨基在抵达纽约后不久的一次集会上表达了他对美国即将成为世界霸权的看法：

> “目前，最具有现实意义的经济事实是：当欧洲的经济基础开始崩溃的时候，美国却富强起来了。我仍然以自己是一个欧洲人的角度羡慕而不无嫉妒地看着纽约，忧心忡忡地自问，欧洲能从这场战争中坚持下来吗？它不会变成一片墓地吗？今后世界的经济和文化重心不会移到美国来吧？”[233]

托洛茨基没有说他自己从这些推论中得出了什么结论，但一个在思想上已经成为新世界永久居民的人可以这样说。

起初，托洛茨基开始与俄罗斯政治移民日报《新世界报》合作，该报由布哈林领导，布哈林自 1916 年 10 月初就来到了美国。虽然布哈林是布尔什维克，但他并不反对托洛茨基加入该报编辑部。斯蒂芬-科恩认为，尽管他们之间存在分歧，但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在《新世界报》建立了热烈的友谊和政治合作”。《我们的言论》的通讯员柯伦泰也在该报合作。托洛茨基后来抱怨柯伦泰，指出她在与列宁的通信中“就把美国方面的消息，其中也包括有关我的活动的情况，都提供给了列宁。在列宁的回信中，可以发现对这些显然是一文不值的消息的反应”。[234]

托洛茨基很快与犹太社会主义报纸《前进报》（英文名为“每日前进报”）建立了联系。该报的读者和订户包括许多来自俄国的人，他们和多克托罗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没有在美国找到“应许之地”。该报采取亲德和反工会的立场。

托洛茨基的接触可能并不局限于这些圈子，他也有机会与雅科夫-希夫的随从会面，后者一直在帮助俄国的革命力量。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托洛茨基与这些人有过会面。

1 月 16 日，《前进报》发表了对托洛茨基的采访。通讯员报道说：

> “托洛茨基同志将与我们在一起.....至少到战争结束”。

此时，很少有俄国革命者相信专制制度会迅速崩溃，列宁在 1917 年 2 月对瑞士社会主义者发表讲话时说，俄国革命最早将在 10-15 年内发生。托洛茨基很

---

[232]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二十二章 在纽约”，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233]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二十二章 在纽约”，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234]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二十二章 在纽约”，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有可能做出过这样的判断。

托洛茨基在美国停留的最初几天，就非常积极地参与了关于美国是否参加世界大战的辩论。美国对世界大战的态度问题是当时美国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和爆炸性问题。在1916年第二次总统大选中获胜的伍德罗-威尔逊在反德口号下主张“做好战争准备”。虽然向协约国出售武器帮助美国克服了1913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并从战争中获得了财富，但实行普遍征兵制以及未来在欧洲战场上不可避免的伤亡引起了美国的极大不满。

针对威尔逊的路线，社会主义民众领袖尤金-德布斯鼓吹“用内战代替国家战争”。由尤金-德布斯和海伍德创建的世界产业工人工会（IRW），其中既有社会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宣布准备在反对美国参战的斗争中采取极端措施。世界产业工人工会领导人海伍德宣称：

> “破坏活动是打击资本主义、根除其毒牙或打碎其毒牙的方法”。

此时，托洛茨基结识了世界产业工人工会的领导人。他对尤金-德布斯印象深刻，尽管托洛茨基认为这位美国社会主义领袖的马克思主义“不够深刻”。在组织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与美国社会党、世界产业工人工会和其他左翼组织之间的联系方面，《新世界报》编辑部成员沃洛达尔斯基（戈尔茨坦）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虽然是伏尔加人，但于1913年移民美国，自称“出身和生活方式都是美国工人”。沃洛达尔斯基是美国社会党和世界产业工人工会的成员。如果托洛茨基更早到达美国，他也有可能宣称自己是一名“美国人”，因为当时他已经在政治或工会组织中担任了一些高级职务。

托洛茨基在纽约、费城和其他城市向来自俄国的人们发表演讲，变得尤为活跃。托洛茨基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前进报》的工作。他回忆说：

> “我们逐渐渗透到强大的犹太人联合会及其14层的大厦之中，从这里每天要发出20万份《前进报》”。[235]

托洛茨基在这份报纸上发表的四篇文章充满了对异教徒的尖锐抨击，与国际犹太人运动发起的反战运动的精神一脉相承。托洛茨基反对“被称为祖国的资本主义上帝”，认为美国无产阶级必须在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之间做出选择：

> “必须有意识地从这两个方向中选择一个，这两个方向对美国人来说是不相容的，尤其是对那些尚未做出选择的犹太裔美国工人来说”。

托洛茨基计划中的第五篇文章没有发表，因为该报支持美国国务院揭露的德国发动新的美墨战争的阴谋。

> “在这篇声明发表几小时后，托洛茨基突然闯入《前进报》编辑阿-卡根的办公室，他们两个社会主义者之间发生了尖锐的意见交锋。结果，托洛茨基与这家犹太工人运动的机关报及其编辑断绝了一切关系”。

不管托洛茨基愿不愿意，他的行为客观上与德国的利益不谋而合，就像在法国一样，他引起了美国当局的怀疑，认为他是该国的代理人。

就在此时，德国情报部门正在努力破坏军事供应，阻止美国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德国特工在运往欧洲的武器仓库和货轮上组织破坏和爆炸活动。与此同时，德国情报人员弗朗茨-冯-林特莱和为希特勒扫清道路的未来帝国总理、武官冯-帕本资助成立了“工人全国和平委员会”，用于反战宣传。与此同时，工会领导人和政治家们并不知道是谁在资助这个委员会及其许多反战活动。冯-林特莱的工作开展得如此优雅，以至于当他坐在“工人全国和平委员会”组织的一次集会上，聆听美国国会议员、前美国驻西班牙大使和工会领袖的演讲时，他后来可以

[235]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二十二章 在纽约”，2005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写道：

“没有一个演讲者有丝毫怀疑他们是在为坐在听众中间的一位德国军官‘服务’”。

调查局（联邦调查局的前身）特工揭露工人全国和平委员会与德国的关系后，该局指责世界产业工人协会、其他工会组织、反战组织、社会主义组织和无政府主义组织为德国从事间谍活动。尽管主席团对一些工会成员有所怀疑，但它将注意力集中在前俄罗斯裔反战运动成员身上。据该局领导层称，正是这些人站在了“反美活动”的最前沿。后来，在美国海军副部长罗斯福和亿万富翁摩根家中发生恐怖爆炸事件后，俄罗斯工人联合会的 250 名人士于 1919 年 12 月 21 日被一艘专船驱逐到苏维埃俄国。该局领导人埃德加-胡佛等人声称，自 1916 年以来，“社会主义宣传联盟”就一直在准备通过从俄国移民推翻美国的国家制度。如果托洛茨基、布哈林、沃洛达尔斯基、柯伦泰和《新世界报》编辑部的其他成员继续留在美国，他们的名字可能会与被指控从事有利于德国的活动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领导人、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名字一起被提及。他们有可能与 1919 年 12 月被驱逐出美国的 250 人在一起。

但这并没有发生，因为他们在美国的短暂停留突然被俄国发生的事件打断了。1917 年 3 月初，有关彼得格勒“粮食暴动”的报道传到了美国。3 月 13 日（俄历 2 月 28 日），托洛茨基在《新世界报》上写道：

“我们见证了俄国第二次革命的开始。希望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能成为革命的参与者”。

同 1905 年一样，托洛茨基再一次没有见证革命的开始。1905 年血腥事件周年纪念日的罢工揭开了圣彼得堡示威游行的序幕，最终推翻了君主制。后来，托洛茨基在他的历史研究中将 1917 年二月革命的进程与他 1904 年的“行动计划”进行了比较。二月事件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对抗武装秩序力量的模式。1917 年与 1905 年不同，哥萨克人没有表现出与示威者战斗的热情。12 年间，治安部队的行为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有道理的。

引发 1905-1907 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的深刻社会矛盾，无论是在革命被镇压期间，还是在沙皇政府进行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改革之后，都没有得到解决。斯托雷平改革被认为是克服农村最尖锐矛盾的一种方式，但却走入了死胡同。自由资产阶级利用 1905 年后的自由，不断通过报刊和国家杜马对沙皇制度进行积极的政治宣传。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数百万装备简陋的士兵在战场上的死亡、动员数百万农民参军造成的经济困难、后方的投机和物价上涨、权力高层的腐败，尤其是在“拉斯普京事件”中的表现，都成为诋毁沙皇政权的沃土。各阶层民众，包括那些本应成为制度支柱的人，对国家最高层人物腐化、贪污和叛国的指控义愤填膺。要求沙皇下台的呼声得到了所有前线指挥官的支持。

俄国君主制被推翻震动了整个国家。这些事件的目击者皮季里姆-索罗金写道：

“举国欢腾……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人们像庆祝复活节一样庆祝”。

著名政治人物维纳维拉的妻子罗莎-格奥尔吉耶夫娜回忆说：

“这一事件与犹太人庆祝逾越节的时间相吻合。似乎出现了第二次出埃及”。

格鲁岑贝格律师在他的公开演讲中说：

“如果说革命前的俄罗斯国家是一个畸形的巨大监狱.....那么最恶臭、最残酷的牢房，即牢房监狱就是为我们六百万犹太人准备的……就像路

上的囚犯一样，所有犹太人都被一条共同的蔑视异化链条捆绑在一起……我们的父辈和母辈、我们的兄弟姐妹的血溅落在我们的灵魂上，点燃并煽起了永不熄灭的革命火焰”。

那些像托洛茨基一样认为被废黜的专制者亲自组织了大屠杀并对人数不多感到遗憾的人，在那些日子里不仅感到高兴，而且热切渴望对尼古拉二世进行残酷的报复。根据诗人伊-乌特金的说法，基希讷乌大屠杀的受害者是这样回应沙皇被推翻的消息的：

这是一个崭新的一天，
这是一个年轻如黎明的一天！
破天荒的，在基希讷乌
国王不再颂歌，
沙皇不再祷祝。
在沉睡的寂静中
在吝啬的死灭里
血海里的狗吠叫着，
塔赫里希姆[236]紧缝着，
呜呼哀哉，尼古拉，伏惟尚飨！

托洛茨基与之合作的《前进报》对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表示欢迎，该报写道：

“犹太人的悲痛结束了，所有被压迫民族都获得了充分的权利，俄国迎来了新的光明”。

雅各布-希夫也欣喜地欢迎革命。他说：

“我一直是俄国专制制度的敌人，它无情地迫害我的同宗教信徒。现在，请允许我向.....俄罗斯人民致以问候，他们已经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伟大事业”。

1917 年 3 月 9 日，在伦敦参加爱德华七世葬礼的君主们举行了庄严的仪式，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家人被软禁在皇村。

在罗曼诺夫王朝退出历史舞台的日子里，那些准备好领导国家的人纷纷赶往彼得格勒。3 月初，弗斯滕贝格向列宁提出，让他在帕尔乌斯的帮助下通过德国。列宁在回信中讲述了他试图通过法国和英国前往俄国时遇到的困难。同时，列宁坚决拒绝了弗斯滕贝格的提议：

“我衷心感谢你的关心和帮助。当然，我不能利用那些可以接触到‘钟声’出版商（即帕尔乌斯——作者注）的人的服务。我今天已经给您发过电报，我离开这里的唯一希望就是用瑞士移民交换被关押的德国人”。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瑞士国会议员格里姆和当时的瑞士社会党书记弗里茨-普拉滕就俄国移民离开瑞士的问题进行了谈判。根据协议，1917 年 3 月 27 日（4 月 9 日）列宁、克鲁普斯卡娅和其他 32 名移民离开了瑞士，其中包括 19 名布尔什维克和 6 名崩得分子。3 月底，尼-布哈林乘汽船横渡太平洋前往俄国。

托洛茨基也要去俄国。他对美国一见钟情，并在不久后向欧洲发出了最后的诅咒。托洛茨基为什么突然希望回到他认为是野蛮和野蛮缩影的俄国呢？

他可能决定暂时推迟在美国定居的计划。他从未放弃的不断革命理论的基础是，俄国可能成为世界巨大动荡的发射台。他意识到，他的政治经验和他所获得的国际关系将使他能够在这些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托洛茨基可能没有独立做出决定，而只是听从他所依赖的人的命令。

---

236 塔赫里希姆，希伯来语，是一块裹尸布——编者

尽管托洛茨基抱怨俄罗斯驻纽约总领事馆办事拖延，但他还是在几天内拿到了入境签证。根据弗罗亚诺夫引述的《华尔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一书作者萨顿的说法，托洛茨基“带着 1 万美元（据称来自德国）.....和一本美国护照从美国前往俄国，这本护照是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亲自指示发给他的”。3 月 13 日（26 日），托洛茨基在离开纽约前在一次美国社会主义者集会上发表讲话，对资本主义发出了一个革命者惯常的职责诅咒。

> “我希望你们越来越加强你们的组织——最终推翻你们那该死的腐朽的资本主义政府”。

第二天，他带着家人和一群移民，乘坐挪威蒸汽轮船克里斯蒂安娜福特号离开了纽约。后来他写道：

> “当我离开美国去往欧洲的时候，我感到我只是匆匆扫了一眼这个将锻造人类命运的熔炉。我总以什么时候还有机会再回这里来安慰自己，直到今天我也没有放弃这个希望”。[237]

与此同时，这位“世界公民”再次前往“那边”，俄罗斯。

[237]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二十二章 在纽约”，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 第 十 二 章

# 蜕变于巨变之年

与 1905 年的革命不同，托洛茨基不仅迟迟没有发动革命，而且也没有赢得革命。托洛茨基到达俄国时，临时政府已经成立，几乎所有俄国城市都效仿俄国第一次革命成立了苏维埃。虽然临时政府中有不同党派的代表，但这个政府立即与苏维埃对立起来，临时政府和最强大的苏维埃——彼得格勒苏维埃中的所有重要职位都由同一个秘密共济会组织的成员担任。在临时政府的 11 名成员中，有 9 人（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除外）是共济会会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所有成员（克伦斯基、斯科别列夫、齐赫泽）以及苏维埃秘书处四名成员中的两名也是共济会员。这并不奇怪，因为根据大量的历史研究和回忆录，包括克伦斯基自己的回忆录，二月革命的主要组织者是俄国共济会组织的阴谋。因此，托洛茨基还在敖德萨监狱学习共济会的历史和实践时就坚信，这个秘密组织是历史进程中“那股鲜活的动力之源”，二月革命的事件生动地证实了这一点。

然而，尽管托洛茨基与共济会有着广泛的联系（如乔兹），并可能是该组织的成员，尽管他与各国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有着广泛的联系，但他还是被排除在外了。他在革命政权的任何机构中都没有代表。这就是为什么他对迟迟不能返回俄国反应如此强烈的原因。

从纽约出发航行六天后，在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港停留时，他、他的家人和六名同行者被要求下船。托洛茨基拒绝了这一命令，被加拿大当局抱下了船。由于托洛茨基被怀疑与德国有秘密联系，他被送往阿默斯特的德国战俘营。这里关押的主要是被盟军击沉的军舰上的船员，以及被怀疑与德国有联系的人。集中营负责人莫里斯上校向托洛茨基解释说：

> “对现在的俄国政府来说，你们是危险分子.....你们对所有的盟国来说都是危险分子”。[238]

面对托洛茨基的抗议，这位前英布战争参与者吼道：

> “他要是在南非海岸落到我的手里……”。[239]

在纽约住过舒适的公寓后，托洛茨基被迫住进了“一座从一个德国私营业主手里没收来的、已经废弃的铸铁厂破旧厂房里。那间大房子的每一面墙边都放着两排三层床铺，我们 800 个人就住在这样的地方，因此不难想象到了晚上这件卧室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气氛”。更糟糕的是，“有五个人发疯了。我们就和这些精神失常的人吃在一起，睡在一起”。[240]

托洛茨基试图在士兵和水兵中进行政治宣传，但营地里的德国军官提出抗议，要求将他调离营地。为了赢得士兵们的好感，托洛茨基试图与他们平等地履行营地职责：扫地、削土豆皮、洗碗、整理厕所等。

托洛茨基从集中营向包括英国首相和俄国临时政府在内的所有地址发出了无数抗议电报。彼得格勒苏维埃要求释放托洛茨基。4 月间，列宁也多次表达了

---

[238]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二十三章 集中营”，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239]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二十三章 集中营”，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240]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一卷 第二十三章 集中营”，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对托洛茨基被捕的愤怒：

“英国正在逮捕蓄意的国际主义者、战争的反对者，比如托洛茨基”。

“英国人把我们的同志托洛茨基关在监狱里.....他曾在1905年担任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

托洛茨基的被捕帮助列宁解释了他选择通过德国前往俄国的正确性。他强调说，如果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取道英国，等待他们的将是“托洛茨基的命运”。

直到4月29日，托洛茨基才从阿默斯特集中营获释，并于1917年5月5日抵达彼得格勒。当时，全国各地都在推翻各级政权。据克伦斯基回忆：

“不得人心的官僚几乎全都被撤了职，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被打死或打伤。工厂里的工人停止工作，开始轰走他们不喜欢的管理人员和工程师，用手推车把他们送出大门。在某些地区，农民没有忘记1905年到1906年的做法，开始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土地问题，赶走地主，占有了他们的土地。在各个城市里，自封的‘自由卫士’开始逮捕‘反革命分子’和那些与抢劫有牵连的人。经过三年的战争，前线疲惫已极的士兵拒绝服从军官的命令，不愿和敌人继续打仗”。[241]

由于对法律的尊重程度下降，以及号召力的增强，那些有能力控制人群情绪、激动并渴望立即实现其要求的人变得更加重要。

激情因素不易控制，国家的劳动节奏被无望地打乱了。由于管理体制的崩溃和各种破坏性力量的激活，从战争初期就开始的经济困难进一步加剧。引发革命的社会危机现象在许多方面加剧了。为了稳定社会局势，必须做出紧急努力。

布尔什维克党通过进一步深化革命变革，为摆脱危机局势提供了出路。在托洛茨基返回革命俄国首都前一个月，列宁于1917年4月3日抵达。在芬兰火车站，他受到了支持者的热烈欢迎。列宁在装甲车上发表讲话，首先宣布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第二天，他概述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纲领，这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四月提纲》。

列宁宣称：

“这次战争从俄国方面来说，在李沃夫之流的新政府的条件下，无疑仍然是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因为这个政府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在我们对这次战争的态度上”。[242]

在批评了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其他布尔什维克在战争问题上的立场后，列宁宣布“决不允许对‘革命护国主义’”做出丝毫让步。

列宁提出的目标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在这一阶段，权力将落入工人代表苏维埃手中。列宁的出发点是，到目前为止，“在大多数工人代表苏维埃中我们党处于少数地位”，但他相信群众能够“纠正自己的错误”。[243]列宁的立场得到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层的支持，而布尔什维克党本身也在首都和国内其他大城市的工人中迅速赢得了声望。

尽管托洛茨基在芬兰火车站受到了乌里茨基及其他朋友的热情欢迎，但这次会面与列宁凯旋抵达彼得格勒时的情景完全不同。根据目击者的描述，托洛茨基

---

[241]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2006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二十二章 如何拯救党于危亡”校对。

[242] 列宁《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提纲”，《列宁全集》，第29卷。

[243] 列宁《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提纲”，《列宁全集》，第29卷。

发现自己已经远远落后于革命的发展，这让他非常愤怒。根据安杰利卡-巴拉巴诺娃的说法，托洛茨基指责党的领导人没有努力把他从英国的囚禁中解救出来，“因为他们不希望看到他出现在舞台上”。托洛茨基认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对他怀有恶意和不信任”，因为害怕与他竞争。“政治明星”考虑的不是国家和革命的命运，最重要的是团队没有了他，所有获胜的角色都已被抢走。多伊彻通过托洛茨基的眼睛观察政治舞台，他写道：

“1905 年，托洛茨基是第一批回国的移民。现在他是最后一个。对于他这样有才华和抱负的人来说，似乎没有合适的职位空缺”。

首先，托洛茨基开始在脑海中过目革命当局有影响力的人物（政府部长、彼得格勒苏维埃领导人）的名字，计算他们是否能赞助他。他写道：

“我对策列铁里了解得不多，对克伦斯基更是一无所知，对齐赫泽了解得多一点，斯科别列夫曾经是我的学生，与切尔诺夫曾多次在国外的报告会上进行过论战，与戈茨是第一次见面。这就是苏维埃的民主领导成员”。[244]

托洛茨基一分钟也没耽搁，就从火车站直奔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令他失望的是，与托洛茨基关系最密切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常任主席“齐赫泽冷淡地和我打招呼”。尽管如此，作为 1905 年彼得格勒苏维埃前主席的托洛茨基还是被决定加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并拥有咨询投票权。托洛茨基说：

“我得到了自己的代表证、一杯茶和一份黑面包”。[245]

托洛茨基和他的家人得以在“一个叫‘基辅公寓’的地方找了房间，安顿下来”。[246]

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首次演讲与他 1905 年在技术学院发表的激烈演讲截然不同。据这次演讲的目击者苏哈诺夫（吉梅尔）说，托洛茨基“显然很紧张，担心自己的首次亮相，并感受到.....陌生群众的目光和‘社会叛徒’的敌视”。多伊彻指出，托洛茨基在演讲一开始就小心翼翼地“歌颂革命的伟大”。这有助于他回避关键问题：苏维埃对临时政府中社会主义部长们的态度。相反，托洛茨基描绘了一幅世界末日般的战斗全景图，宣称俄国“开启了一个新纪元，一个铁与血的纪元，不再是人民与人民的斗争，而是受苦受难的被压迫阶级与统治者的斗争”。托洛茨基的这篇演说只是泛泛而谈，表明他对自己在革命中的地位和将采取的路线还不确定。

演讲二十天后，托洛茨基发表了题为《和平纲领》的小册子，其中概述了他对俄国革命面临的任务的看法。小册子重申了托洛茨基对不断革命理论的忠诚。托洛茨基重申，革命运动在欧洲某国开始后，“很明显，这次革命运动只有作为全欧洲的运动才能顺利发展和走向胜利。如果它仍然是民族范围内的孤立的运动，那么必然会遭到毁灭……拯救俄国革命的方法是把革命转到整个欧洲去.....在民族范围内观察社会革命的基础，就意味着变为构成社会爱国主义的民族狭隘性的牺牲品”。[247]

谈到欧洲革命，托洛茨基显然不认为这是世界大战的可能结果。尽管托洛茨基宣称，列宁提出的将帝国主义战争发展为内战的口号是世界冲突最有利的结局，

---

[244]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二卷 第二十四章 在彼得格勒”，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245]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二卷 第二十四章 在彼得格勒”，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246]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二卷 第二十四章 在彼得格勒”，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247] 托洛茨基《和平纲领》，“四 欧洲联邦”。

但他对这样的结局表示怀疑。他认为“最可能发生的结局是平局，它也会产生完全一样的结果：交战阵营中的一方没有取得对另一方的明显优势”。[248]托洛茨基认为，“没有兼并的和平”的口号正是与战争的这一结果相对应的。然而，托洛茨基指出，执行这一口号只会使 1914 年边界的不公正永久化。

从托洛茨基的观点来看，考虑到民族自决权而改变边界会更加公正。然而，列宁指责托洛茨基虚伪地接受这一口号并非偶然：托洛茨基在形式上承认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的重要性，但他声称存在着一种“进步”的趋势，即“最终摆脱民族限制的愚蠢”，他把民族限制比作“村庄和地区限制的愚蠢”。“世界公民”与人们维护民族文化和民族特性的需要格格不入。托洛茨基非常有保留地接受了民族自决原则：

> “民族自决权不可能从无产阶级的和平纲领中抹去，但是它不能妄求绝对的意义，相反地，对我们来说，它受到历史发展中所碰到的深刻进步趋势的限制”。[249]

托洛茨基强烈主张世界经济的国际化。托洛茨基相当含糊地解释了为什么破坏国界有助于满足人民的自决权，他只发表了一个未经证实的声明：

> “欧洲本身的国家统一是欧洲大小民族自决的前提。只有在摆脱了国家关税壁垒的民主统一的欧洲家庭里，建立在真正自决基础上的、排除了民族经济对抗的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才是可能的”。[250]

实质上，托洛茨基是在鼓吹“民族文化”自治的思想，这一思想是由奥地利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在俄国仅得到崩得的支持。斯大林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中早已谴责了这一思想，该著作得到了列宁的充分肯定。

托洛茨基认为，“无产阶级和平纲领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是“争取不割地的和平”，不是“民族自决权”，而是“没有君主制、常备军和秘密外交的欧洲联邦”。同时，托洛茨基强调，“不言而喻，欧洲联邦将仅仅成为世界经济组织的两个中枢中的一个。另一个中枢将是美洲联邦”。[251]本世纪 50-80 年代的经验证实了这一方案能够很好地满足国际资产阶级的要求，当时建立欧洲“共同市场”及其政治结构是西方主要大国政策中最重要的方向之一。 事实上，托洛茨基提出的观点后来成为了“世界新秩序”和全球化计划的基础。

托洛茨基提出了“欧洲联邦”的口号，将俄国作为欧洲一体化的战场。托洛茨基忠实于帕尔乌斯的思想，认为俄国的革命只能有助于建立一个“摆脱了国家关税壁垒的民主统一的欧洲家庭”。[252]

《和平纲领》成为以托洛茨基为首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一个特殊团体的思想和政治宣言。在托洛茨基周围，聚集着《新世界报》的积极分子，以及他在维也纳、苏黎世、巴黎和纽约的熟人：卢那察尔斯基、梁赞诺夫、马努伊尔斯基、波克罗夫斯基、越飞、乌里茨基、沃洛达尔斯基、卡拉汉、尤列涅夫。这些人领导着所谓的区际组织（“区联派”），该组织团结了约 4000 名社会民主党人。托洛茨基组织出版了区联派的报纸——《前进报》。然而，与他出版的维也纳《真理报》一样，这份报纸也是不定期出版（1917 年只出版了几个月），而且发行困难。

尽管托洛茨基抵达俄国后一开始试图在国家生活中发挥特殊作用，但革命爆

---

[248] 托洛茨基《和平纲领》，“一 什么是和平纲领”。
[249] 托洛茨基《和平纲领》，“三 民族自决权”。
[250] 托洛茨基《和平纲领》，“三 民族自决权”。
[251] 托洛茨基《和平纲领》，“二 Status quo ante bellum”、“三 民族自决权”、“四 欧洲联邦”。
[252] 托洛茨基《和平纲领》，“三 民族自决权”。

发的致命延误迫使他和区联派成员寻求与其他党派结盟。孟什维克在苏维埃中的领导地位已经根深蒂固，他们显然不愿意让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中央执行委员会中获得更多的投票权，这促使他寻求与他的政治对手布尔什维克和解。5 月 7 日，托洛茨基会见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像往常一样，他在谈话中谈到了革命力量统一行动的必要性，但 1917 年 5 月 10 日，托洛茨基在“区联”会议上发言时坚决宣布：

“我不能被称为布尔什维克.....不能要求我们承认布尔什维主义”。

列宁则从托洛茨基的立场中看到了小资产阶级典型的不稳定性。列宁在四月会议上的报告提纲中写道：

“小资产阶级的波动（托洛茨基.....拉林和宾斯托克、马尔托夫、《新生活》）”。

但布尔什维克为什么要与托洛茨基和解呢？看来，与托洛茨基多年的斗争在他和布尔什维克之间造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当布尔什维克返回祖国的问题成为一个问题时，列宁不愿与托洛茨基最亲密的朋友帕尔乌斯重修旧好。早在 1917 年 4 月，列宁就把托洛茨基视为异己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对于布尔什维克党内的许多知名人士（如斯大林）来说，托洛茨基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上不择手段的化身。

显然，随着革命的发展，布尔什维克认为革命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形势。因此，托洛茨基和他所领导的“区联派”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国际资产阶级代表中的广泛国际联系，可能会对布尔什维克党有所帮助。如果布尔什维克甚至可以就迁往俄国的问题与德国总参谋部直接达成协议，那么他们就更应该与那些与有影响力的资产阶级圈子有联系的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结成联盟。

此外，“区联派”还包括许多经验丰富的宣传家，他们对布尔什维克党很有帮助。其中包括卢那察尔斯基等出色的演说家，托洛茨基本人不仅以撰写生动的新闻报道而闻名，而且还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认为可以忽略他们与托洛茨基主义者之间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实质性分歧。显然，他们认为利用这些人作为盟友的潜力比让他们成为政敌要好得多。

1917 年 5 月 30 日（6 月 12 日），列宁写道：

“同区联派协商让托洛茨基同志参加出版通俗的机关报”。[253]

然而，面对出版印刷机关报的困难，托洛茨基一如既往地决定“不是通过写作，而是通过演说来对首都的政治生活施加影响”。他与卢那察尔斯基一起，开始向各种听众发表演讲。

那一年，集会风席卷全国。作家阿尔卡季-盖达尔在他的自传体故事《学校》中回忆起 1917 年在阿尔扎马斯举行的集会时说：

> “演讲者一个接一个地走上讲台。他们用嘶哑的声音谈论社会主义。他们还在为那些想入党和志愿上前线的人报名。有些演讲者爬上讲台，一直讲到被拉下来。新的演说者被推到了他们的位置上……个别发言者的发言被混在一起。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演讲词在我的记忆中只有一个词：‘自由.....自由.....自由.....’”

托洛茨基在回忆 1917 年时写道：

> “生活在集会的漩涡中飞速旋转。我在彼得格勒遇见的许多革命的演说家都已经嗓音沙哑，或者干脆已经讲不出话了。1905 年革命教会了我要保护嗓子，正因为如此，我才没有退下火线。在工厂、学校、剧院、马戏场甚至是街上和广场上到处都举行集会。我常常到了半夜才能拖着精疲力竭的身子

[253]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会议文献》，《列宁全集》，第 30 卷。

回家，在半睡半醒之间突然又想起反驳对手的最有力的论据。早晨 7 点，有时甚至更早，那些令人难以忍受的敲门声又会把我从睡梦中给拽起来，叫我去彼得戈夫参加集会，或者是喀琅施塔德派汽艇来接我。每一次我都觉得自己快支撑不住了，但一开始讲，就好像是有某种潜在的精神力量爆发出来，我又能讲一个小时，甚至是两个小时。而在我演讲的时候，我已经被别的工厂或区里派来的代表团团地包围了。原来，还有三五个地方的数千名工人已经等了我一个、两个、三个小时……在那个年代，被唤醒的群众是多么耐心地等待着新的言论啊”。[254]

多伊彻指出，“他最喜欢的活动领域是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从革命的最初几天起，喀琅施塔得显然就是革命激情的熔炉。在革命的最初几天，叛乱的水兵在这里屠杀了海军上将维仁和一些海军军官，只有克伦斯基的演说才能在 3 月平息喀琅施塔得水兵失控的叛乱。

现代马戏团也是托洛茨基的常设舞台，他几乎每晚都在那里为众多观众表演。他利用听众的情绪，像魔术师一样，用结构严谨、充满金属质感的语句回敬他们的恼怒、愤慨和愤怒，从而进一步激起他们的激情。在他的固定听众中，有他第一次婚姻的女儿们，她们怀着钦佩的心情聆听父亲的演讲。

托洛茨基说：

“我一般都是晚上甚至深夜在摩登马戏场发表演说。听众总是工人、士兵、劳动妇女、街上的半大孩子，全都是首都被压在社会底层的人们。马戏场内的每一块地方都站满了人，他们紧紧地挤在一起。小孩子坐在父亲的肩上，婴儿躺在母亲的怀里吸着奶水。没有人抽烟。严重超载的看台每分钟都有倒塌的危险。我总是要从狭窄的人体巷道里挤到讲台上，有时甚至是被人们从头顶上抬过去。在人们欢呼的热烈气氛中，不时爆发出阵阵的喊声，这是摩登马戏场特有的热烈吼叫。在我的四周甚至头顶上方，肩肘、胸膛、头颅挤成一团。我就像是在由人体组成的温暖的缝隙里发表演讲。有时候，我做出动作稍大的手势就会碰到人，对方尽量做出善意的动作，让我不要在意，不要中断，继续讲下去。在这么热烈的群众的强力感召下，无论怎样的疲劳，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需要知道、明白并找到自己的出路。有时候，好像我的嘴唇就能感到这些融为一体的人群的渴望心情

……

摩登马戏场的情况就是这样”。[255]

整个广袤的国家和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前线都变成了这样的“马戏团”。在这些会议上，人民希望听到简单明了的话语，即如何解决社会不公和赤贫的老问题，如何公平地划分土地，如何结束血腥的战争，如何克服日益严重的经济混乱。布尔什维克及其来自区联派的新盟友宣称，解决国家紧迫问题的首要条件必须是退出世界大战。

克伦斯基在被任命为部长一周后抵达前线，他看到了布尔什维克宣传的规模。他写道：

“布尔什维克特务打着代表和政委的幌子渗透到军队中；在革命的头几个星期，这很容易做到，因为当时‘政委委任状’是在没有适当核实一个人

[254]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二卷 第二十四章 在彼得格勒”，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255]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二卷 第二十四章 在彼得格勒”，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前往前线的动机的情况下向左右每个人签发的”。

克伦斯基在解释这些“委员”的成功时说：

“布尔什维克在工人阶级和士兵中进行宣传的秘密在于，布尔什维克用简单的语言对他们进行宣传，并利用了根深蒂固的自我保护本能。布尔什维克宣传的精髓可以用列宁的话来表达：

‘我们号召你们参加社会革命。我们号召你们不是为他人而死，而是去杀死他人——在国内战线上消灭你们的阶级敌人！’”

与此同时，俄国军队也受到了德国宣传的大量影响。克伦斯基承认“列宁和德国‘和平缔造者’所追求的目标截然相反，当然也是不相容的”，但他声称“他们的手段是相同的”，并导致“摧毁俄国的战斗精神”。德国从自身利益出发，支持削弱俄国军事潜力的一切努力，这将使其能够在西线发动一场成功的战役。东线总司令巴伐利亚的利奥波德亲王在沙皇被推翻后下令停止对俄军的敌对行动。但是，从飞机上撒下来的数吨传单落在了俄国战壕上，传单上呼吁和平，要求公布揭露帝国主义战争目的的秘密协议，揭露临时政府大臣与英国和法国银行家之间的联系。德国士兵开始越过前线，与俄国士兵举行“联谊”。“联谊会”是由受过专门训练的德国军官和士兵组织的。“联谊会”呈现出流行病的特征，战壕和堑壕仍然空无一人，前线的军事秩序逐渐崩溃。克伦斯基指出：

“与此同时，德国师一个接一个地开赴西线”。

国家军事领导层为保持军队战斗力所做的一切努力都遭到了布尔什维克及其新盟友的严厉批评。在 6 月 3 日于彼得格勒召开的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认为，军队没有战斗能力，因为它没有值得捍卫的理想。只有切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俄国才能在“新的苏维埃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向欧洲各国人民发表讲话，告诉他们欧洲版图上已经出现了革命的堡垒”。

托洛茨基说得没错，1917 年的军队已不再有能力进行成功的作战行动。虽然在 6 月 18 日西南侧开始的两天攻势中，俄军士兵成功地将德军打开了第一道防线，俘虏了数千人并缴获了野战炮，但他们的进一步推进很快就陷入了停滞。布鲁西洛夫用军队士气下降来解释这次失败。同样是这些克伦斯基曾许诺过如此之多的士兵，“当他们开始行动时，先是攻占了敌人的战壕”，“然后在第二天就武断地返回了，宣称既然不能要求兼并和缴械，在胜利结束之前也不能发动战争，他们就回到了原来的阵地。然后，当敌人发起进攻时，我军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清空了阵地，并向后撤退”。

前线攻势的开始与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计划的示威游行不谋而合。虽然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占少数，但彼得格勒 50 万人的示威游行却是由布尔什维克队伍主导的。这次示威游行的组织者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其中包括斯大林。然而，与托洛茨基向彼得格勒群众发表的沸沸扬扬的演讲相比，革命党组织者的活动仍然不那么引人注目。多伊彻指出：

“革命活动家群星灿烂，这在欧洲自从丹东.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时代以来是没有过的，他们出现在前台，而斯大林仍继续在昏暗的后台干他的工作”[256]

托洛茨基的演讲夸大了他在领导革命中的作用。“区联派”散布的对托洛茨基的钦佩评价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卢那察尔斯基写道，在托洛茨基惊人成功的影响下，“许多与他关系密切的人都把他视为俄国革命真正的第一领袖”。

[256]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2006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二十一章 革命事业中的师傅”校对。

乌利茨基宣称：

“伟大的革命到来了，虽然列宁有很大的智慧，但它与托洛茨基的天才相比则相形见绌”。[257]

托洛茨基的这一形象是在他的印刷宣传领域仅限于群众小报《前进报》和他的政治基地仅限于区联派时形成的。然而，他晚上在“摩登”马戏团的露面，每天对喀琅施塔得水兵和其他听众的演讲，在革命的彼得格勒意识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多伊彻说得部分正确：

“在革命中，语言，伟大的理想主义语言，比团和师更有效，鼓舞人心的咆哮取代了尖锐的战斗。在一定程度上，它们使革命根本无需进行战斗”。

像托洛茨基这样的演说家的话语具有如此激发想象力的力量，以至于它们不仅取代了“尖锐的战斗”，而且催生了它们。彼得格勒和喀琅施塔得士兵和水兵的不断骚动使他们的不满情绪达到了沸点，从而促成了 7 月 3 日至 4 日的示威游行。

没有理由相信克伦斯基的说法，即 7 月 3-4 日彼得格勒的士兵和水兵示威是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一次失败的起义。一切都表明，示威游行的要求让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措手不及。此外，布尔什维克为控制包围塔夫里达宫（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在此开会）的示威人群付出了巨大努力。托洛茨基在街头发表了长篇演讲后，才说服来自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同胞们释放了差点成为暴徒私刑受害者的切尔诺夫部长。对示威者的驱散和枪杀、随后对《真理报》的捣毁以及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逮捕——所有这一切都不能证明布尔什维克准备了起义，而是表明事件的发展超出了他们的意愿。

另据了解，无政府主义者而非布尔什维克在士兵和水兵支持示威游行的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尽管与世界历史上许多类似事件一样，示威游行的直接发起者仍然默默无闻。示威者的目的也不明确。多伊彻指出：

“组织示威的人不知道他们是要推翻政府，还是只是为了和平而走上街头。在大多数此类情况下，群众的冲动愤怒会引发危险的政治举措，而这次举措的目的并不明确”。

在不否认布尔什维克和其他左翼分子的鼓动对于唤起士兵和水兵群众的重要性的同时，还应该注意到有证据表明，7 月 3 日至 4 日的事件是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及其盟友之外的势力煽动的。托洛茨基后来声称，七月示威游行的许多参与者都是雇佣兵。无论如何，当他发现自己被关在彼得格勒的克雷斯蒂监狱时，他认出了里面的一个“水兵”，他没有把切尔诺夫交给托洛茨基。在“克雷斯蒂”，这名“水兵”因抢劫入狱。

在布尔什维克七月失败期间，各种秘密和半秘密的右翼组织出现在公共场合，这表明七月示威可能是受反革命势力的鼓动。克伦斯基对 1917 年 5 月成立的“共和中心”活动的描述也表明了这种可能性，该中心的成员包括科尔尼洛夫将军在内的工业、金融和军事界代表。克伦斯基指出，该中心“在 7 月 4 日布尔什维克起义期间”开始活动。

克伦斯基在回忆录中引用了德军为在俄军中进行宣传而出版的《同志报》上的材料，证明 7 月 3-4 日的事件是德国为发动俄国内战而组织的。在前线时，克伦斯基从这份报纸上了解到彼得格勒的暴力示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被捕和转入地下的消息。然而，这些事件是在报纸报道几天后才发生的。克伦斯基深信德国

[257]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2006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二十一章 革命事业中的师傅”校对。

军界与布尔什维克的合作，深信列宁组织了 7 月 3-4 日的起义，却没有注意到他所引用的事实可能说明了其他问题：德国军队知道这份报纸正在准备挑衅，并希望在俄国引起流血的内部冲突，而不是特别考虑与德国“赞成民主和平缔约”的布尔什维克的命运。

支持七月事件是由企图打败布尔什维克的内部势力或希望尽早挑起自相残杀的冲突的外部势力巧妙挑起的这一事实的证据是，指责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从事有利于德国的间谍活动的运动甚嚣尘上。

关于列宁和其他经德国返回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被“德国人收买”的说法首次出现在 1917 年 4 月，列宁对此发表了愤怒的评论。5 月，布尔什维克与德国的联系问题再次被提出，原因是格里姆被驱逐出俄国，他最初参与了列宁离开瑞士的谈判。

7 月 4 日，关于左派领导人从事间谍活动的说法得到了新的佐证。两年前曾指责托洛茨基从事亲奥地利活动的阿列克辛斯基通知彼得格勒的一些报纸说，他有诋毁列宁的资料。在斯大林的要求下，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齐赫泽召见了所有报纸编辑，要求他们不要刊登阿列克辛斯基的说法。因此，这些材料最初只发表在默默无名的报纸《鲜活的话》上。

7 月 4 日晚，内政部长佩雷韦尔泽夫宣布，在布尔什维克和德国军方之间起联络作用的“秘密特工”是“布尔什维克雅科夫-弗斯滕贝格（又名加涅茨基）、帕尔乌斯（盖尔芬德博士）和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科兹洛夫斯基、苏门松夫人（加涅茨基的亲戚）”。佩雷韦尔泽夫声称科兹洛夫斯基是这笔钱的“主要收款人”。这一说法声称，约有 200 万卢布被转入科兹洛夫斯基在彼得格勒西伯利亚银行的账户。

后来，在对列宁正式提出这些指控时，列宁评论道：

> “检察官竟玩弄花样，说帕尔乌斯同加涅茨基有联系，而加涅茨基则同列宁有联系！这简直是骗子的手法，因为大家都知道，加涅茨基和帕尔乌斯之间有钱财关系，而我和加涅茨基之间却没有任何关系。
>
> 加涅茨基是一个商人，曾在帕尔乌斯那里供职，或者是同他合伙经商的。但是有许多名字见过报的俄国侨民都曾在帕尔乌斯的企业和机构里供职”。[258]

这种辩护很难说是成功的，因为列宁与加涅茨基保持着通信联系。1917 年 3 月，列宁写信给加涅茨基，表示拒绝接受帕尔乌斯公司员工帮助他离开德国。因此，在搜查列宁的公寓时，侦探们发现了加涅茨基的电报，关于他与加涅茨基没有来往的说法可能会增加怀疑。

美国历史学家亚当-乌拉姆在评论对列宁的指控时写道：

> “现在毫无疑问——从相关文件中可以看出——指控的实质是正确的，但对指控的解释却不正确。列宁收了德国人的钱，就像他在任何地方都会为革命收钱一样，包括沙皇陛下的俄国宫廷，但他不是‘德国特工’”。

众所周知，布尔什维克党不仅从党员的捐款中寻求资金。为了资助反资产阶级革命，布尔什维克党从俄国各资本家那里拿钱，一些布尔什维克组织还对银行进行了“征用”（即抢劫）。党接受外国贷款并不一定意味着它成为了某个国家政策的代理人。然而，接受这些资金可能会附带某些义务。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进行这种交易，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相信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取得胜利，因此他们内心坚信，任何利用社会主义的征服力量谋取私利的行为都是徒

[258] 列宁《答复》，“答复”，《列宁全集》，第 32 卷。

劳无益的。

托洛茨基极力为列宁辩护，将对布尔什维克间谍的指控与德雷福斯案件和贝利斯案件相提并论。托洛茨基在给司法部长扎鲁德尼的一封公开信中抗议对列宁的指控，并保证“德雷福斯案件和贝利斯案件根本无法与这种蓄意的道德谋杀相比”。然而，托洛茨基本人很快也成了类似指控的目标。米留可夫的《言论报》宣布，托洛茨基在离开纽约前收到了来自德裔美国人的 1 万美元。其他报纸则断言这是德国总参谋部的钱。

与列宁不同的是，托洛茨基选择了讽刺而非愤怒的方式来为自己辩解。他说，显然，德裔美国人或德国总参谋部认为，如果他们给他这么一点钱，推翻制度就是一件非常便宜的事。托洛茨基没有否认他从美国人（包括德裔美国人）那里收过钱，但他说，有人为他和其他移民筹到了 310 美元，其中 100 美元是德裔美国人给的。这个解释似乎很有说服力，尤其是在检察官拿不出任何真凭实据的情况下。

然而，要驳回所有指控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检察官办公室接手此案之后。由于担心随时会被捕，列宁决定躲藏起来。托洛茨基反对这样做。根据多伊彻的说法：

> “他认为列宁没有什么可隐瞒的，相反，把他的观点公之于众是很重要的。这样他才能更好地为事业服务，而不是逃避，逃避只会加深不利的印象。加米涅夫支持托洛茨基，决定接受监禁”。

起初，列宁也倾向于接受审判，甚至为此写信给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然而，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斯塔索娃和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其他一些成员强烈反对，这最终改变了列宁的立场。在做出转入地下的决定时，列宁意识到，如果不这样做，不仅会危及他个人，还会使党的领导瘫痪，从而危及整个党的活动。列宁也可能意识到，布尔什维克和德国在追求迅速和平方面的目标客观上是一致的，而且在前线士兵中进行鼓动的方法也很相似，因此即使没有证据，对布尔什维克党与德国总参谋部合作的指控也会令人信服。此外，他也无法确定 1915 年他与帕尔乌斯的谈判或与加涅茨基的接触有哪些真实或捏造的文件被公开。

7 月 9 日（22 日）至 10 日（23 日）夜间，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被送往拉兹利夫车站布尔什维克工人叶梅利亚诺夫。几小时后，7 月 10 日（23 日），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加米涅夫和其他一些人被捕并被送往“克列斯蒂”。托洛茨基注意到，二月革命后，监狱的条件急剧恶化。牢房里人满为患。政治犯与抢劫前者的罪犯关在一起。唯一能缓解这种状况的是，他的邻居有加米涅夫、克里连科、季边科、安东诺夫-奥夫先科、拉斯科利尼科夫。

在监狱围墙外，一场反对二月后政权的运动正在发展。7 月初，工业巨头杰尼索夫、普季洛夫和金融家利普斯基举行会议，决定拨款 50 万卢布用于军事政变行动。密谋者与科尔尼洛夫将军保持联系。

7 月 18 日，科尔尼洛夫被任命为国家最高统帅。1917 年 8 月国家会议期间，科尔尼洛夫在莫斯科的热情会见表明，反革命势力正在最高统帅周围整合。叛变的借口是布尔什维克起义的消息，阴谋家们预计起义会在 9 月初发生。

8 月 21 日里加的投降为科尔尼洛夫的干预拉开了序幕。科尔尼洛夫用前线的衰败和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发动战争来解释里加的投降。前临时政府成员也加入了这一阴谋。社会革命党报《演讲报》于 8 月 30 日发表了一篇由米留可夫撰写的社论，提前对科尔尼洛夫将军的胜利表示欢迎。这篇文章在最后一刻被删掉了，报纸在付印时用的是白话文。8 月 28 日科尔尼洛夫发表演说期间，法国、

英国和意大利大使向临时政府发出普通照会，照会显示，如果不采取措施加强军队和后方的纪律，盟国威胁将停止向俄国提供军事援助。三国的照会满足了科尔尼洛夫的要求。美国大使弗朗西斯也积极支持科尔尼洛夫的阴谋。8 月 28 日，在前线的英国坦克师接到了科尔尼洛夫向彼得格勒进军的命令。

克雷莫夫将军的哥萨克部队拒绝向彼得格勒进军，使阴谋家的计划落空。尽管将军们的阴谋遭到了失败，但在社会革命党和西方三国的支持下，他们的阴谋严重削弱了临时政府的地位。正如七月事件以可能的“布尔什维克起义”为借口帮助巩固了反革命势力一样，科尔尼洛夫兵变也帮助动员了左翼势力。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赤卫队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成立。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在苏维埃中与布尔什维克联合，这有助于左翼力量在这些平行权力机构中赢得多数。

国家的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古老秩序、权威和传统的崩溃，世世代代奉为神圣的东西遭到亵渎，禁令的取消不是导致了创造力的解放，而是通过自由和摆脱旧世界枷锁的口号，为与荣誉、劳动和创造力格格不入的自私自利和消费主义愿望辩护。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刚刚抵达彼得格勒，二月革命就加速了物价上涨和投机猖獗，引发了违法乱纪和集会，使激动人心的集会成为政府的主要机构，而容易歇斯底里蛊惑人心的克伦斯基则成为俄国的主要政治人物。

自 1917 年 3 月起，政治禁令和社会壁垒的消除使社会瓦解的进程达到了最广泛的程度，但除了临时政府的大量法令之外，并没有伴随着创造性的工作。 会议民主无法取代被革命摧毁的秩序，而这些秩序迄今为止一直确保着国家的生存。取而代之的是对法律和犯罪世界的风俗习惯一无所知的警察。工人们在工厂大门外赶走了严厉但能干的工头，建立起了人道、诚实但经济上低效、无助的“工人控制”。对地主庄园的洗劫只会导致农业生产的下降。

二月沙皇政权的破产和八月科尔尼洛夫兵变的失败表明，要恢复稳固的右翼政权并非易事。这种权力的前提是保持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特权阶级的地位不变。工厂主、地主、将军和军官受制于过去的经验，无法在陌生的环境中行动。他们中的一些人试图恢复旧秩序，这不仅暴露了他们没有能力在国内进行紧急变革，也暴露了他们没有能力找到摆脱灾难性战争的出路，同时还暴露了他们倾向于采取挑衅和骚乱的手段，即加剧社会解体和士气低落的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国家的人可以不受关于领导方法的旧观念的束缚，因为他们从未领导过国家、城市或企业。权力的瘫痪让那些几十年来一直相信原有秩序必然崩溃、相信社会组织会另辟蹊径的人上台执政。

列宁说：“有这样的党——布尔什维克党”，这句话是他在回答策列铁里关于俄国没有一个党愿意为国家命运承担责任的说法时说的，这句话引起了 6 月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们的怀疑和嘲笑。尽管 7 月遭到了失败，但 1917 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 3 日在地下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确认了党员们准备取得新的革命胜利的决心。斯大林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他宣称：

> “既然革命力量正在发展，爆发就必然会到来，终究会有一天，工人把贫苦农民阶层发动起来并把他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高举起工人革命的旗帜，开辟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纪元”。[259]

在这次大会上，斯大林首次提出，俄国可以在世界上率先发起社会主义改造。他说：

---

[259] 斯大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三 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斯大林全集》，第 3 卷。

“如果要求俄国在欧洲没有‘开始’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前‘暂缓’实行社会主义改造,那就是可耻的迂腐之见了。哪个国家有更多的可能，哪个国家就先‘开始’”。[260]

此时，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已决定在组织上与布尔什维克联合。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区联派的成员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托洛茨基和乌里茨基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越飞成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他们加入了一个准备发动新的革命政变的政党。

1917 年秋，列宁满怀信心地挑起了治理国家的重担。列宁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提出了通过实行纪律和秩序使国家摆脱毁灭的方案。列宁宣称：

“监督，监察，计算，——这就是消除灾难和战胜饥荒的首要办法”。[261]

布尔什维克不仅表达了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意愿，而且也有了真正的机会。与 1905 年不同的是，布尔什维克处于合法地位，他们的代表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和莫斯科苏维埃以及国内其他苏维埃中占据着有影响力的位置。在 1917 年的几个月里，布尔什维克能够进行积极的口头和印刷宣传。到 1917 年 7 月初，布尔什维克出版了 50 多份报纸和杂志，日发行量超过 50 万份。

与 1905 年相比，党的武装力量也有所增强。布尔什维克当时只能依靠用克拉辛实验室的炸弹武装起来的民兵和义勇军。现在，他们拥有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大部分人员、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以及前线的大批部队。现在，无论是在二月被扫荡一空的警察和宪兵，还是在科尔尼洛夫兵变失败后士气低落的临时政府领导层，都无法抵抗他们。

党在 1905 年 4 月采取的武装起义路线在同年 12 月以失败告终。现在，武装起义的决定可能会导致胜利。1917 年 9 月 12-14 日（25-27 日），列宁致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信中保证：

“布尔什维克在两个首都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之后，可以而且应当夺取国家政权……把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以及莫斯科区域）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和推翻政府的问题提上日程”。[262]

12 年前，布尔什维克的盟友是所有社会主义党人。现在，只有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左翼派别准备支持布尔什维克。在一个自 1905 年以来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环境中，政治上的孤立可能会让布尔什维克对国家的所有问题负责，无论是 1917 年 2 月之前积累的问题还是革命最初几个月出现的问题。

后来人们才知道，右翼势力一心想阻止革命不受控制地发展，从 1917 年春天起就已经计划利用布尔什维克作为替罪羊。当时国内的政治人物都不相信布尔什维克能够保住政权，即使他们设法夺取了政权。镇压布尔什维克起义的措施将成为击败所有革命力量的方便借口。根据克伦斯基在流亡期间从法国将军佩蒂特那里得到的情报，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罗将科、米留可夫等人正准备以击败布尔什维克为借口发动政变。与此同时，右翼势力并不反对布尔什维克首先推翻克伦斯基。右翼势力坚信，在几个星期内，他们就能扫平布尔什维克政府，永远消灭布尔什维克。

---

[260] 斯大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三 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斯大林全集》，第 3 卷。

[261] 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饥荒逼近”，《列宁全集》，第 32 卷。

[262] 列宁《布尔什维克应当夺取政权》，《列宁全集》，第 32 卷。

这些政治和军事力量与以著名作家兼情报员毛姆为首的英国特务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毛姆的阴谋是利用由奥地利军队战俘在俄国组建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来消灭布尔什维克。

因此，列宁说过，武装起义是不可能拖延的。必须从字面上理解“拖延就等于死亡”。起义的拖延有可能导致右翼势力的出现，他们会以打击“布尔什维克祖国叛徒”为借口，彻底打垮党。虽然在当时历史上还没有出现反共恶棍对反对派实施血腥恐怖的例子（如后来发生在 1933 年的德国、1936-1939 年的西班牙、1965 年的印度尼西亚、1973 年的智利等），但列宁正确地指出了布尔什维克当时面临的真正选择：

“要么科尔尼洛夫专政，要么无产阶级和最贫穷的农民阶级专政”。

在危机席卷社会各个领域和毁灭性战争的背景下，实际上不可能通过民主会议来解决紧急问题。希望通过召开立宪会议来建立可持续和有效的民主体制是荒谬的。

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清楚地认识到形势的紧迫性。但许多领导人认为，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企图注定要失败，只会加速对他们和革命力量的屠杀。中央委员会成员好不容易才说服列宁放弃其计划，不等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驱散民主会议，早在 1917 年 9 月就夺取政权。

为了让他们相信发动起义的必要性，他大大夸大了此时在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发生的小规模反政府示威。

此时，托洛茨基极力支持列宁。9 月 2 日，托洛茨基被保释出狱，保释金为 3000 卢布。两天后，他参加了中央委员会会议，并在会上当选为《真理报》编委。9 月 9 日，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发表讲话，要求为自己、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其他布尔什维克平反。在同一次会议上，他提出了一项对苏维埃主席团不信任的决议，并获得通过。在克伦斯基于 9 月 14 日召开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和民主会议上，托洛茨基发表了几次引人注目的演说，这使他更受欢迎。9 月 25 日，他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这样，与 1905 年一样，托洛茨基成为了首都苏维埃的首脑。列宁对苏维埃的这一决定表示欢迎。

关于托洛茨基的立宪会议代表提名，列宁写道：

“不言而喻，在我们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工作经验很少的区联党人中，没有人会争夺托洛茨基这样的候选人地位，因为：第一，托洛茨基一到任就立即采取了国际主义者的立场；第二，他在区联党人中为合并而斗争；第三，在七月的艰难日子里，他证明自己能够胜任工作，是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忠实支持者。显然，这一点在昨天被列入名单的众多党员身上是无法体现的”。

可能是看到托洛茨基对武装起义的支持，列宁把他视为盟友，因为反对他的武装起义路线的中央委员会成员越来越多，其中包括自他流亡时代以来最亲近的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10 月 10 日，列宁在地下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谴责党的领导”对叛乱问题漠不关心”，并认为“时机似乎已经大大错过了”。列宁保证说，“现在大多数人都支持我们”，“政权交接的政治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并认为“有必要谈谈起义的技术问题”。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列宁。他们在给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其他党委员会的信中对列宁路线的正确性表示怀疑。他们嘲弄列宁的论点，写道：

“据说，一、俄国人民的大多数支持我们；二、国际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支持我们。可惜的是这两种说法都不对，整个问题就在于此”。[263]

[263]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2006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二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提议放弃起义，等待立宪会议选举的结果。

然而，这封信是在中央委员会以 10 票对 2 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多数通过了列宁的决议之后发出的：

> “因此中央委员会认为，武装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业已完全成熟。中央委员会建议各级党组织以此为指针，并从这一观点出发讨论和解决一切实际问题（北方区域苏维埃代表大会、军队撤出彼得格勒、莫斯科人和明斯克人发起行动，等等）”。[264]

在 10 月 10 日的同一次会议上，还决定成立一个政治局，其成员包括：列宁、布勃诺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索科尔尼科夫、斯大林、托洛茨基。

苏维埃决定用需要采取防御措施以击退右翼反革命分子可能发动的新起义的声明来掩盖起义的准备工作。在此借口下，托洛茨基于 10 月 12 日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提议成立军事革命委员会（VRK）。10 月 16 日，苏维埃全会批准了这一提议。由于该委员会是作为彼得格勒革命政权击退反革命的机关而非布尔什维克起义的机关成立的，因此除布尔什维克外，它还由其他党派的代表组成。三名布尔什维克（波德沃斯基、安东诺夫-奥夫先科、萨多夫斯基）和两名孟什维克（拉齐米尔和苏汉诺夫）成为了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帕维尔-拉齐米尔当选为主席。

为了确保布尔什维克对军事革命委员会活动的可靠控制，10 月 16 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选出了一个军事革命中心，其中包括新成立的政治局的一些成员和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其他成员：布勃诺夫、捷尔任斯基、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乌里茨基。该中心成为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的一部分。此外，托洛茨基和其他几十名布尔什维克也加入了军事革命委员会。

首都的党组织对其党员进行了军事训练，这些党员加入了在军事革命委员会主持下成立的赤卫队。每个分队都配备了指挥官、射击场、训练用步枪和手榴弹。与此同时，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 15 万士兵中，军事革命委员会赤卫队也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波罗的海舰队的数万名水兵随时准备按照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命令行动。早在 9 月，由布尔什维克水兵迪本科领导的水兵选举机构水兵委员会就宣布“不执行临时政府的命令，不承认其权威”。

在 10 月 16 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列宁再次发表讲话，证明了革命起义的必要性。然而，一些与会者（博基、沃洛达尔斯基、米柳亭）在发言中谈到群众对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无动于衷，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再次反对起义。会议以 19 票对 2 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4 票弃权的多数票通过了《关于全面地和加紧地准备武装起义的决议》。

同日，10 月 16 日，首都卫戍部队各团宣布不服从克伦斯基的命令，不离开彼得格勒。同一天，根据托洛茨基的命令，向赤卫队分发了五千支步枪。两天后，即 10 月 18 日，托洛茨基在议会中被问及关于布尔什维克准备起义并向赤卫队分发武器的谣言。托洛茨基的回答是：

> “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决定已经公布……革命议会不可能做出工人们不知道的决定……我们没有隐瞒任何事情。我以苏维埃的名义宣布，我们没有作出任何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

纯粹从形式上看，托洛茨基是对的：彼得格勒苏维埃确实没有做出这样的决

---

十二章 如何拯救党于危亡”校对。

[264]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 1917 年 10 月 10 日（23 日）会议文献》，“2 决议”，《列宁全集》，第 32 卷。

定。

托洛茨基的这一声明得到了加米涅夫在讲话中的匆忙支持，加米涅夫原则上谴责了起义行动。同一天，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发表了一封信，他们在信中批评了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实际上证实了流传的关于党准备发动起义的谣言。列宁在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党员的信中严厉谴责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行为，称他们是“工贼”，把他们的信定性为“严重的叛变”，并要求把他们开除出党。

同一天，托洛茨基担心加米涅夫讲话后列宁会认为他和托洛茨基在起义问题上立场一致，急忙向列宁解释自己讲话的动机。但是，列宁不仅没有谴责托洛茨基，反而在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中为自己的讲话作了充分的辩解，并批评了加米涅夫。

> “加米涅夫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支吾搪塞的发言简直卑鄙到极点了，他说同托洛茨基意见完全一致。但是，托洛茨基除已经讲的以外，不能、没有权利、也不应当在敌人面前说得更多了”。[265]

10 月 21 日，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军团委员会通过了托洛茨基起草的一份决议。决议表达了对临时政府的不信任，并承诺“将最后一个人交由全俄代表大会.....我们坚守岗位，随时准备战斗或牺牲”。

临时政府试图通过征服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和解除赤卫队工人支队的武装来控制局势。最高统帅杜鹤宁向彼得格勒苏维埃发出电报，要求“立即停止布尔什维克的暴力行为，放弃武装夺取政权，无条件服从完全按照民主授权机关行事的临时政府”。

而托洛茨基则宣称，面对反革命势力的推进，这种要求是企图解除革命的武装。与此同时，他继续在群众大会上积极演讲，发出革命的呼吁。10 月 21 日至 22 日，在彼得格勒的工厂、工厂、兵营和机关举行了集会，布勃诺夫、沃洛达尔斯基、加里宁、柯伦泰、卢那察尔斯基等人都在会上发了言。10 月 21 日，托洛茨基在人民集会发表讲话说：

> “苏维埃政权将摧毁堑壕战。苏维埃政权将给予土地，医治内部破坏。苏维埃政权将把国家的一切分给穷人和战壕里的劳动者。你们资产阶级有两件毛皮大衣，把一件给士兵……你们有暖和的靴子吗？分一点吧。工人需要你的靴子”。

托洛茨基演讲的一位目击者写道：

> “大厅里几乎是一片欢腾。现在，群众似乎要不约而同地唱起革命的赞歌.....我们提出一项决议：为工农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大家赞成吗？成千上万的群众齐刷刷地举起了手”。
>
> “托洛茨基在会议结束时说：让你们的投票成为你们的誓言，用你们的全部力量和全部献身精神支持苏维埃，苏维埃肩负着将革命胜利进行到底，给人民以土地、面包和和平的伟大重任”。

在起义发展的这一阶段，托洛茨基的演说技巧为布尔什维克派上了用场。10 月 23 日，当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清楚地知道，除了彼得保罗要塞的卫戍部队外，彼得格勒的所有部队都支持起义时，托洛茨基前往那里，在士兵面前发表讲话，让他们宣誓效忠苏维埃。同一天，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讲话中，再次含糊地表达了自己对可能起义问题的看法：

> “我们的原则是一切权力属于苏维埃……在即将召开的全俄苏维埃代

[265] 列宁《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信》，《列宁全集》，第 32 卷。

表大会上，这一原则必须付诸实践。这是否会导致起义或其他形式的行动，与其说取决于苏维埃，不如说取决于那些违背人民的一致意愿，将政府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人……这是起义吗？我们只是有一个人民不信任、自己也不信任自己的半政府罢了”。

托洛茨基结束演讲时，约翰-里德走进了会议室。他在书中描述了托洛茨基演讲的结尾。托洛茨基说：

“然而，即使在今天，在此刻，我们都还在努力设法避免冲突……但是，如果临时政府想利用它那短促的苟延残喘的时间——二十四小时，四十八小时，或七十二小时——来进攻我们，那末我们就将给以回击，予打击者以打击，刀对刀！枪对枪！”[266]

托洛茨基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结束了演讲。托洛茨基关于布尔什维克正竭尽全力避免武装行动的讲话，有助于该党为夺取政权做准备。

直到起义开始前的最后一小时，托洛茨基还在用关于苏维埃纯粹防御性行动的声明来掩盖起义的准备工作。10 月 24 日下午，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上宣称：

“现在一切都取决于（苏维埃）代表大会。唯一的救星就是代表大会的坚定政策。作为一个独立的任务.....逮捕临时政府并不是当务之急……如果至少派出守卫冬宫的装甲车去逮捕政府，那将是一个错误.....这是防御。权力可以和平转移”。

就在托洛茨基发表这些言论的同时，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军事革命委员会并在军事革命委员会之外为起义做着最后的准备。10 月 24 日下午 1 点，克伦斯基在共和国临时委员会（筹备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宣称：

“我必须在俄罗斯共和国临时委员会面前确定彼得格勒市已知部分居民处于完全、清楚和明确的起义状态”。

克伦斯基后来回忆说：

“必须承认，布尔什维克当时的行动精力充沛，技巧也不逊色。就在起义如火如荼、‘赤卫队’遍布全城的时候，一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还不无得意地试图让‘革命民主派’的代表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整整一夜，这些工匠们都在无休止地争论各种方案，而这些方案据说是起义的和解与专政的基础。通过这种‘谈判’方式，布尔什维克赢得了大量对他们有利的时间。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战斗力量却没有及时动员起来”。

事件的目击者科列涅夫声称，10 月 24 日，彼得格勒的许多旅馆和军官宿舍都“挤满了”准备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军官。然而，军官们只是“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焦躁不安，不知道躲到哪里去。除了跳棋和左轮手枪，他们没有任何武器，他们也没有接到军队上级的命令，让他们去某个地方组织起来，他们只能像一群绵羊一样等待着……军队高层一片混乱……

……

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当然忙于‘更高层’的政治；

军区首长是谁也不知道的、神秘地躲在某个地方的波尔科夫尼科夫上将；

而前线，也就是最高统帅部，与后方毫无关系，而且离得太远，无法干涉首都的保卫工作”。

临时政府的支持者中一片混乱，布尔什维克却满怀信心地制定了实现起义的计划。10 月 24 日晚，列宁抵达彼得格勒苏维埃开会的斯莫尔尼。他立即写了一

[266] 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第三章 前夜”，1980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封信，开头写道：

“我写这封信是在 24 日晚上，情况已经万分危急。非常清楚，现在拖延起义确实等于自取灭亡。

我力劝同志们相信，现在正是千钧一发的关头，目前提上日程的问题决不是会议或代表大会（即使是苏维埃代表大会）所能解决的，而只有各族人民，只有群众，只有武装起来的群众的斗争才能解决。

……

无论如何必须在今天晚上，今天夜里逮捕政府成员，解除士官生的武装（如果他们抵抗，就击败他们），如此等等。

不能等待了！！等待会丧失一切！！”[267]

根据布尔什维克党领袖的命令，10 月 24-25 日夜，隶属于军事革命委员会的赤卫队支队和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占领了中央电报局、市邮局、波罗的海火车站和尼古拉耶夫斯基火车站以及彼得格勒市政府大楼。“曙光”（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停泊在尼古拉耶夫斯基大桥。

尽管托洛茨基和他的许多辩护者竭力制造他是起义主要领导人的印象，但这明显是夸大其词。列宁是起义的发起人，也是发动起义的党的主要政治领袖。起义的直接领导权由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组成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和革命军事中心行使。起义的组织和实施由许多经验丰富的布尔什维克来完成，他们在布尔什维克党存在的 14 年中非常了解自己的干部，知道如何领导他们。托洛茨基刚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不久，9 月初才从狱中获释，并立即忙于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事务和积极的公开露面，这使他无法在起义的组织工作中发挥领导作用。

毫无疑问，在起义前的最后几天，托洛茨基一直在了解起义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并全力以赴地处理与完成宣传支持武装起义有关的事务。显然，托洛茨基对起义前最后几天超负荷工作的描述是正确的：

“在整整一周的时间内，我几乎没有离开过斯莫尔尼宫，总是穿着衣服躺在长沙发上过夜。我只能忙里偷闲地睡一会儿，而且还常常被送信的人、侦察员、自行车队的士兵、电报员和不断的电话铃声弄醒。决战的时刻正在迫近，很清楚，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268]

关于革命力量取得成功的第一份报告让托洛茨基稍稍平静了一些。他回忆说：

“可以离开电话机了。我坐到沙发上，崩得紧紧的神经刚松弛下来，阵阵倦意就向我袭来。我对加米涅夫说：‘给我支烟吧！’那几年我还在抽烟，尽管不是经常抽。我猛吸了两口，刚刚在心里说了一句：‘这些还不够’，就失去了知觉”。[269]

虽然托洛茨基否认了这一点，但多伊彻声称，他的癫痫病发作了。

很明显，正如他从小就有的情况一样，当时他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激起了他神经系统通常的急性反应。在随后的岁月里，这些压力使托洛茨基越来越经常地出现机体的痛苦反应和难以治疗的长期疾病。

这一次，托洛茨基很快清醒过来。赤卫队和首都革命卫戍部队继续占领着城市中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目标。十月事件目击者和参与者的大量回忆录表明，布尔什维克部队之所以能轻而易举地占领首都，不仅是因为他们的组织有序，还因为政府军没有进行严重抵抗。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者索科洛夫写道：

---

[267] 列宁《给中央委员的信》，《列宁全集》，第 32 卷。

[268]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二卷 第二十七章 决战之夜”，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269]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二卷 第二十七章 决战之夜”，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许多军事专家都证实，彼得格勒守备部队的实际战斗力微不足道，一两个相当忠诚、随时准备战斗的团就足以让整个守备部队服从命令”。

然而，1917 年 10 月并没有这样的团，索科洛夫承认：

“绝大多数团和军事单位士气低落，缺乏军纪。科尔尼洛夫事件后，军官们受到士兵群众的特别怀疑，他们消极反对被推翻的临时政府、民主和立宪会议。除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外，各团的所有组织都已解体，组织新组织的条件根本不具备”。

首都居民也没有进行严重的抵抗。虽然郊区的工人支持布尔什维克，但索科洛夫说“彼得格勒的普通人”（即城市中层的代表）“强烈反对布尔什维克”，这显然是正确的。然而，这些情绪被“对临时政府的不满、对其左倾性和软弱性的不满.....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恐惧，以及最重要的、几乎上升为原则的被动性：‘他们说，我们已经厌倦了政治，让其他人去同布尔什维克战斗吧’所压倒”。“让我们看看他们是如何对付布尔什维克的”“他们说：‘我们的房子就在边缘！’”

布尔什维克的相当一部分反对者希望出现期待已久的反革命力量，既消灭布尔什维克，也消灭所有左派。当时在莫斯科的安-斯基在回忆录中保证，在他的反布尔什维克随行人员中，“几乎每个人都保持着以往的乐观态度：他们说，布尔什维克政权不会长久”。同时，布尔什维克的敌人本身也不想积极参与斗争。这些情绪决定了政府军在彼得格勒的撤退，随后克伦斯基在克拉斯诺夫哥萨克军团的帮助下进入彼得格勒的企图失败，以及首都绝大多数人对解散立宪会议的消极态度。

尽管 1917 年 10 月 25 日上午临时政府仍在冬宫办公，但军事革命委员会发表了列宁撰写的《告俄国公民书》呼吁书。呼吁书说：

“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业已转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机关，即领导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

立即提出民主的和约，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工人监督生产，成立苏维埃政府，人民为之奋斗的这一切事业都有了保证。

工人、士兵、农民的革命万岁！”[270]

10 月 25 日凌晨 2 时 35 分，彼得格勒苏维埃紧急会议在斯莫尔尼召开。列宁在会上致开幕词：

“同志们！布尔什维克始终认为必要的工农革命，已经成功了”。[271]

此时，托洛茨基已经完全恢复过来。10 月 25 日，约翰-里德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看到了精神饱满的托洛茨基，当时他宣布“临时政府已经不存在了”，“打电报给前线上的部队，宣布武装起义的胜利”。对于“你们抢先包办代替了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意志！”这句话，里德认为托洛茨基“冷冷地”宣布：

“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意志，已经由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武装起义预先表达出来了！”[272]

与对手不同，布尔什维克坚决镇压最轻微的抵抗企图。列宁以敌人的残忍为理由（“例如，在莫斯科，士官生表现出残忍、枪杀被俘士兵等情况比比皆是”），要求采取严厉的政策进行报复：

---

[270] 列宁《告俄国公民书》，《列宁全集》，第 33 卷。

[271] 列宁《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文献》，“1 关于苏维埃政权的任务的报告报道”，《列宁全集》，第 33 卷。

[272] 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第四章 临时政府的垮台”，1980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们必须使用武力，逮捕银行行长等等……在巴黎，他们上了断头台，但我们只会剥夺那些手眼通天不需要从工会领取配给卡的人的配给卡。这就是我们履行职责的方式……当我们被告知没有权威时……就有必要进行逮捕，我们也会这样做。让他们给我们讲无产阶级专政的恐怖故事吧。我可以理解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恐惧‘逮捕’。让他们高喊逮捕吧。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说：‘把他们都抓起来’——这我理解；在这里，他对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有了理解”。[273]

列宁指出，起义前，一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反对起义，起义胜利后，他们以需要与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广泛联合为由，拒绝在政府中工作，托洛茨基发言支持起义，谴责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合作的做法：

“托洛茨基早就说过，统一是不可能的。托洛茨基意识到了这一点，从那时起就没有比他更好的布尔什维克了”。

列宁从托洛茨基身上看到了一个准备支持政府严厉镇压反对派的人。在十月的最初几天，托洛茨基宣称：

“小资产阶级群众正在寻找一种他们必须服从的力量。谁不了解这一点，他就不了解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更不了解国家机器”。

他要求充分使用武装暴力：

“他们说，坐在刺刀上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也不能没有刺刀。我们需要刺刀坐在这里.....武装暴力是对付我们的。我们能用什么呢？也是暴力”。

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发言时宣称：

“要求停止内战期间的镇压，就等于要求我们停止内战.....我们的敌人没有向我们提供和平”。

在此基础上，托洛茨基为严格控制报刊的行动和取缔立宪民主党的措施辩护。

在反对反革命的斗争中，托洛茨基宣称必须坚持劫持人质的原则。在俘虏了几名反革命部队的士兵后，他向彼得格勒苏维埃解释说：

“我们俘虏的是我们的人质。如果我们的敌人俘虏了我们的人，那就让他们知道，我们将用每个工人和农民交换五名军校士官生。我们知道地主和资本家是如何对待我们的起义士兵、工人和农民的，他们流了多少血，毁灭了多少生命”。

托洛茨基在这几天的讲话中不断提醒，反革命必须为革命者的牺牲付出五倍的代价。托洛茨基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讲话中呼吁无情镇压士官生的叛变，他宣称：

“当鲜血已经流淌，只有一条路可走——无情的斗争”。

尽管他继续说“我们没有处决过任何人，也不打算这样做”。托洛茨基立即宣布：

“每杀死一个革命者，我们将消灭五个反革命分子”。

几个月后，托洛茨基证明了他有能力将威胁转化为行动。托洛茨基的支持者梁赞诺夫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时，尖锐地谴责了托洛茨基在 1918 年 3 月初以彼得苏维埃主席的身份签署的命令，即枪决 6 名因号召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宣言和公告而被搜查的彼得格勒学生。梁赞诺夫说：

---

[273] 列宁《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前线代表联席会议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 33 卷。原句是：“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抓人。是的，我们是在抓人，今天我们还抓了国家银行的经理。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采取恐怖手段，但是，我们还没有采取法国革命者所采取的那种恐怖手段，把赤手空拳的人送上断头台，我希望我们将来也不采取这种恐怖手段。我希望不采取这种手段，是因为我们有力量。我们每抓一个人，就对他说，如果你具结保证今后不再暗中破坏，我们就放了你。他们都具了结”。

“那些知道以苏维埃政权的名义在做什么的人，那些被世界上最革命的政党——布尔什维克的荣光所加冕的人，那些知道两天前发生的令人发指的事情，即根据托洛茨基签署的立即处决的疯狂命令枪决了六个无辜的人的人，就会明白以无产阶级政党的名义采取的行动变成了什么”。

然而，这次发言并没有得到大会其他代表的支持。

显然，鉴于托洛茨基的冷酷行动能力，列宁让他担任新苏维埃政府的内务人民委员一职。这个职位在人民委员名单上排名第二，仅次于列宁担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托洛茨基说：

“他要求我主管内政，而与反革命做斗争是当时最重要的任务。我提出了种种理由表示反对，甚至还提到了我的民族问题。我说：‘值得因为我的犹太血统而授敌以柄吗？’列宁都有点生气了，说：‘我们进行的是一场伟大的国际主义的革命，这样的小事算得了什么？’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半开玩笑地争执了一通”。[274]

最后，托洛茨基“把斯维尔德洛夫和其他一些中央委员争取到我的一边，在这个问题上列宁成了少数派。他耸了耸肩，叹着气，责备地摇了摇头，只能以无论在哪个部门工作都要对反革命进行斗争来安慰自己”。[275]

托洛茨基正确地认识到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尽管托洛茨基是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中唯一的犹太人（1917 年 10 月 27 日的《工兵报》上公布了政府的组成），但谣传几乎整个政府都是犹太人。迪基在《俄罗斯和苏联的犹太人》一书（该书仍在不断重印）中保证，在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 22 名成员中，有 3 名俄罗斯人、1 名格鲁吉亚人、1 名亚美尼亚人和 17 名犹太人。为了证实这一信息的准确性，迪基引用了苏维埃政府成员名单，声称该名单“与 1962 年在爱尔兰出版的《俄罗斯统治者》一书中的名单进行了比较，该书获得了天主教的沃特福德和里斯莫伦斯基的主教耶利米的证实。人民委员会第一批组成人员的真实名单上注明了人民委员的国籍，但完全不能证实爱尔兰人和耶利米主教的结论：

人民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列宁（俄国）。

内务人民委员——李可夫（俄国）。

农业——米柳亭（俄国）。

军事和海军事务委员会由以下人员组成——奥夫先科（安东诺夫）、克里连科和迪本科（均为俄国）。

贸易和工业部——诺金（俄国）。

教育与公共教育——卢那察尔斯基（俄国）。

财政部——斯克沃佐夫-斯捷潘诺夫（俄国）。

外交事务人民委员部——勃朗施坦-托洛茨基（犹太）。

司法部——奥波科-洛莫夫（俄国）。

食品——西奥多罗维奇（波兰）。

邮电——阿维洛夫（俄国）。

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朱加什维利-斯大林（格鲁吉亚）。

对苏维埃政府中犹太人数量的不同估计可以解释为，耶利米和爱尔兰人名单中并不包括许多曾担任过人民委员的俄国人（斯科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奥波科夫-洛莫夫、米柳亭等人）。相反，从未担任过人民委员职务的犹太裔人士被任意引入苏维埃政府。与此同时，人民委员会组成人员中从未有过的职位也被注

[274]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二卷 第二十九章 执掌政权”，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275]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二卷 第二十九章 执掌政权”，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明。因此，在这份名单中有：

“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卢里-拉林——犹太人。

重建人民委员——什利切特——犹太人。

国家监察人民委员——兰德——犹太人。

公共工程人民委员——考夫曼——犹太人。

国家建设人民委员——施密特——犹太人。

公共供应人民委员——莉莉娜-克尼吉森——犹太人。

宗教人民委员——斯皮茨贝格——犹太人。

公共卫生人民委员——安维尔特——犹太人。

财政人民委员——古科夫斯基——犹太人。

新闻人民委员——科根-沃洛达斯基——犹太人。

选举人民委员——拉多米尔斯基-乌里茨基）——犹太人。

司法人民委员——斯坦伯格——犹太人。

应急人民委员——费尼格施泰因——犹太人。他的助手——拉维奇和扎斯拉夫斯基——犹太人”。

“人民委员——阿普费鲍姆（季诺维也夫）——犹太人”也被引入了苏维埃政府，尽管季诺维也夫从未在这个权力机关工作过，而且也没有没有职务的人民委员。

同样，迪基也在革命第一年改变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他把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减少到了 12 人（而不是 1917 年 8 月选出的 21 名委员和 8 名候选人，以及 1918 年 3 月选出的 15 名委员和 8 名候选人）。他武断地将阿尔焦姆（谢尔盖耶夫）、别尔津、布勃诺夫、捷尔任斯基、科伦泰、克里斯廷斯基、米柳亭、穆拉罗夫、诺金、李可夫、斯米尔加、斯大林、斯塔索娃等人从中央委员会中除名，却无缘无故地将卢里、沃洛达尔斯基、斯米多维奇、斯特克洛夫（纳哈姆克斯）等人纳入中央委员会。借助这种巧妙的伎俩，作者声称，在中央委员会的 12 名成员中，只有 3 人是俄罗斯人，9 人是犹太人。

然而，即使没有这些捏造，国内也有许多人相信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党是由犹太人控制的。如果连政府中出现一个犹太人都能让流言蜚语断言政府几乎完全由犹太人组成，那么很快国外就会流传出俄国完全由犹太人统治的说法，这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一保证得到了其他信息的支持。各种书籍（如大卫-杜克最近出版的《美国人眼中的犹太人问题》）引用了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罗伯特-威尔顿在 1918 年的报道，称俄国由“384 名人民委员统治。其中有 2 名黑人、13 名俄罗斯人、15 名中国人、22 名亚美尼亚人和 300 多名犹太人。自俄罗斯帝国政府垮台以来，后者中有 264 人来自美国”。卫理公会牧师西蒙斯在彼得格勒一直工作到 1919 年，他提供的苏维埃“政府机构由 16 名俄国人和 371 名犹太人组成，其中 265 人来自纽约”的信息也被反复使用。1916 年 6 月至 1918 年 9 月在彼得格勒的美国大使馆商务参赞在国会委员会作证说，布尔什维克中有三分之二是俄罗斯犹太人。1919 年 3 月 5 日的伦敦《泰晤士报》报道说，75%的布尔什维克是俄国犹太人。

事实上，布尔什维克党内的犹太人比例要低得多，不超过党员总数的 5%。犹太人在国家中央行政机构中的比例也被大大夸大了。虽然从十月革命的最初几天起，就有数百名犹太裔人担任苏维埃中央行政机构的各种职务，但在中央行政机构中担任职务的俄国人人数如此之少，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根据威尔顿、西蒙斯等人提供的信息，在 380 名最高苏维埃负责人中，有 13-16 名俄罗斯人，约

占 0.3%-0.4%。事实上，在苏维埃政府的最初组成中，俄国人占 78.5%。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 29 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中，俄罗斯人有 16 名，占 55%。除了这些政府和党的高级机构外，俄罗斯人还在新苏维埃政权的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中担任了数千个不同的职务。

关于犹太人在新的苏维埃政府中完全占据统治地位的消息是出于什么原因呢？二月革命前，犹太人在国家机器中的地位相对较低，推翻专制制度后，他们开始在各种政府机构中担任各种管理职务，因此形成了“犹太人统治”俄罗斯政府的印象。

内达瓦写道：

> “1917 年的两次革命彻底改变了俄罗斯犹太人的处境。不再有任何居住地限制或百分比标准，犹太人涌入首都和高等教育机构。为那些选择同化的人创造了条件，这也许是犹太人在欧洲定居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因此，正如《犹太百科全书》所指出的那样：

> “犹太人的政治活动急剧增加，即使在 1917 年 2 月后席卷俄罗斯的社会动荡浪潮的背景下也是如此”。

迄今为止最不关心政治的犹太人开始参与积极的公共生活。苏联诗人乌特金用善意的讽刺描述了他的诗歌主人公——基申涅夫裁缝莫特莱-布洛赫的政治化：

在难以被称为明智的日子里，
粗鄙浅薄之人裁决国家大事！
想把卷发从金色变成银色
……
不许嘲笑莫特莱肤浅幼稚
虽然鸡毛蒜皮但不是小事：
小裁缝剃光了干枯的头发，
莫特莱脱掉了陈旧的风披。
旧有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他尝到了有史以来最美味的汤！）：
“树根”一样的粗茶淡饭
也是龙肝凤髓一样的人间绝味。

1917 年期间，犹太人成为俄罗斯许多城市政府的首脑。索尔仁尼琴指出“埃泽尔-米诺.....领导莫斯科市议会，温斯坦（拉赫米尔）——在明斯克，波隆斯基——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切尔特科夫——在萨拉托夫.....施拉德成为彼得格勒市长，金兹堡-纳乌莫夫成为基辅市长”。显然，他们都是在包括俄罗斯人在内的民众的支持下当选的。

然而，随着民众对普遍危机的不满情绪迅速增长，并在整个 1917 年期间不断加深，新的革命领导层成了不满的对象。此外，1917 年与 1905 年一样，种族间关系升级。索尔仁尼琴有理由写道：

> “到二月革命时，俄国国内还没有‘民众反犹主义’，只有定居地区才有……但在二月革命后的头几个月，人民中爆发了对犹太人的恼怒情绪——并在整个俄国广泛蔓延，逐月积累……许多犹太演讲者被二月革命头几个月的自由散漫冲昏了头脑，他们没有看到，没有注意到，他们在群众集会上的频繁游走开始受到困惑和敌视”。

随着食品困难的增加，对犹太人的恼怒也在加剧。索尔仁尼奇在书中引用的 1917 年的报纸说：

“如果你.....想听听‘黑色百人团’的煽动.....去排队吧。在这些人中，你会听到：‘你在队列中根本看不到犹太人，他们不需要任何东西，他们有足够的面包’”。

而在队列的另一端，你会听到“犹太人藏匿面包的传说”。

托洛茨基在十月起义前三周发表了《大屠杀煽动》一文，[276]其中写道：

“全国各地，包括我们圣彼得堡，都在进行大屠杀煽动。在排队的人群中，在茶馆里，在电车上——到处都能听到要打犹太人、打社会主义者、打苏维埃的言论”。

托洛茨基认为，用语言来反对这种煽动是没有用的，必须同银行家和投机商进行斗争，赢得无产阶级和穷人对党的信任。

托洛茨基认为，十月革命的反资产阶级性质必然会证明，新当局站在那些“藏粮食”的犹太人一边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此外，正如索尔仁尼琴正确指出的那样：

“布尔什维主义在犹太人中并不是一股强大的潮流”。

在俄国一些有影响力的政党（主要是社会革命党）领导层中，犹太人的比例高于布尔什维克。此时，犹太复国主义政党在犹太人中最受欢迎。1918 年 11 月 2 日，外交大臣贝尔福发表声明，宣布将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民的民族圣地”，这为犹太复国主义政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索尔仁尼琴指出，在立宪会议选举中，“俄国 80%以上的犹太人投票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政党”，布尔什维主义和俄国都与这些政党格格不入。

然而，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在俄国政府官员罢工的日子里，这些与布尔什维主义思想格格不入的人中有许多人进入了新政府的公务员队伍。索尔仁尼琴引用了列宁在这一场合所说的话：

“由于战争，相当多的犹太中等知识分子在俄国城市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对革命大有裨益。他们挫败了我们在十月革命后立即遇到的、对我们极其危险的普遍破坏活动。犹太分子，尽管绝不是全部犹太分子，挫败了这一破坏活动，从而在困难时刻帮助了革命”。

索尔仁尼琴在评论列宁的这些话时不无道理地指出：

“还有一些非党员，他们根本不是革命者，他们仍然像非政治人物一样。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有一种简单的生活算计，而不是意识形态算计，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本地人以及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者迅速转变为苏维埃机器中的工人，这很可能不是这种深度的蜕变和真诚的证明，而只是外在的投机。当然，为布尔什维克服务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代表不仅仅是犹太人。俄国人和其他国籍的人在干部中即使不是占绝大多数，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列宁笔下的“官吏破坏”逐渐结束，他早在 1922 年就写道，国家机器中革命前的官吏过多，这个机器“只是被涂上了苏维埃的外漆”。

对于那些仅凭“生活算计”就去为布尔什维克服务的国家机器工作人员来说，内心对布尔什维主义许多思想的排斥与他们自身活动之间的矛盾，成为苏维埃国家和这些人的许多问题的根源。那些来自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家庭的人很难与工农出身的同事建立理解。他们与自己的群众文化格格不入，而且往往对此毫不掩饰。他们也不接受执政党的许多主张，而这些主张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所产生的。这种矛盾未来将会日益加剧，因为国家为了满足最有活力的阶层的需求，将

[276] 译者没找到中文版的翻译。——译者。

会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下，着手建立一个高度发达的政权，并忘记了世界革命的口号，将国内任务置于国际任务之上。

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被视为意外参加革命的“不可靠的同路人”而被解除了国家行政职务。还有一些人适应了陌生的社会、民族文化和政治环境，表面上热心履行国家职责，但内心却不接受国内的主流观点。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们对国家工作的形式化、无思想和无原则的态度。

最后，即使是那些真诚相信布尔什维主义思想并愿意为革命无私奉献的人，也常常从他们的朋友和亲戚那里“获得”一个并非总是赞同布尔什维克观点的同事圈子。索尔仁尼琴引用了兰道的一段话：

> “犹太人接近权力，占据了各种国家‘高地’.....在占据了顶层之后，他们又以纯粹的家庭方式把自己的亲戚、熟人、儿时的朋友和年轻时的女友拉到自己身后。利用熟人、亲属关系和人脉关系，把职位让给熟人、信任的人、赞助的人，最后又把他们靠拢起来，这种完全自然的过程使犹太人在苏维埃机构中的人数异乎寻常地成倍增加”。

索尔仁尼琴说：

> “我们不消说季诺维也夫的妻子莉莉娜有多少亲戚，更不用谈论季诺维也夫传说中慷慨地把职位分配给‘自己人’”。

托洛茨基的父亲离开敖德萨后，他的儿子给他找了一份苏维埃主席办公室干部的工作。

在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犹太人涌入苏维埃中低层行政机构的同时，不同社会出身的犹太人在高层行政机构中所占的比例也在逐步增加。犹太人在人口中所占比例约为 4%，在党员中所占比例约为 5%；在革命后的第一次党代会上，犹太人代表所占比例为 15%-18%，在中央委员会中所占比例为 24%。在 1917 年 10 月 10 日选出的政治局中，7 名成员中有 4 名犹太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索科尔尼科夫）。在 1917 年 11 月成立的由四名成员（列宁、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中，犹太人（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占了一半。

根据内达瓦的说法：

> “白卫军和哥萨克阿塔曼的口号：‘犹太人发明了共产主义’。由于托洛茨基的出现，.....以及其他二十几个聪明活跃的犹太人在新政权的领导下而显得真实……犹太人……之所以引人注目，正是因为他们以前从未接近过俄国的最高领导层……当然，托洛茨基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正如历史学家切里科娃所说，‘他比他们都要厉害’”。

内达瓦指出，在“革命运动和苏维埃政权最初几年的领导人物.....约 250 人中.....16%以上是犹太人”，他说：

> “因此，新世界建设者领导层中的犹太人数量，即使不能证实十月革命是犹太人反对俄罗斯和人类的阴谋的一部分这一观点，也许也不会与之相矛盾；由不到 4%的人口委派了 16%的领导人是值得深思的”。

然而，大量犹太人担任公职并占据苏维埃国家的一些最高职位，并不意味着俄国的所有犹太人都毫无保留地支持新政权，因为新政权本质上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关系深怀敌意。内达瓦指出，大多数犹太人“倾向于传统，包括通常的经济生活方式。这些犹太人大多数是在革命中失去一切的城市小业主……在经济崩溃的同时，新政权还摧毁了旧的文化和慈善机构，这对许多人来说既是不幸，也是野蛮。因此，犹太人对苏维埃政权持双重态度：一些人热烈欢迎，另一些人则

诅咒它”。

许多犹太人对新政府表示不满，即使新政府是由犹太人领导的。然而，他们并没有因为犹太领导人的民族身份而包容他们，而是指责他们的无能。乌特金诗歌中的主人公莫特莱-布洛赫曾是一名裁缝，当他成为人民委员后，他成为当地居民严厉批评的对象：

排队的人在叫喊着，
愤怒的人在嘲笑着：
为什么不给糖？
为什么在怠工？
忙上一个小时很难吗？
不祸害群众就会死吗？
希望列宁有这样的生活，
像我们一样的美好生活！
你站在那里干什么，莎拉？
瞎子能做什么？
作为一个裁缝？
修好他的衬衫？
他可以是一切，
但他竟然是人民委员！
排队的人在叫喊着，
愤怒的人在嘲笑着。

但是，对许多犹太人来说，反对新政府的主要理由是它是由“某个裁缝”领导的，而对许多非犹太人来说，没有糖的原因则是委员的犹太民族身份。那些反对十月革命的人认为新政权是异己的，因此，当他们看到犹太人的名字出现在新苏维埃国家的显要位置上，看到犹太人出现在布尔什维克群众集会上时，他们就会谈论苏维埃制度的“外国”特征，称其为“犹太”制度。索尔仁尼琴引用了当时一个典型的笑话：“维索茨基的茶、布罗茨基的糖、托洛茨基的权力”。因此，尽管革命具有强烈的反资产阶级性质，但十月革命领导人之一托洛茨基却被部分俄罗斯人视为两个著名的犹太资本家。

1917 年底，托洛茨基已经成为苏维埃政权的化身，这一事实生动地证明了这一年发生的变化。在发生了两场彻底改变俄国的巨大革命的一年里，托洛茨基从一个纽约人和美国公民变成了俄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更短的时间内，他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死敌（他曾与布尔什维克主义斗争了 14 年）变成了布尔什维克党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在列宁最亲密的同事（尤其是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犹豫不决的背景下，托洛茨基在谴责十月起义和镇压布尔什维克党的敌人方面表现出坚定不移的决心，这使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领导人中的重要性迅速上升到第二位。在美国，那些确保托洛茨基迅速抵达俄国的人可以感到完全满意。

这种迅速的变化有多深刻？托洛茨基早在 1917 年 5 月就表示拒绝布尔什维克主义，他转变为一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在多大程度上是真诚的呢？难道这不是像那些在 1917 年 11 月投票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政党，从而反对布尔什维克并赞成离开俄国，但随后又加入布尔什维克成为俄国公务员的人那样“生活算计”的结果吗？他新发现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难道不是他为掩盖自己与这股政治潮流之间的深刻分歧而戴上的一个方便的面具吗？

很难想象，一个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进行了 14 年激烈斗争的

人，突然在几个月内变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真诚支持者之一。同样难以想象的是，一个撰写了长达数页的文章为自己蔑视俄国的理由进行辩解的人，一个早已成为“世界公民”并梦想在美国定居的人，突然成了俄国政府的一名光荣成员，并因此成了维护政府最高利益的人。更让人难以相信的是，一个生活和创作经历仅限于新闻报道和演讲活动的人，会突然变成一个称职的政治家。

很可能，这些变化都是表面的，托洛茨基和莫特莱-布洛赫一样，只是获得了适合其新社会角色的外在特征和词汇。然而，与莫特莱-布洛赫一样，托洛茨基对政府工作的不适应很快就显现出来。

# 第 十 三 章

# 布列斯特灾难

托洛茨基保留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领导权，并成为苏维埃“内阁”和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成员，继续积极影响国家国内政策的制定。托洛茨基获得了外交委员的职位（这一提议没有遭到反对），从而可以直接参与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托洛茨基在党和政府中的领导地位使他能够更好地贯彻不断革命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俄国革命的利益与世界革命的目标相比是次要的。

在向托洛茨基提供这一职位时，列宁可能考虑到了他广泛的国际关系和未来外交委员的宣传才能。与此同时，把外交政策的领导权交给一个长期以来被列宁评价为不负责任、无原则的阴谋家，是一项冒险的尝试。由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俄国的外交政策活动掌握在一个没有外交经验、倾向于使政治活动服从于自己的野心计划、在国际舞台上无限蔑视他所代表的国家的杰出演说家和张扬的宣传家手中。这一点尤为危险，因为俄罗斯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战双方主要大国的外交政策活动，需要高度的专业精神和对国家命运负责的态度。

布尔什维克在十月取得胜利，并宣布退出战争作为其外交政策的目标，这造成了一种复杂的国际局势，在这种局势下，苏维埃政府、同盟国和协约国的目标既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又有不谋而合的利益：

1.苏俄因战争和经济封锁而衰弱，但仍在努力争取战争的胜利，同盟国希望在它们之间签署一份和平协议。对协约国来说，单独媾和意味着战争失败的威胁，实际上将苏俄变成了德国的盟友，因此也是敌人。和平谈判的破裂为恢复协约国与俄国的合作提供了机会。

2.协约国和同盟国都希望分裂俄国，削弱它的力量，使它成为二流国家。战争的结束可能导致西方国家反俄统一战线的建立。在欧洲资本主义一体化的进程中，这样一个集团本可以建立起来，而欧洲资本主义一体化是在“欧洲联邦”的口号下推进的。

3.从革命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对苏维埃政府来说，西方所有帝国主义列强都是不可调和的敌人，无产阶级的起义必须推翻他们的政权。

所有这些相互矛盾的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出来，但在十月之后的头几个月里表现得非常明显。

苏维埃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找到摆脱世界大战的出路。在 1917 年 10 月 26 日（11 月 8 日）的和平法令中，苏维埃代表大会向所有交战国提出停火。11 月 7 日（20 日），托洛茨基向与俄国结盟的列强大使正式建议立即在所有战线停战并开始和平谈判。

11 月 10 日（23 日），协约国武官无视苏维埃政府，非但没有答复，反而直接致函俄军最高统帅杜鹤宁，警告他不要让俄国违反协约国条约。托洛茨基对这种干涉国家内政的行为提出了抗议。

苏俄的建议只在德国得到了积极回应。新上任的德国总理赫特林于 11 月 14 日（27 日）同意开始和平谈判。同一天，接替被士兵撕碎的杜霍宁将军的俄国新任最高统帅克里连科准尉宣布全线停火。托洛茨基再次提议协约国参加和谈，

但这一提议也没有得到回应。

托洛茨基试图利用交战各方的对抗为苏维埃政府争取有利地位。然而，他未能利用这种对抗。相反，交战双方通过鼓励苏俄内部的离心力来削弱苏俄。这尤其表现在同盟国和协约国同时开始支持基辅拉达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

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凯南所强调的："布尔什维克一控制彼得格勒，协约国就把希望寄托在分离主义上"。1917 年 12 月 23 日，法国的克里蒙梭、皮雄和福煦，英国的米尔纳勋爵和罗伯特-塞西尔勋爵缔结了一项关于在俄国划分行动范围的秘密公约。根据该公约，英国势力范围包括高加索以及库班河和顿河沿岸的哥萨克领地，而法国势力范围则包括比萨拉比亚、乌克兰和克里米亚。

几乎与此同时，12 月 18 日，在威廉二世的主持下，德军最高统帅部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寻求将立陶宛和库尔兰并入德国，同时让爱沙尼亚和利沃尼亚从俄国分离。

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一次讲话中解释了苏俄外交在这些日子里面临的任务，他说：

> "在民众的压力下，德国和奥地利政府已经同意坐在被告席上。可以肯定的是，以俄国革命和平代表团为代表的检察官会做得很好，并将在适当的时候对所有帝国主义者的外交提出响亮的指控"。

这位"雄辩爱好者"一如既往地极大地歪曲了事实：谈判的气氛丝毫不像是革命俄国对帝国主义罪犯的公开审判。在 12 月 9 日（22 日）于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开始的和平谈判中，甚至不可能接受苏维埃关于会议应公开进行的建议。

然而，苏俄代表团试图利用和谈进行政治宣传。以托洛茨基在维也纳的老熟人越飞为首、包括加米涅夫在内的俄罗斯代表团提议使用《和平法令》的原则进行谈判，坚持反对兼并和赔款，承认人民的自决权。然而，将这两项原则（"没有兼并的和平"和"自决权"）结合起来并非易事，托洛茨基在他的小册子《和平纲领》中提请注意这一点。第一项原则要求恢复战前状态。第二个原则是改变现状。

布列斯特谈判的第三天就宣布，在德国占领者控制下成立的立陶宛最高机构（塔里巴）宣布立陶宛国家自决。"塔里巴"在"自决"之后，宣布"立陶宛与德意志帝国永恒、持久的联系"。

与此同时，德国代表团宣布乌克兰中央拉达愿意与德国签署和平条约，这意味着德国式的"自决"将扩展到前俄罗斯帝国最富庶的地区。因此，在谈判的第一周，德国及其盟国就提出了从俄罗斯分离出芬兰湾至塔甘罗格湾的领土并将其置于德奥保护之下的问题。12 月 15 日（28 日）在布列斯特举行的和平会议上交换了建议后，宣布谈判破裂。

苏俄政府不必指望公正的和平。尽管尽快在东方实现和平并将其军队转向西线对德国及其盟国有利，但和平缔结的每一天拖延都会刺激同盟国列强政府的胃口，并导致其领土要求的加强。

此外，夺取东部领土（尤其是乌克兰）的必要性是由同盟国的严峻形势决定的，它们发现自己处于协约国的封锁之下。德国正在挨饿。德国缺乏战略原材料。奥匈帝国开始发生粮食骚乱。奥斯曼帝国的物资储备正在耗尽。夺取东方丰富的粮食和原材料资源的问题正成为同盟国生存的最重要问题。

与此同时，俄国没有组织抵抗德国及其盟国扩张的实际能力。饥肠辘辘的士兵逃离前线成为灾难。12 月下旬，托洛茨基率领苏俄代表团前往布列斯特，在路上穿过前线时，他看到了废弃的战壕和空荡荡的战壕。对许多人来说，逃离前

线是一场悲剧。罗马尼亚方面军的士兵在协约国知情的情况下，按照舍巴切夫将军的命令解除了武装，“他们没有武器，没有食物，被迫在严寒中徒步进入俄国，常常是在深雪中。许多人在此过程中丧生”。从里加湾到多瑙河口的整个前线，许多其他士兵也经历了类似的磨难。

在社会日益解体的基础上，国内的反爱国情绪日益高涨。人们渴望建立任何政权，哪怕是来自外国的政权，只要国家恢复基本秩序就行。托尔斯泰注意到这种情绪在彼得格勒的增长，他写道：

> “有许多人幸灾乐祸地等待着德国人的到来。他们穿着青灰色的大衣，头戴钢盔。他们会在广场上公开鞭打某人——对俄罗斯普通人来说，和鞭打一下猪一样。仁慈的守门人会站在十字路口：‘靠右走！’。肩上挎着金色肩章的军事长官会乘车沿着一尘不染的涅夫斯基大道飞驰，面包店、香肠店和啤酒屋的窗户都会亮起来”。

抵抗德国侵略的民族力量的衰落可能会迫使苏俄政府转向协约国。然而，在外交人民委员部披露了协约国的秘密条约、暴露了战争的自私目的之后，以及在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取消外债的法令之后，西方对苏维埃俄国的敌意增加了，这尤其影响到了俄国的前盟国。

此外，向协约国发出呼吁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协约国有可能直接干涉俄国事务。早在 1917 年 12 月，驻摩尔曼斯克的英国军事使团就开始依靠地方议会的支持，为干涉北方事务做准备。以帮助打击德奥扩张为借口，协约国干涉者可以轻而易举地推翻苏维埃制度，俄国可能会被对立派别分割成不同的区域。然而，拒绝与西方合作以及与同盟国签署和平协议也可能成为协约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借口。1918 年 1 月 11 日（24 日），列宁并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

> “我们签订和约会使日本人和美国人不受拘束，他们就会立刻占领符拉迪沃斯托克”。[277]

苏维埃政权的维持和俄国的独立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断恶化的外部因素。国家的领导权是建立在德国可能继续从西面扩张、美日开始从东面干涉、国内势力有望逐步巩固以及德国和奥匈帝国有望发生革命的基础之上的。鉴于日本和美国有可能在远东发动进攻，列宁希望，“在他们只到达伊尔库茨克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能够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得到巩固了”。[278]如果不在布列斯特签署条约，就可以避免这种干涉。但如果不签署和约，德国就会重新发动进攻。

1918 年 1 月，列宁认为，如果德国和奥匈帝国在这一时期结束时爆发革命，苏维埃政权可以维持三四个月。否则，列宁认为俄国的失败和苏维埃政权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 “如果德国革命在最近三四个月内爆发并且获得胜利，那么，立刻进行革命战争的策略，也许不致于断送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
>
> 如果德国的革命在最近几个月内不会到来，那么，在继续进行战争的情况下，事件的发展必然是：最严重的失败将迫使俄国缔结更加不利的单独和约，并且缔结这个和约的将不是社会主义政府，而是某个其他的政府（诸如资产阶级拉达和切尔诺夫派[279]的联合政府，或者其他类似的政府）。因为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的农民军队受到最初的几次挫折以后，甚至过不了几个月，

[277]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讲话》，“记录 1”，《列宁全集》，第 33 卷。

[278]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讲话》，“记录 1”，《列宁全集》，第 33 卷。

[279] 即右派社会革命党，切尔诺夫的支持者。——作者注。

只要过几个星期，大概就会把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府推翻”。

任何对俄国命运负责的政府的任务都是将不可避免的干涉主义攻势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并最大限度地恢复国家的军事和经济潜力以及爱国精神。这些目标与“革命战争”支持者的纲领相悖。

后来，“革命战争”的支持者形成了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派别，他们的出发点是德日占领的必然性，以及随着民众对干涉者的愤慨日益高涨，游击运动逐渐兴起。俄国的游击战有助于耗尽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并引发那里的革命爆发，但代价是无数人的伤亡和俄国难以置信的破坏。

在 1918 年 1 月 8 日（21 日）中央委员会组织的“党的会议”上，托洛茨基面临着一个选择：革命战争还是按德奥条件媾和。他清楚地意识到“革命战争”的不可能性。加入“左派”意味着要为不可避免的失败承担责任，这是俄国历史上最不朽的失败。

托洛茨基清楚地意识到，俄国唯一真正的出路就是签订和约。然而，他可以猜到，许多政党认为战争没有其他出路，他们会在和约签署后试图指责苏维埃政府受到条约的束缚，并指责苏维埃政府领导人与德国串通一气，企图推翻苏维埃政府。托洛茨基无法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的名字将作为不平等协议名称的一部分载入史册，就像 1914 年美国强加给尼加拉瓜的《布赖恩-卡莫罗条约》或 1903 年关于巴拿马运河的《海布诺-瓦里利亚奴役条约》一样。《库尔曼-托洛茨基条约》的共同起草人失去了领导国家或世界革命的任何机会。

托洛茨基为寻求政治上的有利地位，提出了“不战不和”的口号。根据苏加的说法，他提议在俄国西部边境建立一个无限期的国家，这个国家不会得到任何国际条约（包括停战协定）的支持。与此同时，托洛茨基提议宣布俄罗斯军队复员。

托洛茨基提出了他的口号，宣称“德国士兵不会发动进攻”。然而，他的信心并不是绝对的。在 1 月 8 日（21 日）的一次会议上，他宣布：“25%的人认为德国人能够进攻”。托洛茨基相信 75%的第一种方案，他承诺在德国和奥匈帝国迅速进行革命。

第二种选择使托洛茨基想到苏维埃制度即将崩溃。托洛茨基在被任命为人民委员后不久说：

> “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外交工作呢？在这里，我将向人民发布几条革命宣言，然后关门大吉”。

如果苏维埃政权崩溃，托洛茨基等人将再次成为移民。在这种情况下，他拒绝在条约上签字，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他在 1917 年结识的美国朋友的眼中，他的声誉会大大提高，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自 1903 年以来一直与他保持着密切联系。

缺乏现实主义、能力和对国家命运不负责任的态度不仅是托洛茨基的特点。1918 年 1 月 8 日（21 日）的党内会议以多数票赞成“革命战争”（32 票），其中 16 票赞成托洛茨基的立场，15 票赞成列宁的立场。这并不妨碍列宁作为苏维埃领袖坚持缔结和平。然而，必须牢记的是，列宁的出发点是，一旦收到有关德国或奥地利革命的情报，就有可能终止布列斯特谈判。

列宁能够无视既定方针和评估，对形势变化做出迅速反应，为革命党带来最大利益，这是他作为政治领袖的最强特质之一，也是布尔什维克屡屡取得成功的保证。与此同时，列宁倾向于寻求当下能带来最大利益的解决方案，这也不止一次地导致他忽视了此类决策的长期后果。

如果不是列宁的立场允许机会主义的波动，托洛茨基很可能无法推行他的“中间”路线。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故意拖延谈判，坚持把谈判转移到斯德哥尔摩，并要求最大限度地宣传谈判，力图把会议变成他的演讲论坛。波克罗夫斯基认为，托洛茨基并不打算在布列斯特进行严肃的谈判：

“他天真地以为，只要把‘摩登马戏团’搬到布列斯特，问题就解决了。他没有注意到，只有在威廉二世的军事审查员允许印刷的情况下，他在布列斯特的演说才会传到德国工人的耳朵里”。

为了拖延谈判并利用会议进行革命宣传，托洛茨基并不认为在条约缔结之前时间对俄国不利。谈判的延长导致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参加。代表团团长戈卢博维奇宣布了中央拉达的声明，声明指出“苏维埃的权力不延伸到乌克兰”，因此代表们“将独立进行谈判”。

可以说，托洛茨基的行为并没有在彼得格勒引起谴责。在彼得格勒，随着苏维埃军队向基辅挺进，人们又一次预料到局势会迅速发生变化，这一次是在乌克兰。

1918 年 1 月 11 日（24 日）会议休会期间，中央委员会就布列斯特谈判问题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列宁再次提议采取拖延谈判的策略，得到了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全力支持。赞成号召进行革命战争的有 2 票，反对的有 12 票，弃权的有 1 票。托洛茨基的方案：“我们停止战争，我们不缔结和约，我们遣散军队”获得了 9 票赞成，7 票反对。

列宁的“千方百计拖延”政策与托洛茨基的“不战不和”公式之间的界限非常不稳固。和以前一样，以机会主义为导向为公然无视国家利益的冒险主义政策开辟了道路。后来，托洛茨基不无道理地用党的领导立场来解释他在布列斯特的行为：

“包括列宁同志在内的所有人都说：‘去要求德国人把他们的提法说清楚，把他们定罪，一有机会就中断谈判，然后回去’”。

列宁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回应托洛茨基时说：

“他引用了同我的谈话的一部分，但是，我要补充一点，当时我们之间曾经约定：德国人不下最后通牒，我们就坚持下去，等他们下了最后通牒我们再让步”。[280]

拖延政策没有奏效。虽然中央拉达被赶出了基辅，乌克兰苏维埃政府的代表也抵达了布列斯特，但列强并不承认乌克兰新代表的权威。1 月 27 日（2 月 9 日），德国和其他参加布列斯特谈判的国家与中央拉达签署了和约。作为粮食援助的交换，德国和奥匈帝国承诺向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提供军事支持。同一天，在领土问题小组委员会上，德国及其盟国向苏俄代表团提出了一些要求，这些要求源于俄国失去了对大片领土的控制这一事实。

在 2 月 10 日（1 月 28 日）的一次会议上，德国代表团团长库尔曼问托洛茨基是否愿意汇报他的想法，以帮助达成令人满意的问题解决方案。苏俄代表团军事专家福克描述了托洛茨基在库尔曼提问后的表现：

“托洛茨基站了起来，紧张地抽动着他的麦斐斯托菲尔胡须。他的眼睛里闪烁着邪恶和自我满足的光芒。驼峰鼻和向前突出的尖下巴合二为一，朝着对方咧嘴一笑。托洛茨基用响亮的金属嗓音朗读，一字一顿”。

托洛茨基向会议解释了世界大战是为了帝国主义的利益而发动的，然后他宣

[280] 列宁《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2 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的总结发言（3 月 8 日）”，《列宁全集》，第 34 卷。

布：

“我们再不愿意参加这场纯粹帝国主义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为了满足有产阶级的贪欲，公然以人类的鲜血为代价。我们对两个阵营的帝国主义采取同样的不妥协的态度，我们不再同意用我国士兵的鲜血去保卫一个帝国主义阵营的利益，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阵营。

我们把我们的军队和人民撤出战争……我们退出战争。我们把这一点通告各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我们向目前正在抗击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等国军队的我国军队发出了全面复员的命令”。[281]

托洛茨基的最后一句话表明，他有权单独宣布俄军复员。

但这只是摆脱战争方案的第一部分。托洛茨基继续说道：

“同时我们声明，德国和奥匈帝国政府向我们提出的条件是根本违背各国人民利益的.....全世界人民群众根据政治认识或道德本能拒绝接受这些条件，他们正在等待由世界各国的劳动阶级制定各国人民和平共居和友好合作的准则的那一天到来”。[282]

托洛茨基拒绝接受和平条件，他强调苏维埃政府宣布复员就等于剥夺了保卫俄国的可能性。他宣称：

“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政府想根据军事占领权统治各国土地和人民。让他们公开地去干自己的勾当吧”。[283]

对托洛茨基来说，最重要的似乎不是组织击退侵略者或限制他们的扩张，而是维护自己的良好声誉：

“我们不能以俄国革命的名义在给千百万活着的人带来压迫、痛苦和不幸的条件上签字

.....

我们不能使暴力神圣化。我们退出战争，但是我们不得不拒绝在和约上签字”。[284]

托洛茨基在结束发言时宣读了一份由代表团全体成员签署的官方声明，其中指出：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政府以人民委员会名义，谨通知同我国交战的同盟国以及中立国的政府和人民，俄国拒绝在兼并的条约上签字，单方面宣布结束同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战争状态。同时向全线俄国部队发出全面复员的命令”。[285]

福克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托洛茨基完蛋了。给人的印象就像一颗炸弹爆炸了。宣言如晴天霹雳般响起……整个会场静静地坐着，聆听着这些听起来如此荒唐的奇怪话语……有人，差不多是霍夫曼将军，在托洛茨基发言之后，低声说：‘闻所未闻’”。

---

[281] 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的声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 4 卷，1985 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282] 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的声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 4 卷，1985 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283] 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的声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 4 卷，1985 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284] 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的声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 4 卷，1985 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285] 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政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的声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 4 卷，1985 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托洛茨基的声明不仅违反了他与列宁达成的协议（“下了最后通牒我们再让步”），而且也结束了迄今为止一直奉行的拖延谈判的政策。此外，退出会议的声明意味着敌对行动的恢复，而复员宣言则告知德国和奥匈帝国政府，他们的军队在进攻俄国时不会遇到任何抵抗。

尽管托洛茨基的发言让库尔曼目瞪口呆，但他还是立即明确指出：

> “根据停战条约，尽管战争状态仍在继续，但敌对行动迄今已经停止。如果取消这个条约，敌对行动就会自动恢复。无论从事实还是从法律上讲，一方遣散其军队都不会改变目前的局势”。

库尔曼要求托洛茨基澄清俄国国家的边界在哪里，以及苏维埃政府是否准备在战争状态停止和和平到来的相应范围内恢复商业和法律关系。托洛茨基对库尔曼的询问作了含糊的回答：

> “至于形势所引起的实际困难，我无法提供解决这些困难的法律方案。不可能找到一个公式来界定俄国政府与同盟国之间的关系”。

尽管德国方面向苏维埃代表团提出了再次继续谈判的可能性，只要能够解释托洛茨基声明的含义，但后者却不愿利用这一机会，他说：

> “就我们而言，我们已经用尽了我们所拥有的和迄今为止能够从彼得格勒获得的一切权力。我们认为有必要返回彼得格勒，在那里我们将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政府一起讨论盟国代表团给我们的所有函件，并给予适当的答复”。

托洛茨基在宣布德国今后可以通过无线电与彼得格勒保持联系后，离开了会议室，并于傍晚离开了布列斯特。

波克罗夫斯基在解释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的行为时写道：

> “在这里很难找到逻辑，但很容易找到心理上的解释……在布列斯特哪怕多呆一个小时，对托洛茨基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为了避免误解：我当然不会质疑托洛茨基身体上的怯懦——因为他是一个身体勇敢的人。当然，他实际上是在拯救‘领袖’的信誉，没有他，革命可能会灭亡”。

托洛茨基没有签署“可耻的”条约，宣布遣散一支在“革命战争”中注定要失败的军队，他将自己视为革命的领袖，采取了最无懈可击的立场。甚至在许多年后，当他撰写回忆录时，他还是假设德军很有可能放弃进攻。他写道：

> “在德国和奥地利的 10 月罢工之后，对于德国政府是否会决意发动进攻的问题，所有的人，不论是我们，还是德国政府自己，都不像现在这些事后聪明佬们看得那么清楚”。[286]

托洛茨基认为，他不能在布列斯特多待哪怕一个小时，因为他的位置在彼得格勒，是革命的领导者，无论革命走向何方——是在德国或奥匈帝国的革命起义后取得胜利，还是遭到大失败，使他永远成为失去的彼得格勒公社的杰出领袖。正如多伊彻所言：

> “托洛茨基满怀信心地回到了彼得格勒，并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他孤身一人，身后除了一个处于混乱状态的国家和一个勉强建立的政权外一无所有，而就在一年前，他，一个流放到纽约的无名记者，却成功地击败了半个欧洲的外交人才”。

布列斯特谈判破裂三天后，威廉二世于 2 月 13 日主持召开了德国最高军事指挥官和政治领导人会议。为了准备这次会议，德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鲁登道夫为德皇准备了一份备忘录，他在备忘录中建议利用谈判破裂的机会解决德国的军事

[286]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二卷 第三十二章 和平”，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战略任务。一方面，鲁登道夫强调有必要将一些师从东线调往西线。同时，他坚持在俄国部署攻势。鲁登道夫认为，德奥军队的不作为可能导致丧失现有局势的优势和进一步利用这些优势的机会：

> “我们将导致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入侵乌克兰.....我们将危及与乌克兰的和约，从而危及奥匈帝国和我们自己所需的物资。因此，最后的胜利仍然是个疑问……我们将把芬兰留给布尔什维克……爱沙尼亚和利沃尼亚将被判处死刑，我们将把它们置于英国的影响之下，它们的居民甚至会被赶入英国军队”。

鲁登道夫对布尔什维克的煽动所产生的影响表示了严重的忧虑：

> “我们将导致俄国政府.....不受阻碍地煽动德国人民和军队……正如最近的打击所表明的那样，我们的边境对敌人的宣传是开放的，我们在占领区的权威受到了损害。维尔纳已经有了赤卫队的名单”。

此时，德国统治集团已经走上了推翻布尔什维克政府和支持反革命势力的道路。鲁登道夫在提出向波罗的海北部进军的计划时强调：

> “这样，我们很可能会给布尔什维克致命一击，并巩固我们国内的政治地位，使俄国最优秀阶层受益”。

与来自俄国“最优秀阶层”的前仇德分子合作是有道理的。反苏维埃主义把一些前统治集团的代表变成了德国占领俄国的支持者。根据托尔斯泰的说法，1918 年冬天在彼得格勒的公寓里，人们可以听到这样的对话：

> “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的霍夫曼将军把我们‘亲爱的同志’像小孩一样鞭打……先生们，我是爱国者，我是俄国人，该死的。但我愿意为霍夫曼将军鼓掌……毕竟，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最终，没有石蜡，没有糖，没有木头”。

在 2 月 13 日与德皇的一次会议上，战争派的论点占了上风，会议决定对俄国军队“进行短暂而有力的打击”，这将使德国和奥匈帝国能够“夺取大量军事装备”。会议决定占领乌克兰、整个波罗的海直至纳尔瓦，并向芬兰提供武装支持。由于德国报纸继续造谣说不会发动进攻，托洛茨基得以在几天内冒充英雄，通过结束战争而不是签署“可耻的”和平协定，解开了布列斯特谈判的“死结”。

根据停战条款，七天后经警告可恢复敌对行动。2 月 16 日，德国宣布终止停战，并从 2 月 18 日中午 12 点起开始军事行动。2 月 17 日晚，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少数派（列宁、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索科尔尼科夫和斯米尔加）发言“赞成立即向德国建议就签署和平协定进行新的谈判”。多数派（托洛茨基、布哈林、越飞、乌里茨基、克里斯廷斯基、洛莫夫）拒绝了这一建议，决定“等待恢复和平谈判，直到德国的攻势充分显示出来，直到它对工人运动的影响显露出来”。很明显，如果恢复谈判，德国会强加更糟糕的和平条件，但在进攻开始之前，至少有机会疏散大部分必须割让给侵略者的地区。由于中央委员会的投票，这一机会已经丧失。

2 月 18 日，德奥军队沿整个战线发起进攻。同一天，列宁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要求立即向德国发出一封电报，提出和平建议。托洛茨基关于“德国人不会进攻”的预言落空了。针对列宁的要求，托洛茨基认为：

> “现在群众才开始消化所发生的一切；现在签署和平协议只会给我们的队伍带来混乱；德国人也是如此，他们认为我们只是在等待最后通牒。他们可能指望的是心理效应”。

最后，列宁关于发电报的提议再次以 6 票对 7 票被否决。

同日傍晚，中央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托洛茨基首先报告了德军攻占德文斯克（道加夫皮尔斯）和进军乌克兰的情况。他现在提议向维也纳和柏林提出“他们的要求”，再次采用有利于德奥进攻的“拖延战术”。斯大林在回应这一提议时说：

“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出问题的实质：德国人在进攻，我们没有力量，该是直截了当地说应当恢复谈判的时候了”。[287]

列宁现在不仅主张签署和平协定，而且强烈谴责“玩弄谈判游戏”的政策、托洛茨基宣布的单方面动员以及他在和平与战争之间的中间路线。列宁宣称：

“战争是不能闹着玩的。我们的车厢不断损失，我们的交通运输每况愈下。现在不能观望，因为局势已经十分明显。人民不会理解这种做法，既然打仗，军队就不能复员；现在德国人会把一切都拿走。这种把戏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如果继续采取折中的政策，革命非失败不可”。[288]

针对列宁的讲话，托洛茨基再次提出“要求德国提出要求，并有义务在一定期限内给予答复”。他开始提醒说，政府的“谈判游戏”政策是在列宁的同意下推行的。他显然意识到“中间路线”会遭到和平支持者和战争支持者的抨击，于是开始谴责政府和他本人两个月来一直奉行的拖延谈判的政策。然而，在会议结束时，他再次提出建议：

“不是要求停战，而是询问他们的要求是什么”。

会议记录没有明确说明为什么将列宁的提议付诸表决，而不是这一动议：“我们是否应立即向德国政府提出立即缔结和平的建议？”五票反对，七票赞成，其中包括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为何撤回自己的草案而支持列宁的提案，至今仍不清楚。同样不清楚的是，为什么对立提案的两位作者，列宁和托洛茨基，受命起草向柏林和维也纳发出的呼吁书的最后文本。可能在 2 月 18 日晚间会议结束时，托洛茨基从与会者的反应中意识到，他的提案可能会被和平支持者和战争支持者的联合投票否决。在这种情况下，他显然认为没有必要坚持自己的政策，于是同意了列宁的立场。现在，在所有人看来，“中间路线”就像是向同盟国集团投降。德国的攻势和俄国新的领土损失每增加一小时，都会增加那些继续坚持“不战不和”口号的人的罪恶感。托洛茨基破坏布列斯特谈判看起来是一个公然的错误，他的傲慢导致了俄国的惨败。托洛茨基关于他在布列斯特外交胜利的说法不攻自破。波克罗夫斯基认为：

“布列斯特大灾难震耳欲聋的打击接踵而至——对托洛茨基来说，这正是一场灾难。他不能不意识到这是一场灾难——托洛茨基虽然不是天才，但也不愚蠢，——是他四分之三的轻浮造成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领导这样一个责任重大的职务，不可能再轻率地对待了”。

1918 年 2 月 21 日，同盟国向苏维埃俄国提出的条件与 2 月 10 日库尔曼提出的要求大相径庭。3 月 3 日，在这些破坏性条款的基础上签署了和平协议。俄国失去了总面积约 100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并不得不向德国支付 60 亿马克。布列斯特和约签署一年半后，在一些德国军营里可以听到关于布列斯特条约和凡尔赛条约比较分析的讲座。演讲者是一名前线士兵，他自信地证明了布列斯特和约的公正性。阿道夫-希特勒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

[287]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2006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二十三章 革命政权的负担”校对。

[288]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1”，《列宁全集》，第 33 卷。

也许，托洛茨基的朋友帕尔乌斯会感到完全满意——德国强加给苏维埃政府的条件完全符合他在1915年的计划和他为俄国崩溃所做的活动。事实上，俄国国家及其军事机器的惨败与他的观点是一致的，如果托洛茨基坚信苏维埃政权即将被推翻、反革命取得胜利、他在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朋友们上台，那么他的行动客观上有助于俄国及其军队的崩溃。但托洛茨基不可能不意识到，只要他还在俄国政府中，他就不能助长俄国的失败。国家因他的过错而蒙受的损失，使他对俄国所遭受的灾难的责任问题变得尖锐起来。

多伊彻写道：

“一夜之间，偶像变成了灾难的制造者。它在布列斯特的演出完全失败了……这正是许多人对它的看法和评价。这是有充分理由的。他被指责为一再声称德国人不敢进攻，从而哄骗党入睡”。

托洛茨基的神经绷到了极限。作为事件的目击者，普赖斯保证说：

“托洛茨基消失了好几天，没有人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2月27日晚，托洛茨基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谩骂同盟国和协约国的帝国主义者，俄国革命就是在他们的祭坛上发生的。当他讲完之后，又消失了。有传言说……他精神崩溃，哭了起来”。

波克罗夫斯基写道，起初“托洛茨基简直糊涂透顶，他在德国人开始进攻后的表现可悲得令人难以置信。他先是投票赞成接受德国的最后通牒，然后又投了反对票，接着又投了赞成票——最后，在最具决定性的一票中，他投了弃权票。最后，他不仅辞去了人民委员的职务，而且实际上也无法担任这一职务，即让其他人去收拾他一手造成的烂摊子，从而表达了他对不服从他的客观现实的愤恨”。

然而，托洛茨基从布列斯特任务失败后的第一天起，就开始努力恢复自己的政治地位。首先，他试图把所发生的一切归咎于他人。在2月23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托洛茨基在承认“现在提供给我们的条件比布列斯特时更糟了”的同时，突然宣布：

“在加米涅夫第一次出访时，条件要好一些，如果加米涅夫和越飞签署了和平协议，情况会更好”。

托洛茨基在3月7日举行的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说：

“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最有利的和平，我们早在11月就应该同意了”。

托洛茨基将拖延战术归咎于列宁和“大多数人”，他说，“他们说，‘不，继续执行同样的政策、鼓动、拖延等等’”。托洛茨基无法完全否认自己对承诺“德国人不会发动进攻”的责任，但他立即为这些言论找到了似是而非的解释：

“我是认为德国人不会进攻的人之一。同时，我也说过，如果他们进攻，我们总有时间签署这份和平协议，即使是在更糟糕的条件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人都确信我们别无选择.....（观众席上的低声议论）”。

在分析布列斯特戏剧的原因时，托洛茨基还提到了他认为造成所有灾难的主要原因——俄国的落后：

“在这里发现了某种差异，其根源很深：在于我们国家的落后，在于我们国家无力抵御这场旷日持久的世界大战，却卷入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循环”。

托洛茨基竭力证明布列斯特没有发生任何可怕的事情。针对“左派”关于谈判破裂后和平条件恶化的指责，托洛茨基语焉不详地解释道：

“和平的具体条件并不像布哈林认为的那样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当然，其中有一部分是有意义的，但无论如何，它们并不包含诱导的关键。历史将纠正一切”。

托洛茨基在表达了所有这些本应为他的行为辩护的论点之后，自信地向可能的指责者抛出了自己的观点：

“如果我被迫继续与德国人谈判，我会在2月10日重复我所做的……我会认为当时绝对不能签署和约，尽管我很清楚，每拖延一天，和平的条件就会恶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以前与德国人进行的所有谈判和我们的鼓动，只有在它们被当作表面价值时才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事实证明，俄国失去了大片领土、军备和撤退军队遗弃的物质财富，德国和奥地利建立了对数百万人的统治——这一切都不重要，因为托洛茨基的主要任务是在布列斯特鼓动西欧革命。

托洛茨基借助蛊惑人心的伎俩，避免了在党代会上激烈讨论他对布列斯特谈判破裂应负的责任。但这对他来说还不够。他要求对自己在布列斯特的行为进行正面评价。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表决中，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克里斯廷斯基提出了如下决议草案：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大会认为，今年2月10日不在布列斯特签署和约的策略是正确的，因为它甚至清楚地向国际无产阶级最落后的支队表明了俄国工农政府完全独立于德意志帝国主义和后者的强盗本质”。

大概只有列宁对托洛茨基破坏布列斯特谈判的强烈谴责才阻止了这项决议的通过。尽管如此，代表大会还是以20票对3票通过了季诺维也夫起草的决议，内容如下：

“代表大会欢迎布列斯特苏维埃代表团在揭露德帝国主义、使各国工人参与反对帝国主义政府的斗争方面所做的巨大工作”。

但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要求大会对他在布列斯特的行为给予更加明确的积极评价。克里斯廷斯基坚持对他的决议草案进行重新表决。托洛茨基把代表大会变成了一个综艺剧场，提出了一项谴责他的活动的决议草案：

“代表大会认为我国代表团关于不签署和平协定的声明是错误的”。

他希望这个草案会被坚决否决，从而使大会确认他的正确性。

第二次举行讨论克里斯廷斯基决议会议的尝试被否决了。托洛茨基的决议也未被接受讨论。然而，布列斯特灾难的制造者却感到了某种满足：虽然他厚颜无耻地企图宣布失败为胜利的做法遭到了否决，但大会并没有谴责他破坏和平谈判以及因此而丧失俄国大片领土的行为。

如果说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的行动导致了德国和奥匈帝国侵略者对我国的入侵，那么他在布列斯特破坏和平谈判后的行动则客观上促成了协约国军队对俄国的干涉。早在2月22日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托洛茨基就在德奥攻势中主张利用英国和法国提供的军事援助。3月1日，托洛茨基给摩尔曼斯克发了一封电报，命令“接受盟国使团的一切援助”。3月2日，摩尔曼斯克苏维埃主席尤里耶夫与盟军司令部在电报中达成了“口头协议”。3月6日，协约国以击退德国威胁为借口，开始在摩尔曼斯克进行干涉。虽然干涉俄国的计划是在《布列斯特和约》和托洛茨基给摩尔曼斯克的电报之前制定的，但事实证明，他的声明和电报促成了外国干涉者在三周内入侵乌克兰、白俄罗斯、东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欧洲俄国北部。

对托洛茨基来说，这些国家的领土和人口似乎是地缘政治游戏中的牢笼和棋子。托洛茨基不断拿法国历史作类比，他认为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插曲，因此对他来说，失败甚至苏维埃政权的崩溃都只是暂时的挫折：

“对于欧洲革命运动的发展来说，资产阶级对我们的胜利将是一个打击，但这不能与巴黎公社之后发生的事情相提并论。当时，法国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先锋，欧洲其他地区没有革命传统，在政治上深陷半封建野蛮状态；现在则完全不同了。欧洲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时机比我们更成熟。即使我们被击垮，毫无疑问也不会出现巴黎公社之后那样的历史性失败”。

托洛茨基在评估苏维埃政府的前景时指出：

“问题很快就会明朗，要么我们宣布我们来得太早，辞职，躲起来，让切尔诺夫、古契科夫、米留可夫——这些公认的政治家——去找斯温胡德或乌克兰算账。但我认为，作为一个革命党，如果我们不得不辞职的话，我们应该辞职——也就是说，我们应该为每一个职位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历史条件使我们面临这样的前景”。

也许，基于这种观点，他认为建设性的外交政策活动毫无意义，并准备像1917年11月那样“关门大吉”。2月22日，他第一次辞职。托洛茨基在重复辞职时，每次都提出了不同的辞职动机。2月24日，托洛茨基重提辞职信，解释说“今后他不可能代表中央委员会发言，因为他无法捍卫自己的立场”。他强调说：

“正是在签署和平协议时，他才不能继续留在这里，因为他不得不为自己不同意的立场辩护”。

托洛茨基直到两星期前还在单枪匹马地中断和谈并宣布俄罗斯军队复员，但他突然报告说，他在政府中的作用纯粹是形式上的：

“他完全可以离开，因为所有实际工作都是在他和外部领导层之外完成的。他实际上并不拒绝在必要时提供帮助，但他不想再承担任何责任.....他指出，目前的工作可以由奇切林负责，而列宁则应承担政治领导工作”。

列宁对托洛茨基的辞职表示关切。他指出：

“政策的改变就是危机”，并建议“将以下声明付诸表决：‘中央委员会认为目前不可能接受托洛茨基同志的辞呈，请他将自己的这一决定推迟到代表团从布列斯特返回和实际情况发生变化之后’”。

这一提议被接受了。然而，托洛茨基宣称：

“由于他的辞呈未被接受，他被迫不再在官方机构露面”。

在此之后，列宁又提出了新的建议：

“中央委员会在听取了托洛茨基同志的发言后，对托洛茨基同志在人民委员会关于外交事务的决定中缺席感到非常满意，请托洛茨基同志不要退出其他决定”。

这一决定也被接受。列宁的声明和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帮助托洛茨基获得了党领导层对其“不可或缺性”的正式承认。

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再次两次宣布辞职，其中包括与克里斯廷斯基决议失败有关的辞职。这一次，托洛茨基没有被说服不辞去外交委员的职务。正如多伊彻所说，“此时党内领导层已经在讨论任命托洛茨基为军事委员的问题”。大会上的辞职声明不仅再次提醒了托洛茨基的“不可替代性”，也让党为托洛茨基的新角色做好了准备。在中央委员会选举中，托洛茨基获得了与列宁相同的票数（34票）。（斯维尔德洛夫和季诺维也夫少得一票；斯大林、布哈林、索科利尼科夫和克里斯廷斯基少得两票）。托洛茨基很快恢复了他已经崩溃的声望。尽管托洛茨基的外交政策遭到了俄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失败，但他仍保住了自己的地位。托洛茨基保住了国家第二领导人的地位。

# 第 十 四 章

# 领导工农红军

1918 年 3 月 14 日《布列斯特和约》签署后不久，托洛茨基被任命为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领导苏维埃俄国武装力量的工作是他政治生涯的最高峰。托洛茨基“红军缔造者”的美誉从此诞生。甚至出现了他是“红色波拿巴”的传说。这个传说，正如弗-克拉斯诺夫和弗-戴恩斯所著的一本现代书籍的书名所描述的那样，至今仍广为流传。戴恩斯所著现代书籍的标题，至今仍在积极流传。与此同时，许多人对托洛茨基担任苏维埃共和国军事部门负责人的记忆主要停留在他下令枪杀和其他镇压行动上。就连沃尔科戈诺夫这样一位对托洛茨基颇有好感的作家也确信，托洛茨基成为了“内战期间军事恐怖的主要支柱之一”。

一方面，托洛茨基从十月革命的最初几个小时起就表现出愿意采取最残酷的镇压抵抗措施，这可能是国家领导层决定在干涉主义军队进入俄国、俄国郊区落入叛乱分子和分裂分子之手时委托他指挥武装力量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这一任命也反映出苏维埃俄国对专业经验的要求逐渐降低。克里连科曾是一名少尉，而接替他的托洛茨基一生从未服过兵役。多伊彻写道：

> “正如汉普郡掷弹兵团上尉的经验对罗马帝国史作者吉本有用一样，战地记者的经验后来对红军创始人也派上了用场”。

虽然同意战地记者身份对未来“苏联”的前景并非一无是处，但如果红军领袖过去是一名手榴弹兵上尉，而不是一名记者，对红军来说可能会更好。还应该考虑到，多伊彻自己也承认，托洛茨基关于世界大战的文章之所以生动，与其说是因为他对军事行动的深刻了解，不如说是因为他能够绘声绘色地描述作者道听途说的事件。托洛茨基并不属于那些“最先穿着单调的工作服，带着一个笔杆子进入城市”的战地记者。多伊彻在谈到托洛茨基关于堑壕战的战地报道时写道，“作者一生从未见过堑壕”，这“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俄军领导层专业化水平急剧下降之时，俄军的前身已不复存在。如果说在 1917 年底，俄军的士兵人数约为 1200 万，那么在 1918 年初，红军刚刚开始建立，牺牲的都是志愿兵。当时的志愿兵人数并不多。即使在“革命摇篮”彼得格勒，截至 1918 年 4 月 30 日，红军入伍总人数也只有 12820 人。1918 年初，下诺夫哥罗德有 174 人加入红军。察里津组建了 374 人的部队。伊尔库茨克有 350 人参军。内战开始时（1918 年 5 月），新成立的红军队伍中有 11.6 万名步兵和 7940 名骑兵。他们装备了 1635 挺机枪和 1050 门火炮。

与红军对峙的是科尔尼洛夫将军和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指挥的白卫志愿军，起初，这支军队的表现甚至更加可悲。到 1918 年初，从沙皇的数百万军队中，只有不到 4000 名装备简陋的士兵加入了志愿军的行列。

世界历史表明，在内战期间，相当一部分人拒绝在对立派别之间做出选择，这在内乱时期并不少见。在内战开始时，旧制度已经大打折扣，而新制度尚未与人们的祖国观念和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牢固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敌对双方的中坚力量都是最忠实于一种或另一种思想的人。然而，在交战双方阵营中，这种执着的理想主义者毕竟是少数。白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舒尔金在感叹白军运动缺乏

理想主义和无私精神时写道，在“白卫军”（即那些虔诚地信仰“白色事业”并愿意为其理想而牺牲自己的人）中，还有许多“灰卫军”，即那些不小心被拉入白军队伍的人，他们在道义上还没有做好为“伟大、统一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而无私斗争的准备。红军阵营中也有类似的情绪。

对立阵营中占主导地位的少数人试图用他们事业的理想感染惰性的、动摇的和其他的人，因此鼓动和宣传在内战过程中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并具有攻击性的风格和极其简单化的内容。被捍卫的事业被描绘成无懈可击的纯洁，所有可能的恶行都归咎于敌对一方。

然而，赤裸裸的宣传对惰性和摇摆不定的人没有持久的作用。绝大多数人不愿意积极支持对立双方的主张，也不相信政治宣传，这就迫使意识形态领域的少数人诉诸残酷的压力，以迫使其他人服从。由于经济普遍崩溃，当局又缺乏物质和组织能力来激发民众的支持，因此这一政策更加雪上加霜。因此，影响大多数民众的主要方法变成了暴力。恐吓或恐怖是参与内战的任何一方的政策特点。

1918-1920 年的俄国内战中，红军和白军以及控制着这个伟大国家各个地区的各种军事和准军事组织都使用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暴力手段。在冲突参与者野蛮无法无天的氛围中，具有公开犯罪心理的人崛起并开始在敌对阵营中定调。他们的专横和暴力是为了满足军队的需要或报复敌对阵营。

白军将领邓尼金在回忆录中写道：

> “超越了‘战利品’和‘征收’的界限，便是道德堕落的无底深渊：使用暴力和抢劫。这样的行为遍及……国内战争的整个战场，使得人民的痛苦又充满了血和泪，在他们思想上弄不清军事政治力量的所有‘颜色’，不止一次地抹掉了用以区分救星和敌人的特点”。[289]

作为白军道德沦丧的一个令人沮丧的例子，邓尼金引用了马蒙托夫将军的一封电报，他从坦波夫突袭红军后方归来：

> “我向你们致以问候。我们给亲戚朋友带来了丰厚的礼物，给顿河国库带来了 6000 万卢布，用于装饰教堂——昂贵的圣像和教堂用具”。

根据舒尔金的评价，在白军运动中，除了“白军”和“灰军”，“肮脏人种”也占有重要地位。红色运动的情况大概也是如此。

他说，为了制止军队中的犯罪行为，邓尼金和其他白军领导人“制定了严厉的法律，其中死刑是通常的惩罚。我们派遣拥有特殊权力的将军到军队中去，并派委员会现场调查部队犯下的罪行。我们——我和军事指挥官——下令禁止暴力和抢劫、劫持俘虏等等。但是，这些法律和命令有时会遭到环境的顽强抵抗，因为环境没有意识到这些法律和命令的精神和公然的必要性。有必要砍头，但我们却砍到了尾巴”。

内战的恶劣环境导致人们士气低落：正常秩序的崩溃、经济混乱和社会无序使许多人面临选择：要么为这个或那个意识形态政党而战，要么努力保护自己的家园和家人。类似的情绪在 1918-1920 年内战期间也有所表现。即使是哥萨克白军中最顽强抵抗的部分，只要敌对行动发生在其家乡附近，通常也会英勇作战。然而，随着战线远离哥萨克地区，白军中的逃兵越来越多。邓尼金指出：

> “履行国家义务的责任感非常薄弱.....开小差的现象很普遍……我曾一度命令率部（叶卡捷琳娜）采取特殊措施，将在大本营设立的战地法庭对逃兵的所有判决交给我确认。两三个月过去了；雅罗斯拉夫尔或坦波夫的

[289]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2006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二十四章 在察里津前线”校对。

一些农民经常被判处死刑，他们被投入叶卡捷琳诺达尔，我总是给他们减刑；但是，尽管下达了关于各阶级平等承担国家负担的命令，尽管更换了指挥官，却没有一个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受到审判。前躲后闪、肆无忌惮，甚至接受波斯公民身份、任人唯亲、对逃避者轻易袒护等手段，都成为他们可靠的挡箭牌”。

不愿服兵役的现象在苏维埃共和国十分普遍。当时最流行的歌曲之一《我的母亲怎样为我送行》讲述了一个被动员参加红军的农民的所有亲戚如何劝说他不要参军，并向他保证“布尔什维克没有你也行”。

内战敌对双方的逃兵成为建立“第三势力”部队的基础。邓尼金声称，最活跃的那部分人“出于远非理想的动机，被卷入了黑海‘绿军’运动：斯塔夫罗波尔的卡米沙人、库班的‘组织者和山区叛乱支队’”。这些组织往往变成了普通的犯罪团伙。这些团伙恐吓民众。

最后，在经济和组织解体的条件下，交战双方没有足够的作战手段。红军和白军都没有足够的弹药。即使在内战最激烈的战斗期间，1919 年夏天南线红军的步枪子弹总储备量也只有约 400 万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老兵、沙皇军队上校卡库林就此指出：

“要知道，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一个步兵团在一天的激战中最多消耗 250 万个步枪子弹”。

白军的弹药情况往往更糟，因为他们被切断了与军工生产中心的联系。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夺取红军的军械库。因此，内战中的战斗在火力饱和度方面与 1914-1917 年俄国参加的世界大战军事行动的相应指标相差几个数量级。

因此，规模相对较小但装备精良的部队毫不费力地占领俄国大片领土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装备精良、纪律严明的 4.5 万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在 1918 年 5 月底控制了乌拉尔山脉以外西伯利亚公路沿线的所有城市。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哗变使内战演变成了一场全面战争，而事实上内战早在北高加索地区的哗变中就已经开始了。

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在发动内战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俄国解体的情况下，最适合作战的编队往往不是由国家的主要人口组成的，而是由外国人或新独立国家的居民组成的，他们由于命运的安排发现自己身处祖国之外。就白军而言，起初除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外，干预部队也扮演了这样的角色。白军军官马塔索夫声称：

“共产主义国际部队和新兵为布尔什维克提供了非同寻常的决定性援助：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步兵师、中国人和匈牙利人”。

由于大部分俄国人没有参加内战，白军和红军都积极鼓动他们的爱国情绪，指责他们的对手为外国人服务。托洛茨基不断嘲弄“爱国主义”的概念和热爱祖国的言论，在德军进攻彼得格勒期间，他被迫提出了“社会主义祖国危在旦夕！”的口号。苏维埃当局强调了干涉的外国性质，并提请注意外国对白军将领的援助。

反革命势力则提出了“伟大的、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俄罗斯”的口号，指出了苏维埃制度的国际主义口号和新政府与古老俄罗斯的基础进行的斗争。为了证明红军的“非俄罗斯”性质，反布尔什维克的宣传还不断提到犹太人在苏维埃军队管理中的支配地位。

为了支持关于犹太人在红军领导层中占主导地位的说法，怀尔德列举了一长串人名和职位。他的“军事委员会”名单以“陆海军委员——勃朗施坦（托洛茨基）……”开头，最后得出结论：“43 名成员中，俄国人共计——0 人，拉脱维

亚人——7 人，德国人——1 人，犹太人——35 人”。由此可见，红军领导层中没有俄罗斯人。

但是，迪基的名单能被视为完整而准确地反映了红军领导干部的构成吗？在托洛茨基的名字之后，紧接着出现了一些人，他们的职位并没有也不可能在红军领导层中发挥任何重要作用（某位“北方军革命参谋部主席费什曼”和某位“第十二军军事司法委员罗姆”）。然后是同样无足轻重的职位，如“第 12 军政治委员”、“维捷布斯克军区政治委员”等等。可能在怀尔德和爱尔兰主教耶利米看来，担任这些职务的人在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力量中发挥了领导作用，斯卢茨克和维捷布斯克的政委似乎是红军最伟大的军事指挥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根据 1918 年 9 月 2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成立的共和国军事革命委员会（RVSR）是内战期间红军的主要领导机构，由列-达-托洛茨基领导。该委员会最初的成员包括：托洛茨基、科博热夫、梅霍诺辛、拉斯柯尔尼科夫、斯米尔诺夫、达尼舍夫斯基和瓦采蒂斯。在这七人中，只有托洛茨基是犹太人，两人是拉脱维亚人（约阿基姆-约阿基莫维奇-瓦采季斯和卡尔-尤利乌斯-克里斯蒂安诺维奇-达尼舍夫斯基），其他四人是俄罗斯人。很快，共和国军事委员会扩大到 23 人。在新成员中，有许多犹太人，而大多数是俄罗斯人。然而，迪基既不想让共和国总司令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卡缅诺夫（列夫-鲍里索维奇-加米涅夫-罗森菲尔德的同名人），也不想让伊万-尼基托维奇-斯米尔诺夫、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奥库洛夫、尼古拉-伊里奇-波德沃伊斯基等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进入苏维埃俄国武装力量的领导层。怀尔德更倾向于从“盖克尔”（“雅罗斯拉夫尔红军司令”）、“舒尔曼”（“东线特派员”）等姓氏中整理出他的名单。（迪基的无能程度从他“任命”瓦采蒂斯为“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西线指挥官”就可见一斑。显然，迪基认为苏维埃俄国正在西部某地与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作战。事实上，与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战斗发生在俄罗斯东部）。

与此同时，毫无疑问，犹太人在红军领导层中发挥了突出作用。托洛茨基被任命为共和国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后不久，埃夫拉伊姆-斯克良斯基成为他的第一副手。其他一些犹太裔人士也在红军领导层中担任要职（例如，阿尔法特成为共和国海军全军司令）。1982 年在特拉维夫出版的阿布拉莫维奇的《决战中》一书中的数据证明，红军指挥机构中有许多犹太裔人士。阿布拉莫维奇列出了在国家军事机构中担任最高指挥职务的犹太人名单，从共和国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到师、旅指挥官，共有约 400 人。在共和国军事革命委员会领导人、方面军和军队指挥官中，阿布拉莫维奇提到了托洛茨基、斯克良斯基、罗森戈尔茨、古谢夫（德拉布金）、拉舍维奇、皮亚特尼茨基、恩施利希特、瓦伊曼、格列扎罗夫、佩切斯基、斯拉文、利索夫斯基、泽连斯基、比特克尔、贝拉-库恩、索科尔尼科夫、霍多罗夫斯基、拉扎列维奇、索金、雅基尔。

乌特金在他关于描写前裁缝莫特莱-布洛赫的姿势中就捕捉到了这样一位军事领导人：

> 疯婆子在集市上忧心忡忡。
> 除了“疯婆子”，整个队伍忧心忡忡：
> 队伍从街上走过车站……
> 牺牲的威胁阴云不散
> 莫根多夫的行伍里
> 莫特莱–布洛赫在列
> 他行军的步伐气宇矫健

宛若将领阅兵活灵活现
疯婆子在集市上忧心忡忡。
除了“疯婆子”，整个队伍忧心忡忡。

诗人可能亲眼目睹了犹太政委们在印有六角大卫星的旗帜下行进，从而表明他们属于犹太民族和他们祖先的古老宗教。

这种示威游行不仅会激怒市场上的商人，即新任政委昨天的朋友，还会激怒其他国籍的普通红军士兵。他们中的许多人注意到，虽然军事领导层中有许多犹太人，但普通士兵中的犹太人要少得多（普通参谋人员中犹太人的比例为 1.9%，即不仅远远低于他们在指挥人员中的比例，而且比犹太人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4%——还要低一倍）。

据内达瓦称，1919 年初，“托洛茨基开始感到，犹太人在最高层所占比例过大，是不必要的”。他给列宁写了一封密信，之后在 1919 年 4 月 18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听取了“托洛茨基的报告，即在前线地区、前线地区和后方执行委员会以及中央苏维埃机构中，拉脱维亚人和犹太人在契卡 b 级军官中所占比例极大”。托洛茨基指出：

> “他们在前线的比例相对较低，在红军中加强了对这一问题的沙文主义煽动。所以必须重新安置党员，以便在前线和后方之间更均匀地分配各民族的党务工作者”。

政治局指示托洛茨基和军事革命委员会政治部主席斯米尔加“代表中央委员会起草并向各委员会发出关于在中央和地方组织与前线之间分配干部的指示”。

与此同时，托洛茨基支持锡安犹太复国主义-社会主义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在红军中建立犹太人部队的提案。该提案的作者认为：

> “犹太部队中的犹太红军战士将更好地与白卫军作战——特别是因为他将摆脱红军战士中无意识部分所维持的压迫性反犹氛围”。

1919 年 4 月 28 日，政治局决定在混编团中建立犹太营，在混编旅中建立民族犹太团。

正如内达瓦所强调的，建立“犹太人军事或准军事部队的基础……是革命前时期存在的反大屠杀自卫队。1917 年 10 月召开的犹太士兵联盟第一次会议讨论了这些部队的合法化及其转变为固定部队的问题……建立犹太部队的问题在乌克兰尤为突出。在这里，他们既可以成为红军的一支有效力量，也可以成为抵御大屠杀的盾牌”。内达瓦认为，“托洛茨基赞成犹太部队”，因为“大众普遍认为犹太人在逃避服役……托洛茨基显然也对所有红军政委都是犹太人的说法感到不安”。

正如他被任命为内务委员部委员一样，托洛茨基在将犹太人分配到红军各师和领导岗位的行动中，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对自己的部落同胞采取消极态度，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在自己的讲话中受到批评。

托洛茨基意识到自己和他的许多革命同事在军事事务中的无助，因此他从就任新职伊始，就倡议让职业军人全面参与共和国武装力量的领导工作。1918 年 4 月 22 日，托洛茨基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了在红军中使用退役军官和将军的计划，他的提议遭到了布哈林领导的“左派共产党人”以及丹和马尔托夫领导的孟什维克的攻击。波列季耶在托洛茨基的计划中看到了布尔什维克与反革命军队之间形成集团的可能性。“拿破仑就是这样出现的！”——丹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感叹道。马尔托夫指责托洛茨基为新的科尔尼洛夫扫清了道路。然而，托洛茨基对这些指责置若罔闻。

到 1918 年底，沙皇军队的退役军官和士官已占红军指挥人员的四分之三。在托洛茨基的坚持下，人民委员会于 1918 年 12 月 7 日颁布了《关于征召所有退役军官服现役的命令》。到内战结束时，在红军队伍中有 3 万名沙皇军队的军官和 16 万名军士。

由于苏维埃共和国受到敌人的四面夹击，对红军指挥人员的专业增援需求与日俱增。1918 年，苏维埃政府控制的领土迅速缩小。俄罗斯大部分地区都在外国军队或各种反苏组织的控制之下。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诸国和普斯科夫州的部分地区处于德奥占领者的统治之下。外高加索和中亚的大部分地区落入民族分裂政府的统治之下。整个西伯利亚落入叛乱的捷克人之手。7 月 6 日，协约国宣布符拉迪沃斯托克为国际区，美军（1-1.2 万人）和日军（7-7.5 万人）在此登陆。摩尔曼斯克的干涉者分遣队得到了加强（多达 1 万人），8 月 2 日，英美干涉者占领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并从那里向南朝沃洛格达方向前进。7 月 6 日，在协约国的帮助下，雅罗斯拉夫尔、里宾斯克、科夫罗夫斯克、穆罗姆和摩尔曼斯克爆发了叛乱。7 月 6 日同一天，左翼社会革命党在莫斯科发动叛乱。东线左翼社会革命党司令穆拉维耶夫试图夺取辛比尔斯克，加入捷克斯洛伐克人的行列。

托洛茨基回忆说：

> “德国统帅部通过他们的军事代表通知我说，如果白军从东面逼近莫斯科，那德军将从西面的奥尔沙和普斯科夫方向进逼莫斯科，使我们不能建立新的东部战线。我们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290]

在捷克斯洛伐克人干涉该国东部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共和国处于危险之中。1918 年 7 月 18 日，托洛茨基在任命前沙皇军队上校瓦采蒂斯为新的东线总司令的命令中，只提出了与捷克斯洛伐克人作战的鼓动手段：

> “向工人、农民和士兵印发数百万份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叛乱意义的公告。你们的一切努力都要朝着这个方向。我们保证提供帮助”。

瓦采蒂斯还制定了一项专业计划，以包围捷克斯洛伐克人，并向乌拉尔以外地区发起进攻。

然而，红军的兵力不足以完成任务。夺取乌法的所谓第 2 军有 1000 把刺刀和 140 把马刀，17 挺机枪和 6 门火炮，却被捷克人的一个连打败了。包围捷克人的其他“军”也同样束手无策。

1918 年 8 月 6 日至 7 日，捷克人占领了喀山。在这座城市里有俄罗斯从彼得格勒撤出的黄金储备。这些黄金被捷克斯洛伐克人攫取。卡库林指出，双方的“兵力数量微不足道”，“初步计算：在伏尔加河右岸，红军有 1200–1500 名步兵、4 门轻型火炮和 2 门重型火炮，而白军有 1200 人和 4 门火炮；在伏尔加河左岸，红军有 2000 名步兵、270 把军刀、9 门火炮和 1 辆装甲车，而白军有 900 人，他们只有 2 门火炮和 1 辆装甲车”。

捷克人和白卫军的总人数比 1938 年 8 月攻占哈桑湖附近两座山头的日军人数少 10 倍。然而，红军的虚弱使这些微不足道的部队得以前进。在 8 月 13 日的报告中，前线指挥官瓦采蒂斯描述了各军和各部队的状况：“第 3 军完全没有战斗力”，第 1 军“大部分已经腐朽”，喀山师的炮兵“拒绝与捷克人作战，在喀山附近的敌对行动开始之前就已四散奔逃”。

在苏维埃国家领导人看来，捷克斯洛伐克人和白军可能很快就会攻入莫斯科

---

[290]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二卷 第三十三章 在斯维亚日斯克的一个月”，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城墙。托洛茨基在题为《可怕的警告》[291]的命令中写道：

“我们现在之所以战斗，是因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任务。能否夺取喀山取决于战争的进一步进程，而战争的进程则取决于俄国和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命运”。

1552 年 8 月至 9 月间，莫斯科在斯维亚日斯克附近集结了一支军队，准备攻占喀山，俄罗斯东进的命运就取决于此。但是，如果说在那个遥远的年代，伊凡雷帝的军队有 15 万士兵和 500 多门火炮，那么 1918 年苏维埃政权的军队则要弱小得多，尽管军事编制的名称令人印象深刻，但战斗结束时，两支红色“军队”的总人数不超过 1.5 万人，火炮数量为 69 门。拉斯科利尼科夫率领的伏尔加“船队”由 5 艘武装汽船、3 艘驱逐舰、1 个浮动炮台、4 艘小艇和由 4 架水上飞机组成的航空分队组成。

托洛茨基决定亲自乘坐装甲列车奔赴战场，随后他又乘坐装甲列车在前线奔波了两年多。根据托洛茨基的命令，这辆装甲列车于 8 月 8 日成立，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它有自己的印刷厂，出版《路途报》，有俄国前所未有的冷冻箱，甚至还有一架小型飞机。这是一座移动的堡垒，同时也是一座车轮上的宫殿。在 12 辆马车上，除了委员长外，还有 231 名随从，其中包括拉脱维亚步枪兵（30 人）、水兵（18 人）、骑兵（9 人）、机枪手（21 人）、司机（10 人）、摩托车手（5 人）、电话接线员（7 人）、装甲车乘务员（7 人）等等。人数最多的是鼓动员（37 人）。

托洛茨基的装甲列车是他领导红军风格的缩影。这列装甲列车对小规模红军部队的穿行被转化为行动，既有两栖作战的战斗力，又有东方暴君游行的震撼力。托洛茨基试图尽可能使他的前线之行仪式化。正如拉林所证实的，在火车上“有一名摄影师和一名电影摄影师，他们记录下了旅途中的重要情节”。

列车长奇科利尼的第 58 号命令，要求警卫队长负责警戒：

（1）防止人们聚集在保卫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同志的车厢附近。

（2）当国防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同志离开时，不应由任何同志，而只能由为此目的指定的人，蜂拥而上地陪同他。

（3）在任何建筑物的入口或出口处，从我们的列车上派去迎接国防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同志的哨兵，在他经过时不应急于追赶，而应根据卫兵长的命令离开自己的位置。

在前往喀山附近的军事行动区之前，托洛茨基发布了一条命令，其中写道：

“同时，我发出如下警告：绝不宽怒人民的敌人、外国帝国主义特务、资产阶级雇佣军。我在军事人民委员会的专列里起草这道命令时，由莫斯科工农代表苏维埃主席斯米多维奇同志、代表军事人民委员会的古谢夫同志和代表交通人民委员会的日格蒙德同志组成的革命军事法庭正在列车上开庭。

革命军事法庭在受戒严管制下的铁路沿线范围内享有无限的权力。

我已责成卡缅希科夫同志防御莫斯科——喀山战线，他已安排在穆罗姆、阿尔扎马斯、斯维亚日斯克设立集中营，对可疑的煽动者、反革命军官、破坏者、寄生虫和投机商等等，除了应就地枪决或由革命军事法庭判处其他刑罚的之外，一律关进集中营。我警告所有负责正进行军事作战的地区和军事行动的地区内苏维埃的官员，我们将加倍严厉地对待他们。苏维埃共和国对玩忽职守和犯罪的政府人员的惩处，将像对敌人一样严厉。这个国家可怕的局势迫使我们采取这种可怕的方式。

[291] 译者没有找到中文版的翻译。——译者。

苏维埃共和国处于危险之中！对直接或间接加剧这种危险处境的人都将严惩不贷！”[292]

除了恐吓之外，托洛茨基还可以依靠他的主要天赋——用动情的演讲影响听众的能力。根据多伊彻的说法，托洛茨基一到斯维亚日斯克，就立即“走到一群惊恐万状的士兵中间，慷慨陈词”。后来，他不断向红军士兵发表演说。装甲列车上的 37 名鼓动者也不知疲倦地向部队发表演说。

托洛茨基把他的演讲变成了戏剧表演，让士兵们久久难忘。在这些年里，托洛茨基的演讲形成了一定的仪式。通常情况下，托洛茨基都会在规定的时间内迟到。当因演讲者缺席而产生的焦虑累积到极限时，托洛茨基就会在一名居民的陪同下突然登台。他身着黑色皮大衣，迈着急促的步伐走到舞台边缘，双手猛地一挥，将大衣打开，然后凝固片刻。所有坐在大厅里的人都在灯光下看到了大衣的红色衬里、一个穿着黑色皮衣的男人的身影、一缕向前甩动的胡须和闪闪发光的眼镜。掌声雷动，欢呼声此起彼伏。

托洛茨基对“恶魔”、“麦斐斯托菲尔”形象的诉求符合革命美学，符合无情摧毁旧世界的美学。显然，这样的形象符合集会者的心情，他们准备投入“最后的殊死搏斗”，摧毁“整个暴力世界”，摧毁阻碍建立国际兄弟情谊世界的一切。托洛茨基的演讲中经常出现以实现地球和世界历史规模的伟大目标为名否定传统道德基础的“恶魔”言论。1918 年 12 月，他在库尔斯克发表讲话时宣称：

“爱国主义，对祖国、对人民、对周围的人，无论远近，对生活在此时此刻的人，对渴望微小的、不易察觉的幸福的人的爱，自我牺牲，英雄主义——这些空洞的词语代表着什么价值！”

然而，在对普通红军战士讲话时，他一如既往地说他想听的话，把他们的情绪变成生动的短语——口号。他谈到了战争的艰辛和胜利的不远。他诅咒敌人，对聚集在一起的战士们的勇气表示钦佩。在这些时刻，他没有谈论俄罗斯文化的二流性质。从他的口中说出的话，在白卫将军的演说中更为恰当。据目击者回忆，在邓尼金发动进攻期间，他在基辅的演讲中突然宣布：

“敌人不敢践踏俄罗斯母亲的土地！”

为了唤起人们对他演讲的兴趣，托洛茨基可以突然从队伍中拉出一名士兵，对他说：

“兄弟，我和你一样。你和我都需要自由。布尔什维克给了我们自由（用手指向红色阵地的方向）。今天，白卫军官和地主可以从那里（朝白色阵地猛地一甩手）来把你我再次变成奴隶！”

演讲结束时，他要求群众集体宣誓效忠苏维埃共和国。在人群开始高喊“前进！”、“让我们为革命献身！”之后，托洛茨基向人群喊出了“到喀山去！”的口号。

他亲自向表现突出的士兵发放现金或其他荣誉。当这些礼物供不应求时，他就会炫耀地把自己的勃朗宁手枪或其他私人物品送给士兵。这样的故事口口相传。

共和国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古谢夫（德拉布金）高度评价了托洛茨基在那些日子里的活动：

“托洛茨基同志在斯维亚日斯克度过的这 25 天里，做了大量的工作，把第 5 军的涣散和衰败的部队变成了可以作战的部队，并为夺取喀山做好了准备”。

同时，他强调托洛茨基行动的主要目的是恐吓战士。

[292] 托洛茨基《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的命令》（8 月 18 日）。

托洛茨基的命令中充满了对违反军纪，尤其是开小差的处决承诺。托洛茨基在整个内战期间不断发布此类命令。即使知道加强军队纪律需要采取严厉的措施，托洛茨基 1918 年 11 月 24 日命令[293]的严厉程度还是不禁让人瞠目结舌：

（1）任何煽动撤退、开小差或不服从作战命令的恶棍都将被枪决。

（2）任何擅自离开战斗岗位的红军士兵都将被枪决。

（3）任何丢弃步枪或出售部分制服的士兵都将被枪决。

（4）在每条前线，都分布有抓捕逃兵的督战队。任何试图抵抗这些督战队的士兵都将被就地枪决。

（5）所有地方苏维埃和贫农委员会承诺采取一切措施抓捕逃兵，每天组织两次围捕：上午 8 点和下午 8 点。抓到的人将被带到最近的部队总部和最近的军事委员会。

（6）窝藏逃兵的罪犯将被枪决。

（7）发现逃兵的房屋将被烧毁。

让投机分子和叛徒都去死！

让逃兵和克拉斯诺夫的特工去死！

1918 年 8 月，为了打击逃兵和撤退士兵，东线首次建立了督战队。托洛茨基坚持全面扩大这些支队的职能。托洛茨基在给阻击分队队长伊万诺夫的信中写道：

“显然，在许多情况下，督战队的工作仅限于拘留个别逃兵。同时，在进攻期间，督战队的作用应该更加积极。他们应该驻扎在我们战线的后方，并在必要时推动落后者和溃退者。如有可能，督战队应配备一辆装有机枪的卡车或一辆装有机枪的汽车，或者最后配备几名装有机枪的骑兵。

军事革命委员会 托洛茨基”。

不仅普通士兵，指挥官也可能成为残酷镇压的对象。1918 年 11 月 20 日的军事革命委员会命令指出：

“只有通过有组织的、教育性的和镇压性的措施体系，才能提高军队的稳定性”。

军队纪律的维持是通过实际扣押指挥官和政委来实现的，他们要对士兵的任何不当行为负责。托洛茨基在命令中强调：

“恐慌、混乱、开小差、队伍涣散是指挥人员的主要责任，因此也是政治委员的主要责任。每个政治委员都必须在自己的部队发生任何不幸之后，清楚地说明谁应该负主要责任，报告不称职的指挥官，必要时当场逮捕那些明显的无赖，他们在和平时期不介意戴上指挥官的头衔，但在战斗中却躲在自己部队的背后，逼迫部队撤退到安全地带。政治委员有责任通过革命法庭处决这些无赖”。

古谢夫在为这种领导风格辩解时写道：

“在党派纷争和纪律涣散的时代，托洛茨基同志.....的严厉方法首先是权宜之计，也是必要的。说服是不可能的，也没有时间说服”。

共和国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另一名成员达尼舍夫斯基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不记得我从阿尔扎马斯访问莫斯科并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会面的哪次谈话中谈到了托洛茨基及其在前线的作用。我转达了前线政治工作者对托洛茨基的火车在这个或那个战场上遭到游击队袭击的普遍不满。指挥部也很不满，因为托洛茨基的火车在前线行驶和停留时，往往会形成双重力量，

[293] 译者没有找到中文版的翻译。——译者。

行动和计划会被混淆，因为托洛茨基往往既不向指挥部也不向军事革命委员会通报他的命令和行动。

这种情况在斯维亚日斯克尤为明显。托洛茨基在这条战线上的存在确实给行动管理带来了混乱。有时需要调派特种部队来保护托洛茨基或营救他（如白卫军突破喀山铁路并锁住托洛茨基的火车时的情况）。与此同时，托洛茨基还试图直接指挥。这一切造成了前线的混乱，使政治工作者和指挥部都感到不安”。

白军在斯维亚日斯克突破托洛茨基的装甲列车（达尼舍夫斯基曾提到过），给许多红军士兵造成了严重后果。突破装甲列车的敌军被击退后，军事法庭开始审判那些未能保卫装甲列车的部队。彼得格勒第 2 团的未保卫装甲车的指战员因此受到指控。法庭判处十分之一的人枪决，其中包括共产党员、团长和政委。

托洛茨基为了使这支行刑队成为我们其他人的榜样，在这一场合发布了一道命令，内容如下：

“红军战士既不是懦夫，也不是无赖。他们要为工人阶级的自由而战。如果他们退缩或战斗不力，指挥官和政委难辞其咎。我在此发出警告：如果任何部队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撤退，首先枪毙的是政委，其次是指挥官……懦夫、无赖和叛徒都逃不过枪毙的命运——我当着整个红军的面保证这一点”。

托洛茨基在回忆录中这样解释他的行动：

“这只能说在用烧红的铁块去烫化脓的伤口”。[294]

1918 年 8 月 30 日社会革命党范妮-卡普兰企图谋杀列宁，以及社会革命党卡内基瑟谋杀彼得格勒契卡主席乌里茨基后，“红色恐怖”开始了。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数百名沙皇制度下的重要人物被枪杀，其中包括一些前大臣，但更早的时候，在“红色恐怖”开始的前几天，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在叶卡捷琳堡被枪杀。由于托洛茨基曾打算在对尼古拉二世的审判中担任国家公诉人，多伊彻在评论叶卡捷琳堡的处决时只遗憾地表示，“世界失去了托洛茨基和沙皇面对面的戏剧性审判的场面”。

托洛茨基得知有人企图谋杀列宁的消息后，立即赶往莫斯科。托洛茨基看到，尽管列宁身受重伤，但他没有生命危险，因此国家领导层不会发生变化。在莫斯科的几天里，他争取到了成立共和国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决定，这个新机构大大加强了军事人民委员的地位。（这一决定于 1918 年 9 月 6 日正式宣布）。1918 年 9 月 4 日宣布设立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一职。托洛茨基在准备进攻喀山的日子里与之关系密切的瓦采蒂斯被任命为总司令。

9 月 2 日，托洛茨基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报告了东线局势后，乘坐装甲列车返回斯维亚日斯克，在那里参加了攻打喀山的准备工作。自 1552 年以来，莫斯科政府的军队第一次像 366 年前一样对喀山进行了长时间的炮击，于 1918 年 9 月 10 日攻占了这座城市，击溃了 4000 名捷克人和白卫武装，他们在撤退时丢弃了两辆装甲列车和 12 门大炮，但带走了俄国的黄金储备。

托洛茨基断然拒绝了列宁的请求，不允许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团访问喀山。他不想让代表团看到炮击喀山“资产阶级老巢”的后果。也许他不想让不必要的目击者进入这座城市，因为在那里很快就开始出版《红色恐怖》杂志，其中使用了有关在喀山铲除反革命的经验的材料。

---

[294]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二卷 第三十三章 在斯维亚日斯克的一个月”，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红军进入以前被白军占领的领土的同时，还采取残酷措施打击前当局的支持者。镇压的受害者往往是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指控与白军合作的平民。

因此，托洛茨基在 1918 年 12 月 10 日恐吓顿河哥萨克的命令中写道：

“哥萨克，最后警告你们！克拉斯诺夫及其盟友的罪行使工人和农民的心变得更加坚硬。对克拉斯诺夫的仇恨常常转移到哥萨克身上。工人和农民的呼声越来越高：‘必须消灭所有哥萨克人，这样俄罗斯南部才会有和平与安宁！’这当然是错误的、不公正的。但是，哥萨克成为克拉斯诺夫手中的盲目工具的时间越长，红军战士对他们的处置就越严厉”。

顿河地区的居民很快就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体会到了这些威胁在所谓的“红色恐怖”计划实施期间意味着什么。1919 年 1 月 24 日，斯维尔德洛夫、克里斯廷斯基和弗拉基米尔斯基起草了一份中央委员会通函，其中指出：

“考虑到与哥萨克的内战经验，有必要承认通过消灭哥萨克来对所有上层阶级进行最残酷斗争的唯一正确性”。

正如克拉斯诺夫和戴恩斯所强调的：

“信的作者要求‘对富有的哥萨克人.....实行大规模恐怖’，‘对所有直接或间接参与反对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哥萨克人实行无情的大规模恐怖’。命令没收粮食，在哥萨克土地上重新安置‘异族贫农’，在土地方面让异族与哥萨克人平起平坐，进行全面裁军，枪毙任何在规定的投降期限后仍持有武器的人”。

在谈到“镇压”时，克拉斯诺夫和戴恩斯写道：

“在红军部队占领的顿河地区领土上，惩罚机器日夜不停地工作着，每天将 40–60 人送往对岸（枪决）”。

然而，在白军进入该地区后，被指控支持苏维埃政权的领土上的居民也遭受了类似的大规模镇压。那些处于无权地区或受“绿军”帮派或各种地方统治者控制的人所遭受的苦难也同样深重。随着自相残杀的战争持续进行，该国人民的苦难仍在继续。

托洛茨基试图制造喀山胜利是划时代事件的印象，但红军攻占伏尔加河畔的这座城市并没有导致内战的转折点。诚然，由于东线没有大量反革命部队，红军得以发动攻势，但白军早在 1918 年 11 月就以更强大的兵力恢复了东线攻势。高尔察克指挥的先头部队有 14.3 万人，210 门火炮。他们的对手是东线红军，人数为 10 万人，拥有 334 门火炮。这与 1905 年辽阳会战中对阵双方的人数（俄军 15.2 万人，日军 13 万人）大致相当，但火炮的比例却不同（俄军 606 门，日军 508 门）。然而，尽管与喀山战役相比，对阵双方的人数有所增加，但应该考虑到辽阳战役的战线长度为 60 公里，而东线战线长达 1400 公里。

在这种情况下，要管理分散在广阔战线上的部队行动极为困难。各个部队往往独立作战，脱离中央领导，其行动接近于游击队风格。由于部队无法覆盖绵延的战线，战斗以机动为主。个别部队向敌后纵深过渡和突袭，突然袭击陆军总部，也迅速撤离战场。关于内战的战斗条件，布琼尼写道：

“这是在广阔土地上进行的战斗，战线很不清楚，战斗常常为争夺最重要的城市、铁路枢纽和村庄而进行，任何时候都有迂回、包抄、打击侧翼和后方的可能”。[295]

这样的条件意味着要积极使用机动编队，在当时的条件下意味着要使用大型

[295]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2006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二十四章 在察里津前线”校对。

骑兵编队。在内战后半期，白军建立了庞大的骑兵军团，而红军则建立了由9000-17000名骑兵组成的骑兵军。后来，托洛茨基和他的传记作者试图让后人记住他的口号："无产阶级，马背上的无产阶级！"然而，托洛茨基承认骑兵作用的道路是自相矛盾的，他一开始就全盘否定骑兵的重要性。

正如布琼尼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证实的那样，托洛茨基在回答他在会上提出的赞成建立大型骑兵编队的论点时说：

> "布琼尼同志！您明白您说的是什么吗？您不懂得骑兵的本性。这是公爵、伯爵和男爵指挥的贵族部队。我们这些穿树皮鞋的人没有必要往卖白面包的摊前挤"。[296]

布琼尼认为：

> "托洛茨基的回答很可能反映了他周围军事专家的意见，他们以各种可能的方式阻碍苏联骑兵的建立——有些人有意识地为敌人的利益工作，有些人则'善意地'自欺欺人地否定骑兵在内战中的作用"。（托洛茨基正确地指出，对"红色指挥官"的高度怀疑往往是由于那些没有军事理论知识的人的自负造成的）。

然而，托洛茨基本人也没有摆脱对"军事专家"的不断怀疑。他在回忆录中描述了自己如何多次揭露前沙皇军官的"叛国罪"。这种指责的依据是他无意中听到的一次谈话，其中一名前沙皇军官批评了托洛茨基的战略计划。托洛茨基以为自己遭到了炮火袭击，因为这名前军官设法打电话给敌军部队，告诉他们共和国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的位置。托洛茨基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了他与一些前军官打交道的经历，他声称：

> "在参谋部、各级指挥机关等部门，到处都潜伏着叛变投敌分子"。[297]

托洛茨基屡次对那些成为他不信任对象的人进行严厉报复，以证实他的怀疑。甚至在他担任共和国武装力量首脑之初，托洛茨基就于1918年5月27日下令逮捕一等上尉什恰斯尼，罪名是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在6月20-21日进行的审判中，托洛茨基担任了控方证人。托洛茨基提出的唯一不利于上尉的证据是什恰斯尼的文章，他准备在海军编队代表大会上宣读这篇文章。法庭仅根据托洛茨基的怀疑就判处什恰斯尼死刑。沃尔科戈诺夫指出，这是"苏维埃俄国第一次因政治立场而判处死刑的判决"。

托洛茨基为了消除真实或想象中的叛徒威胁，不断采取恐吓手段。正如多伊彻所强调的，"托洛茨基的命令中闪烁着对白卫军特工的严峻威胁"。然而，与他的传记作者不同的是，托洛茨基认为"死刑的恐吓并不能严重威胁战斗军官"。因此，托洛茨基下令编制曾在红军队伍中服役的白卫军官的家属名单，以便"让潜在的叛徒知道，如果他们叛变投敌，他的妻子和孩子将作为人质留在前线后方"。托洛茨基在从喀山发给军事委员梅日劳克的命令中写道：

> "我建议严格注意被吸引的人员，只让那些家人在苏维埃俄国境内的前军官担任指挥职务，并以个人签字画押向他们宣布，他们自己要对家人的命运负责。
>
> 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 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提醒军事人民委员部行动处处长阿拉洛夫，他曾下达一项命令——

---

[296]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2006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二十七章 歼灭邓尼金的军队"校对。

[297]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二卷 第三十三章 在斯维亚日斯克的一个月"，2005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要求查明前军官指挥人员的家庭状况，并在每个人的亲笔签名上注明，他的叛逃或叛变行为将导致其家人被捕，因此他本人要对其家人的命运负责。从那时起，发生了多起前军官叛国的案件，但据我所知，没有一起叛国者的家人被逮捕，因为显然根本没有对前军官进行登记。对一项重要任务如此漫不经心的态度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 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为镇压叛逃军官家属和建立人质制度的要求辩解，理由是“如果不这样做，革命就会失败，保卫革命的阶级就会成为白卫军复仇的牺牲品”。就连托洛茨基的辩护人多伊彻也承认，“在恐慌发作、猜疑加剧和暴力激情中，有许多无辜的受害者”。

托洛茨基在解释他对“资产阶级专家”的态度的原则时，毫不掩饰他对他们的极度疏远，甚至不承认他们是活生生的人。1918 年 3 月，他宣称：

“就像投入到死的机器中去一样，对这些技术员、工程师、医生、教师和昨天的旧军官也投入了我们一定的人民的、国家的资本，我们应当使用和利用这资本，如果我们真的想要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任务的话”。[298]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托洛茨基却成为了“红色指挥官”们无数次指责的对象，说他偏袒前沙皇军官。应该考虑到，托洛茨基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教养更接近于军事知识分子，而不是人民。与托洛茨基一样，许多“军事专家”都是西方及其价值观的崇拜者，他们同样蔑视那些“把头埋在泥里”的“乡下人”。因此，在选择“军事专家”和“红色指挥官”的建议时，他通常无条件地倾向于前者的意见。

与此同时，尽管他们所受的普通教育和军事教育存在种种缺陷，但与那些在日俄战争和世界大战的经验中成长起来的前沙皇军官相比，红军队伍的指挥官们对分散战线条件下战争的特殊性做出了更为生动的反应。布琼尼（尽管不无得意）不无道理地嘲笑白卫军官的公式化思维倾向。第一骑兵军司令指出：（军事知识分子）“恪守法规”，“就像一堵盲目的墙”，“在我们以不符合法规的方式行事的所有情况下，白卫军指挥部都失去了冷静和报复的能力。有时，在形势和常识的驱使下，最简单的行动也会使局面陷入僵局”。

事业的利益要求将军事理论、世界战争经验和内战作战行动分析和谐地结合起来。但军事专家与红军指挥官之间的矛盾演变成了尖锐的冲突，尤其是在托洛茨基于 1918 年秋天访问南线之后。

1918 年下半年，察里津方向是军事行动最重要的地区之一。总体而言，向察里津方向推进的白军有 1.2 万名步兵和 6000 名骑兵。根据卡库林的计算，防守察里津的红军部队拥有“31649 把刺刀、7816 把马刀、240 门火炮、1005 挺机枪和 13 辆装甲列车”。这些兵力比 1918 年 8 月至 9 月在喀山附近作战的“军队”多出许多倍。

察里津的战略重要性并不逊色于喀山，甚至可能更胜一筹。毕竟，察里津的陷落会切断俄国中部与粮食和其他食品的最后来源。正是为了向俄国中部提供粮食，斯大林才从莫斯科派人前往这座城市。此外，察里津的陷落会使南方的白军与东部的白军会合。

受中央委员会委托控制南线的斯大林、守卫察里津的第 10 军军长伏罗希洛夫和南线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米宁努力阻止白军。托洛茨基乘坐装甲列车在激烈

[298]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2006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二十九章 在国内战争‘军事学院’里学到的东西”校对。

的战斗中抵达南线，与在斯维亚日斯克一样，他试图指挥战斗行动，但遭到拒绝。事实上，在南线，他面对的不是像 1918 年夏天在伏尔加河畔由瓦采蒂斯仓促组建的部队，而是成熟的军事组织。行动的规模也更大。最后，斯大林在南线，作为党中央政治局和“内阁”的成员，他可以反驳托洛茨基的行动。正如多伊彻所说，“伏罗希洛夫拒绝按照托洛茨基制定的命令重组部队”。伏罗希洛夫的立场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

此时，察里津方向的战斗最为激烈。领导层的变动，尤其是对指挥官的军事法庭审判（正如托洛茨基所坚持的那样），可能会对前线的命运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在 1918 年 10 月 3 日给列宁的电报中，斯大林把托洛茨基的“电报命令”说成是“一个不了解南方阵线的人写的”文件。斯大林宣称，“我们认为执行托洛茨基的命令是犯罪”，并要求“党中央委员会在中央全会上讨论托洛茨基的行为问题,.....不能允许托洛茨基发布一个人的命令,完全不顾地点和时间的条件,威胁前线的崩溃”。

斯大林在同一天写给列宁的信中提醒他，托洛茨基是布尔什维克的局外人。他写道：

> “我不是说昨天才入党的托洛茨基试图向我传授党的纪律如何如任何，而是他显然忘记了党的纪律不是表现在正式命令上，而首先是表现在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上”。

托洛茨基则在 10 月 4 日给列宁的电报中坚持要求斯大林从察里津召回。同时，他威胁要对伏罗希洛夫和米宁进行审判。斯大林被迫在 10 月 5 日的激战中离开察里津，但一到莫斯科就得到了列宁的支持。因此，斯大林于 10 月 8 日进入共和国军事革命委员会。1918 年 11 月 30 日，以列宁为首的工农国防委员会成立，这也证明了托洛茨基在军事事务领导地位上的削弱。托洛茨基与斯大林、铁路运输人民委员涅夫斯基、粮食副人民委员布留哈诺夫、红军供给特别委员会主席克拉辛一起，仅作为委员之一加入了该委员会。

但托洛茨基并没有停止与“察里津派”的斗争。据多伊彻称，托洛茨基在向苏维埃代表大会提交的十月革命一周年纪念报告中，“不遗余力地描绘了第 10 军的状况”。似乎共和国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在于第 10 军及其领导层。当然，察里津方面军在组织方面也有自己的缺陷，包括“红色指挥官”的自负造成的缺陷。然而，对这些军队的行动评价如此之低是很不公平的，因为这些军队迄今为止成功地守住了这座城市的防线，而这座城市在向中俄国供应粮食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夸大“察里津派”的罪过是托洛茨基压制红军中对其领导方法日益增长的抵触情绪所必需的。

由于对托洛茨基作为红军领导人的活动不满，“军事反对派”应运而生。“军事反对派”团结了出于各种原因反对“军事革命委员会”路线的人，因此具有松散和矛盾的特点。其领导人之一斯米尔诺夫捍卫游击队式战斗行动所特有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军事反对派”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是“察里津人”（伏罗希洛夫和米宁），他们谴责“过度”使用军事专家的做法。

1918 年 11 月至 12 月，《真理报》发表了索林的文章《现役军队中的司令员和政委》和“察里津人”卡缅斯基的文章《是时候了》，对积极招募军事专家担任指挥职务的做法提出了质疑。这些文章在《真理报》上的发表表明，该报主编布哈林和其他前“左派共产党人”支持对使用军事专家的批评态度。托洛茨基遭到了中央委员斯米尔加和中央委员会军事部部长拉舍维奇的反对，他们向中央

委员会成员散发了一封信，对托洛茨基下令枪杀政委和指挥官表示愤慨。

托洛茨基不得不在给中央委员会成员的一封特别信中解释自己的行为。他为自己下达的枪决命令的公正性进行了辩护。托洛茨基特别谈到了利用军事专家亲属作为人质的制度。他解释说：

“根据他的命令，政委必须有一份军官家属的名单，这样他们就知道，如果他们抵抗，他们的亲属就会受到迫害”。

当一名军官去叛逃到白卫军阵营时，发现“政委没有注意准备他们的家属名单”。托洛茨基随后写道，“犯有这种粗心大意罪的共产党员应该被枪毙”。托洛茨基没有否认这一说法，也没有收回他的话。他只是澄清说，在提出新的枪决建议时，他个人并不是指斯米尔加和拉舍维奇。

尽管托洛茨基试图降低反对其政策的抗议强度，“军事反对派”还是为下一届党的八大准备了自己的纲领（斯米尔诺夫报告的论点）。在白军开始主动进攻之前，在内战期间出现了反对武装部队领导层的党内知名人士和军事指挥官，这对党和国家的内部政治动荡构成了威胁。此外，在大会开幕前夕，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突然去世。党中央政治局现在由三人（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组成，其中两人与站在“军事反对派”前列的“察里津”集团持极端对立的观点。

为了使党内冲突“缓和化”，可能在列宁的参与下采取了一些措施。起初有人提议，军事领导人（其中许多人是“军事反对派”成员）在大会期间不得离开前线。然而，这一提议激起了激烈的不满。于是，在大会召开前两天，托洛茨基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前往东线。后来他愤愤不平地写道：

“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最近告诉我，好像我甚至不敢出席第八次代表大会，以便不听批评。这与实际情况相差得多么畸形啊！”

托洛茨基引用了 1919 年 3 月 16 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的摘录：

“列夫-托洛茨基抗议把中央委员会的命令解释为‘诡计’，并指出从乌法和更西面发动进攻的形势极为严峻，坚持要他离开”。

会议记录的执行部分记录了这一决定：

“列夫-托洛茨基立即前往前线”。

虽然从会议记录的文字中看不出托洛茨基是为了不激化矛盾而被迫在大会开幕前一天离开莫斯科的。显然，这是由于最高层在大会开幕前达成了妥协。这不仅表现在托洛茨基不再与对其政策不满的代表们进行可能的激烈解释，也表现在斯大林立场的转变，他坚决反对“军事反对派立场”，他说：

“.....或者我们建立起一支有严格纪律的真正的工农正规军而保卫住共和国，或者我们不这样做而使我们的事业遭到毁灭。

……斯米尔诺夫提出的草案是不能采纳的，因为这个草案只能破坏军队的纪律和取消建立正规军的可能性”。[299]

正如“军事反对派”的主要共同报告员斯米尔诺夫所指出的那样，由于这些政治花招，“分歧问题”被简化为“一些人似乎支持游击队，而另一些人则支持正规军”。这正是索科尔尼科夫在他的报告中提出的问题，他在报告中概述了托洛茨基的论点。斯米尔诺夫试图扩大讨论的范围，他说：

“共和国革命委员会和其他中央机构的组织应得到最认真的关注.....我们应该注意到，中央机构极其臃肿，它们之间的职能分配极不明确，导致发布的命令相互矛盾”。

[299] 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军事问题的演说摘要》，《斯大林全集》，第 4 卷。

与此同时，在斯米尔诺夫的报告和其他“军事反对派”支持者的发言中，对个人指挥的批评占据了重要位置，这是正规军所必需的命令，这使得“军事反对派”的纲领很容易受到批评。

尽管如此，在代表大会军事部分的非公开会议上讨论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政策时，许多代表还是点名批评了托洛茨基。正如《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中指出：

> 大会的许多代表尖锐而正确地批评了中央军事机构和托洛茨基同志作为共和国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的活动。他们指出，托洛茨基同志和军事机构的其他领导人不了解前线的情况，不召集军队的共产党员，不与他们商议。代表们说，托洛茨基在出访期间，一连串的‘取消’、‘补充’、‘更改’命令和指示让大家不知所措，给战斗管理带来了混乱。代表们在发言中抗议托洛茨基同志盲目信任旧军事专家的路线，抗议他企图削弱党组织和军事委员的作用，反对不经过阶级成分审查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动员入伍”。

列宁在部门发言中谴责了“军事反对派”关于雇用前沙皇军官的虚无主义观点，强调说：

> “现在，首要问题是应该有正规军，应该过渡到拥有军事专家的正规军。你们在提纲中，一方面说：我们是赞成军事专家的；另一方面，又说要由集体指挥，你们自己否定了自己”。[300]

尽管列宁和中央委员会领导层的其他成员谴责了“军事反对派”的论调，但军事部门的大多数与会者（37 票对 20 票）支持这一纲领，这表明了对托洛茨基领导作风的不满。于是，少数派要求将讨论转移到大会的非公开会议上进行。虽然批准托洛茨基政策的整个决议获得了多数票，但相当多的反对票（174 票赞成，95 票反对）本身就证明了代表大会代表对通过的决定普遍不满。

此外，大会还多次批评了党的领导权力不受控制地集中在个人手中的做法。这些批评是在评价斯维尔德洛夫的活动时提出的。

由于苏维埃共和国的局势日益恶化，克服决策中的主观主义显得尤为迫切。白军在苏维埃共和国外围积蓄了一年半的兵力，正准备发动决定性的进攻。高尔察克的军队向东推进，可能会与北部的白军和南部人数更多的邓尼金的军队会师。截至 1919 年 3 月 1 日，共和国 8500 公里长的战线上共有 38.15 万名红军士兵，装备有 6561 挺机枪和 1697 门火炮。尽管兵力相对薄弱，东方方面军司令卡缅涅夫还是赞成对高尔察克的军队发动广泛的反攻。4 月底，东方方面军司令部计划从南面发起的打击取得了预期效果。

在一次成功的进攻中，在瓦采蒂斯的坚持下和托洛茨基的命令下，卡缅涅夫突然被解除了东线指挥官的职务。新任司令员萨莫伊罗下令将在南翼顺利推进的第 5 军调往前线北部。正如卡库林所说：

> “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第 5 军主力向北急转弯是不必要的，因为在南方集团军新胜利的影响下，敌人开始投降，并在其北部作战方向投降”。

新任方面军司令员的行动有可能破坏红军的成功攻势。图哈切夫斯基在给萨莫伊罗的信中建议他“遵守 1918 年《野战条令》第 19 条的规定”，即“在下达命令之前，应该考虑一下”。

但显然，红军东进攻势的中止并非萨莫伊罗的失误所致，而是托洛茨基和瓦采蒂斯计划的一部分。后者担心卡缅涅夫的军队在越过乌拉尔山后会落入圈套，托洛茨基也有同感，同时希望根据国际形势暂停东进攻势。正如多伊彻所指出的，

---

[300] 列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6 关于军事问题的讲话”，《列宁全集》，第 36 卷。

此时托洛茨基更渴望清除欧洲俄国的白卫军，而不是将苏维埃政权扩展到西伯利亚。

“当时有新的变化：匈牙利和巴伐利亚刚刚成为苏维埃共和国，列宁敦促红军与苏维埃匈牙利建立联系，尽管东加利西亚的波兰军队正在关闭通往匈牙利的道路。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托洛茨基希望减少在东线的投入。由于卡缅涅夫没有放弃他的追击计划，托洛茨基解除了他的指挥权”。

托洛茨基计划的实现将有助于高尔察克守住西伯利亚和远东。此外，试图将红军转向西方可能会导致苏维埃政权的全面崩溃。但托洛茨基的行动显然不是出于对“最高统治者”和其他白军将领命运的担忧。红军部队突破波兰进入匈牙利，再经奥地利进入巴伐利亚，这符合托洛茨基关于十月革命应发挥的作用的想法。红军在 1919 年年中进入匈牙利和德国，将使其士兵成为西欧的“拉脱维亚步枪兵”，这将对这些国家的革命进程和世界事件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红军无论是在突入西欧的过程中，还是在与欧洲国家数量和质量都占优势的军队的进一步战斗中，都会遭受巨大损失。

显然，在党员和红军指挥官中公开讨论这样的行动计划可能会引起那些首先考虑俄罗斯利益而不是欧洲联邦利益的人的强烈抗议。同时，许多关心俄国的前沙皇军官和红军指挥官可能会联合起来反对具有国际意识的冒险家。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托洛茨基暂停东线进攻的计划采取了一种隐蔽的形式，即萨莫伊罗指示将南方集团军群的部队调往北方。

由于东线各级指挥官的强烈抗议，在他辞职 20 天后，即 5 月 25 日，卡缅涅夫再次被任命为前线指挥官。5 月 29 日，列宁给方面军军事革命委员会发电报说：

“在你们的坚持下，卡缅涅夫再次被任命。如果我们不能在冬季之前征服乌拉尔，我认为革命的死亡将不可避免”。

然而，后来列-达-托洛茨基承认了他在东线的行动计划的“错误”，强调他与卡缅涅夫的分歧是“纯粹实际的”。

东线攻势取得成功的同时，红军也在邓尼金军队的进攻下向南撤退。虽然在 1919 年 5 月至 6 月间推进的白军数量不多（10 万人），但与之对抗的部队在数量上（6 万人）和质量上都更弱。

尤登尼奇于 5 月开始对彼得格勒发动进攻，使困难进一步加剧。5 月中旬，斯大林被派往彼得格勒组织击退尤登尼奇部队的行动。6 月 10 日，中央委员会确认“彼得格勒方面军的重要性居首位”。中央委员会指令如下“从东线撤出的师，2/3 给彼得堡，1/3 给南线”。6 月 21 日，红军发起进攻，消除了对彼得格勒的威胁。

托洛茨基自 1919 年 5 月以来一直在南方阵线。历史学家安德烈亚-格拉齐奥西在其《乌克兰的布尔什维克与农民》一书中指出：

“托洛茨基的到来意味着旨在将红军及其游击队转变为正规军的措施急剧收紧”。

然而，这位历史学家认为，这种态度的“粗暴和机械应用”忽视了乌克兰的具体情况。

托洛茨基反对“游击主义”的行动导致“席卷整个地区的起义数量增加”。托洛茨基的政策导致了与马赫诺部关系的恶化，而马赫诺支队此前一直与红军结盟。格拉齐奥西认为：

“清算马赫诺的决定”，“为邓尼金扫除障碍.....5 月 26 日，尽管安

东诺夫-奥夫先科提出抗议，而且有报道称邓尼金正在推进，但一些最可靠的军事特遣队还是投入了对马赫诺派的镇压.....邓尼金.....有机会巩固和扩大战果”。

6月下半月，邓尼金的部队逼近哈尔科夫。托洛茨基在哈尔科夫工农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全会上发表讲话，要求把哈尔科夫“和通往哈尔科夫的道路变为防御区”，扩大和深化哈尔科夫无产阶级的动员，并把军事革命委员会置于哈尔科夫工业区的领导地位。然而，正如卡库林所指出的，“这些措施并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因为从本质上讲，它们纯粹是临时起意”。6月25日，志愿军在梅-马耶夫斯基指挥的志愿军于进入哈尔科夫。

1919年6月30日，白军攻占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和察里津，在第聂伯河至伏尔加河一线迅速发起攻势。

托洛茨基在7月1日的电报中承认了前线的崩溃和他惯用的部队管理方法的无能：

“无论是鼓动还是镇压，都无法使一支赤脚、无衣、挨饿的烂军队做好战斗准备”。

几天后，托洛茨基抵达莫斯科。多伊彻写道：

“这是他在内战期间坠落的最低点。他已经认识到，当他反对追击高尔察克时，他对东线的判断是错误的。现在，他不得不为自己对乌克兰方面军的拙劣领导回应责难”。

历史学家格拉齐奥西和亚当斯认为：

“托洛茨基在邓尼金的突破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无论如何他在乌克兰任务的失败.....可以被认为是他在1919年7月与列宁决裂的原因之一，这对接下来三年的事件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很有可能列宁当时认为托洛茨基在某种程度上对战败负有责任，并越来越倾向于斯大林的观点”。

回到莫斯科后，托洛茨基得知斯大林提议用卡缅涅夫取代瓦采蒂斯担任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这一提议于7月8日被接受。多伊彻通过托洛茨基的视角对局势进行了评估，他指出：

“顺便说一句，斯大林本人成功地领导了彼得格勒对尤登尼奇的保卫战，他正沉浸在最近胜利的荣耀之中”。

意识到共和国绝境的斯大林不可能有时间去回味对尤登尼奇的胜利。然而，多伊彻对托洛茨基心情的描述或许正确地解释了“军事革命委员会”随后的行动。7月3日，中央委员会决定解除瓦采蒂斯的职务，托洛茨基在斯维亚日斯克的朋友斯米尔诺夫、罗森戈尔茨和拉斯科尔尼科夫也被军事革命委员会开除，此后托洛茨基辞去了所有职务。

这是托洛茨基在苏维埃执政20个月内的第二次辞职。很明显，托洛茨基认为他的“团队”的解散是比红军在南线的失败更可怕的失败。与布列斯特战役失败时一样，托洛茨基只想到了自己的政治命运，与1918年2月至3月一样，辞职请求对托洛茨基来说只是一个借口，让他被长期乞求回去。

然而，尽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托洛茨基的军事政策已经崩溃，但他不仅没有离职，反而被恳求留下来。1919年7月5日通过了一项由列宁、加米涅夫、加里宁、谢列布里亚科夫、斯大林和斯塔索娃签署的决定，宣布中央组织局和政治局不能“接受托洛茨基的辞职，他们绝对无法满足他的请愿”。很明显，国家领导层害怕让继列宁之后党和国家的第二位领导人退休。将托洛茨基置于领导层之外，执政党就会成为对列宁及其支持者不满的势力的潜在重心。而这在内战期间

是极其危险的。

正如他在布列斯特惨败后被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致推选为中央委员一样，托洛茨基再次得到了他不可或缺的证据。该决定指出：

“托洛茨基的辞职.....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托洛茨基的辞职.....将是对共和国的最大伤害”。

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甚至宣布，他们打算给托洛茨基“充分的机会，让他通过一切手段来纠正他认为在军事问题上的路线，如果他愿意，还可以努力加快党代表大会的召开”。为了满足军事委员的愿望，组织局和政治局宣布，他们将“竭尽全力使托洛茨基最方便、使共和国最富有成效地开展南方战线的工作，这是目前最困难、最危险、最重要的工作，也是托洛茨基自己选择的工作”。

托洛茨基证实，在这些日子里，列宁给了他“一张表格，并在页底写下了以下几行字”：

“同志们，我深知托洛茨基同志的命令的严格性，我绝对相信托洛茨基同志所下命令的正确性、权宜性和对事业有利的必要性，因此我全心全意地支持这一命令。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1919 年夏，托洛茨基负责指挥红军，他只有接受列宁的全权委托才能在战斗中取得成功。托洛茨基一直控制着南线，这暴露了他无力阻止邓尼金军队的推进。列宁再次开始公开对托洛茨基的活动表示不满，并理所当然地“怀疑托洛茨基试图在南方方面军指挥官的眼中败坏新总司令的名声”。

1919 年 8 月 5 日，托洛茨基为中央委员会准备了一份秘密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他仿佛是在重复保罗一世给阿塔曼-普拉托夫的命令，提出了一个红军从俄国向印度突围的疯狂计划，这证明托洛茨基的军事战略思想已经完全陷入僵局。正如多伊彻所强调的，托洛茨基的决定受到了两种情况的影响。一方面，在起草备忘录时，他认为苏维埃政权不可能守住俄国的欧洲领土。另一方面，从印度传来了圣雄甘地领导的非暴力反抗运动的消息。“这一系列事件激发了托洛茨基的政治想象力，并将他引向了一个奇怪的方向”。

托洛茨基建议将“乌克兰党内最优秀的分子派往西伯利亚，这些人现在由于他们无法控制的原因而被从苏维埃工作中解放出来。如果他们失去了乌克兰，那就让他们为苏维埃革命征服西伯利亚吧”。托洛茨基指出：

“欧洲革命似乎被推后了。绝对毋庸置疑的是，我们自己已经从西方转向东方。从这一变化出发，必须改变方向”。

因此，他建议提出准备“亚洲方向的要素，特别是.....对印度进行军事打击，以帮助印度革命”的问题。

托洛茨基保证说：

“亚洲能成为近期发生起义的舞台，我们的任务是在时间.....对我们的国际定位的重心进行必要的转移。如果说骑兵在内战演习中的重要性正如经验所证明的那样，那么它在亚洲行动中的作用似乎无可争议地具有决定性。几个月前，一位严肃的军事工作者提出了建立一个军团（三万到四万骑兵）并将其派往印度的计划”。

托洛茨基接着说，“当然，这样的计划需要充分的准备，包括物质上和政治上的准备”。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建议——

“把亚洲革命的革命学院和政治总部设在乌拉尔或突厥斯坦某地，它在不久的将来会比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更有效。现在就需要利用我们所能利用

的一切手段和方法,着手在这方面进行更加认真的组织工作,把语言学家、翻译书籍的人的必不可少的力量集中起来,并吸收当地的革命者来参加”。[301]

也许，托洛茨基把自己想象成了无产阶级的成吉思汗，准备进行一场宏大的冒险，与之相比，即使是突入苏维埃匈牙利，看起来也是一项安全可靠的事业。

此时，共和国的军事和政治领导层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迄今为止已经存在的击败邓尼金的计划，即从察里津经由顿河草原向新罗西斯克发起侧翼进攻的恶毒性。每个在 30-50 年代上过苏联历史课的人，都从教科书上清楚地知道，托洛茨基发明了这一计划，斯大林反对另一个打败邓尼金的计划，建议通过哈尔科夫、顿巴斯和罗斯托夫实施主要打击。一个成功的小学生可以很容易地解释为什么托洛茨基的计划不好（“红军将通过哥萨克人聚居的地区，其中一些地区受到白卫军的影响”），为什么斯大林的计划好（“红军将通过工人阶级地区”）。当时几乎没有小学生知道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第二个计划的作者身份提出过异议。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是侧翼进攻的作者，而他托洛茨基则赞成正面进攻。

显然，打败邓尼金的详细计划是由比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受过更全面军事训练的人制定的。然而，还应考虑到，在红军开始对邓尼金发动进攻时，不是托洛茨基，而是斯大林从党的领导层控制着南线的行动。有文献证据表明，斯大林极力维护“正面进攻”计划。在 1919 年 10 月 9 日给列宁的信中，他详细列举了这一计划的优点，甚至威胁说如果他不同意，就辞职：

“如果不这样做，我在南线的工作就会变得毫无意义、罪恶、不必要，这使我有权，或者说有义务去任何地方，甚至去地狱，但不能留在南线”。

针对邓尼金军队的进攻计划在斯大林的极力维护下获得通过，1919 年 10 月 14 日，红军在奥廖尔附近发起进攻。10 月 20 日，这座城市被攻占，4 天后，布琼尼的骑兵军团（不久后改编为第一骑兵军）攻占了沃罗涅日。邓尼金军队的失败开始了。

而托洛茨基此时却不在南线，因为他被派往彼得格勒，那里正再次遭到尤登尼奇部队的进攻。虽然白军只有 8000 名步兵、100 名骑兵、24 门火炮和 3 辆坦克，但红军还是努力集结了一支足以保卫城市的部队。尽管彼得格勒动员了 1879 年至 1901 年出生的工人，但红军只能以 15000 名步兵和 1000 名骑兵抵抗进攻者。他们有 200 门火炮。尤登尼奇的部队起初比五月份推进得更快，占领了巴甫洛夫斯克、察尔斯科耶塞洛，并抵达利戈夫。

10 月 16 日，托洛茨基在前往彼得格勒的途中制定了保卫彼得格勒的计划。他列举了本人在内战中使用的主要方法，并写道：

“同往常一样，这次我们通过组织性、煽动性和惩罚性的措施取得了必要的突破”。

托洛茨基认为，逼近彼得格勒郊区的白军将向北方首都进攻，因此他建议在巷战中击败尤登尼奇的部队。

托洛茨基只依靠 1905 年 12 月莫斯科事件的经验。他写道：

“如果我们还记得，1905 年 12 月，邓巴泽上将用了几乎整整一个星期才征服莫斯科，尽管当时整个莫斯科的革命武装分子不超过一千人，他们还占领了一些重要的建筑物，那么很明显，在彼得格勒，几千名进攻的白卫军在一两天内就会被完全驱赶、消耗殆尽。任何合理的内部防御组织都会被一网打击和摧毁。而在此期间，来自外部的足够援军将有时间到达”。

---

[301]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2006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二十七章 歼灭邓尼金的军队”校对。

与1905年12月革命者和惩罚者在普雷斯尼亚的战斗进行类比是非常不可靠的。与邓巴泽的惩罚者不同，尤登尼奇的部队不会试图摧毁所有小股抵抗力量，而是会试图夺取彼得格勒的关键地点，就像1917年10月赤卫队所做的那样。尤登尼奇的部队装备精良、纪律严明，完全可以完成这一任务。

托洛茨基认为，优先事项应包括：在通往市中心的所有街道上设置便携式铁丝网障碍物，在建筑物的高层建立手榴弹兵小组，建立手榴弹储备库，修建路障和战壕等。他甚至提出了一个色彩鲜艳的口号：

> “如果白军闯入城市，他们将在这里蒸发，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消失”。

托洛茨基并不完全确定他的计划是否可行，因此认为有必要“拟定把军队和工人向东南方向撤退的计划，这是挽救彼得格勒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免遭全歼的惟一出路”。[302]

托洛茨基在描述他抵达彼得格勒后的活动时，提请人们注意该市普遍存在的恐慌情绪。他声称，当他抵达彼得格勒时，他发现了“最严重的惊慌失措”。托洛茨基毫不夸张地说，“季诺维也夫是惊慌失措的放射源”，[303]他是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市国防委员会的领导人。托洛茨基说：

> “斯维尔德洛夫曾经对我说：‘季诺维也夫就是惊慌失措’。斯维尔德洛夫很善于识人。事实的确如此：在一切都顺利的时期，用列宁的说法是在‘平安无事’的时候，季诺维也夫就得意地飘上天了；而一旦势头不妙，季诺维也夫马上就会躺到沙发上唉声叹气，这样说可不是比喻，而是事实”。[304]

托洛茨基像1918年8月在斯维亚日斯克一样活跃。他向奔赴前线的士兵发表了演讲。他的防御计划开始付诸实施。托洛茨基回忆说：

> “重要的地段布上了铁丝网，选好了炮兵阵地，并预先标定了射击的目标。在广场和最重要的交叉路口部署了约60门大炮，并把它们掩蔽起来。河岸街道、街心花园、墙壁、栅栏、房屋都成了防御工事，在郊区和涅瓦河沿岸都挖了战壕。整个城市的南部变成了一座堡垒，在许多街道和广场上修建了街垒”。[305]

幸运的是，托洛茨基的计划没有为北方的首都和居民带来好处，尤登尼奇在彼得格勒郊外被阻击。

与往常一样，托洛茨基依靠的是严厉的命令。托洛茨基在10月18日的命令中要求“在极度惊慌失措的地方，禁止谎报残酷战斗的情况。谎报军情以叛国罪论处”。[306]根据拉舍维奇的证词，托洛茨基还采取了组织行动：

> “更换了中高级指挥官。托洛茨基的命令.....没有给任何人造成阴影.....表明有一只坚定的指导之手”。

托洛茨基并不局限于书面命令，他亲自前往前线。他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自己是如何“在整个国内战争期间是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充当了一次团长的

---

[302]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二卷 第三十五章 保卫彼得格勒”，2005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303]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二卷 第三十五章 保卫彼得格勒”，2005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304]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二卷 第三十五章 保卫彼得格勒”，2005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305]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二卷 第三十五章 保卫彼得格勒”，2005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306]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二卷 第三十五章 保卫彼得格勒”，2005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角色”。

“当溃退的部队乱作一团涌进驻扎在亚历山德罗夫卡的师指挥部时，我骑上顺手牵来的一匹马就来回地跑着让部队向后转。最初的几分钟曾引起了一阵混乱，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明白是怎么回事，有些人继续溃逃。我骑着马把他们一个一个地追回来，这时候我才注意到，我的传令兵科兹洛夫正紧紧地跟在我身后飞奔。他是莫斯科近郊的一个农民，在旧军队里当过兵。他像喝醉了一样，手里拿着纳甘式左轮手枪在退却的士兵中跑来跑去，不停地重复我的命令。他挥舞着手枪扯着嗓门大声喊着：

‘弟兄们，别害怕，现在是托洛茨基同志在率领你们……’

这时大家以刚才撤退的速度转入了进攻，没有一名红军战士畏缩不前。大约跑了两俄里，耳边传来了可恶的子弹的呼啸声。冲在最前面的人受伤倒下了，团长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总是出现在最危险的地方。全团刚刚收复先前放弃的阵地，团长的双腿就受伤了。我坐着卡车返回司令部，沿途收容着伤员。已经给了他们必要的动力，我深深地感到，我们能够保住彼得格勒”。[307]

在不排除托洛茨基的许多行动对红色彼得格勒的保卫者有用的情况下，我们很难相信托洛茨基的故事，因为从他的故事中可以看出，他几乎以一己之力在五天内阻止了红军的撤退，并组织了红军于 10 月 21 日开始的成功反攻。

1919 年底至 1920 年初，随着邓尼金、尤登尼奇和高尔察克军队的失败，红军在各条战线上的攻势宣告结束。胜利之际，托洛茨基被授予红旗勋章。彼得格勒也获得了同样的勋章。斯大林也获得了同样的勋章，这让托洛茨基很不高兴。多伊彻写道：

“托洛茨基很恼火，他很快写道：‘至于彼得格勒，他确实当之无愧.....’当奖项颁给他人的时候，错误是有可能发生的”。

但内战尚未结束。在土耳其城墙后的克里米亚，白军依然存在，邓尼金辞职后，由弗兰格尔将军领导。1920 年 4 月 25 日，装备精良的波兰军队（6.5 万官兵）与彼得留拉率领的部队一起向乌克兰发起进攻。他们只遭到 2 万名红军战士的抵抗。5 月 6 日，波兰和彼得留拉的部队占领了基辅。与此同时，7.9 万波兰军队在白俄罗斯发动了进攻。

5 月 8 日，托洛茨基抵达斯摩棱斯克西线司令部。同一天，他在一支部队的集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在讲话中宣称：

“西线的士兵们！红色基辅已落入波兰强奸犯的魔爪……要摆脱枷锁和束缚，只有一个办法：给资产阶级贵族部队以决定性的、无情的、粉碎性的打击……你们中间不要有犹豫不决和优柔寡断的人！让死亡之手重重地落在每一个在兄弟们危难时刻背叛他们的懦夫和逃兵身上！……西线的战士们，前进！”

第二天，托洛茨基在指挥部参谋会议上发言时保证说，“西线情绪变化取得彻底和最后胜利的必要条件尚未达到”。他要求对红军进行适当的补给。他还说，“必须更好地进行鼓动”。与此同时，托洛茨基还呼吁建立“督战队，以便每支主要的军事部队在其背后至少有一个薄而坚固的督战队网……年轻的士兵第一次掉进火坑，想从火坑里逃出来，就必须遇到一双有力的手，把他强行拉回来，并警告他要严惩所有违反军事职责的人。逃跑的懦夫必须撞上左轮手枪或刺刀”。

---

[307]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二卷 第三十五章 保卫彼得格勒”，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5 月 10 日，托洛茨基起草了一份“在戈梅利地区打击逃兵的命令”，他在命令中宣称：

“在戈梅利地区对逃兵进行严厉报复的时刻已经到来！”

根据该命令——

“对那些不对波兰豪绅的走狗、叛徒、卖国贼和代理人采取措施的人应予以逮捕并送上法庭”。

命令写道：

“窝藏逃兵的家庭，无论是否送交法庭，都必须受到财产处罚（没收马匹和其他牲畜等）.....在所有地区组织法庭现场会议，并规定法庭的职责是当场无情地处理顽固的逃兵……听着，农民和工人们！你们的工农共和国正面临着致命的危险！谁在危险时刻背叛工人，谁就没有荣誉可言！逃兵、叛徒和卖国贼去死吧！

共和国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

同一天，托洛茨基在戈梅利的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说，确定了反对波兰干涉运动的目标：

“战争是无法避免的。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砍掉掠夺性的波兰鹰的头，从而帮助波兰工人和农民在波兰共和国的上空举起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上，将和我们一样，是劳动的象征！”

托洛茨基后来在回忆录中断言，他意识到将防御战“转变为进攻性革命战争”的困难。他声称，不是他，而是列宁“形成了一个坚定的计划，即把战争进行到底，向华沙挺进，以帮助波兰工人群众推翻毕苏斯基政府，夺取政权”。[308]然而，事实表明，托洛茨基是“进军华沙”最积极的支持者之一。

5 月 4 日，西线攻势开始，5 月 23 日，托洛茨基代表政治局撰写的论文《波兰战线和我们的任务》[309]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发表。这些论文表达了这样的信念：波兰资产阶级将被红军打败，“波兰无产阶级将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因此，托洛茨基宣布军事行动的目标不仅是从波兰侵略者手中解放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而且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扩展到波兰。

几天后，另一位政治局委员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协约国对俄国的新进攻》一文，对红军在这场战役中的任务表达了有些不同的看法。一方面，他强调了红军在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居住的土地上开展的战役的解放性质。他写道：

“波兰军队越出波兰境界，深人和波兰毗邻的地域，这样就远离了本国的后方，削弱了同后方的联系，陷人异族的而且大部分是敌视他们的居民中间。更糟糕的是，这种敌视日益加深，因为和波兰毗邻的地域的……绝大多数居民是受波兰地主压迫的非波兰农民……这也就说明，为什么苏维埃军队的‘打倒波兰地主！’的口号在上述各地域的大多数居民中得到了强烈的反应，为什么这些地域的农民把苏维埃军队看做是使他们摆脱地主束缚的解放者，为什么他们等待苏维埃军队的到来，并且一有适当机会就举行起义，从后方打击波兰军队”。

另一方面，斯大林对红军深入波兰的危险发出警告：

“波兰军队的后方（这里指波兰人居住的地方。——作者注）是单纯的，

---

[308]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二卷 第三十七章 在军事战略问题上的分歧”，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309] 译者没有找到中文版的翻译。——译者。

民族方面团结的。因此，它的后方是统一的和坚固的。后方居民的普遍情绪——‘祖国情感’通过很多条线传到波兰前线在部队中造成了民族团结和坚定精神。因此，波兰军队是坚强的。当然，波兰后方的阶级方面不是单纯的……但是，阶级冲突还没有达到使民族一致的感情被冲破并使阶级状况复杂的前线发生矛盾的程度。如果波兰军队是在波兰本土活动，和他们作战无疑是困难的”。[310]

1920 年，托洛茨基显然不同意这种担忧。6 月 16 日，他发表了一篇题为《不坚持到底的人有祸了》的文章，谴责苏维埃西进缓慢。

同一天，列宁、加里宁、契切林、拉科夫斯基和托洛茨基签署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全俄中央执委和人民委员会宣言，他们在宣言中宣布要把波兰从资本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在这一态度的影响下，苏维埃政府开始对苏维埃俄国与波兰之间的和平谈判踩刹车，而这一谈判是在英国的调停下开始的。

在这些日子里，斯大林继续对把敌对行动转移到波兰统治区的计划表示怀疑。6 月 24 日，在与乌克兰罗斯塔社记者的谈话中，他对波兰人的大量储备和协约国的援助提出了警告。他宣称：

“某些同志所表现的那种骄矜和对事业有害的自满是不切实际的。其中一部分人不满足于前线的胜利，叫喊‘向华沙进军’，另一部分人不满足于只是防卫我们共和国，使它免受敌人进攻，傲慢地说，只有打到‘红色苏维埃华沙’他们才能罢休”。[311]

事实证明，斯大林的这些评价是公正的。波兰宣布动员所有年龄段的男子参军，并开始招募志愿兵。7 月间，573000 名动员兵和 160000 名志愿兵加入了波兰军队。7 月 21 日，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宣布，“法国和英国可以为波兰军队的组织提供一切必要条件”。

莫斯科方面对所有的事件都置若罔闻。苏俄方面停止了与波兰人的和平谈判。7 月 23 日，共和国总司令卡缅涅夫下令攻占华沙。据认为，波兰的胜利将导致资本主义欧洲的崩溃。同一天，即 7 月 23 日，列宁给斯大林发了一封电报：

“国际共运的形势非常好。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我本人都认为，我们应该立即鼓励意大利的革命。我个人的意见是，为此有必要使匈牙利苏维埃化，也许还应该使波希米亚（捷克）和罗马尼亚苏维埃化”。

8 月 4 日，劳合-乔治要求苏俄立即停止进攻，威胁要重新实施封锁，并将英国舰队派往俄国海岸。然而，在 8 月 5 日审议英国最后通牒的政治局会议上，托洛茨基向与会者保证：

“红军将在 8 月攻占华沙”。

托洛茨基的命令随后于 8 月 14 日下达，开头写道：

“英雄们，到华沙去！英雄们，你们给进攻我们的白色波兰以沉重打击……现在，和开战第一天一样，我们渴望和平。但要实现和平，我们必须让破产的波兰政府不再和我们捉迷藏。

红军，前进，英雄们，向华沙进发！

胜利万岁！

工农红军万岁！

共和国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 托洛茨基”。

---

[310] 斯大林《协约国对俄国的新进攻》，“二 后方。突击地域”，《斯大林全集》，第 4 卷。

[311] 斯大林《关于西南战线的情况》，“结论”，《斯大林全集》，第 4 卷。

8 月 14 日这一天，波兰军队向西线的两个军发起了反击。红军开始沿整个战线撤退。托洛茨基将失败归咎于斯大林。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将“华沙的灾难”归咎于斯大林。

> “不得不指出的是，造成华沙城下规模空前的灾难性失败的一个原因，是攻向利沃夫（伦贝格）的苏军南集团指挥部的行径，在这路部队的军事革命委员会里主要的政治人物就是斯大林。当斯米尔加和图哈切夫斯基已经兵临华沙城下的时候，斯大林却盘算着无论如何都要拿下利沃夫。有些人会有这样的野心也没什么可奇怪的！”[312]

托洛茨基歪曲了事件的实际过程，声称斯大林的野心挫败了对华沙波兰军队侧翼的打击。

斯大林证明了这些指控的虚假性，指出重新部署在利沃夫作战的第一骑兵队的命令下达得太晚了。然而，托洛茨基等人对他的指责显然说服了国家领导人。斯大林被从西南方面军召回，不久政治局批准了他的请求，解除了他作为该方面军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的职务。托洛茨基战胜了他的政治对手。

1920 年 10 月。苏维埃俄国与波兰签订了和约，条件远不如波兰人在 7 月提出的条件有利。与波兰的敌对行动停止后，红军指挥官得以向南调动部队，由弗兰格尔部队保卫的克里米亚很快被攻占。内战基本结束，只有远东的战斗一直持续到 1922 年底。

布尔什维克党打着内战胜利的旗号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毫无疑问，庆祝活动是完全有理由的。1917 年险些失败的布尔什维克党已证明有能力保住政权，并成为俄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布尔什维克政府几乎从零开始组织国家机器和武装力量，成功击退了对手无数次推翻政府的企图，并在三年内控制了前俄罗斯帝国几乎所有的土地。

显而易见，布尔什维克为巩固政权采取了粗暴野蛮的暴力手段。然而，白军也使用了同样的方法。白军失败的原因是不同的。正如邓尼金和苏维埃政权的其他敌人后来承认的那样，白军运动未能提出任何有意义和有吸引力的方案来解决导致 1917 年革命和内战的尖锐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白军未能在道义上凝聚反布尔什维克的力量。这表现在顿河哥萨克的各怀鬼胎和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不愿在白军中服役。

布尔什维克赢得了全国大部分人口的支持，首先是最有活力的部分——城市工人和农村穷人。与波兰的战争爆发后，许多其他有爱国心的人也站出来支持苏维埃政府。在绝大多数人消极怠工、不愿参加内战的时候，这些人的支持对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能够在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和富裕的社会的群众口号下团结群众。

苏维埃政权的胜利催生了“赤手空拳”的红军士兵战胜 14 个列强的干涉者和协约国白军将领的优势部队的神话。它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丘吉尔反复提到的“十四国武装干涉”的必要性从未发生过，侵略者认为在进入长期血腥斗争之前撤出俄国是个好主意。西方列强虽然在口头上表示支持白军，但实际上却向他们提供了微薄的、往往纯粹是象征性的援助，这一点没有被考虑在内，因为他们既不想要一个强大的苏维埃共和国，也不想要一个“伟大、统一、不可分割的俄罗斯”，而更愿意支持在帝国崩溃的外围形成的新国家。

内战中的战斗在军队人数和武器装备方面都比世界大战期间的俄军水平低

---

[312]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二卷 第三十七章 在军事战略问题上的分歧”，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几个数量级，因此红军战胜白军和民族分裂主义政府的军事编队并不能证明其具有非凡的能力。此外，与波兰的战争表明，在内战期间，如果苏维埃国家从西欧获得足够的援助，它甚至没有力量战胜从俄国分离出来的一个小国。

然而，“从英国沿海到西伯利亚，世界上红军最强大”[313]这一神话使苏联人民多年来一直士气高昂。自然，红军无所不能的神话也适用于其领导人。在同一首关于红军的歌曲中，人们唱到“军事革命委员会正带领我们投入战斗”，并听到这样的话：

> “随着喀琅施塔得的海军，托洛茨基同志，带领我们战斗至最后一滴血！”

托洛茨基被认为是胜利的主要创造者之一。工厂和企业都以他的名字命名。地图上出现了托洛茨基城，而不是加特契纳。托洛茨基的肖像成为官方机构内部和节日游行中不可或缺的装饰。演讲结束时很少不向托洛茨基敬礼，然后再向列宁致意。内战结束后不久，《红军章程》中增加了托洛茨基的政治传记，其标题是：

> “托洛茨基同志是红军的领袖和组织者。托洛茨基同志领导红军，带领红军战胜苏维埃共和国的所有敌人”。[314]

对托洛茨基的颂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对红军军事行动行使控制权的红军领导人。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同时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最高统帅和国防人民委员，而内战期间托洛茨基却没有这样的权力。与国防委员会类似的工农国防委员会由列宁领导。托洛茨基是该委员会的普通成员。苏维埃共和国的总司令轮流由瓦采蒂斯和卡缅涅夫担任。工农国防委员会和共和国总司令关于军事行动中许多最重要问题的决定都是在托洛茨基之外作出的，而且往往违背他的意愿。

还应考虑到，内战的性质严重限制了中央指挥部控制战场行动进程的能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才不断乘坐装甲列车前往内战的各个前线。虽然这种旅行使托洛茨基能够及时了解一条战线上的事务，但他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共和国其他战线上发生的事情。与 20 世纪的其他战争相比，集中控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战线拉得极长，战斗的机动性使单个编队甚至部队的指挥官有了更大的行动自由。因此，内战中涌现出了相当多的前线指挥官、军和师长，他们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这些年红军胜利的缔造者，如伏龙芝、科托夫斯基、什乔尔斯、布柳赫尔、法布里奇乌斯、布琼尼、帕霍缅科、科夫秋克、基克维泽、亚细亚、戈罗多维科夫、夏伯阳、杜缅科、米罗诺夫。（最后两人是奉托洛茨基的命令被枪决的）。

最后，我们有很多理由相信，托洛茨基在创建红军并取得胜利方面的功绩毋庸置疑，但他在部队管理方面的重大失误也是不争的事实。尽管托洛茨基从原沙皇军队中招募专业人员到红军中服役的做法无疑是合理的，但他没有充分考虑到内战与俄国在 20 世纪参与的其他战争之间的根本区别，因此他忽视了“红色指挥官”积累的实际经验，并以各种方式对他们进行了批评。虽然他希望通过火热的演说来提高红军战士的热情，这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显然喜欢把自己的前线之行戏剧化，这往往只会引起不必要的骚动。尽管在内战期间，他想通过严格的命令来执行纪律的愿望在很多方面是合理的，但很明显，他在无情的惩

---

[313] 是苏联军歌《红军最强大》的歌词。——译者。

[314]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2006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三十二章 同列夫·托洛茨基的搏斗”校对。

罚行动中失去了分寸感。托洛茨基的命令导致了许多指挥官的毁灭，他的命令成为枪杀民众、将他们关进集中营、将他们变成人质的理由，这些消息甚至震惊了他的许多同事，他们也不比托洛茨基死板，这也损害了苏维埃政权的形象。

此外，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托洛茨基是任何军事战略计划的制定者，这些计划导致红军取得了宏大的胜利。红军在内战期间成功实施的许多计划都是由高级军事专家制定的，如叶戈罗夫、邦奇-布鲁耶维奇、卡尔比雪夫、沙波什尼科夫、布鲁西洛夫等沙皇军队的将军和军官。托洛茨基发明的在彼得格勒巷战中击败尤登尼奇的计划风险极大，最终未能实现。他在南线反对“游击主义”的斗争促成了邓尼金的突破。他向华沙进军的命令被证明是不现实的。他想突破红军进入苏维埃匈牙利或印度的计划，坦率地说是冒险主义的。

军队工人特里福诺夫（著名作家的父亲）认为：

> “不是托洛茨基创建了军队，而是我们这些普通的军队工人创建了军队。托洛茨基试图在哪里工作，哪里就会立即出现恐慌。糊涂虫在有机体中是没有地位的，而军事就是这样一个有机体”。

然而，数百万苏联人民对红军不可战胜的信念和红军领袖的光环，却使“红色波拿巴”的神话得以延续。相信新的革命神话的愿望与当年的情绪是一致的。“革命恶魔”将领导无产阶级军队战胜世界资产阶级的信念鼓舞了数百万苏联人民。许多目睹过托洛茨基演讲的红军士兵或平民都以钦佩的口吻讲述了他们的印象。即使是那些从未见过或听过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的人，也被集会参与者的情绪所感染。

他们相信，托洛茨基和他们一样，是一个来自人民的人。托洛茨基在他的回忆录中引用的一个半轶事尤其证明了这一点：

> “在柏林出版的《俄国革命档案》中，作者博洛格瓦尔丁讲述了以下丰富多彩的小故事：‘一个哥萨克来找我们，有人故意污蔑他，说他现在在一个犹太人托洛茨基的指挥下服役和上战场，他激烈而令人信服地反对说：没有这样的事！托洛茨基不是犹太人。托洛茨基是一个战士。他是我们的俄国人！列宁，那个共产主义者，是个犹太人，但托洛茨基是我们的——一个战斗的俄国人——我们的！’”

作家伊萨克-巴别尔在《盐》一书中的主人公——一个红色哥萨克——的评价也非常有趣：

> “顺便说一句，我不能说列宁，但托洛茨基是坦波夫省长的私生子，他为工人阶级挺身而出，尽管他的阶级出身不同”。（内达瓦在评论这些故事时写道：“就民族而言，托洛茨基和列宁有时‘混淆不清’，在内战期间换了个民族出身——但只有在外省那些他们没有亲眼见过、亲耳听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的人才会流传这样的谣言。反之那些在现场看到和听到他们的人并没有弄错”）。

虽然红色阵营中的许多俄国人承认托洛茨基是“自己人”，但也有许多犹太人不承认托洛茨基。敖德萨犹太教堂甚至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将托洛茨基逐出犹太教，并宣读了相应的诅咒咒语。托洛茨基遭到了那些积极支持白卫运动的犹太人的反对。其中一些人在白军将领的政府中担任职务。大约 20 万犹太人跟随白军流亡。

托洛茨基在世界各国的许多同胞自豪地看到，托洛茨基是他们民族的儿子，成为了一个伟大国家的领导人之一。1920 年，拉什在美国报纸《犹太世界》上写道，表达了当时许多犹太人特有的情感：

“人们无法对托洛茨基下结论，只能说他是一个受过教育、研究过世界经济的人，是一个坚强、精力充沛的领导者和思想家，毫无疑问，他将作为我们民族改造世界.....的伟人之一载入史册。俄罗斯.....不会是一个乌托邦国家，但那里将建立一个完美的政府，就像那些毫无疑问极具天赋的精神理想主义实践者一样，他们现在正在用这种不完美的人类材料建设那里。其中一位领导人就是列夫-托洛茨基！”

犹太人普遍支持托洛茨基，无论其政治同情心如何，部分原因在于反苏组织实施的反犹大屠杀。后来，《布尔什维克苏维埃百科全书》证实，这些大屠杀的受害者仅在乌克兰就有约 20 万犹太人。宣传家扎克斯在《布尔什维主义与犹太人》一文中写道：

“现在所有与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的人（帕德雷维斯基领导的波兰、彼得留拉领导的乌克兰）都鼓励大屠杀。相反，布尔什维主义反对大屠杀。显然，托洛茨基比帕德雷维斯基更可取……让托洛茨基这样激进的犹太人担任政府首脑——我们的敌人会气得咬牙切齿、口吐白沫，但他们不敢动我们”。

扎克斯认为，托洛茨基的升迁证明了“古老犹太民族的力量和青春。如果犹太人推举出像托洛茨基这样让世界列强政府感到恐惧的领导人，那就意味着犹太民族还活着，还没有堕落，还拥有伟大的未来”。

在扎克斯看来，托洛茨基是威慑当今犹太人敌人的有力指挥棒，而在一些人看来，托洛茨基则是向“他们的折磨者、压迫者、昨天的追随者和刽子手”复仇的工具。托洛茨基在纽约的熟人鲁文-卜拉希伊写道：“打狗棍子”。

托洛茨基和许多其他犹太人在俄国崛起，巴伐利亚和匈牙利的革命事件使犹太共产党人和犹太社会主义者掌权，与此同时，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的运动也十分活跃。这些事件对许多犹太人来说，是他们漫长历史中实现古老愿望的一个伟大转折点。《贝尔福宣言》发表后，在耶路撒冷庆祝新年的传统愿望似乎不再那么不切实际。《旧约》中犹太人战胜压迫他们的民族和君主的故事似乎在犹太人托洛茨基领导的红军的胜利中重演。在几百年的宗教传统中长大的犹太人将苏维埃政府在内战中的胜利解释为不是马克思和列宁思想的成功，也不是俄国工人阶级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就，而是犹太教的胜利，他们在俄国共产主义中看到了古老犹太传统的诞生。

作家埃利泽-施泰因曼反映了这种情绪，他在敖德萨出版了一本题为《犹太共产主义者》的希伯来文小册子。他对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表示欢迎，认为这是“红色犹太教”的胜利。他写道：

“黑色犹太教的堡垒已经陷落——红色犹太教万岁！”

作者钦佩进入敖德萨的红军：

“祝你们平安，我的兄弟们，红军战士们！即使你们的马蹄践踏了我，我也会原谅你们，我会原谅你们，我会原谅你们的新世界，新世界的秩序将因我的死亡而建立，我将成为新世界自由车轮上的一个齿轮。和平与你们同在，我的兄弟们。

——来自一个不为你们所知的古老犹太人”。

施泰因曼希望“作为一名犹太共产主义者，从犹大山顶宣告耶路撒冷的解救”，他认为“共产主义和革命起源于《圣经》和先知”，并相信“犹太教和共产主义将在圣地融合”。

对托洛茨基的过分崇拜，把他作为复仇的象征、雷电和古老民族的青春而大肆宣扬，导致人们不恰当地把他的人格与整个犹太民族相提并论，这为反犹宣传

提供了素材。尽管这种情绪在犹太人中并不普遍，但许多白卫分子仍然清楚，大多数犹太人更倾向于同情苏维埃政权，而不是与之对立。舒尔金注意到，在苏维埃军队进入基辅之前，当基辅上层和部分中产阶级开始逃离这座城市时，逃亡者中几乎没有犹太人。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在苏维埃政府中的崇高地位，成千上万犹太人在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机器中的存在，特别是在红军和全俄契卡中的存在，再一次让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相信布尔什维克党是犹太人手中的工具，因此他们要为这个党和苏维埃政权的一切行为负责。

红军不可战胜、共产主义思想即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神话，与内战失败者为解释失败原因而创造的神话相对立。白卫移民不愿意承认，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选择被否决了，他们的将军、军官和哥萨克人被证明没有能力打败红军，他们没有表现出取得胜利所必需的足够的道德和精神毅力。因此，他们坚持只谈苏维埃政权的一面——红色恐怖。对于白军集中营中公然违反法律的行为，对于“绿军”和其他各种帮派的暴行，对于人民自发的残酷行为所造成的数百万受害者，白军完全保持沉默，他们只谈论“契卡恐怖”。内战期间，苏维埃当局从肉体上消灭了包括贵族和商人在内的所有社会阶层代表以及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神话就是在那时诞生的。

这些暴行的责任被归咎于“异族人”，首先是在苏维埃俄国担任各种政府职务的犹太人。这种判断是有一定道理的。舒尔金在列举热衷于消灭“阶级敌人”的基辅契卡领导层时，提请人们注意犹太人在其队伍中占主导地位。许多人记得，在执行“肃反”的惩罚分遣队中也有许多犹太人，他们还记得，威胁顿河哥萨克人的命令和关于“肃反”的通告是由犹太人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签署的。一些犹太人关于必须为大屠杀“复仇”的声明成为犹太人对“红色恐怖”负有集体罪责的证据。托洛茨基恶魔般的形象接二连三地在处决令上签字，这只会加剧犹太人有针对性地灭绝俄罗斯人民的想法。

根据帕斯马尼克的说法，白军“被托洛茨基和纳哈姆金斯催眠，导致其将所有布尔什维主义与犹太人相提并论，其后果就是大屠杀”。他还写道：

> “白卫军和彼得留拉分遣队特别憎恨托洛茨基的名字；几乎每次大屠杀都伴随着这样的口号：‘这都是因为托洛茨基’”。

犹太人中的许多知名人士认为，托洛茨基和其他犹太共产党人的活动对他们的同胞造成了极大的危险。犹太复国主义领袖阿基梅尔写道：

> “犹太裔共产党人比邓尼金和彼得留拉更应该为大屠杀负责……俄罗斯犹太人为托洛茨基的军事部长职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历史学家杜布诺夫声称，“托洛茨基和乌里茨基”在参与组织恐怖活动的程度上“胜过”苏维埃政府中的每一个人。杜布诺夫写道：

> “我们会以某种方式活着走出这个血腥的间歇期，但我们永远不会因为参与布尔什维克恐怖活动而得到宽恕.....犹太人投机革命.....反犹太主义将深深扎根于俄罗斯社会的各个角落。文化反犹太主义的土壤已经准备就绪”。

莫斯科首席拉比雅科夫-摩西解释了托洛茨基在任何领导岗位上都会不由自主地成为镇压和残暴的象征的原因之一：

> “托洛茨基派制造革命，而勃朗施坦派支付账单”。

1923 年，俄罗斯海外犹太人国内协会发表了一份《致各国犹太人！》的呼吁书，其中写道：

> “布尔什维克犹太人过分热衷于参与压迫和毁灭俄罗斯——这本身就

是一种罪恶，因为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还有什么比看到自己的儿子放荡不羁更大的不幸呢——不仅被归咎为我们的过错，而且还被解释为我们权力的体现，是犹太人的统治。苏维埃政权与犹太政权相提并论，对布尔什维克的强烈仇恨也转化为对犹太人的仇恨。在俄国，几乎没有一个阶层没有渗透到这种对我们的仇恨之中。不仅是俄国。在颠覆俄罗斯政权的风暴的推动下，所有国家和民族都被仇视犹太人的浪潮所淹没。从来没有如此多的雷云聚集在犹太人民的头上”。

“雷云”给犹太人民带来了苦难，这不是俄罗斯人民对托洛茨基或其他犹太政委所作所为的报复，而是俄罗斯境外猖獗的仇犹情绪造成的。这些“犹太恐惧症浪潮”是由“红色恐怖”的神话催生的。所有白卫移民和彼得留拉分遣队都在谈论苏维埃政权的恐怖，而阻止这种恐怖重演的愿望成为西欧国家出现大规模反犹和反共政治运动的沃土。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托洛茨基被神话了，许多犹太人希望将他视为“红色犹太教”的领袖，粉碎他们永远的敌人，这给犹太民族许多世纪以来面临的最可怕的威胁带来了生机。把俄罗斯从犹太势力手中解放出来的口号也成了准备进攻苏维埃国家的幌子。

# 第 十 五 章

# 以劳动军事化为口号

虽然不排除苏维埃国家进行新的外国干涉的可能性，但在内战胜利的影响下，人们普遍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即将爆发革命抱有幻想。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期间收到的一份错误电报使布哈林有理由在大会讲坛上宣布德国已经开始革命，代表们大声欢迎这一失败事件。《真理报》以《是时候了！》为题发表了另一篇来自瑞士的关于革命的虚假报道。在解决国家经济问题的问题上，许多领导人的推理也表现出了打着乌托邦口号的倾向——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时间估计为10-15年。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并没有排除“我们在三四五年内或多或少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可能性”。

内战的胜利使许多苏联领导人相信，为了在国家经济中取得类似的成就，有必要保留和发展1918-1920年形成的、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的组织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特殊方法。一些苏维埃领导人甚至试图从理论上证明，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个时期内，“战时共产主义”方法的延续和发展是合理的。

对“战时共产主义”最完整的理论论证是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他在书中认为：

> “所有各种形式的无产阶级的强制手段，从枪决到劳役……是把资本主义时代人的材料培养成共产主义人类的方法”。[315]

托洛茨基还为“战时共产主义”的理论辩护做出了贡献。1919年12月16日，当红军继续追随撤退的白军南下时，托洛茨基向党中央提交了他关于向和平建设过渡的论文，布哈林很快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这些论文。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托洛茨基编写了许多文件，发表了许多演讲，提出了他的以战时共产主义方法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建设纲领。

托洛茨基在《论工业无产阶级的动员、劳动征兵、经济军事化和利用军事单位满足经济需要》一文中宣称：

> “在一个背负着最悲惨的过去所遗留下来的包袱的社会的发展过渡阶段，如果不对寄生虫分子、农民中的落后分子以及工人阶级本身采取强制措施，是无法完成向系统组织起来的社会劳动过渡。国家强制的工具就是军事力量”。

托洛茨基呼吁摒弃“已成为偏见的资产阶级旧公理，即强迫劳动是不生产的”。他宣称：

> “我们说，并非所有条件下的强迫劳动都是非生产性的”。

也许是想起了他的装甲列车曾在乌拉尔陷在雪地里好几个小时无人救援的情景，托洛茨基宣称：

> “如果有必要调动一千名工人去扫雪，那也要有组织地进行，而不是像

[315]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2006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二十九章 在‘国内战争’军事学院里学到的东西”校对。

现在这样，通过‘军事革命委员会’列车进行动员”。

显然，托洛茨基认为，为了防止将来他的装甲列车出现类似的麻烦，有必要让工人们坚定地认识到大自然的敌意：

> “每个工人、每个农妇都有必要了解我们周围的自然物质世界以及并非总是有利的力量。我们的发展来自与这些力量的斗争，来自对它们的征服”。

然而，托洛茨基并不想等待“每个工人、每个农妇”在意识到各种因素对“军事革命委员会”装甲列车的敌意后，排队清理积雪覆盖的铁轨。他写道：

> “我们无法等到每一个农夫和每一个农妇都懂得！我们应当今天就强迫每个人待在他应待的位置上”。

每个工人和每个农妇的地位都将由党来决定。托洛茨基声称，俄国的各个阶级和社会阶层“都看到了一个党，这个党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它尽其所能地说出自己想要什么，并用自己的钢铁意志在实践中实现自己的愿望”。至于那些不愿意被“服从、任命和指挥”或不愿意服从党的意志的人，托洛茨基在第九次代表大会《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草案中用了整整一节“劳动中的逃跑现象”来论述他们。托洛茨基指出：

> “鉴于大批工人为了追求更好的粮食条件，往往也为了进行投机，竟擅自离开企业，到处流动，这种情况使生产受到进一步的打击，使工人阶级的总的状况恶化起来，代表大会认为苏维埃政权和工会组织的迫切任务之一，就是同这种劳动中的逃跑现象进行有计划、有系统、坚决而严厉的斗争，例如可以公布应受惩罚的逃跑者的名单，把逃跑者编成受惩罚的工人队，以至把他们关进集中营”。[316]

托洛茨基的立场显然与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上大多数人的观点一致，因为中央委员会的论文和代表大会的决议都逐字重复了这段文字。

托洛茨基提出了“劳动军”作为组织劳动活动的模式。在把第 3 军转变为第 1 劳动军并“把这一经验推广到其他军队”的过程中，他看到了“向实行普遍劳动征兵制和最广泛地实行普遍劳动的过渡形式”之一。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呼吁在意识形态上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团主义的偏见作斗争，这些偏见认为阿拉克切夫斯基主义是指导劳动军事化或广泛使用军事编制进行劳动的思想”。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加强了托洛茨基的地位。他是议程上两个问题（经济建设和向劳动军制度过渡）的主要发言人。《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了托洛茨基的论述，是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主要决定。虽然托洛茨基说过，用不了多久，整个国家的经济就会变成一个工厂。在“一个中心的指导下”，整个国家和每个公民的生活都将取决于领导所有劳动军队和地区劳动征兵办公室的那个人的意志。代表大会赞同国民生活军事化和实行强迫劳动的方针，并帮助将托洛茨基的思想传播到苏联社会的各个领域。

还应牢记的是，波兰的失败被视为偶然和暂时的事件。图哈切夫斯基正在为第二次进军华沙做准备，从而为向西欧输出革命的新尝试做准备。在对波兰战败的原因进行详细分析后，苏维埃领导层得出结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运输状况不佳，无法向前线运送物资。由于国内运输业的崩溃实际上已经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托洛茨基完全有理由要求获得无限的权力来恢复这一经济领域的秩序。1920 年 9 月初，他发起并成立了铁路和水路运输联合工会（Tsektran）中央委员会。这个新组织的任务是恢复运输工作，“采取……非常措施、铁的纪律、劳

---

316 《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劳动中的逃跑现象”，《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 2 卷，1964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动军事化、个人负责制”。

铁路和水路运输联合工会在其纲领性文件中宣称：

“铁路运输已经军事化。作为最重要的经济战线，在铁路工人、工头和雇员中实行了严厉的军事纪律”。

铁路和水路运输联合工会的纪律处罚包括15至30天的逮捕和1至6个月的强制劳动。

铁路和水路运输联合工会成立后不久，托洛茨基就宣布了该组织在改善运输业务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并呼吁将“铁路和水路运输联合工会”的经验推广到国家经济的所有部门。1920年11月3日，他在第五次全俄工会会议共产党党团会议上发言，呼吁对工会进行“整刷”，并要求让有能力“拧紧螺丝钉”的人掌管工会。托洛茨基以铁路和水路运输联合工会的工作为榜样，建议按行业将经济当局和工会联合起来。

就在同一天，托洛茨基宣布必须对苏维埃人民实行严格的纪律制度，不仅在工作中，而且在家庭中也是如此。1920年11月6日，托洛茨基在纪念十月革命三周年时发表讲话说：

“必须彻底改变我所说的情况——人类80%的精力都花在了食物上。不排除我们将不得不转向公共饮食，也就是说，我们账簿上的所有苏维埃工人，上至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下至最年轻的工人，都将不得不在工厂和机构的公共食堂就餐”。

托洛茨基认为，这“也是最伟大的劳动社会教育学校。有必要从我们的整个环境中引入接近斯巴达式的道德。首先，旷工将被取消。在共同的餐桌上，民意将得到体现”。

这种与监狱生活几乎毫无区别的生活方式显然将长期存在。托洛茨基早在1920年4月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就宣布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四个阶段。托洛茨基在宣称三至五年内可以建立发达的农业生产的同时，又宣称苏维埃国家“还需要许多年”“才能接近生产-消费公社”。

托洛茨基认为俄国劳动者的智商低下，他完全依赖原始条件反射机制来灌输“正确”的行为态度。工作的愿望必须通过热汤饭来强化（托洛茨基宣称：“谁不去工作，谁就得不到热汤饭”）。旷工可以通过惩罚来阻止（“纪律措施，最严厉的措施，必须适应我们经济状况的悲剧”）。

这些思想及其在铁路和水路运输联合工会实践中的体现激起了党内的积极抵制。此时，内战及其造成的破坏已将国家的力量消耗到极限。外部势力竭尽全力，企图使俄国经济崩溃，但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他们破坏俄罗斯稳定的多重行动组合取得了成功。美国谷物生产商（其中一位是前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弗朗西斯）从俄罗斯在世界谷物市场上被淘汰中获得了非凡的利益。托洛茨基说：

“在战争和革命期间，美国占有了我们90%的前农业生产市场.....他们直接买下我们有那么难吗？他们可以在一年内用他们的美元扼杀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任何机会”。

全国工业生产下降到革命前水平的4%至20%。工业生产的崩溃导致城市几乎无法向乡村提供任何必需品。而被内战破坏殆尽的村庄也几乎无法向城市提供任何粮食。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关于早日过上幸福生活的美好口号，还是激烈的威胁，都无法调动工人的积极性。粮食收购者采用的枪杀甚至酷刑威胁对农民不再起作用。对粮食收购者活动的反应往往是充耳不闻、沉默抵抗。在另一些情况下，收购者干脆被杀害。正如粮食人民委员提苏鲁帕所说：

“仅在乌克兰粮食战线上就有1700名采购员被杀”。

以枪毙为代价强迫采购员工作的企图也没有任何效果：他们宁愿逃跑，躲避上级当局的追捕。

许多地方爆发了农民起义。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由社会革命党人安东诺夫领导，于1920年8月在坦波夫省爆发，很快覆盖了俄罗斯黑土地区的大部分地区。图哈切夫斯基率领部队投入镇压起义。对起义者使用了飞机和毒气，囚犯被关进集中营。

党内越来越认识到，仅靠恐吓和暴力手段已经无法进行管理。列宁考虑到了这一点，他撰写了《工会的任务及其实现的方法》的论文，在论文中谴责了铁路和水路运输联合工会活动中的消极倾向，并要求对“过分加强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的现象应予制止”。列宁建议党员把“发扬民主和主动性、参加工业管理以及开展竞赛等等，运用到整个工会运动中去”。[317]

这样，党的领导就在工会工作中表现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1920年11月8日至9日召开的俄共（布）中央全会拒绝了托洛茨基的建议，通过了列宁起草的论文。全会建议采取在工会运动中发展民主的方针，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季诺维也夫（主席）、托姆斯基、鲁祖加克、李可夫和托洛茨基组成，负责起草关于工会工作新方法的指示。

自托洛茨基于1917年夏天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以来，他与列宁之间第一次出现了以政治斗争形式出现的分歧。这并非偶然。内战的结束为革命的战时阶段划上了句号。俄国内战演变为世界革命的希望落空了。在向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1921年）提交的中央委员会报告中，列宁虽然声称“国际革命在发展，同时欧洲的经济危机在加剧”，但同时也承认：

“如果我们据此断定欧洲在短期内会用扎实的无产阶级革命来援助我们，那简直是疯了”。[318]

俄罗斯不需要依靠外部支持，相反，国家的衰落使其越来越容易受到来自外部的攻击。

托洛茨基在1917年11月宣布的“依靠强制”、恐吓军队和平民的方法、经济的军事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战争形势来解释，但在和平时期却失去了合理性。在战争年代，托洛茨基建立了强大的武装部队中央集权机构，并将其影响力扩大到经济领域，这使得托洛茨基的权力在共和国内无人能及。

工会是党的领导与托洛茨基的军事行政“帝国”进行斗争的领域。在这场斗争中，列宁得到了反对“军事革命委员会”独裁权力的人们的广泛支持。托洛茨基试图采取他惯用的示威方式，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工会委员会的会议。但就在这个时候，托洛茨基夺取的“工会领地”——铁路和水路运输联合工会——发生了“叛乱”，因为属于这个联合工会的水路工人要求放弃军事领导方法。季诺维也夫委员会建议清理铁路和水路运输联合工会的政治部门，加快召开运输工人工会代表大会，并改变铁路和水路运输联合工会的组成。12月7日，中央全会审议了这些建议，托洛茨基在会上为铁路和水路运输联合工会的工作方法进行了辩护。在讨论过程中，布哈林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被称为“缓冲决议”（铁路和水路运输联合工会的组成保持不变，但放弃了“整刷”工会的要求）。该决议获得通过。

---

[317] 列宁《<工会的任务及其实现的方法>决议草案》，《列宁全集》，第40卷。

[318]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献》，“2 俄共（布）中央政治工作报告”，《列宁全集》，第41卷。

列宁反对全会决议，但仍占少数（7 票对 8 票）。三天后，水路工人撤出了铁路和水路运输联合工会。党和工会领导层的政治斗争不断扩大和加剧。12 月 24 日，中央全会决定就即将召开的党代会的议程展开讨论。第二天，托洛茨基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概述了他的“整刷”工会和军事化方案，该方案随后发表在《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小册子上。托洛茨基提议按纲领选举代表大会代表，实际上宣布成立自己的特殊派别，并打算把党的最高机关变成战场，显然是指望他的支持者取得胜利。

12 月 30 日，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和莫斯科市工会理事会的联席会议上，开始了讨论。列宁发表了《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的演说，尖锐地批评了后者的小册子。列宁仿佛又回到了 1903-1916 年两人之间论战的风格，他写道：

> “我把这本小册子同他在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那个提纲加以比较，并且仔细地加以研究之后，发现其中理论上的错误和极明显的不正确地方，真是多得惊人”。[319]

列宁坚决反对托洛茨基的劳工军事化路线，他保证工会“工会却不是国家组织，不是实行强制的组织，它是一个教育的组织，是吸引和训练的组织，它是一所学校，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320]

列宁反对把军事方法推广到民事领域的想法，他宣称：

> “在军事方面有宝贵的经验：英雄主义、雷厉风行等等。但是也有军人中不良分子的坏经验：官僚主义，高傲自大。托洛茨基的提纲，同他的想法和愿望相反，支持的不是军事经验中的最好的东西，而是最坏的东西”。[321]

列宁对 12 月 7 日中央全会的决定表示不满，称其为“悲哀”：

> “中央委员会搞得乱七八糟；这是革命以来我党历史上的第一次，这是危险的。关键在于分成了两派，出现了布哈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谢列布里亚科夫的‘缓冲’派。这一派带来的危害和混乱最大”。[322]

列宁毫不掩饰自己的恼怒，他说：

> “应当用这个例子再一次指出：‘尼·伊·布哈林同志，少在名词上标新立异吧，这对于您，对于理论，对于共和国，都会有好处的’”。[323]

与此同时，围绕这一有争议问题的斗争愈演愈烈。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工会委员会起草了一份《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决议》草案，列宁、谢尔盖耶夫（阿尔焦姆）、季诺维也夫、加里宁、加米涅夫、彼得罗夫斯基、鲁祖塔克、斯大林、托姆斯基、洛佐夫斯基签署了这份草案。1921 年 1 月 18 日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所谓“十人纲领”成为列宁在党中央委员会中的支持者的纲领性文件。虽然签名者中有 9 名中央委员会成员，但其他 11 名成员（包括布哈林、捷尔任斯基、克里斯廷斯基、李可夫和拉狄克等著名人士）没有签名，这表明党的大多数领导层不准备在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中坚决支持列宁。

“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制”纲领的支持者和其他主张全面扩大工会权利和“工人民主”的人积极参加了讨论。他们的要求与托洛茨基的立场截然相反，同时也引起了列宁的批评。在拉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索科

---

[319] 列宁《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列宁全集》，第 40 卷。
[320] 列宁《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列宁全集》，第 40 卷。
[321] 列宁《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列宁全集》，第 40 卷。
[322] 列宁《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列宁全集》，第 40 卷。
[323] 列宁《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列宁全集》，第 40 卷。

尔尼科夫和雅科夫列娃的支持下，布哈林提出了自己的纲领。这个纲领支持托洛茨基的“工会国有化”主张，同时也支持“工人反对派”和所谓的“民主集中派”要求工会为经济管理机构提名候选人的主张。新纲领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极端无原则，使列宁称之为“意识形态瓦解的顶峰”。在所讨论的问题上持直接相反观点的团体的联合表明，反对列宁及其最亲密盟友的现有领导，是当前的斗争任务。

在《党内危机》一文中，列宁谴责了一些纲领的“工团主义”倾向（“我们也就是这样从小的分歧‘发展成为’工团主义的，如果党不够健全有力，不能迅速地彻底地把病治好，那么这种工团主义就会完全背离共产主义并使党不可避免地分裂”。[324]）以及托洛茨基的工会国有化和军事化路线。在评价反对他的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立场时，列宁强调说，他们的“政治错误，却使我们党离开经济任务，离开‘生产’工作，迫使我们——遗憾得很——花许多时间来纠正这些错误”。[325]在谈到讨论的过程时，列宁宣称：

> “我们的讨论引起了轰动，给世界树立了一个令人惊叹的榜样，说明了一个处于绝望斗争的最困难条件下的政党是如何对澄清纲领的各个细节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的——而这是在庄稼歉收和危机的条件下，在毁灭和复员的条件下”。

铁路和水路运输联合工会的实际问题和关于工会作用的理论争论在党内和国内掀起了一场政治权力斗争，这场斗争时明时暗，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持续不断。一段时间后，一封由莫斯科寄给移民伊利亚-不列坦的匿名信在苏维埃俄国广为流传，信中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对苏维埃国家的许多知名人士进行了不光彩的描述。在谈到“工会讨论”的过程时，匿名作者回忆道：“还记得臭名昭著的工会讨论曾威胁要分裂党，用托洛茨基取代列宁（这就是讨论的实质，只是在理论争论的幌子下被掩盖了）”。

1 月 23 日，托洛茨基宣布撤回自己的纲领，并与布哈林联合。2 月 1 日，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形成了联合纲领。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提出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问题的决议草案，主要矛头直指季诺维也夫，而此时的季诺维也夫已再次成为列宁最亲密的伙伴之一。草案指出：

> “由季诺维也夫同志任主席的中央委员会工会问题委员会最初力图在工会问题上找到与‘工人反对派’共同的路线，这种意图完全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不论‘工人反对派’这个集团的领导人作了怎样不可容许的夸大，但“工人反对派”内却有很多很有用的党员。可是，季诺维也夫同志领导的委员会所制定的纲领，不仅没有促成同‘工人反对派’的接近，反而，加深了与‘工人反对派’的分歧，把‘工人反对派’更加推向工团主义”。[326]

托洛茨基-布哈林的纲领以“工会国家化”的思想为基础，创造了与“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组成集团的可能性，暂时掩盖了“国家化”工会在决策方法及其执行方面的根本分歧。在“工人民主”的口号下，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提议发起一场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事实上，这是一个在经济组织和工会组织的“联合”机构基础上建立新的管理层的问题。

在“民主”口号的背后，是托洛茨基关于建立以工会的新管理者为主体的严格的经济管理制度的方案的同样规定。除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之外，中央委员会

---

[324] 列宁《党内危机》，《列宁全集》，第 40 卷。

[325] 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政治和经济。辩证法和折中主义”，《列宁全集》，第 40 卷。

[326] 《俄共（布）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 列·托洛茨基、尼·布哈林等人提出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问题的决议草案（1921 年 1 月 25 日）”，《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2 年。

的其他六名成员（安德烈耶夫、捷尔任斯基、克里斯廷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拉科夫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以及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领导成员戈尔茨曼，科西奥尔和许多党内著名人士，包括卢森戈尔斯、拉科夫、谢列布里亚科夫、罗森戈尔茨、索科利尼科夫、雅科夫列娃和皮达可夫都支持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联合纲领。然而，托洛茨基-布哈林政纲没有得到列宁的支持，而且与列宁对立，这大大削弱了它在党内群众中的支持。

列宁及其支持者积极批判对手的立场，宣传“十人纲领”。在各主要党组织中，列宁主义纲领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在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彼得格勒党组织中，对列宁主义纲领的支持尤为强烈（占所有共产党员的 95-98%）。即使在反对派占主导地位的组织中（如在叶卡捷琳堡），“十人纲领”也赢得了多数支持。

然而，一位不知名的朋友写信伊-布里坦（白俄侨民）声称，托洛茨基“在代表大会上占了少数，是因为书记处没有注意到从地方选出的代表是错误的”。（事实上，由托洛茨基的支持者组成的中央书记处为代表大会带来了不少前革命军事委员的支持者）。但是，托洛茨基在代表大会上战胜列宁的预期并没有实现。两位领导人之间也没有发生严重冲突。事实上，在代表大会的大部分时间里，托洛茨基都不在场。给布里坦的信的作者解释了前革命军事委员懦弱的行为：

“托洛茨基在最后一刻害怕权力和责任”。

然而，我们很难同意这种解释。

这封信的作者在某种程度上简化了事件的过程：托洛茨基在大会的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场，因为他正在领导镇压喀琅施塔得起义。与第八次代表大会期间一样，他在代表大会开始前不久离开了莫斯科。尽管会议主持人几乎每天都宣布托洛茨基“明天到”，但他的到会时间却一再推迟。托洛茨基直到 3 月 14 日，即大会工作结束前两天才首次发言，共同报告工会问题，而此前他一直忙于组织击败这场看似突如其来的叛乱。虽然喀琅施塔得的事件被比作闪电，但其发展情节却让人想起了马尔克斯的《谋杀预告记》，根据这本书，犯罪在发生之前早已广为人知。

在 1921 年 3 月 2 日开始的 2 月 14 日至 15 日喀琅施塔得起义的两周前，巴黎报纸《回声报》和《晨报》以及移民报纸《共同事业报》（由前警察挑衅者揭发人布尔采夫出版）发表了报道。这些巴黎报纸以《波罗的海舰队反抗苏维埃政府》、《莫斯科对喀琅施塔得起义者采取措施》、《喀琅施塔得起义在彼得格勒的回声》为题发表了报道。1917 年 7 月，来自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在示威游行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季诺维也夫和他身边的人早就染上了危言耸听的毛病。根据瓦谢茨基的公正结论——

“季诺维也夫和他在彼得格勒的支持者们简直被间谍狂热所迷惑。在彼得格勒及其周边地区，他们随处可见苏维埃政权敌人的阴谋诡计。季诺维也夫的妹夫萨克斯-格拉德涅夫主编的《彼得格勒真理报》一再呼吁抓捕间谍，不要屈服于他们的挑衅”。

因此，季诺维也夫及其随行人员对巴黎报纸的报道不闻不问显得尤为奇怪。

如果我们假定季诺维也夫本人在很大程度上挑起了起义，那么他行为中的古怪之处就可以理解了。有理由相信，作为起义根源的喀琅施塔得的粮食困难是人为造成的。当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开始提出合理要求时，季诺维也夫在《彼得格勒真理报》上发表了《他们受够了！》一文，指责他们有反革命情绪。

甚至在起义开始之前，季诺维也夫就宣布了喀琅施塔得的反革命起义。历史

学家瓦谢茨基说：

“第一个向莫斯科报告喀琅施塔得情况的是季诺维也夫。2 月底，他给在克里姆林宫的列宁打了电话，不仅成为了消息源，而且实际上成为了对所发生事件的第一个评论者。我们认为，没有季诺维也夫对政府信息来源的参与，叛乱的主要原因就不可能是反革命阴谋”。

瓦谢茨基认为：

“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员会的纲领起初并不是反苏维埃的，而是用现代词汇来说是民粹主义的……本来是有可能避免悲剧性结局的，特别是因为起义者的官兵都有和平解决冲突的意愿”。

在喀琅施塔得煽动不满情绪，然后有目的地解读水兵的情绪，这可能有助于季诺维也夫对付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撤出镇压兵变的行动使他得以在大会上远离自己的支持者。托洛茨基对是谁竭力制造了阻碍他出席代表大会的局面并不抱幻想。根据多伊彻的说法：

“在喀琅施塔得起义期间，托洛茨基指责季诺维也夫不必要地挑起了这场起义”。

但是，为什么托洛茨基无怨无悔地接受了领导层的决定，即镇压起义需要他亲自到场呢？毕竟，如果托洛茨基真的有可能在代表大会上取得成功，那么这个热爱权力的人就会以任何借口留在莫斯科。而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对喀琅施塔得的夸大关注对托洛茨基是有利的。正如瓦谢茨基正确指出的那样：

“除其他外，他对喀琅施塔得兵变也有个人原因。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没有试图寻找除军事手段之外的其他方式来平息叛乱。托洛茨基在关于工会的讨论中遭到了失败，他希望通过迅速、成功地战胜喀琅施塔得兵变来提高自己已经动摇的权威”。

虽然托洛茨基在代表大会上有足够多的支持者，但他几乎没有准备好站在一个分裂的党领导层之首，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全国所有共产党人，而大多数共产党人刚刚认可了列宁主义纲领。即使托洛茨基在代表大会上取得了成功，将列宁主义领导层赶下了台，他也会发现自己处境艰难。因为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他是“铁路和水路运输联合工会”军事化方法的捍卫者。与此同时，不仅是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对“战时共产主义”感到厌倦。任何试图在 1921 年初在俄国夺取政权、要求生活进一步军事化并反对苏维埃共和国主要领导人列宁的人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出兵镇压喀琅施塔得起义让托洛茨基在代表大会上为他的支持者找到了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这些支持者正准备夺取党内权力。因此，推迟击败喀琅施塔得起义者也符合托洛茨基的计划。起义是一个方便的借口，可以为他不参加政治斗争进行辩解，而政治斗争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与列宁发生极其危险的对抗。值得注意的是，托洛茨基即使在回到莫斯科后，也没有急于出现在大会上。

似乎党内领导层中最不同的力量都对起义感兴趣。派遣党代会代表攻打喀琅施塔得的非同寻常的决定就证明了这一点。在攻打过程中，战士们不得不在叛军的炮火下沿着冰面爬行到叛军要塞，这样的条件使报名参加突击队的 279 名党代会代表（占党员总数的 42%）变成了自杀炸弹手。（诚然，实际参加攻打喀琅施塔得的代表名单至今仍未找到）。这种情况为从肉体上消灭政治对手提供了丰富的机会，就像切斯特顿故事中的人物一样，他将自己的军团投入到一场与优势敌军的无望战斗中，以便在血战中的阵亡者中隐藏他的罪行的受害者。

无论喀琅施塔得事件背后的力量是什么，无论其动机是什么，起义显然给布

尔什维克党及其非党支持者带来了震惊，因为人们相信波罗的海水兵是革命的中坚力量。但很显然，这种看法和起义的震撼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夸大了。革命的社会基础是大城市的无产阶级。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人的反布尔什维克起义，如果真的发生了，完全可以被视为党的政策的彻底破产。水兵的起义反映了农民的情绪，而农民正是海军的主要兵源。1921 年，这些情绪已经在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中表现出来，当时这些起义已经席卷了俄国的许多省份。喀琅施塔得的“布尔什维克化”从未建立在坚实的社会基础之上。甚至在 1917 年，当喀琅施塔得卫戍部队在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时，卫戍部队的水兵也坚定地支持自发的反叛冲动或无政府主义口号，这在维伦上将的屠杀和 1917 年的七月事件中都有所体现。

党的领导人利用对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夸大反应来证明革命危机的严重性，并从中得出实际结论。没有理由相信喀琅施塔得起义是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条件。早在起义开始前三周（巴黎报纸刊登起义消息前一周），领导层就已经采取了这一方针。早在 1921 年 2 月 8 日，政治局会议就听取了奥辛斯基所作的《关于播种运动和农民状况》的报告。会后，列宁起草了《农民问题提纲初稿》，建议“满足非党农民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即收走余粮）的愿望”。[327]1921 年 2 月 16 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在《真理报》上开展“关于用粮食税取代余粮征集制”讨论的问题。早在 1921 年 2 月，坦波夫省就取消了“余粮征集制”。至于“第三次革命”的喀琅施塔得支持者所坚持的实行自由贸易，这一要求直到 1921 年秋天才得到落实，与喀琅施塔得事件没有任何明显的联系。

列宁把喀琅施塔得起义解释为不可能继续用托洛茨基坚持推广的军事方法治理国家的证据。列宁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宣布：

> “我们知道，在其他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之前，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
>
> ……
>
> 我们应当努力满足农民的要求，因为他们感到不满足，不满意，而这种不满意是合理的，他们是不可能感到满意的”。[328]

列宁强调：

> “实质上可以用两个东西来满足小农。第一，需要有一定的流转自由，需要给小私有主一定的自由。第二，需要弄到商品和产品”。[329]

同时，列宁从所发生的事件中看到了有利于加强党内团结的论据。经过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激烈争论，批准中央委员会活动的决议以 514 票获得通过（47 票支持谴责中央委员会活动的民主集中派决议，45 票支持谴责类似的“工人反对派”决议）。3 月 14 日开始就工会问题进行辩论时，代表们对十人纲领的支持已毋庸置疑。

托洛茨基在一份为自己的纲领辩护的共同报告中，首先努力证明一年前，“去年二月”，他向中央委员会提交了“一份书面建议”，“这份建议我可以散发给代表大会的每个代表”。托洛茨基声称，“它与你们现在所要讨论并通过的那份关于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建议几乎是字字句句完全相符”。[330]托洛茨基在

---

[327] 列宁《农民问题提纲初稿》，《列宁全集》，第 40 卷。

[328]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献》，“5 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列宁全集》，第 41 卷。

[329]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文献》，“5 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列宁全集》，第 41 卷。

[330] 托洛茨基《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工会问题的副报告》。

解释他为什么没有在立场异常强硬的 1920 年 2 月坚持实行新经济政策时说，他当时“被指责为寻求自由贸易——而他在中央委员会得到了 4 票”。

事实上，托洛茨基在 1920 年 2 月提交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论文《粮食和土地政策的基本问题》，与《关于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根本不同。虽然托洛茨基在这些论文中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对富农的压力”，“更加谨慎地对待上层农民”，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路线，主张加速农业集体化。根据托洛茨基的提议，党的农村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强制扫耕和集体耕种土地”。然而，在 1921 年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托洛茨基认为不仅有必要证明他对粮食税的承诺，而且有必要证明他在制定这一提案时的优先权。

托洛茨基意识到，“铁路和水路运输联合工会”的形象已不再具有吸引力。他恶毒地讽刺道：

> “在每个村子里，他们现在都知道铁路和水路运输联合工会是什么东西了：它就是拿走面包、拿着棍子、不让工人自由呼吸、在工人累了的时候给他喝醋而不是像季诺维也夫给他们喝牛奶的东西”。

托洛茨基认为，军事化是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针对托姆斯基”和“在我不在的时候”制造出来的。他指责党的领导两面三刀：

> “当需要采取强硬手段时，他们建立了铁路和水路运输联合工会；当劳动军的政策成为批评的对象时，中央委员会又与之脱离关系”。

托洛茨基声称，正是他“告诉铁路和水路运输联合工会：我们需要果断地转向民主路线”。

托洛茨基表示，他不是工会问题讨论的发起人，并极力淡化工会问题的重要性。他宣称：

> “决不能把工会问题溶解在革命危机的总问题中”。

他批评的主要对象是季诺维也夫，而不是列宁。托洛茨基不愿意参与争夺政权的决战，这可能制约了他。他试图捍卫自己的立场，谴责“十人纲领”，为工会和经济机构合并的路线辩护。在对“工会”决议的表决中，“十人纲领”取得了令人信服的胜利（336 票）。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决议获得了 50 票，“工人反对派”的决议获得了 18 票。

托洛茨基地位的削弱也影响了选举结果。他的得票数明显落后于列宁。（列宁——479 票，拉狄克——475 票，托姆斯基——472 票，加里宁——470 票，科马罗夫——457 票，莫洛托夫——453 票，托洛茨基——452 票）。然而，两名政治局委员获得的选票甚至更少（季诺维也夫——423 票，加米涅夫——406 票）。在选举过程中，新的中央委员会包括了“十人纲领”的所有共同起草人。其支持者如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伏龙芝和雅罗斯拉夫斯基都加入了中央委员会。相反，托洛茨基决议的一些共同起草人——布哈林和其他人（克里斯廷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安德烈耶夫）却没有被选入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自喀山行动以来的支持者斯米尔诺夫也没有加入中央委员会。除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之外，决议的共同起草人中只有拉科夫斯基和捷尔任斯基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这也说明了托洛茨基的严重失败。

对托洛茨基来说，大会的结束意味着回到了尚未解决的喀琅施塔得问题。在大会闭幕的当天，对要塞的攻击再次爆发。起义者被打败了，其中许多人成为残酷屠杀的牺牲品。然而，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雷夫科姆和科兹洛夫斯基将军的带领下，于 3 月 18 日越过冰川来到芬兰，并被关押在那里。4 月 3 日，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皇宫广场主持了纪念喀琅施塔得冲锋英雄的游行。他在胜利中所

起的作用得到了高度评价：他被授予第二枚红旗勋章。

在列宁的建议下，大会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禁止派别，并将“工人反对派”的一些领导人（什利亚普尼科夫、库图佐夫）纳入中央委员会，这本应有助于恢复党内的和平。这符合以国家和平发展为基础的新政策。托洛茨基试图将劳动军和铁路和水路运输联合工会的力量扩大到全国，但没有成功。然而，他仍然保持着在党内领导层的崇高地位，领导着武装力量，并有理由相信时间在为他工作。

# 第 十 六 章

## 雄狮待跃

1921 年春之后，新经济政策时期开始。1921 年 5 月 17 日，小型工业部分非国有化，未实际国有化的企业保留为私人所有。5 月 24 日，颁布了允许私人贸易的法令，并决定采用租让、租赁和混合经营等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

新经济政策为市场关系的发展开辟了空间。国家的经济生活开始复苏。随着国内私营企业的振兴，外国公司也开展了活动，并获得了俄罗斯的原材料和其他财富。在这方面，伊戈尔-弗罗亚诺夫在他的《坠入深渊》一书中引用了美国著名亿万富翁阿曼德-哈默的话，回答了如何赚取数百万美元财富的问题：

> “其实，这并不难。你只需等待俄罗斯的革命。一旦革命发生，你就应该带着御寒衣物前往那里，立即开始与新政府的代表进行贸易谈判。他们不超过三百人，所以不会很困难”。

也许哈默甚至不需要跑遍 300 名苏维埃干部的办公室，而只需要与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人会面。托洛茨基就是其中之一。哈默回忆说，托洛茨基在与他的一次谈话中说服他说：

> “在俄国，特别是在乌拉尔，美国资本投资的机会是无限的”。

托洛茨基的话是有道理的。阿曼德-哈默在乌拉尔购买廉价的毛皮和皮革，出售因美国空前丰收而价格下跌的美国谷物，从而成为百万富翁。然而，哈默绝不是唯一一个通过与苏维埃俄国进行有利可图的贸易交易而致富的美国企业家。

伊-弗罗亚诺夫指出：

> “1919 年，9 家美国公司与苏维埃俄国签订了总额为 20902541 美元的各种商品供应合同……布尔什维克用金条和沙皇金币支付……除了合法.....出口俄罗斯的黄金储备外，走私活动也很普遍”。

弗罗亚诺夫引用哈默的话说：

> “当时，雷维尔（塔林）是与俄国贸易的中转站之一，但从俄国运到这里换取粮食的大部分货物都是走私的：艺术品、钻石、白金”。

可以想象，托洛茨基之所以帮助美国企业家，是因为他与帕尔乌斯以及后来与其他国际金融界的长期联系。但是，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其他成员不断宣称要摧毁地球上的资本主义，他们为什么要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企业家致富创造条件呢？基于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需要，并相信资产阶级无法超越狭隘的自身利益，列宁和其他苏维埃领导人认为，应利用资产阶级对利润的渴望来振兴苏俄经济，这将成为打败世界资产阶级的基础。

苏俄领导层从内战结束后开始的“休养生息”的暂时性出发。新经济政策被视为在国内外资产阶级面前的暂时退却，目的是通过市场机制恢复国家的经济生活。与此同时，人们认为外部事件将对苏维埃国家的命运起决定性作用。一方面，苏俄领导人期待着某个资本主义国家发生革命。另一方面，他们担心白军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进行军事干预。

当年苏俄的所有宣传都旨在促进国际共产主义与世界无产阶级的团结，以及做好准备反击“白军和黑男爵”，因为他们“正在为我们准备沙皇的宝座”。但

人们渴望更快地战胜内战的破坏，并积极关注和平生活。

20 世纪 20 年代初苏联生活中的这些矛盾趋势反映在托洛茨基的地位上。现在，身为苏维埃国家最高领导人之一的托洛茨基尝到了和平生活的好处。多伊彻写道：

> “装甲列车被安置在博物馆，由司机、技术员、军事鼓动员和秘书组成的团队被解散，托洛茨基度过了革命开始以来的第一个假期。他在离莫斯科不远的乡下打猎、钓鱼和写作，为人生的新篇章做准备”。

政府迁往莫斯科后，托洛茨基、他的妻子和孩子列娃、谢廖沙在克里姆林宫定居下来。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就住在附近，有时两家人一起吃饭。托洛茨基感到好笑的是，一个老仆人在上晚餐时，试图把印有俄罗斯国徽的盘子摆成鹰头朝上的样子。托洛茨基后来写道：

> “中世纪的城墙和无数镀金的拱顶，使得克里姆林宫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堡垒看起来有些不伦不类……历史的两个极端、两种不可调和的文化要如此近距离地朝夕相处，这不免令人感到既惊奇又好笑”。[331]

托洛茨基写道：

> “钟王的缺口和炮王的炮口中透出莫斯科那种深厚的野蛮之气”。

然而，这位西欧文化的崇拜者很快就适应了沙皇的环境。托洛茨基不断在克里姆林宫组织的宴会惹恼了列宁，他坚持要求这些宴会远离他的公寓。在这些宴会上，托洛茨基和他的朋友们到莫斯科附近的林区喧闹地打猎。托洛茨基在回忆他最喜欢的消遣时写道：

> “打猎的魅力在于，它对我的意识的作用就好比是贴在病痛处一帖膏药……”[332]

同时，随着他对贵族生活的习惯，他发现越来越难以扮演无产阶级军队领袖的角色。托洛茨基感到，苏联人民不再那么容易相信关于“他们的”、“好战的”领袖的传说。多伊彻写道，托洛茨基于 5 月 1 日和 11 月 7 日在红场接受阅兵式时，他的“外表……和演讲仍然让群众激动不已.....但他再也找不到在内战期间与观众建立的亲密接触.....他的戏剧性举止和英雄主义风格以前在人们看来并不奇怪,因为这符合当时的戏剧氛围。现在,他们却想成了歇斯底里的行为”。

托洛茨基的演讲之所以“歇斯底里”，可能是因为他对国家的和平生活感到负担沉重，认为国家注定落后。托洛茨基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说：

>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特殊的国家。战前，我们的一极是野蛮、半野蛮的游牧经济，而另一极则是高度集中的工业。所有的过渡阶段、所有的对立面都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这一切都建立在经济极端落后的基础上，建立在我国广大农民使用最原始的耕作方法的基础上。俄罗斯现在被一些自作聪明的非主流知识分子称为欧亚大陆，即欧洲和亚洲的结合体。无论你怎么称呼它，它都是正确的……例如，贸易资本的作用是欧亚大陆的，与其说是欧洲的，不如说是亚洲的”。

托洛茨基不相信“野蛮”的俄国有能力实现高水平的发展，他只能寄希望于世界革命，在革命中再次证明自己的领袖地位。托洛茨基在 1922 年为小册子《和平纲领》撰写的后记中写道：

>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在政治和军事上保卫了自己，但我们还没有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甚至还没有接近。在此期间，革命国家的自我保护斗争导

[331]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二卷 第三十章 在莫斯科”，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332]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二卷 第三十九章 列宁患病”，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致生产力异常低下；然而，只有在生产力增长和繁荣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才是可以想象的……只有在欧洲最重要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之后，俄罗斯的社会主义经济才有可能真正崛起”。

托洛茨基认为俄国的发展只能在未来欧洲联邦的框架内进行。他写道：

“为夺取政权而进行公开战斗的新时期必然会提出革命的欧洲各国人民的相互国家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惟一的纲领性的解决办法是成立欧洲合众国”。[333]

鉴于德国可能发生革命，托洛茨基认为俄国成为欧洲联邦的前景似乎特别现实。正如他后来写道的那样，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认为取得胜利的德国无产阶级不仅将供给苏维埃俄国机器和现成的产品，而且将输送几万名熟练工人、工程师和组织者，而俄国将以原料和粮食来支付”。[334]

托洛茨基不断提醒他的听众，和平喘息和新经济政策只是暂时现象，现代性的永久因素是世界革命。1923 年春，托洛茨基在哈尔科夫发表演讲时说：

“我们学习如何搞平衡，同时机警地注视着西方和东方，事态的发展不会使我们措手不及……如果西方响起报警的钟声——它是一定会响起来的，那么虽然我们至今大半身陷在估价、平衡和新经济政策之中，但是我们会毫不迟疑地立即响应：我们从头到脚都是革命者，我们过去是革命者，现在仍然是，我们要做彻底的革命者”。[335]

这种态度与列宁试图让托洛茨基参与人民委员会旨在解决经济问题的一般活动的努力相矛盾。一方面，托洛茨基不想失去对国家武装力量的控制。另一方面，只有当经济问题的解决置于他的严格控制之下时，他才准备接管国家的经济，但他不愿意在一个“共同团队”中工作，只负责这项复杂工作的一个单独部分。

托洛茨基的这一立场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会后斯大林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结束后不久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在 1922 年 4 月 11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列宁提议任命托洛茨基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根据列宁当天提出的《关于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工作的决定》草案文本，“副主席约十分之九的精力应该用于经济系统各人民委员部，十分之一的精力用于其他人民委员部”。[336]正如多伊彻所指出的，“托洛茨基断然而相当傲慢地拒绝了担任这一职务的提议”。与此同时，他批评了列宁的法令草案，写道：

“所规定的任务是如此普遍，以至于等于说没有规定任务”。

1922 年 4 月之前，工农检察院一直由斯大林领导，针对加强工农检察院权力的建议，托洛茨基对该组织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写道：

“在工农检察院工作的主要是在不同领域工作过的工人，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是不可能的……因此，以工农检察院为杠杆来提高国家苏维埃机器的计划显然是天方夜谭”。

托洛茨基认为，“国家计划委员会”本应成为“经济秩序的杠杆”。

托洛茨基希望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立法职能，可能并不是想成为该机构

---

[333]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2006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三十二章 同列夫·托洛茨基的搏斗”校对。

[334]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2006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三十二章 同列夫·托洛茨基的搏斗”校对。

[335]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2006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三十二章 同列夫·托洛茨基的搏斗”校对。

[336] 列宁《关于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工作的决定》，“二 有关副主席工作的专门问题”，《列宁全集》，第 43 卷。

首脑的托洛茨基的最低愿望，因为随着国有部门的强大，该机构将在国家经济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从侧面可以看出，托洛茨基不想被纳入现有的经济管理结构中的原因。因为在这个结构中，政府计划没有发挥主导作用。此外，如果托洛茨基接受了列宁的建议，即使他成为了列宁在苏维埃的第一副代表，他也必须与另外两名代表——李可夫和提苏鲁帕——分担权责，而这两人在 1922 年 4 月都不是政治局委员。

托洛茨基拒绝了列宁的建议，这标志着他开始了与党内大多数领导层的“冷战”。多伊彻指出，托洛茨基的这一立场“以及提出这一立场的方式激怒了列宁；这引发了新的矛盾，加上旧的冲突，政治局出现了分裂”。

托洛茨基在给政治局的信中批评了列宁关于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工作的建议，一个月后，列宁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半身不遂。（托洛茨基是在接受治疗时得知此事的。据他说，他是在用网捕鱼时在斜坡上滑倒后肌腱撕裂）。

列宁离开克里姆林宫将近六个月，而且他的病有可能致命，这影响了政治局成员之间的关系。托洛茨基公开表示不愿与政治局其他成员合作。党的领导机构正在失去权威性和可控性，并成为冲突的战场。在治疗期间，1922 年 9 月 11 日，列宁再次提出任命托洛茨基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问题，并要求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除了托姆斯基和加米涅夫投了弃权票外，所有政治局委员都投了赞成票。由于李可夫要去度假，列宁匆忙处理了这个问题，希望托洛茨基立即担任副手。托洛茨基再次拒绝就任，说他正忙于筹备共产国际代表大会，自己也要去度假。9 月 14 日，斯大林在列宁的建议下，向政治局会议提交了一份谴责托洛茨基立场的决议草案，该草案获得通过。

1922 年秋季，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紧张，12 月中旬，他们就外贸问题交换了照会，关系得到了缓和。列宁支持托洛茨基关于国家垄断外贸的立场，并指示他在全会上捍卫他们的共同观点。看来，列宁发现他们在一个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上意见一致后，就急于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使托洛茨基与他一起捍卫国家利益。同时，列宁再次拒绝了托洛茨基关于通过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行政职能来加强它的建议。12 月中旬，列宁再次提出任命托洛茨基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问题，这一提议第三次遭到拒绝。

此时，列宁的工作能力已经降到了最低点，因为从 11 月底开始，他的四肢又开始萎缩，到 12 月中旬，出现了更持久的瘫痪。医生建议列宁完全退出公共事务。1922 年 12 月 18 日，政治局决定监督列宁遵守医生制定的治疗制度的情况。斯大林受托控制这一制度。他自己的病情、医生的要求和政治局的控制都激怒了列宁。1922 年 5 月，他想结束自己的生命，要求给他服毒。因此，列宁在这些日子里所写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他对现实的痛苦感悟的色彩。列宁担心政治局的斗争加剧，正如后来发生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他夸大了党内分裂的危险。

1922 年 12 月 24 日，列宁在给沃洛迪切娃的口述笔记中呼吁采取预防措施防止分裂，确保党的“稳定”。列宁显然是在借鉴以往政治危机的经验（1919 年，托洛茨基与“军事反对派”发生冲突；1920-1921 年，列宁的“十人纲领”遭到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的反对）。

列宁现在认为，危险的根源在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他说：

> “我想，从这个角度看，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

[337]

列宁同时批评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338]

显然，为了不给人留下他要把这两个人从国家领导层中清除出去并提名其他人取而代之的印象，列宁立即对国家领导层中的其他人物：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达可夫作了不光彩的描述。与此同时，列宁回顾了十月起义前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行为，并说这一事件“不是偶然”，他还评论了托洛茨基的“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然而，他马上就淡化了这些言论的重要性，说这一切“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339]

与以往的领导层危机一样，列宁试图分化敌对派别。在第八次党代会前，他努力把托洛茨基派往前线，以免加剧他与“军事反对派”的冲突。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前，他同意托洛茨基前往镇压喀琅施塔得兵变，因为这有助于避免在党代会上发生尖锐的斗争。这一次，列宁提议“分化”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他们之间设置一个由 50-100 名来自工人的新中央委员组成的缓冲区。

显然，还有其他考虑迫使列宁对托洛茨基做出让步。他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第一封照会的结尾说，必须增强“我们党的巩固性”，使它“会有助于它在敌对国家中间进行斗争，据我看，这种斗争在最近几年内可能而且一定会大大尖锐化”。[340]国际形势有可能恶化，这迫使列宁一方面考虑加强托洛茨基领导的红军的必要性，另一方面考虑利用托洛茨基与各国有影响力的圈子（包括国际金融家）的巨大联系的重要性。

由于这些原因或其他原因，列宁显然准备在“国家计划委员会”问题上向托洛茨基作出部分让步。12 月 23 日，他口授说：

“我想提请代表大会注意，在某些条件下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性质，在这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和某些条件下满足托洛茨基同志的要求”。[341]

12 月 27 日，列宁给沃洛迪切娃写了一封口信：

“这个思想是托洛茨基同志提出来的，大概已经很久了。我当时反对这个思想，因为我认为，这样一来，在我们的立法机关系统中将出现严重的不协调现象。但是经过仔细研究，我发现这里实质上有合理的思想，即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个汇集了内行、专家、科技界人士的机关，虽然实质上掌握着正确判断事物所需的大量材料，却有点被置于我们的立法机关之外”。[342]

然而，列宁立即规定，“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一职，或者由我们政治领袖中

---

[337] 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全集》，第 43 卷。
[338] 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全集》，第 43 卷。
[339] 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全集》，第 43 卷。
[340] 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全集》，第 43 卷。
[341] 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全集》，第 43 卷。
[342] 列宁《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列宁全集》，第 43 卷。

的某人担任，或者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担任”，[343]他不能会见托洛茨基。列宁在描述未来的“国家计委”主席时，列举了托洛茨基显然不具备的品质：

> “我想，领导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人应该是这样的人，他是有科学修养的人，也就是在技术或农艺方面有修养的人，在技术或农艺方面有几十年实际工作的丰富经验。我想这种人应当具有的主要不是行政才能，而是吸收人才的广泛经验和能力”。[344]

因此，列宁明确表示，他不认为托洛茨基是未来的“国家计委”首脑。

或者是夸大了对党内分裂的恐惧，或者是他对斯大林的恼怒，斯大林经常控制列宁的待遇，并因此与克鲁普斯卡娅发生冲突，这在列宁决定于 1923 年 1 月 4 日发号施令中起了重要作用；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其他敌人当时积极利用了这一说明：

>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345]

因此，列宁提议以斯大林辞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务来平衡托洛茨基未被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一事。虽然斯大林的辞职意味着其地位的削弱，但当时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尚未成为党内的重要职位，而只是负责组织和技术工作。从列宁笔记的整个上下文来看，尽管众所周知列宁对斯大林不满，但他并没有想过要把斯大林从党的最高领导层撤下来。对列宁来说，斯大林只是在政治局组织者的角色上，特别是在政治局成员与托洛茨基之间的爆炸性关系上显得“不方便”。（后来在解释这些题为《给代表大会的信》的笔记时忽略了这些要点，并将其归类为“伊里奇意志的篡夺者”所掩盖的“遗嘱”）。

然而，列宁对党领导层分裂威胁的担忧并非毫无根据，他的病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这种担忧。政治局成员之间的关系危机日益加剧。1923 年 1 月，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互致信中央政治局。斯大林再次向托洛茨基提出担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职位。托洛茨基再次拒绝。与此同时，托洛茨基表示，“任命我为副主席的计划”是“一个从未提交给政治局或全会，也从未在它们中讨论过的建议”。

这显然是对事实的歪曲，因为这已经是第四次向政治局提交这一建议了。然而，当斯大林轻而易举地驳斥托洛茨基的劝说时，后者并没有提到自己的健忘。托洛茨基并没有因为被指责歪曲事实而感到难堪，他在 1923 年 1 月 20 日写给斯大林的信中保证说：

> “我再次声明，这个问题从来没有在政治局提出过，也没有在政治局讨论过——至少是在我在场的情况下。而且我认为，我在场也不是多余的，因为此事与我的任命有关”。

托洛茨基显然不愿采取行动缓和领导层的紧张关系，他在 1923 年 2 月 22 日的一封信中强烈反对列宁关于将中央委员会成员人数增加到 50-100 人的提议。

---

[343] 列宁《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列宁全集》，第 43 卷。
[344] 列宁《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列宁全集》，第 43 卷。
[345] 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列宁全集》，第 43 卷。

他建议成立一个“由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因此，与目前的中央相比，中央的人数有所减少，而且无论如何不会扩大”。很明显，列宁的提议损害了托洛茨基的计划，他试图将其付诸东流。

托洛茨基的行动得到了党内其他知名人士的支持。从 1922 年底开始，他们中的一些人就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表明了对托洛茨基的支持，力图表明党在托洛茨基这个人身上有一个当之无愧的列宁接班人。1922 年 10 月 14 日，拉狄克在《真理报》上写道：

> “如果列宁可以被称为革命的思想家，他通过意志的传递支配着革命，那么托洛茨基就可以被称为建设的思想家。托洛茨基可以说是被理智遏制的坚定意志。托洛茨基的讲话就像召唤工作的钟声。它的所有意义、它的内涵以及我们未来几年工作的意义都清晰可见”。

专门从事反宗教宣传的党的宣传员埃米利安-雅罗斯拉夫斯基于 1923 年 2 月出版了一本托洛茨基传记，让人联想到圣人传记。他甚至在年轻的托洛茨基身上发现了使他成为苏维埃国家领袖的特质。雅罗斯拉夫斯基写道：

> “也许很多人都见过年轻托洛茨基的一张相当普遍的照片，那是他被送往西伯利亚第一次流放时的照片：这一头旺盛的头发，这特有的嘴唇和高高的额头。在这浓密的头发，高高的额头下，当时就已经有了各种形象、思想和情绪的狂风暴雨，这些形象、思想和情绪有时会使托洛茨基同志偏离大路，迫使他有时选择过于遥远的旁路，或者相反，在不可能通过的地方无所畏惧地直奔前方。但是，在所有这些探索中，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深深献身于革命的人，他长大后扮演了革命家的角色，他的舌头锋利而灵活，像钢铁一样可以斩断反对者，他的笔下有一把把艺术珍珠，散落着丰富的思想”。

在党内主要宣传家的赞美声中，托洛茨基向 1923 年 2 月的中央全会提交了他的党中央机关改组计划。然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们并不准备向托洛茨基屈服，向新领袖低头。政治局委员们在 1923 年 3 月 22 日的信中描述了这些事件，他们写道：

> “全会委员们还记得在二月全会上发生的严重事件，当时中央委员会全会以压倒性多数票否决了托洛茨基提出的改组党的中央机关的错误计划。托洛茨基对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一些成员进行了极其尖锐的指责，称他们在上述问题上的立场是由所谓的落后思想和政治举动决定的。中央全会对这一完全不能接受的问题表态作出了相当一致的反应，接下来的危机似乎可以安全地平息了”。

列宁没有出席二月的中央全会，但他知道全会的讨论情况、反对托洛茨基改组中央委员会的计划以及托洛茨基的失败。显然，他对自己解决领导层危机的计划没有成功感到不安，因此他试图通过一些声明来缓和托洛茨基的失败，这些声明表明列宁希望获得与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的合作。

然而，托洛茨基和他的许多传记作者却竭力不提他在二月中央全会上与列宁的建议作斗争时遭到失败的事。相反，托洛茨基和他的辩护士们却试图制造这样一种印象：在列宁严重瘫痪前的最后几天，据称列宁在托洛茨基身上看到了领导国家的唯一盟友。为此，他们使用了列宁在 1923 年初口述的关于一些私人事务的简短笔记中的某些语句。

在提到列宁 3 月 5 日给托洛茨基的信时，多伊彻谈到了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对“三架马车”（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胜利。事实上，这封信表明列宁在“格鲁吉亚事件”中寻求托洛茨基的支持。然而，不能夸大“格鲁吉亚

事件”对党的命运的重要性。相反，列宁向托洛茨基发出的呼吁是他为防止党内分裂而不懈努力的又一次外交行动。为此，列宁准备指示托洛茨基“处分”奥尔忠尼启则，“罪责”捷尔任斯基和斯大林。给托洛茨基的简短照会中没有任何关于政治路线的原则声明。更糟糕的是，列宁不确定托洛茨基是否会同意支持他。照会最后写道：

“如果您由于某种原因不同意，那就请把全部案卷退还给我。我将认为这是您表示不同意”。[346]

列宁的不确定性得到了简单的解释：托洛茨基亲自撰写了一份针对姆迪瓦尼集团的政治局关于格鲁吉亚的决议。该决议后来成为奥尔忠尼启则在该共和国采取行动的依据，而奥尔忠尼启则后来受到了列宁的谴责。只是在列宁开始为姆迪瓦尼辩护后，托洛茨基才与政治局的这一决议撇清了关系。列宁怀疑托洛茨基会在“格鲁吉亚事件”中支持他，但这并不是徒劳的。在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讨论这一问题时，托洛茨基保持了沉默。

利用列宁写给中央委员会或托洛茨基本人的笔记中的个别语句来证明这位病重的党的领导人在最后一刻认识到斯大林的“背信弃义”并支持托洛茨基，这不禁让人想起狄更斯小说中的伦敦律师们所使用的手法，他们试图在匹克威克写给主妇的笔记中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光荣俱乐部的负责人决定向这位可敬的寡妇求婚。托洛茨基及其辩护者无休止地引用列宁笔记中的个别语句：

“尊敬的托洛茨基同志：

我请您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事件进行辩护。这一事件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进行‘调查’，但是我不能指望他们会不偏不倚，甚至会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为这件事辩护，那我就可以放心了。如果您由于某种原因不同意，那就请把全部案卷退还给我。我将认为这是您表示不同意。

致最崇高的同志的敬礼！

列宁”。[347]

这些话表面上是为了证明，在列宁最后的活动日子里，他对托洛茨基的态度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在这个站不住脚的基础上，多伊彻保证说：

“即使是在病床上，病中的列宁也以压倒托洛茨基的顽强意志对斯大林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

还使用了沃洛季切娃口述的列宁的另一张简短便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我补充告诉您，加米涅夫将于星期三前往格鲁吉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想知道您是否愿意从您那里寄些什么东西”。[348]

托洛茨基后来武断地解释了这张便条的内容，声称在 1923 年 3 月初，“三架马车”被打败了，斯大林被打败了。

在托洛茨基缺乏书面证据的情况下，他诉诸于幻想。他保证说，加米涅夫于 3 月 6 日来找托洛茨基，“准备向胜利者的仁慈投降”（“接受了我的全部建议”）。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托洛茨基的这些保证，也没有理由相信列宁准备降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职，并把奥尔忠尼启则开除出党。托洛茨基在回忆录中说，尽管列宁警告他不要“变质的妥协”，但他还是决定宽宏大量地原谅这三个人。托洛茨基声称，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前夕，政治局委员们在他面前卑躬屈膝，斯大林亲自建议他在代表大会前作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

[346]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二卷 第三十九章 列宁患病”，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347]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二卷 第三十九章 列宁患病”，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348] 未找到原文。——译者。

然而，事实表明，托洛茨基并没有“战胜”政治局委员。1923 年 3 月 22 日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加米涅夫、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给中央委员会成员的信的语气和内容充分证明，政治局成员不仅没有在托洛茨基面前卑躬屈膝，而且毫不掩饰他们对托洛茨基的愤慨。信中描述了政治局委员两年来与托洛茨基斗争的历史：

“托洛茨基对政治局的这种态度不是几个月，也不是两个月，也许是两年。我们不止一次或两次听到对政治局工作的如此全面的负面评价，即使是在政治局工作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主持的时候也是如此”。

信中回顾说，政治局成员“曾一度支持列宁关于任命托洛茨基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之一的建议，但不幸被托洛茨基拒绝了。托洛茨基出于同样的目的，我们中的一些人提出了让托洛茨基自己选择一个或另一个主要经济工作部门的建议，我们现在仍然支持这一建议”。

信中特别提请注意托洛茨基在其“关于工业的论述”中对与农民结盟问题的忽视：

“在托洛茨基对这一问题的处理（这些论述由托洛茨基对论文进行了多次修改，但在这方面他始终忠实于自己的错误）中存在着一个绝对明确的政治错误：违背了观点，低估了农民的作用。这是一个公然的错误，一个违背布尔什维主义传统的错误，一个充满巨大后果的错误”。

后来，政治局更加尖锐地要求托洛茨基修改论文文本。斯大林在 4 月 4 日给当时在哈尔科夫的托洛茨基的电报中说：

“在我看来，您没有遵守全会关于农民问题修正案的决议。全会通过的关于农民问题的修正案不仅没有被写入论文，而且还在新的论文文本中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意见。与此同时，全会已经投票通过了修正案，你们只负责将修正案文本与论文正文统一起来……请你们在明天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报告中提出反馈意见”。

这些声明的内容和语气与托洛茨基声称他“战胜”了政治局委员并宽宏大量地原谅了“战败者”的说法完全不符。

3 月 22 日政治局信件的语气之所以比先前针对托洛茨基的声明更加尖锐，很可能是因为 3 月 16 日列宁第三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病发：他瘫痪了，说不出话来。列宁不仅在给代表大会的未发出的信中，而且在私人谈话中都主张对托洛茨基采取谨慎态度，他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政治局其他成员发言的尖锐性。政治局委员们一直依赖列宁的权威，他们可能会把托洛茨基无视二月中央全会的决定和他们的要求视为他完全不服从党的领导的证据。列宁担心党内领导层的分歧会导致党的分裂，政治局其他成员也有同感。这迫使他们不公开存在的矛盾。

造成政治局分裂的分歧没有被带到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就像两年前，科西奥尔提出了歧视托洛茨基支持者的问题：

“我们的几十名同志被排除在党的工作之外，不是因为他们组织能力差，不是因为他们是坏共产党员，而仅仅是因为他们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参加了这样或那样的团体，参加了反对中央委员会所奉行的官方路线的争论”。

科西奥尔在讲话中进一步指出：

“这种争论……可以从托洛茨基开始，到斯利亚普尼科夫和‘工人反对派’的其他成员结束”。

这句话在正式记录文本中被删除。

斯大林在回答科西奥尔时说：

“我必须驳斥这种指责……托洛茨基被排除在党的工作之外，这可能吗？要领导像我们的陆军和海军这样的机器，难道还不够吗？是被排除在党的工作之外吗？对托洛茨基先生这样的高级干部来说，这还不够吗？但我必须指出一些事实，这些事实表明托洛茨基同志本人显然只打算在陆海军中工作。其本人显然无意或逃避从事其他更艰巨的工作”。

斯大林在回忆托洛茨基在1922年9月和1923年1月拒绝担任列宁的副手时说：

“我们又一次得到了明确的答复，理由是任命他——托洛茨基——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就意味着把他作为苏维埃干部加以清算。当然，同志们，这是人品问题。我并不认为李可夫、提苏鲁帕和加米涅夫同志如果当了主席，就会把自己当作苏维埃干部来清算，但托洛茨基同志却不这么认为。同志们，无论如何这与中央委员会无关。显然，托洛茨基有某种动机、某种考虑、某种原因，使他不能在军队之外从事另一项更艰巨的工作”。

斯大林讲话的这一部分也没有列入大会的正式记录。虽然托洛茨基没有在大会上解释是什么“动机”、什么“考虑”和什么“原因”阻止他从事另一项工作，但他明确表示自己有话要说，只是说“大会不是处理这类事件的地方”。

同时，托洛茨基通过关于工业的报告，证明了他除了军事工作外，还能做“其他艰巨的工作”。在这份报告中，托洛茨基特别谈到了经济中的尖锐问题——工农业产品价格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托洛茨基展示了一张说明这些价格动态的图表，他说：“这就是我们所拥有的，或者说是剪刀！”这一生动的表述深入人心，从此进入了苏联生活的永久词典）。

托洛茨基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改进工业的工作。另一方面，他建议扩大粮食的国家出口。在这个问题上，他表现出了丰富的知识，因为这是他从小就熟悉的。为此，他主张由国家垄断对外贸易，希望欧洲“用……机器和工厂消费品（当然，后者我们应尽量少拿）来交换我们的粮食”。

为了改进工业工作，托洛茨基建议“把生产集中到设备最好、地理位置和商业位置最佳的企业中去”。他谈到了“让工人和女工下岗”的必要性，因为他认为不可能让“过多的工人和女工在工厂里勉强工作，但领取的工资只有工作工人的三分之一，这样做只是为了不使他们陷入公开失业的境地”。

保护国内外国家利益的工具是考虑到市场条件的规划。托洛茨基支持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关于协调“国家计划委员会”与“劳动和国防委员会”的行动的建议。托洛茨基建议以国家计委为依托，抑制市场因素。他希望将国家计划“扩大到整个市场，从而吸收和摧毁它。换句话说，我们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取得的成功会自动地使新经济政策更接近于清算，由最新的经济政策取而代之，而最新的经济政策将是社会主义政策”。[349]

大会代表虽然对发言人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但普遍对所概述的经济发展计划表示满意。托洛茨基通过他的报告以有利的姿态展示了自己，他是一位理解复杂的经济问题并捍卫社会主义建设纲领的领导人，而这一纲领被认为是现实的。

托洛茨基的威望也因工人代表团对他的多次问候而得到提高。（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与前几次代表大会截然不同，工人集体向代表大会致以了大量的问候）。工人代表团的贺词反复提到托洛茨基是“伟大的”、“人民的”或“红色的”红军领袖。托洛茨基是党的领导人中唯一一个被授予工人荣誉称号的人。在

[349] 托洛茨基在党的十二大上的发言，我国基本上没有翻译（只翻译了部分），所以无法校对，敬请谅解。——译者。

代表大会上宣布了由工厂委员会主席克瓦斯曼和秘书卡扎斯签署的以列宁命名的格卢霍夫工厂“利率冲突委员会”会议记录，其中记录道：

“从今年 4 月 23 日起，让托洛茨基成为格卢霍夫工厂的名誉纺纱工，并根据纺织工人工会的税率确定第七类税率”。

格卢霍夫纺织工人代表团团长警告说：

“托洛茨基在工厂露面的最后期限如下：

托洛茨基到厂的最后期限是 5 月 1 日，我们要求主席团告诉托洛茨基在整个革命期间至少到我们工厂来一次，并对我们的工人鼓舞几句”。

托洛茨基的姓氏经常与列宁的姓氏一起出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同志万岁！”、“托洛茨基-伊里奇万岁！”、“我们的领袖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万岁！”）。

虽然托洛茨基不是代表大会的主要发言人，政治局的斗争也继续在墙外进行，在那里他是一个人在对抗所有人，但十二大有助于加强他在党内群众中的影响力，最重要的是给他的支持者们带来了希望，两年来他们一直在等待恢复斗争的信号。托洛茨基可以断定，他不断用分裂的威胁恐吓党的领导，同时又不积极反对政治局领导人的策略，不费吹灰之力就给他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他正在耐心地为权力决战做准备。

# 第 十 七 章

# 打猎及其后果

1923 年夏天，国内形势恶化。相对昂贵的工业产品卖不出去。一些企业停工，许多企业无法支付工人工资。工厂开始罢工。发酵的局势总是有利于政客的出现，他们积极利用社会蛊惑人心的伎俩，攻击现有秩序。“工人小组”和“工人真理”派的党员煽动了罢工。1923 年 5 月，中央决定逮捕共产党员米亚斯尼科夫和其他 20 名“工人小组”成员，因为他们散发了攻击国家政治的材料。托洛茨基没有反对这一决定。

在这种紧张的环境下，党的领导试图巩固其对国家武装力量的控制。托洛茨基在给布里顿的一封信中说：

“他的军队是一个萝卜，外面是红色的，里面是白色的”。

一位匿名记者声称：

“卡缅涅夫，军队的实际领导人和沙皇的仆人，仍然不是共产党员，神秘地捻着他那最漂亮的小胡子，用他的沉默给我们带来了真正的恐惧，他的沉默隐藏着魔鬼知道的东西”。

四年前，他的前任瓦采蒂斯也曾引起过同样的恐惧，他甚至一度因涉嫌有波拿巴主义野心而被捕。

然而，对波拿巴主义的怀疑延伸到了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本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阿尔弗雷德-罗斯梅尔声称，1923 年，这种谣言在党的最高层广为流传：

“托洛茨基把自己想象成波拿巴”，“托洛茨基想表现得像波拿巴”。

这些谣言很可能影响了季诺维也夫提出的将斯大林或伏罗希洛夫引入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建议。

托洛茨基对这一建议的反应极为痛苦，因为这意味着“察里津集团”的敌人将进入他的“领地”。他不仅辞去了所有职务，还要求应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布兰德勒的请求，“作为革命的士兵”被派去帮助德国共产党组织无产阶级起义。如果托洛茨基的这一举动得以实现，那么他就会先于切-格瓦拉离开古巴政府前往玻利维亚参加革命斗争这一史无前例的举动。然而，与格瓦拉不同，托洛茨基的声明只是一个美丽的姿态。季诺维也夫也做出了类似的姿态，他宣布他作为共产国际主席，将代替托洛茨基前往德国，成为一名“革命士兵”。斯大林介入了这场争论，他说两位政治局委员的离开会破坏领导层的工作。此外，他还保证自己在军事革命委员会中没有席位。共产国际对德国事件的控制权交给了拉狄克和皮达可夫。

1923 年 8 月 22 日的政治局会议根据拉狄克和以布兰德勒为首的德国共产党领导层提供的信息，通过了一项决议，指出“德国无产阶级即将迎来夺取政权的决战”。政治局确定了“苏联劳动群众应为未来的事变做政治上的准备”、动员“全共和国的战斗力量”和组织对德国工人的经济援助的措施。[350]为解决这些问

[350]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2006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三十二章 同列夫·托洛茨基的搏斗”校对。

题，成立了一个由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托洛茨基、拉狄克和契切林组成的委员会。

许多苏联领导人，尤其是流亡多年的领导人，不相信俄罗斯人民有能力建立一个独立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他们认为德国革命是解决 1923 年国家当前面临的经济和政治困难的灵丹妙药。长期流亡在外的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一直梦想着欧洲革命。他在 1923 年 4 月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时表示，希望“在 1930 年.....我们俄国共产主义者将在欧洲各国首都的街道上与外国工人并肩战斗”。

季诺维也夫的这些观点反映在他的论文《未来的德国革命和俄共的任务》中，该论文于 9 月 23 日获得政治局批准。论文描述了德国革命将给苏维埃国家带来的好处：

> “拥有农业优势的苏联和拥有工业优势的德国结合在起，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相互补充。苏维埃德国同苏联的结盟在最近期间内就能成为一支强大的经济力量.....
>
> 苏维埃俄国同苏维埃德国结盟将会在俄国形成新经济政策的新阶段，加速和巩固苏联社会主义国营工业的发展，而且也必然要从根本上消灭新的资产阶级企图在我们联盟的经济中占领统治地位的趋向.....
>
> 苏维埃德国同苏联结盟还能形成一个同样强大的军事基础。两个共和国共同努力可以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军事力量的坚强核心，足以保证两个共和国的独立，使其免遭世界帝国主义的任何侵犯”。[351]

这些观点与托洛茨基关于俄罗斯在未来欧洲社会主义国家联邦中的地位的观点不谋而合。托洛茨基的观点也体现在季诺维也夫题为“欧洲工农共和国联邦”的论文中。

诚然，并非所有委员会成员都相信德国革命会迅速取得胜利。甚至在政治局做出决定之前，斯大林就在 8 月 7 日给季诺维也夫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 “共产党人（在现阶段）应该不应该撇开社会民主党人去夺取政权？他们是否成熟到能这样做的程度，——我认为问题就在于此。
>
> 我们在夺取政权时，在俄国有这样的后备：
>
> 一、和平；
>
> 二、土地归农民；
>
> 三、工人阶级的绝大部分的支持；
>
> 四、农民的同情。
>
> 现在德国共产党人没有任何这些东西。当然，他们有苏维埃国家这个邻国，而我们当时没有，但是我们此刻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如果现在德国的政权，这样说吧，垮了台，共产党人把它抓了过来，他们也会丢人现眼。在‘最好的’情况下会是这样。而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会被砸得粉碎，被扔回去。问题不在于布兰德勒[352]想‘教育群众’，——问题在于资产阶级加上右派社会民主党人一定会把作为演习的游行示威变成决战（他们现在有这样做的一切条件）并把他们打败。当然，法西斯分子并没有睡大觉，但是让法西斯分子发起进攻对我们有利：这会把整个工人阶级团结在共产党人周围（德国不是保加利亚）。此外，根据所有材料，法西斯分子在德国力量还很

[351] 季诺维也夫《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国际形势》的决议（附季诺维也夫的提纲）》，“4.苏维埃德国同苏联结盟会有何种结果？”，《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5 卷。

[352] 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作者注。

弱。依我看，应当劝阻德国人，而不是鼓励他们”。

祝一切都好。

斯大林”。[353]

斯大林之所以希望撤回对德国革命计划的支持，不仅仅是因为他对德国共产党人的力量缺乏信心。斯大林了解苏联领导人在 1922 年 4 月与德国在拉帕洛签署贸易合作协定后所采取的行动。该协议的发起人是列昂尼德-克拉辛和卡尔-拉狄克，他们于 1921 年秋访问了德国。卡尔-拉狄克在解释签订这一协定的必要性时写道：

“在最近一段的历史时期内，我们最依赖英国，也最需要德国。英德关系是我们政策的支柱，直到我们吸引了美国，当我们能够在俄罗斯土地上将美国资本与德国技术设备结合起来时为止”。

很明显，这些考虑与德国的革命计划毫无关系，而且相互矛盾。除其他外，《拉帕洛协定》是苏维埃俄国和德国在军备领域秘密合作的开端，也是绕过《凡尔赛条约》在俄国领土上培训帝国国防军人员的开端。早在 1922 年春，帝国国防军和容克就成立了一个与红军合作的特别小组。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协议不仅是与红军领袖托洛茨基协调达成的，而且是在他的积极参与下起草的。

1923 年的一份协议正式确定了这种合作关系，该协议有时被称为《塞克特-拉狄克条约》。[354]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根据这份协议，容克斯公司在莫斯科附近的菲力郊区建造了飞机，在特罗茨克市（加契纳）建立了毒气生产基地，在列宁格勒和尼古拉耶夫的造船厂建造了潜艇和装甲舰，在利佩茨克建立了德国空军训练中心，在萨拉托夫建立了化学战学校，在喀山建立了装甲学校和帝国国防军坦克发射场。

如果德国革命计划的制定者们同时还在发展与德国军事家和国防工业家的合作，而这些人根本没有共产主义革命的想法，那就不清楚他们到底在指望什么了。与此同时，卡尔-拉狄克并不满足于与德国军方和德国国防工业领导人建立联系，他还与该国的右翼民族主义团体建立了联系，这些团体的活动在 1923 年初法国占领鲁尔区后开始增加。希特勒的前翻译、德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施密特（笔名保罗-卡雷尔）写道：

“拉狄克……是‘凡尔赛战胜国的共同敌人’应由苏联和德国组成的集团，并且击败他们这一观点的积极支持者”。

拉狄克并不认为德国必须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他认为，德国民族主义者可以成为通往布尔什维主义道路上的过渡阶段。因此，1923 年 5 月，当德国自由军团（反对法国占领鲁尔区的地下战士）非正规编队的一名中尉阿尔伯特-利奥-施拉格特因恐怖主义行为被判处死刑并被枪决时，拉狄克在 1923 年 6 月 20 日的共产国际会议上就这名被处决者发表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演讲，演讲的题目是《利奥-施拉格特，无处可去的旅行者》。

托洛茨基的支持者拉狄克不是政治局委员，他不太可能独自允许采取这种措施。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与德国右翼民族主义者的和解是在托洛茨基的同意，甚至可能是托洛茨基的倡议下进行的。

这意味着拉狄克和托洛茨基在为德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制定计划的同时，也在赌准军事组织的成员会更接近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与此同时，包

---

[353]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2006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三十二章 同列夫 • 托洛茨基的搏斗”校对。

[354] 汉斯-塞克特是秘密成立的德国陆军总参谋部的实际负责人。——作者注。

括斯大林在内的许多人都清楚，“法西斯分子”（希特勒的党员当时被称为“法西斯分子”）是共产党人最可怕的敌人。斯大林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同时支持两股对立势力的政策能否成功。

此外，斯大林不可能不知道，西方早就制定了在德国和苏联之间发动战争的计划。帕尔乌斯就是这些计划的制定者之一。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向苏联政府提出担任顾问，但遭到拒绝。从 20 年代初开始，帕尔乌斯成为德国总统埃伯特的顾问。在这些年里，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敦促德国对俄罗斯进行扩张，从而预见了希特勒不久在《我的奋斗》中表达的许多想法。

不得不说，帕尔乌斯的想法并非独创。早在 1918 年 11 月，根据英国政府大臣、共济会组织成员温斯顿-丘吉尔的回忆录，他就产生了必须将德国的扩张引向苏维埃俄国的想法，并开始以各种可能的方式为这一想法辩护。帕尔乌斯只是详细阐述和论证了德国入侵苏联的计划。

1922 年 2 月 2 日，列宁得知罗斯塔（后来的塔斯社）从华沙发来的信件中载有帕尔乌斯小册子内容的简短摘要后，愤怒地给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莫洛托夫发了一封电报，供政治局全体成员参考，内容如下：

> “我建议指定专人调查前几天是谁在报纸上刊登了帕尔乌斯著作摘要的电报。一旦查出是谁干的，我建议严厉批评罗斯塔这个部门的负责人，并将有罪的记者开除公职，因为只有傻瓜或白卫军才能把我们的报纸变成为帕尔乌斯这样的恶棍做广告的工具”。

然而，帕尔乌斯在莫斯科不是与“傻瓜”或“白卫军”保持联系，而是与国家领导层中许多有影响力的人，特别是托洛茨基保持联系。

斯大林肯定意识到，如果支持在德国发动革命的可疑计划，苏联不仅会卷入该国的内战，而且还会挑起苏德战争。拉狄克、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计划会在不知不觉中造成一种符合托洛茨基的朋友帕尔乌斯所提出的目标的局面。帕尔乌斯从一个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和世界“不断革命”理论家迅速转变为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家和德国及奥斯曼帝国政府的顾问，这一点早已众所周知。那些现在口沫横飞地要证明他们对共产主义革命思想的忠诚的人，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蜕变呢？那些心甘情愿地与德国极右翼势力接触的“世界公民”哪里能保证他们不会背叛布兰德勒党的共产党人，同时也不会背叛被他们视为异常“落后”的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

无论斯大林是否考虑过这一点，但对德国革命计划的疑虑压倒了他，他认为德国共产党人不应鼓励，而应遏制。然而，很明显，在苏联领导层中，只有斯大林一个人抱有疑虑。因此，当政治局在 10 月 4 日根据季诺维也夫的论文决定德国革命的日期时，斯大林显然没有反对：

> “同意委员会关于确定日期的问题，即今年 11 月 9 日”。

托洛茨基根本不愿意让共产国际主席在实现这些冒险计划的过程中占据首要地位。作为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他至少可以凭借自己的地位在即将发生的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德国革命的计划设想了红军的积极参与。稍后，又制定了一项计划，将红军人数增加到 250 万人，并新建 20 个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德军战俘而熟悉德语的人将被选入新的编队。根据布兰德勒等人的证词，托洛茨基不仅积极参与了革命起义计划的制定，而且亲自制定并坚持实施这些计划。因此，托洛茨基决定铲除季诺维也夫及其在国家领导层的盟友。解除领导权的借口不是德国革命问题，而是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

尽管“工人真理”和“工人小组”派的罢工发起人受到迫害，但工人的经济

示威在把“官僚”和“资产阶级”党的领导下台的口号下变成了政治示威。托洛茨基利用这种不满情绪，提出了在改变党的路线和改变国家领导层的基础上克服经济和政治危机的纲领。

10 月 8 日，托洛茨基向政治局递交了他的声明，这是他两年半来在政治局发动的冷战中最尖锐的政治文件。这封信谴责了“缺乏普遍计划”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政府计划”。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坚持在工业中实行“严格的集中”。三天后，即 10 月 11 日，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政府的组建情况公布于众。

三天后，即 10 月 11 日，萨克森州和图林根州成立了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德国的革命似乎将在政治局确定的日期开始。这些事件发生四天后，即 10 月 15 日，一份由 46 位党内知名人士组成的声明（“四十六人声明”）被送达政治局，该声明在全国广为流传，并成为反对派的纲领。信中指出了国家经济中的危机现象，作者们批评了“中央委员会的各项决定临时应付，轻率从事，不成系统，在经济领域未能首尾一致”。在谴责“不称职的领导”的同时，他们还批评了“党越来越加速地几乎毫不掩饰地分化成书记等级和平民百姓，由上面选定的职业党的官员和不参与社会生活的其他党员群众”。[355]声明作者要求取消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派别的禁令。

关于违反党内民主的言论与关于领导层的矛盾和优柔寡断的行动的言论一样真实。列宁生病、领导层内部不和谐、甚至托洛茨基的反对者之间也难以协调行动、“三驾马车”的领袖人物季诺维也夫作为领导者的软弱无力——所有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政治局政策的前后不一和活动风格的封闭倾向。在这种环境下，要求撤换已经糊里糊涂，迷失方向的领导层，并为提名新的领导人创造条件，提出更明确的符合当前形势的纲领，在许多人看来是合理的。同时，从文件下方的签名可以看出，“四十六人声明”的作者绝不是“其他党员群众”的代表，他们至今都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一般来说，他们都是党内的知名人士，他们对“自己肩上”的工作没有完成表示不满。显然，《声明》的作者与托洛茨基协调了他们的发言。后来季诺维也夫套用了高尔基的小说《二十六个又一个》的标题，把反对派的演说称为“四十六个又一个”。

签名者包括安东诺夫-奥夫先科、斯米尔诺夫、罗森霍尔茨、科西奥尔、叶尔津、穆拉罗夫、阿尔斯基、别洛博罗多夫和前铁路水运联合工会领导人戈尔茨曼，他们都是托洛茨基在移民时期或内战时期的忠实支持者。前“左派共产主义者”和“民主集中派”分子皮达科夫、奥辛斯基、斯米尔诺夫、雅科夫列娃、布勃诺夫、拉斐尔和萨普龙诺夫也加入了这封信的行列。如果说拉斐尔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可以讽刺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已经成为大民主主义者，那么斯大林也同样有理由对“四十六人声明”的作者及其支持者的民主理想的诚意和深度表示怀疑：

> “在反对派队伍中，有像别洛博罗多夫、罗森霍尔茨、皮达可夫、阿尔斯基、贝克这样的人。别洛博罗多夫的‘民主’至今还留在罗斯托夫工人们的记忆中；罗森霍尔茨的‘民主’使我们的水运员工和铁路员工吃了苦头；皮达可夫的‘民主’使整个顿巴斯不是号叫就是痛哭；阿尔斯基的‘民主’是大家都知道的；贝克的‘民主’使花剌子模至今还在痛哭”。[356]

后来，斯大林不无嘲讽地说：

---

[355] “四十六人声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5 卷。

[356] 斯大林《关于争论，关于拉法伊尔，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文和萨普龙诺夫的论文以及关于托洛茨基的信》，“关于萨普龙诺夫的论文”，《斯大林全集》，第 5 卷。

“而他托洛茨基，这位官僚主义分子的头子，没有民主就活不下去”。[357]

斯大林说：

> “从托洛茨基的嘴巴里听到关于民主的词句，我们感到有些可笑，因为就是这位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曾经要求从上面来整刷工会。可是我们知道，第十次代表大会时期的托洛茨基和现在的托洛茨基是没有多大差别的，因为无论在当时，无论在现在，他都主张整刷列宁式的干部。差别只在于：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他要在工会范围内从上面来整刷列宁式的干部，而现在他要在党的范围内从下面来整刷还是那些列宁式的干部。他需要民主，把它当做法宝，当做战略手腕。全部花样就在这里”。[358]

然而，从那时起，托洛茨基作为社会主义革命民主原则的一贯支持者和反对“斯大林体制”的专制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斗士的另一个神话诞生了。这个神话的生命力可以从罗戈文的著作《有替代方案吗？托洛茨基主义：岁月回眸》一书中，作者试图证明托洛茨基的“民主主义”和“反极权主义”。

在民主的口号下，托洛茨基和声明的共同作者都没有提出扩大工人和劳动集体权利的问题。党的最高层代表的发言是顶点性的，而不是群众性的，其目的不是要深刻改变国家或劳动群众的利益，而是要改变领导层。推翻党官僚的权力和讨论自由的要求，加上对领导层在缺乏克服危机的真正积极方案的情况下优柔寡断和行动前后不一的批评，是对一个具有独裁野心的专制人物上台的民粹主义掩饰。

所有客观的观察者都清楚，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的蛊惑人心的言论隐藏着夺取政权的欲望。意大利记者祖切特（笔名库尔齐奥-马拉帕特）在《政变的技巧》一书中评估了 20 年代与反对派斗争的整个过程：

> “斯大林与托洛茨基斗争的故事，就是托洛茨基企图夺权和斯大林与老布尔什维克卫队一起保卫国家的故事：这是一个政变失败的故事”。

祖切特-马拉帕特拒绝接受当年的主要论战是理论问题的说法，他保证说：

> “托洛茨基考虑的是夺取国家政权，而斯大林考虑的是如何保卫国家”。

在争取权力的斗争中，托洛茨基呼吁群众。托洛茨基的信和“四十六人声明”在各政党组织中广为散发。

10 月 15 日，也就是“四十六人声明”发表的当天，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开会讨论了托洛茨基的信。中央监察委员会指出，这封信的精神实质是要制造派别，并要求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合全会做出决定之前，停止向党组织散发这封信。

此时，列宁意外地于 10 月 18 日从戈罗基抵达莫斯科。虽然列宁仍然半身不遂，但许多人认为他的到来证明“伊里奇”正在康复。他参观了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公寓和办公室，并参观了苏维埃政府的会议室。第二天，列宁参观了一个农业展览，并从他的图书馆里挑选了几本书，然后回到了高尔基。列宁一生中最后一次访问莫斯科，至少表明他开始关心时事。

虽然没有关于列宁在党内冲突中对各派立场的态度的资料，但政治局大多数成员在这些日子里的表现显然绝不能证实托洛茨基的说法，即从 1922 年底起列宁就完全站在他这一边。从随后发生的事件来看，列宁的来访反而使政治局的大

---

[357] 斯大林《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二 结论”，《斯大林全集》，第 6 卷。
[358] 斯大林《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二 结论”，《斯大林全集》，第 6 卷。

多数成员更加大胆，并激励他们采取有力的行动。10 月 19 日，列宁在莫斯科期间，政治局的八名成员和候选人致信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对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的立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与 1923 年 3 月 23 日的信一样，他们指责托洛茨基低估了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联盟的重要性。信中谴责了托洛茨基提出的“工业集中化”路线。信中认为，托洛茨基已成为所有反对党及其主要干部的人的吸引中心。

10 月 26 日召开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政治局邀请了 10 个最大的地区党组织的代表参加全会，这似乎是对列宁提出的将中央委员会成员扩大到 50-100 人的建议的姗姗来迟的反应。全会以 102 票赞成、2 票反对、10 票弃权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认为托洛茨基和四十六人的声明“是派别和分裂政策的一步”，有可能“打击党的团结，在党内制造危机”。

与此同时，德国的事态并没有按照在莫斯科制定的计划发展。柏林和鲁尔区都没有支持萨克森和图林根。只有汉堡在 10 月 23 日爆发了由台尔曼领导的起义。然而，这次起义没有得到其他城市的支持，政府采取了严厉措施来击败共产党人。早先与拉狄克签署了军事合作协议的塞克特将所有行政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然后坚决无情地镇压了革命运动。10 月 30 日，萨克森政府被解散，汉堡起义被镇压。

德国的革命起义激起了右翼的反应。1923 年 11 月 8 日，在莫斯科确定的共产主义革命开始的最后期限的前一天，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领导人希特勒在慕尼黑宣布自己为德国政府首脑，而 5 年前曾指挥德国对俄进攻的鲁登道夫——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的总司令——也宣布自己为德国政府首脑。然而，叛乱并没有持续多久，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就被逮捕了。托洛茨基后来在分析共产党人失败的原因时指出，他们在起义的第一阶段低估了“敌人的武装力量”，包括“法西斯支队”。同时，托洛茨基认为德国共产党人在起义爆发后夸大了敌人的力量，本应采取更果断的行动。

托洛茨基曾对德国革命寄予厚望，希望从权力斗争和互相算计中摆脱出来，投身于世界革命事件的风暴中，但革命并未发生。1923 年 10 月三周内事态的发展表明，最初有利于托洛茨基成功的外部和内部条件急剧恶化。被党内许多人视为一群糊涂领袖的俄共（布）领导层在攻击反对派时表现出了主动性和一贯性。

在这些日子里，托洛茨基突然停止了数月的国家活动。多伊彻写道：

> “一场不幸的疾病迫使他陷入沉默。10 月下旬，托洛茨基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沼泽地星期天打猎时感染了疟疾，发烧不止，在那关键的几个月里卧床不起”。

托洛茨基在《我的生活》中写道：

> “我能够预见战争与革命，却不能预见秋天去打野鸭的后果”。[359]

然而，托洛茨基的病却来得正是时候，他的病使他暂时退出了政治生活。人们很难怀疑托洛茨基的病从头到尾都是虚构的，就像 1962 年古巴危机爆发前夕的约翰-肯尼迪一样，当时由于需要与军方进行长时间会谈，肯尼迪不得不向他的新闻官皮埃尔-塞林格宣布：“明天和接下来的几天，我将患上上呼吸道感染，并伴有轻微发烧”。然而，托洛茨基和多伊彻的说法并非一帆风顺。通常在莫斯科地区，到 10 月底猎鸭活动就结束了，因为野鸭会飞往温暖的地方。即使在 20 年代，莫斯科地区的深秋也几乎不可能感染疟疾，因为到了 10 月底，这种疾病

[359]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二卷 第四十章 追随者们的阴谋”，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的传播者蚊子总是从沼泽地里消失。

虽然托洛茨基在 1923 年 12 月 8 日给党员的信中表示希望自己“很快就能战胜疟疾”，但 12 月 21 日召开的医生会议并没有证实他对自己病情的自我评估。卫生委员谢马什科和克里姆林宫列克萨努普尔的五名医生得出结论，托洛茨基得的不是疟疾，而是流行性感冒、上呼吸道肺炎、发烧（不超过 38°C）、体重减轻、食欲不振和工作能力下降。

医生建议托洛茨基停止工作，并改变气候条件至少两个月。这一诊断结果发表在 1923 年 1 月 8 日的《真理报》上。

尽管托洛茨基的诊断并不正确，但他并非装病。很明显，1923 年秋天发生的尖锐事件对他造成了难以承受的压力，正如他通常所做的那样，引起了整个机体长时间的痛苦反应。

同时，不排除托洛茨基长期无法摆脱病态的事实，但应该考虑到，通常情况下，政治家的公共责任意识会使他克服身体不适。历史上有许多负责任的领导人在最需要他们的时候表现出身体耐力的例子。1941 年 10 月，严寒并没有阻止斯大林领导国家。然而，许多历史学家对托洛茨基的感冒持宽容态度，不允许他在不停打喷嚏和咳嗽的情况下从事积极的工作。

最有可能的是，对于瓦姆皮洛夫戏剧中的人物来说，“猎鸭行动”及其后果成了托洛茨基逃避复杂生活问题的方便借口，成了他破产的幌子。德国革命的失败使托洛茨基上台的环境变得不稳定，现在他领导的反对派运动也注定要失败。因此，脱离反对派对托洛茨基有利。许多人，包括波克罗夫斯基和写给不列颠的那封信的不知名作者，都对托洛茨基对四十六个人的不慷慨行为感到不满，他从来都懒得去为他们承担责任，而是躲在克里姆林宫的卧室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打败。托洛茨基写道：

> “因为生病，我错过了 1923 年反‘托洛茨基主义’大论战”。[360]

疾病帮助他避免了公开放弃反对派，从而在反对派眼中“保住了托洛茨基的面子”，尽管这种弃权只会增加政治局大多数人对他的不信任。

斯大林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问题：

> “托洛茨基到底代表谁——代表中央委员会还是反对派？”

斯大林有充分的理由表示不相信托洛茨基的病情严重到只能卧床不起：

> “托洛茨基到底拥护谁，拥护中央委员会还是拥护反对派？……据说托洛茨基病得很厉害。就算他病得很厉害吧。但是他在生病的时候写了三篇文章，并给他今天出版的小册子写了另外的四章。托洛茨基完全有可能写两三行字来说明他拥护反对派还是反对反对派，以满足询问他的那些组织的要求，这难道还不明显吗？”[361]

针对反对派的民粹主义要求，党领导层决定开展广泛讨论，提出国家政治生活中最紧迫的问题。这次讨论呈现出鲜明的特点。站在托洛茨基和“四十六人”一边的是许多年轻党员，他们是在 1917 年之后，也就是托洛茨基加入布尔什维克之后加入的，因此并不了解他们的领袖与列宁斗争的全部历史。托洛茨基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得到了特别积极的支持。学生们对反对派提出的扩大党内民主和动摇最高权力干部的要求作出了生动的回应。

---

[360]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二卷 第四十章 追随者们的阴谋”，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361]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二卷 第四十章 追随者们的阴谋”，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米高扬于1923年11月底抵达莫斯科，他“抵达的第一天.....是在莫斯科大学的会议上度过的，有人建议我去那里融入.....讨论的氛围。从早到晚，除了中间有短时间的休息外……总有人在吵吵嚷嚷地和大喊大叫地、有时是杂乱无章地发表讲话……在这些讲话的人当中拥护中央委员会路线的人很少……对党的路线的抨击非常尖锐。我觉得这些会议上的气氛难以忍受”。[362]

具有革命前经历的党员仅占俄共（布）党员的12%。许多老布尔什维克积极在党组织中严厉批评托洛茨基。正如米高扬所说，他们强调“大多数工人会议和共产党员都反对反对派，支持中央委员会。在大学里，反对派利用年轻人在政治上毫无准备的弱点取得了成功。反对派的发言人反对说，工人们投票支持中央委员会是担心如果他们投票反对中央委员会，就会被解雇。但革命学生投反对派的票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政治局成员也参与了激烈的讨论。在1923年12月2日的讨论中，斯大林承认党内生活民主化要求的合法性。同时，他认为党的“民主化”主要体现在党对全国劳动群众的开放性上。因此，他敦促“必须抛弃我们的地方组织有时在接收工人同志入党时表现出来的那种多余的形式主义”。他坚持认为，“党可以而且应当放宽从工人阶级队伍中接收新党员的条件”。[363]

1923年12月7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公布了12月5日通过的《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决定承认有必要采取措施使党的生活民主化，但同时反对以此为借口改变党的领导的企图。托洛茨基支持这一决议，决议获得一致通过。

然而，托洛茨基的立场是对自己支持者的背叛。因此，他决定让他们知道，他对党领导层的决议投赞成票只是一种政治花招。就在决议公布的第二天，“重病缠身”的托洛茨基突然宣布自己已经康复，可以亲自在莫斯科的一次地区会议上发言。他宣读了题为《新方针》的《给党的会议的信》。[364]据苏加说，这封信是针对政治局的。

托洛茨基在信中呼吁开展争取民主、反对官僚主义、革新党的工作作风的斗争。主要声明了“保守的官僚主义派别主义的危险”。撤换“倾向于高估官僚机关作用的思想保守的同志”是为了确保工作作风的端正。托洛茨基敦促道：

> “结论只有一个：脓包必须切开和消毒，除此之外，——这是更重要的，——必须打开窗子，使血液更好地吸收新鲜空气中的氧气”。[365]

托洛茨基宣称，“党的官僚主义”的替代办法是“在党内民主的框架内，老一代人与年轻一代人之间的不断互动”。托洛茨基看到自己的主要支持者是党内的青年党员，他在信中抛出了一句后来成为一句名言的话：

> “青年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对党的官僚主义的反应最敏感”。[366]

虽然托洛茨基的口号在学生群体中得到了广泛支持，但“四十六人声明”运动中最强大的力量是军队，托洛茨基始终掌握着军队的领导权。1923年12月底，红军政治部主任安东诺夫-奥夫谢年科下令召开高等军事院校共产主义小组会议，

---

362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二卷 第四十章 追随者们的阴谋”，2005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363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二卷 第四十章 追随者们的阴谋”，2005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364 准确的说，应该是一本小册子。信是小册子的一节。——译者。

365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2006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三十二章 同列夫·托洛茨基的搏斗”校对。

366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2006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三十二章 同列夫·托洛茨基的搏斗”校对。

并向军队各组织发出第 200 号通告，命令根据《新方针》的规定改变红军党政机关的制度。针对政治局要求撤回这份文件的要求，安东诺夫-奥夫谢年科在 12 月 27 日向党的领导人发出了一封威胁信。12 月 28 日和 29 日，托洛茨基在《真理报》上发表材料，宣传他对《新方针》的解释。在这几天里，安东诺夫-奥夫谢年科宣布红军战士将“团结一致”支持托洛茨基。这些言论和行动充满了军事政变的威胁。

1921 年春，季诺维也夫为确保喀琅施塔得事件以尖锐而戏剧化的形式发生，从而影响党内斗争的进程做了大量工作，这一次他也提议采取极端措施，要求逮捕托洛茨基。虽然这一提议遭到了拒绝，但党的领导人还是采取了有效措施，将托洛茨基在红军领导层中最有力的支持者赶下了台。根据中央委员会组织局的决定，政治部通告被取消，安东诺夫-奥夫先科被免职，此时已不再支持“四十六人声明”的布勃诺夫于 1 月 12 日被任命接替他的职务。前一天，也就是 1 月 11 日，1918 年 10 月起担任军事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的叶夫拉伊姆-斯克良斯基辞职了。

与此同时，反对反对派的政治运动席卷了党的所有组织。中央委员会成员在全国各个城市发表讲话，谴责“四十六人声明”和托洛茨基的立场。托洛茨基的信与《新方针》公开发表后，政治局委员们认为，再也没有必要掩盖领导层内部的分歧了。12 月 15 日，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关于争论，关于拉法伊尔，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文和萨普龙诺夫的论文以及关于托洛茨基的信》一文，解释了托洛茨基写信的目的：

> “显然，这里是别有用心的，那就是：在维护中央决议的幌子下用外交手腕支持反对派反对党中央。
>
> 正因为如此，托洛茨基的信中有两面性的痕迹。
>
> 托洛茨基和民主集中派及一部分‘左派’共产主义者结成了联盟，——这就是托洛茨基的言论的政治意义”。[367]

论战是在明显优于反对派的情况下进行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宣布，在为期两个月的讨论中，反对派取得了完全的失败。同时，斯大林在报告中间接承认，即使托洛茨基没有公开参加反对派一方的论战，许多党组织也表示支持他。如同在某种大张旗鼓反对一个人的群众性运动中常见的那样，人们出于同情单个人的感情往往会去卫护“受迫害”的人，特别是在这个人享有往日的荣耀和“为真理而斗争的战士”的盛名的时候。斯大林谈到，一系列党组织提出应给赞同政治局的决议加上“一些尾巴，比如说，是的，你们一切都很好，但是不要欺负托洛茨基”。斯大林在回答这些“尾巴”时说：

> “这里我不提谁欺负谁的问题。我认为好好分析一下，那就可以看出关于齐特·齐梯奇的著名的话对托洛茨基是十分合适的：齐特·齐梯奇，谁欺负你了？你自己在欺负一切人”。[368]

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支持政治局方针的决议。

与此同时，还决定扩大俄共（布）的队伍，至少要有 10 万名工人阶级的代表，并且不允许来自非无产阶级阶层的人入党。在 1924 年 2 月 15 日至 10 月 1 日的“列宁主义呼吁”期间，24 万工人入党改变了党的社会构成。工人的比例从 44%增加到 60%。相应地，“非无产阶级分子”的比例下降了。

后来，托洛茨基注意到在“列宁主义呼吁”开始后，他在党内失去了威望，

---

[367] 斯大林《关于争论，关于拉法伊尔，关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文和萨普龙诺夫的论文以及关于托洛茨基的信》，“关于托洛茨基的信”，《斯大林全集》，第 5 卷。

[368] 齐特·齐梯奇是俄国剧作家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剧本《代人受过》中的主人公。

他保证新党员受到了反犹太主义的感染。这一解释被广泛接受，美国历史学家费索德和霍夫甚至断言，托洛茨基的民族身份“在数十万工人入党时成为他的一个特别大的障碍”。人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印象：1924 年，犹太大屠杀的参与者被接纳加入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而“列宁主义呼吁”的发起者是希特勒和施特莱歇尔，而不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同时，毫无疑问，吸收工人阶级的新党员和反对吸收非无产阶级的新党员意味着削弱了那些犹太裔人士的地位，这些人在 1917 年 10 月之前远离布尔什维主义，但在“官员罢工”期间加入了执政党，或者认为托洛茨基的执政是犹太教的胜利。那些认为共产党执政是“红色犹太教”胜利的人将托洛茨基视为民族领袖而非无产阶级领袖，因此在辩论中特别热心地为他辩护。同时，托洛茨基主义的许多积极反对者都是犹太裔，因此说讨论的真正背景是犹太问题是荒谬的。

但是，托洛茨基在吸收新党员入党时面临的主要威胁是，他长期疏远本国工人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愿望格格不入，蔑视人民的文化。吸收那些迄今为止一直从事积极创造性工作的人入党，使俄共（布）更接近人民中最积极、最有活力的那部分人，并使其免受托洛茨基最关心的以欧洲联邦的名义进行世界革命的冒险主义计划的影响。

托洛茨基没有出席会议，1 月 18 日，他听从医生的建议前往格鲁吉亚。托洛茨基在第比利斯收到列宁去世的消息。后来，他把自己没有参加葬礼的责任归咎于斯大林，声称据说斯大林曾给他发电报，说列宁的葬礼将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天举行。这一点没有记录在案。无论如何，托洛茨基可能前往莫斯科参加了对列宁逝世的普遍哀悼，尽管是姗姗来迟。

据米高扬回忆，“早在 1923 年，民航飞机就开始飞行了。当时，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也在为我们工作。特别是，它的飞机在罗斯托夫”。米高扬认为，托洛茨基“本可以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使用军用飞机——把它飞到罗斯托夫或哈尔科夫，然后从那里乘火车——而且还来得及”。在米高扬看来，托洛茨基拒绝尽一切可能飞往莫斯科的行为“令人愤慨，从最消极的一面反映了他的个性特征”。就连托洛茨基的儿子们也在写给苏呼米的信中对他的决定表示不解。

托洛茨基还在苏呼米休息时，就被告知伏龙芝代替斯克良斯基被任命为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这一任命标志着军事革命委员会正在摆脱托洛茨基的垄断权力。在南方，托洛茨基得知李可夫被任命为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可能会想到，如果他当时表现得谦逊一些，同意成为列宁的第一副手，那么他现在几乎可以自动成为苏维埃政府的首脑。

托洛茨基不愿匆忙赶往莫斯科可能有其自身的原因。对于“三驾马车”来说，他可能被视为一个失败者。他的阴谋经验可能告诉他，列宁死后，政治局内部可能会发生冲突，他应该耐心等待领导层中不可避免的冲突。托洛茨基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在这一特殊情况下是错误的：政治局成员在与托洛茨基的三年斗争中变得更加强硬，他们团结一致，随时准备继续攻击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

在评价 1924 年 5 月 23 日开幕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时，多伊彻说它变成了一场针对托洛茨基的“咒骂狂欢”。这位历史学家写道：

> “托洛茨基只有一次为自己辩护。他平静而令人信服地发言，潜台词中响起了注定要失败的承认”。

这听起来很凄美，但对大会过程的描述并不准确。在托洛茨基的“唯一”一次发言之前，除了在提名他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时提到过他的名字之外，没有一个代表对他说过一句话。

但是，在季诺维也夫所作的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已经对托洛茨基参与的斗争进行了尖锐的评价，尽管他的名字没有被提及。实质上，季诺维也夫将反对派的表现评价为前所未有的政变威胁。报告辩论开始后，托洛茨基第二个发言。他没有承认错误。他的发言被乌格拉诺夫称为“议会式的”，但在形式上却极为谨慎。在演讲的大部分时间里，托洛茨基都尽量避免他惯用的情绪化火药味。托洛茨基演讲的性质符合他的策略目标，即保持他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地位，同时维护他在反对派眼中的权威。托洛茨基拒绝了小资产阶级偏见的指责，只是小心翼翼地称这些指责“夸大其词”。托洛茨基声称，他的行动并不是为了改变中央委员会的组成，而只是为了按照 1923 年 12 月 5 日决议的精神发展党内民主。

与此同时，托洛茨基断然拒绝了季诺维也夫的要求：明确承认自己的立场是错误的。托洛茨基在回答季诺维也夫时宣称：

> “我已经说过，面对党，没有什么比说所有这些批评、所有这些声明、警告和抗议——所有这些都是错误——更容易的了……如果在其他同志看来，我在这里徒劳地发出了这些或其他提醒……徒劳地引出了这些或其他危险，那么，就我而言，我认为我只是履行了作为一名党员的职责”。

托洛茨基的讲话引起了党的领导和他的支持者的极大不满，他们在大会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不少于 15 位发言者谴责了他的讲话。许多发言者对托洛茨基没有采纳季诺维也夫的建议表示不满。克鲁普斯卡娅虽然不支持托洛茨基的观点，但同时反对要求他承认错误：

> “季诺维也夫.....向反对派提出挑战，敦促他们在讲台上承认错误。从心理上讲，这是不可能的……我认为，没有必要把问题放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然后说：‘在讲台上说你们错了’。托洛茨基同志说过，他认为不应该有派别或集团。只要反对派表示愿意共同努力就足够了”。

不过，托洛茨基的批评因不断提醒自己的领导地位而有所缓和，因为他的领导地位没有受到质疑。对于托洛茨基关于准备“在布尔什维克街垒上”战斗的说法，乌格拉诺夫评论道：

> “对我们来说，托洛茨基同志，这还不够。我们不把您看作是普通的步枪手，我们把您看作是指挥官，我们要求您不仅是普通地参加街垒，我们还要求您指挥，而且是明智的指挥和明确的命令”。

虽然那些最近对托洛茨基推崇备至的人现在急于与托洛茨基划清界限，但他们提醒说，推翻托洛茨基也会给党抹黑。雅罗斯拉夫斯基还提请大家注意，托洛茨基的威望是党的宣传的结果，他必须意识到自己对这些努力的依赖：

> “我们为托洛茨基同志树立了权威，因此有权要求他利用这一权威来确保我们现在最需要团结的党不会面临新的动摇的危险”。

此时，托洛茨基的作品已经出版了大量版本，他的肖像也在官方机构展出。据威尔斯报道，早在 1920 年底，莫斯科就出现了一位英国雕塑家，托洛茨基的半身像就是委托他制作的。虽然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致词中，托洛茨基的名字只在企业名称中被提及（“以托洛茨基同志的名字命名的细呢绒布料厂”），这让代表们想起了一年前歌颂托洛茨基的游行队伍，但这也让代表们想到了有多少工厂、厂房和街道印着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的名字。这种情况迫使领导人不要急于将托洛茨基“逐出会议”。

雅罗斯拉夫斯基特别强调了这个问题：

> “托洛茨基同志现在和将来都在我们的队伍中，他还在党中央委员会中，他还拥有权威，他还拥有一切，如果一个有权威、有份量的人被疏离了，如

果他开始领导一条单独的路线——这对党来说是危险的。其他人的错觉和错误并不危险。雅罗斯拉夫斯基的错误想法，伊万诺夫、斯捷潘诺夫的错误想法，对全党都没有什么严重的意义。然而，当托洛茨基同志被误解和疏远时，其意义就完全不同了”。

这句话的意思是，在代表大会上反对托洛茨基的运动到目前为止还不是为了把他开除出政治局，而是为了让他参加领导层的活动，但条件是服从总路线。

大会结束时，托洛茨基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但他意识到，自己的地位越来越取决于党内其他领导层的意愿，因此变得不可靠。托洛茨基的光辉并没有急剧熄灭，而是沿着领导人衰落的通常曲线，经历了地位逐渐下降、权力逐渐缩小、实际活动被纯粹的仪式性活动所取代、权威逐渐削弱等不可避免的阶段。

整个 1924 年夏天，托洛茨基都在等待政治局内部分歧的加剧，而他在权力斗争中一直指望着政治局内部的分歧。他知道，早在 1923 年夏天，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拉谢维奇、叶夫多基莫夫在基斯洛沃茨克度假时，在山间的一个山洞里散步时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建议斯大林离开总书记的职位，转而成立一个由三人组成的书记处。会议建议让斯大林、托洛茨基以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或布哈林三人中的任何一人进入秘书处。当时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都拒绝了这一建议。斯大林从这个建议中看到了季诺维也夫及其盟友想除掉他的企图。

托洛茨基现在得知，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之间的关系再次变得紧张。8 月 19 日，斯大林辞去总书记职务，并要求从政治局和组织局中除名。他的理由是“不可能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进行诚实和真诚的联合政治工作”。虽然辞职未被接受，托洛茨基还是决定利用政治局分歧加剧的机会。

这一次，他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回忆起 1923 年秋天发生的事件，他决定把阻碍他上台的德国革命失败归咎于这两位领导人。此外，托洛茨基还决定对 1923 年底和 1924 年初揭露他的运动进行报复，因为这场运动不断提醒党内年轻党员他的“机会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多伊彻正确地指出：

“当青年们得知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是孟什维克或半个孟什维克时感到震惊”。

为配合《托洛茨基文集》的出版，托洛茨基为第三卷撰写了一篇题为《十月的教训》的介绍性文章。托洛茨基阐释了他在《新方针》小册子中提出的相同主题，试图回顾 1917 年期间他的政治对手的所有最令人不快的行为。虽然托洛茨基努力指出了斯大林在 1917 年 3 月“错误的护国主义”立场，但他并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只是引用了当时在斯大林领导下出版的《真理报》的社论。在他的小册子《新方针》中，托洛茨基为布哈林的反感蒙上了阴影，而在《十月的教训》中，他却只字未提“左派共产主义者”。

但托洛茨基多次提到了 1917 年 4 月列宁和加米涅夫在革命性质问题上的分歧，以及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十月（革命）起义准备期间的表现。托洛茨基拿 1923 年 10 月德国发生的革命事件作类比，让读者相信，如果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路线在中央委员会中占了上风，俄国革命就会像德国革命一样落得悲惨的结局。

托洛茨基在政治斗争中使用历史题材，为运用他所熟悉的论战方法提供了大量机会。许多事件缺乏证据，现有文件模棱两可，争端的观察者愿意接受对历史的任意解释，这些都为托洛茨基提供了机会，使他能够对过去的事件编造出外表上令人信服的版本，并在当前取得相当大的政治成功。

与此同时，关于“谁是最好的布尔什维克和列宁主义者？”的争论对托洛茨基来说充满了风险，因为如果争论加深，就会使他陷入困境。托洛茨基后来写道：

> “当所谓的著作争论爆发时（1924 年），我们小组中一些最亲密的同志大声疾呼，认为我出版《十月的教训》是一个战术错误，因为这给了当时大多数人发起‘著作争论’的机会”。

托洛茨基的对手们不仅对党史有很多话要说，而且知道如何去说。季诺维也夫就 1917 年 2 月之前的党史发表了一整套演讲，这些演讲很快就出版了。在长达 300 多页的篇幅中，季诺维也夫只提到了托洛茨基五六次，从而强调了他在党史中的地位不高，但他同时回顾了托洛茨基与孟什维克和帕尔乌斯的联系、不断革命理论和八月集团。季诺维也夫解释说：

> “当时，托洛茨基同志正在对我们的列宁格勒《真理报》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运动”。（尽管季诺维也夫指的是 1912 年发生的事件，但当时的习惯是，即使在提及城市更名之前的事件时，也要用现代名称来称呼城市。托洛茨基正确地指出了这种做法的荒谬性：“例如，有可能说：列宁在列宁格勒被捕.....吗？更不可能说：彼得大帝建立了列宁格勒”）。

1924 年底，许多关于托洛茨基革命前活动的文章在报刊上大量发表，这些文章都是季诺维也夫概述的主题的变体。然而，对托洛茨基的批评并不局限于分析他在 1917 年之前的活动。布列斯特周围的事件和工会讨论期间的事件受到了极大关注。

在反对托洛茨基的运动中，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并非孤军奋战。那些没有被《十月的教训》作者点名批评的人也加入了这场运动：斯大林、加里宁、李可夫、莫洛托夫、捷尔任斯基、索科利尼科夫、奎林、库西宁和其他许多人。《真理报》的编辑布哈林心甘情愿地发表了这些材料。随后，托洛茨基正确地指出了这场针对他的运动的主要打击方向——表明他们是在反对“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特殊路线”。

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文中与托洛茨基进行了论战，他试图说明自己不相信俄国革命可能性的根源在于不断革命论。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 “托洛茨基的理论和孟什维主义的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欧几个主要国家内’预先胜利，社会主义在一国而且还是在落后的一国内就不可能胜利的这个普通的理论有什么区别呢？”

接着回答说：

> “实质上是毫无区别的。这是不容置疑的。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变相的孟什维主义”。[369]

多伊彻承认，“著作争论”进一步削弱了托洛茨基的地位，“使托洛茨基无法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在谈到托洛茨基“如果试图发动军事政变”的胜算时，多伊彻认为，“在冲突之初，在书记处开始在军队中调动和重新安排党的干部之前，他有很大的胜算，但后来胜算下降了.....在伏龙芝和昂施里希特的帮助下，三驾马车逐渐扩大了对整个军队政委队伍的控制”。

全联盟军事政治工作会议要求托洛茨基辞去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和前一年一样，在莫斯科的冬天，“托洛茨基疟疾发作”，拒绝参加会议工作。托洛茨基回忆说：

---

[369] 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二 论十月革命的两个特点，或十月革命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斯大林全集》，第 6 卷，

“1924 年秋天，我的体温再度升高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再一次爆发了大辩论……我发着高烧躺在床上，对此保持沉默”。[370]

塞多娃回忆说：

“列-达……第二次病发与对他的滔天骚扰相吻合，我们把这当作一场残酷的疾病”。

很明显，不是疟疾，而是这次“著作争论”造成的压力再次激起了托洛茨基机体的急性反应。在克服了病痛之后，他再一次没有尝试去反对他的对手，而是宁愿躺在床上，而他的支持者们却遭到了碾压。

与此同时，1924 年 11 月开始的谴责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一文的运动席卷了全国所有党组织。在 1925 年 1 月 17 日至 20 日召开的俄共（布）中央全会上，托洛茨基的问题成为了讨论的主题。托洛茨基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为了“党的利益”，他拒绝参与论战，不承认党对自己的任何控制，并要求解除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托洛茨基以生病为由，表示无法出席中央全会，但表示他推迟了前往高加索的计划，以便在必要时回答中央委员会成员的问题。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想结束与托洛茨基的斗争。列宁格勒州委决定开除托洛茨基的党籍。后来，在党的十四大上斯大林报告说：

“我们同列宁格勒的同志经过了一些斗争，并说服他们从自己的决议中删去关于开除托洛茨基一项。此后不久，当我们召开中央全会时，列宁格勒的同志和加米涅夫一起要求立刻撤销托洛茨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我们也没有同意这个建议……我们在中央委员会内获得了多数，只是撤销了托洛茨基在军事人民委员部担任的职务”。[371]

在多次发言之后，全会通过了如下决定，其中指出：“从最一般的形式上看，托洛茨基反对党的全部言论现在可以说是想把俄共（布）的意识形态变成某种没有列宁主义的‘现代化’布尔什维主义。这不是布尔什维主义。这是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修正。这是企图用托洛茨基主义取代列宁主义。全会仅限于警告托洛茨基，如果他违反党的决定，就有可能被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

这场讨论最终导致托洛茨基被剥夺了红军领导权，严重打击了他在内战和和平生活最初几年中建立起来的被夸大的权威。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在讨论中回顾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前夕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的其他“错误”，这有助于使他们名誉扫地。斯大林避免了对其权威的严重打击。他在讨论中表现出的坚定与温和的结合只会加强他的威信。此外，他在讨论中引入了“一国社会主义”的主题，而且这一口号在反托洛茨基运动中得到了广泛支持，这为新的政治斗争开辟了前景，并加强了斯大林的影响力。

托洛茨基在 1923-1924 年的讨论中也低估了斯大林，没有重视他在领导层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也没有与斯大林关于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口号进行论战，而斯大林的口号对他来说是如此陌生。

---

[370]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二卷 第四十一章 列宁逝世与权力转移”，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371]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2006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三十四章 同列夫·托洛茨基的第二次搏斗”校对。

# 第 十 八 章

# 近敌联盟

1925 年 5 月，托洛茨基辞去革命前军事委员会和国防人民委员职务仅五个月后，就获得了新的任命。他回忆说：

> “我被任命为租让委员会主席、电气技术管理局局长和工业科技管理局局长……我就我新工作中的问题做报告，出版书籍和小册子”。[372]

同以前一样，托洛茨基将新的活动领域用于政治斗争。他写道：

> “我不仅试图把自己的新工作与日常的经济任务联系起来，而且要把它同社会主义的基本课题联系起来。在反对以愚蠢的民族主义方法(通过自给自足和自我孤立的途径实现‘独立’)对待经济问题的斗争中，我提出了建立一种系统比较我国经济系数与世界经济系数的课题。这一课题的提出，是出于必须正确判断世界市场的动向，而且它也能为我们的进出口及租让政策服务。事实上，系数比较课题本身正是源于承认世界生产力对民族生产力的支配地位，因而它意味着向在个别国家建成社会主义这一反动理论的进攻”。[373]

同时，托洛茨基的新立场也为向外国公司分配租让地提供了大量机会。

弗罗亚诺夫指出，1921-1929 年间，根据人民委员会 1920 年 11 月 23 日的法令签订了 123 项特许协定。 该法令为外国公司提供了“利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广大地区自然资源”的机会，并给予了“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雇用工人和雇员”的权利。弗罗亚诺夫强调说，通过这项法令和特许协议，苏联政府为西方利用俄罗斯“作为原材料和劳动力的来源”创造了条件。托洛茨基与西方国际金融界的广泛联系使他有机会实现其长期以来的想法，即把俄罗斯变成西方主要国家的原材料附属品。

托洛茨基可能意识到了自己地位的不稳定性。托洛茨基领导的所有三个组织都隶属于由政治局候补委员捷尔任斯基领导的全联盟国民经济委员会。托洛茨基意识到，从政治等级的角度来看，政治局委员隶属于候补委员是一种违反隶属关系的行为，这种情况很快就会得到纠正，而且很可能是以他为代价。托洛茨基不能不意识到，他最终被免去政治局委员职务的问题可能要在下一届代表大会上决定，因此他没有积极发言。他只能寄希望于党内领导层可能出现的冲突，而冲突的结果可能会使形势发生有利于托洛茨基的变化。

这一次，托洛茨基认为，党的领导“元老”或三巨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与“新人”（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之间可能会发生冲突。在集体领导和任何集体中，这种冲突并不少见。“新人”年龄较轻，资历较浅，往往随时准备批评现有的做法，提出新的计划和实施办法。“老人”则维护既有做法，不信任创新。同时，“老人”往往不关心事业的利益，而只关心如何维护

---

[372]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二卷 第四十二章 党内斗争的最后阶段”，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373]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二卷 第四十二章 党内斗争的最后阶段”，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自己的权力和特权地位。反过来，“新人”关心的也不是共同工作的利益，而是对高职位的渴望。

每一次代表大会或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都会造成一种情况，让人联想到公共汽车站的情况：有人上车，有人下车，站在过道上的人可以抢占空出的座位。就像那些很久以前就坐上了自己座位的乘客一样，“老人”们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自己的位置。“新人”就像那些精力充沛的人，试图抢占最方便的空位。

随着下一届党代会的临近，“新人”与“老人”之间的冲突正在酝酿之中。布哈林是“新人”的领袖，他是新经济政策和城乡市场关系发展的一贯捍卫者。在他的一次演讲中，他向全国农民提出了“发财吧！”的口号。季诺维也夫认为他的这一言论是无视乡村阶级分化的证据。1925 年秋。季诺维也夫在《时代哲学》一文中不点名地抨击了布哈林的这一言论。季诺维也夫强调不能向“阶级敌人”让步。在这种气氛下，中央委员会于 1925 年秋天召开了一次暴风雨般的会议，布哈林的支持者李可夫在会上猛烈抨击了季诺维也夫的《时代哲学》。后者离开会场以示抗议，加米涅夫、叶夫多基莫夫、克鲁普斯卡娅、拉舍维奇等人紧随其后。托洛茨基目睹了这场冲突，但冲突几乎没有得到解决。托洛茨基的印象是，在代表大会上，老资格的三驾马车和布哈林集团之间会发生冲突。

托洛茨基在政治局两派的产生中看到了一个方便的机会，他可以扮演“中派”的角色，通过批评双方并从他们的立场中发现积极的开端，从而采取领导立场。托洛茨基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四天写的便条中指出：

> “加米涅夫用作为动力的工业的角度，反对布哈林的农业和合作社路线；布哈林在评估工业本身的社会性质问题上反对加米涅夫……在这里，我们看到双方是如何零敲碎打地瓦解 1923 年的共同立场的，这一立场一方面导致工业落后于农业，另一方面导致布哈林的中农合作计划，而‘发财吧’的口号绝非偶然”。

现在，由于政治局成员之间的冲突，他不仅可以“证明”他们观点的谬误，还可以提出自己的纲领作为党未来政策的基础。为此，他认为政治局必须放弃对托洛茨基纲领的批评：

> “必须消除 1923 年的立场，不是零敲碎打，而是彻底消除”。

托洛茨基没有考虑到一个重要情况：政治局的七名成员并没有分成两个“三人小组”和托洛茨基的“仲裁人”。反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不仅有三个“新人”，还有斯大林，他领导了反对两个“老人”的斗争。十三年后，已到了墨西哥的托洛茨基说，“当我看到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的冲突时，感到很惊讶”。多伊彻被迫承认，托洛茨基“缺乏观察力、直觉能力和分析态度”。

在代表大会上爆发的斗争之前，已经采取了许多行动，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索科尔尼科夫和克鲁普斯卡娅联名写信，要求进行党内讨论。根据多伊彻的证词，就连无原则集团的大师托洛茨基也对这个联盟的组成感到惊讶。

> “他不明白，索科尔尼科夫这个最极端狂热的人，本应站在布哈林一边，为什么却加入了列宁格勒派”。[374]

托洛茨基还对莫斯科党组织和列宁格勒党组织之间突然尖锐化的分歧感到震惊。

托洛茨基的惊讶不是徒劳的。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带头发言反对政治局多数派的人组成的联盟，其思想基础是极其不拘一格的。反对派纲领的内在不一致

---

[374]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2006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三十五章 反对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和列夫·加米涅夫”校对。

性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他在代表大会上发言说：

“加米涅夫说一套，做一套，季诺维也夫说另一套，做一套，拉舍维奇说第三套，索科尔尼科夫说第四套”。

斯大林对“分歧史”的叙述主要是围绕人事和组织问题（“如何处置托洛茨基”、在列宁格勒创办《布尔什维克》杂志、在列宁格勒召开共青团会议而共青团中央并不知情等）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这些冲突表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支持者希望保持他们在党内的统治地位，这也表明口号和呼吁掩盖了事件的主要原因——权力斗争。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列宁格勒党团又回到了 1923 年秋季诺维也夫等人在“山洞会议”期间制定的改组党的高级机关的计划上来。此前，季诺维也夫还试图用鲁祖塔克取代斯大林。

权力斗争与各种社会力量的利益有机地交织在一起。托洛茨基并没有夸大其词，他说：“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在敌视列宁格勒上层领导特点和作风的心态后面”，是地方对中央垄断的不满，托洛茨基指出：

“各中心城市的预算都太大。它们都有工业，有报刊，有十分强大的组织，有思想优势，但有利于农村的事做得太少，而只提供响亮的空泛口号——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许多发言不过是这一思潮大大减弱了的余波”。[375]

托洛茨基在与列宁主义者的斗争中发现的主要危险是“农民倾向”，即“慢慢滑向庄稼汉的热月”：

“至于我国的整个社会生活，由于世界革命迟迟没有爆发，由于工业落后，为这种倾向造成了良好的物质前提，——这一点是不可能有任何疑问的”。[376]

此外，托洛茨基认为，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导致了这样一个事实：

“其实，缺乏阶级斗争锻炼的年轻一代就是在这种论战中形成的。完全可以有把握地断言，正是这种情况为农民倾向的发展创造了最为广泛、最易于滋生的土壤”。[377]

托洛茨基看到，斗争的逻辑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得出了与他在 1923 年受到他们批评时相同的观点。托洛茨基认为：

“现在，完全无可置疑的是，所谓富农倾向从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来，尤其是从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来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最大推动力。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主要是指责它对农民估计不足。

……

结果，就出现了表面上十分荒唐，但当时完全合乎规律的怪现象：列宁格勒组织同反对派斗争得最坚决、对农民估计不足抨击得最猛然、叫喊“面向农村”的口号嗓门最高，却率先避开已出现的党的转折的后果，这一转折的思想根源就是同所谓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378]

托洛茨基错误地估计了政治局大多数成员所持立场的实质。布哈林及其盟友和斯大林都不是“农民倾向”的代言人。虽然布哈林赞成在农村发展市场关系，但他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暂时的现象。布哈林自移居国外以来一直与西欧社会民主主义的领导人保持联系，后来又在共产国际领导层积极工作，他相信世界革命

[375] 托洛茨基《论列宁格勒反对派》，《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6 卷。
[376] 托洛茨基《论列宁格勒反对派》，《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6 卷。
[377] 托洛茨基《论列宁格勒反对派》，《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6 卷。
[378] 托洛茨基《论列宁格勒反对派》，《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6 卷。

即将到来。他宣称：

“我们清楚地看到，在我们面前出现了多么巨大的世界历史前景：地球已经在遥远的大革命的隆隆声中颤抖，其规模甚至将超过我们所经历和感受到的”。

为了迎接这些伟大的事件，他建议不要急于发展苏维埃经济：

“我们将拖着农民的马车慢慢前进”。

布哈林支持斯大林关于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立场，只是基于苏联将代表未来世界革命的基础。

然而，斯大林对这一规定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他认为苏联可以迅速建立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无需等待西方的革命。与其他大多数最杰出的苏联领导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不同，他从未移居国外。他在瑞典、德国、英国和奥匈帝国的逗留时间很短，也没有广泛结识西欧社会主义政党的人物。同时，在革命活动的岁月里，特别是在巴库组织工人运动的过程中，他获得了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了解了俄国最有活力的阶级——城市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可能性。他并不倾向于把俄国工人阶级仅仅视为世界革命的后备军和欧洲社会主义联邦的发射台。从苏维埃掌权的第一天起，他就对西欧发生革命起义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与此同时，他在 1917 年夏天已经提出，俄国无产阶级可以率先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然后，他得出结论，这一建设可以进行到底。

托洛茨基认为，俄罗斯能够在社会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发达社会的想法是荒谬的。他对俄国及其文化和历史的蔑视使他无法正确评估一个伟大国家的可能性。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挑战了他和帕尔乌斯一直倡导的不断革命思想。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对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思想的恶毒攻击从何而来？许诺在本国建成自己的社会主义的民族自大狂从何而来？是哪些阶层提出这种反动庸俗的要求的？”[379]

托洛茨基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表示积极反对“民族魔鬼的有限性倾向”，同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然而，他并不急于加入“新的反对派”。在解释托洛茨基的行为时，多伊彻保证说，代表大会正等着看托洛茨基会站在哪一边：

“新对手们的眼睛都盯着托洛茨基，他们在考虑他会站在哪一边，并屏息等待他的表态。然而，在大会召开的两周内，托洛茨基一直保持沉默”。

托洛茨基的沉默是有实际考虑的。在看到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支持者在代表大会上的失败后，托洛茨基并不急于去帮助他最近的敌人。托洛茨基认为列宁格勒“新反对派”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失败是“民族-农民”力量的胜利。同时，尽管代表大会表明斯大林的地位得到了明显的加强，托洛茨基仍然认为对他威胁最大的是布哈林和他的“学派”。在托洛茨基专门分析大会分歧的笔记中，多次提到布哈林，但斯大林却一次也没有提到。然而，政治局选举的结果可能会让托洛茨基相信布哈林最终会获胜。直到 1928 年，托洛茨基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认为新当选的政治局委员加里宁是布哈林的支持者。托洛茨基认为，任命伏罗希洛夫代替 1925 年 10 月 31 日在手术中去世的伏龙芝担任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可以大大加强布哈林的支持者在军队中的地位。托洛茨基对伏罗希洛夫的“右翼”观点深信不疑，以至于后来在 1928 年 10 月，他认为伏罗希洛夫或布琼尼可以通过发动 18 世纪热月式的波拿巴政变来完成社会的反革命

[379]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二卷 第四十一章 列宁逝世与权力转移”，2005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

堕落。

新的政治局候选人彼得罗夫斯基也被认为是“右翼”，而另一位新候选人乌格拉诺夫后来实际上被宣布为莫斯科“右翼”的著名领导人。只有新任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可以被视为斯大林的支持者。

领导层的力量对比迫使托洛茨基寻求胜利者的支持。很久没有与布哈林保持联系的托洛茨基重新与布哈林建立了联系。1926 年 1 月至 3 月，托洛茨基与布哈林进行了积极的通信往来。正如科恩所指出的：

“布哈林说服托洛茨基重新考虑革命的‘重大社会问题’”。

托洛茨基试图向布哈林表明，莫斯科（他在莫斯科发挥领导作用）和列宁格勒（季诺维也夫的主要支持者）之间的分歧加深是危险的。

3 月 4 日，托洛茨基给布哈林写了一封信，信中他对莫斯科党组织负责人乌格拉诺夫进行了控诉：

“您当然知道，乌格拉诺夫在莫斯科对我发动了一场幕后战争，使用了各种军事策略和影射手段，我不想在这里一一列举。通过各种阴谋诡计，我被阻止在工人集体中发表讲话，而这些阴谋诡计往往是不值得的，是对组织的侮辱。同时，在工人中间散布谣言，说我为资产阶级讲课，拒绝同工人讲话”。

托洛茨基还声称，在他被阻止发言的工人集体中存在反犹主义煽动。他写道：

“共产党员不敢向党的机关报告‘黑帮’的鼓动活动，认为他们（而不是‘黑帮’）会被指责为反犹太主义并被开除……你们会说：这太夸张了。在我们党内，在莫斯科，在工人集体中，恶意的反犹主义同时也是诽谤性的宣传竟然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正直的工人竟然在被解雇的威胁下不敢提出问题，不敢核实或驳斥毫无意义的谣言，这是可以想象的吗？”

托洛茨基发表这些言论是有原因的。当时联共（布）赤塔专区索洪多村预备党员小组的会议记录曾广为人知。其中记录了小组一个成员伊万·鲁萨克的下述意见：

“托洛茨基早就开始推行分裂路线。托洛茨基不可能成为共产党员，他的民族属性说明他需要的是投机。我记得季诺维也夫曾有一次在全会上率众围攻托洛茨基，但是看来他和托洛茨基成了朋友。他们对俄罗斯精神作了错误估计，俄国工人和农民是不会跟这些耐普曼式的人物走的”。[380]

内拉瓦声称反犹太主义有助于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他写道：

“中央委员尤里·拉林（米哈依尔·扎尔曼诺维奇·卢利叶）在莫斯科领导了一次关于反犹太主义的课堂讨论，留下一份很有意思的总结……请看寻根问底的无产阶级代表给他提了一些什么问题：‘为什么反对派 76%的人是犹太人？犹太人是怎么占据所有好的职位的？为什么犹太人不愿干重活累活？为什么大学里有那么多犹太人？他们是否伪造自己的文件？如果打起仗来，犹太人会不会当叛徒？他们会逃避兵役吗？反犹主义的原因是否就在于犹太人本身，在于他们的心理、道德和传统？’”[381]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所谓的克里米亚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对犹太人的怀疑和反犹太情绪。1923 年，布拉金制定了一项在包括敖德萨、尼古拉耶夫和

---

[380]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2006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三十六章 反对两个列夫和一个格里戈里”校对。

[381]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2006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三十六章 反对两个列夫和一个格里戈里”校对。

克里米亚在内的地区重新安置犹太人的计划，并给予他们自治权。正如内达瓦指出的那样，这一计划和其他类似的犹太人重新安置计划吸引了热烈的支持，“西方一些亲共产党的狂热分子急忙宣布苏联的‘犹太千年’开始了”。根据内达瓦的说法，“该计划给苏联政府留下了一些印象。预期的经济效益已经得到权衡和检验”。该计划得到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的积极支持。然而，就像在红军中建立犹太人部队的计划一样，犹太委员会也对该项目进行了抵制，因为他们倾向于犹太人的同化。犹太复国主义者也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克里米亚计划”将阻止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殖民。非犹太人口中也出现了反对意见。根据内达瓦的说法，当时苏联的许多人都提出了问题：

> “为什么要把克里米亚这个俄罗斯境内的地中海绿洲交给犹太人？为什么犹太人总是能得到最好的一切？”

基于这些情绪的存在，托洛茨基反对“克里米亚计划”。他认为：

> “在不可能完全由犹太人居住的犹太自治地区，反犹太主义将会爆发，这将为地中海邻国的反犹太主义宣传提供素材”。

到 1926 年，“克里米亚计划”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在阿穆尔河左支流比拉河沿岸安置犹太人的计划。这个项目没有引起任何明显的反对，围绕“克里米亚计划”而沸腾的激情也随之平息。

显然，托洛茨基提出反对他、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斗争的反犹背景问题，是政治斗争中的一个举动。托洛茨基以这种方式迫使他的对手在批评他时再次表现出克制，以免被指责为反犹主义。正如多伊彻所写，在给布哈林的信两星期后，托洛茨基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 “政治局委员们耸耸肩，把这个问题搁置一边。布哈林因尴尬和羞愧而脸红，但他无法说出反对他的同事和盟友的话”。

在让布哈林“尴尬”之后，托洛茨基看到，他对反犹太主义问题的猜测让他的对手陷入了困境。

多伊彻强调说：

> “犹太人在反对派中非常突出.....与此同时，斯大林主义者中的犹太人很少，布哈林主义者中的犹太人就更少了”。

然而，这些民族构成上的差异不太可能起到根本性的作用。应该考虑到，斯大林路线的许多著名捍卫者都是犹太人（如雅罗斯拉夫斯基、卡冈诺维奇、泽姆利亚奇卡、梅里斯）。在“布哈林学派”中，也有许多犹太裔人士（艾亨瓦尔德、罗齐特、戈尔登贝格、采伊特里等人）。然而，托洛茨基以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支持者都积极利用反犹太主义这一话题进行自卫。

为了消除这种反对派论调的影响，斯大林发表了一份特别声明，大意是中央委员会打击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是因为他们是反对派。然而，这一声明也被解释为反犹宣传的一部分。托洛茨基在《热月和反犹主义》[382]一书中写道：

> “每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完全清楚这个声明有意把话说得模棱两可，看样子似乎是为了反对反犹主义的极端做法，实际上是为它提供营养。‘别忘记反对派的领导人是犹太人’——这就是发表在所有苏联报纸上的斯大林的话的真正意思”。[383]

---

[382] 译者未找到本书中文版翻译。——译者。

[383]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2006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三十六章 反对两个列夫和一个格里戈里”校对。

很明显，托洛茨基准备以同样的热情攻击斯大林等人在反犹斗争中的被动和积极。托洛茨基对其对手的反犹太主义指控是蛊惑人心的，完全是由政治斗争的目标决定的。出于同样的目的，托洛茨基还对他个人作为 1923-1924 年反对派领袖的偏见进行了指责。托洛茨基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四月全会（1926 年）上发言时抱怨道：

“在任何场合，对半托洛茨基主义的指责都会从右飞到左，从左飞到右。托洛茨基主义的幽灵是维持机器政权所必需的”。

事实上，政治局大多数成员对托洛茨基的攻击并不是因为他的民族血统或个人对他的厌恶，而是因为他的立场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立场在本质上是接近的，这一点他后来也承认了。与“列宁格勒反对派”一样，托洛茨基坚决反对党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后通过的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

在联共（布）中央四月全会（1926 年）上，托洛茨基投票赞成加米涅夫对李可夫起草的决议草案的修正案，从而表明了对“列宁格勒反对派”领导人的支持。全会之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举行了会晤，结束了他们之间的冲突，为他们新的合作开辟了道路。

托洛茨基的病又发作了，他再次把这种病称为“疟疾”，这推迟了集团的最后敲定。托洛茨基再次抱怨发高烧。显然，与国家领导人的尖锐对立再次给托洛茨基造成了压力，引起了身体的剧烈疼痛反应。似乎每当他进入另一轮蓄意的无望斗争时，他的机体就要求他停下来。托洛茨基之所以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演说家，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为他拥有对周围环境高度敏感的天赋。这种天赋可能使他能够捕捉听众的情绪，并立即将其转化为语言、手势和表情。然而，托洛茨基从小就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的政治观点也是如此，因此他并不愿意听从自己天生的直觉。相反，他倾向于盲目相信自己的分析结论，因为他深信自己的理论知识有多么渊博。然而，他没有意识到，他的分析结论往往是肤浅的，因此不止一次让他失望。他决定依靠现代疗法和外科手术的成就来治疗自己的疾病。

这一次，托洛茨基决定隐姓埋名前往德国治病。托洛茨基剃掉了胡须，拿着以乌克兰教育家库兹缅科的名字签发的护照，在纳塔利娅-塞多娃和一名警卫的陪同下，于 1926 年 4 月中旬抵达柏林。托洛茨基在一家私人诊所度过了为期六周的大部分时间，并在那里切除了扁桃体。但在警方通知医院管理部门白卫移民准备暗杀托洛茨基后，他被匆忙疏散到苏联大使馆，在那里他与驻德国大使尼克里斯廷斯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后者自 1923 年以来就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积极成员。

不久，托洛茨基回到苏联，又开始抱怨发烧和高烧。大约一年后（1927 年 5 月 4 日），主治医生哥特向塞多娃承认，托洛茨基的健康状况让他束手无策。他指出：

“体温偶尔会升高到 37.0–37.1 度，但已不再使他虚弱。奇怪的是，狩猎时的身体疲劳、呆在空气相当新鲜的地方、坐在帐篷里等等，对他的影响一点也不严重”。

托洛茨基认为，他是在 1923 年的“野鸭狩猎”中感染了疟疾。事实上，在狩猎期间，他既暴露在低温和寒风中，同时又从政治斗争分心，因此他的发烧和感冒症状得到了缓解。显然，在苏呼米或柏林时，他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康复的。然而，托洛茨基一回到莫斯科并投入政治斗争，他的病症就又复发了。与以往的情况一样，托洛茨基生病的同时，党内从 1926 年年中开始了尖锐的政治斗争，并一直持续到 1927 年年底。和以前一样，身体的这种痛苦反应与他在政治

上遭受严重失败的情况相吻合。托洛茨基脆弱的神经系统和病态的机体向他的意识发出了绝望的信号：他处于危险之中。然而，托洛茨基一如既往地无视这些警告，继续参与危险的政治游戏。

从柏林返回后，托洛茨基开始全力团结反对派的联合集团。这并非易事。许多托洛茨基主义者不信任季诺维也夫派，而季诺维也夫派也不信任托洛茨基主义者。然而，这些反对派（“工人反对派”成员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决定联合起来。托洛茨基在 1926 年 6 月 6 日给政治局的信中，以批评乌格拉诺夫的报告为借口，在扎莫斯科沃列茨基区委扩大全会上提出了“联合反对派”政治纲领的若干规定。正如在 1907 年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一样，他建议建立一个“文化和政治水平更高的新领导层”，以取代现任领导人。领导层的更迭将以民主的名义进行。托洛茨基要求改变“党的制度”，以确保“无产阶级”在国家经济和文化生活中的“适当地位”，并奉行“工人民主，首先是党内民主的路线”。

同 1923 年一样，争取民主的斗争以依靠在武装部队中担任要职的人员为前提。1926 年 6 月 6 日，在莫斯科附近的森林中发现了季诺维也夫的积极支持者、军事副人民委员拉舍维奇举行的秘密会议，这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还有报道称，季诺维也夫正在利用共产国际机构编制和分发反对派材料。

联合反对派最终在 7 月（1926 年）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正式成立，并向全会提交了一份“十三人声明”，其中包括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克鲁普斯卡娅、皮达可夫、拉舍维奇、穆拉罗夫等人。声明强调必须为民主和反对官僚主义而斗争。毫无疑问，“声明”中包含了许多有理有据的言论，涉及国家存在的尖锐问题（工业发展滞后、失业率和零售价格上涨等），对政府不重视经济中日益严重的危机现象以及党内日益严重的官僚化作出了公正的结论。然而，这份“声明”的作者名单表明，这些言论是在权力斗争过程中提出的口号。

只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在党内担任领导职务，他们就会把关于领导层经济政策失败的“四十六人声明”视为颠覆性的，不到三年后，他们自己也指责党的领导层的经济政策“使国家更接近崩溃”。这些“声明”的警告可能有其道理，但“四十六人声明”中对国家形势和政府政策的全面否定和“十三人声明”中的批评都过于夸张，而且提出的解决方案似乎也很可疑。

两年前，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谢维奇等人还污蔑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攻击“党官僚政权”，现在他们却欣然签署了似乎是从“四十六人声明”中逐字摘录的措辞。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现在签署的声明中写道：

> “目前处于统治地位的派别的演变表明，毫无疑义，1923 年的反对派的核心人物曾经警告背离无产阶级路线的行径的危险，以及那种日益增长的机关制度的威胁，是完全正确的”。[384]

如果说三年前季诺维也夫等人从四十六人的要求——召开党的工人会议修改党的政策——中看到了政变的企图，那么现在他们又提出了类似的要求——

> “我们在此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提议：让我们通过共同的努力在党内恢复一种制度，使得一切有争论的问题都能完全按照党的传统以及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感情和思想来加以解决”。[385]

当托洛茨基主义者科西奥尔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宣称托洛茨基和什利亚普尼科夫在国家工作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用时，他是在捍卫在十月革命的浪潮中被推上国家领导岗位的领导人的权利，他们几乎终身都是国家行政机构的掌舵人。

---

[384] 托洛茨基《十三人声明》，“十一、关于派别活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83 年第 2 期。
[385] 托洛茨基《十三人声明》，“十二、为了团结”，《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83 年第 2 期。

现在，“联合反对派”的领导人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他们声称，中央书记处有一个计划，要“改组政治局，开除一些曾在列宁领导下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由新的成员代替他们，这些新成员将组成拥护斯大林同志领导地位的可靠的基础”。[386]

“十三人声明”与“四十六人声明”的最大区别或许在于批评的个人化和针对斯大林。经过几年的斗争，托洛茨基终于认识到斯大林是他最严重的对手。多伊彻声称，他早就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说服了。政治局的两位成员都认为主要的打击对象应该是总书记，他们以前反对发表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现在却改变了立场。由于列宁与托洛茨基的斗争以及 1920-1921 年的工会讨论（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是否发表《给代表大会的信》背后的动机）已不再重要，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发现自己与托洛茨基形成了一个集团，他们看到了利用列宁的“遗嘱”来诋毁斯大林的大好机会。列宁关于托洛茨基的作用、扩大中央委员会规模的必要性等思想只是被当作附带的评论，而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上调离的建议似乎才是“信”的核心，而“信”也越来越多地被宣布为“遗嘱”。现在，与 1922/23 年冬天相比，总书记的作用及其权力已不可估量地增长，列宁关于斯大林已将巨大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说法看起来像是一个致命的预言。“声明”的作者强调：

> “列宁在那个被人们认为是他的遗嘱的文件中，清楚而准确地表述了他的思想，根据过去几年的经验，我们同列宁一样确信，斯大林及其集团的组织政策，由于进一步迫害党的重要干部和进一步脱离阶级路线，正在威胁着党”。[387]

1926 年 7 月全会上的讨论异常激烈。针对反对派的要求，斯大林公布了《给代表大会的信》和其他三封未公开的列宁信件。反过来，反对派被指责玩弄“两面派思想”，并在全国多个城市建立地下组织。奥索夫斯基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联共（布）不可能保持团结的问题。讨论的气氛非常紧张，以至于捷尔任斯基在一次情绪激烈的发言后不久就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

根据全会的决定，季诺维也夫被解除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不久，他又被解除了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职务。拉舍维奇被排除在候补中央委员之外。在此之前，他还被解除了军事副人民委员的职务。结果，反对派失去了对共产国际的控制和在军队领导层中的地位。奇怪的是，尽管有这些举动，托洛茨基仍然是政治局委员。领导层似乎仍然考虑到（正如伏罗希洛夫在 1926 年初报告的那样）“托洛茨基受到同情，与其说是在党内，不如说是在党外”。

经过近三个月的党内斗争，疲惫不堪的托洛茨基前往北高加索。1926 年 8 月 30 日，他在给拉狄克的信中写道：

> “我一点一点地写作，接待客人，与度假区的同志们合影留念，打野鸭，我希望你也能这样”。

“度假村的同志们”是反对派成员，托洛茨基被一位匿名党员指控，他在信中指出：

> “列夫-达维多维奇！你不觉得你在最近的中央委员会事件中‘走群众路线’（疗养院）不太圆滑吗？其他政治局委员似乎没有这样做？”

这些疗养院之行和野鸭狩猎活动的结果是，反对派的策略中加强了反斯大林的倾向。如果说“十三人声明”丑化了“斯大林及其集团”，那么季诺维也夫和

---

[386] 托洛茨基《十三人声明》，“补充声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83 年第 2 期。
[387] 托洛茨基《十三人声明》，“补充声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83 年第 2 期。

托洛茨基在 8 月发出的《致中央委员会的呼吁书》则强调，“斯大林派高层”希望“并保证使斯大林取得对托姆斯基、李可夫和布哈林的绝对优势”。为了加强这一阴谋的效果，信的作者声称：“一些属于多数派的政治局委员提到这个计划时非常气愤”。[388]与此同时，反对派领导人决定向党内群众发出呼吁。

反对派用传真机、油印机和打字机复制他们的材料。1926 年 10 月 1 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皮达可夫、拉狄克、斯米尔加、萨普罗诺夫等人在莫斯科阿维阿普里波尔工厂小组会议上宣传了他们的观点。然而，会议以 78 票对 21 票通过的决议谴责了反对派，并要求中央委员会“采取果断措施打击反对派，在采取组织性质的措施之前不能停止”。季诺维也夫试图在列宁格勒的克拉斯诺-普蒂洛维茨工厂发表演说，但被阻止，无法完成演讲。10 月 1 日至 8 日，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党小组中，有 87388 人参加了会议，但只有 496 人投票支持反对派。

托洛茨基试图利用自己雄辩的催眠力量的努力失败了。多伊彻写道：

> “托洛茨基发现自己面对群众束手无策，这还是三十年来的第一次，是他开始革命演说家的生涯以来的第一次。面对一片冲他而来的愤怒的吼叫声，他那无可争辩的论据，他那天赋的说服力和高亢洪亮的声音都无用武之地了。而其他演讲者的遭遇甚至更可怕。显然，反对派第一次同心协力诉诸党内舆论的行动遭到了失败”。[389]

托洛茨基可能觉得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在 1923 年失去了最后的机会。后来，他向自己和其他人保证说：

> “1923 年秋天，我们党内出现了与德国革命的崛起相平行的宏伟崛起。而在革命失败后，我们也经历了低潮”。

他保证说，反对派没有得到工人的支持，因为他们已经厌倦了革命。

> “家庭负担重的、疲惫的工人对革命感到失望，由于惯性留在党内，他们会去反对派吗？不，他们不会。他们会说：政权当然不好，但让他们做他们想做的事吧，我不会加入的”。

他安慰自己说，只有惰性的、懦弱的、粗暴的人才会跟着斯大林走，最勇敢的人跟着反对派走。

> “如果我们把一个仕途主义者当作一个普通人物，我要问：在目前的条件下，这样一个仕途主义者会通过反对派来谋求自己的前途吗？你们知道：他不会……我再问：那些野心家、官僚、黑帮会投靠反对派吗？不，他们不会”。

托洛茨基的话不无道理。野心家不太可能加入反对党。在那些急于谴责托洛茨基的人当中，有许多无原则的仕途主义者甘愿加入执政党。同时，反对派中也不乏雄心勃勃的人，但这并不值得理想化。他们不想放手权力，因此在 1920 年、1923 年和 1926 年都支持托洛茨基。

反对派领导人试图赢得工人阶级听众的同情，而工人阶级听众可以对揭露党内日益增长的官僚主义和对民主原则的攻击做出回应。他们能够接受对新经济政策的批评，因为新经济政策导致了社会分层的重新出现，并使社会平等的希望破灭。然而，它不能不看到，新经济政策带领国家走出了崩溃的深渊。斯大林在党的十四大上指出，1925-1926 年全国农业将达到战前水平的 91%，工业将达到战

---

[388]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给中央委员会的呼吁书》，《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9 卷。

[389]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2006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三十六章 反对两个列夫和一个格里戈里”校对。

前水平的 93%，这是有道理的。

以斯大林为首的党领导层宣称自己是改善人民生活的变革的坚定倡导者，他们站在社会发展的最前沿，这股强大的力量将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联系在一起。正因如此，站在这股强大力量前列的人们被视为新生活的创造者，他们的思想、言论、声明——预示着幸福和平等的世界即将到来，而这个世界越来越多地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斯大林在 1924 年底提出的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表达了主张苏维埃国家经济和政治独立、反对沦为半殖民地的人们的愿望。

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宣布，他坚决反对“使我国客观上必然由依靠国内市场的独立的经济单位变成资本主义总体系附属品”的政策。他要求：

> “我们应该竭尽全力使我国成为经济上独立自主而依靠国内市场的国家，成为能把其他一切逐渐脱离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经济轨道的国家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基地”。[390]

这一路线在苏联人民中得到了爱国主义的响应，并在党的队伍和劳动群众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

为了反对流行的“一国社会主义”口号，托洛茨基重新提出了“欧洲联邦”的主张。他认为“‘社会主义欧洲联邦’的口号非常及时”。托洛茨基坚决反对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想法，因为他认为这种想法的出发点是“四分之一世纪”内世界上一成不变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托洛茨基认为这段时期是建立社会主义所必需的。他认为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欧洲资本主义“从困难走向困难”。这势必会放慢依赖进口欧洲设备的苏联的发展速度。“宣称在这种前景下我们仍将建设‘一国社会主义’，简直就是在玩文字游戏”。托洛茨基宣布：

> “随着资本主义的逐步衰落，欧洲无产阶级将无法在几十年内掌握政权和经济的假设是错误的。换句话说，对‘一国社会主义’的不加批判的乐观主义，来自于对欧洲革命的严重悲观主义”。

其他反对派领导人也对“一国社会主义”持类似观点。季诺维也夫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宣称，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充满了民族局限性”。加米涅夫则宣称，这一理论是“用民族改良观点.....来代替国际革命观点”。

对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批评者正确地提请人们注意，正如后来发生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实现这一理论会遇到困难。然而，他们考虑到的不是苏联人民的真正潜力，而是被夸大了的世界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的言论使本国工人只能被动地等待外来的帮助，使他们的活动沦为世界革命的辅助角色。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反对派在群众中宣传的失败。斯大林把批判不可能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作为反对派斗争的主旨并非偶然。

“向群众进军”尚未完成，反对派领导人意识到自己的失败。1926 年 10 月 4 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致信政治局，建议结束论战。一周后，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

> “无疑地，反对派是惨败了。同样很明显，在党的队伍里对反对派的愤慨正在增长”。[391]

---

[390] 斯大林《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二 苏联的内部状况；一、整个国民经济”；《斯大林全集》，第 7 卷。

[391]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2006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三

斯大林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现在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保留反对派的首领们做中央委员。现在主要的问题就在这里”。[392]

斯大林为反对派领导人提出的条件包括无条件服从党的机关的决定，承认反对派工作的谬误和危害，与“工人反对派”以及共产国际中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者决裂。作为对反对派的让步，斯大林同意“缓和”批评的语气，承认他们有权在党小组中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并在党代会上以讨论单的形式提出自己的观点。反对派接受了这些条件。

然而，马克斯-伊斯特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有人怀疑这是在托洛茨基的建议下发表的，托洛茨基公开宣称斯大林是“革命的掘墓人”，这些都无助于缓和论战的基调。与此同时，在 1926 年 10 月 26 日开幕的党的十五大上，布哈林对反对派领导人的批评最为尖锐。反对派企图在斯大林和政治局其他成员之间制造分裂的算盘落空了。

在党的十五大召开前夕，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解除了托洛茨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解除了加米涅夫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然而，他们和季诺维也夫一样，仍然是中央委员会成员。党的十五大一致通过了谴责反对派的决议。自革命开始以来，托洛茨基第一次发现自己处于最高职位之外，而这个最高职位将决定党和国家的命运。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联盟并没有给他带来政治上的成功，但现在他没有了斗士的后盾。从他在 1926 年冬天写的笔记来看，他无意放下武器，只是在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场合和方法，以便在 1927 年新的一年里重新开始斗争。

有过多年地下工作经验的托派和季诺维也夫派党员，现在在党内斗争中采用了他们在筹备俄国第一次革命时广泛使用的方法。从 1926 年夏天开始，托洛茨基主义者就与联合反对派的其他成员一起组织了秘密会议。根据多伊彻的说法：

“他们在墓地、在树林里、在市郊等地集会；为了保卫自己的会议还派了警卫和放了哨”。[393]

关于托洛茨基可能武装起义的传言使党感到震惊，有时迫使莫斯科的学生——党的多数派的支持者——闻警而起，穿上内务部队（特殊目的部队）的制服。斯大林领导的政治局的支持者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领导的反对派的支持者之间的新内战似乎一触即发。

后来，1927 年 11 月 16 日，联共（布）党员库佐夫尼科夫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区党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报告说，1926 年，国内成立了一个平行的反对派共产党，在地下开展活动。该党组织收缴党费，建立州委员会、区委员会和基层组织。该党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敖德萨、哈尔科夫、格鲁吉亚、乌拉尔和西伯利亚都设有地方委员会。库佐夫尼科夫本人领导着“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共产党乌拉尔地区地下委员会。在党的十五大（1926 年 10 月 26 日至 11 月 3 日）期间，反对派举行了一次平行会议。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哈尔科夫建立了地下印刷所。

托洛茨基通过组织地下活动，如他要求开除什利亚普尼科夫和米亚斯尼科夫党籍的活动，无法指望联共（布）领导层对他表现出比对“工人反对派”领导人

---

十六章 反对两个列夫和一个格里戈里”校对。

[392]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2006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三十六章 反对两个列夫和一个格里戈里”校对。

[393]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2006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三十六章 反对两个列夫和一个格里戈里”校对。

更宽松的态度。斗争的逻辑使他与联共（布）的领导层发生了激烈的对抗，联共（布）的领导层在执政的岁月里积累了镇压公开和秘密抵抗的丰富经验。

# 第 十 九 章

## 联合反对派的陨落

整个冬天，托洛茨基都在忙于准备大量的声明、信件和分析。他与反对派团体的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通信。随着托洛茨基和其他反对派领导人与他们以前的对手结成广泛的联盟，诉诸地下活动，他们争权夺利的无原则和冒险性质变得越来越明显。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不能也不愿为国家提供不同的社会秩序或政治组织。他们曾在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委员会中任职时，他们既不质疑党治理国家的垄断权，也不质疑党内的指挥和控制方法。这表明他们可以主要依靠专制方法来治理国家。现在，反对派领导人宣布要推翻“党政权”，但他们并没有批判性地反思自己在最高权力岗位上的活动，也没有提出党内生活民主化的有效方案。此外，他们的纲领要求还尖锐地抨击了国家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向和平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转变。

反对派领导人真正能提供的唯一选择就是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支持者作为政府的管理精英。他们试图让共产党人相信，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比斯大林好得多的领导人，斯大林成了他们攻击的主要对象。对斯大林的攻击不断使用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一句话，其中提到斯大林“太粗暴”。反对派故意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列宁是在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很困难的情况下，在克鲁普斯卡娅的抱怨影响下写下这些笔记的，斯大林理所当然地斥责了克鲁普斯卡娅，因为她违反了对列宁健康的严格控制。反对派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列宁至死都信任斯大林，并经常就国家生活的所有问题向他请教。他们继续散布自己的说法，说列宁在党的十三大上“准备了一枚炸弹”来对付斯大林，只有他的疾病才阻止了他在政治上摧毁斯大林。

与此同时，每一个不仅在群众大会的讲台上，而且在工作中都能看到党的领导人的人，早就得出结论，斯大林作为政治家明显胜过反对派领导人。

从苏维埃政权执政的第一天起，斯大林就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国家生活中最多样、最复杂问题的人。托洛茨基分子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对斯大林同时掌管两个委员会（民族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表示不满，列宁在回答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时宣称：

>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这里轻率地指责说：斯大林身兼两个人民委员部的工作……试问，为了保持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目前的局面，为了处理突厥斯坦、高加索等等问题，我们此刻能够做些什么呢？要知道，这一切都是政治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必须解决。这类问题欧洲各国已经研究好几百年了，只有在民主共和国才解决了极小一部分。我们正在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有一个各族人民的代表都能找他深谈的人。哪里能找到这样的人呢？我想，除了斯大林同志以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提不出第二个人选来。工农检查院也是这样。工作很艰巨。为了能进行检查，需要有个有威信的人来领导，否则我们就会陷入细小的倾轧而不能自拔”。[394]

[394]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2006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三

日后，当反对派领导人在宴席上消磨时光、在狩猎中沉醉、在度假村享受治疗或撰写业余的艺术文章时，斯大林却在处理数十件复杂的公共管理案件。他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对任何问题都一丝不苟的研究精神，为他周围的人树立了榜样。斯大林的同事莫洛托夫在斯大林晚年回忆说：

“斯大林有惊人的工作能力。他对自己需要什么了如指掌，并紧随其后……他不是只看一个方向，而是看所有的方向……斯大林会问：‘重要吗？’‘重要’他会写到最后一个逗号”。

斯大林对他的一些同事的肤浅深恶痛绝，他们不是研究问题，而是依靠老生常谈的陈词滥调，是提出漂亮的口号，而不是提出解决方案。

斯大林在日常生活中的谦虚与他的一些同事大相径庭。即使是他的前秘书巴扎诺夫这样一位逃往国外的反对派观察者也写道：

“这位热情洋溢的政治家没有其他恶习。他既不爱钱，也不爱享乐，既不爱运动，也不爱女人。除了他的妻子，女人是不存在的”。

多伊彻承认，斯大林和他的家人“住在克里姆林宫一栋为仆人准备的房子里的一间小公寓里.....总书记的个人生活带有平凡甚至禁欲主义的印记，这一事实给党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党的成员遵循清教徒的风尚，因此对克里姆林宫中腐败和挥霍的苗头感到担忧”。

但是，对于斯大林作为党的领导人的政治选择来说，他在复杂的党内斗争环境中的行动是决定性的。无论是近距离观察斯大林的人，还是普通党员，都能看出斯大林在竭尽全力防止党内分裂，防止国家发生新的内战。党员们目睹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或者这三位领导人是如何在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上共同反对多数派的，而斯大林则竭尽全力通过妥协或采取有效措施镇压充满分裂的叛乱来防止分裂。

多伊彻写道：

“在当时的许多人看来，与其他政治领导人相比，斯大林并不是最不宽容的人。与其他三驾马车相比，他对反对者的攻击没有那么恶毒。他的讲话总是充满了善意和略带欢快的乐观情绪，这与当时普遍存在的自满情绪是一致的。在政治局讨论重大政治问题时，他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同事。对党的听众来说，他不像是一个有私心或怀有个人恩怨的人。他似乎是一个忠实的列宁主义者，一个只为事业而批评他人的理论守护者。即使在政治局闭门开会时，他也给人这种印象”。

最后，斯大林在党的领导层和普通党员中得到了广泛支持，因为他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首倡者。这一立场的前提是国内工业的快速发展、新城市的建立以及农村的现代化，而无需等待世界革命。实现这种国家变革的愿望符合广大党员和劳动群众的愿望。

1927 年，国际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出现了对苏联进行新一轮干预的可能性问题，这再次证明了加强国家经济和国防潜力的必要性。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于 1927 年 2 月 23 日向苏联发出的威胁性照会成为新战争言论的标志。在当时的任何政治演说中，国际主题都不绝于耳。显然，作家伊尔夫和彼得罗夫在描写有轨电车开通时所说的话并非巧合。彼得罗夫在描述 1927 年 5 月 1 日斯塔尔戈罗德有轨电车开通时，描绘了人民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在这次活动的集会上发表演说时，如何在讲述苏联的国际形势时迷失方向，直到把他所知道的关于张伯伦、墨索里尼和罗马尼亚统治集团的一切都说出来才罢休。

---

十章 斯大林如何掌握了无限的权力”校对。

1927 年 5 月 9 日，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创刊 15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发言中谈到了国际话题。然而，他的众多听众（季诺维也夫的演讲通过电台播出）对演讲者尖锐批评苏联在英国的外交政策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活动感到惊讶。与加里宁不同，季诺维也夫涉足国际主题并非偶然。

甚至在季诺维也夫发表讲话之前，正在加格拉度假的托洛茨基就在 3 月和 4 月向政治局发出了多份照会，批评苏联和共产国际当时在英国和中国的政策。1927 年 4 月，季诺维也夫给政治局和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照会中也提出了类似的批评。

托洛茨基认为，在最大的大英帝国的心脏地带发生的宏大罢工，以及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的革命运动的发展，都是支持世界革命即将爆发的有力论据。这些事件使他得以强调苏联事件对世界进程的依赖性。他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经济问题的决议草案中写道：

> “党一刻也不能忘记，苏联的经济只有作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才能发展。苏联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赖性今后必须加强而不是削弱”。

这一论点有助于托洛茨基反对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他在《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理论》一文中指出：

>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有害的，对此不仅联共，而且整个共产国际都应理解和认同”。[395]

与此同时，英国工会总委员会宣布的总罢工的失败和蒋介石发动的政变，以及对共产党人的屠杀，对托洛茨基及其盟友来说意味着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政策的失败。托洛茨基宣称自己和他的支持者是国际工人运动的“左翼”，并宣布他打算“在共产国际内全力斗争，以改变.....严重的机会主义政策”。他公开蔑视“斯大林的路线，列宁曾警告过这种危险”。托洛茨基表示，他相信“路线将得到纠正”，“革命布尔什维主义将取得胜利”。

政治局没有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说明作出反应，但季诺维也夫试图通过广播向广大听众发表演说，立即遭到了严厉的反击。5 月 10 日，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主席团和 5 月 11 日联共（布）列宁格勒委员会主席团将季诺维也夫的讲话描述为：

> “在党面前犯下的最大的罪行，违反了季诺维也夫和其他领导人在 1926 年 10 月 16 日声明中作出的停止派别斗争的承诺，是闻所未闻的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

莫斯科委员会和列宁格勒委员会要求中央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追究季诺维也夫的党内责任。5 月 12 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宣布季诺维也夫的讲话“杂乱无章”，并将他的案件移交给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作为回应，反对派领导人于 5 月 25 日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递交了一份由 83 名党员签署的声明。为了对党的领导层发起新的政治攻势，反对派又从已被打散的派别和团体中抽调成员组成了一个集团。早在 1925 年 12 月，斯大林在党代会上发言时就谈到了反对派领导人之一拉舍维奇制造联合集团的倾向，他虽然“潇洒地反对联合政策，但自己也是联合分子之一……上帝保佑他”。斯大林嘲笑那些“聚集在中央委员会机关周围，建立各种联合”的人。“嗯，这是他们的事，让他们联合吧”。（显然，在当时，“联合分子”和“联合”主要是作为“骗子”和“欺诈”的同义词使用的。小说《十二把椅子》就是在这个时候写成的，描写

---

[395] 托洛茨基《单独一国的社会主义理论》，“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与共产国际”，《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 9 卷。

了伟大的联合分子「骗子」奥斯塔普-本德在 1927 年的冒险经历）。

“八十三人声明”开宗明义地指责党的领导在中国采取了错误的政策：

> “在领导中国革命当中所犯的严重错误，招致了惨重的失败，只有回到列宁的道路上来才能加以克服”。[396]

反对派指责联共（布）领导层错误判断形势，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反对国民党执政的错误建议。随后，反对派罕见地没有对国民党内部形势进行详细分析就发表了讲话。同时，反对派认为政治局对蒋介石发动政变和屠杀中国共产党人负有罪责。

联共（布）领导层对英国工人运动的政策也受到了严厉批评。与事实相反，引起英国统治集团担忧的并不是苏联工会与英国工会的合作，而是联共（布）对工人运动的事务缺乏直接干预，这被宣布为英国对苏联的侵略性增强的原因。反对派指责政治局通过“英俄委员会”与工会总理事会合作。他们认为，这种合作导致英国错失革命良机。

“八十三人声明”宣称党的领导在外交政策上背离了列宁主义原则，认为罪恶的根源在于“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并宣布该理论是“错误的”、“小资产阶级的”、“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声明断言，从这一理论出发的“错误政策”“加速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敌对势力：富农、耐普曼和官僚主义者的发展”。[397]

与以往的类似声明一样，这里强调了许多影响人民切身利益的尖锐问题。同过去一样，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提出一些有吸引力但经济上不健全的想法（例如，建议取消对占农民总数 50%的贫苦农民征税；提高所有工人的工资）。反对派领导人执政时所主张的政策，现在却被宣布为恶毒的政策，给人民带来了苦难。托洛茨基在四年前提出了以大规模失业为代价的“生产集中化”纲领，而现在他却签署了一份“声明”，谴责“工业集中化”正在“牺牲基于工业无产阶级的利益。实际上的失业比已经登记的要多。失业大军的增加使整个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恶化”。[398]

与类似声明的作者一样，反对派领导人再次提出了“活跃党内民主，加强党同工人阶级的活生生的、积极的联系”，反对“破坏”“党内的制度”的“铁的纪律”的口号。声明“召开一次专门的中央全会”，并在会上做出“草拟出大家一致同意的各项决议”。[399]否则，就应进行广泛的讨论，在讨论期间，反对派应与多数派一样有机会发表意见。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外，拉狄克、斯米尔加、萨法罗夫等活跃的反对派人士以及“四十六人声明”的一些共同作者（阿尔斯基、别洛博罗多耶、皮达可夫、谢列布里亚科夫、索斯诺夫斯基、斯米尔诺夫、叶尔钦）也在声明上签名。

反对派在党员中组织征集“八十三人声明”的签名。6 月 27 日，“民主集中派”加入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15 人在“在列宁旗帜下”的声明上签名，其中包括斯米尔诺夫、萨普罗诺夫。这份被称为“十五人声明”的文件包含了大量的历史论述，开篇即号召开展反对“小资产阶级”国内政策和“孟什维克”国际政策的斗争。

反对派的发言成为了当时由奥尔忠尼启则领导的中央协商会议的议事主题。

---

396 托洛茨基《八十四人声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83 年第 2 期。
397 托洛茨基《八十四人声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83 年第 2 期。
398 托洛茨基《八十四人声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83 年第 2 期。
399 托洛茨基《八十四人声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83 年第 2 期。

托洛茨基在与奥尔忠尼启则通信后，开始揣测反对派是如何理解维护本阶级利益的。由于 1927 年夏天国际形势变得更加严峻，战争的威胁真实存在，反对派被指责其言论只会削弱苏维埃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凝聚力，是一群失败主义者。托洛茨基驳斥了这些指责，并举例说明法国激进派领袖克列孟梭如何领导了一场反对法国政府的尖锐政治斗争：

> “克列孟梭集团当时是这个政府的反对派。不顾战争和战时的书报检查，甚至不顾德国人已经离巴黎只有八十公里（克列孟梭说：‘正是这个缘故’），他激烈地反对小资产阶级的优柔寡断，拥护帝国主义者的暴戾残忍。克列孟梭并没有背叛自己的阶级——资产阶级，相反地，他比维维安尼、庞勒维及其伙伴更忠实、更坚定、更坚决、更聪明地为资产阶级服务。后来事变的进程证明了这一点。克列孟梭集团登台执政后，就用更彻底、更带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政策保证了法国资产阶级的胜利”。[400]

与克列孟梭的类比使托洛茨基能够为反对派在对苏联的战争威胁真实存在的时候发起反政府运动进行辩护。

然而，领导层从这种比较中得出结论，反对派急于夺权，准备利用战争或战前局势。8 月 1 日，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发言时，对托洛茨基的信作了如下解释：

> “如果敌人到了离克列姆里宫墙约有八十公里的地方，那末，这位新出现的克列孟梭，这位小丑般的克列孟梭，原来就是因为敌人离克列姆里只有八十公里，所以力图首先推翻目前的多数，然后才去进行保卫。如果我们这位小丑般的克列孟梭能够做到这一步，那末，这原来就是真正地无条件地保卫苏联了”。[401]

托洛茨基向全会与会者为自己辩解，并展开攻势，指责联共（布）的领导背叛了列宁的事业。托洛茨基坚持认为，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已经达到了阶级蜕变的地步，他用法国大革命作历史类比，把他们比作热月政变的组织者。

托洛茨基将热月的堕落归咎于领导层，他解释说：

>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许多人被送上了断头台。我们也枪毙了许多人。但在法国大革命中，有两个伟大的篇章.....当这个篇章是这样发展的——向上发展——法国雅各宾派，然后是布尔什维克，把保皇派和吉伦特派送上了断头台。而当我们这些反对派与你们一起枪杀白卫军、驱逐吉伦特派时，我们迎来了这样一个伟大的篇章。然后，法国又掀开了新的篇章……热月党人和波拿巴党人……开始枪杀左派雅各宾派——当时的布尔什维克”。

托洛茨基向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索尔茨致辞。问道：

> “我想请您谈谈您的看法。索尔茨……要根据哪一章向我们开枪？”

托洛茨基需要这种历史类比，以便将“热月主义”的标签和联共（布）领导层反革命重生的思想更牢固地植入公众意识。与此同时，他还必须在当权者的心目中制造心理障碍，以保护自己免受严厉制裁。虽然当时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和丹东的命运并没有威胁到托洛茨基，但在八月（即法国革命日历为热月的日子），反对派领导人意识到斯大林和大多数中央委员会成员都可能对他们执行民事处决。一年前，托洛茨基曾利用反犹太主义的幌子或指责他们对托洛茨基主义抱有偏见，现在，托洛茨基有必要让他的法官们感到尴尬和困惑。重要的是，托洛茨

---

400 斯大林摘自《托洛茨基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一日给奥尔忠尼启泽同志的信》，《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四 关于战争威胁和保卫苏联”，《斯大林全集》，第 10 卷。

401 斯大林《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四 关于战争威胁和保卫苏联”，《斯大林全集》，第 10 卷。

基并没有想到要质疑这样一个事实：当革命“高涨”起来时，上断头台和枪毙都是可能的，而不会造成不便或精神痛苦。在他看来，只有枪毙那些开枪的人才是极不道德的。托洛茨基坚持不懈地把这种思想灌输给坐在大厅里的人，然后又灌输给他的演讲稿的读者，他问道：

“索尔兹同志，我担心您会按照热月章节来枪毙我们”。

8月8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斯米尔加、拉科夫斯基、穆拉罗夫等人向中央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忏悔声明。斯大林对反对派“在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上都有了一定程度的退却”这一事实表示满意，但他说：

“不要把反对派向我们提出的建议看做党内和平。不要为错觉所迷惑……这是暂时的休战，它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是前进了一步，但也可能不是”。[402]

面对观众的呼喊：“我们不需要停战，我们需要和平”，斯大林会说：

“不，同志们，我们是需要休战的，这一点你们错了。如果要举例子的话，最好就举果戈理的奥西普为例，奥西普说：‘小绳子吗？拿来吧，就是小绳子也会有用的’。我们最好也像果戈理的奥西普那样做法。我们的物资还不够充裕，我们的力量也还不够强大，所以不能够轻视一条小绳子”。[403]

作为停战的条件，斯大林要求反对派立即解散“他们所拥有的派别，该派别前几天将在莫斯科召开非法会议”。托洛茨基在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宣布，反对派“别无选择”，只能服从全会的决定。

中央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自1923年以来，“最初以托洛茨基为首，自1926年以来又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反对派，利用党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必须克服的每一个困难，打击我们党的团结和党的领导，在任何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面前都不罢休”。决议宣称，反对派“客观上正在成为反党反苏势力聚集的中心，国内外反革命的腐化活动已经指望着它”。然而，尽管语气严厉，该决定还是巩固了停战的双边性质，反对派领导人仍留在中央委员会。

反对派决定利用暂时休战的机会巩固自己的力量。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召开还不到一个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穆拉罗夫和彼得森就在9月6日的声明中提到把大会前的讨论缩短为一个月，要求在9月15日至20日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会。在此之前的三天，即9月3日，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13名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为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起草了《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纲领》草案。该纲领的名称本身就表明托洛茨基及其同伙在党内有一个党派。

托洛茨基在9月12日给他的同事叶尔辛写了一封信，要求他澄清有关叶努基泽的一些信息，以便让他妥协，从这封信来看，托洛茨基并不知道新的麻烦正笼罩着反对派。就在小说《十二把交椅》中描写的克里米亚大地震发生的同一天，莫斯科也发生了一起政治事件，其破坏性后果类似于地质大灾难，伴随而来的是迄今为止深藏在苏联社会深层的力量浮出水面。保卫局的机关搜查了前工厂主的儿子谢尔巴科夫的公寓，并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地下印刷所，确定了房主与一些党员——反对派的支持者（格伦斯坦、格尔多夫斯基、姆拉赫科夫斯基、奥霍特尼科夫等人）——的关系。在9月13日的报告中，国家保卫局提到了一名被捕者

---

402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关于反对派一九二七年八月八日的‘声明’”，《斯大林全集》，第10卷。

403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关于反对派一九二七年八月八日的‘声明’”，《斯大林全集》，第10卷。

的证词，他说：

“在军界存在着一个以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同志为首的运动……没有说这个组织打算发动政变的事，但这是不言而喻的”。[404]

揭露印刷厂的消息表明，国家领导人已决定对地下反对派展开积极斗争。尽管除了关于军事政变“运动”的谣言之外，保卫局什么也拿不出来，谢尔巴科夫的外来阶级出身也难以证明印刷厂的“白卫军”性质，但地下反革命活动的指控开始被用来对付反对派。9 月 15 日，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处听取了雅罗斯拉夫斯基的报告《关于联共（布）党员同非党员一起参加非法反革命组织活动的问题》，报告引用了保卫局的这份报告。9 月 22 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向所有党组织发出了一份关于披露印刷厂情况的通知，其中指出：

“部分被捕的非党人员确实与某些想要按照毕苏斯基政变的模式在苏联发动军事政变的军界人士有联系”。[405]

这些事件改变了托洛茨基的计划。早在 9 月 17 日，他就从纳尔奇克写信给季诺维也夫，说他将在那里逗留到 9 月 25 日，然后前往基斯洛沃茨克。显然，托洛茨基像往常一样，准备在政治斗争之前休息一段时间。然而，托洛茨基并没有去基斯洛沃茨克，而是返回了莫斯科，听取了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及其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对托洛茨基的主要指责之一是“托派非法反党印刷所问题”。斯大林指出：

“反对派已经糊涂透顶，居然把自己驱入没有出路的绝境，以致不得不进行选择：或者倒向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党一边，或者倒向……反党非法印刷所叛徒那一边。永远在这两个阵营之间徘徊是不行的。现在是选择的时候了。或者跟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在一起，那就要……反对所有一切叛徒；或者是反对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那就……滚到一切叛徒和蜕化分子那儿去，滚到各种舍尔巴柯夫分子和其他败类那儿去”。[406]

斯大林指出：

“在今年八月召开的上一次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有些委员责骂我，说我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态度太温和，说我劝阻了全会立即取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中央委员资格。（听众喊道：“对，我们现在还要骂。”）我那时建议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采取比较温和的方针，也许是过于仁慈而犯了错误。（喊声：“对！”彼得罗夫斯基同志喊道：“对，为了那件腐烂‘小绳子’的事我们一直要骂！”）但是现在，同志们，这三个月来我们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在反对派违背了他们在八月八日的特别“声明”中所提出的取消自己的派别组织的诺言而再一次欺骗了党之后，决不能再容许采取温和态度了。现在我们要站在那些要求取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中央委员资格的同志们的前列。（热烈鼓掌。喊声：“对！对！”有人喊道：“应当把托洛茨基开除出党。”）同志们，这一点让代表大会去决定吧”。[407]

在总结托洛茨基的政治生涯时，斯大林这样讽刺这位战败者：

---

[404]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2006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三十七章 在‘张伯伦到托洛茨基’的战线上”校对。

[405]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2006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三十七章 在‘张伯伦到托洛茨基’的战线上”校对。

[406] 斯大林《俄国反对派的政治面貌》，《斯大林全集》，第 10 卷。

[407] 斯大林《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五 反对派在怎样‘准备’代表大会”，《斯大林全集》，第 10 卷。

“为什么托洛茨基没有能够‘攫取’党内的权柄，窃取党内的领导呢？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托洛茨基没有取得领导的意愿吗？托洛茨基为争夺党内领导已经跟布尔什维克斗争二十多年了，难道这不是事实吗？为什么他没有能够‘攫取’党内的权柄呢？比起我们党内现在的一些领袖来，难道他是较为逊色的演说家吗？作为一个演说家，托洛茨基比我们党内现在的很多领袖都要高出一头，这样说不是更对吗？托洛茨基尽管有演说的技巧，尽管有取得领导的意愿，尽管有才干，结果还是被排斥于联共（布）这个伟大的党的领导之外，这是什么原因呢？”[408]

斯大林将托洛茨基的失败归咎于他脱离了党：

“托洛茨基有意把原因归于：我们党（在他着来）是一群盲目跟着党中央跑的只会表决的乌合之众。但是，只有那些鄙视我们党并把我们党看做贱民的人才会这样说我们党”。[409]

斯大林的这些言论感受到了胜利者的胜利，其中既明确承认了托洛茨基的优点，也忠实地观察了他垮台的原因。

托洛茨基把那些拒绝接受他的纲领的党员看作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深深地鄙视人民，而人民在党的群众中比在主要由革命和内战初期的被提名者组成的小反对派中更有代表性。

然而，托洛茨基的蔑视不仅限于支持政治局的党内群众。托洛茨基对他人的傲慢是他性格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他常常轻蔑地驳回亲近之人的合理建议，而依赖于自己的智慧和在西欧的生活经验。当年苏联的一位著名雇员佩斯特科夫斯基在比较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工作作风时指出，斯大林在委员会上总是愿意耐心听取各种意见，包括与自己截然不同的意见。据佩斯特科夫斯基说，托洛茨基会在几天内驱散这样的委员会。

托洛茨基甚至对他的支持者也表现出“贵族对平民的蔑视”，在最尖锐的政治斗争中，托洛茨基一再抛弃这些支持者，任其自生自灭。他既蔑视那些认为他是“他们的”“俄国人”的人，也蔑视那些认为他是“红色犹太教”领袖的人。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试图领导的国家的蔑视，因此他脱离人民，不理解人民。托洛茨基把人民的情绪和愿望与他个人的利益和世界革命的口号对立起来。

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短暂讨论以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而告终。托洛茨基似乎早已对这样的结果有所准备，他把自己被开除一事看成是一个赌徒，为了发大财而不计较一时的损失。在 9 月 30 日给拉科夫斯基的信中，他只是偶然提到了这一事件。正如斯大林所推测的那样，托洛茨基在这些日子里的所作所为特别具有他的乌托邦现实主义的特点。托洛茨基和其他反对派领导人在十月革命十周年之际提出的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的政治局建议中，生动地表现了他对群众情绪的无能为力。

反对派有理由相信，这种行动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然而最近，反对派坚持要求提高所有工人的工资，显然没有考虑到这一建议在经济上是否合理。这一次，托洛茨基因为对工人有吸引力的倡议被国家领导层拦截而感到绝望，他决定表现出自己的现实主义，坚决反对宣布七小时工作制，指责政治局蛊惑人心。他代表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纲领，建议不迟于一年后，在“不减少劳动报酬的情况下”逐步实行七小时工作制。然而，托洛茨基对缩短工作日建议的积极批评被用作他和他的同伙反对改善工人工作条件的证据。正如多伊彻正确指出的那样，反对派

[408] 斯大林《俄国反对派的政治面貌》，《斯大林全集》，第 10 卷。
[409] 斯大林《俄国反对派的政治面貌》，《斯大林全集》，第 10 卷。

可以用“那些超出工人理解力的问题：国民党、英俄委员会、不断革命论、热月政变，克列孟梭等。反对派的语言中惟一不难为工人理解的问题是改善工人命运的要求”。现在，在反对七小时工作制之后，“在反对派的周围筑起了一堵冷漠而充满敌意的墙”。[410]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始终没有注意到这堵排斥之墙。10 月 15 日，列宁格勒中央执行委员会周年纪念会议开幕，宣布实行七小时工作制。两天后的 10 月 17 日，列宁格勒举行了庆祝革命十周年的示威游行。像往常一样，示威者游行经过国家领导人代表站立的观礼台。当示威者队伍经过这个观礼台时，他们突然发现了一辆敞篷卡车，卡车后面站着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其他一些反对派领导人。根据多伊彻的说法，示威者们“认出了这两位反对派领导人并停了下来”，一些人还向他们挥舞着帽子和手帕。人群面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表现“含糊的”。显然，人们的反应中充满了好奇。“反对派领袖们误解了游行者的情绪”。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认定群众在追随他们。

甚至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反对派领导人也没有克服他们的自我蒙蔽，在这次全会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于 10 月 23 日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在全会上的讲话中保证说：

> “列宁格勒的工人阶级……以 10 月 17 日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游行的形式表达了……对官僚主义和压制行为的理所当然的不满”。[411]

托洛茨基似乎从一群惊愕地驻足观看前领导人的列宁格勒人中看到了革命的曙光，他们正等待着号召游行反对“热月独裁”，他相信了自己的虚构和预言。托洛茨基宣称：

> “在去年七月的宣言里，我们十分精确地预言了对党的列宁式领导进行破坏必经的所有阶段，以及斯大林领导的暂时取而代之。我说暂时取而代之，是因为现在的统治集团得到的“胜利”越多，它也就越脆弱。现在可以用下面的结论来补充我们去年七月的预言：斯大林目前在组织上的胜利是他在政治上彻底破产的先奏。这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并且——在斯大林政权这方面——马上就要开始”。[412]

托洛茨基的这些预言和他关于外国干涉苏联不可避免、迫在眉睫的预言一样站不住脚，但显然他对自己的胜利充满激情，因此盲目地相信了自己的结论。反对派参加了中央全会决定宣布的讨论。《真理报》的“争论专页”刊登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及其支持者的材料。与前一年一样，反对派积极分子在党员面前发言。后来，在汇总投票结果时发现，在讨论期间，有 738000 名党员投票赞成“中央委员会路线”，只有 4000 多人投票支持反对派，弃权的不到 3000 人。一切似乎都预示着一场惨败，但托洛茨基显然没有注意到，现在是 1927 年 11 月，4000 人是无法扭转历史进程的。这些天，托洛茨基表现出了与奥斯塔普-本德同样的乐观和活力，后者正在莫斯科四处寻找第十二把交椅，托洛茨基正在准备十月革命纪念日的演讲。

放假前三天，反对派占领了莫斯科工人运动联合会的一间教室，并在那里召开了一次会议。11 月 7 日上午，在反对派莫斯科公寓的窗户上和阳台上，挂着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画像，还有列宁的画像和“回到列宁身边！”的呼吁。

---

410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2006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三十七章 在‘张伯伦到托洛茨基’的战线上”校对。

411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2006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三十七章 在‘张伯伦到托洛茨基’的战线上”校对。

412 托洛茨基《谁害怕我们的政纲》，《俄国局势真相》。

托洛茨基和他的支持者乘车四处巡游，不时停下来向示威者队伍发表讲话。斯米尔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其他一些反对派人士，就像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10月17日在列宁格勒所做的那样，走到特维尔大街拐角处的房子（现在的民族饭店）的阳台上，向经过他们身边的示威者致意。然而，当反对派的领袖准备进攻时，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斯米尔加的所有举措都以“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领导人声明中记录的一系列丑闻而告终。他们详细描述了反对派在节日中于公寓演讲时所遭到的吹口哨、起哄、敲打物品甚至大打出手等等。

正如声明中所说的那样，斯米尔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格伦斯坦、阿尔斯基和其他走到阳台上的人被扔了“黄瓜和西红柿”，这顺便证明了苏维埃国家在恢复农业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反对派领导人在发言中强调，克拉斯诺普列先斯基区委书记柳蒂亚、克拉斯诺普列先斯基区苏维埃主席米纳切夫、莫斯科市委书记莫罗兹和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成员齐夫里诺维奇最积极地参与了针对他们的行动。

反对派的支持者阿尔基波夫在一份声明中描述了11月7日事件的一个插曲，这份声明被收录在《托洛茨基档案》中，并保留了这份文件的字号和印刷笔迹等特点。声明说：

> “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基火车站集合示威的时刻，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穆拉罗夫来到我们这里，克拉斯诺普列斯年斯基区的工人们欢呼着迎接他们：‘万岁！’这时，一伙纯粹法西斯性质的告密者，其中有我们小组的代表艾季诺夫、科罗廖夫和其他一些人，提前组织起来，目的是把他们赶下汽车。我作为一名忠实的党员，始终站在捍卫工人利益的立场上，参加了反对这些现象的斗争。当艾季诺夫爬上车打算殴打托洛茨基同志时，我拽着他的衣领把我们小组的这个恶劣的法西斯分子拖走了。当载着世界革命领袖的汽车离开时，这些法西斯分子用苹果、面包卷、泥巴和他们所有的东西砸他们……当我们回到我们纵队的队伍时，我告诫艾德涅夫说：‘只有法西斯才这么做’当时，科罗廖夫挥拳打了我的头，只因为我尽了一个诚实的工人、一个党员保卫世界无产阶级领袖的职责，也尽了任何一个诚实的工人（即使不是共产党员）保卫领袖的职责……就我而言，我认为我有责任宣布必须制止这种现象，因为它们妨碍工人阶级正确地进入现代政治的进程，而对这些告密者的依赖可能会成为十月胜利进军的全部崩溃”。

关于1927年11月7日的丑闻、斗殴和混战的其他描述都是在首都警察局整理出来的。托洛茨基在这一天年满48岁，他的政治活动始于背着老师在教室里组织的“大合唱”。1927年11月7日，在反对者的口哨声和叫嚣声中，他结束了对俄国革命的参与。伟大的联合行动失败了。

如果我们相信伊尔夫和彼得罗夫的话，那么大约在1927年11月的同一天，“特许权获得者”本德尔和沃罗比亚尼诺夫的活动结束了。后者在莫斯科街头徘徊，悲痛欲绝，而另一位“特许权获得者”，伟大的联合者，却因没有得到他在银盘上寻求的遗产而流血至死。

托洛茨基的失败不仅是对他个人的打击。特别是，俄国的许多寻宝者也遭受了损失。他们发大财的希望就寄托在托洛茨基担任特许权委员会主席上。11月17日，根据人民委员会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的决议，托洛茨基被解除了租让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弗罗亚诺夫在评论这一决定时写道：

> “因此，特许权获得者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靠山.....托洛茨基的失败恶化了外国资本在苏维埃俄国活动的条件”。

然而，托洛茨基及其反对派盟友的失败并没有就此结束。托洛茨基的失败意味着国家终于从那些认为国家的未来只能盲目屈从于世界政治和经济进程的人们手中解放出来。国家选择了建立自己的现代经济、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强大军队的道路。这使它能够在不远的将来经受住严峻的考验。而托洛茨基则被抛到了历史发展道路的边缘。

11 月 7 日晚，托洛茨基通知家人，他们必须离开克里姆林宫。他在俄国沙皇居所的逗留从近十年前就开始了，现在已经结束。当天晚上，他搬到了住在街上的支持者别洛博罗多夫的公寓里，他住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他没有等到 11 月 16 日，即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把反对派积极分子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两天后，克里姆林宫大规模驱逐前国家领导人的行动。当晚，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拉狄克等人离开公寓时，克里姆林宫响起了枪声。因精神失常而长期接受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治疗的越飞自杀身亡。阿德勒的精神分析风格认为，任何行为都可以被解释为非理性的自我主张的证据，因此反对派撰写的讣告将一个精神不健康者的自杀宣布为“社会乐观主义”的表现。11 月 19 日，托洛茨基在诺沃德维奇公墓举行的越飞的葬礼上发表讲话，敦促他的支持者坚守岗位，继续斗争。

但这一号召越来越难以实现。1927 年 12 月 2 日至 19 日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推翻了只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的决定，又把反对派的 75 名积极分子开除出党，其中包括加米涅夫、皮达可夫、拉狄克、拉科夫斯基、萨法洛夫、斯米尔加、斯米尔诺夫和拉舍维奇。萨普罗诺夫集团的成员也被排除在外。针对反对派提出的恢复党籍的申请，大会决定在六个月后才以个人为单位进行审议，条件是他们放弃“八十三人声明”、“9 月 3 日声明”和“十五人声明”。

国家领导层采取措施，确保反对派不仅不在党内，也不在首都。1928 年 1 月 17 日，一群保卫局军官来到别洛博罗多夫位于格拉诺夫斯基大街的公寓。所发生的一幕，就其形式而言，类似于佐先科、伊尔夫和彼得罗夫笔下的家庭公寓争吵。托洛茨基被锁在房间里，拒绝让不速之客进入。保卫局人员破门而入。托洛茨基拒绝穿上衣服离开公寓。多伊彻写道：

> “武装人员脱下他的拖鞋，给他穿上衣服，由于他拒绝离开，就在托洛茨基家人和陪同他们的寡妇伊奥菲的叫骂声中把他抬上了楼梯。（托洛茨基重复了他在哈利法克斯港被带下汽船时所采取的抵抗手段）。保卫局人员不得不把托洛茨基抱在怀里，穿过喀山火车站的站台，在那里有一节车厢在等着他。托洛茨基的儿子列夫跟在他们后面喊道：‘同志们，快看，托洛茨基同志被抬走了！’工人们在他们身后静静地注视着——听不到一声喊叫，甚至听不到一声抗议的低语”。

托洛茨基被送上了一列开往哈萨克斯坦的火车，奥斯塔普-本德就是在这列火车上获得了梦寐以求的一百万美元，他在小说《金牛犊》中被两位讽刺作家复活了。但托洛茨基没想到会在哈萨克大草原上遇到一位地下百万富翁。托洛茨基离开了处决王室命令的起草人之一——别洛博罗多夫——的公寓，前往该命令的另一位共同起草人——领导该地区党组织的戈洛什金处。与别洛博罗多夫不同，戈洛舍金不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而且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尤为积极，甚至在中央全会的激烈讨论中，他还曾向托洛茨基扔过一卷厚重的手册，这引起了斯大林的评论：

> “菲利普，我理解你的感受，但这——不是争论的方式”。

托洛茨基从这种恶作剧中看到了斯大林工作作风的缩影。在被流放到阿拉木图的三个月前，他写道：

> “为什么？既然戈洛舍金等人可以把厚厚一沓控制数字（手册）砸到反对派的头上，为什么还要争论控制数字呢？斯大林主义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最为肆无忌惮，甚至达到了公开流氓的地步”。

斯大林之所以选择流放地，大概是因为他相信托洛茨基在这里不会受到热烈欢迎。托洛茨基前往游牧部落卡扎尔人的后裔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他还不知道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不能自由行动，一会儿被看守，一会儿又躲在他的忠实拥护者的保护下。他不断地变换居住地、国家和大陆，不再像开朗的班德，而是古代传说中永远受迫害的英雄，被基督诅咒的阿加斯费尔。据沃尔科戈诺夫说，奥尔加-格伯就是这样称呼托洛茨基的，托洛茨基是她的岳父。

# 第 二 十 章

## 输掉的复赛

一到阿拉木图，托洛茨基立即对“无法忍受的条件”提出抗议，因为他被安排住在一家旅馆里。抗议得到了批准，托洛茨基和塞多娃住进了一套有四个房间的公寓。托洛茨基随后向加里宁、奥尔忠尼启则和门津斯基提出抗议，要求允许他去打猎。他获得了这一权利。托洛茨基又提出了新的抗议，他希望在阿拉木图把猎狗玛雅交给他，这一要求最终得到了满足。狩猎活动每次都要持续好几天。在寒冷的春天，托洛茨基睡在露天，有一次在转场时还掉进了冰水里。然而，在这里，在哈萨克斯坦的土地上，托洛茨基表现出了惊人的抗病能力。托洛茨基甚至没有感冒过。很显然，托洛茨基的机体对超负荷的体力没有任何抵抗力——只要他能避免尖锐的政治斗争和对不可避免的失败的直觉预期所带来的永恒的压力。

托洛茨基对自己在鸟语花香之地狩猎的成功感到高兴，在同伴们告诉他巴尔喀什湖上的猎物后，他开始考虑狩猎当地的老虎。但很快，炎热的夏天来临了，六月初，托洛茨基动身前往山中的别墅。

托洛茨基并不是唯一一个被逐出莫斯科的反对派。曾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的家中为他提供庇护的别洛博罗多夫被送往科米自治区，谢列布里亚科夫被送往塞米巴拉金斯克，斯米尔诺夫被送往亚美尼亚，拉狄克被送往托博尔斯克，拉科夫斯基被送往阿斯特拉罕，斯米尔加被送往纳里姆。然而，托洛茨基和他的战友们都不打算放弃和抛弃政治讨论，至少是在缺席的情况下，因此他们之间开始了积极的通信。

在沃尔科戈诺夫在其两卷本著作中引用的信件中，有一封是托洛茨基写给他的伴侣的。信中写道：“我想和你下一盘通信棋。我开始了”。就像奥斯塔普-本德在瓦修基的比赛中一样，托洛茨基认为棋局应该从“E2-E4”这步棋开始。沃尔科戈诺夫在评论这封信时说：“我想借此机会说，托洛茨基是个好棋手”。

这一次，托洛茨基主动与他的反对派同僚通信，实际上是开启了一场试图战胜历史命运的重赛。正如瓦谢茨基所指出的，仅在 1928 年 4 月至 11 月间，托洛茨基就向他的同僚们发出了约 800 封信和 500 封电报。他从他们那里收到了大约 1000 封信和 700 封电报。

此时，反对派正在经历一场内部危机。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后不久，季诺维也夫派和托洛茨基派分裂了。托洛茨基主义者中也出现了因对党内领导层事件的不同评价而产生的不团结现象。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与斯大林、莫洛托夫及其支持者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同时对后者在党内的“富农倾向”的批评也越来越多。部分反对派准备支持斯大林。在 1928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托洛茨基在他的信中建议坚定立场，不要对斯大林做出任何妥协。托洛茨基在 1928 年 7 月得到布哈林和加米涅夫秘密会谈的消息后，坚信自己的方针是正确的。

在托洛茨基于 1928 年 9 月 12 日写成并在其支持者中传阅的《与一位善良的党员的公开谈话》中，他宣布“为了党内民主的利益”，他准备与李可夫和布哈林合作。然而，1928 年 10 月，托洛茨基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出，在反对波拿巴主义的斗争中（他从伏罗希洛夫、布琼尼或任何其他会领导军队反对斯大林的

军事领导人身上看到了波拿巴主义的威胁），“托洛茨基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将在街垒的同一边战斗”。和以前一样，托洛茨基选择了一个能让他再次发挥关键作用的组合。然而，他再次回到领导层发挥积极作用的机会微乎其微。托洛茨基的信件并没有得到中央政治局的注意。寄给他的信件开始被拖延，他为此向加里宁和门津斯基提出了抗议。12 月 16 日，总参谋长办公室的一位特别专员从莫斯科致函托洛茨基，要求他“立即停止反革命活动”。否则，他将不得不“改变居住地”。

托洛茨基书面拒绝了这些要求。1929 年 1 月 22 日上午，托洛茨基和塞多娃从阿拉木图被押往伏龙芝（今比什凯克）。他们在那里被装上火车，在路上才被宣布驱逐到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托洛茨基抗议道：

> “君士坦丁堡是弗兰格尔军队残余的聚集地……政治局怎么敢保证他们作为白卫军复仇的对象？难道他们就不能确保前往德国或其他国家吗？”

他拒绝前往，而总参谋长办公室的代表在向莫斯科转达了他的抗议后，命令他在两个十字路口之间的某个路口停下火车，等待指示。就像九年前他的装甲列车在乌拉尔受困时一样，托洛茨基住在一节车厢里，置身于冰天雪地之中。窗外是噼啪作响的冰霜。司机不时地来回奔跑，以保持火车的行驶。托洛茨基等待了十二天，终于等到了命运的裁决。莫斯科给出了答案：由于德国拒绝给予托洛茨基签证，他将不得不前往君士坦丁堡。

火车载着托洛茨基向西驶去。现在，在他的余生中，他注定要稳步走向日落的边缘。几天后，火车带着他穿越了他出生并度过童年的乌克兰大草原，把他带到了他学生时代的城市敖德萨。托洛茨基和妻子在这里转乘“伊里奇”号汽船。他的儿子、第一任妻子和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女儿齐娜留在了他即将离开的国家（他的小女儿齐娜在阿拉木图时死于肺结核）。在土耳其，托洛茨基被安排住在普林基波岛（马尔马拉海）。几年前，成千上万的俄罗斯难民从海上来到君士坦丁堡，被他指挥的军队从克里米亚赶了出来。现在，白军的胜利者正追随着被征服者。

托洛茨基来到的世界充满了不公正。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即使在发达的欧洲和北美，财产极度不平等和社会保障不发达也是其特征。托洛茨基在普林基波的生活刚刚开始不久，资本主义国家就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生产急剧下降，数千万人失业，陷入饥饿和贫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绝大多数人口的境况长期恶化。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由专制政权统治，这些政权既有非人的残暴，也有后来被马尔克斯笔下捕捉到的荒诞不经的闹剧。几乎整个非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都处于殖民统治之下。意大利由前社会主义者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统治。在德国，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党日益壮大。

1923 年，拉狄克和托洛茨基与激进的德国民族主义者进行了冒险的政治博弈，但未能在德国建立起反对凡尔赛胜利者的统一战线。希特勒和他的支持者从 1923 年 11 月 8 日至 9 日啤酒政变的失败中恢复过来，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他们在德国的声望迅速上升。如果说在 1928 年 5 月的选举中，有 2.6%的选民投票支持纳粹，那么在 1930 年 9 月，这一比例已经达到了 18.3%。托洛茨基最生动地体现了俄国犹太共产主义力量的神话，这个神话被战败的白军和彼得留拉带到了德国，成为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基础。纳粹领导人与这些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移民圈子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他们以将俄罗斯从这一势力手中解放出来并摧毁其对全世界的威胁为借口，制定了由德国统治世界的计划。几年间，数百万与托洛茨基毫无关系的各国犹太人以及数千万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

斯人、塞尔维亚人、波兰人和其他民族成为希特勒主义的受害者。

托洛茨基经常谈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似乎可以期待他最积极地参与反对法西斯主义威胁和消除对劳动人民各种形式压迫的斗争。西方许多人甚至对托洛茨基来到土耳其感到震惊，认为联共（布）内部的分裂只是为了掩盖共产主义大阴谋。他们认为，托洛茨基来到普林基波的真正目的是为某个国家的革命做准备。

托洛茨基在马尔马拉海普林基波岛逗留的最初几天，就立即发现自己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因此这些谣言愈演愈烈。托洛茨基刚在新住处安顿下来，据多伊彻所说：

> “来自各大洲的记者就纷纷赶来采访他。来访者和朋友们都来了……年轻的托洛茨基分子前来充当警卫。德国和美国的出版商前来签订图书合同并提供预付款。持不同政见的共产党人从各地写信来，询问有关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问题……托洛茨基对左派和激进知识分子的想象力产生了巨大影响。当萧伯纳写道，他再次成为‘各国极左派所有激进分子的启蒙者和英雄’时，他所言非虚”。

然而，托洛茨基虽然仍然关心世界事务，却没有努力高举捍卫工人、民主和社会正义的斗争旗帜，也没有像切-格瓦拉那样为被压迫者的利益而斗争。托洛茨基有好几年没有离开普林基波。他第一次走出土耳其是在 1932 年 11 月，应当地社会民主党人的邀请访问丹麦，发表了关于十月革命历史的演讲。这次短暂的旅行表明，此时的托洛茨基在政治上已经孤立无援。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府把他视为阴谋反对他们的敌人。西欧的共产党人视他为共产国际的异己分子。苏联政府将托洛茨基抵达哥本哈根与他准备对苏联采取另一次行动联系起来。

托洛茨基抵达丹麦后，王室成员要求将他驱逐出境，因为他是谋杀沙皇的凶手，而沙皇是丹麦公主的儿子。另一方面，苏联大使馆向社会民主党政府表示，一个人在丹麦组织反对苏联的颠覆活动是不可取的。丹麦共产党人支持这一声明。

他用德语发表的演讲是托洛茨基最后一次向大众听众发表演讲。托洛茨基试图使自己的演讲具有学术性，因此避免了他惯用的演说技巧。然而，他试图在演讲中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进行论战。

无论托洛茨基现在写什么、谈什么，他总是把话题转向他与斯大林的对抗。即使托洛茨基在 1930 年的《公开信》[413]中警告欧洲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纳粹党的危险，他也把分析的重点转移到批评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领导层的政策上。托洛茨基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明智呼吁退居幕后，让位于蛊惑人心的要求，即红军对德国进行武装干涉，以阻止希特勒的政党赢得国会选举。托洛茨基认为，苏联政府在希特勒上台后拒绝动员红军是斯大林的重大失误。托洛茨基在专门论述希特勒上台的《德国无产阶级的悲剧》[414]一文的标题后面加上了副标题：《德国工人将再次崛起——斯大林主义永远不会！》。

在抨击“斯大林主义”时，托洛茨基失去了分寸感。苏联人民在最短的时间内成功地将自己的国家变为世界发达国家之一，并拥有一支最强大、技术装备最先进的军队，这些毋庸置疑的成就却被他贬低，仅仅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优点。他拒绝承认苏联工人的高尚品质，拒绝承认他们是大众文化传统的传承者。他从未忘记大声疾呼俄国的长期落后，以及俄国工人阶级丧失了其在十月革命和内战中才表现出的卓越品质。他否定了来自人民的苏维埃生产组织者的力量，经

[413] 译者未找到中文翻译。——译者。
[414] 译者未找到中文翻译。——译者。

常谈到“执政的苏维埃官僚机构的蜕化变质”。

托洛茨基与诗人托尔斯泰笔下“逃离沙皇的愤怒”、在“立陶宛集中营”给伊凡雷帝写“充满毒药的信”的库尔布斯基亲王一样，将大部分精力用于写作诅咒“斯大林主义”及其缔造者——斯大林的作品。托洛茨基在解释斯大林胜利的原因和评价他的个性时，甚至失去了客观性的残余。在谈到阅读斯大林第一篇文章的印象时，托洛茨基写道：

> “这篇文章之所以引起注意，主要是因为在灰色的背景上，文字突然闪现出新颖的思想和明亮的公式。后来我才知道，这篇文章是受列宁的启发写成的，学生的手稿经过了大师的手”。[415]

在托洛茨基看来，“灰色”斯大林被剥夺了最主要的天赋：他“不是一个演说家，面对群众不知所措”。托洛茨基认为，他还缺乏其他优点：

> “他既缺乏理论上的想像力，也缺乏历史远见，更不具备预见的才能”，“在知识领域，尤其是在语言学领域，头脑不大灵活的斯大林常常寻找阻力最小的途径……斯大林的意志力也许并不比列宁的意志力要差。但是他的资质如果用百分比来表示的话，那么只及列宁的百分之十到二十。在智力方面，斯大林也有不均衡的现象：他的实际的洞察力和耍手腕的能力特别发达，而综合能力和创造性想像的能力则较差”。[416]

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这种有精神缺陷的人格具有许多道德缺陷：

> “在他的灵魂中，对当局的憎恨远比对受压迫者的爱来得活跃”。[417]

邪恶的灵魂和灰暗的心灵的结合还表现在斯大林的行为上：

> “他觉得自己是个外省人，行动缓慢，步伐沉重，用妒忌的目光左顾右盼……在政治局中，他几乎总是沉默寡言、闷闷不乐。只有在原始、野蛮、不受偏见束缚的人的圈子里，他才会变得更加平和友好。在监狱里，他与刑事犯相处比与政治犯相处更容易。粗暴是斯大林的一个生理特点”。

为了支持自己的论断，托洛茨基会在车道上以争吵的邻居的口吻说话。他报告了斯大林如何违反法令，强迫他的司机在晚上 11 点后把车开到克里姆林宫的拱门下（这让托洛茨基感到不安），并详细描述了他与不高兴的司机的争吵。托洛茨基重复了斯大林秘书对总书记在家中行为的描述，并向读者介绍了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公寓争吵的最新情况，托洛茨基的妻子塞多娃也参与其中。

由于很难相信对斯大林如此明确的描述是真实的，托洛茨基解释说，只有在人为的构造中才可能出现这种愚蠢和卑劣的难以置信的结合：

> “机器创造了斯大林。但机器是一台死机器……它没有创造力……斯大林是官僚机构中最杰出的庸才”。

托洛茨基不愿意注意到，他自己的失败，除其他外，是由于斯大林的许多优点，特别是他的耐心，他能够透彻而深入地研究任何对国家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包括通过认真听取该领域专家的意见，他的克制和忍耐，即托洛茨基自己所缺乏的那些品质。然而，在对斯大林的批评中，托洛茨基依靠的是毫无根据的保证，仅以日常的流言蜚语和尖刻的七嘴八舌来佐证。

---

[415] 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无疑是斯大林最重要的——不如说是他的唯一的——理论著作。这一篇文章（它长达 40 页）使它的作者有权被承认是杰出的理论家。相当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在这以前或者以后，他没有写出在质量上可以稍与之比拟的任何东西呢？这个谜的解答在于：斯大林的这篇著作完全是列宁启发他写的，是在列宁不断监督下写成的，并且是由列宁逐字逐句修改的”。

[416] 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通向权力之路（2006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为什么斯大林获得了胜利（代结束语）”校对。

[417] 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第二章 ‘职业革命家’”。

斯大林的随从人员也受到了类似的攻击。托洛茨基对他们的一些批评可能是有道理的。在十月革命和内战浪潮中崛起的许多领导人远非完美无缺。然而，托洛茨基声称“斯大林卫队”和他的支持者之间在情商、一般文化、道德和其他素质方面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是毫无道理的夸大其词。安东诺夫-奥夫先科、斯米尔诺夫、斯克良斯基、罗森戈尔茨以及军事革命委员会和铁路水运联合工会的其他领导人，无论是教育程度、职业和生活经验、一般文化水平还是他们的实际成就，都不允许他们声称自己的素质高于以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古比雪夫和其他政治局人物为代表的“斯大林卫队”。对“斯大林官僚”的咒骂有助于托洛茨基解释自己的失败。托洛茨基试图让他的读者相信，只有沉闷而灰暗的公众才无法欣赏他被摒弃的才华，才会钦佩斯大林这样的“庸才”。

但托洛茨基不仅忙于撰写反对斯大林的小册子和改写历史，以证明自己在革命中的杰出作用和对手的渺小。他不仅要在过去，而且要在现在的生活中打败斯大林及其制度。一旦离开苏联，他就试图在新的政治游戏中复仇。

早在 1929 年 7 月，托洛茨基抵达普林基波的外国朋友就帮助他组织出版了《反对派公报》，该通讯成为猛烈抨击苏维埃政府的平台。《公报》被偷运到莫斯科。

多伊彻引用他的亲身经历说，甚至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走廊里，也在讨论最新一期的《公报》：

> “从国外旅行归来的党员，特别是大使馆工作人员，偷运《公报》并在朋友间散发”。

《反对派公报》刊登了托洛茨基主义者从苏联寄来的信件和文章。正如多伊彻指出的那样：

> “深信不疑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从监狱和刑罚殖民地与他们的领导人通信，向他集体祝贺十月革命和五一纪念日；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反对派公告》的文章和‘论文’下面”。

托洛茨基几乎在每一期《公报》上都刊登了拉科夫斯基的出版物。

托洛茨基与他在苏联的支持者保持着联系。1929 年夏天，刺杀德国驻苏俄大使米尔巴赫的凶手、托洛茨基的贴身卫队长布卢姆金被捕并被处决。另据了解，托洛茨基与斯米尔诺夫建立了定期联系，后者在 30 年代曾担任托尔科夫斯基汽车厂厂长。斯米尔诺夫转交的材料发表在《反对派公报》上。根据多伊彻的证词：

> “直到 1932 年底，托洛茨基一直与他在苏联的追随者保持联系，收到了来自许多流放地和监狱的信件和公告”。

在普林基波期间，托洛茨基不仅忙于通信。在这里，他写下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1930-1932 年，他的自传《我的生活》、《俄国革命史》第一卷、《斯大林伪造学派》在柏林出版。托洛茨基在所有这些著作中都抨击了斯大林、其他苏联领导人和斯大林主义。

托洛茨基的文学和政治活动成为苏联有关机构的诉讼对象，1932 年 2 月 20 日，苏联政府正式剥夺了托洛茨基、他的妻子和他在国外的所有亲属的苏联国籍。

当时，除了托洛茨基、塞多娃和他们的儿子列夫（谢尔盖留在苏联），托洛茨基第一次婚姻的女儿季娜伊达也在国外，在柏林接受治疗（她同时患有肺病和精神问题）。早在 1932 年 6 月，她同父异母的哥哥列夫就劝她离开柏林，因为那里的政治局势紧张，可能会遭到警察的迫害。他劝季娜伊达搬到维也纳。然而，季娜伊达没有听从这个建议。与此同时，对纳粹和共产党的恐惧迫使柏林警方加强了安保措施。托洛茨基的女儿住在德国首都的消息引起了柏林当局的警觉，

1932 年底，他们要求季娜伊达和她年幼的儿子弗塞沃洛德离开柏林。为此，1933 年 1 月 5 日，一名精神失常的妇女带着孩子来到邻居家，用毒气自杀。托洛茨基将女儿的死归咎于……苏联政府。

他写了一封信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成员、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成员、全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信中他声称柏林警方是在苏联大使馆的唆使下采取行动的。他称“迫害.....我的女儿”是“赤裸裸的报复”行为。

此时，托洛茨基反对苏维埃领导层的斗争已公然具有政变准备活动的性质。1932 年，《反对派公报》发表了一封来自苏联的匿名信（作者是斯米尔诺夫），信中写道：

> “由于现领导不能找到摆脱当前经济和政治困境的出路，必须更换党的领导的看法与日俱增”。[418]

托洛茨基知道，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农业生产的增长赶不上工业生产的快速增长。因此，苏联政府制定了加快农业集体化的方针，认为这样可以迅速实现农业机械化，从而提高适销粮食和其他食品的产量。然而，在残酷的行政压力下，集体化进程的加快引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并在一些地方演变成了起义。农民屠杀牲畜，以防止牲畜成为集体农场的财产。虽然集体化的步伐有所减慢，但 1929 年底和 1930 年初集体化加速造成的破坏已经造成，并在随后的几年里长期存在。

农产品供应中断影响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进度。集体农庄和私人农庄的农产品被粗暴的行政措施没收。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通常出现的丰收年与歉收年交替出现、农村周期性饥荒的情况，在全国许多大片地区演变成了严重饥荒和人口死亡。国内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不仅是战败的反对派成员，一些当权的政治人物也在秘密散发的纲领性声明中，越来越尖锐地抨击斯大林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并就如何摆脱当前的严峻形势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与 20 年代的讨论一样，这些摆脱危机的方案往往掩盖了作者在国家权力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愿望。

托洛茨基从苏联得到的消息称，农村出现大规模饥荒，第一个五年计划难以执行，包括党员在内的各阶层民众情绪低落。与此同时，他并没有把赌注压在早已被开除党籍、失去政府职位的同伙身上，而是压在那些急于利用当前困难上台的苏联上层社会的野心家身上。1933 年 3 月，他给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

> “斯大林的力量总是在国家机器中，而不在其自身……脱离了国家机器……斯大林就什么也不是……摆脱斯大林神话的时候到了……斯大林把我们带进了死胡同……重新审视苏维埃体制和无情地清除覆盖在它身上的一切污秽的时候到了，实现列宁最后的坚决的遗训——‘撤掉斯大林！’的时候到了”。[419]

显然，托洛茨基希望更接近世界政治生活的中心，在那里他可以影响苏联的事态发展，这迫使他离开土耳其，并于 1933 年 7 月移居法国。不久，托洛茨基与他的儿子列夫一起，积极开展创建第四国际的活动。托洛茨基依靠因托洛茨基主义而被共产国际各党派开除的支持者，试图创建一个另类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

[418]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2006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二章 在所有的战线上的进攻和困难”校对。

[419]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2006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二章 在所有的战线上的进攻和困难”校对。

尽管在 20 世纪下半叶，托洛茨基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人数不断增加，甚至在一些国家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但正如瓦谢茨基所说：“在 30 年代末，托洛茨基主义者不超过 3000 人”。很明显，托洛茨基在自己周围召集的不是群众性政党，而是一些职业政治家，他们后来可以在这些政党中发挥领导作用。然而，在 20 世纪 30 年代，托洛茨基领导下的世界革命的思想并没有深入人心。

与此同时，托洛茨基不仅试图与被共产党开除的支持者重新建立联系，而且还试图与西欧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重新建立联系，因为这些人可以让他重新回到 1917 年革命前的“大政治”圈子。这些人中有后来在西欧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例如，未来的比利时首相兼北约秘书长亨利-斯帕克、著名作家兼戴高乐政府未来的文化部长亨利-马尔罗、英国工党未来的重要人物等等。在托洛茨基的随行人员中，来自法国的弗雷德-泽勒并不显眼，他后来加入了第四国际秘书处。泽勒是法国共济会一位著名人士的儿子，他本人也是一名共济会成员，并在法国“自由共济会”中担任最高职务。

托洛茨基似乎像 30 年前从俄国“返回”西欧时一样，正在打通关系，以帮助他凯旋而归。1933 年 10 月，托洛茨基在《反对派公告》中宣布有必要建立一个地下党。他强调说：

> “没有正常的宪法途径来取消统治集团，只有强力能迫使官僚们把政权转交到无产阶级先锋队手中”。[420]

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主义是软弱的”，因为“它的根基在工人阶级，而不在其他地方”，因此他的计划以挑起工人反对苏维埃制度的示威游行为基础。托洛茨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机器会发现自己处于真空状态”，而反对派在民众压力的支持下，即使没有革命或内战也能取得胜利。然而，托洛茨基主张采取不同的行动方案：

> “斯大林及其追随者尽管很孤立，如果他们紧紧抓住政权不放，反对派将借助于‘警察行动’消灭他们”。[421]

1934 年 12 月 1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基洛夫在列宁格勒遇刺身亡，托洛茨基看到了斯大林末日的开始。托洛茨基断言：

> “制止针对当局代表的恐怖行动……非常重要。其中最著名的是杀害基洛夫这个聪明、无情的列宁格勒专制者……正如沙皇时代一样，政治谋杀是风暴气氛正确无误的征兆，并预告着公开的政治危机的开端”。[422]

暗杀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耶夫被捕，他与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者之间的联系被证实，导致后者和加米涅夫被捕。季诺维也夫派和托洛茨基派先后被指控参与谋杀基洛夫和颠覆性反国家活动。与此同时，早在 1934 年 12 月 1 日之前就有充分理由怀疑尼古拉耶夫企图暗杀基洛夫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的内务部官员却逍遥法外。

许多证据表明，暗杀基洛夫的幕后黑手是那些在政府中担任要职并渴望获得最高权力的人。特别是，暗杀基洛夫的行动掌握在内务部首长雅戈达的手中，他可以利用大规模镇压“秘密敌人”来加强自己的权力。20 世纪 80 年代末，内务部的一名前雇员雷宾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雅戈达正在为定于 1936 年 5

---

[420]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2006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二章 在所有的战线上的进攻和困难”校对。

[421]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2006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七章 在宫廷阴谋的罗网中”校对。

[422]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2006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七章 在宫廷阴谋的罗网中”校对。

月 1 日发动的政变做准备。 1938 年逃离苏联的另一名内务部雇员奥尔洛夫（列夫-费尔宾）在 1956 年的《生活》杂志上声称，在内务部的深处已经形成了一个推翻斯大林的阴谋。

内务人民委员不太可能单独行动。海因里希-雅戈达是 1988 年为所谓右翼托洛茨基反苏中心的其他成员平反时唯一没有平反的被告，这一事实间接表明，1938 年 3 月莫斯科审判期间对雅戈达与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的联系的指控是有根据的。托洛茨基关于需要通过“警察行动”消灭斯大林的说法很可能是基于雅戈达参与了托洛茨基反对苏维埃领导层的阴谋。

托洛茨基可能还与此时在国防委员会中形成的另一个阴谋的成员有联系。保罗-卡雷尔（保罗-施密特）根据纳粹德国上层掌握的情报，在他的著作中指出，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初开始，一些主要的红军指挥官（图哈切夫斯基、加马尼克、布柳赫尔等人）开始采取旨在改变苏维埃制度的行动。他写道，盖世太保通过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将“伪造的档案”转交给斯大林，以损害著名军事领导人的利益，“这并不是图哈切夫斯基及其朋友被审判和定罪的原因.....悲剧的根源要深得多。它们导致了两个强大对手之间真正而残酷的权力斗争”，最终导致“唯一能够推翻斯大林的力量惨遭失败”。

正如卡雷尔所言，20 世纪 30 年代，加马尼克在图哈切夫斯基的支持下，在远东建立了一支人数超过 10 万的特别武装力量，其基础是在军中农场定居的预备役军人，“这是任何有政治野心的将军的理想工具”。卡雷尔称，“从 1935 年开始，图哈切夫斯基在哈巴罗夫斯克.....成立了一个类似革命委员会的机构。该委员会由最高行政长官和军事当局组成”。人们假定，在政变发生时，苏联的表现将得到蒙古军队充分行动的支持。

根据 1923 年的“塞克特-拉狄克”秘密协议（该协议在希特勒上台后终止），在与帝国国防军领导人长达 10 年的秘密合作期间，红军的许多重要人物与德国领导人建立了友好关系。这种情况有助于图哈切夫斯基在准备阴谋时与德国将军进行谈判。（作者在《斯大林：在权力的顶峰》。莫斯科：维特出版社，2002 年有论述）。

托洛茨基在多大程度上了解这一阴谋不得而知，但他与红军主要人物的关系有可能使他对这些事件了如指掌，甚至成为同谋。一方面，托洛茨基的形象在 1936 年莫斯科审判期间受到了夸大的关注，另一方面，在这些审判的主要参与者平反之后，他参与反对苏维埃领导层的阴谋活动的所有证据都被抛弃，这使得现在寻找真相变得异常困难。

当时要弄清真相也并非易事。1935-1936 年，大批托洛茨基的前支持者被开除出党并遭到逮捕，这只是转移了那些准备发动政变的人的注意力。地区苏维埃和党委员会的负责人仿佛相互竞争一般，报告了暴露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情况。

斯大林后来承认，当时许多被开除党籍的人被不加区分地指控持有托洛茨基观点。他说：

> “这期间我们开除了几万、几十万人，在对待一些党员的命运上我们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没有人性和官僚主义的冷漠，近两年的清党和后来的更换党证——开除了三十万人”。[423]

斯大林在对地方和高级工作人员的党的领导人讲话时说：

> “你们所做的所有这些丑事——这一切都是为我们敌人的磨坊加

[423]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2006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八章 ‘整个苏维埃制度处在千钧一发之时’”校对。

水……所有这一切为敌人——为右派，为托洛茨基分子，为季诺维也夫分子，为随便什么敌人创造了形势。同志们，应该终止这一冷酷的政策”。[424]

联共（布）莫斯科市委和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 1935 年 12 月 30 日的报告中宣布了莫斯科党组织开除一万名托派分子的消息，其他类似的报告也让托洛茨基感到高兴。托洛茨基在《反对派公报》中写道：

“在最近几个月被驱逐的一万到两万名‘托洛茨基分子’中，老一代反对派、反对派人士不超过几十人，1923–1928 年的反对派或许只有几百……老人，大批人都是新招募的”。

多伊彻这样解释托洛茨基高兴的原因：

“十年来，斯大林一直把托洛茨基主义者关在铁窗和铁丝网后面……几乎成功地把他们与社会隔绝开来。到 1934 年，托洛茨基主义似乎已被连根拔起……然而，矛盾的是，基洛夫遇刺后发生的大清洗和大规模驱逐给托洛茨基主义带来了新生。托洛茨基主义者被数以万计甚至数十万计的新‘反对派’包围，他们不再感到孤立无援。大批投降者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懊恼地认识到，如果当初与托洛茨基主义者团结在一起，事情就不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年轻的反对派、托洛茨基主义失败后很久才转而反对斯大林的共青团员、各种‘倾向分子’、因轻微违反劳动纪律而被流放的普通工人、心怀不满的人和只在铁丝网后面才开始思考政治问题的怨妇——他们都为托派老人们提供了大量新的听众”。

托洛茨基继续密切关注苏联发生的事件，利用公开和秘密情报，继续为推翻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做准备。然而，1935 年 5 月签署《苏法互助条约》后，托洛茨基准备在苏联发动政变的活动和他在法国的逗留受到了威胁。托洛茨基有理由相信，该条约签署后，法国政府会听从苏联政府的要求，将他驱逐出境。托洛茨基可能会被驱逐到非洲的某个殖民地，出于某种原因，他决定将自己送往马达加斯加。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于 1935 年春决定到挪威寻求庇护。

尽管挪威右翼势力和共产党人提出了强烈抗议，但执政的工人党还是对托洛茨基的请求做出了积极回应。托洛茨基于 6 月底抵达挪威后，包括未来的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在内的三位党的领导人拜访了他。后者坚持不懈地向托洛茨基解释说，挪威政府给予他庇护的条件是他不得从事政治活动，包括反对挪威友好大国的政治活动。托洛茨基答应了。托洛茨基后来说，他说这番话的意思是，他不会干涉挪威的国内政治生活。然而，他并不打算停止他的政治活动，其中最主要的是夺取苏联政权的愿望。

托洛茨基抵达挪威时不仅带着家人，还带着他的秘书，其中就有弗雷德-泽勒。这位年轻的共济会员于 1935 年秋天访问了苏联。从挪威回来后，泽勒前往巴黎，在那里他向第四国际秘书处提交了组织暗杀斯大林的书面建议。秘书处在一次会议上审议了这一建议，并以“挑衅”为由予以否决。然而，这个规模小、影响力小、纯粹起象征性作用的组织的意见意义不大。由于泽勒是在与托洛茨基会面后，带着这个建议从挪威来到巴黎的，因此这个建议很可能已经得到了他的首领的批准。托洛茨基将这一建议提交第四国际秘书处讨论，很可能是想得到其他国家同僚的赞同。同时，拒绝这种批准也很难阻止托洛茨基。由此可见，国际共济会在组织反对斯大林的阴谋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自由共济会”与托洛茨基之间的联络人是泽勒。

---

[424]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2006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八章 ‘整个苏维埃制度处在千钧一发之时’”校对。

与此同时，苏联加紧了军事阴谋的准备工作。保罗-卡雷尔写道：

“1936 年春，图哈切夫斯基作为参加英王乔治五世葬礼的苏联代表团团长前往伦敦。往返途中，他经过了柏林。他借此机会与德国主要将领进行了谈判。他希望得到保证，德国不会利用苏联可能发生的革命动乱作为向东方进军的借口。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在斯大林被推翻后建立俄德联盟”。

为了证实这一点，卡雷尔引用了图哈切夫斯基对罗马尼亚外交部长蒂图列斯库说过的一句话：

“你们把自己国家的命运与法国和英国这样的老牌强国联系在一起是错误的。你们必须面向新的德国。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德国将在欧洲大陆占据领导地位”。

关于苏联即将发生军事阴谋的谣言开始在西欧各国首都传播。在这种情况下，1936 年 8 月，对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成员进行了审判。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被告席上的著名托派人士指控托洛茨基准备推翻现有秩序，并对斯大林和政治局其他成员采取恐怖主义行动。

一些被告的证词值得怀疑。例如，被告戈尔茨曼、戴维和伯尔曼-尤林保证说，1932 年 11 月托洛茨基在哥本哈根逗留期间，他们收到了托洛茨基关于实施恐怖行动的指示。然而，托洛茨基可以轻而易举地反驳这一说法，他指出，据称托洛茨基下达过这些指示的布里斯托尔酒店在 1932 年早已被拆除。与此同时，对托洛茨基反国家活动的许多其他指控也不容易反驳。

审判结束后，苏联驻挪威大使雅库博维奇要求立即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境。右翼政党的代表也要求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境。尽管托洛茨基在 1936 年 12 月提出了强烈抗议，挪威政府还是决定驱逐托洛茨基。墨西哥同意接受托洛茨基。

1936 年 12 月 19 日，托洛茨基乘坐“露丝”号油轮离开挪威，于 1937 年 1 月 9 日抵达墨西哥坦皮科港。最重要的是，托洛茨基及其有影响力的朋友们努力确保他在墨西哥的逗留不会像在法国和挪威那样短暂。为此，有必要证明在莫斯科审判中对托洛茨基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

在美国、英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世界其他国家，都成立了保卫托洛茨基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于 1937 年 3 月组成了一个联合委员会。除托洛茨基主义者罗斯梅拉外，委员会还包括一些远离托洛茨基主义，但在西方社会具有相当权威的人士。委员会由美国著名哲学家约翰-杜威领导。这些人参与托洛茨基的辩护，表明他与西方主要国家的精英阶层有着广泛的联系。

委员会决定举行一次“反审判”，以处理 1936-1937 年莫斯科审判中提出的指控。最初，委员会决定在墨西哥城市中心的一个大礼堂举行“反审判”会议。然而，出于安全考虑，委员会会议在托洛茨基居住的房子里举行。

事实证明，托洛茨基试图把杜威委员会的会议变成他自己雄辩的讲坛的努力并不成功。托洛茨基向人们发表演说时，他所熟悉的、苏联革命者所能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和论点与这些人格格不入，因此托洛茨基不得不放弃他最容易接受的公开演讲方法。此外，会议是用英语进行的，而托洛茨基几乎不懂英语。多伊彻写道：

“他的词汇量有限。他对语法和用词感到混乱……他日复一日，一次又一次地寻找正确的表达方式，苦苦挣扎，试图克服外语的阻力，经常停顿或犹豫不决，不由自主地说出一些滑稽的短语，有时还说出一些与他想说的完全相反的话，或者不理解别人问他的问题。口吃尚未痊愈的德摩斯梯尼好像在说话，但出现在法庭上时，嘴里却塞满了鹅卵石”。

为了迎合委员会成员的观点，托洛茨基放弃了他的世界革命计划，并宣称他的出发点一直是：只有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革命才能在某个国家取得胜利，但绝不能输出革命。针对委员会成员卡尔顿-比尔斯教授关于托洛茨基曾于 1919 年派鲍罗廷（格鲁岑贝格）前往墨西哥组织革命的说法，托洛茨基开始极力为自己辩护。由于这种指控可能会使他面临被进一步驱逐的危险，他开始否认自己认识鲍罗廷，尽管他听说过他。他声称，他根本没有计划这样做，鲍罗廷在撒谎。他保证说，此时他还没有离开他的装甲列车，他只是研究了前线地图，“甚至几乎忘记了世界地理”。（托洛茨基确信，委员会成员并不知道他在 1919 年提出的突破印度、在那里发动世界革命的建议以及其他类似计划的存在）。

委员会于 4 月 10 日至 17 日召开会议，直到 1937 年 9 月才做出裁决。委员会成员承认莫斯科审判期间对托洛茨基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反审判”的主要目标已经实现。现在，针对苏联驻墨西哥大使馆提出的驱逐托洛茨基的要求，墨西哥政府可以参考杜威委员会的报告。然而，托洛茨基期望“反审判”的材料能在全世界引起广泛反响的想法是没有道理的。多伊彻承认，委员会的决定对世界舆论的影响“很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此时的世界，“距离慕尼黑还有一年”，人们“更关心法国人民阵线和西班牙内战的命运”。托洛茨基对此非常恼火，并将这种“罪行”和“政治盲目性”归咎于他的儿子，因为他没有及时在下一期《反对派公报》上准备杜威委员会决定的声明。

尽管失败了，托洛茨基仍试图向全世界证明他的观点。此时，他的著作《被背叛了的革命：苏联是什么，它将走向何方？》（《被背叛了的革命》），这是托洛茨基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这本书于 1936 年 8 月初完成，其中包括 1936 年秋和 1937 年春写的一些增补，多伊彻认为，这本书“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在他的最后一本书中，他完成了自己的政治遗嘱”。在这本书中，托洛茨基最充分地阐述了他对苏维埃制度和斯大林统治的批判。与此同时，他还试图在书中对 1936-1937 年莫斯科审判期间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和“平行”中心的指控作出回应。

像往常一样，托洛茨基在分析苏联现状时，首先对俄国落后的过去进行了咒骂：

> “造成这种情况的历史责任，当然在于俄国的暗淡而悲惨的过去——它的黑暗和贫穷的遗产”。[425]

托洛茨基重申了他对反对派纲领的坚持，这些纲领认为，虽然苏联必须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系统地缩短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同世界其他部分的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但建设的主要目的是“加速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然后，“这种革命就能更快地把世界技术供给我们，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就能作为欧洲和世界建设的一部分而更真实地向前迈进”。[426]

托洛茨基认为，苏维埃国家的大众意识进程有利于世界革命的发生。“在沙皇统治和落后的资本主义的野蛮条件下形成的”，包括“在许多方面还落后的无产阶级”，无法长期承受革命的压力。群众的疲劳，“新经济政策给了他们新生命，他们越来越大胆”，导致对世界革命的信心减弱。社会阶层的情绪也反映在国家领导层的社会心理变化上。“‘平民自豪感’进入低潮而让位给胆怯和自私自利的浪潮。新统治阶层就在这种浪潮上达到自己的地位”。[427]

---

[425] 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第一章 取得了什么成就”，1963 年三联书店出版。
[426] 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附录一 ‘一国社会主义’”，1963 年三联书店出版。
[427] 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第五章 苏维埃的热月”，1963 年三联书店出版。

这是托洛茨基对苏联生活中许多消极方面的解释。这些解释中不乏蛊惑人心的成分。只要托洛茨基站在“官僚指挥阶层”的首脑位置上，他就会发现其中没有任何恶毒之处，并随时准备将最严格的行政控制扩大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人民的日常生活。在成为反对派之后，他首先呼吁克服“过分加强机器集权主义”。现在，托洛茨基要求推翻他一手创建并积极用于残酷镇压的政权。托洛茨基提出了“反官僚革命”的纲领，以结束“热月独裁”，他没有吝啬美丽的口号，比1923-1927年的“信件”、“声明”和“纲领”的要求更进一步。

他曾是最早主张残酷镇压政治对手并诉诸无情镇压的人之一，现在却承诺恢复批评权和真正的选举自由，并“从布尔什维克党开始”恢复所有“苏维埃政党”。曾主张“劳动军事化”和“整刷工会”的托洛茨基，现在呼吁为工会活动留出空间，在工业中引入民主，并从工人的利益出发彻底修改计划。托洛茨基宣称，从今以后，经济问题将得到自由讨论。他提出，在反官僚革命之后，将“为工人提供住房，而不是苏维埃宫殿、新剧院和华而不实的地铁”。当绝大多数人都是穷人的时候，托洛茨基在苏联社会享有特权地位，现在他却宣称“资产阶级的分配准则”将符合“严格的必要性的限制，并屈服于社会主义的平等”。托洛茨基从来没有反对过授予他勋章，他也接受过无数名贵头衔，现在却宣布“这些头衔将立即取消，镀金的珠宝将被熔化”。

托洛茨基认为，这场革命的主要战斗力量应该是青年。托洛茨基写道：

> “青年的建康的肺，无法忍受那种虚伪的气氛，这种气氛是同一种热月分不开的，也就是说，是同一种还不得不披着革命外衣的反动分不开的。社会主义标语和生活现实之间的强烈对照，损害了人们对官方教规的信赖。有相当大一部分青年以轻视政治、粗野荒淫为荣。在许多情况下，也许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漠不关心和玩世不恭的态度，正是不满的最初表现形式，正是要自己独立这种秘密愿望的最初表现形式”。[428]

事实证明，在针对体制的有计划革命中，托洛茨基感兴趣的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而是他们中以非政治、粗鲁和流氓行为“为荣”的“阶层”。托洛茨基以这一阶层的情绪和行为方式为中心，提出了一个重构公共道德的方案，从而使青年人在公民、道德和家庭地位上的不完整性得以保留，使全国人口变成永远不成熟、对社会不负责任的青年。在拉金40年代流行的科幻小说《AB专利》中，在激素药物的帮助下，少年儿童变成了身体发育成熟的人，但却永远保持着幼稚的心智，这为将他们用于军队和劳动领域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托洛茨基似乎打算对国家的年轻一代采取类似的行动，消灭家庭，破坏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的联系。

“热月”官僚集团在三十年代采取了加强家庭制度的措施，因此受到托洛茨基等极端革命者的严厉谴责。托洛茨基认为：

> “革命作了一次英勇的努力来摧毁所谓“家庭”——即劳苦阶级的妇女在其中像奴隶般地从小劳动到死的那种陈腐、令人感到窒息和停滞的制度”。[429]

他对这项工作未能结束感到遗憾。他承认，“不幸，社会太穷了，也太没有文化了”。[430]托洛茨基正确地指出了儿童机构和服务建设中的不足，并将批评的中心转移到了30年代提倡的“家庭崇拜”上。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领导层在反对左派在家庭和道德问题上的歪曲的口号下，摒弃了共产主义的“基础原则”，

---

[428] 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第七章 家庭、青年和文化”，1963年三联书店出版。
[429] 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第七章 家庭、青年和文化”，1963年三联书店出版。
[430] 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第七章 家庭、青年和文化”，1963年三联书店出版。

他对这一事实表示愤慨，并讽刺苏联社会道德准则中“恢复第七诫”（“不可通奸”）的做法。

托洛茨基愤慨的另一个对象是摩西律法中所谓的“恢复第五诫”（“孝敬父亲”）。托洛茨基对“关心上一代人的权威”感到震惊。托洛茨基将青年的利益与世代相传的任务对立起来，他写道，官僚机构正在“与青年作斗争”。

同时，托洛茨基对“宗教政策的改变”表示担忧。托洛茨基强调说：

> “否认上帝以及他的帮助和奇迹，是革命政权分化儿童和父母的最尖锐的武器”。[431]

托洛茨基认为，把青年与他们的父母和老一代人分开的楔子，就是把他们与“重生”的权力分开。这些任务与解决托洛茨基提出的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有关。托洛茨基关注年轻人行为中的不道德和反社会冲动，毫不掩饰他希望将这些情绪引入政治恐怖主义领域。“最后，那些最不能忍耐的、脾气暴躁的、控制不住自己的以及在利益方面和感情方面受到损害的人，正在使自己的思想朝恐怖主义的复仇方向发展”[432]——这就是托洛茨基对 30 年代中期苏联青年情绪的描述。托洛茨基直接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这些“脾气暴躁的年轻人”加入了为国家树立不同的社会主义形象的运动行列，那么他们就会发动谴责国家的新革命。

托洛茨基在书中解释了谁将成为“热血忍耐者”军队的思想和政治领袖。托洛茨基引用了他的同党维克托·塞奇的话，他对西方国家说：

> “我毫不夸张，我的每个字都经过了斟酌。我说的每件事情，我都能举出悲剧性的证据和真实的姓名。在这大批的殉道者和抗议者当中，大部分人是沉默的，有少数英勇的人比所有其他人更同我接近，这些人的精力、洞察力、坚忍不拔以及对于伟大时代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忠诚都是宝贵的。成千上万的这种建党时就参加了党的共产党人、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同志、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者，在苏维埃还存在的时候正在用社会主义原则反对制度的内部蜕化，正在尽力（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忍受一切可能的牺牲）保卫工人阶级的权利……”[433]

从这些话中，该书的知识渊博的读者不难猜出，这里指的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即反对派成员，他们在 1926 年就已经开始建立一个非法组织。托洛茨基显然很满意地报告了维克托-塞奇“给西欧”带来的“可怕的消息”。

> “我把那些还囚禁在那里的人们的消息带给你们。不管怎样，他们一定会坚持到底。即使他们活不到看见新革命曙光出现的时候……西方的革命分子是可以对他们抱着期望的。火焰将继续燃烧下去，即使只是在监狱里。同样，他们也对你们抱着期望。你们必须——我们必须——维护他们，以维护世界上的工人民主制度，恢复无产阶级专政的原来形象，并且有一天恢复苏联精神上的伟大和工人对苏联的信心”。[434]

在托洛茨基的心目中，这群“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在西方的声援下，将成为他所策划的政变的政治先锋。

托洛茨基在书中反复强调：

> “无论如何，官僚只能被革命力量铲除”。[435]

他强调说：

---

[431] 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第七章 家庭、青年和文化”，1963 年三联书店出版。
[432] 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第七章 家庭、青年和文化”，1963 年三联书店出版。
[433] 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第十一章 苏联到何处去？”，1963 年三联书店出版。
[434] 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第十一章 苏联到何处去？”，1963 年三联书店出版。
[435] 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第十一章 苏联到何处去？”，1963 年三联书店出版。

“在有利的历史情况下把群众领导起来——这就是第四国际苏联支部的任务。今天这个支部的力量还是弱的，它还处于地下状态。但是，一个政党不合法地存在并不是不存在。这只不过是一种困难的存在形式”。[436]

托洛茨基向全世界宣布，他在地下的支持者将能够在适当的时候采取有效的行动。

“攻击越是坚决果断，牺牲就越小”。[437]

托洛茨基竭力让全世界相信，非法的托洛茨基党异常强大，没有什么能够摧毁它。托洛茨基用历史的必然性为他在执政期间组织的大规模镇压辩护，他宣称苏联的国家政权掌握者等不到托派的报复就已经灭亡了：

“压制手段对于一个正在从舞台上消失的阶级来说是能够充分发挥效力的——这一点已经完全为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三年的革命专政所证明——但是对革命先锋队采取暴力行为是不能拯救一个已经活过了头的阶层的，如果总的来说苏联注定还要发展下去的话”。[438]

此时在苏联，托洛茨基主义者被认为是最危险的内部敌人，因为他们代表着党内对斯大林领导的最真实的替代。根据多伊彻的说法，到 1936 年，“托洛茨基主义虽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政党，但作为一种情绪、一种传统和一面旗帜，它仍然活着。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都知道，在有利条件下，‘情绪和传统’很容易变成一个党”。只有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党内有地下组织，而且可能在党的领导干部中也有地下组织。托洛茨基领导着这个党内地下组织。托洛茨基在他的著作和大量文章中保证说，在一个阴谋政党的领导下，全国已经有了随时准备反对现存秩序的强大力量。

托洛茨基对领导层日益加剧的危机的判断并没有错。托洛茨基的书尚未出版，1937 年 1 月，“平行”中心案的审判就开始了，参与者包括 20 年代许多反对派团体的领导人（皮达可夫、拉狄克、索科尔尼科夫等）。在这次审判中，“托洛茨基分子”与军方之间的联系首次被提及。拉狄克在作证时宣布，普特纳是托派阴谋的共犯。这不禁让人想起了 1927 年 7 月普特纳和雅基尔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在托洛茨基提出“克列孟梭理论”（即在战争情况下发动政变的实际主张）时，以自己的行动支持了反对派。在 1937 年 2 月至 3 月的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斯大林宣布红军队伍中有“间谍和国家的敌人”。

敌对派别依靠行政机构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根据卡雷尔和奥尔洛夫的说法，一些地区和共和国组织的领导人加入了军方和内务部领导层的阴谋。其中包括波斯蒂雪夫、科斯诺尔、谢博达耶夫等人。奥尔忠尼启则在编写关于托洛茨基分子在工业中的破坏活动的报告时自杀，这让斯大林相信，即使是他的老朋友也面临着无法解决的两难境地：要么向全世界揭露阴谋的真相，要么拯救他身边的人，把他们阴谋活动的秘密带进坟墓。

在 2 月至 3 月的全会上，斯大林批评了党的高层，认为他们已经变得唯我独尊，不愿意考虑国家利益，并且有意无意地隐瞒了颠覆活动的真相。斯大林在广泛竞争和干部再培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党领导层的变革方案。虽然此时雅戈达已被免去内务委员会委员的职务，由叶若夫接替，但军事和政治阴谋仍未解决，这一方案引起了阴谋家们的警觉。

根据卡雷尔的说法：

---

[436] 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第十一章 苏联到何处去？”，1963 年三联书店出版。
[437] 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第十一章 苏联到何处去？”，1963 年三联书店出版。
[438] 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第十一章 苏联到何处去？”，1963 年三联书店出版。

“1937 年 3 月，图哈切夫斯基和斯大林的秘密特工之间的斗争呈现出一种特别戏剧化的特征.....针对斯大林的政变被安排在 1937 年 5 月 1 日，这主要是因为与五一劳动节相似，可以在不引起怀疑的情况下将大批部队调往莫斯科。不知是出于偶然还是斯大林的诡计，计划被推迟了。克里姆林宫宣布，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将率领苏联代表团前往伦敦，出席 1937 年 5 月 12 日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仪式。图哈切夫斯基冷静了下来。他将政变推迟了三个星期。这是他的致命错误”。

另有报道称，1937 年 5 月 1 日的政变在最后一刻被阻止。梅希克声称，1937 年 5 月 1 日，他因解除一名准备向列宁墓看台开枪的恐怖分子的武装而被授予第一枚勋章。红场庆祝活动的目击者回忆起当时的紧张气氛。看台上一度传出列宁墓即将被炸毁的谣言。用当天在红场的英国记者菲茨罗伊-麦克林的话说：

“政治局委员们紧张地僵笑着，尴尬地踱来踱去，忘记了阅兵式和他们的崇高地位”。

只有斯大林不慌不忙，脸上的表情既“居高临下，又百无聊赖”。

5 月 4 日，有关图哈切夫斯基的文件被撤回，这些文件是因他涉嫌前往伦敦而送交英国大使馆的。不久，元帅和其他一些被指控参与阴谋的著名军事指挥官被捕。随后，谢尔布达耶夫等人也相继被捕。他们被指控与托洛茨基和托派分子结盟准备发动政变。

托洛茨基为什么在 1937 年 5 月出版的书中，以及在书出版前在报刊上发表的多次讲话中，宣布托派准备发动政变？如果他在秘密准备反对斯大林及其领导层的行动，为什么要公开宣布呢？如果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阴谋并不代表威胁苏维埃制度的真正力量，那么在托洛茨基的仓促声明曝光后，真相很容易就会大白于天下。然而，给人的印象是，这些言论并不是一个冒险家迷惑于自己的权力计划的空洞虚张声势，而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人物在无情的政治游戏中的举动。

1936 年底和 1937 年初，托洛茨基向全世界宣布，苏联内部出现了革命形势，包括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在内的许多人都在努力推翻现有秩序，托洛茨基主义者已经准备好领导他们反对斯大林政府的斗争。托洛茨基非常清楚苏维埃国家从建立之初就面临的形势，当时来自外部的不断攻击和内部的不断阴谋使得有必要在每一个可疑的人身上寻找敌人。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清楚地知道，让人们相信那些正直的、献身于革命事业的指挥官和政委是秘密的敌人是多么容易：他曾多次下令以牵强或夸大的罪名枪毙他不喜欢的人，但这些命令通常都被不加质疑地执行了。

基洛夫遇刺后（基洛夫于 1934 年 12 月 1 日遇害），国内普遍怀疑的气氛尤为浓厚。托洛茨基公开对国家领袖被杀表示满意，这更让人确信托派在操纵尼古拉耶夫。1935-1936 年，一些与反党反国家活动毫无关系的人与一些反对派一起被捕并被定罪，这清楚地向托洛茨基表明了怀疑、无法无天的程度以及局势进一步恶化的可能前景。

托洛茨基在他的文章中自信满满地宣布，反对派精心策划的阴谋即将取得胜利，甚至在 1936 年 8 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被指控与他有联系的人被处决之后也是如此。托洛茨基在将近十五年的时间里一直被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视为政变阴谋的主要领导者，他的言论不能不在领导层中引起混乱。新任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及其幕僚在搜查和“揭露”越来越多的“托洛茨基分子”和“托洛茨基主义”中心时表现出的疯狂热情，很难仅仅用他们个人的残忍和对命令的渴望来解释。也许，他们是害怕让托洛茨基秘密军队的士兵逍遥法外，而该军队的

指挥官是如此自信地宣布他们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托洛茨基在书中揭露了 1936-1937 年审判中被告关于与他和他儿子会面的明显伪造的证词，这些证词引起了对安全机关的不信任，他们可能会被怀疑试图通过栽赃陷害来掩盖真正的托派分子及其组织。对安全机关的不信任只会让内务部的工作人员更加积极，因为他们受到了跟踪受害者的威胁。

托洛茨基向苏维埃国家的领导层宣称，党和共青团内部才是其敌人，这激起了广泛的镇压，打击了社会中最忠诚、最活跃的成员。许多共产党员成为毫无道理的镇压的受害者，可能会在未来数年内成为政府的敌人。这将导致后来社会中的积极分子更愿意在 20 年代被国家拒绝的领导人的旗帜下崛起。

多伊彻认为大规模镇压对托洛茨基有利。他认为：

> “集中营成为反对派的学校和训练场，在那里托洛茨基分子成了无可争议的教导者……他们有组织有纪律，在政治方面消息灵通，是被扔进铁丝网的那个大阶层的真正的社会精华”。[439]

这就是为什么托洛茨基热衷于看到政治犯的人数成倍增加，包括以荒唐的指控和毫无根据的怀疑的受害者为代价。

托洛茨基主义者仿佛遵循了《旧约全书》的逻辑，将带领他们的新追随者经历磨难，带他们走出囚禁，建立一个幸福的新社会。1938 年，托洛茨基在《反对派公报》中预言了斯大林的被推翻和对他的审判：

> “斯大林为自己树起的丰碑将被推倒……而胜利的工人阶级将重新审理公开的和秘密的案件，将在解放了的苏联国土上为斯大林可耻暴行的牺牲者树起纪念碑”。[440]

显然，托洛茨基并不十分惋惜这些受害者，因为他们的人数在不断增加，特别是由于他的缘故。

托洛茨基正确地评估了审查 1936-1938 年镇压期间被定罪者的大量案件的后果。由于受害者是苏联社会中具有政治影响力的阶层的代表，他们的命运比托洛茨基积极参与的“红色恐怖”的受害者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同情。赫鲁晓夫等曾经组织大规模清洗真实和假想的托洛茨基分子的人，试图通过炒作被镇压后又被平反的人的命运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为了掩盖自己在这些镇压中的作用，他们试图将这些镇压归咎于斯大林，推翻为纪念斯大林而建立的纪念碑，同时抹杀苏维埃国家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

诚然，托洛茨基不断预言“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崩溃，从而假定这一事件很快就会发生。然而，托洛茨基并没有亲眼目睹这些事件。他的其他预言也没有成真。

艾萨克-多伊彻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积极宣传者，在他专门论述托洛茨基的三本书中，每一本的书名中都有“先知”一词。托洛茨基本人也赞扬了他的预测能力，称他和他的支持者“对国家正在发生的进程进行了更为正确的分析，并更为正确地预见了其未来的发展”。通过比较托洛茨基在 1936-1937 年对世界大战进程的预测及其实现情况，可以很容易地验证他的这些预言。

尽管托洛茨基不相信苏联能够打败希特勒的德国，但他认为，如果出现这种几乎不可能的结果，“德国在对苏战争中的失败将不可避免地不仅导致希特勒的

---

439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2006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九章 叶若夫时期”校对。

440 根据叶梅利亚诺夫《斯大林：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2006 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第九章 叶若夫时期”校对。

崩溃，而且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众所周知，德国的战败和希特勒政权的崩溃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的死亡。

托洛茨基在评估战争前夕的世界力量对比时认为，苏联与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强国的军事集团将是脆弱的。关于苏联与西方国家的互助条约，他写道：

> “这些条约在军事行动的第一阶段仍有其价值，但毫无疑问，在战争的决定性阶段，力量的组合将由比外交官的誓言更重要的因素来决定，因为他们（外交官）是苏维埃政权的敌视者，他们的职业是毫无公信力的公证人。帝国主义的矛盾只会通过妥协来克服，以防止苏联取得军事胜利”。

事实上，尽管盟国之间存在摩擦，但苏联与英国、美国以及后来几十个资本主义国家在“联合国”旗帜下的军事和政治合作经受住了世界大战的考验。

如果说托洛茨基间接正确的话，那就是苏联与其他国家的军事和政治合作并不是苏联人民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正如未来的美国总统、拥有共济会 33 级学位的杜鲁门在 1941 年 7 月 24 日所说的那样，西方有影响力的势力竭尽全力确保德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尽可能地自相残杀。然而，托洛茨基不相信苏联与西方列强结盟的现实，他的出发点是苏联不可能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取得军事胜利。

托洛茨基在他的其他“预言”中也犯了错误。

托洛茨基预测：

如果发生战争，“苏联的命运最终不是在总参谋部的地图上，而是在阶级斗争的地图上决定的。只有欧洲无产阶级……才能保卫苏联不被摧毁或不被盟国从背后捅一刀.....战争将有助于革命”。

实际上：

苏联的命运主要是由于苏联人民的英勇努力而决定的。中欧和东南欧国家的革命变化主要是由于苏联军队解放了这些国家的大部分。

托洛茨基不相信苏联人民在没有外来帮助的情况下经受住严峻考验的能力，他预言了苏联军队的毁灭是不可避免的。

托洛茨基预测：

> “毫无疑问，军事失败不仅对苏维埃统治阶级是致命的，而且对苏维埃联盟的社会基础也是致命的.....在国家急需基本必需品的影响下，农民经济的个人主义倾向将得到实质性的支持，集体农庄内部的离心力将随着每个月的流逝而增强.....换句话说，在长期战争的情况下，如果世界无产阶级仍然处于被动地位，苏联内部的社会矛盾不仅能够而且必然会导致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的反革命”。
>
> “如果战争仅仅是一场战争，那么苏联的失败将不可避免。在技术、经济和军事方面，帝国主义无比强大。如果帝国主义不被西方的革命所瘫痪，它就会扫荡十月革命催生的政权”。

实际上：

尽管人员损失惨重，国家经济遭受巨大破坏，但其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经受住了考验。盟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并没有削弱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中的地位。

从托洛茨基的预测中可以得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既然这些预测不是神秘洞察力的结果，而是从他对苏联和世界其他国家形势的评估总和中逻辑地得出的，那么很明显，其中许多评估最初都是错误的。他对欧洲和亚洲可能发生的社会爆炸的错误预测，是由于他夸大了当年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低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

托洛茨基对战争给苏联带来的后果的预测失败，也证明了他对苏联制度、苏

联能力和苏联人民抵抗侵略者的意志的完全误解。托洛茨基深信苏联体制的致命脆弱性，完全低估了苏维埃爱国主义的力量，他排除了在没有欧洲崛起的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将苏联从希特勒的奴役中拯救出来的可能性。他无法想象，尽管苏联的经济在斯大林的五年计划期间取得了巨大的飞跃，但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却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而在战争的第三年，苏联却能够生产出比纳粹德国及其盟国和被奴役的欧洲的军事机器更多的坦克、飞机和大炮。他被对“野蛮”国家及其人民的蔑视蒙蔽了双眼，没有预见到苏联“落后”的无产阶级和“野蛮”的农民能够完成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大规模军事和劳动壮举。如果不使用他惯用的漂亮的蛊惑人心的词句和冒犯苏联人民的表达方式，他不可能试图解释为什么苏联人民在前线表现出如此的英雄主义，在后方表现出如此自觉的自我牺牲精神，为了战胜西欧征服者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工作到筋疲力尽。

托洛茨基夸大了苏联青年的“叛逆”情绪，更夸大了他们的恐怖主义倾向，在他们身上，托洛茨基只看到了实现他的强权计划的工具。1936 年，16 至 28 岁的年轻人属于这样一代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革命理想的忠诚完全不体现在对政治的蔑视、流氓行为、玩世不恭或针对国家领导人的恐怖主义行为上。年轻人通过对苏维埃国家和社会主义祖国的无私支持，表达了他们对祖国和社会主义这两个不可分割的概念的忠诚。尽管这一代人中的许多人都有缺点，他们具有典型的断章取义的性格，倾向于不加批判地相信权威，但他们不是在批评上级时，而是在无比严格地要求自己、随时准备自我克制甚至自我牺牲时，表达了对理想的忠诚。

与托洛茨基的预言相反，战争年代的青年不是针对党的机构的工人，而是针对敌后的法西斯侵略者和祖国的叛徒采取了恐怖行动。这一代青年构成了红军和苏维埃后方劳动战线的基础。

托洛茨基在预言苏联人民即将反抗斯大林的同时，却没有理解他的对手在苏联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他没有认识到斯大林在苏联人民中拥有巨大的权威。他没有看到，对于绝大多数苏联人民来说，斯大林是一位言出必行的领袖。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斯大林作为国家领导人和军事领导人的优秀品质得到了充分体现，这只会加强千百万苏联人民对斯大林的无私信仰和爱戴。

对托洛茨基预测的分析不仅表明了他对苏联社会和世界发展观念的恶毒，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政治失败的原因。苏联人民在和平建设中取得的杰出成就和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表明，尽管在最初的革命岁月中出现了错误和失败，但苏联仍存在着巨大的健康力量潜力，这阻止了一个公开提出苏联人民的利益完全服从世界革命的冒险主义计划的人物上台。托洛茨基对苏联人民及其文化的蔑视被他掩饰得很好。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数百万党员和非党员就意识到托洛茨基的纲领是恶毒的，是对国家的毁灭。

事实证明，托洛茨基的恶毒算计给他自己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与斯大林领导层的战争从未间断，这证明托洛茨基致命地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低估了对手。不愿意承认失败迫使托洛茨基在他无可救药的冒险主义游戏中越走越远，试图借助阴谋诡计、《反对派公报》和软弱无力的第四国际推翻苏维埃制度。

《反对派公报》激起的苏联人民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大规模指责，必然导致托洛茨基成为这场”追捕”的牺牲品。早在 1935 年 2 月 7 日，托洛茨基就在日记中写道，显然，他将被斯大林的特务杀害。这场由伟大的联合反对派主导的游戏杀害了成千上万的受害者，对他本人来说也变得越来越危险。他最后的避难所是他的支持者、艺术家迭戈-里维拉在墨西哥城郊区科约阿坎的乡间别墅。托洛茨

基最后居住的房子不得不变成一座真正的堡垒。

托洛茨基宣布的反斯大林革命并没有发生。他的许多忠实的代理人在各国神秘失踪。托洛茨基坚信，他的儿子列夫在巴黎死于阑尾炎手术，是被敌人杀害的。他留在苏联的小儿子谢尔盖早已对政治失去兴趣，却被当作“托洛茨基分子”逮捕。托洛茨基的第一任妻子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也以同样的罪名被送往集中营。只有托洛茨基的孙子塞瓦在托洛茨基的坚持下被带到了科约阿坎，成为了托洛茨基后代的遗物。

托洛茨基可能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他敏锐的直觉告诉他，末日即将来临。离开普林基波后，托洛茨基开始以他之前组织反对派纲领和集团时的精力谋划反对斯大林的行动。 他的身体再次向托洛茨基的头脑发出信号：他正在从事危险的事业。

最后，他的身体状况开始让托洛茨基为自己的生命担忧。在他去世前几乎整整六个月，即 1940 年 2 月 27 日，他立下了遗嘱。他在遗嘱中指出，他的死因不是暗杀未遂，而是自然死亡。他认为医生搞错了，他的病情比他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托洛茨基认为，他很可能很快就会死于进行性动脉粥样硬化。他担心等待自己的将是列宁的命运，担心自己的身体和语言器官会出现瘫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直觉性的预见与托洛茨基在 1940 年 8 月 20 日头部遭受致命打击后长期痛苦的身体表现相吻合。

1940 年 5 月 23 日至 24 日夜间，他遭遇了第一次未遂袭击。手持机枪的人冲进了精心守卫的别墅。机枪声在屋内响起，一枚手榴弹爆炸了。虽然恐怖分子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但托洛茨基、塞多娃和他的孙子塞瓦都没有受伤。一位赶到现场的墨西哥警察督察被托洛茨基的冷静和他解释暗杀企图细节时的镇定自若所震撼。这位警察毫不怀疑托洛茨基向他报告的一切都只是在模仿暗杀企图，因为在他的各种实践中，从来没有人在刚刚死里逃生后表现得如此冷静。他错了。托洛茨基之所以镇定自若，是因为他内心已经做好了死亡的准备，而且可能比他自己承认的要充分得多。在他意识之外的某个角落，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在与死敌的战斗中败下阵来，因此他平静地等待着不可避免的结果。

可能当托洛茨基在遗嘱中写道他的死因可能是脑出血时，他下意识地提到了长期以来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的画面。他在狱中读到的关于所罗门圣殿的建造者阿多尼拉姆被镐头击中头部而死的共济会传说，有可能从他的记忆深处浮现出来。他可能还想起了他和他的同伙们在最初的革命岁月中借助的那些文学形象。当时布哈林宣称：

“在革命中，谁打破了别人的头骨，谁就赢了”。

托洛茨基也使用了类似的形象，他在 1917 年 10 月 30 日的《彼得格勒消息报》上写道：

“敌人应该知道，随时都会有一根铁棒砸在他的头骨上”。

托洛茨基几乎不知道斯大林在 30 年代初寓意性地说过的一句话：“应该坚决敲打这位先生的脑袋”，1936 年 10 月，他在《反对派公报》上写道：“斯大林需要托洛茨基的脑袋——这是他的主要目标”。后来，他在 1938 年 12 月 28 日的日记中写道，斯大林“不是要打击对手的思想，而是要打击对手的头颅”。

但是，当托洛茨基遇到他秘书的朋友雅克-莫纳尔时，天生的直觉并没有给他敲响警钟。这绝非偶然。雅克-莫纳尔（西班牙共产党员拉蒙-德尔-里奥-梅尔卡德就用这个名字作掩护）不是职业刺客，这个人可能比任何人都不适合刺客的角色。在最初的暗杀计划中，他的角色是辅助性的。梅尔卡德本应只是详细描述

托洛茨基的家和家中的典型作息时间。然而，在第一次刺杀托洛茨基未遂后，内务部特工命令梅尔卡德执行刺杀行动。

托洛茨基的随从后来回忆说，暗杀发生前一周，“莫纳尔”来到家里，手里慌乱地抓着一件斗篷，这件斗篷对于墨西哥的八月天来说太不合适了。后来得知，斗篷里藏有各种凶器。“莫纳尔”脸色苍白，大家都以为他病了。

莫纳尔的任何非常行为都可能会引起托洛茨基的怀疑。“莫纳尔”毫不掩饰自己对托洛茨基主义缺乏兴趣，他被相信是因为这是事实。“莫纳尔”并不隐瞒他有秘密关系，他被相信了，因为他被认定是个桃花源中的“灰色”人，无法对托洛茨基的学说表现出兴趣，而且与走私者或投机者有联系。当莫纳尔确实对托洛茨基主义感兴趣并撰写了一篇关于世界革命主题的文章时，托洛茨基在阅读了他的大作后，确信其“灰色”，只是出于对他的秘书的好感才开始纠正这部著作。

与此同时，历史决定选择一个远非“灰色”的人作为刺杀托洛茨基的凶手。人们对他知之甚少，主要是因为他异常神秘。无论是托洛茨基卫兵对他的殴打，还是墨西哥警方对他的审讯，抑或是长达 20 年的牢狱生活，甚至是出示的身份证据，都没有让他承认自己不是雅克-莫纳尔。根据心理学家的记录，他具有超常的智力和惊人的记忆力。监狱当局惊叹于他的能力，当他看到一种新型武器时，能在一分钟内蒙上眼睛拆卸并重新组装。我们不知道还有哪些隐藏着这种天性的人才，他的命运就像许多被卷入二十世纪战争和革命漩涡的人一样被无情地扭曲了。但正是这样一个不做作的人，能够隐藏自己的优点，而不是炫耀这些优点，被托洛茨基视为人类灰色背景的一部分，不会被视为致命的威胁。托洛茨基没有及时认识到下令毁灭他的人的优点，因而也没有认识到他的危险，因此他也没有看到这个命令的执行者的威胁。托洛茨基没有注意到，站在他旁边的那颗棋子是外国颜色的，他只需走一步棋就能将托洛茨基格杀。

1940 年 8 月 20 日，梅尔卡德再次出现在托洛茨基的家中。他再次面色苍白，手里紧紧攥着一件与热带夏天格格不入的斗篷。他走进托洛茨基的书房，把手稿交给托洛茨基阅读，然后站在托洛茨基的背后。然后，梅尔卡德闭上了眼睛，手里紧握着一把冰斧，对着托洛茨基的头部就是一记重击。这一击并不致命。流血不止的托洛茨基发出了惨叫。后来，这声惨叫在梅尔卡德的噩梦中折磨了他很长时间。托洛茨基开始向他投掷手边的第一件东西。在托洛茨基的尖叫声中，卫兵冲了进来。他们把梅尔卡德打倒在地，开始殴打他。托洛茨基说：

“找出是谁派他来的！”

看守们试图在警察到来之前执行首领的命令，但尽管遭到毒打，梅尔卡德仍然保持沉默。与此同时，试图抢救托洛茨基的医生也赶到了。他被送进了医院。与托洛茨基的预见完全一致，他的四肢被截肢，然后失去了语言能力。第二天，1940 年 8 月 22 日，当地时间晚上 7 时 25 分，托洛茨基去世。

# 代 替 结 论

## 持久的神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动荡事件以及紧接着战争结束后开始的冷战，使世界舆论的注意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远离了托洛茨基、他的活动及其沧桑的一生。如果不是我国的历史老师强迫中小学生记住反对派的名字，记住领导各种“机会主义路线”领导人的名字，托洛茨基主义和托洛茨基似乎到处都被遗忘了。国外确实有各种托洛茨基主义团体，但他们人数不多，相互仇视，似乎注定要从历史舞台上消失。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68 年，托洛茨基在 50 多个国家的学生中重新受到欢迎。托洛茨基的肖像在电视屏幕上闪过，描绘了巴黎的街垒战、墨西哥城的骚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演讲。托洛茨基似乎回来了，但不是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物，而是作为一个神话人物。

托洛茨基的神话是在他有生之年开始形成的，托洛茨基本人也为这一神话的创造付出了大量心血。与任何神话一样，托洛茨基性格、生活和活动的真实特点也被调整为符合这一流派的规律。托洛茨基的暴躁、任性和痛苦的破碎，主要是由于他的慢性神经疾病造成的，这些都消失了，让位给了雄伟的纪念碑。在军事问题上屡屡犯错，在战略战术上犯下许多大错，在遥远的国度制定了奇思妙想的作战计划的托洛茨基，变成了古今中外最有才华的军事领袖，“红色波拿巴”。托洛茨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却能以非凡的气度、傲慢的蔑视和赤裸裸的言辞掩盖自己的无知，在神话中成为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的化身，比他周围的苏联领导层中的“黑暗分子”高出一筹。他重复着他所处环境中常见的仇俄公式化判断，在俄罗斯文化中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却被认为是高雅文化的化身。

在神话中，托洛茨基在成为民主主义者、反对特权的原则斗士之后，贵族的行为成为了他的特征。在神话中，虽然托洛茨基的良心毁掉了许多人的生命，但他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这些人往往是他的情感决定的“必需的代价”。虽然托洛茨基毕生致力于权力斗争，精通各种阴谋诡计，但他是一个坚毅的政治家，一个革命的浪漫主义者（被描绘）。所有与幕后世界的可疑联系都被遗忘了，而这些联系在托洛茨基转变为杰出人物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活动。帕尔乌斯只是被顺带提及。

正如每一个神话一样，在神话时代，生活是理想的，“不像现在这样”。被神话的托洛茨基是一场“纯粹的”、“真正的”革命的领袖，这场革命与他战败流亡后盛行的制度毫无关系。这样一场理想化的革命及其浪漫化的领袖不可能不吸引年轻人的同情。与任何神话一样，托洛茨基的故事没有令人不舒服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因此对过去的解释简单而生动，情感丰富。

“托洛茨基神话”中不仅有英雄，而且还有斯大林这个恶魔，这符合神话体裁的特点。和其他恶魔一样，斯大林也做了这种角色所固有的一切事情：他隐瞒了本应将权力传给英雄的意愿，篡夺了权力，并借助狡猾和欺骗追捕英雄。

像任何神话一样，它不仅讲述了过去的故事，还可以用来解释现在。因此，当赫鲁晓夫决定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解释他和他的同事们在解决国家事务中

遇到的困难时，他诉诸于一个现成的托洛茨基主义神话，尽管没有提及作者的真实身份。赫鲁晓夫完全按照托洛茨基主义关于斯大林的神话的情节，将国家的许多问题归咎于一个具有令人厌恶的性格特征的篡夺者掌权 30 年这一事实。对斯大林的这一描述几乎完全取自托洛茨基的著作。

与任何神话一样，托洛茨基“坚定革命”的故事成为了走向未来的运动纲领。恢复“真正的”、“纯粹的”革命思想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基础。在这个神话的名义下，苏联人民 70 多年来取得的所有真正成就都被一笔勾销。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努力创造并捍卫的经济、社会领域、文化、教育的完整性受到质疑。要求“回到”神话中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呼声变成了对现实生活中建立起来的一切的破坏。

回归革命起源的诱人神话与它的对立面——主要由托洛茨基的活动引发并诞生于内战年代的反苏神话——以一种令人惊讶但却自然而然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冷战期间，这种反苏神话再次被我国的敌人所采用。尽管战后版本的反苏神话不再提及“犹太势力”，但其本质是一样的：苏联历史被描绘成完全由敌视人民的势力统治的时期，是毁灭和衰落的岁月。各种“广播声音”播放索尔仁尼琴关于苏联的著作，将整个苏联历史描绘成在集中营铁丝网后的生存时期。苏联人民取得的所有成就、经济的崛起、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都被粗暴地划掉，并被宣布为“活在谎言中”。这种宣传在冷战期间美国战胜苏联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导致了一个大国的毁灭。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开始，反苏神话和托洛茨基的“背叛革命”神话开始相辅相成，致力于摧毁苏维埃制度。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后苏联改革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宣布这是我国走向国际社会的道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在苏联和苏维埃制度的解体中得到了真正的体现，随后又在苏联人民 70 多年来所创造的一切接连不断的毁灭中得到了体现。托洛茨基的梦想——将俄罗斯转变为欧洲联邦的国家之一——在我国屈从于西方主要垄断企业及其政治利益集团的过程中开始实现。

托洛茨基神话及其反神话（即反苏神话——译者）的惊人共生之处在于它们具有相同的本质——对我国人民、他们的历史和文化、他们的创造潜力的深深蔑视。从我国的二流性质出发，托洛茨基神话及其反神话都提出了我国的唯一出路——将我国作为原材料的附属品与“先进的”西方接轨，让我国人民作为初学者接受西方文明的熏陶。

关于托洛茨基的神话和反神话持续存在的原因是什么？众所周知，人类的神话诞生于原始意识之中，原始意识试图根据关于世界的原始观念来理解世界。这种意识无法区分自然和超自然，对矛盾漠不关心，也不具备抽象概念。尽管教育和信息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但现代人的意识中也存在类似的特质。现代生活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政治和国家人物的欺骗和虚伪，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大众虚假信息媒体，导致人们丧失了能够充分感知周围世界的强有力的道德和智力标准。现代人，即使受过良好的教育，也会被周围的生活问题所困惑，因此倾向于接受简单明了的神话，将其作为解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便捷手段。电视屏幕上无耻的骗人故事，报纸上叫嚣的谎言，书本上厚颜无耻的欺骗，取代了许多现代人对真相深思熟虑的探求。

大规模操纵舆论的手段不断制造和复制神话，让当权者得以控制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同样是那些有影响力的世界势力把托洛茨基推向了政治前沿，把“不断革命”的口号塞进了他的嘴里，每当俄国发生另一场革命时就宣传他，帮助他

争取权力，然后又嫉妒地关心他和他的声誉，而现在，这些势力又在重拾关于托洛茨基的神话和反神话，将其作为意识形态奴役人民的有效手段。

托洛茨基成为神话的对象并非偶然。内达瓦在《永恒的委员》一书中称托洛茨基为“犹太人中久负盛名的先知（或假先知）”，他的说法有一定道理。需要说明的是，先知和假先知并不只存在于这个古老的民族中。由于托洛茨基的预言几乎都是假的，因此他不应被归类为先知，而应被归类为假先知。

同时，这种特征在人类历史上也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既有的组织形式发生冲突，就会出现社会动荡和革命。为改变社会生活条件而进行的斗争不可避免地会引发激情，而在这一浪潮中，最适合表达激情的人也会崛起。在革命因素的电光石火中，一些人总是站在历史的前沿，他们倾向于表达摧毁旧秩序的思想，并承诺迅速创造一种新的、理想的生活。

毫无疑问，托洛茨基具有杰出的演说才能。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很少就和平的、创造性的生活主题发表演讲，而且演讲也不那么生动。他的口才是在等待革命或革命进行中的激烈听众席上发挥出来的。他蛊惑人心地要求在革命前将所有个人财产平均分配给人民，他梦幻般地计划在几年内建立高度发达的国家农业，他民粹主义地要求国家立即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他对人民的历史和文化持虚无主义态度，这些都表达了许多倾向于相信简单易行地解决复杂问题的人的情绪。托洛茨基对处于危机中的社会产生了催眠作用。托洛茨基的神话诞生于一个倾向于相信那些自称为革命先知和领袖的人的激情演讲的环境中。

在需要能够发动人民起义、能够带领士兵投入内战、能够以最残酷的方式粉碎动摇者的抵抗的领导人的时候，托洛茨基能够发挥他的历史性作用。在这些年里，人群动荡不安。他们不愿意长时间思考社会生活中的复杂问题，不愿意听取他人的意见，不愿意尊重他人的经验，不愿意努力解决棘手的问题。然而，托洛茨基并不具备从事创造性活动的能力，因为创造性活动不仅需要真知灼见，还需要长期的辛勤工作，需要与其他人协调自己的意见，尊重其他民族的习俗和文化。在远离革命战斗的生活中，他变成了无用之才。

出于同样的原因，托洛茨基神话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每次都不是在创造性劳动的时代，而是在社会动荡的时代复活。托洛茨基神话和它的对立面——反苏神话——的起源都是破坏性的，它们的良心是许多国家的死亡和千百万人民的毁灭。因此，只有了解托洛茨基这个真实的历史人物，才能成为这些神话的解毒剂，才能有助于从这些神话的邪恶魅力中解放出来。